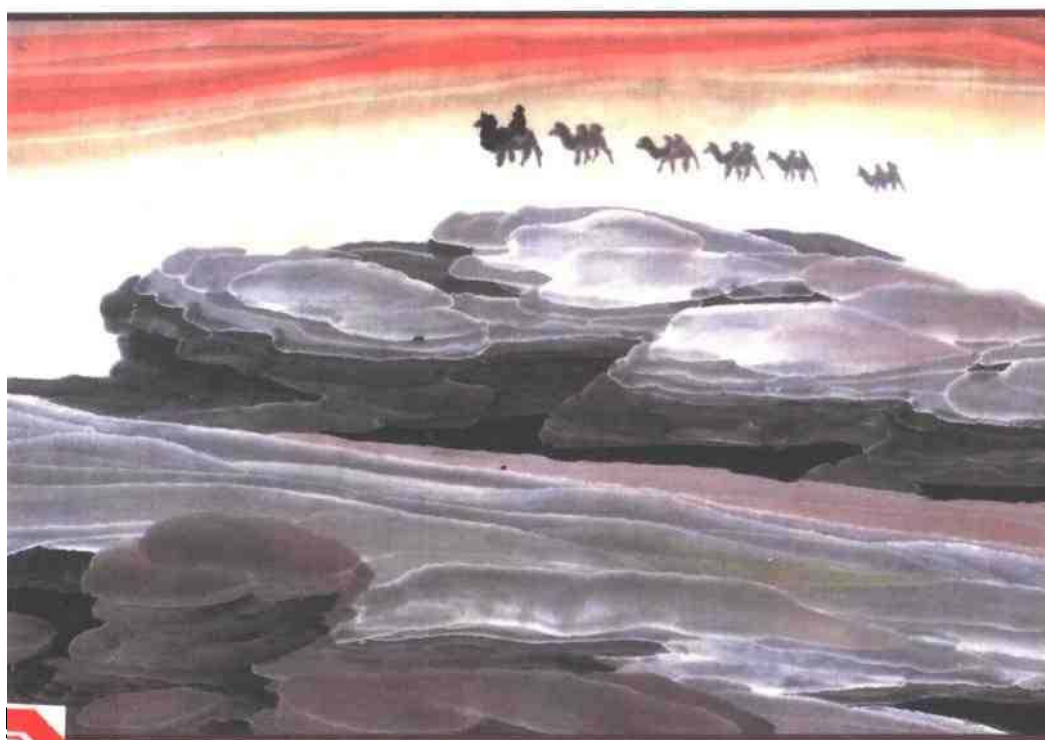


西域历史地理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WEST REGION



新疆大学出版社

XIYU
LISHI
DILI

ISBN 7-5631-1238-3



9 787563 112388 >

ISBN 7-5631-1238-3

K · 136 定价: 28.00元

西域历史地理

(第二卷)

苏北海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历史地理. 第2卷/苏北海著.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6

ISBN 7-5631-1238-3

I. 西... I. 苏... II. 西域—历史地理—研究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755 号

2001. 12. 29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6416331

Xiyu Lishi Dili

出版发行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邮编:8300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八家户彩印厂

规 格 850×1168 1/32 17.6875 印张 450 千字

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序

十年以前,我为苏北海教授的《西域历史地理》第1卷作序。我仔细阅读了该书全稿以后,著者在西域历史地理知识和治学精神及方法上,都给我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为此,我在那篇序言中特别指出:

“《西域历史地理》所论述和考证的,虽然都是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问题,但是著者考证和论述这些问题的动机和目的却是清楚的,是为了把事实考证明白,古为今用,为现代西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研究提供依据,也为现代西域的其他研究提供依据。由于过去流传的不少以讹传讹的说法经过本书著者的深入研究而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因此,《西域历史地理》中的许多考证和论述,不仅有裨于今日,而且有裨于将来。”

上面一段话,既是我对第1卷的评价,也是我对该书的赞叹。我为同行学者(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的著作作序始于15年以前,近年以赖,每年常多达十起。我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原则,第一,我决不有求必应;第二,我决不在序言中作没有根据的捧场。为此,我在那篇序言中最后提出:

“苏北海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值得称道的，这当然不是说，由于此书的出版，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苏北海教授在全面、系统和科学地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方面，作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不仅是此书讨论的这些专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而且更多、更广泛的其他专题，犹待不断地发掘探讨。希望因此书的出版，迎来一个西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高潮。”

现在看来，此书问世以后，有关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高潮，确实如我所期望的开始掀起，而苏北海教授仍然驰骋在这个高潮的前头。在这10年之中，我先后读到了他的《哈萨克族文化史》、《哈萨克族通史》、《新疆岩画》、《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等专著。而10年以后，我终于又读到了他的《西域历史地理》第2卷，让我满意地看到，10年前我在此书第1卷序言中所希望的，在第2卷中有了很好的体现。

这1卷共20章，第一章作为西域历史地理的一个专题，让我领略了著者在这个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宽广领域和卓越见解。在全部专题中，明显的重点有两个：第一是汉、唐两代在这个地区的戮力开拓和惨淡经营，第二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与这个地区的重要关系。对于这两个我生平都稍有涉猎却又莫悉奥秘的专题，第2卷的许多论证，使我豁然开朗，获益非浅。

第一个专题涉及我国西北和北方历史上的领土及其疆界。在这方面，我也曾经在拙著《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表达过个人的意见。在该书中，我对于不少人高度赞扬的秦始皇和秦长城，作了与某些人士包括权威人士颇不相同的评价：

“秦始皇当然是个武功卓著的皇帝，他降服六国，进军东南沿海和岭南，直至今中南半岛，救平所谓“百越”之地，但这是对于中国内部和南疆而言。对于中国的北疆，看来历史还应该对他作不同

的评价。他修筑‘尸骸相支柱’的长城，残暴达于极点，而智勇实属未流。他以长城阻遏北方的游牧民族，实际上暴露了他对汉族北疆的最低愿望。所以对汉族北疆的开拓和经营来说，他是一个眼光短浅，缺乏战略思想的弱者。他用千千万万生命的代价，为汉族修建了这样一条萎缩不前的北方疆界。假使没有后世的民族交流、融合和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中华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则我国的北疆将会成为怎样一种状况，人们或许不难想象。”

对于这条称为“万里长城”的秦长城（当然不是今八达岭一带的明长城），我在拙著中作了十分无情的评述，我为中国北疆历史上的长期萎缩不前找出了我多年思考的原因：

“这很可能就是这条万里长城限制。对于古代开拓北疆的事业来说，万里长城开始是地理上的限制，后天成为传统观念的限制。对于汉族的不少有志于北荒的领袖们，这条以夯土堆迭起来的人为界限，不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而且束缚了他们的抱负和思想，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

我在该书中用很多事实推崇了战国的赵武灵王。但是我接着说：

“可惜他的事业后继无人，包括秦始皇在内，在对付草原驕马民族和开拓北部疆域的事业上，都是那样的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以致贻误了许多开拓疆域的机会。否则的话，元代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局面，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我们历史上的北疆，在成吉思汗以前多少个世纪，就早已面临了北冰洋。”

我在此书的许多地方，赞扬了西汉在西疆开拓方面的功业。我说：“两汉在西北建置了金城、武威、西海、张掖、酒泉、敦煌各郡，并置西域都护府，把汉族势力伸展到今新疆。”当然，西汉对北疆的开拓也较秦前进了一步，我在拙著中指出：“对于匈奴，西汉毕竟比秦

多了一点作为,曾经进行了几次征讨,并且采用过和亲一类的睦邻政策。但是和它对西域的功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这个“微不足道”,实际上就是我对西汉为我们在西域奠定稳固基础,创建丰功伟绩的最大颂扬。现在《西域历史地理》第2卷不仅论证了汉代开拓西域的许多问题,并且论证了唐代经营西域的许多问题,为我们研究汉、唐盛世的西域历史地理提供了大量经过著者多年考证、精心分析的资料。对于这个专题的许多精湛章节,我的体会除了在第1卷序言中已经写明的“不仅有裨于今日,而且有裨于将来”以外,现在让我更进一步地感觉到,这个专题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界关心的和深感兴趣的,同时也是其他知识界甚至一般群众所关心和深感兴趣的。

我在上面说的这种体会并非没有根据,以第10章《唐轮台城位置考》第4节《岑参轮台诗歌的重要学术价值》为例,岑参描写西域特别是轮台的诗篇,长期以来脍炙人口。这些诗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历史地理学者通过这些诗篇,可以研究西域的历史沿革、地貌、气候等等,但除了在这些方面为专业学者提供学术上的证据外,这些诗篇在文学艺术上的感染力,实在异乎寻常。在一般知识界,不少人能背诵几首,也有些人能吟哦几句,这些人,既不是专业学者,也不是文学家,他们不知道《岑嘉州诗集》,也不翻《全唐诗》,他们是从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中读到的。这些人既不曾到过新疆,也从不研究新疆的历史、地理、文化,而是通过这些诗篇,才知道我国西陲的这片广阔、瑰丽和充满着神话故事的土地,从而产生了对这片土地的求知欲和热爱。

除上述岑参轮台诗篇以外,我还可以举一个我在大学时代的例子。我是抗日战争后期在江西省念大学的,当时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大学生生活艰苦,功课繁重,而新疆离江西又那么遥

远。但奇怪的是你在校园中行走,到处可以听到男女同学们哼着一支流行的、许多人爱好的、与新疆有关的歌曲。至今我还能全部唱出来,在这里不妨写上几句:“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从工学院到文学院,从农学院到理学院,大家学的是不同的专业,但大家都喜欢这支歌曲。凡是和我年龄相仿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记得起这支歌曲,而且热爱这支歌曲。这实际上就是热爱这片汉、唐以来的我国的美好领土。所以我认为作为第2卷内容的重点之一,即汉、唐盛世对西域开拓经营的研究,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

对于第2卷内容中的另一重点,即这个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的研究。在全书中突出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不仅说明著者由于长期从事西域研究而胸有成竹,同时也是他多年著作生涯中积累的关于著书立说的经验。因为在西域历史地理中突出这个专题,显然可以使全书锦上添花。而对于我来说,先前对此不过是一知半解,由于种种原因,最后竟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在现代化道路发展以前,世界各国的著名古道不知有多少,我也算是一个考察几条国内外古道的历史地理学者,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绝对找不出一条道,能够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可惜在8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这条古道的研究不多,著述很少。以创刊于30年代的著名历史地理刊物《禹贡》半月刊为例,此刊于民国23年(1934年)初创,到民国26年(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计出版七卷82期,共有论文700余篇,但竟无一篇论述丝绸之路,说明学术界当时并不注意及此。

70年代之末,我的好友,即当时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后来

调任为英文《中国日报》总编的陈砾先生,获悉我将应聘去日本担任客座教授,而我的夫人又熟谙日语,为此特地从天津赶到杭州,邀请我们到日本选择若干有关丝绸之路的著述,翻译后在他们的出版社出版,以引起国内知识界对这条著名古道的重视。到日本以后立刻发现,日本汉学家对这条古道的研究成果甚多,而在社会上的影响也确实超过中国。在大阪,我就买到了《丝绸之路辞典》和《丝绸之路地图集》,并且还在以“丝绸之路”作为店名的中国料理馆吃了饭。到东京我们在日比谷区书店集中的街上搜索有关丝绸之路的著述,从专题研究到一般介绍,大大小小竟达十几种之多。考虑到这类书籍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情况,我们选择了前岛信次的《丝绸之路的九十九个谜》一书(讲谈社出版),我夫人在日本就动手翻译。这是一本内容严肃的小册子,但富于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一般读者对这方面的知识当时还比较缺乏,所以我也不得不在讲课之余插手这项工作,花了差不多与翻译相同的时间,为中译本作了近250条译注,我们把译稿从日本寄回中国,让天津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就出版此书。

与此同时,我夫人又着手翻译另一本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专著,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知名的国际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岩波书店出版)。这不仅因为著者是我们夫妇的朋友,主要因为这本著作,其内容虽然论述中国陶瓷的输出路径,但这条道路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在翻译前曾与三杉隆敏的《海上的丝绸之路》作了比较,发现《陶瓷之路》的内容更为完整,而且这两条冠以“丝绸”和“陶瓷”的海路,实际上是相同的航程。三杉隆敏的著作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而三上次男的著作除了历史文献以外,他自己曾经多次在这条海路上作过实地考察;在翻译过程中,著者又为我们提供了不

少原版所没有的照片,并且由他亲自写了中译本序,于1983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在这两本有关丝绸之路著作的翻译中,我都是译稿的第一个读者,而且也帮助做了一些译注工作,所以使我这个对这条古道不甚了解的人增加了不少知识,因而对第2卷中的这些文章倍感亲切。

除了上述二书以外,从80年代初期起,我自己也接触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几件事情。1983年秋,我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国际人文科学学术会议,会上遇着我的前辈,前中研院院士,当时在香港主持新亚研究所的全汉昇先生,他与我谈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并且谈及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用英文撰写的《从晚明到清代初期中国与西班牙美洲的贸易》(收入于《东学义教授七十五寿辰论文集》,劳伦斯·G·汤普森主编《亚洲研究特辑》第29号,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1975年出版)。此文主要论证当时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如秘鲁、墨西哥等与其亚洲殖民地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关系。西班牙殖民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必须维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当时,秘鲁出产的白银,占全世界白银产量的60%以上,但菲律宾的低价农产品,根本接受不了这种高价的秘鲁产品,这种横渡太平洋的远程贸易,连船舶费用都无法偿付。但西班牙殖民者最后终于找到了门径,他们把菲律宾作为一个中间站,用美洲的白银到中国东南沿海换取价高而质优的丝绸。以后,墨西哥的白银产量也急剧上升,西班牙殖民者的船舶就这样长期往来于美洲、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之间从事以白银换取丝绸的贸易。为了这项研究工作,全汉昇先生特地到菲律宾查阅了当时的许多有关材料,并且与这段时期中太湖流域及杭嘉湖平原等地蚕桑、丝织业的迅速发展相印证,证实了在两个多世纪之中,这条横渡太平洋的、贸易额巨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我曾仔细阅读了这篇用英文撰写的

文章,由于全文很长,所以最后交给了我的研究生,即现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鲁奇研究员,由他翻译后发表于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的《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全先生的这篇文章。

另一件事是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论证。自从80年代以来,随着西域这条丝绸之路研究热潮的兴起,四川和云南等地,也出现一些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和报导,日本学术界对此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我于1985年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时,就有学者与我讨论这条古道的问题,可惜我当时所知甚少。对于传入日本的有关这条古道的信息,不少日本汉学家参差半信,很希望看到一种可靠的结论。而此事在日本学术界酝酿的结果,导致文部省组织了一个研究课题,他们邀请我作为主要成员。1990年夏季,这个课题成员之一,大阪商业大学商经学院院长富冈仪八教授,代表文部省专程来中国与我商量课题的进行,目的是要我通过实地考察,论证这条丝绸之路是否确实存在。我在作了半年的室内文献资料准备以后,于1991年春偕夫人去蜀。在四川省地理研究所和四川省丝绸局的协助下,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证实了这条古代运输丝绸从四川、云南到印度的所谓“蜀身毒道”的存在。这条道路在中国境内包括西山南道、临邛道、始阳道、牦牛道、岷江道、石门道、博南道、永昌道等段落,我把它定名为“南方丝绸之路”。我撰成一篇题为《关于四川省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报告,除了送交委托我进行这个课题的日本文部省以外,并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发表,读者可以参阅。

以上述及的我与丝绸之路接触的几件事情,实际上正是苏北海教授在此书第3章第1节《我国丝绸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所论证的。由于我国丝绸对人类的贡献,促使世界各地对这种商品的殷切

需求。因此,从我国境内到域外,从陆上到海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丝绸之路。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在所有经过学者研究和论证的丝绸之路中,本书所阐述的这条通过西域而东西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无与伦比的古道。正是因为本书所指出的这个古老的“丝绸之国”所出产的“无上珍品”,就是这个光辉灿烂的商品,在一段悠久的历史时期中,沟通了这条漫长的古文明地带。

我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本书著者在这个专题研究中所获得的新的成就,这就是第3章第3节《草原民族的丝绸之路》所论证的。著者在这一节中用极有说服力的各种证据说明:“丝绸之路的西去不论是通过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都得先通过草原地区,才能到达塔里木盆地及中亚河中地区,所以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是先有草原路。”

记得1983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讲课,这所大学的几位汉学家都与我讨论过这条道路与北方草原及细石器文化的关系问题,并且送给我刚刚重印出版的护雅夫所著的《游牧骑马民族的国家》一书(讲谈社1981年第16版重印本),指出在此书不少骑马民族的插画中,已经出现了丝绸服饰的迹像。读了苏北海教授的这段文章,使我恍然记起十多年前在日本高等学府中的往事。我认为著者在此书中提出的这种论断,已经解决了当年日本汉学家与我讨论的问题。

我在这篇序言中已经阐述了这些年来我与丝绸之路接触的点滴经过,但最后有必要说明我与丝绸之路关系中不可忘却的一件重要事情,那是在1986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兰州召开而由我主持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由国内外学者180多人参加的学术盛会。三天会议以后,全

体代表用几辆大轿车,花几天时间,考察了这条著名的历史道路,访问了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直到敦煌。虽然旅途辛苦,但是许多代表都说,对这样一次慕名已久的丝绸之路的考察,不仅三生有幸,而且收获巨大。我在这次学术会议中的开幕词,后来刊载在《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其中有关丝绸之路的一段是:

“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丝绸之路。当然,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这是许多门学科的共同成就,它可以单独地形成一门称为‘丝路学’的学问,这门学问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历史地理学者在丝路学领域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这个地区的历史交通运输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我们也应该加紧努力,做好我们在丝路学这门学问中应该做的工作,让丝路学这门学问获得更快的发展,让大西北这片伟大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开发。”

在这个会议以后的十多年之中,大西北的加速开发和建设成就的喜讯不断传来。特别是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大盆地的丰富石油资源正在为这片无垠的沙漠和新疆全区带来繁荣。而此时此刻,我又读到了苏北海教授的《西北历史地理》第2卷,这是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一部爱国主义读物。展读全卷,遐思无穷;溯昔抚今,衷心感奋。特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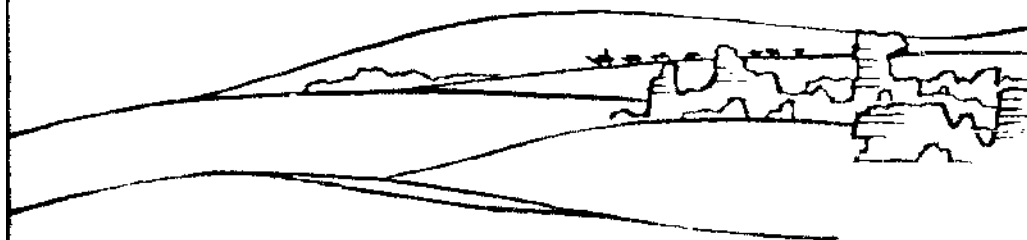
陈桥驿*

1998年2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 陈桥驿教授是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地理系博士生导师,国家终身教授。

西域历史地理

苏北海 著





作者简介

苏北海,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1915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长期从事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7部:《西域历史地理》第1卷34万字,获1992年全国高等院校出版社首届学术著作评奖二等奖;《哈萨克族文化史》45万字,获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著作二等奖;《新疆岩画》57万字,获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著作三等奖;《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20万字(合作);《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50万字;《哈萨克族通史》92万字;《西域文化史》90万字。正在出版中的学术著作《维吾尔族历史研究》50万字;《哈萨克族历史人物》40万字。另还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1992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西域历史地理(第二卷)

内容提要

本书在第一卷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诸方面,从纵横两个视角,用大量的史籍文献、考古资料和实地勘查所得,探讨和研究了西域的历史地理状况,颇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对汉、唐时期和清代以来西域的军政建置、疆域沿革、民族实情和国际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对巩固西域边防,加强民族团结,加速经济、文化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赵星华 王少杰

装帧设计:王钧兵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WEST REGION

-
1. The Ancient Loulan State and the Ancient Route with Millennial Brilliance

 2.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Viceroy's Offices in the West Regio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3. The Grassland Silk Road betwee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 Region and the Silk Road with Changan and Luoyang as its Centre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5. A Study in the Location of the Royal Court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Turkic Period

 6. Rise and Fall of the Xue Yantuo Khanate

 7. A Probe into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stituted in the West Reg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8. The Defence Works in the Turpan Basi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9.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iuzhong City in Turpan Basin

10.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the Luntai C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11. The Garrisoning Facilities of the Anxi Military Viceroy's Office in the Territory of Qiuc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12. On the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the Sizhen and Yixi Area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13. A Study on the Crescent City and Crescent Tribe

14. Yelu Dashi's Westward Expedi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

15. The Location of the Ancient Alimali City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16.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Ertix River Valley

17. Institution of Ili General Headquarter and Its Historical Exploi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8. Tsarist Russian Scheme in Boundary Survey and Tablet Erection in the Altai Region

19. In 1884,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Sino -- Russia Sequential Survey of Kashgar" Border and Its Problems

20. The History of the Pamir and Its Current State

目次

前言	1
1 光照千秋的楼兰古国和楼兰古道	5
(1) 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	5
(2) 楼兰王国与汉及匈奴的关系	10
(3) 考古见到的楼兰古城风貌	13
(4) 屯戍重地	16
(5) 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	30
2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位置问题	38
(1) 汉初西进西域的艰巨进程	38
(2) 汉在乌垒设立西域都护府	42
(3) 东汉班超迁西域都护府于龟兹	49
(4) 乌垒、龟兹的自然和人文比较	53
3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	63

(1) 我国丝绸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63
(2) 丝绸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关系	66
(3) 草原民族的丝绸之路	70
(4) 丝绸的国际关系及其战争	75

4 汉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关系	78
----------------------------------	----

(1) 汉唐时期自长安、洛阳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	78
(2) 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和边防巩固	80
(3) 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87

5 西突厥初期的王庭位置考	93
---------------------	----

(1) 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	93
(2) 西突厥汗国初期王庭周围的自然环境	95
(3) 西突厥初期王庭及鹰娑山位置考	99

6 薛延陀汗国的兴衰	108
(1) 为铁勒族正名	108
(2) 薛延陀部的族属及其经济、习俗	113
(3) 薛延陀等部反抗突厥贵族及契苾—薛延陀汗国的建立	116
(4) 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及其与唐、突厥的关系	122
(5) 薛延陀汗国的衰亡	132
<hr/>	
7 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州县考	142
(1) 唐以前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立的州县	142
(2) 唐朝在天山南路设立的州县	147
(3) 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立的州县	156
(4) 安史叛乱后的西域	165
<hr/>	
8 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国防设施	170
(1) 吐鲁番盆地的自然环境及战略地位	170
(2) 唐朝在东部天山南北的军事部署	173
(3) 守捉	175

(4) 镇	178
(5) 戍堡	186
(6) 烽铺	188
(7) 馆驿	201
(8) 车坊	214

9 吐鲁番盆地柳中城的历史发展	221
-----------------------	-----

(1) 柳中城的自然环境	222
(2) 柳中城在两汉时期的战略地位	224
(3) 公元3~13世纪柳中城的历史进程	228
(4) 东察合台后王统治时期鲁克沁的剧变	237

10 唐轮台城位置考	249
------------------	-----

(1) 唐轮台城建立的历史背景	249
(2) 乌拉泊古城即唐轮台城	257
(3) 唐轮台城周围地区的人类活动遗迹	261
(4) 岑参轮台诗歌的重要学术价值	265

11 唐代龟兹境内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军事屯戍设施	275
--------------------------------	-----

(1) 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屯戍古城	275
(2) 龟兹镇	282
(3) 守捉	284
(4) 关隘	289
(5) 亭燧	292

12 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	296
----------------------	-----

(1) 增设四镇、伊西节度使	296
(2) 四镇节度使的管区及武装	302
(3) 伊西节度使的管区及武装	312
(4) 光照史册的守边英雄	320

13 弓月城及弓月部落考	325
--------------------	-----

14 耶律大石西征及统一中亚	329
----------------------	-----

(1) 辽朝与西域的关系	329
(2) 耶律大石西征	337
(3) 统一中亚	346

(4) 统治特点	352
(5) 疆域与民族	358

15 阿力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	371
--------------------------	-----

(1) 阿力麻里古城的地理位置	371
(2) 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递变	373
(3) 伊斯兰教在阿力麻里城的发展	382
(4) 从钱币看阿力麻里城的经济文化	386

16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历史演变	393
-----------------------	-----

(1) 额尔齐斯河的位置及其战略地位	393
(2) 古代额尔齐斯河流域与中原的密切关系	395
(3)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9 世纪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民族活 动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397
(4) 成吉思汗征服阿尔泰山周围各部及瓦剌蒙古占有额尔 齐斯河流域的经过	403

17 清代伊犁将军府的设置及其历史功绩	410
---------------------------	-----

(1) 清代统一西部疆域的经过	411
(2) 伊犁将军府的设置	416
(3) 伊犁将军府的统辖区域	420
(4) 清代伊犁九城	430
(5) 伊犁将军府的军事部署	446
(6) 清代在新疆设立的卡伦及其功用	457

18 沙俄在阿尔泰地区勘界立牌中的诡谋	468
---------------------------	-----

(1) 中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签订经过	468
(2) 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签订经过	472
(3)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侵占了我国阿尔泰地区的大片领土	475

19 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及其勘界问题	482
-------------------------------------	-----

(1) 沙俄对浩罕的侵略	482
(2) 沙俄疯狂入侵喀什噶尔及帕米尔	485

(3)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及其勘界后果	490
(4) 结语	495
<hr/>	
20 帕米尔的历史和现状	497
<hr/>	
(1) 亚欧大陆的“心脏”——帕米尔	497
(2) 清代以前中国对帕米尔的统治	500
(3) 清朝对帕米尔的统治	506
(4) 沙皇俄国对帕米尔的侵略	514
(5) 英帝国对帕米尔的侵略	521
(6) 中俄关于帕米尔的划界谈判	524
(7) 1895年俄英瓜分我国帕米尔	529
(8) 苏联侵吞瓦罕走廊	534
(9) 中华儿女围剿侵略者	538
<hr/>	
后记	543
<hr/>	

山的辽阔疆域归入了中国版图。

哈萨克族杰出史学家尼合迈德·蒙加尼先生深刻地指出,西域归入中国版图“一方面是由于汉朝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西域少数民族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汉朝对西域少数民族的政策措施得人心,如对乌孙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方法;相反,匈奴贵族对各民族却实行连续的掠夺政策,使人们不能安居乐业,不断的征兵和各种苛捐杂税,很不得人心。所以猎骄靡、翁归靡为了乌孙人的安居乐业,实行亲汉政策,由联姻到军政同盟,最后乌孙国臣服汉朝。使原来乌孙国的广大疆土归入中国版图,这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为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决不是个别人所说的‘武力征服’或‘军事侵占’。这样的客观历史规律,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①这就是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真实。我在本书中所以要阐述汉唐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历史功绩的用意也即在此。本书中有的章节叙述了西域历代边界及划界情况,其宗旨在于维护祖国统一。

我国的唐朝,从唐太宗经唐高宗、武则天直至唐玄宗前期的一百多年时间中,被称为盛唐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历史的高峰,同时也是公元7~8世纪世界历史的高峰,是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辉煌的国家之一。为此唐朝如何统治西域,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需要认真总结。所以我在本书中重点叙述和确证了唐代的疆域、政治、国防设施等,充分阐明了唐朝对西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国防设施上的恢宏谋略,民族关系上的和谐和团结。

当唐太宗平定高昌国王鞠文泰的叛乱后,力排众议,在东部天山南北设置州县,并选用西域少数民族中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巩

^① 苏北海著《哈萨克族通史》序。

固边防、维护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在广大的西域土地上，唐朝的驻军最多时也不到五万人。这样一点兵力，仅可维持社会治安，一旦遇到动乱或外敌入侵，其兵员来源主要依靠西域少数民族军队。西域少数民族人民所以能心向中原，全然是依靠唐朝发达的经济文化和宽松的民族政策。岑参名诗《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中说：“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可见各族兄弟人民只要知道真相后，唐军一出，不用战斗，就“降虏来如归”。足证唐朝的民族政策在西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西域有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就筑起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可以战胜任何凶恶的敌人，创造许多奇迹。最突出的是公元755年关内发生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后，西域各族人民踊跃参军，奔赴平叛前线，英勇杀敌；同时西域的精锐部队也被调往中原平叛前线，仅留少数老弱残兵守卫西域。在此危急情况下，吐蕃贵族又乘机袭据陇右，切断了自关中通往西域的道路，在此艰困万状、完全被包围的态势下，驻守西域的少数唐军仍然团结西域各族人民，孤军奋战30多年，确保了西域土地未失，这是世界史上少有的奇迹。可知大唐业绩在西域少数民族心灵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怪不得唐朝在公元907年灭亡后，高昌回鹘时期的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僧古萨里把《玄奘传》、《金光明经》等从汉文译成回鹘文时，对我们多民族的伟大祖国——“桃花石国”（即中国）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挚的敬仰和无限的热爱。因而在汉文中的“中国”一词之前，增加了一个“伟大的”形容词，这在《玄奘传》译文中多处见到。同时还在译文的“唐”之前加一“大”字，一律译成“大唐”，充分表明他对唐代文化的仰慕。而僧古萨里所处的时代已是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西域也已分裂为高昌回鹘和喀拉汗王朝，他仍然能热爱伟大祖国，维护多民族的统一事业，向往大唐各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可知僧古萨里的身心已和中国这个崇高

的伟大名词融为一体了。这种思想是西域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生活在统一的祖国之内,长期间密切交往,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

清朝统一西域,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以统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域,由于清朝末年的腐败,新疆在俄、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被侵占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迄今帕米尔的问题仍然是悬案,成为新疆的未定界。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伊犁条约》划定的边界线,也在划界过程中,被沙俄用蒙骗、敲诈等方法划去不少土地,这是必须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早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不受强权势力的侵辱。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因此每一个地名都来源于各民族不同的语言。至于每一座古城,则都凝聚着各族人民开拓和保卫的血汗。同时每一座城镇,都和丝绸之路一样具有国际性,印刻着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光彩,不仅为全国人民所景慕,更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这就为我们开展旅游业提供了独特的宝贵资源,切不可身在宝山而不识宝。如楼兰古城、轮台古城、龟兹古城、阿力麻里古城、伊犁将军府,各种屯城、守捉城、烽火台等,都是宣传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只要能善于利用这些别地所无而为新疆所独有且享有世界声誉的人文资源优势,一定能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加速新疆的经济腾飞,使绿洲、草原文化的光荣誉满世界。

苏北海

1997年于新疆大学

光照千秋的楼兰古国和楼兰古道

(1) 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

《山海经·西山经》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岳之山。东望泐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①这里说到的泐泽，就是罗布泊，其所以称“泐”，因其水势很大很深故，但并未提到楼兰之名。

在汉文史书上，楼兰名称始见于公元前 2 世纪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 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遣汉文帝书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二当作三引者），皆以为匈奴。”可知楼兰已役属匈奴，但汉朝还是第一次听到楼兰的名称。对楼兰的位置及情况还并不清楚，直至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各国情况后，司马迁才据张骞报告在《史记》中写出《大宛列传》，明言“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盛极一时的楼兰王国从公元 4 世纪末 5 世纪初就消失在茫茫黄沙之中。近代以来经过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美国人亨丁顿，中国的黄文弼、陈宗器、新疆考古所等的探索，才对楼兰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根据国内外一些考古学家的实地探查，不仅找到历史

^① 袁珂《山海经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 页。

时期铜、铁器的文化,同时还出土和采集到不少石器时代的文化,从而可以断定:在罗布泊周围地区从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

不妨先描述一下楼兰国的位置及其周围地形。经新疆考古所1980年测定,楼兰城址位于东经 $89^{\circ}55'22''$,北纬 $40^{\circ}29'55''$ ^①,适处亚洲大陆中枢,远离海洋,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沙漠戈壁包围之中,其北面横亘着一条由西向东的库鲁克山(即“干山”意)。在楼兰周围地区的年降水量一般不足20毫米,年蒸发量却为2500~3000毫米,高于降水量的100~200倍,可知这里的生态环境十分严酷。但在远古西域,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类的活动,在楼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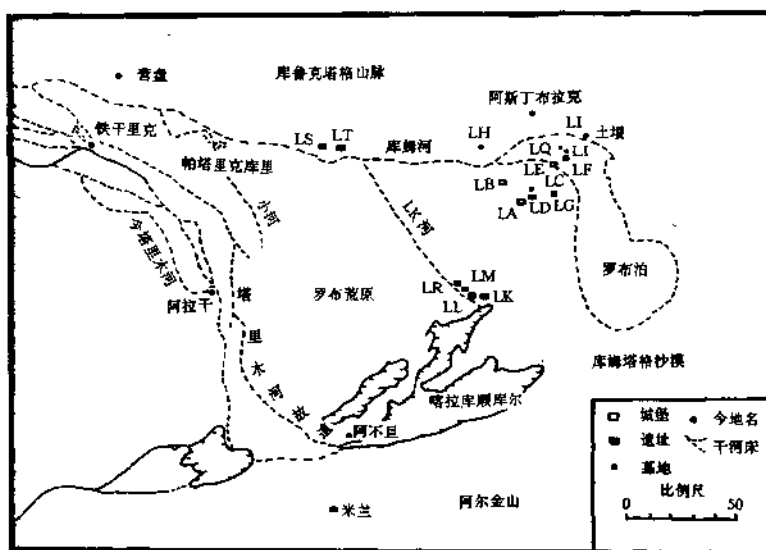


图1 罗布荒原考古遗址分布略图
(引自《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①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区得天独厚的是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两条大水的尾间,所以从远古起就汇集成一个碧波浩渺的罗布泊,从而这些水域周围成为人类生存并得以施展才华和创造的园地。

斯坦因曾在楼兰故址及孔雀河谷采集到不少细石器;贝格曼也在孔雀河上的小河东面雅丹布拉克附近发现了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点,采集到燧石核、燧石叶、石刃片、石刀、柳叶形石箭头等。斯坦因认为:“在风扫光了的地上屡屡拾得石器时代的石箭镞、石片,其他小件器具……可以证明,这些地带在史前时代末叶,必然已为人类占有。”^①并肯定楼兰故城有人居住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早期。1930、1934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两次从罗布泊北的土垠向西,在盐壳地带及酒海沿岸的考察中,发现石器时代的文化点五处,采集到石器百余件,大件的有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等类,小件的有石刃片及各种石矢镞等类,大都为打制,因而他认为“金属文化输入楼兰以前,楼兰有一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②

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多次在楼兰古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对楼兰王国的形成及其史前社会有了更多科学依据。如1979年底在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上古墓沟发掘了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的古墓葬42座,获得了大量的包括石器在内的各种原始社会时期的珍贵文物。这片古墓沟墓地位于东经88°55′21″,北纬40°40′35″处,东距罗布泊约70公里,正当楼兰故城西向焉耆、龟兹的孔道。

这块墓地东西长35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1600平方米,墓葬形式可分两类。一类墓葬是地表无环形列木,仅部分墓葬墓室东西两端各有一根立木,露出地表,这类墓葬占多数,共36座;另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95页。

^②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一类墓葬的地表有七圈比较规整的环列木桩,由内向外,精细有序,列木呈放射状四向展开,蔚为太阳形的壮观,共6座墓。在无环木的第一类型墓葬中,死者全部仰身直肢,头东脚西,裸体包覆毛织物,平卧于沙土上,墓中除个别合葬二男性、三男性外,均只葬一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墓内随葬物主要是随身的衣物、装饰品,彼此差别不大。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存在小家庭,婴幼儿都在母亲身旁,随葬物也相差不多,可见其占有的生活资料基本上是平等的,只是在一些女性墓中,尤其是老年女性墓中,除随身的衣物随葬物外,还较其他墓葬稍多一点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木盆、木碗、锯齿形刻木,以及盛水的羊、牛角和木雕女性像等,这些都表明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①

墓葬内的尸体全身包裹于毛毯中,打开毛毯,可见死者头戴尖顶毡帽,毡帽上有的还插禽鸟翎羽,足穿牛皮鞋;于右胸上部还均挂一麻黄碎枝小包;在麻黄小包近处,都有一件草编小篓,在草篓内盛10多粒或100多粒小麦不等,也有白色浆状物的东西,腕、腰、颈部有玉、骨、珠饰等;还随葬有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器,木制盆、碗、杓、角杯、兽角等。可见生活在这块墓地周围的远古人群主要饲养牛和羊,因为墓中殉葬的牛羊角,最多达26支,也可知他们的主要肉食是羊、牛肉。而瑞典贝格曼和中国胡邦铸先生等都已在孔雀河北面不远的库鲁克山中兴地发现了远古的重要岩画,现属尉犁县库鲁克山兴地峡谷中的兴地村。其中最大的一幅岩画长15米、高6米、面积约90平方米,大小图像近300个。这里的岩画内容甚为广泛,有多种动物图像,还有狩猎、放牧、车辆、驮运、宗教、征战、舞蹈、建筑、印记等。单就动物图像说,就有羊、骆驼、马、鹿、狗、野牛、虎、雁、鸟、鹰、蛇、鱼等,尤以羊、骆驼、马、鹿、狗为多。^②这是与库鲁克山、古墓沟、楼兰周围地区古代的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

^① 参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② 转引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图。

通行于戈壁沙漠之间,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除车辆外,最主要的是骆驼和马,与《汉书·西域传》所说“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的情况相符。尽管古墓沟地区石器时代的人民以畜牧为主,但也已有农业,尸体所附草编小篓内所盛麦粒就是明证,不过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不是以农业为主罢了。

1979年11月和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两次有组织地深入罗布泊地区对楼兰古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察,获得了不少重要考古资料,把楼兰历史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先说采集到的石器文化,过去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在楼兰周围地区所采集到的石器,从制造技术上看,一种是以打制的细石叶和燧石核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以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杂陈为特征,总起来也有相当数量的石器,但都没有指出何处是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和聚点,而新疆考古研究所这次在楼兰遗址采集到的石器文化标本在百件以上,其中以在楼兰城采集到的为最多,因而作者认为,现存的楼兰遗址是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聚点和中心”。也就是说,“楼兰遗址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从使用最典型的细石叶和燧石核开始,中经使用琢制细石器、桂叶形石器到使用磨制石器和金属工具,这里一直都存在着人类活动”。^①这次新疆考古研究所在楼兰遗址采集到的细石器文化遗物,“按其形状和用途来分,主要有单脊细石叶、双脊细石叶、截端细石叶、发卡形细石叶、啄背细石刀和燧石核、三棱尖状器、刮削器以及三角形、四棱形、桂叶形细石镞和石矛等。从制造技术上来分,打制的较多,多在一边或两边有比较精细的第二步加工;琢制的其次,用压琢法作出锋刃;磨制的较少。从色相和质地来分,有灰绿色、黄褐色、深绿色、淡红色、枣红色、赭色、绛紫色等玉髓,有灰色泥灰岩、绿色钙质粉砂岩、褐色石灰岩、青绿色变质砂岩、暗绿色板岩,也有绛紫色

^①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的火山岩、滑石化的蛇纹岩以及隐晶质的淡蓝色硅华和蛋白石等。这些石器的石质细密、坚硬,打制、琢制、磨制的技术都精高。”^①这里的细石叶和石核是细石器的代表,使用时间早而长,与内蒙、华北一带细石器的类型及制造技术都比较一致。^②而众多形式的细石铤,使用时间延续很久,很可能一直进入金属工具的使用期。这些都确凿证明楼兰地区存在史前的石器文化时期,是西域石器文化的光辉篇章。

(2) 楼兰王国与汉及匈奴的关系

当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楼兰名称的时候,楼兰王国已为匈奴役属。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原以内蒙阴山做根据地的匈奴冒顿夺得单于位后,势力日强,即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约于公元前2世纪起即役属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三十六国。位于楼兰旁的盐泽,历史上曾称为泅泽、辅日海、牢兰海、蒲昌海、临海、罗布淖尔、罗布泊。《汉书·西域传》指出:“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据近代考古证实,楼兰遗址位于白龙堆西,临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流入罗布泊近处,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为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重要门户。

自匈奴贵族统治西域以后,由于得到了西域广大地区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资源,匈奴的势力日强,对中原的侵扰也日盛。汉初经过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几代皇帝近70年的忍辱负重,积蓄国

^① 侯旭《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② 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力,到武帝刘彻时才决心断匈奴右臂,以根除北边匈奴贵族侵扰的祸患。由于匈奴的根据地是设在天山中段的焉耆、危须、尉犁间,因此汉武帝势力进入西域必须避开天山中部的匈奴根据地,沿着天山南麓西进。当然沿着昆仑山北麓西进也是匈奴势力较为薄弱之地,不过在这条路上建立汉朝的前进基地,很难随时出击匈奴主力,动摇其根本,所以只有从敦煌向西北经玉门关、楼兰、库尔勒、龟兹一线,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随时威慑敌人的战略之路。从而楼兰就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略重地。匈奴贵族当然也看到了汉朝西进的战略意图,所以千方百计要控制和严密监视楼兰的一切动静。于是汉与匈奴在楼兰地区展开了极为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

尽管自敦煌西北至罗布泊之间大都是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路途十分艰险,但汉武帝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筑成一条新的长城,直插罗布泊,为西进西域打下了可攻可守的牢固基地,《汉书·西域传》所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就是这种真实的记录。当近代国内外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实地考察后,无不赞叹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处处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和力量。正是在这种巨大国防工程的支撑下,汉朝才有可能不断向盘踞在西域的匈奴出击。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称:“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从这简单记载中可以知晓,汉武帝时西出西域的使者,每年十余辈都是经行于敦煌、玉门关、楼兰、龟兹一线,匈奴贵族当然十分恼恨,唆使楼兰王遮击汉使。对此,“武帝即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汉朝虽然以兵威迫使楼兰王降服,匈奴贵族当然不会让卧榻之旁有雄狮酣

睡，必然立即发兵击楼兰，楼兰王无奈，只好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过程中，匈奴对汉朝势力深入西域任何时间都要进行阻击。公元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仍唆使楼兰遮击后过的汉使，汉朝即遣屯驻玉门关的军正任文便道引兵捉得楼兰王，责其首鼠两端，楼兰王直言不讳地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①确实，只要楼兰王住在楼兰城，他只能脚踏两只船，既要讨好匈奴，又要结好汉朝，楼兰王的态度必然是随汉匈之间势力消长的情况而变化。《汉书·西域传》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僦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怨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尉屠耆降汉，具言状。”在这种情况下，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就断然决定由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率勇敢士，资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到达楼兰后，即设计斩杀了楼兰王尝归，“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为什么要把楼兰王都迁至鄯善，国名也因是而改，显然这是汉昭帝的重要战略决策。如果不这样做，仍把楼兰王放在楼兰城，必然时刻会受匈奴贵族的挟制，阻断汉朝势力的西进。现在把楼兰王迁放于婼羌，又有汉屯田士兵进行保护，就可坚其向汉之心，而楼兰城则可成为汉朝在楼兰地区的屯戍中心。这样就可使敦煌、玉门关、楼兰、渠犂、轮台的屯田联成一线，并力全而出击以天山为依托的匈奴贵族。所以公元前77年楼兰王国的迁都鄯善和更改国名，是一件历史大事，大大有利于推进汉朝对西域的统一

^①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事业。

(3)考古见到的楼兰古城风貌

从飞机上俯瞰远古孔雀河三角洲,存在四条大的干枯河床,河床两岸密布有许多小河叉和小水塘,楼兰古城即座落在第三与第四条河床之间。从遥远的古代起,这里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从采集的各种石器遗物,尤其是众多的细石器文化看,以楼兰城为中心的村落已在逐渐形成中。

楼兰城的城墙经新疆考古研究所重新测定,为东面长 335 米,南面长 329 米,西、北两面各长 327 米,总面积为 108 240 平方米,基本是正方形,校正了 1914 年斯坦因测定的残垣西长东短的错误。^①由于楼兰地区常年盛行东北风,因而南北城墙相对保存较多一些。北城墙东端残长 35 米、宽 8.5 米,残高 3.2 米;西端残长 11 米、宽 5.5 米,残高 3.5 至 4 米,东西两端之间有一 22 米宽的缺口,可能是北城门。南城墙东部东端残存 60.5 米、宽 8 米,残高 3.5~4 米;西端分为两段,靠西南角的一段残长 4.5 米、宽 6 米,残高 2.3 米,靠中部一段残长 9.5 米、宽 5 米、残高 3 米,在中部东南两端之间有一宽 13 米的缺口,适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可能是南城门。东西城墙适迎着常年的东北风势,所以残存的城墙较东西城墙少和矮小。从这座古城的残存城墙看,都是夯土筑成,有的在夯土层间夹有红柳芦苇枝,有的则夹有碎陶片和垃圾物,从夯土层厚薄不均的情况看,这座古城并不是一次建成,而是经过多次分筑而成。

在古城中,从西北角至东南角有一条残存的古河道,水道宽

^①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1 页。

16.8米,深5.5米,底端淤积层厚1.9米,这就是供楼兰古城中居民饮用的淡水,因为在水道上还残留有许多水螺壳,即为流淌河水的证明。如以古水道为中轴线,可把楼兰古城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大部分。东北部以佛塔为标志,可称为佛教寺院区;西南部以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为重点,散布着不少大小宅院,应为居住区。先说东北部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区,现在佛塔残高10.4米,塔基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8米,分九层建筑。一至三层系夯土筑,第四层夯土中夹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之间,夹有10~15厘米的红柳枝。塔呈多角形,紧靠塔身右侧还以土块垒筑一小台,高与第五层塔身相齐;在土台与塔身之间有坡道相通。在佛塔南面的台地上散乱的大木材上压有用红柳枝和芦苇编成并外敷草泥的墙壁,斯文·赫定(1901年)和斯坦因(1906年)曾先后在这里出土了汉文、佉卢文木简、纸文书、木雕佛像、佛像木座和许多精毛织品。新疆考古研究所也在这里采掘到丝毛织品、玉髓质、玻璃质的各色饰珠和来自别国海岸的海贝、珊瑚等物。^①这些物品充分证明楼兰城确是早期丝绸之路上重要而繁华的都市。在佛塔东面32米处有一堆积着散乱木材的小台地,在木材下出土了黄灿灿的糜子堆,堆积层厚达70厘米,宽约1米,其中还夹有少许小麦和大麦粒。新疆考古研究所认为是粮食仓储的遗迹。^②日本长泽和俊则认为僧房。^③看来,新疆考古研究所的论证较正确。

楼兰城区的西南区除残存一些大小院落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相连的三间房址,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106.25平方米,中间一间较大,东西两间较小。1901年斯文·赫定曾在东面一间小屋中掘得纸文书36种;1906年斯坦因又在此屋中掘获

① 侯旭《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233页。

② 侯旭《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③ 长泽和俊《楼兰国王》第三章《笼罩沙漠的战火》,日本第三文明社1976年日文版。

纸文书和许多木简；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在三间房区掘获木简一枚，两面书写的纸文书一种，还有精美的丝毛织品、陶灯、麻鞋、装饰品、日用品多种。另在三间房西35米处是斯坦因出土过大量木简的地方；新疆考古研究所又掘获了纸文书1种，残木简60枚，其中有西晋泰始年间年号记载的木简4枚。^①在西南区内的另一组面积约350平方米的大宅院采集的朽木标本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

新疆考古研究所1979年为了进一步研究楼兰城的历史，还对距楼兰古城东北4.8公里处古墓葬群的七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得到了随葬的羊骨、铁镞、耳饰等物。在一座葬有小孩的墓中，见小孩头裹素绢，枕倚木案一块，紧靠左臂有铜镜残片一块，铜镜边有内向连弧纹饰，以镜纽为圆心，围绕圆心作几何对称的四个花瓣，瓣尖均向外，花瓣之间还夹以卷草，纽成半球形，这是西汉晚期比较流行的一种铜镜纹饰。小孩头枕的木案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碳14测定，距今约2040±90年。^②在此墓地东北两公里，距楼兰古城约6.9公里处，1914年斯坦因曾草草挖掘过14座墓葬，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这块东西长43.4米，南北宽15.7米，高出地面8~9米的墓地上发掘了许多精美的丝、毛、棉织品，漆器残件、木制用具等物。在丝织品中有各色丝绢出品：绢织品中有一件三种颜色缝缀的小人衣服，丝织品十分耀眼，单有铭文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就有五个品种，其他还有“长葆子孙”、“长寿明光”、“长乐明光”、“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永昌”等铭文；在铭文中更杂各种姿态祥禽瑞兽和卷草流云纹锦。此外还有刺绣。毛织品中有多种颜色艳丽的毛绒布、栽绒花木毯，和以通经断纬、纬上起花的两面纹饰一样的缂毛。棉织品虽是平纹十字交叉，但粗细有别的纱线，织

^① 侯旭《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② 侯旭《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出的布纹极为整洁均匀,以及墓葬中出土的各种红里黑外的漆器和木杯、木碟、木案、木罐等多种器物,无不体现出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楼兰的民族特色。在一座葬有八具尸体的墓葬中除有汉五铢铜钱、膝木杯、木案、羊头骨等随葬物外,从该墓采集的朽木标本经碳 14 测定,距今为 1880±85 年。^①可知这块墓地上的丰富出土物为东汉时期的文物,弥足珍贵。

在楼兰古城北部稍东 4 公里处,还有一座较小的佛塔,残高 6.28 米,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为塔基,宽 7.1 米、高 4.6 米;基上为塔身,残高 1.6 米,塔中心是环形建筑,环形台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像壁画残片,以土红色为主色调,台上还遗存塑造佛像的草束木骨架。围绕环形台西南两面残存的土块垒砌墙,形成的直角相交处的甬道还残留有彩塑佛像的眼睛、手指、胳膊等。根据佛塔壁画和塑像残段看,可能属魏晋时期。^②由此可知,楼兰古城内外均有佛教信奉遗迹,足证楼兰时期,当地土著和汉族戍军都信奉佛教。

(4) 屯戍重地

其一、西汉屯田

公元前 77 年,楼兰王被杀,楼兰国迁都婼羌,改名鄯善后,楼兰城就成为西汉在西域的军事基地和屯田重地。这一战略决策加速了西汉统一西域的进程。因为楼兰城距河西及内地最近,地处丝绸之路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的交叉口,水土资源丰富,又属汉政府直接管辖,距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最近,因此成为西汉政府在西

^①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5 页。

^②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6 页。

域驻军的大本营,经常住有屯田军一万多人,最多时达一万五千人,这样就对西域的匈奴贵族时刻起着威慑作用。这些屯田部队很多带有家属,平时屯田,有敌情就参战。他们挖井修渠,开荒种地,建仓积谷,既保护了屯田官兵的安全,又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在楼兰的屯田,《史记》、《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和1933年曾两次到罗布泊地区考古,在罗布泊北岸及孔雀河下游发现了汉军屯垦的沟渠、堤防和兵营住宅,以及西汉古烽燧亭的遗址。于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汉简数十枚。在这些汉简中曾多次记载西汉在楼兰屯田的粮仓,如“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与守居卢訾仓、车师戍校(缺)”^①。这是公元前25年11月12日,西汉政府发给守卫居卢訾仓和车师戍校的敕令。又如“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土□尉临居卢訾仓以□□……”^②。西汉成帝时元延只有四年,到五年时已改为绥和元年,由于西域路远,甫改年号,尚未及知悉,或路途受阻而难知,这简记的就是公元前8年二月间某屯田校尉到居卢訾仓督查工作。汉简还记称:“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③此处交河曲仓史书未见记载。按汉制军下有部,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此处言交河曲,即车师屯田汉军积谷于交河曲,故称交河曲仓。而交河曲仓的守丞衡,因汉制丞理民事,司马、候管兵马。这里就是说交河曲仓的守丞衡移文于居卢訾仓。还有一汉简记称:“居卢訾仓以邮行”。^④这就是说居卢訾仓不仅是供给西汉官兵口粮的大粮仓,同时也是传递文书的驿站。这个居卢訾仓就是《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所记“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鞞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192页。

^②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2页。

^③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2页。

^④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2页。

居庐仓以讨之”。这里的居庐仓即上述居卢警仓的简写，实际居卢警仓、居庐仓均系译自西汉少数民族的地名。那末这个居卢警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根据黄文弼教授的考证，居卢警仓应在罗布泊的东南，即三陇沙的北头，与楼兰城为东南与西北的对峙形式。盖由沙西井向西北行，过白龙堆，到楼兰城。^①即《魏略·西戎传》所说：“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中为中道。”

黄文弼在罗布泊采集到的汉简二七记有：“史隆家属畜产衣物籍”，间二八记有“□□□时籍”。^②这里的“籍”即簿，就是说汉政府为了管理好屯田，规定在屯田区要建立各种“簿录”，其中主要有：计簿，即统计事物数据的登记簿；算簿，是征收人头税的登记簿；田簿，是登记亩产量的簿；食簿，是登记屯田卒领取口粮的籍簿；器用簿，是登记兵器和农具的籍簿；牛簿，是登记牛的簿录等等。这些籍簿都要上报大司农，以便中央了解各地屯田的情况。

西汉在楼兰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根据西汉兵制规定：“天下人皆直戍边三口，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使往者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③可见当时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都有戍守边疆的责任，所以在楼兰屯田的戍卒都来自中原不同地区。如罗布泊出土汉简三四记有“土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玃年州，私从者同县籍同里交上□□”。^④这里的土即士，指戍卒。宋钧系河南南阳郡涅阳石里人，并带有30岁的妻子和同里的人同去楼兰。西汉时期，还由政府招募和鼓励内地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194页。

②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1页。

③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兵制。

④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01页。

志愿人员前往楼兰屯垦，他们在军屯附近的城乡和交通要道参加屯田，被称为民屯。罗布泊出土汉简三〇记有“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①。这里指出去楼兰屯田的孙尚是响应西汉政府动员来的关中长陵县（今陕西咸阳附近）仁里的应募士，并被赐予五等爵大夫。汉简二九还记有“霸陵西新里田由”^②。简三二记有“小巷里王护”^③。说明田由、王护都是从关中霸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北）应募去楼兰屯垦的贫民。

西汉政府对支边军民执行厚惠政策。如大力鼓励屯田军带家属，简三五“右六人其二亡土，四土妻子”^④。这里四人有妻子，二人的妻子已亡。简三六“妻□二人一伯子”，简三九“没临中女子二七□为□男子十□□□□”^⑤。这二简都证明楼兰不少戍卒带有家属；即使未带家属，或遇妻子死亡难觅配偶时，西汉政府也帮助解决妻室。同时西汉政府对前往楼兰屯田的家属，在运输和口粮方面也给予照顾。简四一还记有“□□□□□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⑥。这就是说某戍卒带家属六人，配给官驼二匹，帮助驮运物品，还提供了粮食帮助。

在军事上，对楼兰屯田卒都发给武器，汉简五二记有“五石具弩一、承弦服、棰丸一”^⑦。这里的棰丸为藏矢用具。另汉简五三还记有“奚椎一”^⑧。黄文弼先生把“奚”释为兵，认为兵椎也是一种武器，较为确当。而屯田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由政府统一发给；同时屯田军民的口粮也由公家拨发。汉简四二“凡用世三石七斗升

①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01页。

②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1页。

③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1页。

④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3页。

⑤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3页。

⑥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4页。

⑦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7页。

⑧ 黄文弼《罗布泊考古记》，第207页。

大”^①。汉简四三“十二月十日，□□粟二石”^②。汉简四九“为东卿造水三斗，醇酒一斗”^③。这些汉简不仅说明公家发给口粮，而且还发给酒类等饮料。至于屯田军的衣服，也是政府统一配发。汉简五四记有“绡袍一领，络□一两”^④。此处绡指细葛，络指生丝。就是说某屯田卒领到细葛布袍一件，生丝一两。同时屯田机构还有一定的医疗设施，汉简三九记有“治大……头痛”^⑤。可知楼兰设有军医为戍卒治病。

西汉屯田军民的主食是粟、小麦、稷。粟，俗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是北方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我国及其他许多国家最早栽培。楼兰屯田军民来自内地，加上楼兰也是干旱地区，所以从内地带来的粟种就成为楼兰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汉简四〇记有“六月乙丑尽，七月积一月十二日，食粟四石二斗”^⑥。汉简四三记有“十二月十日，□□粟二石”^⑦。可见西汉楼兰屯田军民的主要粮食是粟。同时小麦最早产于天山南路，所以小麦也是屯田军民的重要食粮，在汉代直到魏晋时期都是如此。另外，稷去壳后称糜子，也是屯田军民喜爱的食粮，曾在楼兰古城内发现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

为了鼓励屯田军英勇杀敌，卫国立功，还在政治上对有功军民赐予官爵。上述简文中提到的史隆赐给八等爵公乘，孙尚赐给五等爵大夫，就是佐证。

只有对屯田军民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实施比较宽厚的政策，才能解除他们的各种顾虑，全身心地为国立功。西汉政府于公元前77年在楼兰屯田以后，确实对统一西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屯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04页。

②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4页。

③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5页。

④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8页。

⑤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3页。

⑥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4页。

⑦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4页。

田军和西域其他地区的屯田军与乌孙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很快就击败了匈奴贵族,于公元前60年迫使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降汉,撤消了僮仆都尉府,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疆土归入了中国版图。回看历史,汉昭帝决定在楼兰屯田的决策是颇有政治和战略远见的,使屯田为西域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二,东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

东汉在楼兰的屯垦,与东汉时期西域的整个形势有关。东汉时期西域残余的匈奴势力虽有所抬头,但毕竟已不能和西汉时西域未统一前的匈奴相比。同时东汉时已在哈密、吐鲁番盆地建有屯垦据点,楼兰屯垦也已不如西汉时期那样独力膺东部御敌的重任,所以东汉在楼兰的屯垦就不如西汉在楼兰屯垦规模大。再加上西汉政府对西域实行积极进取的政策,而东汉政府重内轻外,对西域实行消极防御,甚至动摇退让的政策。也是促成东汉在西域的屯田规模较小,屯田军人数也较少的重要原因。

总起来说,东汉政府对西域的屯垦,从公元73年开始,到220年结束,先后断断续续120多年,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东汉初期公元73年创办西域屯垦开始,汉明帝派军先攻占东部天山南北地区,开始在伊吾、柳中、金满屯田;同时班超出使塔里木盆地后,汉军即在楼兰、于阗、疏勒屯田;不久因汉章帝放弃西域,从而公元77年东汉在东疆和楼兰的屯田也停办。第二阶段,是东汉中期从公元91年开始,班超统一了西域,从而东汉政府在伊吾、高昌、柳中、金满、楼兰、精绝、疏勒等地发展了屯田事业,但到公元107年时,汉安帝再次放弃西域,各地屯垦被迫停办。第三阶段是东汉后期从公元123年开始恢复屯垦的阶段,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为止。这一时期由于东汉国力衰弱,再加上政府对西域抱消极冷淡态度,中原和西域常处于半通状态,为此西域各地屯垦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东汉统治西域时期,无论是讨伐北匈奴,还是平定西域内部叛乱,虽多次从河西四郡调用部分兵力,但主要兵力

是依靠西域属国的地方部队统一了西域,可知东汉时在西域的汉军较少,参加屯垦的人数也必然远少于西汉。有人估计东汉在西域各地屯垦的戍卒只有 5 000 人左右。^①

这里单说东汉在楼兰的屯垦。永平十六年(73 年)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他首先清除鄯善的匈奴势力,使鄯善首先臣服东汉。永平十七年(74 年)十一月,东汉在西域第一次设置西域都护,并在所属各地发展屯田事业,以求解决塔里木盆地南道官兵的军粮,维护丝路的畅通。东汉政府就派军队和犯人到楼兰屯田。史书并未说明军屯和犯屯的人数,只是说在汉章帝建初元年(76 年)杨终向汉章帝上书要求把参加公元 70 年楚王谋反和 73 年淮阳王谋反之狱,被冤屈徙边的罪人及其家属迁回内地,以平民愤。《后汉书·杨终传》具体指出:“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由于杨终等人的建议,汉章帝于公元 77 年决定放弃西域,“悉罢边屯”。

和帝永元三年(91 年)底,东汉政府在西域重置西域都护后,在楼兰也恢复了屯田。除军屯外,还遣去不少犯人,进行犯屯。《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永元八年(96 年)“八月辛酉,饮酎。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然后由敦煌再发配楼兰,这是东汉的惯例。公元 107 年东汉放弃西域,楼兰屯田当然再次被迫停止。

安帝永元七年(120 年),北匈奴攻没伊吾索班屯军,鄯善王尤还系汉人外孙,害怕匈奴乘胜进攻,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上书朝廷,请求出兵西域救援,班勇即建议派军到楼兰屯田。《后汉书·班勇传》载:班勇主张“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又宜遣西域长史将 500 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疆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这

^①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7 页。

个建议受到少数愚庸大臣的阻挠,一时未能实行。直至延光二年(123年)夏因匈奴勾结车师东寇,河西走廊大被其害时,朝廷遂急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带兵五百人出屯吐鲁番盆地的柳中。延光三年(124年)正月,班勇亲至楼兰肃清了匈奴势力,从而鄯善归附,又开始了在楼兰屯田。并于公元126年、144年、147年、150年、153年、154年多次把死罪犯人减刑后,发配楼兰屯田。在原有屯军的监护下,一面生产,一面守卫西域,收到了良好效果。

东汉时期管理西域的屯田机构为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原来西域都护是东汉前期西域地区管理军政和屯垦的最高官府,同时西域都护自西汉设置以来在西域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可是东汉自公元107年以后,由于政府的腐败,竟然废除了西域都护一职,而专设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主管屯垦,这是缺少远见的政治失误。

戊己校尉是东汉主管西域屯垦事务的官吏,地位低于都护,高于长史,直接受中央和都护双重领导,年秩禄比二千石。公元74年11月在西域第一次设置戊己校尉,官置二人,分驻两地,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己校尉关宠屯柳中,直至东汉末年,若断若续地在西域一直设有戊己校尉。

西域长史,是东汉中后期在西域领军屯戍的较高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地位低于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年禄一千石,受西域都护或敦煌太守的领导。东汉末年,内地战乱频仍,中原通向西域的交通被阻断,但屯田西域的军政人员仍然在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领导下,和西域各族人民一起团结奋战,坚守西域广大疆土。他们不仅自己解决了军粮和经费,还多次击退鲜卑贵族对西域的进犯,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定局面。

曹魏政权建立后,沿袭东汉旧制,继续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以统治西域地区。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任命张恭为戊己校尉,到高昌接管汉时戊己校尉继续领导屯田,守卫车师防区。同时,

魏文帝曹丕还任命承移为西域长史,从内地到楼兰接管东汉时设在楼兰的西域长史府。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皇帝,建立西晋(265~316年)后,对西域的治理仍然承袭魏制,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领导屯田戍守,在楼兰设立西域长史府,监护乌孙以外的西域各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后,在凉州的张轨于公元317年建立前凉政权,直至376年间统治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依然在高昌保留戊己校尉府,负责东部天山南北的屯田和防务;在楼兰也保留了西域长史,管理西域属国的日常工作。

这些史实在史书上虽乏明确记载,但在出土的文书和木简上确有可靠记载。在楼兰遗址,前后出土的汉文书主要有三批共429件,其中纸文书87件,木简342件。第一批是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901年3月在楼兰遗址发掘出土纸文书35件,木简120件。第二批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在楼兰发掘出土纸文书50件,木简161件。第三批是新疆考古研究所于1980年4月在楼兰遗址出土的纸文书2件,木简21件。这些纸文书和木简是魏晋时期屯田楼兰的纪实。

上述斯文·赫定所获汉文文书和木简,经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奥古斯·孔拉迪解读、整理成《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于192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其中有纪年的文书14件(包括木简11件,纸文书3件),它们是曹魏嘉平四年(252年)1件,咸熙三年(266年,咸熙只有2年,因路远而仍用该年号)的4件,有西晋泰始年号(265~274年)的8件,永嘉四年(310年)的1件。至于斯坦因搜集的汉文文书,经法国沙畹教授解读,写成《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1913年由英国牛津出版了法文本。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去楼兰掘获的93件文书由马斯伯乐解读,写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有关中国文书》,1953年伦敦出版了法文本。这两书中有纪年的文书19件(包括木简16件,纸文书3件),都是公元263~330年的文书。

从这些木简和纸文书中可以确证魏晋时期,楼兰一直是西域长史府驻在地,是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成为西域最主要的屯戍基地。如沙畹的《汉文文书》第752号木简记有“西域长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这时曹魏新任命的西域长史承移,到楼兰赴任前告诉属吏自己已从天水郡上邽县出发的信。沙畹同书第751号文书记有:“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君坐前,元言疏”。这是元某通过王督,送到长史张某处的文书。在马斯伯乐编的汉文文书第213号还把西域长史写成都督:“都督,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以来,□曹节度所,下杂文书本事。”

《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16表记载:“(嘉)平四年(252年)三月,司徒府癸丑书署军,二年正月戊寅诏”。这是曹魏中央命令转给西域长史的文书。同书第107和109号木简还记有:“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具,十二封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闾欣。泰始六年(270年)二月十五日,楼兰从椽位马厉,付行书□□孙得成。”这里清楚载明西晋时期西域长史和其椽属仍驻楼兰城。当时由于河西社会不安,邮递迟慢,西域长史特派人给敦煌太守带去白书一封,另以长史官署名义分别发生往敦煌、酒泉和王怀、闾欣二人的蒲书十六封。同书第20、21号纸文书记有:“永嘉四年(310年)八月十九日己酉,安西和戎从事谋史含(?)副溥督监移”。由此可知西晋末年楼兰仍然驻有守卫西域各族的边防军。

西域长史府主管军队屯戍的是司马,楼兰出土文书也有关于司马的记述。在沙畹的汉文文书第930号木简记有:“十月四日,具书焉耆,玄顿首言。□督邮彦时,司马君彦相,侍者各□。”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第12号木简记有:“书五,□告即林军,侃司马□□个已敬□。”这两处文书中的司马都是长史府属的屯官。

西域长史府的文官属吏,不下三四十人。其主要的有主簿管秘

书、录事椽管书记、督田椽管生产、督邮管监察,还有诸曹散吏,如水曹管水利、仓曹管仓谷、兵曹管兵卒、铠曹管武器、医曹管医药、金曹管货币、盐铁、法曹管邮驿、尉曹管徙转运、贼曹管武盗贼、决曹管刑法、辞曹管诉讼、奏曹管奏议、功曹管纲纪等等。

楼兰出土文书,颇多这方面的记载。如王国维编录的《流沙坠简·屯戍丛残》中记有水曹,“水曹请绳十丈”。马斯伯乐的汉文文书第 228 号木简记有:“水曹椽左朗白,前府椽所食诸部瓜菜、贾丝一匹,付客曹”。同书 247 号木简也记有水曹等官“使君营以邮行,书一封。水曹、督田椽鲍湘,张雕言事,泰始三年(267 年)二月廿八辛未言”。

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 49 号木简记有:“泰始五年(269 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椽李足、监仓苏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椽位张雅。”同书纸文书 18—2 记有医曹:“□医曹得秋白,尊兄丞相见”。沙畹所编汉文文书第 728 号木简记有:“功曹史赵伦,主簿梁鸾,录事椽曹,监量椽曹。”第 758 号木简记有:“铠曹谨条,所领器仗刃亡失簿。”第 412 号纸文书记有:“永嘉六年(312 年)二月十五日,(下缺)辞曹主者去,四年奉(下缺),发玉门关,州内贞。”

《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汉文文书与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 44 号木简记有“□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这说明楼兰驻军在楼兰城内也种有田地。王国维辑编的《流沙坠简·戍役类》中有一于楼兰城内出土的木简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事垦种情况:

简面:

大麦二顷已栽廿亩

下床九十亩、溉七十亩

将张金部见兵廿一人

小麦卅七亩已栽廿九亩

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助五十亩

简背：

大麦六十六亩栽五十亩

下床八十亩溉七十亩

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

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

禾一顷七十亩助五十亩溉五十亩

从这个简文中可知，楼兰地区的主要粮食是小麦、大麦、糜子，但是由于水量的不足，粮食面积没有种足，同时也不能充分得到灌溉，这就必然影响对屯田军食粮的供应，因此西域长史府官署多次要求所属吏兵节省口粮。如：

今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条所减。

宜渐节省使相周接。^①

上一简文说明官方经过多方核实，须削减粮食供应，只能以新定标准领取。下一简文是说须多方节省粮食，才能渡过困难，与下一年新的收获相接上。也就是说楼兰地区吏兵的粮食供应标准只能按每年的收获实情进行决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中，有不少述及吏民和军队的粮食供应情况，如在曹魏末年及西晋初年楼兰比较繁盛时期每人日给粮食一斗二升，以下二简就是例证：

出黑粟三斛六斗粟督战车成辅

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尽三十日

咸熙三年(265年)二月监仓^②

出麩三十一斛七斗六升粟将尹部兵胡支

^① 王国维《流沙坠简·杂事类》简版 90、简版 91。

^② 孔拉迪编《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之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木简版 N. 51

鸾十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
泰始二年(266年)十月十一日仓曹史申傅监仓史翼
同阙携付书史林阿^①

自此以后所出简文书的记载口粮标准日渐减少,由日食一斗二升,减少到一斗、八升,甚至最少时只有六升。如:

出床四斛粟兵曾房王羌奴二人起九月一日尽二十日日人日食(中缺)人食八升行书入郡出床四斛四斗粟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尽月三十日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

出床十二斛粟兵卫芒等七人人日食六升起

九月一日□日

□床五斛四斗粟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

六升起九月一日尽三十日^②

由这些简文可知,楼兰地区屯田所获粮食已很难满足驻军及吏民。对此斯坦因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此地站头(指楼兰——引者)既小,而整个地方本地的出产又有限,然而在中国文书方面,仍有足够的证明,显示通路未断之际贸易的重要。有从西域长史发出或呈长史的报告,以及显然不属当地的军事行动纪录的残片。但是一大部分的文书却是关于一个中国小屯田区的一切统治事项,如种植粮食存储以及运输之类的记载。对于官吏以及兵士,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③由此可见,楼兰地区的粮食供应已十分紧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根本原因是孔雀河下游水源日益枯竭,最终迫使西域长史府只能迁出楼兰城,移往海头。

那末楼兰城因缺水而不得不废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

① 孔拉迪编《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之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木简版 50。

② 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纸版 11。

③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99页。

斯坦因 1906 年于楼兰出土的最后一种文书是在公元 330 年，文书上却写为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年号早已中止，已是晋成帝咸和五年。可见楼兰和内地的交通已经阻断，所以东晋早已改年号，他们仍然未闻。但这些英勇的战士仍然守卫着西域土地。至前凉张骏据有西域后，设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仍沿魏晋旧规，分居于高昌及楼兰两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称：“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这里的西域都护很可能就是魏晋时的西域长史，因而考古学家黄文弼认为“楼兰故地之放弃，当在前凉之末，即公元后 376 年也。”^①

《晋书·张骏传》载：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而日本人桔瑞超 1909 年于西域掘获李柏文书，主要有表文一通，信稿三纸，谨录信稿一纸于下：^②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阙久不知闻，□怀思想，不知亲相念，□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逐俱共发从北房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这里明说西域长史李柏是到海头，未说楼兰，可见这时楼兰城已荒废，而由海头作为长史府驻地。这个城址位于楼兰故城西南约 50 公里，在米兰遗址东北约 100 公里，位于东经 89°40′52″，北纬 40°05′15″，海头城的边墙东北和西南长约 620 呎，合 189.1 米，东南和西北长约 330 呎，即 106.5 米，总面积约 20 139 平方米，是一长方形城，稍小于楼兰故城。斯坦因曾在该城中采集到细石器、陶器、建筑木雕、铜铁器具和钱币等物。离海头之南不远的喀拉库顺

^①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8 页。

^② 转引自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3 页。

库尔湖,即由塔里木河水及孔雀河下游决口后斜向东南流入的。因而喀拉库顺库尔湖的水仍然来之于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另外车尔成河的水也有一部分流入。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湖泊,才能使海头成为历史名城。

(5) 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

在《汉书·西域传》所说从中原通达天山南路的两条道路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里所说塔里木盆地北道是从车师前王庭即今吐鲁番盆地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未提到楼兰,实际此处《汉书》所记塔里木盆地北道经行车师道的路线决不是汉武帝始通西域时的路线,而是宣帝、昭帝以后之事。因为在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听到张骞的详细陈述,知道了西域的大概形势,决定断匈奴右臂,铲除匈奴在西域势力的决策时,经车师前王庭西行道早已为匈奴所控制,汉朝绝难通过车师道。

自匈奴势力扩及天山南北后,匈奴即于西域设立僮仆都尉的统治机构统治西域各族人民。《汉书·西域传》称:“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可知匈奴统治西域的中心是在焉耆盆地及库鲁克山,而罗布泊和楼兰城正在库鲁克山之南,楼兰地区实际控制在匈奴贵族手中。

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是走塔里木盆地北道,这样才能击中匈奴统治者的要害。如果走车师道去焉耆盆地击僮仆都尉府牺牲太重,且一时难于奏效,因为天山山区是匈奴强固的根据

地。如果单据塔里木盆地南道,难以北击匈奴根据地,统一西域。只有打通楼兰道,作为立足据点,由此前进至渠犁、轮台屯田,建立一牢固的军政根据地,才能时时威胁匈奴统治中心,这样无异在敌人心脏插了一把尖刀,使僮仆都尉寝难安枕。

汉武帝这个战略决策,最后终于打败了匈奴贵族,统一了西域,说明这是一个颇有远见的谋略,但是得来不易,因为自敦煌西至盐泽旁的楼兰须要经过近千里荒芜人烟的沙漠戈壁,并且常年刮东北风,环境极为艰苦,位于其北面的匈奴还要时时来袭击。所以要通过十分艰巨的路程,没有大魄力大勇气是绝难的。斯坦因赞赏汉武帝说:“汉武帝对于中亚的通商同军事前进的政策,并不因地理上可怕的困难,而有所畏缩止息。”^①确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毅力,决定自敦煌西至盐泽筑起一条新的长城,即史书所说的沿途“往往起亭”。

这一条深入西域的新的长城是怎样建筑起来的,英国斯坦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不妨摘引几段在下面。

斯坦因首先说:“楼兰一道东边的起点是一有堡垒的边城,古代中国史书称此为玉门关。玉门之得名始于和阗的美玉,和阗玉自古至今是塔里木盆地输入中国的一宗重要货品。”^②从玉门关向西进入西域的长城,是如何修筑起来的呢?斯坦因实地看到是“用苇杆捆在一定的间隔同泥层交互砌成的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杆捆,扎得很仔细,形如束柴,砌成堤形。苇杆束一致长八呎,厚约八吋。这种奇形怪状仔细坚固的墙……墙顶苇杆捆中露出小块绢头,翻检之余,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板,以及上书中国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27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18页。

字的小木片,所写的字异常清楚,形式也很古,无年代,只有‘鲁丁氏布·疋’字样”^①。这是在人烟稀少,缺水缺砖地方的重要创造。

斯坦因带着兴奋的心情沿着西延的长城继续前进探察,“从一座堡垒走向又一座堡垒,我找出那种奇怪的墙,一长段一长段的不时出现,有些处所还保存有六七呎高……这些碉楼,意思是拿来保护一段连续不断的边墙的。边墙位于低高地的光石子地面上,比冲积地高得多,在有低沙丘处戛然中断,过此便是很好的一段边墙,厚达八呎,两边实际上一无损伤,耸立此间高度仍达七呎以上,建筑方法之特别……芦柴和相间的泥层,因为此地土壤和水中之含有盐质,已成为半化石的状态”^②。这样建成的长城本身“便可以抵抗人同自然。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粘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前面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而滴水俱无,建设这种坚固的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然而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哩以上的长城,竟于比较短时间告竣了。”^③

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理环境,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筑成坚固耐久的新长城,充分显示了汉朝人民团结奋战和出色的智慧与才能,理所当然要受到当代和后世人的赞佩。

斯坦因对延伸西域的汉长城的雄姿继续描述说:“沿伸长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边上,有很多相距不等而保存得很好的碉楼,翼然耸立。这些碉楼无论是用土砖或用泥建,都很坚固。基部方达二十呎至二十四呎左右,到顶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座小瞭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攀缘上去,至今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19~120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20~122页。

^③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22页。

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痕。”^①

“碉楼的位置……一律得着地利，既适防守，复宜瞭望，因此各碉楼间距离，都看城墙线外的地方是否易于观察而大为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同样，一律选择高出的地位，以便传布烽火之信号。夜间用火，白昼用烟的组织严密的传达消息制度，当时推行于全长城线。”^② 现在于楼兰古城西北郊 5.6 公里处有一烽火台，残高 10.2 米，台基宽 18.7 米，分内外两层结构，内层系夯土建筑，夯土层高 40 至 60 厘米不等，呈圆形，外层系土块垒砌，由此可知这座烽火台为两个不同时期遗迹。因汉代烽燧多为夯土版筑，魏晋以后至唐代烽燧主要是土块垒砌且中立，用以住人和放物，因此这个烽燧的夯土版筑部分应为汉代遗迹，土块垒砌部分应为曹魏西晋时期遗迹。

城墙沿着向罗布泊的大路伸展，然后止于疏勒河床终止处，由此突然转向西南，蜿蜒二十四里左右，就止于沼泽地方。从这里延展出去约三百平方里，地面上沼泽纵横，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很难通过，这就可有效地防御骑兵的袭击。在长城终止处的一座碉楼处，斯坦因得到一块有字的木简，书有泰始三年（公元前 94 年）的年号和大煎都的地名。

当斯坦因骑着大马，察看那些凛然的烽燧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冥想古时烽燧城墙防护谨严，牢牢注视着迤北一带靠不住的低地，以防成群结队善于作战的匈奴敌人的情景，不啻如在目前！就在城墙以及烽燧附近所拾得的许多青铜箭镞……证明边境上突袭同警报是数见不鲜的事。”^③

斯坦因还在横墙同古长城线相联结处的一座烽燧遗址的废物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 年版，第 124 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124 页。

③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131~132 页。

堆里得到许多木简，中间年代继续有两个世纪以上。在一个束扎住的小屋中置有带破干残羽的铜箭镞一枚，并写着：“(破)箭一支归库另易新者”。^①在古长城遗书中，记及换发新弓、新弩归还敝损之事甚多，可见当时战争的激烈。

现在古城墙的路线依然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还是清晰可辨。同城墙平行相距约十码左右一条沟型直线，是几百年来戍守的逻卒往来践踏，在粗沙土上形成的一条窄狭分明的道路。还在许多烽燧处排成有规则的十字交叉五点形，或者排成彼此相距不远的一道直线，底部约有七呎八呎，全用芦柴束作十字形交互一层一层的建成，自是一呎至七呎不等，式样相同。在芦柴束初放时中插白杨树枝，用作支柱，时间稍久，经过盐渍浸润，芦柴束已成半化石状态，就再不需中插树枝了。这些就是烽燧昼夜备作烽火用的芦束。

斯坦因实地考察汉代西进中亚的重要国防设施后，惊奇而又赞叹地说：“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之需要何等大的力量同有系统的组织。但是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②

在玉门关通达楼兰、龟兹的军事和丝绸通道上，除了上述各种重要国防设施外，在汉朝也是最为繁荣的丝绸通道。也就是说，楼兰古道对两汉通向西方的丝绸贸易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史书记载是如此，近代考古出土文物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在楼兰城郊出土了不少美丽的彩色锦绢。如斯坦因在一座横墙与古城线相联结处的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古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34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6页。

代的绢，头上书汉字和婆罗谜文，在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及一匹的大小重量等项，显然这是古代绢缁贸易的孑遗。^①同时在离楼兰古城约四里左右的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殉葬的器物，如“死者个人用的有花纹的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写在木版同纸上的中国文书，最了不起的是眩耀在我眼前的光怪陆离的织物，其中有美丽的彩绢，很美的地毯，同绣品残片，堆绒地毯，此外还有粗制的毛织物同毡子”^②。这些除了本地出产的毛织物和中原的丝绢外，同样重要的是西方文化也通过楼兰古道输入西域，对此，斯坦因特别指出：“在研究远东和西方古代关系的人看来，装饰的织物中还有精工制造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式的。无论是本地制，或是从极西的中亚地方输入，我们从此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说明，那条碛路对于这种文化的力量已经服务了好几百年，只是方向相反罢了。”^③楼兰古道上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斯坦因面对这许多出土的东西方珍贵文物汇集于楼兰古道的实情指出：“事实上由于中国方面的声威，经济的富源以及组织的能力，实远过于中国人民以及统治者军事方面的力量。老实说，这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胜利。”^④这是历史发展的真谛，所谓汉唐精神，就是汉唐的综合国力，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是以西域各族人民对中原心向往之。可知并不是两汉的军事打败了匈奴，实质上是汉唐的经济文化征服了各族人民的心。

斯文·赫定考察楼兰后指出：“楼兰是一座边境的堡垒，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是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远近旅客都到这里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34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08页。

③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08页。

④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5页。

来。”^① 斯文·赫定在这里发掘了不少文书,内容十分丰富,他说:“文件谈到延迟的纳税人及其惩罚,谈到邮差,谈到带领扈从出巡的高级官吏,谈到作乱的游牧民族,谈到带有护卫和壮美的西藏驴的运丝旅行队,谈到骑兵和荷枪的兵士、射手、战车、驻防的用具、辎重队、各式兵器和最高的军令。也提到一位将官、一位司令官、军车长、辎重队长、军医以及别种等级的军官。因着楼兰地位上的冲要,所以驻有强大的卫戍队。就是文官也不在少数;文书上提到一位大臣、一位书记长、一位书记官、一位民政长、河工监督、农事主管者、邮务长及其四名属下、一整批仓库官吏、高级管理员等人。也谈到了法规、刑律、税律、民籍法、军役、护照、交换贸易——用‘帛’支付谷价,虽则当时已有了条理井然的币制——以及许多别的事件。”^② 这是一座多么繁荣、多么繁忙,而又是秩序井然的楼兰城呀!不得不使孔拉迪教授赞不绝口地说:“在纪元后三百年的当时楼兰就已经有了这样精细而正确的统治和社会秩序,则他必是经过很长的历史和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进化。”^③

楼兰古道,虽然从公元 5 世纪起由于罗布泊水量的变化和吐哈盆地车师古道的通行而被阻断,但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间,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留下了不朽的业绩,特别是为汉朝统一西域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同时通过楼兰古道的丝绸之路也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融汇放射夺目的光彩。楼兰历史遗迹所体现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在西域坚如磐石的统治,是中国维护统一的不屈英雄精神。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深入楼兰考察后颇为惊奇地说:“楼兰失陷于纪元后四百年之初……虽然是暗云密布,但官厅却从未丧失对国家的责任。大家都竭尽他们的责任。虽则城墙上的守卒敲起备战的鼓声,堡垒上燃起了烽火,这些官吏仍

①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359 页。

②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359 页。

③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第 359 页。

然忠实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做报告,就像是太平无事似的。他们给朋友们写贺年信和吊唁函。毫不受眼前的危险所扰乱。想到这些中国人用这样大的毅力和勇气竭尽他们的责任时,真令人感叹不止,并可以了解这个奇异的民族是怎样统治半壁亚洲的。这并不是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①。这种视死如归、永不动摇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精神,就是我们西域各族人民几千年来谱写的最壮丽的历史长卷和不可磨灭的守边卫国精神,是摸不着,却是永放光芒,令各国人民赞颂不已的精神。

^① 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60页。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位置问题

(1) 汉初西进西域的艰巨进程

秦末汉初以阴山地区为根据地的匈奴族,在北方草原也日渐雄强,到公元前 209 年,匈奴冒顿立为单于后,国力愈强,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①,于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力向四周扩张,先后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随后又攻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国^②,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从而匈奴的疆域就从原来的河套、阴山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河北北部及山西、陕西北部的黄河以东以南地区,并把辖区内的各族人民“皆以为匈奴”、“并为一家”。在征服天山南北后,匈奴日逐王还特设僮仆都尉,即专管奴隶的一个机构,常驻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向西域各族勒收赋税,弄得“敛税重苛,诸国不堪命”。

匈奴的不断侵扰、掳掠,使周围各民族遭到重大损失,汉王朝也面临着严重威胁。文景之世,冒顿虽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

^①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②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为匈奴单于，仍继续冒顿的南进政策。尽管中国的公主，一个跟着一个被嫁送到匈奴的单于庭，但并不能阻止匈奴马蹄的南进。到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大举入寇陕北，前锋部队已迫近长安，汉代首都附近如细柳（今咸阳市西南）、棘门（今咸阳市东北）、霸上，都已划为战区，这样严重的威胁一直持续到武帝的初年。

当时，中国土地上，汉王朝和匈奴王朝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的严重局面。汉武帝为了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存亡，即于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络大月氏、乌孙等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去时经过河西走廊被匈奴囚居十年，回来经过塔里木盆地时，又被囚禁一年，可知自河西直至西域，匈奴控制得很严。在这样的困境下，汉武帝只好集中力量征讨匈奴，于公元前127、121、119年遣将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出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并使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于汉。由是河西走廊平定，设立四郡，从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

不过，汉武帝要进军西域还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匈奴族以游牧为主，长于骑射，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是匈奴在西域的主要根据地。汉武帝首先采纳张骞的建议，与乌孙结成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策略，而匈奴贵族又以主要力量控制东部天山的车师地区。这样，汉朝要西进西域就只有从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经罗布泊直趋渠犂、轮台、龟兹一线，以联结乌孙，才能拦腰切断匈奴在西域的统一局面和隔绝羌胡的联系，这是战略的上策。当然匈奴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楼兰、姑师控制特别严。

汉武帝看到张骞的报告后，洞悉了西域形势，急切想打通通往中亚的丝绸通道，于是前往中亚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②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①。汉朝为了巩固这条军事通道，即在沿途列亭障至玉门关，匈奴闻讯，更要千方百计胁迫楼兰为其效力，其间汉与匈奴在楼兰地区的斗争既激烈又复杂。《汉书·西域传》指出：“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儻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怨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事实上当时匈奴对塔里木盆地南北道上各国都胁迫他们遮击汉使，不供给食宿，进行各种刁难等，《汉书·傅介子传》已指出：“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罪服。……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但这里所称的服罪不过是暂时的遁辞，实际楼兰统治者的态度始终是“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②。是以傅介子终于在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刺杀了楼兰王尝归^③，而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到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乃大发兵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于是匈奴始稍衰。

由此可见，汉朝从敦煌西击玉门关经楼兰直趋轮台、龟兹的通道，每前进一步都是火与血的斗争，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汉书·张骞传》称：“（元封二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称：“（太初三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近代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玉门关是当时汉朝极西的大门，过此而西是荒旷的盐泽，足足有三百公里的沙漠旅程，才能到达塔里木盆地极东的楼兰城。在这种长距离的茫茫黄沙中，如果不步步为营，即使占领了楼兰，也是守不住的，后路随时有被匈奴骑兵切断的危险，为此汉朝从玉门

①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此处《汉书·西域传》称“尝归”，而《汉书·傅介子传》则称“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

关通向楼兰的盐泽道修筑了十分坚固的新长城,这种长城是汉代前进政策的工具,是与汉代西进的武装征伐相配合的。斯坦因曾在玉门关附近的一段古长城废址,看到这里长城并不是用砖石建筑,而是用“苇草捆在一定的间隔,同泥层交互砌成一道正轨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秆,捆扎得很仔细,形成束柴,砌成堤形。苇秆束一致长八呎,高达七呎,厚约八吋”。斯坦因又说从保存得很好的一段墙,可看出其厚达八呎,高达七呎,因有盐卤之浸透,墙壁已成半化石的状态。同时斯坦因还发现了不少烽垒遗迹,他于敦煌西北“沿伸张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边上,发现很多距离不等而完整的古垒,翼然耸立。”这些古垒的基部方达二十呎至二十四呎左右,往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种瞭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索攀缘上去,至今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迹。^①

这种西延的汉代长城西经罗布沙漠,直达吐鲁番盆地南的库鲁克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所称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据汉简载,汉代沿长城的烽垒,布列甚密,大概五里一燧,^②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由于亭障烽燧相望,于是从河西走廊通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

汉代对于烽燧,有着极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据汉简所示当时的烽垒管理,在郡太守之下置都尉,都尉之下置障尉、侯官、侯长、燧长。燧长之下则为戍卒,每一燧有戍卒三人至三十人不等,亦有多至百人者。此等戍卒担任守望举烽,以及采伐举烽用之薪柴及修理烽燧堆的任务。《敦煌汉简·戍役》十三:“二月庚辰日,卒四人,其一人常候,其一人候,其二人积薪十日,率日致□□□薪二里。”这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版,第124页。

^② 《居延汉简考释》卷二:“第二十二燧南致十七燧二十一里。”

些构成了边郡烽燧之层叠的管理组织。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各烽燧都备有武器,其中主要的武器是弓矢。弓有六石弩、三石弩,矢有槁矢、虫矢、邦矢、铜镞各种。此外有剑盾、革甲、马咬、曲旃之类的军用品。除武器外,还有斧、锯、椎、凿、锄、廩、绳索、户扇、杵、著、尊、槃案、衣筐之类的劳动工具及日用工具。

从汉简的记录中,还知道当时边防军的给养,如谷物布帛之类,都要从内地运送。为了安放这些给养,当时沿长城线都设置了仓库,因而在汉简中出现了“仓长”、“仓佐”的官名。斯坦因曾在玉门关东五里之地发现了仓库的遗址。据斯氏说:“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呎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有二十五呎高,只开几个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墙之内有内墙,四角有碉楼。建筑的奇特,使我们猜想,这或者是用作沿长城线军队驻屯移动及官吏和政治使节取道磧路供给一切的仓库。后来在内墙一角,发现了许多中文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运送粮食以及积储衣物等等,于是把这个猜想充分证实了。”^①

(2) 汉在乌垒设立西域都护府

由于匈奴贵族早已统治了西域,天山南北各族都为其所奴役,对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也都派去了奴隶总管,在各方面都有匈奴人的耳目,所以李广利于公元前104、101年两次西征大宛时,从沿途各国很难顺利得到各种军事给养,特别是粮食供给困难。汉武帝吸收了教训,要和匈奴贵族在西域进行长期的斗争,首须解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135页。

决军队的吃粮问题,为此从楼兰城再西进,必须先实行武装屯田,但屯田也必须由近及远,步步为营。

从楼兰向西先到现在的库尔勒、轮台地区。据《汉书·西域传》称:早在武帝征和(公元前92~前89年)中“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眷属)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可见汉朝对西域的土地水利情况早有调查,而“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①。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只有在西域实行屯田积谷,才能“以给使外国者”^②,所以在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③,以统领和保护这些地区的屯田事宜,又派“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④在西域许多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有利于汉代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战争的胜利进行。实际这也就是西域都护最早的雏形,在西域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时所以只能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因为在其东北正在和匈奴争夺从中原通向西域的战略要地车师地区;在其西边的龟兹要地也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因而只有在轮台、渠犁的屯田取得效果,积蓄力量,以此为基地,把车师和龟兹地区的匈奴势力驱逐以后才能前进。

当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校尉时,位于东部天山南北的车师地区仍在匈奴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汉书·西域传》称:武帝天汉二

①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年(公元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汉朝失败后,经过十年的准备,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才又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①但匈奴是决不会甘心的,再加上汉武帝没有采纳桑弘羊加强轮台、渠犁地区屯田的建议,因而到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②。直到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后,才于公元前72年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③。到了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朝趁匈奴单于死,新单于虽立,但爆发了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加之境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匈奴政权暂时停止了对汉朝的侵扰,于是遣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熹带着一些犯过法的人来到渠犁屯田、积谷,“欲以攻车师”^④。

郑吉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将领,他在渠犁屯田一年,秋收之后,眼看军粮充足,就雄心勃勃地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及田士一千五百人进攻远在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第二年,车师投降,郑吉就驻守在车师的交河城,并被任命为护鄯善以西的使者,护南道。这是上述使者校尉的进一步发展,同后来的西域都护实际上已只有所管地域的不同了。

郑吉在车师驱赶匈奴势力后,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在车师,自己仍还屯渠犁,不久郑吉又遵汉廷命,使吏卒三百人屯田车师,匈奴闻讯,其单于、大臣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⑤匈奴即遣骑兵来袭击屯田士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卒,为此,郑吉更将屯田渠犁的一千五百人屯卒派往车师屯田,匈奴就派出更多武装部队进行围攻,并扬言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郑吉即向朝廷告急:“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汉宣帝派常惠出兵救车师。由于匈奴下决心夺回车师,围城的兵力很多,常惠最终也只能把郑吉救出来,仍回到了轮台的校尉城里。

这时北方的丁零也加紧了对匈奴的进攻。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匈奴发生政变。老单于死后,右贤王在和老单于阏氏的勾结与帮助下,篡夺了单于位,并大力铲除老单于的亲信。这时处于匈奴西部的按俗应该继承单于位的日逐王先贤掸处境危急,就毅然率众归属于汉。汉命令郑吉率领渠犁、龟兹兵五万人去迎接先贤掸及其所属人民,并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也因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而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并立西域都护府于今轮台以东的乌垒城,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从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正式归入汉朝的版图。

乌垒城的位置,据《汉书·西域传》称:“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在当时说,其地理位置是在西域比较适中地区,并在丝绸之路的孔道上,惟乌垒、渠犁的原来人口并不多,史称:“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渠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②可见乌垒在北,渠犁在南,原有土著人口均仅一千多人。根据近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今轮台县城东南21公里的喀拉塔勒河下游的红柳丛中有一座古城遗址,正方形,每边长230米,占地5399平方米,城墙已颓,仅余1米左右,有的地段已与四周的碱滩难以分辨。城中有房屋遗址,占地约4亩,直径约

^① 《汉书》卷70《郑吉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米,站到古建筑的废墟上,还分得清楚哪里是正厅,哪里是厢房,一层厚薄不均的红色灰烬覆盖在散乱的土坯堆上,当地维吾尔人称之为“奎玉克协海尔”,大意是灰烬城。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根据出土文物确定其为仓头国都城——仓头城,正是《史记》、《汉书》所记从汉武帝太初开始,两次遣李广利征伐大宛,在第二次远征途中,经过仓头城闭关自守,不供粮草,被李广利攻破城池,纵火焚烧,才留下了这一片凄惨荒凉的废墟。

从古仓头国废墟往东,走八九公里,便到了克孜勒河西岸处在水乡泽国中的卓尔库特古城,比仓头古城的规模大些,位于今轮台县城东南22公里处,城墙基本呈正方形,各边长300米,占地9万平方米。城墙仅余2米土基,城中有一土堆,高3米,周长67米,城东南角有一长方形土堆,高9米,周长124米。均为古时建筑,古城内外低洼处均为水沟,四周生长着红柳丛及芦苇。^①

关于乌垒城的古城遗址,据1985年出版的《轮台县地名图志》说:位于今轮台县城东56公里,野云沟南32公里库木塔格西部有一古城,维吾尔语称为协海尔科台克古城,为树墩城之意。据传古时此城军士极多,出征时在城门投树墩一棵,以军士踩断一棵为单位计算部队,由此得名。^②事实上当时在乌垒城四周分布着几座屯垦军营,向南有大道直通渠犁国,向西南有大道通校尉城,城堡之间有烽火台传递信息,这便是史书上有名的“七连城”的盛况。现在于乌垒城所在的策大雅乡境内留下的汉文明几乎随处可见,如在“策大雅乡的喀拉克尔琴村境内有一个叫乌勒方墩的古城遗址,它所处的地方至今还被当地人叫做‘汉人的地方’。在琼萨依巴格村有块地名‘汉人湖’,虽然看不到建筑遗址,却也能说明当时曾经居住过汉朝居民”^③。而在策大雅乡西及西南的两个多斯麦特原名均

① 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1985年内部版,第105页。

② 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第107页。

③ 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第151页。

为克塔依勒克,即中国人的地方或汉族人的地方。另在离野云沟东面 12 公里的阿克敦古城遗址,1928 年黄文弼曾挖出汉朝军民用过保存粮食的大缸。

把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尽管在西域的地理位置还适中,惟由于绿洲面积不大,要供应西域都护府这样一种军政重要机构的所需是难以承担的。而在其西面的龟兹绿洲,可以耕垦面积比轮台地区大得多,各种物产也丰富得多,经济实力远比乌垒地区雄厚,是建立西域都护府最为合适的地方。但在当时龟兹地区也基本上为匈奴势力控制着,时时阻挠着汉廷势力的西进,《汉书·傅介子传》指出:“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足见匈奴千方百计利用最为当道的楼兰、龟兹贵族以反汉由来已久。而匈奴使者那时经常去龟兹及乌孙等地,以胁迫他们为匈奴效力。史书继续指出:“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①为此,傅介子向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愿往刺之,以示诸国”^②。可知在当时汉廷的心目中,龟兹和楼兰是同受匈奴控制的两个重要据点。是以昭帝时,以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时,龟兹贵人姑翼即向“其王说:‘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③为了报龟兹杀赖丹之仇,直至宣帝时,常惠从乌孙还,才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兵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前杀校尉赖丹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④即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

由上史实可知,从公元前 60 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起,至公元 8

① 《汉书》卷 70《傅介子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汉书》卷 70《傅介子传》。

③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④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

年西汉末近 70 年时间内,匈奴在车师和龟兹仍还有一定的势力,西域都护面临对匈奴的斗争任务仍很繁重,特别是车师及龟兹地区的匈奴势力还未彻底肃清,必须时刻防止这两块重要战略要地受匈奴势力的袭扰,所以在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位置只能设在乌垒城。

西汉西域都护,从第一任都护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 80 多年,计历任都护 18 人,著名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达、但钦、李崇等,其都护驻地,基本都在乌垒城。在段会宗出任西域都护时,由于乌孙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经常要前往乌孙去处理,当时从塔里木盆地去乌孙以从龟兹西北入乌孙最为便利,因而段会宗从乌垒城去乌孙,每次都得经过龟兹。《汉书·段会宗传》说“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遂往谒,诸翎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这里就是指上述一些事件段会宗暂住在龟兹,并不是都护府迁到了龟兹。而王莽篡汉后,于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戊己校尉刁护召车师后王须置离验问谋图率众亡逃匈奴事,须置离“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这个埒娄城仍在今轮台地区,不是在龟兹,因为王莽易单于玺后,单于恨怒,即于公元 13 年,最近匈奴的焉耆国,先叛,即“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①。可知焉耆国离西域都护府不远,在开始乱时,就很快杀了都护但钦。如果都护府已迁至龟兹,就不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死都护,因为焉耆离龟兹还有 300 多公里,以古代的交通,即使是骑兵,也得走一星期,不可能迅速杀死都护,可知但钦所在的埒娄城仍在今轮台地区。而从西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的逃往龟兹,也可证明,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一直在今轮台县的乌垒城;有的在轮台县境的其他地点。王莽天凤三年(公元 16 年)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唯独“焉耆诈降而

^①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聚兵自备”^①，最后并纠集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兵击杀了王骏，而戊己校尉郭钦却另带兵击杀了焉耆地区老弱，然后引兵还。李崇则“收余士，还保龟兹”。于是乌垒城失守，西域交通阻绝不通。数年后，王莽死，李崇也死于龟兹。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于沙雅地区出土了李崇之印，可知在西汉时期只有最后一任都护李崇在兵荒马乱时才从乌垒城逃往龟兹，而其就任都护仍在乌垒地区。李崇死后，西域地区群雄相争，六十多年刀光血影，各族人民重新陷入苦难之中。

(3) 东汉班超迁西域都护府于龟兹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贬易侯王”，遭到西域各族人民反对，于是匈奴势力又乘机侵入西域各地，重新奴役各族人民，继续“敛税重刻”，使得“诸国不堪命”。东汉光武帝登位后不久，西域各国就纷纷派使者至京城洛阳汉廷。《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称：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他们恳切要求汉朝继续统治西域，以解倒悬之命。惟光武帝以天下初定，国力未充为辞，没有立刻派出都护去西域，于是西域各国只好暂时呻吟于铁蹄之下。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遂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断绝65年的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于阗等国纷纷遣子入侍，遂于永平十七年（74年）再次派出都护及戊己校尉。

东汉首任西域都护是陈睦，都护府治仍在乌垒城，因为当时匈奴在天山南北仍有一定的势力，特别是焉耆、龟兹地区更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如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危时，国内政局动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荡,西域匈取势力也随之猖獗,即于6月间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并全歼了其部众;北匈奴及车师后王还同时围攻戊己校尉耿恭于疏勒城。由此看来只有陈睦的都护府仍在乌垒城,焉耆、龟兹联合起来进行东西夹攻,才能迅速攻没都护和都护府。

从这个史实看,当时不仅北匈奴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同时匈奴在天山中也有一定的势力,因而他们还控制着焉耆盆地及以龟兹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各绿洲,是以在明帝、章帝时为统一西域立下不朽功绩的英雄班超于永平十六年(73年)出击伊吾、蒲类地区匈奴立下殊功。“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①班超奉命出使西域时,衡顾西域形势,没有先走塔里木盆地北道,而是先走塔里木盆地南道,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再拼力歼灭北道匈奴势力,这是重要的战略决策,如果当时班超要先走塔里木盆地北道,阻力重重,恐怕是难以完成使命的。

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后,首先到鄯善,那时南道各绿洲也已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因而班超带领吏士36人刚到鄯善,接着匈奴使者也带着100多人来到鄯善,超即以计攻歼了匈奴使者及随员,然后“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②。

从鄯善向西,原有大国于阗、莎车、疏勒,而此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但匈奴正“遣使监护其国”。超至于阗后,又凭藉其出众的谋略和胆识,胁使于阗王广德攻杀匈奴使者后降超,不仅震惊了西域各国,更震惊了在西域的匈奴贵族。

班超在鄯善、于阗击灭匈奴势力的时候,为匈奴所立的龟兹王建已遣兵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年)班超只好从间道到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在

^① 《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后汉书》卷47《班超传》。

疏勒绿洲上展开了和匈奴势力的斗争；而永平十八年(75年)都护陈睦被焉耆、龟兹合力攻没后，超更孤立无援，因而在疏勒和以龟兹王为代表的匈奴势力的斗争是十分艰巨的。当时龟兹、姑墨联军，更乘汉明帝崩，都护陈睦被击杀之机，数发兵进攻疏勒的班超阵地。超虽士吏单少，却英勇无畏地坚守槃橐城岁余，汉章帝初立，恐超单危不能自立，即下诏征超还。疏勒人民闻讯，“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①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目睹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不可分离的战斗情谊，更坚定了战胜匈奴、彻底歼灭匈奴势力的决心，立即决定再返疏勒，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去勇敢战斗。

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即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建初三年(78年)班超又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破了受匈奴势力控制的姑墨石城。超亟想乘胜肃清天山以南各国的匈奴势力，即向朝廷上疏请兵，他在疏状中分析了当时西域的形势：“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出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危。自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倚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②确实，班超对于西域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十分精辟，对于敌情了如指掌，于是朝廷批准了班超的部署。

班超在汉廷的支持下，肩负起重新统一西域、肃清匈奴势力的

^① 《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后汉书》卷47《班超传》。

责任。首先在公元75年肃清疏勒地区的匈奴势力。公元83年(建初八年)以将兵长史名号与军司马徐干、卫侯李邑亲至乌孙,大加赏赐,并联结乌孙力量,以图夹击龟兹。当然疏勒是一块战略重地,匈奴是要费尽心机争夺这块土地的,因此,曾先后向康居及月氏借兵,企图挽回败局,都被班超一一挫败。在永元二年(90年),月氏虽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越帕米尔高原,直下疏勒绿州,围攻班超,时班超虽然人数少,不足以御强敌,但他镇定自若,采用坚壁清野之法,“收谷坚守”。超度月氏军队粮将尽时,必往龟兹求救,预先即于东通龟兹要道上埋伏数百精兵,后来月氏统帅谢果遣骑资金银珠玉以赂龟兹,班超的伏兵尽起遮击,袭杀月氏兵,遂即持其使首送往月氏谢统帅处,谢大惊,立即“遣使请罪,原得生归”^①。超即准其撤回回国,月氏由是大震,只好“岁奉贡献”。

匈奴势力眼看大势已去,龟兹、姑墨、温宿即于永元三年(91年)降于班超,至是西域又重新统一在东汉政府的号令之下,汉廷即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班超欲把西域都护府迁到龟兹它乾城,徐干则屯驻疏勒。这时西域只有焉耆、危须、尉犁几国未平。班超为了先巩固都护所驻的龟兹地,即撤换了由匈奴所立的龟兹王尤利多,而扶持了曾为汉廷侍子的白霸为龟兹王。

龟兹地区的政局初步稳定后,班超即于永元六年(94年)秋,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叛服无常的焉耆,又很快收捕了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在都护陈睦的故城斩之,并传首京师。焉耆降服,即立曾为侍子的元孟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职内属。这时,西域的匈奴势力才真正肃清,才能把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到它乾城,从轮台地区迁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而最适中的龟兹地区。

班超被征还后,即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他虽请教了班超统

^① 《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治西域的经验，“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大不以为然地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①他对班超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所以不到数年，西域各国反乱。汉廷即征任尚返廷，由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二人仍驻龟兹它乾城，但它乾城较龟兹王白霸所住延城为小，因而西域副校尉梁瑾认为它乾城小，难以巩固，乃说服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瑾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入驻白霸王城，可知设在龟兹的西域都护府，班超及任尚时在它乾城，到段禧为都护时，开始仍在它乾城，不久，迁驻龟兹王都延城。后来班超之子班勇虽向汉廷力争要恢复西域原有的政治局面，但因匈奴势力又形嚣张，班勇虽被任命为西域长史，也只能驻守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虽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也再无力还治龟兹。这是迫于势，并非龟兹地区在西域的历史地位有所改变。

(4) 乌垒、龟兹的自然和人文比较

西域都护府位置的选择至为重要，因为它是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中心，及汉廷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有众多的军政各级办事人员及驻军，不仅要位置适中，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维持各级机构所必须的费用。而两汉西域都护府主要设在轮台的乌垒城及其附近地区；另一个是在龟兹地区，这两者的位置在西域虽都比较适中，惟在经济实力和人力上说，龟兹地区比轮台的乌垒要强得多，我们不妨从人力、气候、土地、资源各方面进行比较。

^① 《后汉书》卷 47《班超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在塔里木盆地各属国中人口较多的几国如下：^①

国名	户 口	人 口	胜 兵
鄯善	1 570	14 100	2 912
扞弥	3 340	20 040	3 510
于田	3 300	19 300	2 400
莎车	2 339	16 373	3 049
疏勒	1 510	18 647	2 000
姑墨	3 500	24 500	4 500
龟兹	6 970	81 317	21 076
焉耆	4 000	32 100	6 000

从表内几个大国的人口统计看,以龟兹国的人口最多,几乎比疏勒、莎车、于田国的人口多四五倍。而塔里木盆地南道五国合起来的人口 88 460 人,稍多于龟兹国,可是这几国的胜兵加起来却只有 13 971 人,比龟兹一国的胜兵还少 7 150 人,可知龟兹国人力的雄厚和兵力的精强,班超所指只要能征服龟兹,未服者仅百分之一耳,确是高论。如果把长久役属龟兹的尉头、姑墨、温宿数国也计入龟兹国人口,则达 116 517 人,而塔里木盆地南道的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于田、皮山、莎车、疏勒合计,其人口也只 101 760 人,不如龟兹国所属人口多。再把乌垒、渠犂、尉犂三国也算入龟兹势力范围,则龟兹势力所属人口可达 128 797 人,更远远超过塔里木南道的人力。焉耆盆地系天山中山间盆地,没有算入塔里木盆地。

^① 据《后汉书·西域传》统计。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如果以龟兹绿洲与轮台绿洲的人力相比,那么龟兹绿洲81 317人,轮台绿洲包括乌垒、渠犁、尉犁三国人口仅12 280人,几乎比龟兹绿洲的人口少7倍,其悬殊可见。所以在两汉时代,龟兹局势左右着西域政治的安危,因而班超在平定龟兹以后,迫不及待地把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道理就在此。

汉代乌垒国周围的自然及经济为什么不如龟兹地区呢?就今库车和轮台的平原气候及土壤说,大致相仿,差别不太大。如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全年平均气温 10.7°C ^①。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41.5°C ,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28.9°C ;年日照时数库车为2 424.6小时,新和县2 886.0小时,沙雅县3 029.4小时。年生理辐射量724卡/每平方厘米,无霜期216天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1.6毫米,最多风向是东北风,常见的大风风向是北风。轮台县建国后多年的气象记录,年平均气温为 10.6°C ,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40.1°C ,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25.5°C ,年日照时数为2 670~2 780小时,年生理辐射量为67.6卡/平方厘米左右,无霜期188天,年平均降水量为52.2毫米,全年盛行东北风。从气候看,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和轮台县同属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都是光照充足,热量丰富,蒸发强烈,空气干燥,多风沙浮尘天气,降水稀少,夏季干热,冬季干冷,无霜期较长,年、日温差大。轮台绿洲和库车绿洲的土壤方面有相同处,也有各自的特点。轮台绿洲由于大陆性极端干旱荒漠生物气候,灌溉水源主要来自山区的雨雪水,在洪水季节富含泥沙。由于迪那、阳霞、策大雅—野云沟诸河流的洪积—冲积作用,形成了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并有发育明显的扇缘地下水溢出带,地下水储量丰富。独特的干旱气候和灌溉条件,形成了轮台县的灌溉农业,农区集中分布在山前洪积—冲积扇的下部和扇缘地带,形成迪那、阳霞、策大雅—野山沟三大灌区。在这三大灌区中其主

^① 1951~1978年平均数字,见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农业气候区划办公室编《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农业气候手册》,1982年版,第4页。

要成土过程有以生物气候条件为主导因素形成的自成型地带性土壤；有受地域性水文地质因素的作用形成的（水成型、半水成型、盐成型）成土过程，如沼泽化、草甸化、盐化过程。上述各种成土过程，形成轮台县平原区主要土壤类型为灌淤土、草甸、盐土、棕漠土、沼泽土、风沙土六大类，其中以灌淤土为最多，占总耕地面积的80.2%。^①而汉代西域都护府屯垦乌垒城及其周围地区和唐代在此屯垦等悠久的灌溉历史是形成灌淤土的重要条件。

库车绿洲的农业灌区主要有库车河、渭干河两大灌区。库车河灌区地处洪积—冲积扇部位，区内海拔1 000~1 225米上下，现有耕地绝大部分系自成型土壤。渭干河灌区地处冲积平原部位，区内海拔高965~1 025米上下，现有耕地以水成型农业土壤为主。水成型耕地占灌区总耕地的90.3%，这两大灌区的农业土壤主要为潮土、灌淤土、灌耕棕漠土三种，另还有些水稻土、灌耕草甸土、灌耕沼泽土分布于渭干河灌区。^②其中主要土壤为潮土，大都分布在渭干河灌区及库车河灌区南缘一带的低洼地段，海拔高度1 000米以下，这是轮台绿洲少有的。潮土前身多为草甸土、沼泽土、盐土等水成型土壤，潮土所处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由于地下水和灌溉水的双重作用，所以土体潮湿，氧化还原作用交替发生，剖面中下部常见锈纹锈斑。但由于多年的灌耕熟化作用，已具备了截然不同其前身土壤的构型和属性，耕作层深厚松软，常见片状或层状结构的犁底层，并且有一定厚度的灌淤层，其土壤肥力取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措施，可知土壤潮化和灌溉熟化是潮土形成的两个主导因素。至于灌淤土主要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次在渭干河灌区村中梁上的老耕地，呈同心圆式分布，分布区一般在1 000~1 100米上下，这种灌淤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灌溉水源含有较多的泥沙，经过长期的淤积，耕翻搅拌，

^① 轮台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轮台县土壤普查报告》，1983年版，第11页。

^② 库车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库车土壤》，油印本，第51页。

种植施肥等耕作措施,年复一年,活土层不断加厚,耕层上移,整个土体上部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灌溉淤积熟化层,厚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因而它具有较高的熟化程度和肥力水平,生产性能特好,适种作物很广,库车城郊一带的灌淤土大部大于2,有机质含量达15%~30%,种植小麦单产达500斤以上,棉花单产100斤以上。在库车、沙雅、新和绿州到处可以找到汉唐时期在此屯田开垦的遗迹,在沙雅县境内迄今还有一条二百多里长的汉代渠道,被人称为汉人渠,可知库车、沙雅、新和绿州耕垦历史的悠久。

库车境内的第三种主要土壤是灌耕棕漠土,全部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中大部为边远耕地,海拔高度1100~1300米上下。这是由于棕漠土被垦植后,经多年的灌溉、耕作、施肥等农业措施的影响,其理化性质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土壤得到灌溉淋溶,碳酸钙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垂直下移;灌淤熟化层逐渐加厚,土壤结构有了改善,有机质含量明显提高,部分灌耕棕漠土有机质含量高达20%以上。

综上所述,库车、沙雅、新和绿州由于水量较丰富,经过几千年的灌溉耕垦,各类土壤都得到了发展和改善,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扩大了园艺业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增加了经济实力。

先列轮台县的河流及其年径流量于下:^①

项 目 河 流	年平均流量(m ³ /s)	年径流量(亿立方)
迪那河	10.70	3.374
吐孜鲁克沟	1.252	0.395
吐瑞克沟	1.858	0.586

^① 轮台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轮台县志稿》打印本,第1册第1章,第5页。

项 目 河 流	年平均流量(m ³ /s)	年径流量(亿立方)
阳 霞 河	3.351	1.057
库如勒沟	1.242	0.392
克音力克沟	1.292	0.407
策 大 雅 ^①	2.196	0.693
乌唐沃热克沟	0.964	0.304
野 云 沟	1.847	0.582
合 计	24.702	7.79

正是由于塔里木盆地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在库车绿洲和轮台绿洲年降水量仅在50毫米左右,要发展农牧业和园艺业,只有依靠山区较为丰富的降水,进行灌溉,因而农牧各业的发展决定于水量的大小,汉代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就在于乌垒即今轮台绿洲的水量比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水量小得多,可以现在该两地的水利调查为例。

再说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灌溉水主要来之于渭干河与库车河,塔里木河虽流经这块绿洲的南面,但能为这块绿洲引用的水并不多。这几种水源以渭干河水量最大,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2.46亿立方;库车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53亿立方。这两条河的年径流量已达25.99亿立方,较之轮台绿洲的年径流量7.79亿立方的水量多了3.4倍,如果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一些山溪水如二八台水等计算进去,则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水量至少多于轮台绿洲4倍以上,即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水量可灌溉面积至少多于轮台绿洲4倍以上。不妨再列出轮台绿洲和库车、沙雅、新和绿洲

^① 又称齐依昂勒克沟。

的现有耕地面积进行比较：

名 称	1982 年耕地面积	占绿洲面积
轮台绿洲	256 138 亩	33.25% ^①
库、沙、新绿洲		
库 车 县	942 200 亩	②
沙 雅 县	785 000 亩	③
新 和 县	438 600 亩	④

以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耕地面积为 2 165 600 亩，较轮台绿洲多 8.5 倍，即使把轮台绿洲与古代渠犁、尉犁一部分所在地库尔勒绿洲的耕地面积 517 630 亩合计一起共 773 768 亩，仍比库车、沙雅、新和绿洲耕地面积少 2.8 倍。

古代乌垒、渠犁、尉犁等耕垦范围大概相当于今轮台及库尔勒市地区，此二市县面积为：轮台县 14 789 平方公里，库尔勒市 7 116.89 平方公里，合计 21 905.89 平方公里。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面积：库车 15 265 平方公里，新和 8 223 平方公里，沙雅 31 972.5 平方公里，合计 55 460.5 平方公里。

现在库车、沙雅、新和三县面积，大概相当于古代龟兹绿洲的面积，这也比轮台及库尔勒绿洲的面积 21 905.89 平方公里大 2.5 倍。

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和轮台绿洲的灌溉水量虽都来自天山的雨雪水，但轮台绿洲天山山区各河流发源处远较库车、沙雅、新和河流源头的山体低得多，最高山峰仅 4 727 米，一般山区都在 1 400 米至 4 727 米之间，海拔 3 500 米以上的中高山区虽为雪山，

① 轮台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编《轮台县综合农业区划》，第 15 页。
 ② 库车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库车县综合农业经济区划报告》，1986 年打印稿，第 38~39 页。
 ③ 沙雅县地名委员会编《沙雅县地名图志》，1986 年版，第 2 页。
 ④ 新和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编《新和县农业区划》，第 3 页。

但冰雪覆盖不厚,降水量也远较库车、拜城山区的天山少,从而轮台绿洲地区发源于山区的河流水量都比较小,河流也很短,溪水到山口附近就形成断流。而灌溉库车、沙雅、新和绿洲两条主要河流渭干河和库车河的发源处虽也在天山,可是这两河源头山体高峻,冰雪深厚。渭干河系源于海拔 7 435.29 米的托木尔峰及 6 995 米的汗腾格里峰东缘冰达坂,上游干流为木扎提河,自西而东依次汇合了卡不斯浪河、台尔维其河、卡拉苏河、克孜尔河四条支流。自克孜尔千佛洞以上,河流长约 272 公里,河床宽约 50 米~1 000 米,集雨面积约 16 299 平方公里,自千佛洞以下称渭干河。由于山区降水很丰富,在海拔 3 900 米雪线以上的托木尔峰地区降水达 750 毫米~1 000 毫米,海拔 3 000 米左右山地,年降水量为 400 毫米~600 毫米,如此丰富降水,使得渭干河的水量几千年来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流量,保证了拜城盆地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农牧园艺业的发展。库车河(原名苏巴什河)源于中部天山南麓一带,上游主要有三条支流:奥奇埂巴什、特克勒克等,到中游又汇合克格纳克及卡尔诺两河,到库如力再汇合后,始称库车河,兰干以上全长约 115 公里,流域面积约 3 187 平方公里,海拔高约 1 300 米~4 500 米,山后坡度 40~65 度,河槽宽 30 米~200 米,由于河流上游植被较少,每遇暴雨,洪水携带大量棕色泥流,经引洪输入灌区后,形成了与渭干河灌区明显不同的现代母质。多年平均河水含沙量为 4.36 公斤/立方米,年输入泥沙量为 157 万吨,这对灌淤黄土的成土过程产生了强烈影响。

正是由于库车、沙雅、新和绿洲水量大大超过轮台绿洲,不仅耕地面积和各种经济发展轮台绿洲远远跟不上库车、沙雅、新和绿洲,同时人口发展也必然受到限制。现在轮台绿洲虽有面积 14 789 平方公里,可是全县人口却只有 72 357 人。而库车、沙雅、新和绿洲的库车县面积是 16 265 平方公里,比轮台县仅大 476 平方公里;可是库车县人口据 1982 年全国普查数字为 304 640 人,比轮

台全县人口多 232 283 人,即多 4.2 倍,原因就是库车县的水远多于轮台县,是以轮台县虽还有许多荒地,在地下水还难以充分利用之前,要大量扩充耕地是不可能的。如果以库车、沙雅、新和三县 1982 年的人口合计则更多达 555 804 人(其中沙雅 146 864 人,新和 104 300 人)。其中面积仅 8 223 平方公里的新和县,几乎比轮台县面积小一半,而人口却达 104 300 人,比轮台县还多 1 943 人,其根本原因是由水决定的。不管是人口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在塔里木盆地这样极端干旱区域都决定于水的盈缺。这些数字虽然是现代的统计数字,但与两汉时代轮台绿洲及龟兹绿洲的自然情况并无多大变化,那时水量可能比现在还要大一些,所能利用的塔里木河水也比现在大一些,但也无法改变其基本生态环境。因而以今仿古,用现代科学记录的确切数字来说明汉代西域都护府从轮台绿洲的乌垒城迁往龟兹绿洲的理由是可取的。从而也更可知道在西域的开拓更加超过汉代的唐代西域都护府必须从高昌地区的西州迁往龟兹绿洲,也就可晓然于心了。

确实从古代起龟兹地区就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龟兹绿洲面积大,有悠久的耕垦历史,水量丰富,土地肥沃,是以农业、园艺业、畜、牧业早就闻名于西域。历代史籍早已指出其农产品有稻、粟、麦、麻、糜;园艺业有葡萄、石榴、梨、奈、桃、杏等;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驴等;畜产品则有各种牲畜皮张及兽皮;手工业产品有氍毹、细毡、胡粉、龟兹板、安息香、葡萄酒、金锤碟像等;矿产资源也特多,如金、铜、铁、铅、锡、石炭、石膏、盐等。

《魏书·西域传》说,龟兹出“细毡、饶铜、铁、铅、麋皮、氍毹、饶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等……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隋书·西域传》称,土多稻粟麦,饶铜、铁、铅、麋皮、氍毹、饶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大唐西域记》卷 1《屈支国》称:“宜糜麦,有梗稻,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管

弦伎乐,特善诸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这些记载不仅反映出农业、畜牧业、园艺业十分发达,同时在货币上已有金银钱、小铜钱,说明商业也已相当发达。

由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大大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从而龟兹城墙广轮与长安城相等,城中所建佛寺塔庙多达千所,宫殿壮丽,焕若神居。为什么西域留存的千佛洞壁画以龟兹地区(包括库车、拜城、新和三县)为最多,洞数之多几与敦煌千佛洞相埒,每个洞窟不耗巨资是开凿不出来的,这也正是当时龟兹经济发达的遗物和佐证。在今西北五省中,除西安地区的古城古迹之为中外所赞叹外,其次就是以龟兹地区为最多了。不仅现在库车县的龟兹古都、苏巴什古城为中外所熟知,在新和县的最大古城是县城西北部16.5公里、大尤都斯乡西南3.5公里处的玉奇喀特古城,方形,海拔1003.1米,总面积1740亩,共有宫内外三个城,在其东北6公里多处还有一个托帕协海尔古城,占地面积也达38000平方米。在玉奇喀特城东南几十公里处的通古斯巴什古城,城墙每边长220米,占地63亩,迄今残存城垣高3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仍高6米以上,气势雄浑,在城墙周围还有卫星城、烽火台。在沙雅县城西北25.7公里英买力乡塔什墩村附近的玉什喀特古城,也系三重城,城垣南北69米,东西74米,方形,1959年曾在此出土印信“汉归义羌长”铜印一枚。另在英买力乡境内的艾格买里央塔克协海尔古城城墙遗址面积之大,更为恢宏,外城3410米,内城530米,两城之间有中城,城内有土丘起伏。而在塔里木河北岸的古丝绸道上古城遗址比比皆是,在龟兹古绿洲上各种古城遗址、烽火台、废弃的古渠道之多是西北地区除西安以外的任何地方所难以比及的。从这些遗存的汉唐时代各种遗迹和文物中更可看到当时中国经营西域的气魄和规模的宏大,汉民族文化对西域各族文化影响的深远,古龟兹绿洲经济和商业的发达繁荣,充分体现了汉唐盛世在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奔腾发展的宏伟气势,震撼着西域和世界历史。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

(1) 我国丝绸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蚕桑丝绸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以汉族为首的各族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发明,给世界各国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古代西方人都以“丝国”代替中国的名称,约在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写的《史地书》就有赛里斯——“丝绸之国”的名称,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产丝的确切地点,可是西方人民见到丝绸后,视为无上珍品,因为吃饭穿衣是每个民族的第一等事,特别是印度、伊朗、西亚、北非、欧洲地区的人民,由于地理气候关系最为迫切需要,因此古希腊地理学者斯特拉波、罗马诗人马罗、史学家佛罗勒斯、作家梅拉等的著作中屡以赛里斯代替中国。公元 1 世纪埃及人的著作中已说到中国的丝绸运销到西方,据说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就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① 公元前 3 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即旃陀罗笈多)的大臣商那自写的《政论》一书中也记载了公元前 4 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已远销印度,说明我国的丝绸在公元前 3~前 4 世纪已远销到希腊、罗马、埃及和印度等地。

到公元 1~2 世纪,随着蚕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西域商路的畅通,我国丝织品就日益增多地运往罗马帝国,埃及亚历山大城成

^① 克里思沃尔斯《罗马帝国的商路与商业》第 109 页、262 页。

为最重要的集散地,古叙利亚南部几个沿海城市已成为有名的丝织工业中心。1世纪中叶,白吕内曾感叹说罗马帝国为了向东方购买丝绸、香料等奢侈品,使得大量金银年年外流,至4世纪时罗马更是“不分贵贱都穿丝绸”^①。有的古史家认为“丝绸贸易是古代世界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业”^②。近年考古学家已在埃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中游及帕米尔等地都曾出土公元4~5世纪中国的丝织品。^③这就可见尽管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存在频繁的分裂割据,丝绸之路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冲破一切阻力,沟通着亚、欧、非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考我国蚕丝的发明,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据近年考古所得,已发现到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绸的象形字,2000多年前编成的《诗经》里也已对蚕桑丝帛进行讴歌,在商周时,已有罗、绶、纨、纱、绉、绮、锦、绸等各种丝织物。所以蚕桑事业是历代王朝经济生活中的大事,甚至古代把农田称为桑田,后来实行的均田制,都有一定的永业田植桑。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从事蚕桑和丝织业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写出《蚕书》、《蚕赋》、《农蚕经》等书。

在我国中原地区是如此,在我国兄弟民族地区也同样是如此。即以西域的塔里木盆地来说,也很早就已植桑养蚕,尽管在《史记》及《汉书》上尚无蚕桑的明确记载,但到《后汉书·西域传》上就说:“伊吾(今哈密)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可见至迟到公元1世纪前后,西域已有桑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蚕桑已在塔里木盆地普遍发展起来,在《北史·西域传》中有明确的记载说:高昌“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焉耆也是“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塔里木盆

① 玉尔与考狄袁《西域记程录丛》,第200页。

② 贺德生《欧洲与中国》,第68页。

③ 富卜士《古代技术发达史研究》第4卷,第54页。

地南缘的于田也是“土宜五谷并桑麻”。《魏书·西域传》则说疏勒生产锦绵。这就可见在塔里木盆地南北都已植桑育蚕,同样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元朝的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撮要》中不仅总结了汉族地区的重要经验,同时也总结了西域地区植桑养蚕经验,给我国蚕桑生产技术增添了新篇章。

我国西域各兄弟民族都是智慧勤劳的民族,从古代起就根据自然及生产特点编织了各种富有特色的毛织品,解放后的出土文物中,获得了不少令人惊羨的毛织物。同样蚕桑西传以后,西域各族兄弟人民,又在原有的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绚丽多彩的西域丝绸,既丰富了我国历代的丝绸织品,又活跃了丝绸的国际贸易。从考古资料中已能见到东晋末年生产的丝棉,在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文书有“丘慈锦”的名称。^①在麹氏高昌的隋墓中,还见到丝棉混合织成的几何纹锦^②,这不仅表明西域至迟到公元4世纪前后已能生产丝织品,同时也表明由于棉花的种植,又创造了丝棉混合织品,这是独创,因为隋时还没有把棉花传入内地。

到唐朝统一了西域,就给西域丝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西域丝绸业大发展的时期。《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于阗人民“工纺织”,西州的丝还能供给内地,足见唐代西域已能织出既多又受人喜爱的丝绸织品了。到五代时,西域回鹘人民已能经常带着自己生产的丝锦到内地去换货,以后名贵一时的捻金、番缎、胡锦、西锦、宿绫等不断运往内地,元代更把新疆的织金缎视为珍宝,这都是维吾尔人民在丝绸织品上的重要创造和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赞赏。也销往国际市场,为我国丝绸业增添了新的光彩。

^① 文书原件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② 《新疆历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2) 丝绸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关系

从古代起,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从蒙古高原直到中亚细亚,主要是游牧民族,如匈奴、月氏、乌孙、鲜卑、柔然、回纥(即铁勒)、突厥、黠戛斯、契丹、蒙古等族,都是我国的兄弟民族。汉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之间长期有着互通有无、相互交往的友谊,尽管由于各族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彼此间有过战争,但这不是历史的主流;历史的主流是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所以各草原民族通过“通关市”,从汉族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换取粮食和缯絮^①,同时也给汉族人民带来了各种牲畜和皮毛,从而共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及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汉书》卷94上《匈奴传》称公元前95年(本始二年)单于遣使送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今欲与汉闾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麩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从这两段简单记载中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和汉廷友好相处的条件是要求给以足够的粮食和丝绸,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就要“侵盗”,因而匈奴贵族每次南来,汉廷都给以大量的缯帛、粮食赏赐,特别是彩缯锦帛为多。如:

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

^① 絮,在这里不是指棉絮,而是指的丝绵。

月，……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袋，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公元前 27 年(河平二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①

到后汉南匈奴时，每次入见，也照样给以缯彩絮布。如《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 年)……秋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建武)三十一年……北匈奴复使如前，乃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可见匈奴单于及其大臣每次入朝汉廷，皇帝都给以各种彩缯，因为衣食二项是人民生活的首要问题，宜乎为匈奴贵族及人民所渴求，能满足他们，就能减少战争。所以“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乌维单于立三年……(汉使)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可见是否发生战争与缯絮食物是否能满足匈奴贵族的欲望，虽不是主要原因，至少是和战的原因之一。

不仅对匈奴贵族每次都赐以彩缯，对其他游牧民族也有类似情况。《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中称：“(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

《北史》卷 98《蠕蠕传》称：“永熙二年(公元 533)……东西魏竟结阿那环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女称为化政公主，

^① 见《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妻阿那环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环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

这就可见东西魏都想结交柔然贵族而为臂助，西魏因送了大量金帛而达到了目的。在《新唐书》卷215《突厥上》称：“隋乱，华民多没于虏，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凡此都说明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都喜爱丝绸。

当突厥初兴时，突厥人在土门领导下首先要求与中原王朝通商，《周书·突厥传》称：“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他们在互市贸易中主要卖出牲畜，买入缯絮。

由于回纥在唐朝平乱事业中立下重大功绩，所以唐朝送给回纥贵族的丝绸更多，民间的互市贸易也更盛，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约定每年送给绢二万匹，临时赠送的就更多了；回纥军队协助平定仆固怀恩叛乱之后，唐朝一次就送给缯丝十万匹，并且还专立马市，每马换绢四十匹，有时还高达五十匹，每年来马十万匹，就得支付四百万匹绢，唐朝常无力支付，经常拖欠绢匹。德宗建中三年，回纥遣使来，追唐所负马值一百八十万匹。807年唐宪宗曾一次偿还积欠，不料第二年回纥驱来比常年多一倍的马，要唐收买。白居易在《阴山道》诗中描述说：“五十匹缯易一匹，缯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缯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明年马多来一倍”。可见绢马贸易有关于唐朝经济者至大。那时回纥商人还带同九姓胡商直接到长安购绢的也是频繁于途，往往留京师至千人，一次由突董带率的商队北返，被振武军使张光晟抄没的缯锦就达十万匹。有这样多的丝绸运入漠北回纥族中，不仅成为回纥人民经济上的大事，同时也必然成为丝绸国际贸易上的大事。匈奴贵族喜好汉缯絮食物时，投靠匈奴的中行说一再建议：“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

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①但是，统治阶级对丝绸的喜好以及从丝绸交易中所获得的好处，是中行说的一席话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在外蒙发掘到的匈奴贵族墓中的殉葬品，丝绢与毛织物占着突出的位置，墓中所发现的丝绢纹样及织法，显然是汉代中原的制品，同当时中原流行的锦绣、绮罗、杂帛没有差别。绣和刺绣都是彩色的，在彩绣上织出各式各样的锦云、鸟兽和神仙骑鹿在云中飞奔的花纹，并在绣纹之间反复织出“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汉文吉祥词句。“新”是王莽的国号，其意即“新国之神，既灵且广，保护国家，万寿无疆。”这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说“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赉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这“多赉金帛”与单于墓中的多以金帛殉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尽管匈奴在开国之初在中行说等的拨弄下，企图排斥汉文化，但汉、匈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往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所以越到后来，汉、匈经济关系就越密切，汉、匈人民之间的往来就越频繁，使得汉代或匈奴的统治阶级不得不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逐步推进汉、匈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以满足人民的愿望。例如公元前2世纪中叶“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②。这样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是符合于游牧民族和汉族人民利益的，从而减少了边境地区的纷扰。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草原民族的丝绸之路

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南北道,通向中亚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主要是张骞通西域,汉武帝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后才畅通的。在这以前是不是不存在丝绸之路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设立河西四郡是在公元前 2 世纪,在此以前,不仅我国的丝绸早已西传,同时也已较多地输入北方草原民族。

北方草原民族从古代起不少就是住牧在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地区的,因而在中原地区发明丝绸后,不久就传到了草原民族,究竟什么时候传过去,虽没有确切的记载,可是解放以后,已于阿尔泰山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公元前 5 世纪捻股细丝织成的平纹和花纹的丝织物,有一件绣着精致的我国传统的凤凰图案,经多方鉴定,认为是中国的制品。^①可见我国的丝织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在草原民族中流行了。同时考古工作者又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找到了古代丝绸。额济纳旗并不在河西走廊地区。从额济纳及阿尔泰等地丝绸的发现,和历史记载大量供输草原民族丝绸的实况互证,就可看到草原的丝绸之路是早就存在的。

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匈奴一直游牧在水草丰美的祁连山北麓。那时我国的丝绸已大量流入匈奴地区,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亚、西亚一带。尽管这时的塔里木盆地已是定居农业,但丝绸的西去不论是通过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都得先通过草原地区,才能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河中地区,所以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是先有草原路。汉武帝在河西设立四郡后,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塔里木才成为丝绸

^① 参见《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之路的大道。张籍《凉州词》中所说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①正是对这一条丝绸大道盛况的描述。

从河西走廊直达西域的大道畅通以后，草原的丝绸之道是不是还存在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根据历史记载，中原各王朝大量供应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绢是历朝都未间断。在汉朝设立河西四郡与西域都护以后，汉王朝仍然大量输给匈奴以丝绸，这时匈奴贵族还是继续做着丝绸贸易。当时游牧在伊犁、伊塞克湖一带的是与汉结盟、与匈奴不和的乌孙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奴人要进行丝绸贸易就只能走漠北单于庭，西沿杭爱山，经科布多盆地，穿过阿尔泰山，沿乌伦古河，向西南至塔城直趋塔拉斯及河中地区。郅支单于西迁至康居，依之为西域的根据地，和汉抗衡，就是走的这一条草原大道，实际上这一条也是古已有之的通行道路。后来长春真人的西去中亚也是从科布多盆地翻过阿尔泰山的。所以匈奴贵族的势力退出天山以南，伊犁又被阻于乌孙的时候，匈奴的丝绸贸易也是能行于这条道上的。

从两汉时的形势看，当时匈奴贵族向西方贩运丝绸的道路，概括起来说：匈奴还占据河西走廊的时候，即由此草原道直趋天山山间通道，经伊塞克湖一带而至中亚河中地区。

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呼韩邪单于降汉后，位于阴山一带的匈奴就向西越过今宁夏北部，西经居延海、巴里坤湖、吉木萨尔，入天山的山间草原通道，直趋伊犁、伊塞克湖而达河中。

已经退至漠北，而与汉朝继续为敌的匈奴贵族决不会放弃有巨额利润的丝绸贸易，因而就只能从色楞格河、鄂尔浑一带西沿杭爱山，科布多盆地，越阿尔泰山经塔城直趋康居，达河中的草原大道，如果要从天山通过乌孙地区是决不会被允许的，是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只能走这一草原大道。阿尔泰等地区能发掘到墓葬

^①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函第 6 册。

的丝织物,正是当时进行丝绢贸易在这条道上留下的一个侧面,这是势所必然的发展。后汉时,北匈奴对西方的丝绢贸易也同样是走此道。

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是内地频繁分裂割据的时期,可是魏、西晋仍设有西域长史统治着西域,后来苻坚、吕光等也同样统有西域,而在北方草原却是鲜卑族和柔然、高车等族不断发生战争,这时候的草原路是难于畅通的,也是比较危险的,相反,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丝绸大道却更比西汉时有所发展了,不仅蚕桑业已在西域普遍发展,西域丝绸业也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绚丽。

随着隋唐统一西域,以及唐代丝绸业的新发展,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丝绸大道和草原的丝绸之路规模更较前发展了,涌向西方的丝绸不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越前代。

既然塔里木盆地的丝道畅通,怎么还会有草原路呢?这同样是由特定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代北方及西域草原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民族是突厥和回纥族,青藏高原是吐蕃族。自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前后近200年来突厥人活动在漠北和中亚草原地带,处在唐朝、印度、波斯、东罗马四大文明古国之间,控制着中世纪东西交通的孔道。所以一开始就把丝绸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被称为鹰娑山大、小尤鲁都斯的美丽草原又是西突厥建庭中心地之一,这样东、西突厥还没有分裂以前的草原丝道就从外蒙突厥可汗庭到天山以北的北庭地区,进入天山草原大道经大、小尤鲁都斯而至伊犁,再经楚河流域到河中,这是一条盛极一时的草原丝绸大道。

继之而起的回纥族,更因有功于唐的统一事业,利用政治上和唐的特殊关系获得了大量的丝绢,开辟了草原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操纵着草原丝绸贸易达百年之久,其时吐蕃一度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等地,这时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的丝绸之路均被切断,于是回纥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

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治所(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向河中的草原丝绸大道上,形成了北庭、伊犁、碎叶三个丝绸集散中心。在其周围活动的民族也主要是回纥族,这是丝绸从漠北草原输往西域北疆草原的第一站。而伊犁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丝绸集散中心。近年考古已发现了《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这是有重要价值的文字资料。系197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文书的墓葬中出土的鞋里拆出的,残纸已被剪裁为两个片段。^①文义大约是和田(?)禄山有关的一批绢练等物,从弓月城向龟兹运输,中途发生了问题,问题和李三、毕娑、绍谨三人有联系;田(?)禄山向西州长史申诉,并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残纸中的主要文句有:

上缺“田(?)禄山年卅”

上缺“上件人辞称向西州长史”下缺。

上缺“在弓月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驼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不达到龟兹……”

上缺“……绍谨来日毕娑等在弓月城”下缺。

上缺“向巴西去在□今不知见在何处者(?)”下缺。

上缺“其毕娑相打捉将向城是无”下缺。

据考证,弓月就在今伊犁地区,在上所说于弓月城一次就可提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兹运送,可见弓月城已有一个丝绸业中心,否则就不可能集聚那样多的丝绸,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碎叶当然更是中亚丝绸业集散地的重点,当费尔干纳道路被

^① 参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115页。

堵塞以后,这里更成为西去东来的集中点,所以不仅我国唐朝史书上大量记载碎叶,在阿拉伯及其他国家书籍上也一再提及碎叶,因此碎叶城更成为唐朝诗人反复吟咏的题材。

这一条草原丝绸大道在唐代历史和中世纪世界史上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也丰富了草原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所以在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说:

他们从东到西经商,
给你运来了你需要的物品。
要使中国商队砍掉商队的旗子,
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除上述经行天山及阿尔泰山的两条草原丝绸大道外,实际上从贝加尔湖以南向西沿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流即唐努乌梁海等地绕阿尔泰山以北直至斋桑泊的林木中大道,由此而向西南径达康居及河中,也是北方草原民族所经行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向北经过草原大道,到唐朝形成为参天可汗道而直达漠北各游牧部落,包括贝加尔湖周缘及以西直达斋桑泊以北的广大地域。北去的是源源不断的丝绸和粮食,南来的是“积如丘山”的毛织物和各种名贵毛皮。因为草原民族向历代王朝交纳的贡税就是从草原、森林中得来的各种毛皮。这南来北往以及西去东来的草原大道既是丝绸道,又是皮毛道。在我国统一的大家庭中不仅中原的丝绸、粮食供应着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北方游牧民族也以他们勤劳创造的各种牲畜和兽皮供应着内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经济文化生活,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 丝绸的国际关系及其战争

张骞第二次到西域为什么要“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①,说明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中亚后,已在那里了解到中亚及西方人民对丝绸的渴望,以及国际贸易对此的追求后,才能带数千钜万的黄金和丝绸到中亚。后来傅介子到西域也是“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②,如果丝绸不是被西域人民视为珍品,就不会选它做礼物。

当世界各国人民穿上丝绸的时候,各阶层人民都视为既美又实用的物品,所以在世界上成为运销最广最大的商品,商人们赢得了高额利润,竞相垄断这种商业,以谋取暴利。

安息、大月氏、粟特都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尤其是安息商人,为了垄断丝绸贸易,素来不愿汉与大秦直接接触,所以大秦“欲通使于汉”,但因安息的阻挠“而遮阂不得自达”;汉也常想“使大秦”,也难以建立直接联系。东汉班超派甘英使大秦,也因到了波斯湾边,受安息人的阻拦和欺骗,说海中风急浪高,几年也难以到达,只好怅然而回。很显然,安息商人是想垄断丝绸贸易才编出这个谎言的,以求独占丝绸贸易的利润。

在古代的丝绸贸易上,垄断和反垄断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波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冲衢,集结在中亚的丝绸要运往西方,最近便的道路是通过波斯,因此自汉至唐通过波斯的这条丝绸之道,东西方都有过激烈的竞争,甚至为争夺这条通道而多次发生战争。公元2世纪,安息帝国于幼发拉底河流域长期与罗马帝国有战争。

由于欧亚之间中继贸易有时有障碍,东罗马人便曾打算在安息之北开辟一条绕里海、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陆路,但因北方草原

^① 《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70《傅介子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上游牧民族间的纷扰,未能如愿。据称东罗马人为欲解除居间人贩丝之弊,当杰斯丁(Justinien)在位时,曾自己培养蚕种,568年时,Justinine还把殖蚕艺术出示突厥使臣^①,足见东罗马统治者对丝绸事业的重视。

粟特民族从古起就是一个以经商为主的民族,从陆道到草原各道都有他们的足迹,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一支重要的商队,当西突厥占有中亚后,专营锦绣丝织生意的粟特人又力劝突厥统治者经营旧业,在被许诺后,即于元568年前遣一康居使臣Maniach使于波斯王Khosrou Aneuschirwan,要求在其管属下各地贩卖丝货,被拒绝,所贡献的丝织品也被当众烧掉,以示坚决不买来自突厥的丝绸。后来突厥可汗再度遣使前往,又“多为波斯毒死,其幸免者仅三四人,同时波斯散布流言,谓波斯之气候不宜于突厥,俾其不再来此”^②。

通过波斯的丝道既不让走,粟特商人又说服西突厥可汗通使于东罗马,继续进行丝绸贸易。可汗即遣Maniach为使,由中亚经高加索而西行,于567年底到达东罗马都城,说服他和西突厥直接做丝绸贸易。东罗马随即于568年初也遣Ciliciek Zemarque为使报聘,回去时,为了避免波斯的阻挠,只好绕由里海以北之道返回。以后西突厥和东罗马之间又互派了几次使节。567年,突厥怂恿东罗马攻伐波斯,在571~590年东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达二十年之久,突厥之多方怂恿是重要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争夺丝绸贸易的垄断权。公元588年与589年突厥与东罗马联合出军夹击波斯,突厥最高可汗(Schaba)领兵三十万从北面进攻,东罗马则向叙利亚沙漠进兵,公元627年9月西突厥和东罗马又组织联军攻入波斯。后因突厥军队不习惯波斯冬季的气候,相率遁去,波斯库萨和子Kavadh遂与罗马Heraclius议和。

^① 参见沙腕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58年中华书局版,第208页。

^② 参见沙腕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210页。

仅此史例就可知为了垄断丝绸贸易,谋取高额利润,西突厥、东罗马和波斯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足见丝绸影响于沿途各国的政治、经济者至深。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丝绸,给世界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为我们国家赢得了荣誉。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时代里,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给祖国和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汉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起点的 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关系

(1) 汉唐时期自长安、洛阳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书,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在这改革开放,奔腾向前的经济建设大浪潮里,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古代经济建设的巨龙,是吸引国内外千千万万各族人民为之倾倒的一条金光大道,是一条显示中华经济实力,显示中华无比威力,显示中华不朽文化的智慧结晶。

这本书中已经指出洛阳是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后晋九朝古都,在这些时期内,洛阳自然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而长安为汉、唐古都及丝绸之路起点,已为中外人士熟知。在这段时间内的丝绸之路,一般都是指张骞通西域以后的丝绸之路而言,实际远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民早已和匈奴及其先祖有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那时的玉石、丝绸早已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输往草原,即一条路越黄河至山西太原、大同向北经内蒙至贝加尔湖一带;一条路由洛阳西向关中再向北经陕北、内蒙至漠北再向西至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南北经哈萨克草原去欧洲和小亚细亚,这条草原玉石、丝绸之路早于天山南北及昆仑山北麓的丝绸通道,已在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古墓中

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丝织物就是有力佐证。^①

自张骞通西域后,进入西域的丝绸之路一般书上都说出阳关后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经帕米尔瓦罕走廊,西向大月氏、安息等国直达地中海和非洲。另自玉门关西出经楼兰、龟兹至疏勒;也可经车师、焉耆、龟兹至疏勒,出大宛、康居、奄蔡至欧洲。还可自伊吾西北越天山至木垒、北庭至伊犁、碎叶至欧洲。也可由外蒙沿杭爱山经阿尔泰山南北两道至欧洲。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西域干线。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记载丰富得多。有的人强调丝绸之路的干线和支线,实际干线和支线是很难分的。例如从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县西进天山中阿拉沟经大、小尤鲁都斯草原、巩乃斯草原,直入伊犁至碎叶,一向是一条位于天山间的草原丝绸道,迄今竖立在这条道上的鱼儿沟唐代烽火台巍然耸立,就是用以保护这条丝绸道的有力佐证。同样自龟兹西行,一般只说到疏勒,实际自龟兹至姑墨(今阿克苏)经温宿(今乌什)的别迭里达坂,越伊塞克湖至碎叶,向为古代去中亚的丝绸大道,不一定必走疏勒。类似这种情况还可举出不少。可知我国古代史书记载的很不完全,隋朝裴矩被誉为西域通,但他的《西域图记》三卷的资料仅是根据他在张掖向一些西域商人讯问所得,并未亲身考察,必然与实际的丝绸道有出入。

汉唐时期为了保护这条丝绸道,耗费了大量的人才和物力,不仅营造了一条宽阔的大道,特别重要的是在丝绸道旁都有烽火台,每个烽火台之间的距离视地形而定,约在60~100里左右,离烽火台约5~10里左右必有驻守约300~500人左右的军营,唐朝称之为守捉城。《汉书·西域传》所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个“亭”,不仅指烽火台,而且包括军营在内,由盐泽向西直至龟兹(今库车)、姑墨、温宿,都有屯田军卒,并都筑有屯城和烽火台,迄

^① 参见苏北海《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今依然历历在目。《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下指出：“焉耆西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城”，再前进就到了龟兹镇，成为唐代在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驻军中心地。同样在天山北麓的草原道上也有严密的军事设施，保护着丝绸大道，而以设在庭州的北庭大都护府为中心：“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黑宰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捉守；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现在不仅北庭都护府城巍然耸立于吉木萨尔县城北10公里处，而自都护府城向西的守捉城仍有不少留有遗迹；在守捉城之北不远处则为自东向西的一条烽火台，迄今仍可见到不少烽火台迤迤于准噶尔盆地的戈壁黄沙之中，岑参诗中形象地指出：“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① 离烽火台北约20来米处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现在各族人民都称之为唐朝路，十分宽阔，约20米左右，像箭一样笔直地伸向遥远的西方。可以遥想当年这些丝绸道上行走的东来西往各种商队的繁忙景象，当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② 的宏伟气概，令人惊奇和赞仰。这样的汉、唐气魄，怎能不令各个少数民族折服，怎能不令世界各国仰慕中华民族的伟大！

(2) 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和边防巩固

起点于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对西域究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

^①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函第8册。

^② 张籍《凉州词》。《全唐诗》第6函第6册。

和影响?究竟立下了什么样的功绩?当然不是这一篇短文可以说完的,不妨先作一个概略的评价。

我这里所说的西域不是广义的西域,而是指狭义西域,即专指汉、唐时期直属于中央王朝管辖的西域疆土。从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天山以南轮台境乌垒(今策大雅)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西域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土地归入了中国版图。到了唐朝大统一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唐朝在西域的疆土面积远超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汉、唐时期的西域,是当时中国史突出的重点,为世界各国所格外注目。

这样辽阔的土地是如何得来的呢?史籍记载清楚地告诉人们,当西汉初年,匈奴不断骚扰中原,冒顿单于在公元前209年夺占单于位后,迅速征服了乌桓、月氏,并统一了西域,势力大为扩张,汉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时,匈奴已统治西域半个多世纪。张骞去国13年,返回汉朝后,即向汉武帝建议联络西域人口最多的乌孙国,用以断匈奴右臂,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即于公元前119年遣张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钜万”,^①出使乌孙。这时的乌孙已于公元前160年左右从东部天山迁往伊犁河流域,其疆域东至玛纳斯河,北至塔尔巴哈台山,西至巴尔喀什湖,南至天山及伊塞克湖一带。人口63万,是西域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之国,位于丝绸之路中段要道,早已欣羡着汉朝在丝绸之路上展耀的各种诱人的物资,特别是令人炫目的丝绸,早想和汉朝有所联系,以抵制匈奴的威胁,因而张骞持节前去后,给予了热忱欢迎。惟因长期受匈奴统治,加上匈奴势力尚盛,统治着天山南北各部落、部族,所以还不敢立刻答应张骞谋求结盟的建议,必须对汉朝国情有一个确切了解,才能作最后决定。因而乌孙昆莫即派使者和

^① 《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张骞同至汉朝考察,见到“汉人众富厚”^①,归国报告后,乌孙昆莫猎骄靡才作出与汉结盟,并娶细君公主为夫人的战略决策。这一亲汉政策在昆莫猎骄靡和细君死后,仍然由昆莫翁归靡所继承,并在续娶解忧公主为夫人后,于公元前72~前71年间,翁归靡和解忧公主发乌孙国5万精兵击破了位于蒲类盆地的匈奴右谷蠡王庭,从而大大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终于迫使统治西域的匈奴最高奴隶主日逐王于公元前60年投降汉朝,汉朝即撤销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机构,于是年设立了统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可知西域归入中国版图,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乌孙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成为当时世界史上最大事件之一。因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土地归入汉朝版图,使欧亚大陆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欧亚大陆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汉朝发展,同时把中亚历史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汉朝和乌孙结盟所以能击败匈奴贵族,首先是汉朝经济、政治都较匈奴先进。不仅是汉族的丝绸服饰为西域各族人民所喜爱,同时冶金、各种手工业精品、农耕技术等都较西域原有的精湛和先进。而封建统治也远较匈奴的奴隶制统治宽松得多。随着细君和解忧公主带入乌孙的大批手工业及建筑工人提高了乌孙的手工艺技术及建筑业,而汉朝的礼乐制度不仅深刻影响着乌孙人民,同样也深刻影响着西域各族人民。当西汉龟兹仍受匈奴统治时,龟兹王绛宾就勇敢地和乌孙翁归靡、解忧公主所生女儿弟史结婚,并一同到西汉学习礼乐制度,回到龟兹后就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大力改革,史书说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周围一些保守派讥讽他说:“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羸(即骡)也”^②。他既不顾匈奴贵族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的反对,也不顾保守派的讥刺,把改革进行到底,告诫儿子承德必须执行亲汉政策,发展经济文化。所以西汉时期的西域经济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发展。

到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执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给西域匈奴残余势力的分裂活动以可乘之机,搅得天山南北很不安宁。但“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因而西域各族人民日夜思念汉德,“建武(公元25~56年)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随着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到汉明帝时决心重新统一西域。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都已证明当时洛阳的手工业十分发达,工艺精湛,丝绸、漆器、冶金、玉石器、制陶、烧砖、酿酒等门类齐全,如果没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冶金技术,也就不可能产生天文学家张衡设计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而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蚕丝织业也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班固《两都赋》中指出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桑麻敷茷”,当时洛阳的一些大小贵族官僚家中的丝绸织品已“积如丘山”,如董卓“坞中……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①。在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中所记锦帛已主要来自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正是在经济有所发展情势下,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②,实际就是到洛阳去学习经济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基础上,班超仅带36人,主要依靠西域各族人民,取得了重新统一西域的历史功绩,西域各族人民响亮地喊出了“依汉与依天等”^③的心里话。现在哈萨克族在大型阿肯弹唱会上还经常唱“我们亲爱的祖母细君公主”,可见汉文化对西域各民族影响的深远。

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丰富的物质生产,先进的科学文化为基础,从而推动了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班超统一西域后,

① 《三国志》卷6《董卓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后汉书》卷47《班超传》。

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①。这里所说的“重译贡献”，实际主要是从事商业贸易。为了保护这条丝绸之路，“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由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②。

至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后，更大力发展了丝绸织造业，织品数量既多，种类也繁，技术又精致。《齐民要术》一书中专列《种桑柘》篇，就是对当时植桑养蚕技术的高度概括，于是“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③。胡太后甚至打开库藏，令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④。有了这样充足的商品，才能吸引各方商客前来任意选购。北魏为了强国富民，专门在洛阳城外的伊、洛之间御道东营造了招来四方商客的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并以西域前来的商人安置在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⑤。如果北魏没有以丝绸织造业为代表的各种丰富商品，也就决不能吸引西域百国千城的各族商人前来竞购。同时各族商客也把世界各地珍品带到了洛阳，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到了隋、唐大一统时期，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又有了新的的发展，不论其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有所突破，因而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商道更加繁忙，国家的经济实力更远超汉及魏晋南北朝，从而唐代在西部的疆域也远超过历代王朝。从隋朝起就在长安和洛阳分设有规模巨大的工商业市场。唐代长安西市胡商云集，李白

① 《后汉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后汉书》卷83《西域传》。

③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⑤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少年行》诗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金市，向达先生及日本石田干之助均指出即西市，由此可见西市胡店之多。另在长安布政坊有袄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袄祠；普义宁坊有袄祠；义宁坊有大秦寺；崇化坊有米萨宝宅及袄祠，“所有西域传来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长安城西部，袄祠唯东城清恭坊有之”^①。而在洛阳市场内也是店肆林立，国内外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如隋朝洛阳的丰都市场“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唐朝改丰都市场为南市，规模更扩大，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②。足见隋、唐时期洛阳工商业的繁盛景况。可知长安、洛阳已成为世界各国精品荟萃的国际性商业大都会。

现在于新疆天山南北留下的唐朝时期的丝绸道及其有关设施最为丰富，说明到了唐代，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道进行了扩充和完善，烽火台和守捉城除极少数利用原有者外，大多数均已新建。这是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所必有的新措施。

唐朝在西域的疆域比之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扩大了一倍半还多，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如果要依靠武力进行统治，该驻多少军队！所以唐朝决没有依靠武力统治这块土地，而是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团结了各族人民，事实上也只有农牧工商各业的兴旺发达，才能增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巩固边防。很显然，在唐朝近600万平方公里的西域土地上，于公元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麹文泰和西突厥少数贵族的叛乱后，仅留驻少量军队。到公元675年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和龟兹亲西突厥贵族叛乱后，把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置龟兹，随着地域的扩大，设立四镇，稍增加了一些驻军。后来吐蕃在西域扩张，攻陷龟兹四镇；公元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龟兹四镇后，才专门派驻安西都护府3万汉军。后来设安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版，第37页。

^② 《河南志》。

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分管天山南北以后,安西节度使管戍兵 24 000 人,马 2 700 匹;北庭节度使统戍兵 20 000 人,马 5 000 匹。安西、北庭合计戍兵 44 000 人,马 7 700 匹。在偌大的土地上单靠这一点驻防军是无法守卫的,至多仅够维持一点日常的社会治安罢了。一旦边境有事,主要依靠征集各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最显著的事实是在公元 755 年发生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后,原驻在安西、北庭的一些唐朝军队大部分被调往长安、洛阳的平叛战场,西域在只留下了少数老弱残兵,河西、陇右又被吐蕃军全部占领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竟然能在安西留后郭昕、北庭都护李元忠的带领下,和以吐蕃为首的各种分裂势力艰苦奋战 30 年多年,保大唐疆土于不失,创造了世界史上少有的奇迹。这奇迹就是来自于西域各族人民对唐朝经济、文化的向慕,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维护大唐统一事业的决心。许多出土文物证明,当时各守捉城和各烽火台上,许多已是征募当地各族人民守护的。

当唐朝统一西域的时候,不仅长安、洛阳的丝绸、冶金、造纸、漆器等工商各业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西域各地工商业的大力发展、大繁荣。单以丝绸业来说,那时天山南路的蚕桑、丝绸织业同样有了新的发展,在考古出土文物中已有不少龟兹锦、疏勒锦、高昌锦。说明那时天山南路的丝绸业也已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丝绸贸易,可证唐朝时期的西域地方工业也很发达,经济同样蒸蒸日上,各族人民生活过得红红火火,这就自然迸发出为大唐统一事业献身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就是汉、唐时期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西域各族人民留下了永难忘的思念和向慕之情,因而在西域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3) 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从陆路、水路、海道、草原道通向全国,通向世界,输出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和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奋发有为、不断改革开放、富有创造和政治远见的产物。因而汉、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丝绸之路通向西域后,向西域和西方世界输出了中原各族人民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精湛的工艺精品,不仅推动了在中国西域辖境内各族人民工农商各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西方世界经济、商贸和文化的发展。如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畅销希腊,在我国丝绸透明和半透明的丝织、罗纱的启发下,使得从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希腊雕刻,尤其是塑造女性形像雕刻的服饰质地变得轻松、柔软、贴身,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态,显然这是通过丝绸之路接受了中国文明,从而促进和完善了古希腊文明。在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珍品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域的丝绸大道汇聚到长安、洛阳及其周围地区,进一步推动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人所共知,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后,西域许多珍贵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胡豆、胡菜、胡瓜(黄瓜)、大蒜、红蓝、黄蓝等进入中原。《史记·大宛列传》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特别是汉、唐时期内地所需马匹主要来自西域大宛、乌孙、突厥,对中土农业的发展和骑兵的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玉石、皮毛、棉花、肉食、香料、药材等也是西域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这些土特产成为长安、

洛阳市场上的抢手货。同样来自于汉唐西域疆土之外的西方世界如大秦(罗马)、波斯、印度等地的珠宝、香料、马匹、狮子和各种奇技幻戏也都充斥长安、洛阳市上。《后汉书·西域传》指出,大秦(即罗马)“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这些运进长安、洛阳后,既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商品市场,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

由于许多胡商聚居洛阳,大量销售胡货,于是一些上层人物竟以胡物为贵,东汉灵帝在洛阳大倡“胡风”,他本人更“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笙篥、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竞为之”。^①一些富贵豪族,为求奢侈,更派人到西域及域外去购求骏马及珍宝。如北魏迁都洛阳后,河间王元琛任秦州刺史时,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到波斯国,得千里马,号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瓷有余口、瓿、槃、金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②。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方世界不仅竞相购买中国的丝绸,同时也千方百计栽桑养蚕织绸,所以波斯、罗马等国后来都已织出自己的丝绸。1967年在苏联北高加索山区库班河上游大巴河的莫谢瓦尔·巴勒卡的墓葬中出土了有圆珠纹怪兽纹样的锦袍和中国绢画、汉文文书等。而这件锦袍本身是用萨珊王朝以后的波斯锦缝制,内衬沿边却是缝的蓝色花纹样的粟特丝绸;领袖前方则镶以小块直角形的拜占廷丝料;袍带式饰纽,却用窄幅的中国生产的黑底浅花纹羽纱。显然这是国际间商贸、文化交往所产生的综合型新文化。

正是这种国际间商品贸易上竞争的加剧,我国出口的丝绸也

^① 《后汉书》卷13《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杨愔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必然要在花色品种上不断更新,以迎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事实上,文化之间的交流,不管用什么物质充当媒介,它们的作用都是交互的,所以在丝绸文化冲击西方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就在无形中吸收了某些西方文化,潜移默化若干代以后,仅丝绸的纹饰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相当于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精致的平经锦:有用赭、宝蓝、绿、淡黄、白五色丝织出的树纹锦;有用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出的方格兽纹锦。这时期的丝织物中,还出现了中亚、西亚流行的纹样和纬线上起花的新工艺。所以帕米尔以西及帕米尔地区的文化对于丝绸纹饰的反作用很早就有表现。阿斯塔那虽然出土了北朝“珠圈内有动物”图案^①的织物,颇具“波斯萨珊式”风格,但就其全部内容和布局来看,仍旧显示了我国传统的艺术特色。

东汉至唐初的织锦,在显花方法上,都是经丝彩色显花,在发展中变化不大。惟延至北朝、唐初,工艺更为精湛。从总体看,汉锦的纹饰,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保持了一段时间,直至隋、唐之际,域外文化影响才使其有较大改观,纹饰图案更加丰富。

1966年在吐鲁番48号墓出土了一件“贵”字孔雀纹锦。花纹为孔雀,尾部上翘,外绕联珠纹一圈,与延昌三十六年(596年)和义和四年(617年)等衣物同出。^②同样在吐鲁番1967年92号墓“联珠对鸭纹锦”与贞观十三年(639年)和总章元年(668年)墓志出土。^③以上两件均为隋末、唐初的织物,带有波斯风格。

盛唐的时候,虽仍有经线显花的“王”字龟甲纹锦等,但这时占重要地位的联珠鸟兽纹的斜纹纬锦非常流行,并得到发展。1967年吐鲁番77号墓出土的联珠骑士纹锦,花纹为骑士像,外绕联珠

①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初探》,《文物》1962年7、8期。

② 武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③ 武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纹一圈,两年以后(1969年),吐鲁番138号墓出土“联珠猪头纹锦覆面”^①。花纹为野猪头,獠牙上翘,舌部外伸,脸上有四字纹贴花三朵,外绕联珠纹一圈。这些具有波斯风格图案的织锦,有些花纹间有汉字,如“胡王”的骑射纹锦。中国织工采用波斯锦新织法和图案,更有利于向西方输出织物,中西交通因此更加密切。

无论怎样,唐代丝绸艺术仍是中国丝绸传统艺术的一部分。中国丝绸纹饰图案从汉代开始,通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织造技术上,采用西方传统织法的斜纹组织,光泽更加诱人,唐代的纬丝显花法便是西方文化作用的直接结果。纹饰方面,总的说来,汉代宽带状的花纹布局,到唐代成了散布式的花纹布局。西方植物结构纹饰也盛行起来,作为纹饰的母题;而联珠成圈作为纹饰的边缘。西方文化对于汉唐丝绸织物纹饰变化的反作用,虽不及丝绸文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大。但毫无疑问,在装饰手段上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艺术原有的内容。

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西域的时代里,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纺织业、冶金业、造纸业、建筑业、铸币业、玻璃制造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与此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事业,如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也创造性地异彩纷呈,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中盛赞屈支国(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确实隋、唐代时的西域乐舞深刻影响着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全国各地。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杨坚曾设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其中属于西部的就有龟兹、安国、天竺三部乐;隋炀帝杨广又增设为九部乐,属于西域的就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天竺、西凉六部乐,其中西凉乐是汉族音乐、河西少数民族音乐与龟兹乐融合而成,所以也列入西域音乐中,这

^① 武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样九部乐中西域音乐就占了2/3。到唐朝更增设为十部乐,其中西域音乐就有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天竺乐七部,如把天竺乐作为国外音乐看,那末于唐朝西域境内的音乐也已占到1/2。可知隋、唐时代西域乐舞对长安、洛阳为中心全国各族乐舞影响的深远。《隋书·音乐志》称:“大盛于闲阎”。《新唐书·吐蕃传》载:“明年(中宗景龙三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余俄请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迎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唐元稹《法典》诗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舞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唐王建《凉州行》诗中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学。”足见隋、唐时代的西域乐舞盛行于全国各地。

甚至隋、唐以后的西域乐舞仍然在中州大地余韵犹存。建都于中州开封的北宋王朝,据《宋史·乐志》记载,宋代宫廷教坊设有《法典部》、《龟兹部》、《鼓笛部》、《云韶部》四部乐。《龟兹部》乐器有笙、篳篥、笛、羯鼓、腰鼓、指鼓、鸡娄鼓、鼗、拍板,与唐所设《龟兹部》大体一致。《法典部》乐器有琵琶、箜篌、五弦、箏、笙、篳篥、方响、拍板,与唐朝《太常四部乐》中的《胡部》基本相同。而北宋真宗(998~1022年)笃信道教,在全国大典道观,并令国内画师为道观绘制壁画。当时杰出画师武宗元为道教所绘的《朝元仙仗图》,迄今仍然留存;在其左上方的榜题上写着“仙乐龟兹部”字样,共由十一人组成,出现的乐器有:五弦琵琶、曲项琵琶、横笛、腰鼓、笙、篳篥、排箫、拍板。另外三人分别是幡幢、托花盘和持莲花者。足见汉、唐时期的西域乐舞为中华文化创造了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影响当时全国各地,而且随着丝绸道上的驼铃声和大海航船的波涛声影响着当时的世界。

在结束这一章节的时候,还得重复一句。《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所以有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说清了洛阳是丝绸之路

起点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总结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任何时间,任何朝代,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国富民强、维护统一、巩固边防,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我在新疆工作50年了,对此更有深切体会。现在新疆的疆土,远比汉、唐时期小得多了。这就是近代我国经济衰落、科学技术落后,边疆更成为多事之地,帝国主义侵略者纷至沓来,强占我国大片土地的结果。这个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西突厥初期的王庭位置考

(1) 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

突厥诸部兴起于 6 世纪中叶,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从公元 552 年到 744 年将近 200 年时间,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突厥汗国的统治者出于阿史那氏族。据史籍记载,阿史那氏曾从属于柔然(蠕蠕)汗国,为柔然锻奴,他们在阿尔泰山南面冶炼铁矿,制造铁制武器。

阿史那氏族在土门(“万人长”之意,突厥碑文称 Bumin)为其酋长时,逐渐强盛起来,并与西魏通使和建立了绢马贸易关系。

铁勒诸部原役属于柔然汗国,西魏大统十二年(546 年),铁勒诸部为摆脱柔然可汗的奴役,准备向柔然可汗发动进攻。土门获悉这一消息后率众袭击铁勒诸部,尽降其众五万多帐落,壮大了阿史那氏的力量。土门依据自己扩大了势力,遣使求婚于柔然。柔然首领阿那瓌大怒,遣使辱骂土门说:“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①土门亦很气愤,杀柔然使者,与柔然决裂,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551 年)六月,西魏以长安公主嫁土门。

西魏废帝元年(552 年)土门发兵击柔然,柔然大败,其首领阿那瓌自杀。于是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建成了我国

^① 《周书》卷 50《突厥传》,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突厥在土门次子木汗(Mukan,汗又作杆,皆为Kan异译)为可汗时,尤为强盛,史称木汗可汗,“勇而多谋,遂击茹茹,灭之”,“西破𠵽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①。当时突厥汗国的疆域极为辽阔。“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②

突厥率兵征西域,灭𠵽哒是土门弟室点密可汗。室点密与波斯结成联盟,大破𠵽哒,与波斯瓜分𠵽哒旧有领土,议定两国以阿姆河及此河以北的铁门关为界。但为时不久,室点密又进攻波斯,扩拓领地至于罽宾,把𠵽哒旧日的领土完全占领。^③《旧唐书·西突厥传》所载“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当是指室点密破𠵽哒,征服西域之史事。西域诸国的降服,为西突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室点密可汗卒,其子玷厥立,号达头可汗,又称步迦可汗。达头可汗继承父业,颇为强威。隋开皇二年(582年),达头可汗与东面可汗沙钵略可汗不睦。于是分为东西两突厥。

西突厥自分立之后,自成一国,统治中心在乌孙故地,东以阿尔泰山为界与东突厥接,西抵咸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

西突厥处罗可汗时,原役属于西突厥的铁勒诸部率众反抗,于是国势渐衰。至射匮可汗时,西突厥又强盛起来,曾反抗处罗可汗而自立为可汗的“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④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距波斯,南接罽

① 《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周书》卷50《突厥传》。

③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1~163页。

④ 《旧唐书》卷199《北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故地。”^①统叶护可汗除原有的射匮可汗所建龟兹北面的三弥山(即鹰娑山)牙庭外,又在碎叶城与恒逻斯(今塔拉斯)河之间的千泉建一夏都,以便管理所征服的中亚各国。

西突厥自分为两厢十部之后,各部贵族集团常各立可汗,互争雄长,以致不相统一。当时西突厥一部分臣属于唐,一小部分反唐。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为统一西域,平息反唐势力,稳定西域政局,与亲唐派结成联盟,经过多年征讨,终于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完成统一西域大业,并在西域分设官职,西突厥汗国遂亡。

(2)西突厥汗国初期王庭周围的自然环境

《新唐书·西突厥传》称:“西突厥,其先訃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而在陀跋里的记载中曾说“Singibu(室点密)可汗,在所有突厥人中,是最有胆识,最有权力,并且掌握着大量的军队。”^②所以在室点密的带领下,于563~567年左右出兵征服了哒哒。然后于公元567年底派遣粟特人马尼亚赫(Maniach)作为突厥使者前往东罗马帝国(拜占廷),打通了突厥通往东罗马帝国的丝绸商路。当突厥使者归国之际,东罗马帝国即选派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作为答礼使,随马尼亚赫一行报聘室点密可汗。据弥南(Mneandre)书说:“使臣后抵可汗 Dizabou(Istami)之驻所,其地在 Ektag 山之中。”^③弥南解释

^① 《旧唐书》卷194《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转引于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页。

^③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1页。

Ektag 为金山,法国沙畹则认为释意金山不妥,因“Ektag 即 Aktagh 之讹译,此言白山,而非金山”^①。并进一步指出室点密(Is-tamil)、达头(Tradou)所驻之庭并不在阿尔泰山,而是在“库车北山外之特克斯流域”^②。

在弥南的记录中曾说:“我们一行便与要带领我们到额克塔格山——我们希腊人叫做金山——可汗驻蹕之地而派来的人一起前往。于是我们一行到达了四周为所谓的金山所环抱的一个山谷中,室点密的牙帐即设在这里。”^③在弥南书的另一节中还说于室点密可汗死后,其子达头“居住在叫做额克特尔的山上”^④这里所说的额克特尔山实际就是额克塔格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乌孙考》中指出额克塔格山即隋《西域图志》中的阿羯山,与《新唐书》的阿羯田山是同一座山,他说:“《西域图志》的阿羯是阿克的音译,大概是白的意思,而且,由于突厥语把山叫做 tag,因此,唐书的阿羯田的田可能是 tag 的讹译。”^⑤

这里的阿羯田山实际就是指库车以北的白山,即指终年积雪不化的山,概称之为白山。隋裴矩《西域图记》指出:“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烟,即是出砾砂之处。”^⑥《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条则记称:“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这个白山即指今库车以北铁力买提山等海拔 3 600 米左右雪线以上的山为白山。所以《魏书》、《北史》、《隋书》、《通典》等记载,一致都说龟兹的延城和伊逻卢城在白山南 170 里,个别说 200 里。而在《北史·西域传》中更指出:

①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11 页。

②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12 页。

③ C. Mu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IV, p227. 此处转引于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10 页。

④ C. Mu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IV, p227. 此处转引于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10 页。

⑤ 白鸟库吉《乌孙考》,载日本《史学杂志》11 编,明治三十三年 11 号 11 页。

⑥ 杜佑《通典》卷 191《边防典·龟兹》称《隋西域图》,应为《隋西域图记》异称。

焉耆国：“白山南七十里”。

疏勒国：“白山南一百里”。

可知白山都是指的天山终年不化的雪山而言。至于说龟兹北山常有火光，即因山中盛产煤、铜、铁，由于煤自燃而常见火光，从而也盛产硃砂。所以郦道元《水经注》卷2《河水篇》所引释道安的《西域记》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夜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这里的“石炭”，即指煤而言。在《魏书·西域传》“悦般国”条则说：“其国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熔，流地数十里乃凝坚，人取为药，即石流黄也。”因当时悦般国的位置在今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河、特克斯河、喀什河一带，所称悦般南界有火山，即指龟兹以北天山的阿羯田山。在《北史》同传的“龟兹国”条还说：“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饼餠，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即病）人服之，皆愈”。唐李珣《海药本草》称石流黄一名黄硃砂，说“能坏五金”、“服能治万病”，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指出西戎（即指西域）硃砂，颗块光明，大者如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紧要。所以《周书》、《隋书》等均记龟兹国产硃砂。可知龟兹北山是古代西域的重要硃砂产地。有的人误认为硃砂仅产于北庭，实际龟兹和北庭同产硃砂，均因煤田自燃形成，笔者在龟兹、北庭均作了实地调查，所见属实。是以清人椿园（七十一）在《西域闻见录》卷2《库车》条说得更清楚：“出硃砂之山，在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万点灯光，人不可近。冬日极寒时，大雪火息，土人往取砂，赤身而入，砂产洞中，如钟乳型，故为难得也。”这里所说即指古代龟兹的北山，均为同一地点。

西突厥初期王庭为什么要选择在龟兹北山中，就因为龟兹是当时塔里木盆地最富庶的绿洲，而龟兹北山的巩乃斯河、特克斯河流域又是最富饶的草原，畜牧业最为发达，也可以说这一带是当时西域农牧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龟兹绿洲古代所以是塔里木盆地最富庶的地区,不仅因为它是丝绸道上的要站,人口最多;更在于它的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绿洲面积大,著名的渭干河、库车河纵贯境内,又有塔里木河流贯绿洲南境。因位于其北面及西北面的天山中冰雪很丰富,龟兹西北境正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辽阔境域中。这在清朝《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 21 中曾指出:“额什克巴什鄂拉,在汗腾格里鄂拉南二百里。山形宽广,产硫黄。哈喇库勒发源东南麓。赤色勒郭勒,东一源出西南麓,又东一源出南麓。该山为库车北屏,距库车城百里。山脉自木索尔鄂拉分支东南行百余里,为阿勒坦呼苏鄂拉,至此北与汗腾格里鄂拉合,又东行一支接库克纳克达巴。”现在托木尔山区山体高大,基本上是由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和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连结组成的山汇,在 3 000 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内,山势高峻,海拔 6 0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40 座,使大面积山区突出在雪线以上,无数座高耸入云,晶莹闪烁的皑皑雪峰,刺破云天,直插九霄。群峰之中的托木尔峰海拔高达 7 435.29 米,其周围的著名山峰有汗腾格里峰(6 995 米)、台兰峰(6 934 米)、科学峰(6 620 米)、琼库孜巴衣峰(6 588 米)、科其喀尔峰(6 342 米),因而在托木尔峰山区孕育了天山最大的冰川作用区。

在托木尔峰冰雪带有 509 条冰川,占天山冰川面积的 27%,总储量 3 500 亿立方米,年消融量达 35 亿立方米,同时山区降水量也较丰富。雪线以上地区年降水可达 750~1 000 毫米。海拔 2 000 米左右的中山区年降水量 400~600 毫米;海拔 2 000 米左右的中山区年降水量 250~300 毫米。由是台兰河、昆马力克河、柯柯牙尔河、喀拉玉尔滚河、木扎提河等均发源于托木尔峰周围冰雪带。龟兹绿洲主要灌溉水源的渭干河上源即是由哈尔克他乌山汗腾格里峰冰达坂的木扎提河及迤东的喀布斯浪河、台尔维其河、喀拉苏河及克孜尔河等五条河流汇集而成,在克孜尔河以下即称渭干河,为今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主要灌溉水源。

库车河则发源于龟兹天山山脉南麓哈尔克塔乌山东段,约海拔4500米的山区,属于积雪融化和泉水汇集而成的河流,年径流量103立方米/秒,流域总面积3157平方公里,全长146公里,由此向南奔流。在渭干河、库车河的上游山区,雨雪较多,水草丰茂,古代历来为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

弄清了龟兹北山及西突厥使者所到地点后,就不难知道西突厥王庭所在地了。

(3)西突厥初期王庭及鹰娑山位置考

《隋书·西突厥传》称:“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从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其统治中心,于隋开皇(581~600年)时“处罗可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罽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在《旧唐书·西突厥传》则称:处罗可汗的叔父射匮可汗“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寻卒,第统叶护可汗代立”。“统叶护可汗……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从这些记载可知,从隋处罗可汗至唐初射匮可汗的王庭都在龟兹北,尽管处罗可汗时的王庭在鹰娑山,射匮可汗时的王庭在三弥山,惟均称在龟兹北,可知鹰娑山和三弥山很可能是同一山,不过因时代不同,名称有异罢了。

可知西突厥势力尚不强大时,主要根据地在龟兹北的鹰娑山或三弥山,后来深入中亚的势力巩固后,才能于塔拉斯河的千泉建庭。

那末鹰娑山和三弥山究竟在龟兹北的何处?沙畹《西突厥史

料》212页说在特克斯河流域。他说：“龟兹王居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此在龟兹北之白山。而由西北溯裕勒都斯河所抵之白山，似为处罗可汗时一小可汗所居之地，又似为西突厥诸可汗之南庭，又似为射匮可汗所在之三弥山，亦似为东罗马使臣初谒室点密可汗，继谒达头可汗之白山。设此说不误，最初西突厥诸可汗之驻地应为今库车北山外之特克斯(Tekes)流域矣。”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则认为在大裕勒都斯(即尤鲁都斯)草原。他说：“西突厥前身的西面可汗(室点密可汗和达头可汗)就是在这个大裕勒都斯的山谷和从此地一直到额什克巴什河上游的地方建立了基地。他们在从这里获得了丰富的铁和硝砂等矿产，并发挥了突厥本来作为锻工的特点的同时，在西方通过伊犁盆地对锡尔河和阿姆河方面施加了压力；在东方则利用到南方去的道路，将焉耆和龟兹置于其统治之下，在北方则依靠通向乌鲁木齐及玛纳斯的山道与阿尔泰山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①

以上各说，核诸龟兹北山一带的地理自然实际都有不尽合理之处。《隋书·西域传》指出：

龟兹：“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

疏勒：“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

钹汗：“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

尽管在《北史》卷97《西域传》“龟兹国”说：“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查《北史·西域传》系采自《魏书》，写在前。而《隋书·西域传》经过裴矩等的调查，纠正了前书所说“突厥牙位于龟兹以北”的错误说法，而改写为“位于龟兹西北”的说法，这是比较正确的，同时指出了突厥牙与疏勒及钹汗(今费尔干)间的距离及方位。实际《隋书·西域传》所指突厥牙离开龟兹、疏勒、钹汗三地的距离都是在一个点上。因为《隋书·龟兹国》指出疏勒东去龟兹一千五百

^① 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2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版。

里,到突厥牙去可以不经龟兹而从拜城越过天山直至西突厥王庭,这样说成从疏勒至突厥牙为千余里,这个约数是对的。同时疏勒西去钹汗国千里,从钹汗国向东北直至突厥牙二千余里也是对的。而日本松田寿男却认为“《隋书·钹汗传》的突厥牙为素叶城,即楚河上游的绿洲。还有在……《隋书·疏勒传》的突厥牙也同样可以认为是在托克玛克附近。”^①这个考证是错误的,因为素叶城位于钹汗的北面、疏勒的西北面,与《隋书》所记方向全不对头,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上述考订,对于突厥牙的方位既明,可知西突厥王庭既不在特克斯河流域,也不在裕勒都斯草原及溪谷,应该是在著名的巩乃斯草原。何以为证?因裕勒都斯草原在龟兹正北,不在西北,只有巩乃斯草原在龟兹西北。现在由巩乃斯河上游翻过一座2800多米的达坂,即东入裕勒都斯草原,同时也可南下库车,北入独山子,这里是一条重要交通冲衢。今从巩乃斯河上游海拔2032米的巩乃斯林场有公路可通库尔勒市330公里,西至伊犁303公里,南距库车340公里,北至独山子240公里。可知从巩乃斯草原直至库车的公路线为680华里。如在古代走山间马道,所称西北距库车600里,正符合实情。

特别重要的是巩乃斯草原不仅是伊犁河流域最好的草原,同时也非裕勒都斯草原可比。在特克斯河流域的特克斯、昭苏、巩留数县虽水草丰美,但或因山高岭陡,缺少平坦开阔的草原;昭苏盆地草原虽辽阔,但海拔高,气候寒;喀什河谷也是山岭连绵,草原不开阔;只有巩乃斯河流域,一派平川,雨雪丰沛,林茂草丰,草场宽阔,海拔较低,气候适宜,特产丰富,是得天独厚的理想草原区域。巩乃斯草原主要位于新源县境内,上游则属和静县。巩乃斯河发源于阿吾拉勒山和依连哈比尔尕山交结处的安迪尔冰川区。自东向

^① 松田寿田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45页。

西,穿流在峡谷中,从乌拉斯台出山口后至阿拉图拜,傍山而过,流至巩乃斯种羊场与特克斯河汇合后注入伊犁河,全长358公里,集水面积3532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50.4立方米/秒;平均径流总量15.89亿立方米,占新源全县总水量63.33%。

巩乃斯河的主要支流恰甫河则发源于那拉提山冰川区,上游和中游一直夹在那拉提山和塔什伯山之间,从东至西流至阿克亚处,出山口后向西北流经20余公里,在哈拉苏注入巩乃斯河,全长123公里,集水面积为1614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17立方米/秒,平均径流总量为5.53亿立方米,占新源全县总水量的21.35%。

而在巩乃斯草原不论冬夏,气候宜人,雨雪丰富,光照充足,全年平均气温 $6.1^{\circ}\text{C}\sim 9.3^{\circ}\text{C}$,一月平均气温 $-11.8^{\circ}\text{C}\sim -17^{\circ}\text{C}$,年极端最高气温 39.8°C (出现在8月),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35.7°C (出现在元月),全年可日照时数4442小时,实际日照数2400~2700小时,无霜期140~180天,年降水量260毫米~880毫米之间,巩乃斯河上游林区年降水量更达917毫米。整个巩乃斯草原降雪丰富,年均降雪日数40天,最多61天,最少21天。年均积雪日数114天,最长139天,最短93天。积雪厚度:中部为20厘米~30厘米,最厚可达67厘米;西部为10厘米~20厘米,最厚达41厘米;东部为40厘米~50厘米,最厚达90厘米。由于东部主要为雪峰冰岭,这就为巩乃斯河水的补给提供了优良条件。

由上可知,巩乃斯河流域是丰水区域,冬夏气候也无暴冷暴热情况,同时海拔较低,现新源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草原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下,如则克台镇海拔760米。由新源县城向东海拔虽逐渐升高,但阿拉托贝乡海拔为1050米,康苏乡1100米,那拉提乡1240米,这种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人类活动和畜牧业的发展,古代就是塞种和乌孙的活动中心地。现在那拉提乡以东15公里拉斯台的古墓地,就是塞种、乌孙、突厥族墓葬的集中地。草原中各种文物古迹,颇为丰富。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为各种动植物的生长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这里繁殖着各种兽类和著名的中亚野苹果原始森林等,山地森林尤为丰富,有林地 58.03 万亩,主要树种有:雪岭云杉、欧洲山杨、山柳、桦木、忍冬等,雪岭云杉的树龄多在 150 年以上;还有较丰富的河谷次生林,分布于巩乃斯河上下游河漫滩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巩乃斯草原是游牧人民的天堂,也是各类牲畜和植物繁殖的理想境地。单新源县所辖区内(还有一小部分属和静县)的草原总面积达 1 100 万亩,其中有 830 多万亩植被为优良的四季牧场。由于巩乃斯草原地貌多样,草场类型也多样,有广袤的河谷草原、山地草原,并具有冬草场、冬春草场、春秋草场、夏草场,所以季节性迁牧路线均不过长。按植被类型说,有高寒草场、山地草甸草场、草甸草原草场、山地草原草场、荒漠化草原草场、低湿地草甸草场、沼泽草场。这种多类型的草场,具有不同的作用,适宜不同畜种的放牧。所以新源县不仅是伊犁最大的牧业县,而且是新疆最大的牧业县之一。1985 年底各类牲畜存栏总数 61.29 万头。向为新疆细毛羊和伊犁马的基地县,也是国家和新疆自治区商品牛基地县之一。原因是一向水足草茂,质量中等以上的草场占总面积的 85%以上,亩产鲜草 400 公斤以上的草场也占 70%以上,所以巩乃斯草原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每百亩的畜牧业产出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国内平均水平。

而位于巩乃斯草原以东的裕勒都斯草原,现为和静县的巴音布鲁克区,面积 23 835 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 20 517.9 平方公里,有著名的开都河流贯其间,1985 年全区各类牲畜存栏 51 万头。巴音布鲁克蒙语为富饶的泉水,现主要为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牧区,古为突厥语名裕勒都斯,意为星星、平原意。1985 年该区总人口为 14 436 人,其中蒙古族占 78.53%;巩乃斯草原单在新源县境内 1985 年就有 219 288 人,其中以哈萨克人为最多,共 91 996 人。虽然与巴音布鲁克草原面积大致相仿,而巩乃斯草原的人口却多于

巴音布鲁克草原14倍多,牲畜也多。原因就是裕勒都斯草原的水、草、气候、资源都不如巩乃斯草原好。首先裕勒都斯草原海拔2500米,比巩乃斯草原海拔高1000多米,地势高寒,年温差和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温度为 -4.7°C ,7月最高气温 28°C ,一月最低气温 -48°C ,无绝对无霜期,年降水平均为216.8毫米 \sim 361.8毫米。这个降水量比巩乃斯草原少一半以上,因而水、草、森林、气候等条件,巩乃斯草原均优于裕勒都斯草原。

笔者于1990年8月详细考察了巩乃斯草原和裕勒都斯草原。当笔者由西向东进入巩乃斯大草原后,只见无边的淡绿、柔绿,镶着山的蓝边、银边,系着山的长带、玉丝,构成了一幅开阔辽远的画面,充满着清新芬芳的气息。但见红一片、黄一片、白一片、紫一片,全是鲜花铺就的世界,在这鲜花的天地里,星罗棋布的哈萨克帐篷,白得就像一朵朵雨后的嫩蘑菇;那羊群更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来去悠悠。而那丛林中、溪流畔、草野上更不时出现一匹又一匹,一群又一群雄伟矫健的天马,展现了天马故乡的雄姿;进入巩乃斯河上游的那拉提草原,景色更佳,芒草碧绿,鲜嫩流汁。进入巩乃斯林场区域,河流两岸是色调层次分明的白桦、河柳、青松交织成的天然林带;近旁是河柳、荆条,远处是胡杨、桦林;再远处是郁郁青松,漫延到山腰,山顶是终年不化很耀眼的积雪,山脚是五彩缤纷的鲜花。愈往源头走,水势愈小,水也愈清碧,景色愈加旖旎迷人。但见千山耸翠,万木葱茏。然后到了与裕勒都斯草原交界的巍峨冰达坂上,看到了巩乃斯河、开都河的源头。从达坂东下进入裕勒都斯草原好像进入了两个天地,碧绿的草变成淡绿、甚至淡黄色了,草深林密的景象,一变而为草短林少,好像巩乃斯的石头也肥得流油,这儿的石头也好像瘦得出汗,因为这里已到了天山以南。尽管这儿的马也很有名,毕竟风韵、神采比不上伊犁马。除了羊群外,还增加了牦牛。这一切毕竟都比不上巩乃斯草原。聪明勇敢的西突厥统治者决不会选择裕勒都斯草原作为王庭,而是把王庭建在巩乃斯

草原。这是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应有的选择。

巩乃斯草原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富产铁矿,这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所比不上的。现在伊犁各县最好的铁矿在新源县的玉其开布台,那里的铁矿石质量好,含铁量达60%以上,是富铁矿。现在伊犁钢铁厂的主要矿石采自这里。公元568年初,东罗马哲斯丁(Justin)帝遣 Cilicie 人蔡马库斯(Zemarque)报聘西突厥王庭。“使抵康居,有若干突厥人向其售铁。弥南(Menandre)以为其意在使臣知其国饶有铁矿”。^① 突厥原是柔然的锻奴,这里所以要向东罗马使臣售铁,不仅表示其国家产铁,同时也在显示其国力强大,因为冶铁技术高,就表示武器先进,所以西突厥汗国十分重视铁器。而突厥王庭选择在富有铁矿之地也是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

综上观察,巩乃斯草原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宜牧、宜农、宜林、宜工的理想好地方。是以西突厥初期的王庭,只可能在巩乃斯草原,而不是松田寿男等说的裕勒都斯草原。中国也有些学者说鹰娑即裕勒都斯河谷。如薛宗正先生说:“西面可汗:建牙鹰娑川(大裕勒都斯河谷)统领西域胡诸国,居日落之方,班序最末,为第四可汗。”^② 吴玉贵先生也说:“应娑即鹰娑,即今库车北裕勒都斯河谷。”^③ 这些说法不确。

《旧唐书·西突厥传》称:“沙钵罗啞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635年)上表请婚,献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俄而其国分为五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其右厢为五弩失毕……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从这个记载看好像“十姓部落”的名称从贞观九年(635年)才开始存在。可是在

^①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210页。

^② 薛宗正《西突厥汗国史统辨——兼与吴玉贵同志切磋论难》,《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③ 吴玉贵《西突厥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同传中却又说：“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里室点密为西面可汗时是在 552~575 年西魏北周时期。^①这和上述史料有矛盾，应以室点密时期已有十姓部落之说为准。因为十姓部落系由汉代乌孙发展而成，只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史书缺少记载，直至突厥崛起，又对中亚草原民族作了突出的叙述，从而显出了十姓部落之名。应该说十姓部落之名在室点密时已有记载，不是始于唐贞观年间。

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指出了咄陆、弩失毕十姓所辖的部落名称：“咄陆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屈啜(居为屋之误——引者注)，贺鲁以女妻之。三曰摄舍提啜，四曰突骑施贺鲁施啜，五曰处尼施鼠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最为强盛，二曰哥舒阙俟斤，三曰拔塞鞞啜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处半俟斤，各有所部。”^②这十姓部落在唐太宗平定西突厥后，即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进行统治。为了便于管理天山以北直至中亚的草原区域，又任阿史那贺鲁为濛池都督统管十姓部落。孰知贺鲁竟利用唐官名义纠集一些叛乱分子，进行反唐的活动，并于 651 年进行叛乱。唐朝即任命程知节、苏定方等率军征贺鲁，“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隙。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县亘山野，不可胜计。”^③次年唐廷又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再征贺鲁，取得了全面胜利，在 657 年活捉贺鲁。于是即在原阿史那贺鲁统区域设立了都督府及昆陵、濛池两都护府治理。在咄陆所属的鼠

①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216 页考订室点密卒于 575 年末或 576 年初。

② 《旧唐书》卷 194 下《西突厥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③ 《旧唐书》卷 88《苏定方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尼施鼠半部则设立鹰娑都督府管理。显然鹰娑都督府即因鹰娑山而得名,即在今巩乃斯河上源地区。由此可知当时游牧在鹰娑山周围地区的是属十姓部落的鼠尼施部。

上面已经考定鹰娑山在巩乃斯河上源,因而鼠尼施部落游牧的地区也主要是在巩乃斯草原。惟由于巩乃斯草原毗连裕勒都斯草原,是以必有少部分鼠尼施部落游牧于裕勒都斯地区,但不能说鼠尼施部落主要是在裕勒都斯草原。《隋书·高祖纪》称:“开皇四年(584年)二月丁未,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庚戌,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这里所说的苏尼部,实际就是鼠尼施部的同名异译。阿史那玷即阿史那玷厥,史籍又称达头。公元583年时突厥可汗沙钵略下诏令西面诸小汗发兵合师攻隋军。阿史那玷厥拒不奉诏,阿波也因隋的离间而中道退兵,引起沙钵略不满,即发兵击阿波。于是达头、贪汗、潘那诸小汗也结成反沙钵略可汗联盟。在此矛盾激化下,西面诸小汗的联盟必须结束同隋朝的交战关系,遣使约和并有部分苏尼部人即鼠尼施部人降隋。这段史实正好揭示了突厥汗国内战激化后的情势。

薛延陀汗国的兴衰

(1) 为铁勒族正名

薛延陀属于铁勒族的一部,由于国内外有不少人把铁勒说成突厥的同族,这样就无法阐明薛延陀部为何长期反对突厥汗国。为此必须首先科学地认识铁勒和突厥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才能弄清铁勒和突厥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

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说:“历史学家们认为铁勒相当于 Türk 之音译,突厥即蒙古语的复数形 Türküt 的记音。虽然有单数、复数的差异,铁勒和突厥却都是来源于 Türk 的名称。”^①羽田亨也认为铁勒与突厥为同族,力主铁勒为 Türk 之音译。俄国巴托尔德(Barthold)也说:“乌古斯无疑是突厥族。”^②但是法国学者勒内·吉罗(Rene Giraud)著《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中则认为“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时代,乌古斯人与突厥人是不同的”,“确实曾有人试图卖力地把突厥人和乌古斯人考证为一体,这样一来,整个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这种理论是难以立足的。”^③可见在国外也已有人觉察到把铁勒和突厥说成同一民族的不妥切。

^① 小野川秀美《铁勒考》,原载《东洋史研究》1940年5卷二号。译文载《民族史译文集》第6期。

^② 转引于小野川秀美《铁勒考》。

^③ 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铅印本,第250、70页。

我国首先把铁勒说成突厥的是岑仲勉教授,他说:“铁勒,欧儒皆以为即突厥文之 T ö lis……然铁勒苟为种族名称,何以突厥文诸碑未之见?此实读史者一大疑问。”^①他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因没有弄清铁勒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可知建立于公元 732 年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建立于 735 年的突厥文苾伽可汗碑的碑文上所以不可能再有铁勒之名,就因铁勒一名已为回纥族名所代替,那时原有统属于铁勒名称之下的各部已为回纥一名代替,自然不会列写铁勒之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正是由于岑仲勉教授没有弄清丁零——铁勒(高车)——回纥一脉相承的历史,于是把回纥族的历史一概误写为突厥族的历史。如在《新唐书·地理志》上所列的“回纥府州”,岑仲勉教授一概斥之为妄。他在《突厥集史》中说“蹄林州属思结别部,贺兰属契苾部,卢山府为思结部,皆铁勒九姓,新志(指《新唐书·地理志》——引者)失察,以回纥州冠名,殊不合当年事实,非也”^②。实际《新唐书》所记是正确的,因为回纥族就是从铁勒族发展而来。而岑仲勉教授所以要这样说,就因他误认为回纥族就是突厥族,是以他说:“按回纥在初唐,不过突厥诸部之一。”“并入……突厥州下尚不为过;今乃以回纥命名,失其称矣。”^③实际失其称的不是《新唐书》,而是岑仲勉教授自己。

从上面简短的引述中,可知岑仲勉所以抛弃新、旧唐书上对回纥、突厥正确的记载不用是受“欧儒”的影响。于是赞成岑仲勉教授之说者不绝于人,如马长寿先生于《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中也说:“铁勒名称,原音为 Turk,与突厥之原音相同,然则铁勒亦可称为广义的突厥。”^④周连宽先生在《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

①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662 页。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 647 页。

③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 649 页。

④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第 83 页。

诸族的关系》^①一文中认为“高车与铁勒有别”，导致结论是高车与铁勒为不同的两个民族。最突出的是新出版的林幹教授的《突厥史》中强调突厥族的族源来之于丁零、高车，并把突厥族和回纥族说成同一民族，在本书目录第二章为突厥的族源：丁零、高车（敕勒）；第九章为继突厥而起的突厥同族——回鹘（回纥）。^②而在我国《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突厥传》上均无片字只语说突厥与回纥同族的史实。而林幹教授把突厥族和回纥族说成同一民族的唯一依据是说突厥文《苾伽可汗碑》中有“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之语，从而断定突厥族与回纥族为同族。可是林幹教授所据的这个译文是韩儒林教授的译本；另外岑仲勉教授在《突厥集史》一书中对此碑文也译作“九姓乌护，本我族也”。只有耿世民教授把此语译成“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③。这与韩、岑二教授的译文不同。要知韩儒林和岑仲勉二教授并不懂突厥文，所译突厥文《阙特勤碑》等全是从外文翻译过来。只有耿世民教授是突厥语文专家，因而他是从突厥文碑直接翻译的，应该以耿教授的译文为准。自从耿教授的译文出来后，再核对韩、岑二教授的译文，虽然耿教授的译文纠正了前译者的错误，指明九姓回纥与突厥族并非同族，译文所说“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的人民”。显然是说九姓乌古斯曾受过突厥贵族的统治，这样突厥统治者自然可以说回纥是他的人民，此理甚明。为此我又特地请哈萨克族突厥语文专家尼合迈德·蒙加尼研究员核对了突厥碑文原文，也说耿世民的译文符合原意，韩、岑二教授的译文有误。

再从阙特勤及苾伽可汗等碑文中也早已说明突厥族与回纥族是两个长期敌对的民族，仅略举碑文所述于下：

1. 突厥文《噉欲谷碑》说：

① 《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目录。

③ 林幹《突厥史》耿世民译文，第262页。

(第6行至第7行)英明的噉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同颉跌利施可汗一起,南边把中国人,东边把契丹人,北边把乌古斯人杀死了许多。^①

(第12行)噉欲谷说:“要是中国、乌古斯、契丹三者联合起来,我们将无救,我们将腹背受敌”^②。

(第22行)“突厥人民已乱,他的乌古斯〔人民〕也涣散了。”^③

(第48行至49行)“颉跌利施可汗由于其英明和勇敢,曾与中国交战十七次,与契丹交战七次,与乌古斯交战五次。”^④

2. 突厥文《阙特勤碑》载:

(东面第14行)“在右边(南方)中国人是敌人,在左边(北方)baz可汗及九姓乌古斯是敌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是敌人。”^⑤

(东面第28行)“为了养育人民,我率领大军出征了十二次,北面反对乌古斯人民,东面反对契丹、奚人民,南面反对中国……我参加了战斗。”^⑥

(北面第4行)“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乃〔与我们〕为敌。一年中我们交战五次。”^⑦

以上二突厥碑文中所译四处“中国”二字原文均为“桃花石”,即指唐人而言。

3. 突厥文《苾伽可汗碑》称:

(北面29行)“九姓乌古斯本是我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北

^①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② 林幹《突厥史》,第247页。

^③ 林幹《突厥史》,第248页。此语在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59页译成“突厥方乱”〔彼说〕“其属部回纥人谋叛”,此处也明说回纥人系归突厥族统治的属部。

^④ 林幹《突厥史》,第251页。

^⑤ 林幹《突厥史》,第257页。

^⑥ 林幹《突厥史》,第260页。

^⑦ 林幹《突厥史》,第262页。

面 30 行)由于心怀嫉妒,成了我们的敌人,一年中我打了四次仗。”^①

(北面第 28 行)“当我 34 岁时,乌古斯逃窜入中国。我悔恨地出征。……我怒取其男儿妻女两颌利发的人民……”^②

4. 突厥文《翁金碑》载:

(正面第 6 行)“那时九姓乌古斯和 atig 成了〔我们的〕敌人,他们很强大。登利可汗出征〔攻打他们〕……”^③

以上四块突厥文碑铭中都清楚地说明回纥族被突厥族征服后,受到突厥贵族极为苛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回纥人民一直进行各种形式的英勇反抗,并且一直站在唐朝一边,和奚、契丹等族共同反对突厥贵族。是以四块碑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突厥贵族多次进攻回纥族人民,掳掠他们妻子、老少和金银财宝的情况,一再说回纥族是突厥族的敌人,竟然一年中要出军镇压回纥族人民的暴动四五次,可见回纥人民反抗的烈火是何等猛烈。可知林幹教授把突厥族源说成来之于丁零、高车,以及把突厥族说成与回纥族同族是不符史实的。在我国二十四史的《唐书》、《新唐书》中都把突厥和回纥两个民族各列专传,足证在唐代人的心目中也认为突厥和回纥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林幹教授、岑仲勉教授等对此却弃而不用,把突厥史的研究引向歧途。实际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已指出:“铁勒(丁零)在历史上出现,比突厥早得多,铁勒原居地在漠北,突厥原居地在金山南,史书记载它们的风俗习惯大有差别,很难说有什么关系……说它们语言是同一语系,即所谓突厥语系,因此,铁勒与突厥应该有什么关系,这是似是而非的谬说……总之,匈奴、铁勒与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

①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8 页。

② 林幹《突厥史》,第 269 页。

③ 林幹《突厥史》,第 273 页。

史。”^①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而段连勤先生著《丁零、高车与铁勒》^②一书对鬼方、丁零、高车、铁勒一脉相承的历史和铁勒与突厥为两个不同民族的考辨都有比较充分的阐述,纠正了不少错误的认识,把维吾尔族族源及铁勒、突厥两族历史的比较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薛宗正先生也主张“突厥同铁勒虽属同一语族,却非同一民族,更不存在历史的共同性”^③。无疑也是正确的科学概括。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不仅给民族史的研究带来不好后果,同时也必然会被泛突厥主义者所利用,造成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不能不慎。

(2) 薛延陀部的族属及其经济、习俗

薛延陀部是铁勒族的一个重要部落,《隋书·铁勒传》指出,铁勒所属部落甚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薛延陀就是铁勒族的一个部落,主要分布于“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同时分布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有契弊、薄落、职乙、啞苏、婆那曷、乌讎、纥骨、也啞、於尼讎等,胜兵可二万”。^④在《旧唐书·铁勒传》进一步指出:“铁勒……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分散,众渐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薛延陀、契苾、回纥等都是铁勒族的重要部落,并把薛延陀列为铁勒的领首部落,表明此部人多势众。同时在《旧唐书·铁勒传》中还指出:“薛延陀者,自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7~498页。

^②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④ 《隋书》卷84《铁勒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新唐书·回鹘下》则说:“薛延陀者,先与薛仲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铁勒诸部最雄张。”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酋夷男公开声称:“我本铁勒之小帅也。”^①可知薛延陀系铁勒族的一个重要部落,史实非常清楚。

可是有的人提到薛延陀部时,则把它说成“突厥族薛延陀部”,如郝关中、阿不都秀库尔两位学者,在他们译注《乌古斯传》的前言中就是这样说的,并且注明材料来源于《新唐书·薛延陀传》,这是不对的。^②因为在《新唐书》中并没有一个单独的《薛延陀传》而是把薛延陀部归入《回鹘传》内叙述,而《新唐书·回鹘传》的记载是:“回纥……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部、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这里清楚地指出薛延陀是属于回纥族的一个部落,而《旧唐书·回纥传》则指出:“回纥……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可证回纥、薛延陀两部于隋唐时期的史书记载中均属铁勒族,同时在《新唐书》内也没有把薛延陀部归入突厥传的任何字语可据,显然是译注者任意改动了古籍的记载。我并不是说对于古籍记载不能有任何改动,而是说,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经过校核考订,古籍记载确有错误时,可以进行改正。可是郝关中等先生既称直接引用《新唐书》的材料,又未指出其非,那就应该把原来记载转引下来,不能在引证时任意改头换面,这是不可取的态度。

薛延陀部出现于历史舞台时,其居牧地在金山西南,这个地域大概包括今准噶尔盆地北部、中部、西北部,即今中国境内的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及阿尔泰山以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所属地域。大约有近一个世纪时间薛延陀部及同薛延陀一起组成薛延

^①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郝关中、阿不都秀库尔《乌古斯传》译注初发表于《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实行土葬。《魏书·高车传》指出“露坎不埋”，这是土葬的一种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到《隋书·铁勒传》时就说“死者埋殓之”，这是土葬向前发展了的一种形式。而突厥却实行火葬，《周书·突厥传》载：“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将其余灰待时而葬。”经过近代考古发掘，证实了突厥确是火葬。同时在婚俗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般都是女子嫁往男家，在史书的《突厥传》上虽未言明其婚俗，但于《隋书·铁勒传》上却特别指出其婚俗与突厥不相同处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那就是说突厥婚俗是女就男家，铁勒则为男就妻家。这种相去悬殊的婚葬习俗，正是两族之间的不同文化体现，范文澜先生指出的突厥、铁勒两族的风俗习惯大有差别是史有所据的，而冯家昇先生等所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所说的“回纥是突厥系部族之一……它的风俗官制，《唐书》说也和突厥相同，它的经济基础也和突厥相仿佛”^①。这样表述很不妥切，不仅在经济习俗上混淆了铁勒和突厥的不同处，同时回纥并不属突厥系，而是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的一个民族。

(3) 薛延陀等部反抗突厥贵族及契苾—薛延陀汗国的建立

当铁勒族的薛延陀部还驻牧在金山西南的时候，即受到西突厥政权的残暴统治。《旧唐书·铁勒传》载：“初，大业中，西突厥处罗可汗始强大，铁勒诸部皆臣之。”原来突厥汗国是奴隶主政权，因而在东、西突厥汗国辖地内突厥与铁勒族各部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即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压迫非常残酷，不仅徭役、

^①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赋税特别重,而且稍不驯顺和反抗,就会遭到屠杀。《大唐西域记》曾载龟兹国某城因其人民对突厥人稍有反抗的表示,突厥奴隶主就“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废,人烟断绝”。《北史·铁勒传》说:“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这就可见,自突厥建国后,发动的多次战争及维持汗国庞大军事机器和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都是包括掳掠和强征铁勒族薛延陀等部的人力物力维持的,所以《隋书·铁勒传》说:“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出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即征收了薛延陀等部铁勒人民无力承受的重税,所以公元583年隋文帝于诏书中说:“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附心,衔悲积恨。”^①足见生活在突厥汗国奴隶主政权残暴统治下的薛延陀等部铁勒族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奴隶生活。为了求得起码的生存权,呻吟在突厥汗国奴隶主暴政下的铁勒各部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突厥汗国的斗争。

公元599年西突厥达头可汗乘东突厥都蓝可汗被杀,局势不稳之时,即率军进入东突厥汗国,大肆诛杀异己,在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与隋朝为敌,势力扩展至漠南,但在东突厥人民和隋军的共同进击下,公元603年达头败亡。正当西突厥大军东调,向漠北扩张势力之时,长期受突厥贵族奴役的,分布于准噶尔盆地南北的铁勒族薛延陀、契苾等部,即乘机发动了大规模起义,以反抗长期奴役他们的西突厥奴隶主贵族。那时在西突厥本土最有势力的是建牙在于都斤山西北属阿波后裔的泥利可汗。《隋书·突厥传》所说“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实际即为薛延陀、契苾等铁勒部落所击败,604年泥利可汗死,即由其子泥撒处罗自立为西突厥汗国的大可汗,薛延陀、契苾等铁勒部落均受其统治。

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起由于处罗可汗对铁勒族薛延陀、

^① 《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契苾等部征税无度,人民怨恨极深,不满情绪时有流露。处罗可汗害怕引起民族大起义,于是借口薛延陀等部将有变乱的谎言,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迅速拘囚并屠杀了数百氏族部落头目,从而激起了居牧于准噶尔盆地南北铁勒部落的反抗怒火。处罗虽派大军前往镇压,都被激怒了的铁勒人民所击败;其中尤以人数多、部落酋领精强的契苾部和薛延陀部,斗争最为英勇,屡挫顽敌。在斗争中,契苾、薛延陀二部更结成联盟,带领铁勒部落,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隋书·铁勒传》载,契苾部头领契苾哥楞“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自号俟利发俟斤,“名振白山”。^①而薛延陀部在铁勒诸部中“最为雄张”^②,且“化为强族”^③。部人乙失钵在反对西突厥的奴隶主统治中,英勇无畏,节节胜利,亦自号俟斤。就在契苾、薛延陀等铁勒人民连续的沉重打击下,西突厥处罗可汗的统治土崩瓦解,起义获得成功。铁勒诸部遂“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④。这里的贪汗山即指博格达山;燕末山可能在今阿尔泰山东部富蕴一带。就是说从605年起建立了历史上虽短暂、却有重要影响的契苾—薛延陀汗国。

组成契苾—薛延陀汗国的铁勒部落除契苾、薛延陀两部实力最强者外,应该还包括与契苾部同游牧在天山东部南北分布的薄落、职乙、啞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啞、於尼护等部及阿尔泰山、塔城一带的啞勒几、十架、达契等部,这个契苾—薛延陀汗国建立后,很快肃清了龟兹以东天山南北、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准噶尔盆地的西突厥汗国的残余力量。《隋书·铁勒传》指出:“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于是莫何可汗遣重臣常驻高

① 《金石萃编》卷70《契苾明碑》。

② 《新唐书》卷217下《薛延陀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通典·薛延陀传》。

④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昌，“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录了很多契苾、薛延陀与高昌的往来情况。如阿斯塔那 307 号墓系麹氏高昌晚期墓葬（即隋朝末年）曾出土《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① 中记有：

十三日……次吕僧忠传，面六斗，床米一斗二升，供鷄弊零。

_____ 传，粟米一斗，炒一斗，供栈头 _____ 大官上十八人，尽十四日。

_____ 斗九升，供栈头案豆遮摩诃先，上二人 _____。

传八斤，供栈头大官使脾婆，中四人，尽廿二日，合用五十六斤。次传七斤，代阿博珂寒使 _____。

_____ 七斛五升，次哇少何传，面五升，供栈头大官 _____。

_____ 传，面二升，供栈头折无良，中一人，下一 _____。

_____ 日，郑伽子传，_____ 斗，供鷄弊零出军 _____。

同墓出土的《高昌国善等传供食帐》中还记有：

_____ 面七斛 _____ 麦五斗，供栈头大 _____。

_____ 九升，供栈头摩珂 _____ 人，中十三人，尽 _____。

_____ 升，床米六升，供栈头 _____ 尽廿一日 _____。

_____ 米一斗二升，供栈头浮 _____ 尽 _____。

这些文字中的“鷄弊零”就是契苾。“栈头”就是薛延陀。契苾、薛延陀同时出现在这些文书中的是“贪得珂寒”和“阿博可汗”。可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3 册，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0~259 页。

知上引文书所记之事是发生在阿波、贪汗统治高昌时期,即 580~587 年间,契苾、薛延陀部已与高昌有密切来往和相当的势力,就敢和西突厥可汗使同时出现在高昌。由是也可知 605 年契苾、薛延陀等铁勒部打败处罗可汗,建立汗国,就不是骤然产生的了。

契苾—薛延陀汗国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于公元 607 年率军东犯隋朝管辖的敦煌塞。隋炀帝即遣将军冯孝慈率军出敦煌塞御敌,战败。铁勒军虽胜,由于汗国新立,又夹在东西两突厥汗国之间,未便多所树敌,如再结仇于疆域广阔的隋帝国,等于四面受敌,于己不利,所以并未乘胜入塞掳掠,相反,“遣使谢罪请降”。这是为了对付重要敌人的重要战略运用。炀帝即遣黄门侍郎裴矩出使前往抚慰,同时令其出击尚未被隋征服的吐谷浑自效。莫何等为了结好隋朝,以对付东、西突厥汗国,即于当年勒兵经且末进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伏允率残部东逃时,又遭隋军伏击,损失惨重,被迫逃匿山谷间。于是吐谷浑故地,“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① 由于契苾—薛延陀汗国打败隋朝和吐谷浑,它的声威更远播西域和青海、陇右,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地方政权。

与势力日隆的契苾—薛延陀汗国相比,此时处罗可汗所统的西突厥汗国却地方日蹙,国力衰弱,原来辖有“东拒于都斤山,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悉附之”的辽阔疆土,现在已大大缩小,昔日阿波、泥利可汗设有于都斤山西北的“北牙”,已为起义的薛延陀部铁勒人占领,处罗可汗被迫从“北牙”西移一千多公里到了“乌孙故地”,即今伊犁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处罗在大大缩小的领土上“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一在龟兹北,其地名鹰娑”^②。可见西突厥汗国的疆土已只有龟兹以西至中亚的一片,其东面天山南北的大部分领土已被契苾—薛延陀汗国占有。可

^① 《北史》卷 96《吐谷浑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② 《隋书》卷 84《西突厥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见契苾一薛延陀汗国建立后,给了西突厥汗国沉重的打击。据《隋书·炀帝上》指出,611年时位处中亚的处罗可汗又受到达头可汗裔孙射匮可汗攻击,东受契苾——薛延陀汗国所逼,只好率数千骑弃国入塞降隋。

契苾一薛延陀汗国建立后,就牢牢地控制着高昌,并专派重臣驻守,征收丝绸道上的商税,送往天山以北的铁勒贵族享用。隋炀帝时代,高昌就和隋朝往来密切,大业四年(608年)伯雅遣使贡献,帝厚待其使;大业五年(609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室女华容公主。”^① 大业八年(612年)冬回到高昌后,即下令说:“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② 试图移中原风俗于高昌,伯雅此举不仅遭到已经铁勒化的高昌人民的不满,而且伯雅一边倒向隋朝的行动,更为铁勒贵族所反对,所以《隋书·高昌传》说:“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人贡其方物。”此时正是契苾一薛延陀汗国统治高昌的时期,此处的铁勒即指契苾一薛延陀汗国的统治者。显然在契苾一薛延陀汗国统治者的干预下,伯雅的改革流产了。而契苾一薛延陀汗国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们策动和支持下,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年)发生政变,伯雅携其子文泰弃国出走,契苾一薛延陀汗国支持的傀儡上台。次年,政变者改延和为义和。^③ 从义和一年至六年,高昌的统治者是政变者,这些事情均发生在射匮可汗在位期间(611~619年)。在射匮可汗打败处罗可汗之后,契苾一薛延陀汗国就去可汗号,表示臣服射匮,此时如果射匮已实际控制了高昌,那么反对改革的不应是铁勒,而应是射匮可汗,可是反对者恰恰是铁勒,这表明射匮在位期间,实际控

① 《隋书》卷 83《高昌国》,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隋书》卷 83《西域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吴震《麹氏高昌国史索引》,《文物》1981 年第 1 期。

制高昌的，依然是契苾、薛延陀部，这种情况，只有到了统叶护可汗上台才得以改变。《旧唐书·突厥传》载，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为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居旧乌孙之地。”可知契苾—薛延陀汗国只是到这时方被彻底征服，失去对高昌的控制。作为统叶护儿女亲家的鞠伯雅在统叶护可汗的支持下，于619年击败了政变者，复国。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至武德三年（620年）三月间鞠伯雅的使者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使者一起朝贡于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叶护可汗对鞠伯雅的支持。

（4）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及其与唐、突厥的关系

薛延陀者，据《旧唐书·铁勒传》载：“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新唐书·回鹘传下》载：“薛延陀者，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通典·薛延陀传》也说：“薛延陀，铁勒之别部也，与薛部杂居，因号薛延陀。”综上可知，薛延陀部是薛部和延陀部杂居，通过战争合并在一起的部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则认为：“延陀、薛、斛三部是邻居，且处在杂居状态，在其间自然地结成了薛延陀和斛薛两部。”^①

当契苾—薛延陀汗国被西突厥射匮可汗击破后，契苾部在西突厥的压迫下，分散为数支。西支由契苾葛率领，从龟兹北迁至中亚伊塞克湖一带，贞观六年（632年）契苾葛之子契苾何力率契苾部六千余家东迁，归降唐朝，唐“处之甘凉间”。向东迁徙的一支，大概是由契苾车必俟斤率领进入东突厥汗国，《旧唐书·铁勒传》所

^①（日本）小野川秀美《铁勒考》，《民族史译文集》第6集。

记载的唐初出现于漠北的铁勒十五部之一的契苾部，即指此支契苾部。向北的一支则迁徙于金山，从“车鼻”的译名出现于史籍中看，车鼻部依附东突厥，其酋乙注车鼻可汗曾拥兵自立。除迁走的外，还有部分契苾部众留居原住地，以“界失”的译名出现在史书中，与处月、处密部杂居在一处，至西突厥咥力失可汗时期。《通典》卷199载“界失处密等并归咥力失”。由于契苾部是西域铁勒诸部起义的首领部落，所以受到西突厥贵族的多方压迫。薛延陀部也是反对西突厥的首要部落，在契苾被西突厥贵族强行分散迁牧的同时，薛延陀部也因贞观元年(627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境内大乱，被奴役的薛延陀部乘机举起了反叛的旗帜。翌年，其酋长夷男率七万帐东逾金山，迁至杭爱山一带草原，与漠北的回纥、仆骨、拔野古联合起来反抗东突厥汗国。这时东突厥汗国是在颉利可汗统治下，一方面对被统治的铁勒各部人民重敛财赋；一方面“兵革岁动”，入侵唐境。由于“用度不给”，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加上贞观元年(627年)东突厥汗国境内“盛夏而霜”^①草木不生，枯地千里，冬又“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②。这样重的天灾，加上疫病的肆虐蔓延，死亡遍野，《册府元龟》卷42指出：“病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在天灾人祸相煎下，突厥国内大乱。于是对突厥奴隶主贵族怀有刻骨仇恨的漠北薛延陀部首先发动了反抗东突厥汗国的大规模起义。接着回纥、拔野古等漠北铁勒部落也相率起兵叛颉利，“自立君长，将图反噬”^③。颉利可汗连忙派欲谷设率十万骑前往镇压。回纥部酋长菩萨迎战于马鬣山，在薛延陀部支持下，“以五千骑大破欲谷设十万骑，并乘胜逐北至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因率

①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旧唐书》卷68《张公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其众附于薛延陀。”^①由是铁勒起义军声势大振。颉利不甘失败，又遣拓设阿史那社尔率军往讨，复为薛延陀所败，拓设“匹马不归”。^②阿史那社尔只好收残众西奔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颉利可汗仓猝再派突利可汗（即什钵苾）率军出讨，结果“突利师又败绩，轻骑奔还”^③。

薛延陀诸部连连获胜，从而大大壮大了漠北铁勒起义军的队伍和声势，铁勒诸部很快组成了以薛延陀部酋长夷男为首的起义大同盟，从此夷男率诸部“连破突厥四设”^④。颉利精兵，尽为薛延陀部所歼。为了躲避薛延陀等部铁勒起义军的打击，颉利“扬言会猎”，引兵进入漠南地区，于是漠北地区尽为起义军所有。

铁勒诸部占有漠北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⑤。夷男以根基未固，“不敢当”^⑥，即遣使报告唐太宗，寻求唐朝的支持。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亟想从南北夹击东突厥汗国，消除北方边害，即遣游击将军乔师望赍册书、鼓，从间道往漠北，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⑦在唐朝的支持下，一个与东突厥汗国分庭抗礼的薛延陀汗国崛起于大漠之北。

薛延陀汗国建庭于漠北乌德鞬山（即杭爱山）下。^⑧而在《旧唐书·铁勒传》中所说贞观二年薛延陀“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接着又说贞观四年夷男“建庭于都尉健山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旧唐书》卷68《张公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6页。

④ 《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 《资治通鉴》，卷193。

⑥ 《资治通鉴》，卷193。

⑦ 《资治通鉴》，卷193。

⑧ 《资治通鉴》，卷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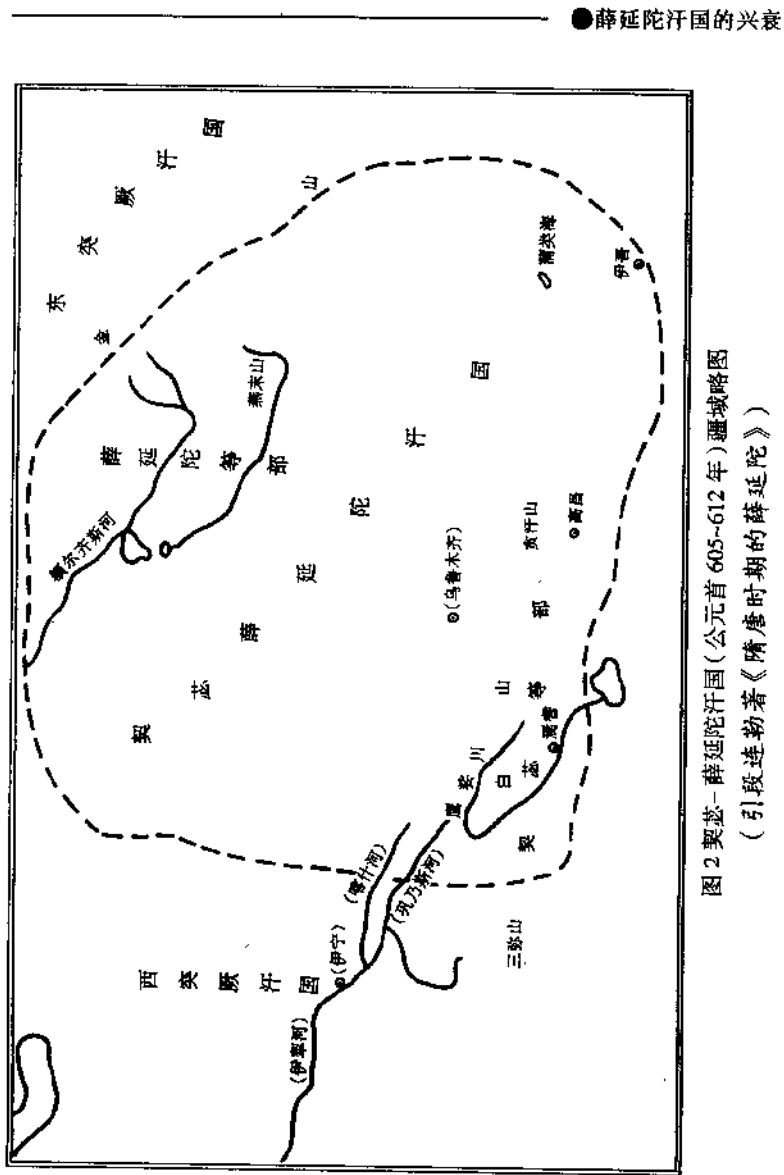


图2 契苾-薛延陀汗国(公元首605~612年)疆域略图
(引自连勒著《隋唐时期的薛延陀》)

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实际郁督军山即都尉犍山,而薛延陀在漠北的牙帐于第一次建庭后,并没有迁移。所说建庭处距京师里程,核诸贾耽《四夷道里记》、《元和郡县志》和《通典》诸书,以距京师四千余里较妥。其具体地点应在鄂尔浑河上游某地。

至于薛延陀汗国所辖疆域,《旧唐书·铁勒传》上有两说,在贞观二年条说:“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磧,北至俱伦水。”贞观四年条则说:“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这两条所说前三句的内含实际是相同的,所称东至室韦或东至靺鞨,地望相同,因为靺鞨在南,室韦在北,不过是同一地区的南北之分而已。第二句所说西至叶护或西至金山,地点也相同,因叶护即指西突厥汗国,其东境至金山,即以阿尔泰山与薛延陀汗国为界。南境界域,一说南接沙磧,一说南至突厥,其意相同,因为突厥已迁至大漠以南,所以南接沙磧与南至突厥为同一意义。只有北境至俱伦水或瀚海之说,历代歧异之见较多。此处俱伦水,《旧唐书》写成俱伦山,《新唐书》、《通典》写成俱伦水,这俱伦山、俱伦水之说差异并不大,不过是说俱伦水出于俱化山而已。有人推说俱伦水即原于杭爱山东脉之朱尔马台河。^①《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薛延陀汗国“北临翰海”,对此丁谦解释为漠北克鲁伦河之沙磧。^②显然不确,因克鲁伦河已偏在东北,同时那里的沙磧也难称瀚海。岑仲勉认为瀚海即杭爱的同音异译,这可备一说,因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唐朝曾在杭爱山东脉薛延陀汗国牙帐旧地以北置瀚海都督府。但杭爱山决不是薛延陀汗国的北界,只能说是薛延陀部牧区所在地。那时有7万多户、近40万人口的薛延陀部牧区很辽阔。《旧唐书·铁勒传》还明确指出: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大部落也都归属薛延陀汗国,这些铁勒部落都在薛延陀部的

^① 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② 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

北方和东北方。如回纥部游牧于娑陵水流域(即色楞格河流域),拔野古游牧于独洛河北,其余同罗、仆骨、阿跌、白蛮等也都在土拉河北、贝加尔湖东及肯特山、呼伦贝尔一带,所以薛延陀汗国的疆域应该包括阿尔泰山以东、大漠以北、呼伦贝尔以西,包有贝加尔湖东西在内的辽阔区域。可知薛延陀汗国已成为雄视漠北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原来在契苾—薛延陀汗国时,薛延陀部曾直接统治过高昌,被西突厥推翻后,高昌鞠文泰就倒向西突厥。鞠文泰对过去薛延陀部统治高昌怀有不满之情,所以对拜见他的薛延陀使者说:“即自为可汗,与唐天子等,何事拜谒其使,明年我当发兵虏尔国,归谓君善自图。”^①如果没有西突厥的支持,鞠文泰是不敢对薛延陀采取如此强硬态度的。史载鞠文泰这一时期东击伊吾,南伐焉耆,不断发动战争。敦煌出土的鞠文泰延寿十四年(637年)的写经题记中,明确提到了“寇贼退散,疫病消灭”这样的战争信息。^②这时,高昌似乎有外敌入侵。因此,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与薛延陀间进行战争完全是可能的。当640年唐朝军队准备伐高昌时,薛延陀要求做向导,此举表明薛延陀有向西域扩张的打算,同时也说明薛延陀与高昌之间的关系已趋于破裂。唐灭高昌后,薛延陀与鞠氏高昌的关系也即告结束。

特别要指出的是,薛延陀汗国建立后,不仅漠北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各部获得了自由,同时也为大唐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于629年建立起来的薛延陀汗国,同唐朝建立了密切的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首先夷男的称汗建国,得到唐朝的玺纛册封,在此之前尽管已得到铁勒诸部的推请,但尚难于约束诸部,“至荒

^① 《新唐书》卷221上《高昌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朱雷《敦煌藏洞所出两种鞠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期。

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①，这是唐朝同周边诸氏族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一种形式。而那时薛延陀部虽拥有骑兵八万，铁勒其他各部合计兵力在12万以上，超过薛延陀兵力，所以夷男深知只有依靠强大的唐朝的支持，才能克服其它铁勒各部分离倾向，保持可汗的宝座。是以夷男受唐朝册封为可汗后，兴奋地向属民说：“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②此后薛延陀汗国的军政大事，都须申报唐廷，听候裁决。如贞观十二年（638年）夷男请立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立嫡子拔灼为四叶护可汗，唐太宗均“诏许之，并礼以册之”^③。同年还下诏册封夷男子额利苾为达度莫贺咄叶护。^④凡被册封为小可汗或叶护等官职的，唐朝都颁赐狼头纛和鼓等象征权力的信物。

薛延陀汗国为了和唐朝维系藩属关系，经常向唐朝朝贡和派遣友好使节。在夷男建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使贡方物”^⑤。如在贞观三年（629年），夷男可汗首先派其弟统特勤入贡于唐，唐太宗回赠了宝刀和宝鞭，并让统特勤转告夷男，“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⑥这对加强唐薛之间的政治联系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此后薛延陀汗国每年都有派往唐朝的使者，有的年份甚至有两次，《新唐书·回鹘传下》称：自贞观三年（629年）至十年（636年）“七年间，使者八朝”。而当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四夷君长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通典·盐漠念》载：“诸蕃君长诣阙稽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应允了各族首领的请求，“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后来唐太宗对薛延陀汗国发布诏令，夷男表示“至尊有

①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唐会要·薛延陀传》。

④ 《册府元龟》卷964。

⑤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 《资治通鉴》卷193，中华书局198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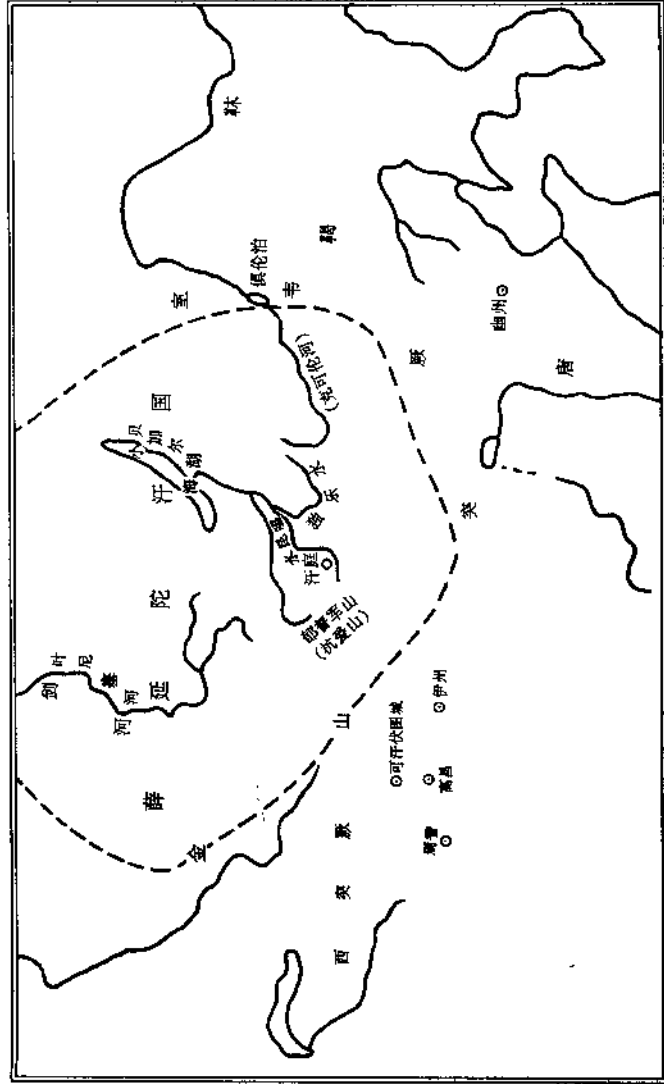


图3 薛延陀汗国(公元619~646年)疆域四邻图
(引段连勤著《隋唐时期的薛延陀》)

命,安敢不从!”^①说明夷男可汗承认唐太宗“天可汗”的国家最高权力地位。所以贞观十三年(639年)高昌王麴文泰遣使薛延陀汗国,挑拨唐薛关系,对此夷男不敢隐瞒,及时报告唐朝,表示“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②。这充分表明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薛延陀汗国都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隶属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符合当时各民族和好相处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当时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因为对薛延陀汗国来说,它臣属唐朝以后,在唐帝国的支持下,维护了汗国内部的和平与统一,由是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唐朝并未向它征收赋税,每年仅向唐朝贡纳有限的“方物”(土特产品),同样,唐朝也因薛延陀汗国的归属,使18年来北部边疆遭受突厥汗国战争破坏的广大地区,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各族的经济文化,增强了唐朝的国力,对唐境内各族人民都有好处。所以唐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年)九月下诏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器宇沉毅,识具明允,夙见时机,早禀正朔;忠诚峻节,著于塞外,贡献琛珍,不绝于王府;加以训勅裔嗣,辑宁种落,俱率藩职,咸慕朝风。其子沙耽弥叶护拔酌、达度莫贺咄设额利苾,并志怀敦确,气干强果,或深竭忠款,乃心阙庭,或远经朝觐,拜首轩陛,言念丹诚,良以嘉尚。”^③

薛延陀汗国的建立,除在政治上密切了与唐的隶属关系外,使当时北方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厥汗国建立时,其东征西讨主要是依赖对铁勒诸部人力、物力的横征暴敛;薛延陀汗国建立后,从根本上斩断了东突厥政权人力物力的基地,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不攻自破的境地。加上薛延陀汗国和唐朝军事上的联合,造成了对东突厥政权南北夹击的军事态势,可以做到唐朝攻其前,薛延陀汗国攻其后,使其陷于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艰困境地。在唐、

① 《资治通鉴》卷193,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193。

③ 《册府元龟》卷984。

薛没有联合之前,虽然各自在抗击着东突厥的军事压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合,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东突厥南侵或北征的进攻态势。

正是在唐朝和薛延陀汗国的军事联合后,加剧了东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单在《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就有不少受颉利可汗统治的东突厥人投向唐朝: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十二月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可知唐、薛军事联合后,不待唐朝大举出兵,颉利东突厥政权就已众叛亲离,面临崩溃的危迫境地。因而当颉利可汗闻知唐朝和薛延陀汗国军事联合后,“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婚礼”^①。这实际是颉利的缓兵之计,企图藉此减轻来自唐朝方面的军事压力,以便全力对付北境的薛延陀汗国,解除背后的威胁,有远见的唐太宗当然不会答应颉利的要求。于是颉利只有孤注一掷,于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发兵进攻唐朝河西走廊各地,唐太宗即派数路大军分道出击,在贞观四年(630年)二月,唐将李靖生擒颉利于阴山,史称:“靖军至,虜众遂溃。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颉利帅万余人欲度磧,李世勣军于磧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勣虜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②至此,唐直辖地已与薛延陀汗国领地连成一片。可见此役收获之丰,胜利之大,无疑是唐、薛军事联合共同斗争获得的重大胜利。

^① 《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三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193,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薛延陀汗国的衰亡

薛延陀汗国经过与唐朝十余年的和平友好相处,终于在贞观十五年(641年)走上了对抗和战争的道路。这主要还得从薛延陀汗国的社会制度去寻找原因。薛延陀汗国是奴隶制度,唐朝是封建制度,尽管两者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但薛延陀汗国生产和奴隶制度的落后性,对相邻民族和国家的财富及人口有着更加强烈的掠夺欲望。唐朝的封建统治阶级也有把自己统治扩充到相邻民族中去的愿望,基于这种阶级本性,唐朝同薛延陀汗国始终为扼制对方和扩大自己一方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首先是争夺人力。当东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余众“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①逃往薛延陀汗国的突厥人,必然都沦为奴隶。逃往西域的突厥部落主要有由欲谷设率领的一支“奔高昌”^②;由拓设阿史那社尔率领的一支“依可汗浮图”^③;多数突厥人投奔唐朝,总数约十万口。薛延陀汗国的奴隶主亟想把这些突厥人变为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唐朝决不会把这些突厥人交给薛延陀汗国,以增强其力量,而是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④于是即把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故突利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夷男看到唐朝对突厥余众的处置后,立即对

① 《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

③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旧唐书》卷61《温彦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朝使臣说：“然突厥反复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巨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①这里不仅说出了夷男处置战俘的政策，同时也企图劝说唐太宗，把突厥人分赐给唐人作奴隶，谋用这种方法把突厥民族部落建置打散，逐渐被汉族同化。因当时薛延陀汗国最担心的是唐朝把突厥部众置于漠南之地，让其繁衍生息和强大起来，威胁薛延陀汗国的生存。对此，夷男当然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薛延陀汗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除了和唐朝争夺突厥降民外，还和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夷男深知只有夺占了天山南北的人力和财富，并控制丝绸之路后，才能有可靠的物质基地，南下同唐朝较量。所以于贞观六年（632年）薛延陀就击败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的军队，把势力扩展到西域的准噶尔盆地。还在与此相差不远的时间内征服了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一带的葛逻禄部。贞观八年（634年）又击溃了盘踞东天山北麓可汗浮图城的东突厥残余势力阿史那社尔部五万骑；那时阿史那社尔已攻破西突厥汗国“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②，已在西域颇有实力，但也仍然不敌薛延陀汗国的精锐铁骑，被迫于贞观九年（635年）率众降唐。可知薛延陀汗国向西域扩张的势头连连得手，然后于贞观十二年（638年）薛延陀夷男可汗即废除原有划分南北二部的军政区划，代之以划分为东西二部新军政区划，将其所属部众及军事力量作了西重东轻的部署，封其嫡嗣拔灼为四叶护可汗，主政西部，所统部落多，且多为延陀部；另封庶长子夷莽为突利失可汗，主政东方，所统部落少，且“所统皆杂

^① 《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种”。^①这种西重东轻的军政部署，显然是同唐朝争夺西域，尤其是争夺丝绸之路东西北交汇点上的高昌据点。

薛延陀汗国这种咄咄逼人、向西域扩张的谋略，唐太宗当然有深谋远虑的对策。原先高昌国与唐朝有良好的关系，曾于武德二年、七年、贞观元年向唐遣使朝贡。贞观四年（630年）鞠文泰亲往长安唐廷，唐对他赐遗甚多。就在这一年伊吾城主奉所属七城投降唐朝，唐太宗即以其地设西伊州，两年后又改为伊州。

鞠文泰从唐廷返回高昌后，见到秦陇以北城邑萧条，不及隋时富庶；又见唐离高昌7000里，其间沙碛占有2000里，地无水草难致大军，料唐朝无力出大军攻击高昌；同时又以金帛厚赂西突厥，约定危急时相援。今又见唐朝已在伊吾立足，势力进入天山南路，打破了高昌王独据中西商道的局面，于是怀恨在心，谋攻打唐伊吾城，受到唐朝不谄切责。征其大臣阿史那矩，也蓄意不遣。西域各国朝唐使者均被阻留。隋末中国大乱时逃入高昌的华人，太宗令其放还，鞠文泰置之不理。焉耆王突骑支在唐朝支持下，开通了由焉耆经碛路直达唐境的商道，鞠文泰即联合西突厥乙毗设袭破焉耆三城，并断绝了同唐朝的朝贡关系。贞观十二年（638年）鞠文泰还遣使薛延陀，公然煽惑夷男脱离唐朝的羁属。同时增筑城池，准备攻守。至此，鞠文泰负隅分裂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唐太宗也决心讨伐高昌少数无视统一大业的分裂分子。

当然唐太宗已侦知薛延陀汗国夷男的野心，为了在出兵征讨高昌的时候免遭薛延陀汗国军队的南侵，就借口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发生的结社率叛乱事件后的秋天，要把内蒙古黄河以南胜夏等州的十多万突厥人尽数遣归河套以北，“复其故土，继其先绪”。^②并册封南迁东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后赐姓李，称李思摩）为突厥降部乙弥泥敦俟利苾可汗，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

^① 《唐会要·薛延陀传》。

^② 《册府元龟》卷964。

那泥熟为右贤王，建立了政权机构，下诏“世作藩屏，长保边塞”。^①唐太宗同时还给夷男下诏说：“至秋间，即欲遣突厥渡河，复其国土……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若其逾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即定，非但有便尔身，貽厥子孙，长守富贵也。”^②唐太宗所以要这样做，是要藉此虚张声势，以便在正面牵制薛延陀汗国的兵力，使其不得分兵助高昌，合力反唐。当夷男可汗闻知李思摩部突厥人将北迁出塞，“心恶思摩，甚不悦”，^③即行调动大军，集结漠北以戒备。实际唐太宗完全是虚张声势，以迷惑薛延陀可汗，乘此时机，击灭高昌，然后再并力对付怀有野心的夷男可汗，这全然是战略上的巧妙运用。如果真的在640年唐灭高昌之前，就把仅“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的突厥降众北迁黄河以北漠南之地，必然会被拥有“胜兵二十万”的薛延陀军所消灭。在此烟幕下，即于贞观十二年（639年）十二月，遣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大军进攻高昌，于次年（640年）八月，唐军神速攻破高昌都城，吓死了魏文泰，新王智盛投降，高昌亡，即在其地置西州。又立刻越天山，占领可汗浮图城，并在那里置庭州，这就堵塞了薛延陀汗国向西域扩展的道路。

只有唐太宗在西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才能集中力量对付薛延陀汗国向唐境扩展的野心。因而到贞观十五年（641年）元月，唐朝决定命李思摩北迁突厥之前将这一决定告知夷男可汗，并郑重申谕：“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疆土，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④然后即命李思摩部突厥北渡黄河，建牙于黄河以北的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规定其居牧区域“南至大

① 《资治通鉴》卷195，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通典·突厥上》。

③ 《旧唐书》卷199下《狄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资治通鉴》卷195，中华书局1982年版。

河,北有白道川”,即整个漠南塞外地区。李思摩部出塞安排定妥后,即上书唐太宗说:“非分蒙恩,立为落长,实望子孙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若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①可见唐朝命李思摩部突厥渡河入漠南,是为了防备薛延陀汗国军队南下的目的非常明显。因此当李思摩部渡过黄河向北迁移时,夷男马上作出了反应:“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②只因唐太宗“遣使戒敕,无得相攻”^③的严令约束,夷男才暂敛兵锋。可是到了十一月,当夷男得知唐太宗将于来年二月东封泰山的消息后,错认为唐朝兵马扈从东行,边境定然空虚,即命其子大度设发兵二十万南攻突厥部众。夷男估计“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④。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高昌后,有百官表请去泰山封禅,唐太宗即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诏许之”^⑤。到贞观十五年(641年)元月李思摩率突厥三万帐,胜兵四万入出塞后的第六天,唐太宗即命皇太子监国,自己带着大臣巡幸东都洛阳,二月十八日又下诏于明年二月总集泰山封禅。夷男可汗深信不疑。可是诏文刚过八日,他又突然以星象不吉,下诏“停封泰山”^⑥。并立刻进行了对北部边境的军事部署,显然已察知薛延陀夷男可汗正“讲武于国中”,即将凭其军事优势剿灭李思摩突厥部众,扩充其势力至漠南。

于是唐太宗一面指示李思摩部突厥人,一俟薛延陀军南犯,即“烧薙秋草”,实行坚壁清野;一面即擢并州都督长史李勣为兵部尚书,坐镇并州(今太原),总领北方军事,并在漠南各战略要地秘密集结大军以待敌。果然,贞观十五年(641年)十月十六日薛延陀汗国夷男借口李思摩突厥人“数窃羊马”,^⑦命其子大度设统率薛

① 《太平御览》卷 904。

② 《资治通鉴》卷 197,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资治通鉴》卷 197,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④ 《资治通鉴》卷 196。

⑤ 《资治通鉴》,卷 195。

⑥ 《旧唐书》卷 3《太宗下》,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⑦ 《册府元龟》卷 996。

延陀本部及回纥、仆骨、同罗等部兵二十万逾漠南下，攻白道川。突厥兵即按照事先唐太宗诱敌深入部署，“先合辄退”^①。夷男错认为突厥人不堪一击，唐朝边境空虚，即行长驱追击，李思摩部安然弃白道川，入保长城。至此，唐太宗胸有成竹地在东起营州、西至凉州的边防线上派出五路大军迎击。以兵部尚书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屯朔州（今山西朔县）；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屯灵武（今宁夏灵武县）；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自大同至托克托一线）正面击敌。各路大军出发时，唐太宗面授胜敌方策说：“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途径数千，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击，既入长城，又不能速退。吾先敕思摩烧薙秋草，（延陀）粮食日尽，野无所获。顷者闻人来云，其马畜啮啖林木，枝皮略尽。卿等犄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制胜之举也。”^② 战争的发展，果如唐太宗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641年12月中旬，薛延陀军攻入漠南一个月之后，唐军开始反击。由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迅速逾白道川，追击薛延陀军至青山，与夷男子大度设相及，双方即列阵激战，“勣兵拒击，而延陀万矢俱发，伤我战马。乃令去马步阵，率长稍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大纵，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甲仗辘重不可胜计”^③。俘获五万余人，薛延陀军大败，大度设只身逃走，“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④。未战死的残众逃向漠北后又遇大雪，“马疲不前，人冻死者十八九”^⑤。薛延陀汗国从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起发动南侵唐朝的战争，以薛延陀汗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因战争而滞

①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册府元龟》卷125。

③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

⑤ 《册府元龟》卷985。

留长安的薛延陀汗国的使臣数人，战争一结束，太宗就礼遣使者，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薛延陀南侵的借口：“语尔可汗，延陀为大，突厥为小。尔责突厥羊马，又勒首领侍卫，我今最处尊大，亦须征发于尔。我既不为，尔安得妄作！尔云突厥部数窃羊马，犬鼠之盗，何国无之，执而加罪，足以惩诫，岂得将兵逾漠，违负要约耶！我国家西越昌海，东逾辽泽，缘边州郡，列屯将士，亦犹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便击。朔州道总管为大度设引兵欲入长城，轻军往问，曾无报答。控弦驰突，轻我师众，致此狼狽！……举措利害，尔当自思！”^①这充分说明唐太宗对薛延陀汗国的南侵事件颇有节制和分寸。正是由于唐太宗对境内各少数民族采取比较宽容和友好的政策，在薛延陀汗国内立即引起了反响。贞观十六年(642年)夏四月，“薛延陀以前扰漠南，遣使谢罪”。唐太宗即对使者说：“延陀(指夷男)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余年，自算何如颉利之众，而侵我边疆。我才发甲骑，倾其部落。尔欲与我为冤，不过欲费我边境十羊五马耳。今见尔遣使谢罪，捨尔前过，情好如初。”^②

贞观十六年(642年)九月，夷男可汗又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向唐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张，玛瑙镜一个，向唐为夷男“请婚”。唐太宗没有立刻答应，经过和大臣们商讨后，同意和亲，并表示“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③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唐太宗却以夷男“聘财未备”为由，“诏绝其婚”。^④对此历史上有的人对唐太宗责有烦言，近现代也有少数人加以责难。我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唐、薛和亲是在双方经过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之后，仍继续保持着军事对抗的形势下发生的。和亲能否成功，决定于这一对抗局面能否得到缓和与改善。唐太宗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① 《册府元龟》卷 996。

② 《册府元龟》卷 980、109。

③ 《资治通鉴》卷 196，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④ 《资治通鉴》卷 197，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如果有损于这个最高政治要求,那就只有断然绝婚,这决不是什么失信不失信的问题。而当薛延陀汗国向唐提出和亲,并经双方议定和亲后仅两个月时间,早在贞观六年(632年)就归附唐朝,定居于甘凉地区的契苾部六千帐,在夷男策动下,投奔薛延陀汗国,接着又把为唐屡建战功,忠贞不二的契苾部酋长契苾何力劫往漠北,胁迫其反唐,何力誓死不从。这些事件使唐、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而契苾何力在漠北亲睹薛延陀汗国上层统治集团对唐朝的敌意,他被唐朝救回后,即劝唐太宗绝婚。显然薛延陀在南侵漠南的战争失败后,夷男的统治地位不稳,所以不惜一切财礼,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婚,目的是“将倚大国,用服其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和亲,必然是“养兽自噬”^①。所以唐太宗断然作出绝婚的决策是明智的,有利于巩固边防,正如唐太宗所说:“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和吾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②果真“诸部怨叛,延陀由是衰弱”^③。因为绝婚后,夷男失去了唐朝的支持,必然增加漠北回纥、仆骨、同罗等铁勒部落的离心倾向,加剧了各部首领同薛延陀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遏制了薛延陀部向南侵扰和扩张的野心。

贞观十九年(645年)九月夷男病死,其二子即展开了争权斗争,少子四叶护可汗拔灼袭杀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拔灼性褊急,取下无恩,多所杀戮,其下不附”。^④即位伊始,乘唐太宗尚在辽东未返,就引兵入寇黄河以南,扰夏州,连犯唐境,为唐将执失思力击败,俘敌数万。拔灼军事失利后,轻骑遁归,“部内骚然”,汗国内部矛盾加剧。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一面派兵进击负隅顽抗的薛延陀军,一面遣使往漠北安抚回纥、

① 《通典·薛延陀》。

② 《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唐会要》卷94。

④ 《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仆骨等部，六月，“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岁共击之”，“多弥大败。”^①在唐和铁勒各部夹击下，薛延陀部众溃散，拔灼为回纥攻杀。薛延陀余众七万余口仍推夷男之侄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但遭到回纥等部军队及唐军的连续攻击，咄摩支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出降唐朝，其余众西奔金山，薛延陀汗国亡。

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太宗亲至灵州，“铁勒诸部相继至数千人，仍请列为州、县。唐太宗接受铁勒诸部的请求，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的行政建置，任命其部落酋长为都督刺史，并给玄金鱼以为符信。对散落的薛延陀部众，唐朝也先后设置了祁连州、曷弹州和达浑都督府等羁縻州、府，加以安辑。”^②降唐的薛延陀首领，被授以将军的职衔。^③至此，唐朝统一了漠北地区。

薛延陀汗国自629年至646年共存在18年；如果再加上605~612年的契苾—薛延陀汗国8年，共计26年。其历史虽短暂，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仍有着不容抹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在铁勒民族经过了漫长的原始公社阶段后，终于在全民族的规模上过渡到了奴隶制社会，成为铁勒民族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它代替了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统治，同唐朝建立了密切的隶属关系，结束了自隋末以来由东突厥贵族发动的连续不断的侵扰战争，使大漠南北各族人民获得十余年的和平与发展，为唐朝最终完成统一漠北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是和夷男可汗一定的政治远见分不开的。尽管夷男晚年曾发动过企图奴役他族的不正义战争，这一点应该予以否定。但他的主要功绩在于领导了反抗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正义斗争，建立了先是包

^① 《资治通鉴》卷198，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202，《旧唐书》卷38《地理一》；《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③ 《资治通鉴》卷209载，咄摩支去可汗降唐后以薛为姓，名咄摩，授右武卫大将军，后改称右卫将军。《资治通鉴》卷200载，原薛延陀部酋长操真达官帅众降唐后，以延陀为姓，名梯真，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岭山开道行军总管身份率领本部士兵参加了讨夏的战斗。

括准噶尔盆地南北,后来是漠北多民族和部落的薛延陀汗国,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唐朝在 西域 设立的 州县 考

(1) 唐以前中央王朝在 西域 设立的 州县

唐代在 西域 的行政建置基本上是沿袭历代统治 西域 的行政建置,不过又有所发展和补充,就是说对于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又是进入 西域 门户的地区,即 西域 东部地区实行州、县、乡、里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官吏任职;而在兄弟民族集中居住地区则采用“守在四方,羁縻不绝”的原则,设立都督府、州制度,被称为羁縻府州,其都督和刺史一律由各族首领担任。这两套行政建置均统摄在 西域 的两大都护府之下。

在这里只说关于 西域 东部设置的州、县、乡里情况。

唐代于 西域 设置州、县、乡、里地区在今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公元 3 世纪晋泰始年间已在罗布泊西南(今若羌)地区设置了鄯善郡,也有可能在此设郡。^①

鄯善自西汉归入中国版图后,由于其地理位置与敦煌郡相连,又为玉门关、阳关西沿昆仑、喀拉昆仑通行的丝绸之路的要站,所以历代都十分重视对鄯善,包括楼兰地区的争夺和经营。而公元

^① 马雍《新疆所出法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中华书局版《文史》第七期。

60年以后鄯善国势力雄张,并灭了楼兰、且末、小宛、精绝等国成为与于田、莎车等国鼎立的重要城邦,所以曹魏、西晋之时都十分注意经营鄯善,迨至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时期也一再争夺鄯善地区。

《魏书·西域传》称:“世祖遂议讨(沮渠)牧犍。凉州既平(事在大延五年,公元439年6月与9月——引者),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事在太平真君九年,行人复通。”

《魏书·沮渠蒙逊传》卷99: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春,“世祖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寻以无讳复规叛逆,复遣奚眷讨酒泉,克之。无讳遂谋渡流沙,遣(沮渠)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遂与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乃据鄯善。”

《魏书·世祖纪下》卷4下: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四月,“征西大将军、高凉王(拓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遣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帝大悦,厚待之。”

《魏书·世祖纪下》卷4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夏五月,“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九月,成周公万度归大破焉耆。……十二月,诏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

《南齐书·茹茹传》卷59称:“先是益州刺史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①

从这些史料看,尽管是在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岁月里,中原各王朝无不争夺鄯善这块要地。到北魏末年时,鄯善已为吐谷浑所

^① 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中推断此事为公元491~493年以前发生之事。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45~46页。

灭,所以《宋云行纪》说: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而吐谷浑占据鄯善将近一个世纪,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才平定吐谷浑,于鄯善国境设置了鄯善、且末二郡。《隋书·炀帝纪》称:“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其中西海、河源二郡在今青海境内。同书《地理志》又说:“鄯善郡……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

到公元327年(咸和二年)前凉张骏击擒派驻在高昌的叛将赵贞后,即在其地设立了高昌郡。这个高昌郡的设立也是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在此设立戊己校尉,主管屯田和军事事宜,并在屯戍区内建立壁垒,从而总称之为高昌壁,终西汉之时,高昌壁都是戊己校尉治所;东汉时曾三次复置戊己校尉,第二、三次都是驻高昌壁,只有第一次将戊和己两校尉分驻柳中和金满。到曹魏西晋时仍在此设戊己校尉。

自汉至魏晋的戊己校尉都是领兵屯戍,负有安定西域之责。当时西域负有军政事务的长官还有西域长史,驻在罗布泊的海头,所以在古海头所出晋代泰始年间的木简内有一简说:^①

兵曹 泰始四年发论部兵名至
高昌留屯逃亡物故等事

由此可知公元286年(泰始四年)有一批兵士由西域长史治所海头调发到高昌留屯。这不仅可见到长史和戊己校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看到在魏晋时期,高昌虽然还没有置郡,但已逐步具有郡的规模以及作为郡的一切军政制度,所以在两汉时期还称高昌壁,到魏晋时期就删去“壁”而单称高昌。在吐鲁番县阿史塔那的一座

^① 孔拉迪(Co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所获的中国文书和零星文物》,第114简。

西晋墓中,还发现一件“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买棺约”。可见当时高昌地区已有相当多的汉族居民。^①从而到前凉就发展成为高昌郡。

在东汉末年西域都护改为西域长史后,虽然西域长史是负责西域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但在东汉末及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却是受敦煌太守和凉州刺史指挥的。因为当西晋统治崩溃后,全国处于混战局面,只有河西走廊地区较为安定,所以产生了五凉政权。当时塔里木盆地也属凉州地区的割据政权管辖,于是中原不少汉人迁往河西及高昌、伊吾一带,形成了汉族文化在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独放异彩的时代,也是英才最多的地区之一。北魏时阚骜所著《十三州志》中指出:“高昌壁,故属敦煌。”当时人早把高昌看做敦煌所属之地。

随着汉人迁往高昌的日渐增多,高昌地区的行政建置也按内地的实行,考古发现一件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的随葬衣物疏,上写:“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民韩渠妻”。可以看出当时高昌郡所施行的乡里制度同内地一样。^②

公元4世纪末,柔然势力伸入西域后,伊吾、高昌、鄯善一带曾一度为柔然所统治,到公元460年柔然贵族消灭了盘踞高昌的北凉残余势力,就立汉族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高昌的割据王朝就以高昌国为名,后来柔然和高车在高昌地区经过激烈斗争,高昌才成为高车贵族的势力范围。虽然公元499年起金城榆中人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后,麹氏王朝维持了140多年,但大部分时间臣服于铁勒族。

由于交河从西汉起就是车师前部王国的都城,地位非常重要,形势也很险要,直到北凉末才被沮渠安周所灭。后来建立王国后,交河成为境内的第二大城市,麹氏高昌王朝在此设交河郡。

^① 《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23、25、39页。

^② 《新疆历史文物》,第23、25、39页。

同时自两汉在柳中屯田以来,那里经济发展,人口日增,加之是丝绸道上通向敦煌的重要口岸,所以麹氏高昌王朝在此设立了田地郡。

可见到唐朝统一西域时,高昌地区早已设有高昌郡、交河郡、田地郡,实行了内地的乡里制度。同时那里已居住着不少汉族人。除原有者外,隋末还逃往不少汉族人,“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①。

唐代以前在今哈密设立伊吾郡也同样是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因为两汉时代,汉和匈奴贵族曾在伊吾、蒲类海一带进行长期争夺战,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开始在伊吾(今哈密附近)屯田,设宜禾都尉,此后这里就形成一个重要的屯田区。到曹魏时设立了伊吾县。据《元和郡县志·陇右道》卷40伊州下称:“至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可见这个伊吾县还在今哈密以南,经寄敦煌郡管属,所以《晋书·地理志》把伊吾县列在敦煌郡下,这是郡县制度推行于西域的最早纪录。公元488年(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二年)柔然贵族在北魏鲜卑贵族的沉重打击下,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即以城降,魏即就其地设伊吾郡。从伊吾县到伊吾郡前后经历了二百多年时间,这不仅标志着行政建置上的前进,特别标志着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巩固。

随着伊吾郡的设立,到隋统一中原后,更大力经营这块西域的门户。隋开皇初就遣元暉出伊吾道,通使于西突厥达头可汗。大业四年(608年)又遣薛世雄率军出玉门,越过白龙堆沙碛出击伊吾,伊吾闻讯大惧,即行出降,于是世雄即筑城于汉故伊吾城东,留兵戍守而还;609年突厥派驻在伊吾的吐屯设即行献所管属的西域地数千里降隋,609年又设伊吾郡。突厥闻讯,即出兵东击,隋末伊

^①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吾又为突厥所据。可是郡县制度长期在伊吾地区的推行已深入人心,不可阻挡了。

(2)唐朝在天山南路设立的州县

于魏晋南北朝和隋朝在西域东部地区已设郡县的基础上,到了唐朝,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张和汉文化的影响,在行政建置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充实。

唐朝初年,西域主要受我国西突厥贵族的统治,当李渊、李世民父子以破竹之势击灭隋朝的时候,伊吾城主石万年有感于唐之威德,即于贞观四年(630年)入朝,举其所属七城降唐,于是唐即就其地设西伊州,632年又改称伊州。西突厥贵族闻讯,即勾结高昌王麹文泰,共击伊州。同时麹文泰也在西突厥贵族的唆使下,利用他占有高昌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阻断并拘留西域各国前来的使者,扣留被突厥掳抢到高昌的汉人;到处去煽动反唐,向薛延陀说什么“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①。自己则昼夜“增城深堑”,预备搞分裂割据;而西突厥贵族又在天山以北的浮图城驻兵,与高昌为犄角,以抗唐军。

在此叛迹已显、无法容忍的情况下,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和薛万钧、契苾何力等将军统率汉兵和突厥、契苾战士数万,一鼓而消灭了高昌的叛乱势力,麹文泰之子智盛投降。侯君集即“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即以其地设西州,并同时设立安西都护府,留兵戍守。而原屯兵于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兵,闻高昌被击破,也惧而来

^① 《旧唐书》卷198《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降,即以其地为庭州。就是说在640年时于天山以南的高昌设置了西州,天山以北的可汗浮图城设置了庭州,这样在东部天山南北就有了伊、西、庭三州。随着安西和金山——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位在天山东部的伊州、西州、庭州先属于金山都护府;后属于北庭都护府管属。

在伊、西、庭三州之下还设有县,州有刺史,县有县令,这种州县设施与内地的完全一样,重要的州还设都督府,如西州另有西州都督府,以统领军政。县以下是乡、里、保、邻、户宝塔式的基层组织制度。唐朝制度规定五户为一邻,四邻为一保,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在州府城内无乡,而以坊或里为管理单位。

先说伊州,自从贞观四年由西伊州改称后,到天宝元年(742年)又一度改称伊吾郡,可为时不久,到乾元元年(758年)仍改称伊州,州治大致在今哈密市附近。据《元和郡县图志·伊州》卷40称,伊州的州境“东西一千一十五里,南北四百九十里”。其户数仅说“开元户六千四百六十六”,这个户数较之新旧《唐书》所载多了两三倍。《旧唐书·地理志》卷40称:“旧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六千七百七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一万一百五十七。在京师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三十里。”^①而由伊州西南至西州七百三十里,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七百里。

在贞观四年(630年)设立西伊州的同时,就设置了伊吾、纳职、柔远三县:

伊吾县设在原伊吾屯田处,与西州州治在一起,下辖四个乡。据《新唐书·地理志》称:“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北距天山一百二十里,县南二里有咸池海。^②

^① 《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说: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万一百五十七,这个数字相同于天宝时期的户数。

^②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称“咸池海在县南二百里。”

柔远县在州治东北，因县东有隋朝的柔远故滇而得名，下辖一个乡。县北二十里即为天山，还设有守捉。

纳职县在伊州西南三百二十里，据考即今哈密县的四堡，又名拉布楚克，下辖七（或三）个乡。东汉明帝时曾于此设宜乐都尉，后鄯善人在此筑城，胡人称鄯善为纳职，因以为名。鄯善人为何到此来筑城，完全是被迫迁来的。在《南齐书·茹茹传》卷59称：“先是益州刺史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道径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查江景玄使丁零时间是在公元490年，由于丁零击破鄯善以后，才把一部分鄯善人北迁伊州，建立纳职城，可知纳职城的建立是在公元5世纪末年。自从唐初在此设纳职县后，开元六年时曾废，十五年复置。县南六十里有陆盐池。

从纳职县向西南可直通西州，向西北越天山可直达北庭。据《新唐书·地理志》称：“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次其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自罗护守捉向“西南经达非草滩，百九十里至赤亭，与伊西路合”，这就是通西州大道；另从罗护守捉向“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至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这是越天山至北庭的大道。这罗护守捉应即今七角井地区。

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的甘露川于景龙四年（710年）建有伊吾军，受北庭节度使统率。所以《文献通考》中又称“北庭伊州”。

伊州是唐代进入西域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古代起就一直居住着我国的兄弟民族，他们一向能歌善舞，唐代设立伊州后，就把那里的民族乐舞也传入了内地，被称为《伊州大曲》，对唐代乐舞艺术影响很大。唐崔令钦的《教坊记》说：“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来叠去，不离此两曲。”可见伊州乐舞在唐代宫廷中的重要地位。

从伊州向西就到了西州，相距七百三十里，自西州至西南焉耆七百二十里。西州的所在位置即今吐鲁番盆地。据《元和郡县图

志》卷 40 指出的州境是“东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六里”。《旧唐书·地理志》卷 40 则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其四境都比伊州小一些，可是西州却比伊州富庶，耕地面积多，物产富饶。《北史·西域传》称：“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多蒲桃酒。”所以设有前庭（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县。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即唐太宗平定高昌的时间和西州、交河郡、安西都护府治所是在同一地，还是不同地点。

先说唐太宗命将平定高昌的时间。《旧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十三年，平高昌”，《旧唐书·太宗纪》则说，贞观十四年八月癸巳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而在同书《西戎传·高昌国》也说是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元和郡县图志》及《新唐书·地理志》等也都持贞观十四年（640 年）说，可知贞观十三年平定高昌之说是错误的。

同时，西州、交河郡、安西都护府治所，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也应该是都在高昌地区，而不在交河。因为《旧唐书·太宗纪》卷三说：640 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可见西州是设在高昌。接着又说，同年九月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可见安西都护府治所也是在高昌。而《旧唐书·地理志》又说：“平高昌，……显庆三年（658 年）改为都督府。”这个西州都督府的名称一度曾改为金山都督府。可知西州都督府也没在高昌。又说“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西州”。可见交河郡也是设在高昌地区。这就可见西州、西州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交河郡的治所先后都是在高昌，并不是在交河。因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上册 76 页所说的：“交河，故城遗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西北五公里处，是两条小河交叉的一个小岛，为安西都护府治所。”这个注解也许是根据《通鉴唐纪十一》卷 195 称，贞观十四年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的材料而得，不过这条材料是

值得商榷的,因为当时的都护是兼任州刺史的,如贞观十六年八月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①。由此可证,在都护兼任刺史的情况下,如何能把州治设在高昌,而把都护府设在交河,这是不可能的。都护和刺史应该同在高昌地区,不可能在交河,是以把安西都护府治说成在交河是通鉴弄错了。

在西州下共设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县,分别简述如下:

高昌县 640年设置,取旧高昌郡以为名。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前庭县,县衙与西州治所在一起,下辖十个乡。县治与州治均在今吐鲁番县城东五十里的阿斯塔那(二堡)和哈拉和卓(三堡)之南,尚存有古城遗址。近代考古已发现高昌县下的乡名有武城、崇化、太平、宁戎、宁大、宁昌、顺义、安西等;^②乡以下为里、保、邻、户,《唐六典》称:“五户为邻,四邻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在另外的出土文书中还见到“保头”称号。保头即保的负责人。高昌城内的里、坊名有节义坊、淳风里等,^③在出土文书中曾见到“节义坊坊正鞠伯恭”。^④

柳中县 即今鄯善县的鲁克沁地区,在高昌东南七十里,从高昌至鲁克沁一带自两汉起就是一个重要的屯戍区域。因为从木头沟、胜金口流下的水灌溉着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从吐峪沟流下的水灌溉着洋赫,从连木沁流下的水灌溉着鲁克沁,现在二、三堡经洋赫至鲁克沁间,虽有少许戈壁沙滩,基本上是村落连村落,田地连田地,鸡犬之声相闻。由于有这样一些水流的灌溉,古今未变,所以在古代也是高昌的富庶区域。相传后汉时就在鲁克沁地区筑城,

① 《通鉴》卷196《唐纪12》,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③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第6页。

④ 《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被称为柳中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于此设戊己校尉进行屯田,匈奴闻讯,即于次年率军围攻校尉关宠。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酒泉太守段彭等,率军驰援柳中,匈奴才遁去。即暂罢戊己校尉,到和帝永元三年(91年)才再设戊己校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又罢。到延光二年(103年)东汉才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屯田柳中,并发龟兹等国兵击走了盘踞在车师前王庭的匈奴军队。在东汉末及魏晋之时,因中原云扰,未能在柳中继续设官驻守,直至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才于设立高昌郡的同时,于柳中设立田地县。《读史方輿纪要》卷65高昌废县条说:“今火州城也,本名田地城。輿地志,晋咸和二年,张氏置高昌郡,立田地县”。这里把田地说成在高昌城地区,是顾祖禹弄错的。因为顾祖禹所说的火州指的是高昌,因为他在“柳中城”下说“在火州城东七十里”。而在田地城的不是高昌城,系柳中城,历史上的记载是清楚的。公元499年麹嘉被立为高昌王后,即设有田地太守,《北史·高昌传》称:“其国,周时,城有一十六。后至隋时,城有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此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这就可见交河、田地是高昌国内仅次于高昌的两个重要城市,如果田地城就是高昌城,就决不会在同一地区再派出一个王子去治理。《唐书·高昌传》亦称:“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趋田地城,将军契苾何力为前军,与之接战而退。大军继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都。”这里也清楚指出先攻下田地城,然后再进逼真都高昌,可见田地非高昌是十分明确的。

640年平定高昌才设立柳中县,是由历史发展而成,因为在那里自汉起已早有城郭,街衢巍然,禾菽相连。下辖4个乡,近代考古发掘已知县下有承礼乡、弘教里等名称。^①

交河县 位于今吐鲁番西北二十里的雅尔湖,周围居民称为

^① 《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雅尔和图”。“雅尔”为突厥语“崖岸”，“和图”为蒙古语“城”，含义“崖城”。城址突出在一个船形小岛上，岛长约1700米，最宽处约300米，岸崖高约30米，形势险峻。发源于天山的河水到土崖北端分流，又在南端相交，所以《汉书·西域传》称：“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在汉代一直是车师前王国的首府。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的30多年间，汉和匈奴贵族为了争夺交河这块战略要地曾进行了五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五争车师”，终于赶走了匈奴贵族，并于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于此设置戊己校尉和驻兵屯田。后汉时，北匈奴又与汉反复争夺车师前部。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西域长史班勇终于击走了前王庭的匈奴，从此车师倾心于中原王朝，公元382年车师前王弥真朝于苻秦；公元435年（北魏太延初）又入朝于魏，魏即册命大帅车伊洛为前部王。公元450年为盘踞高昌的沮渠安周所破，由是以交河为根据地的车师属于高昌，即于其地设交河县，辖三个乡，属西州。

为什么车师前王庭会选择在交河呢？这是由于从高昌盆地通往天山以北的两条通道都要经过交河县界。一条是《西州图经》残卷所记的“他地道”称：“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①这条路也就是《新唐书·地理志四》西州交河郡条所记“自县北八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这是车师由前后部往来的通道，后来宋使王延德去北庭也是走的此道。^②另一条就是《西州图经》所记的“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这就是从吐鲁番西北经达坂城通乌鲁木齐的道路，白水漳即途径的白杨河，处月已西诸蕃，指的是西突厥各部。当时正是通轮台的大道。在《通典》和《太平寰

^① 参见《敦煌石室遗书》。

^② 《宋史·外国传六》高昌国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

宇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正因为交河处在通往北疆的交通冲衢，所以历代以来多少诗人墨客寄以无限征戍情思。伟大诗人李白的名句“玉手开城长叹息，狂夫犹成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鸟泛中洲”（《捣衣篇》）；孟郊的“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折杨柳》），都表达了战士守边卫国的功绩。

天山县 平定高昌后，于640年设置，约在今托克逊县附近，托克逊即天山之转音。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称，县治离西州治所一百五十里。这里是通往焉耆的必经之道。《西州图经》残卷称：“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新唐书·地理四》西州交河郡条更清楚地说：“自州（即高昌城）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礪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三十里至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这里的淡河即开都河，渡河才到焉耆城，可见唐时焉耆城在开都河之南。玄奘西行也是走的此道。其中银山碛，今维吾尔语称库米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指出玄奘“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出也”。

天山县当然不会是凭空设立的，这里必然是先有城镇，然后才设立县治。据《通典》卷191西域车师条称：“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田地之讹）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可知天山县是在始昌城基础上设置的，不过不少书本上都说蒲昌县由始昌城设置，如：

《旧唐书·地理志》卷40：“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

《太平寰宇记》称：“西州蒲昌县（东北一百八十里，二乡），唐贞观十四年，置于始昌故城。”

《读史方舆纪要》卷65：“蒲昌城，在土（吐）鲁番西，高昌所置

始昌城也。”

尽管主张蒲昌城为原始昌城之说者为多，我却同意《通典》所称天山县为原始昌城之说。因为《读史方輿纪要》把蒲昌城放在吐鲁番西部，显然指的是天山县，而蒲昌城却位在吐鲁番的东部，系蒲昌县治所在；同时主张蒲昌城导源于始昌城之说的各书都未指出天山县治源于何城，只有《通典》指明了，足证《通典》较为确实。

开元二年(714年)于西州地区设置的天山军，其驻地也有不同说法，杜佑认为是在西州城内，顾祖禹同意此说；宋白则认为在天山县地区，他说：“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军”。顾祖禹反对宋白所指的天山军位置，认为天山军系天山县之误。我认为天山军不在西州城内，而设在天山县境，虽不一定在城内，但也不会离天山县治太远。因设立天山军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吐鲁番盆地西北天山一带的西突厥各部落。642年8月^①癸酉“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傲，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可知当时威胁吐鲁番盆地的敌人主要来自西北天山牧区。因而天山军设在天山县附近的要隘是最为适当的，不会把它设在西州城内，只会设在常有敌情的地点，此乃用兵之道，不可以想当然为之。

蒲昌县 根据杜佑《通典》所说由原东镇城所设。《元和郡县图志》卷40称：“西南至州百八十里。”我认为《北史·高昌传》中所说的白棘城也可能就是蒲昌城的旧址或转音，因为白棘城西距高昌一百六十里与上述东镇城离西州里数相差只二十里，因而蒲昌也可能由白棘、东镇城等发展而成，应即今鄯善县地区。至于说蒲昌县和蒲类县等并列一起，或把它列在天山以北都是错误的，而在唐

^① 此处为贞观十六年，而《读史方輿纪要》卷65记此事于贞观十二年，讹。

史的不少记载上却是这样写的：

《旧唐书·地理志》卷40：“蒲昌……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蒲昌县“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车师后王庭也”。

《新唐书·地理志》卷40：蒲昌“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

《太平寰宇记》：“西州蒲昌县（东北一百八十里，二乡）……取县东蒲类海以为名。”

这些记载的错误表现在：

1. 把位在天山以南的蒲昌，列于天山以北。

2. 把蒲昌之名误认为得之于蒲类，因蒲类在山北，于是也就牵强附会地把蒲昌也列于山北。

3. 把蒲昌和金满之名混淆一起，自然山南山北难分了。最突出的是说蒲昌县旁有一蒲类海，实际是古今来于蒲昌周围都无蒲类海，也无其他海子。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卷65中的“蒲泽海”条对此错误更大加渲染说：“在吐鲁番西南，一名婆悉海，周四百里，蒲昌、蒲类两县皆以此名。”而在文中所叙自汉至后魏与匈奴及柔然在蒲类海地区斗争的历史，却都是天山以北今巴里坤一带的事迹，而顾祖禹却把它都归入吐鲁番地区叙述，实在失之过远了。

蒲昌县下辖两个乡，可见该县面积并不大，比西州、柳中、交河都小。这是符合当地实情的。

(3)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立的州县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命将平定高昌，设立西州的同时，也在天山以北设立庭州。《旧唐书·高昌传》卷199称：“以高昌为州县……以其地置西州……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

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于是勒石纪功而旋。”原来高昌王麴文泰恃有西突厥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为援,才敢反唐,今见唐兵锐气正盛,未敢战而降,这样高昌势孤力单,也被迫降唐。于是在山北山南同设西州和庭州,以控扼西域门户,这是当时形势和历史发展所必有之结果。因而顾祖禹说:“(贞观)二十年,西突厥以其地来降,因置庭州。”^① 这不符于史实,因为这条史料来自《旧唐书·地理志》卷40所称:“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而在此史料之后,同时又说金满、轮台、蒲类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显然前后矛盾。

庭州设立后,于武后时一度改设金山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改称北庭都护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置北庭节度使。

在庭州地区设置州县及都护府。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称,其主要任务是“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此处斩啜即指东突厥默啜。从庭州“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骑施庭一千六百里,北至坚昆七千里,东至回鹘界一千七百里”^②。

庭州所属有金满、轮台、蒲类三县。《新唐书·地理志》卷40还列有后庭、西海、蒲昌,实际后庭即由金满所改,蒲昌系金满之讹。西海恐也系蒲类海的别称,所以以三县之说为妥。

庭州自古即以游牧为主,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卷40仍说唐时该地各族人民“其族帐居,随逐水草,帐门皆向东开门,向慕皇风也”。核考庭州所辖区域即前汉乌孙故地,后为车师族后王游牧之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65,中华书局版,第3册,第2780页。

^② 见《旧唐书·地理志》卷40。而在《元和郡县图志》卷40则称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西北去突骑施三千余里,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东去斩啜一千七百里,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这里所称东至西州应为南至西州。《旧唐书》中说东至回鹘界与此处所说东至斩啜界里数相同,这是因东突厥后来被回鹘所并,东南至西州从六百八十里较准,其余里数不同,是因有的说衙帐,有的说境界,故里数相差较多。

地。

唐朝所置金满、轮台、蒲类三县的位置不仅都在天山以北，并且都位于天山三条通道处。即轮台位在白水洞道口，金满位在他地道口，蒲类位在伊吾通蒲类道口。谨再进而分述各县建立情况。

A 金 满 县

金满县。据《旧唐书·地理志》卷40称：“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故（胡之误）及突厥常居之。”可见金满县辖地甚广，方圆五千里，就包括东部天山南北在内了。而金满一名远在汉代就已产生。《后汉书》中指出，永平十一年（68年）窦固等击败车师后王，固以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这是插在匈奴势力范围中的一把尖刀，因此匈奴贵族屡屡出兵，进攻金蒲城。耿恭为了坚守这个据点，于永平十七年（74年）另选离金蒲城不远的险要处疏勒城据守。因“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匈奴继续猛攻，甚至“拥绝涧水”，恭乃於城中穿井得泉，城不能下，次年，匈奴更煽诱车师共攻疏勒城，仍不能下，耿恭一直坚守到76年（建初元年），汉朝才命范羌率军前往疏勒解围，并救出耿恭及其战士。上述的金蒲城都是金满城之讹。

原来车师后王庭，据《汉书·西域传》称，“治务涂谷”，后突厥族崛起，又以此为据点，被称为浮图城，徐松《西域水道记》认为浮图系务涂的转音，未必尽然，很有可能因崇信佛教，在此建佛寺而被称为浮图城，并曾一度成为突厥族崛起后统治重心，故又称之为可汗浮图城。《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卷109：“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西州图经》残简所指“他地道”说：自西州交河“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这是一条车师前后部最便捷的通道。而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于唐永徽二年（651年）叛乱进攻庭州时，首先是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这样南面切断

的援军,东面切断伊吾的援军,然后围攻庭州。现在灌溉吉木萨尔的河流就是从金岭北流的欧姆西斯河,由此形成的峡谷就是务涂谷,峡谷两边水草丰美,极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在其出口处正是著名的可汗浮图城,在其北十五里处即为金满县及庭州治所,后来的都护府也设于此。清朝徐松曾在今吉木萨尔北五里护堡子的一个破城中发现了唐代金满县残碑及唐代的造像碑,可证这个破城就是唐朝的金满县所在地。而务涂谷及可汗浮图城均在其南。

突厥势力衰,回纥势力雄张庭州地区,回纥势强后,原在庭州地区游牧的葛逻禄、沙陀突厥等也都受回纥的统治。天宝末关陇一带为吐蕃截断后,吐蕃乘机诱惑北庭一带不满回纥贵族统治的沙陀、葛逻禄、突厥等部一举攻占了北庭,于是“葛禄(即葛逻禄)又取深图川(应为浮图川之讹),回鹘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①。

金满县有两个乡,即在今吉木萨尔地区。吉木二字即金满的音变,萨尔为维吾尔语“城”的意思。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改为后庭县。而在《新唐书·地理志》卷40说:“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后庭县称:“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改为金蒲县。”这里的金蒲县则为金满县之误。也有人说蒲昌县系蒲类县之误,^②恐也不确,因为《新唐书》文是针对庭州设治同时所设的县,不可能指向蒲类。同时在《新唐书·地理志》卷40中指出在庭州所设县为:金满、轮台、后庭、西海。其中无蒲类,只说“有蒲类、郝遮、碱泉三镇”。这里显然可知并不是四县,应该仍是三县,因为金满即后庭,不过名称先后有变而已,后庭县不可能在蒲类地,这是因为西州的高昌县曾于742年已先改为前庭县,《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称:“贞观十四年置高昌县,取旧

^① 《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寇田《唐代西域州县考》,见《新亚细亚》10卷3期。

高昌国为名也,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前庭县”。这是在天山南北的州治地区相对称而改的。所以《新唐书》把后庭县放在天山以北蒲类地区;《新疆简史》也袭取此说而称:“蒲类县,762年(唐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① 这里的蒲类应该是金满之误。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则把庭州西海县拟之为玛纳斯附近的清海军、清镇军及元时的仰吉八里,这些说法都是不妥的。由此而再看西海县的位置,就可肯定说是在蒲类地区,即今巴里坤盆地中。

由于北庭战略地位的重要,因此在西突厥咄陆可汗自恃兵强,于642年胁迫该地的处月、处密等部进围天山县时,唐即命大将“郭恪(系郭孝恪之误)又击走之。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②。降服处月部后,才能于其地设立金满州都督府,《新唐书·地理七下》卷43下称:“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654年)此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这里的金满州都督府隶轮台,可知都督府下所辖系位于天山中的游牧部落。

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1称:“按唐处月部为金满州,在北庭,今为迪化州(Qoroumts)以东博克达鄂拉(Bogdo oula)以北之地,处密部居处月西,在今玛纳斯郭勒(Manasgo)左右,当哈屯博克达鄂拉(katoun Bogdo oula)之北。”这个方位大致是符合于当时实情的。

B. 蒲类县

《旧唐书·地理志》卷40:蒲类,海名。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卷40:蒲类县“贞观十四年置,因蒲类海为名,先天二年(713年)为默啜所陷,开元十四年复置。”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1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②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通典》卷 174：“蒲类县，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

由此可知，蒲类县位在伊吾郡向北越天山，至蒲类海，即在其附近设立了蒲类县治，蒲类县是因近处有湖名蒲类而得名，此蒲类海在唐代又称为婆悉海。这是蒲类县正确的地理位置，即位在今巴里坤盆地。为何那里的湖泊称为蒲类海，这是因为两汉时车师族中的蒲类部落游牧于此，故湖泊也以蒲类名之。到唐朝又别称之为婆悉海，是因拔悉密部落游牧于此而得名，即今巴里坤湖。

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卷 65 中对婆悉海、蒲类县的位置却记载得很混乱。把蒲类海、蒲类县完全搬到天山以南的吐鲁番盆地去了。

实际汉代不少记载都肯定蒲类海在东部天山之北今巴里坤地区，因为西汉和匈奴贵族争夺西域的重点，首先是在伊吾、蒲类一线，这是进入西域的门户，汉朝得此，就可依此为据点，不断出击匈奴在西域的力量；匈奴得此，不仅可阻止汉军进入西域，并可由此使河西“城门昼闭”。汉军和匈奴贵族军为争夺蒲类而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如公元 90 年（永元二年）窦宪遣阎槃率二千骑击破游牧于蒲类海的匈奴。公元 91 年北单于在鹿蠡王於除鞬率二万余人降汉后，即徙居于蒲类海周围牧区。汉即派耿夔、任尚持节前往授玺及卫护。但由于东汉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即于公元 107 年暂时撤回西域都护及屯田军，北匈奴又乘机占领蒲类、伊吾，不断寇扰河西，十余年不得安宁，敦煌太守曹宗即于公元 119 年派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田伊吾，以拓抚诸国，匈奴即胁迫车师后部王攻杀索班，后在西域长史班勇的努力下，连连击破匈奴，并报了索班被杀之耻。

此后北匈奴呼衍王虽屡扰车师、伊吾，偶有所获，也已不能久占。永和二年（137 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兵 3 000 人大破北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全歼敌众，并于今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天山石人子

沟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碑文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①后汉永和六年（141年）窦固等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进至蒲类海；十七年，复出昆仑塞，击西域，破白山戎於蒲类海上。至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残部三千余人虽又一度侵入蒲类、伊吾，但被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吏士四千余人驱逐出去。从此以后，北匈奴再也无力侵扰蒲类、伊吾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唐于此设立了蒲类县，辖三个乡。该县位处战略冲衢，可以南越天山至伊吾，沿途设有守捉；由县治向东北经郝遮镇（四十里）、碱泉镇（二百里）、特罗堡子（二百余里），正当回鹘孔道。由县西行六百里即至北庭都护府，沿途均设有守捉。这里既是一条草原的丝绸大道，又是一条著名的军事通道。在蒲类县治之西四百多里处，还另设有蒲类镇。^②可能就在今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地区，木垒应即蒲类的音变。由蒲类镇再西行约一百六十里，可至北庭都护府。从蒲类南越天山可至罗护守捉，即从今木垒至七角井之路，就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的通行大道。

自汉至唐，蒲类，即今巴里坤地区在军事和草原的丝绸通道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冲衢，特别是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塔里木盆地全为吐蕃贵族切断，蒲类就显得更为重要，成为西域经漠北草原通向内地的最重要通道，可是唐史上只记称设立过蒲类县，未记有“蒲类州”，而1972年于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内发现了一颗“蒲类州之印”的铜印，通高四厘米（包括印纽在内），方形，5.7厘米×5.7厘米。说明唐代在庭州地区除了设有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外，还在少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第30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40。

数民族集中地区另设立了一套羁縻府州制度。《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提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又说：“其役属诸胡皆为州。”就是说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设都督府，人数少的小部落设州，在《唐书》上列出了各都督府的名称，却未列州名，因其较小而被史官删去了。由“蒲类州之印”的发现完全证实了唐史的正确，而从显庆四年（659年）起对西域各羁縻州府颁发印契的事，据《唐会要》卷十三称，唐政府都“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

这个蒲类州和蒲类县尽管都用蒲类之名，但只能表明蒲类州也设在蒲类县境内，所以也采用蒲类之名，但蒲类州并不属蒲类县管，他们虽同属金山都护府，但蒲类州所管人民是山区游牧民，它隶属于金满州都督府，蒲类县则主要管属平原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及部分牧民，隶属庭州，然后再同受都护府的号令行事。

C. 轮台县

轮台县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与庭州同置，属庭州。而《元和郡县图志》卷40所说“长安二年（702年）置”，讹也。其名称来源，则据《旧唐书·地理志》卷40：称“取汉轮台为名”，可知其名称由来系取自轮台之名，但与汉轮台并非同地，而是位在庭州之西，今乌鲁木齐市南的乌拉泊故城。这一点唐人也是说清了的，特别是《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四夷路程》写得非常确切：“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这路是庭州直接向西沿着天山北麓行走，按此里程为三百二十里，因此闻一多的《岑嘉州系年考证》也称岑参所居轮台“在庭州西三百二十里”，实际此里程并非确数，因为在沙钵城守捉冯洛守捉之间漏列了里数，可知自庭州至轮台里数应在三百五十至四百里左右较正确。因而《元和郡县图志》卷40所称轮台县东至州（指庭州）四十二里应为四百十

二里之误,其间漏写了“百”字,也是很显然的。

轮台当时位于天山北路比较适中的地区,又是天山山区南北几条通道中最宽广的一条道路,所以从西州北行及庭州西行至中亚的商旅往来,都得经过轮台重地。因而唐代为了弥补军政开支的不足,曾在开元年间下诏规定在天山以南的焉耆、龟兹、疏勒、于田和天山以北的轮台征收商税,可知轮台县所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重要。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于754~756年为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封常清幕僚时居住在轮台所写下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轮台诗歌中说:

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些写实的诗篇完全是描绘位在天山以北轮台的景色,而在塔里木盆地的汉轮台却决不会八月即飞雪,至少要到阴历十月才飞雪;也决不会“铁衣冷难著”,也很难理解到“轮台路上马蹄滑”的真切感受。

本来这些历史情况和自然景物都说明唐轮台是位在天山以北今乌鲁木齐附近地区。可是不少书籍却把汉唐二轮台混而为一,主要是把唐轮台搬到汉轮台地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注说:“‘轮台’唐时属庭州,隶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库车县之东。”^①这里竟把唐轮台放在今库车以东的轮台县,这就完全背离了史实。考今位于天山以南的轮台县,乃汉轮台的旧地。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卷65《轮台城》条称:“武帝轮台之悔,谓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是也,唐因置轮台县,属庭州。”这又是把唐轮台放到汉轮台地区,另又强加上一句“属庭州”。地点既弄错了,而庭州又如何能管到塔里木盆地的轮台去呢!历史上庭州的管辖范围从未到过汉轮台地区。同样清代的《西域图志》、《清一统志》等重要著作也都列唐轮台于汉轮台故地,类似这样弄错的书籍,实不胜列举,近代各种报刊论文弄错的更多,实际只要认真读唐史,是不应该发生这样一些错误的。

(4)安史叛乱后的西域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起发生安史叛乱后,唐政府迅速征调西域军队开赴中原平叛,西域、河西戍军大量减少,于是吐蕃贵族乘机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原来唐朝对河陇守备较充实,吐蕃贵族多年争夺而未得。安史乱起,就乘虚先占陇右自金城黄河以西先陷凉、甘、肃,然后并力攻沙州。沙州各族人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仍然孤军奋战,据《新唐书·吐蕃传》称:“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廓,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请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阎朝)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绌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尚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

^① 《唐诗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9页。

年。”经过十一年的战斗才被迫出降，沙州终于在“建中二年（781年）陷于吐蕃”^①。

安西、北庭都护府军民在安西及北庭负责军政官员的带领下也和吐蕃贵族进行了浴血奋战。《旧唐书·德宗记》卷12称：“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铤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以抗戎虏，殁身异域，多历岁年，以迄于兹。旅榘方旋，诚深追悼，宜加宠赠，以责幽泉。休明可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铤赠兵部侍郎。”这些守边将士，都能在国家危急之时，不顾死生安危，为国尽力，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灭的精神。其中未提及的伊州刺史袁光庭于《旧唐书·李元忠传》卷120称：“陇右诸郡皆陷，光庭坚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尽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牺牲得壮烈，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就是这点爱国精神，使吐蕃贵族始终无法消灭唐朝在西域的力量。相反唐朝在西域的力量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越战越强，收复了大片失地，并于781年遣使到唐廷，报告抗战实情，德宗大为嘉赏，并诏称：“四镇、二庭，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夙朝以来，相次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其将吏以下叙官，可超七资。”^②

但这时河陇之路仍未打通，吐蕃在河西陇右，西域仍还有较大势力，在吐蕃奴隶主统治下的河西、西域各族人民，仍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唐代沈既济说：“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四军，皆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条，而伦敦藏石室本S·788号《沙州地志》残卷寿昌县称：“建中初陷吐蕃”。

^② 《旧唐书》卷120《郭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恩如此。”^①《旧唐书·吐蕃传》说：“砍头、剜眼、剥皮……诸刑皆备。”甚至对奴隶劳动还有被“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百蹄配之”^②。公元847年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篡夺吐蕃大权后，更“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剝剔其羸老及妇人，以槩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③。

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自然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那时张姓是敦煌大姓。《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条称：“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可见张氏在吐蕃贵族统治时就握有一定实力，所以张姓大族才能阴结豪族，为推翻吐蕃统治作长期准备。从而《通鉴》卷249说：“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可见张议潮于848年（大中二年）在沙州的起义成功，是在广大人民支持下，方能很快占领瓜州。而那时河西走廊地区州县仍在吐蕃统治下。关中之路未通，因而张议潮就派遣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同样表文，分十路去长安，向唐王朝告捷，直到大中四年（850年）才把表文送到唐王朝中央。

在这两年中，张议潮以沙州起义军为基本队伍，团结各族人民，和吐蕃奴隶主进一步展开斗争。到851年（大中五年）又先后收复了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瓜州、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新疆吐鲁番）等十州，即又派他的哥哥张义谭为使者，带了十一州地图去唐中央觐见，唐宣宗即任命张议潮为十一州的“归义节度使”，名其军为“归义军”，管理这些收复地区的军政事务，到863年（唐懿宗咸通四年）三月，张议潮又“自将蕃汉兵七千

① 《沈下贤文集》卷9。

②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通鉴》卷249，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克复凉州”，由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①。到这时河西及天山东部各族人民才完全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的野蛮统治，并完全打通了从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

张议潮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收复伊州，是密切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原因。公元840年时漠北回鹘族被黠戛斯贵族打败后，有一部分回鹘族迁到了伊、西、庭一带，在短时期内联合各族人民进击吐蕃贵族，动摇了吐蕃的统治，所以说：“庞勒已自称可汗，有破西诸城”。即已占有玉门关以西一些地区。沙州首领张议潮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密结西域各族人民，才能于公元851年收复了伊州、西州等地，但这时只能说是占有东部天山南北地区，塔里木盆地仍还有部分吐蕃贵族盘踞着，直至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才奏称：“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这里的固俊即仆固俊，仆固即回鹘仆骨部落的同名异译，表明是仆固部落的首领在张议潮的统一指挥下击败了吐蕃贵族，所克北庭、轮台、清镇等城都在东部天山北麓自巴里坤至玛纳斯一条线上。从而可知在851年以前张议潮向唐奉献的十一州地图还只包括西域的伊州和西州，到公元866年起位在北疆的庭州地区也已归属归义军节度使管辖，另还增加了河西的凉州地区。

由于唐王朝末年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已难于直接派出军政人员经营河西及西域，因而自851年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后，在其所管辖区内，已由张议潮全部肩负重责。所以《新唐书·地理志》说：“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这里所谓“不暇疆理，名存有司”，就是说已没有力量去直接经营，全部军政由张议潮直接决定了。张议潮治理颇有功绩，当时，沙州人民

^① 《通鉴考异》卷22。

^② 《通鉴》卷250《唐纪166》，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

歌颂张议潮说：^①

三光乍来转精耀，六郡尽道是尧时。
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脂。
□中现有十碓水，潺潺流溢满□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是文书。

可见在张议潮统治河西及西域伊、西、庭三州的一段时间里比较安定，各族人民在和吐蕃贵族的斗争中有了进一步的团结。

沙州和伊、西、庭三州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所以伊、西、庭地区从东汉末年起直至魏晋时期在行政上也受敦煌指挥，在古代的军事战斗上都列在同一战斗区域之内，因而从851年以后的唐末时期伊、西、庭地区仍受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统摄，也是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到五代时期，伊、西、庭地区仍由归义军曹议金政权管属，这在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题铭就说：“故敕授河西陇右□沙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中书令（缺）讳议金。”^②查100窟开凿时间是在曹元德掌权时间，即公元936~940年间，而曹议金掌权时间是在914~936年间，其官职全名应为“河西陇右瓜沙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校中书令”。足证五代时伊西庭地区的政权仍隶属于中原各王朝。

^①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册《张议潮变文》附录一。

^②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甘肃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国防设施

(1) 吐鲁番盆地的自然环境及战略地位

吐鲁番盆地是东部天山中一块重要的山间盆地,它的北面是举世闻名的博格达山,最高峰海拔 5 445 米;西起喀拉乌成山的阿拉沟口;南面是库鲁克塔格、库姆塔格;东境止于七角井峡谷西口。如以周围山脊线为界,面积 50 140 平方公里。它的地形,北高南低,西宽东窄,形似纺锤,成不对称的盆地地形,盆地东西长约 245 公里,南北宽约 75 公里。惟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行政区划并不完全以盆地为限,因而它的行政区域面积为 6.7 万平方公里。

吐鲁番盆地所以举世闻名,首先它是全国地势最低地区。整个盆地低于海平面以下的面积有 0.4 万多平方公里,占盆地面积的 8%。在这 0.4 万多平方公里中有 1/2 是低于海平面 100 米以下的底地。盆地最低处位于盆地南缘的艾丁湖,湖水平面低于海平面 154 米,湖底更低于海平面以下 161 米,成为全国地势最低点,仅次于低于海平面以下 392 米的约旦死海,成为世界第二低地。

吐鲁番盆地又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年夏季 6~8 月间,吐鲁番、托克逊及鄯善县火焰山以南地区平均最高气温都在 38℃ 以上,位于盆地东部火焰山以北地势较高的鄯善县城、连木沁一带,夏日平均气温也在 35℃~37℃ 之间。而在戈壁沙漠处的绝对最高温可达 50℃ 左右,地表温度大都在 70℃ 以上;在吐鲁番城西的一

处沙地上,更曾测得 82.3℃ 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有“沙窝里烤熟鸡蛋”、“石头上烤熟面包”之说。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火山云歌送别》:“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在《经火山》一诗中则说:“……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形象地描述了热浪滚滚、炎风逼人的生动情景,所以我国历代史书上称此盆地为火洲。

吐鲁番盆地还是全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位于盆地内的托克逊县年平均降水量仅 3.9 毫米,吐鲁番县年平均降水量 16.6 毫米,鄯善县年平均降水量 25.5 毫米,可知盆地内部降水极为稀少。蒸发却十分强烈,根据多年的平均值,三县的年蒸发量:托克逊县为 3 821.5 毫米,是降水量的 980 倍;吐鲁番县为 3 003.1 毫米,是降水量的 181 倍;鄯善县为 2 879.3 毫米,是降水量的 113 倍。可是在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及西部的喀拉乌成山则有较多的降水和丰富的水利资源。盆地的灌溉水和饮用水主要取之于山区。从而形成了盆地中特殊的水利灌溉事业——著名于世的坎儿井。

炎热、干旱、少雨的特殊气候,簇拥着周围群山环抱的特殊地形,产生了吐鲁番盆地特有的种植业——棉花、蚕桑、葡萄、瓜果、谷麦,“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①成为绿洲农业和畜牧业交汇的地区。同时也产生了吐鲁番盆地品种丰富的矿藏——煤、铁、盐、石油,储量十分诱人。《魏书·高昌传》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现在鄯善油田开发后,显示出储量大、油质好,前景大有可为。其他还有石灰石、石膏、石英石、铜、锰、钠、硝、硼、土碱、陶瓷土等多种金属、非金属矿藏。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吐鲁番盆地位处东部天山以南,东为哈密盆地,西为焉耆盆地,北越博格达山为天山北麓西去碎叶及哈萨克大草原,南越库鲁

^① 《魏书》卷 101《高昌传》,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克塔格为白龙堆沙漠及罗布泊,地处丝绸之路必经通道。特别是楼兰古道自公元5世纪初阻断后,到唐代丝绸之路西去龟兹的中道已只有吐鲁番盆地可通行。随着丝绸之路南道经常为吐蕃贵族阻断,不仅中道须经吐鲁番盆地,同时通向天山北麓的草原道也主要是经由吐鲁番盆地西行白水涧道、轮台城去碎叶。所以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中道和北道均以吐鲁番盆地为枢纽,同时从中原通向西域的军事通道也以吐鲁番盆地为枢纽,西去龟兹、伊犁、轮台都必须经此地。尤其是车师前王庭——交河古城地区是通达南北疆的冲衢,因而多少唐诗都以交河作为征战和思念西域的情结!例如:^①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唐太宗《饮马长城窟行》

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

——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李颀《古从车行》

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

——孟郊《折杨柳》

交河冰薄日迟迟,汉将思家感别离。

——胡曾《交河塞下曲》

^① 以下所引诗均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为什么交河在唐代如此重要呢？就因为从赤亭进入吐鲁番盆地后，到达盆地西部交河城时，适控扼北去北庭、西北去轮台、西去伊犁和龟兹的咽喉要地，成为丝绸要道和军事重地。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歌——悲欢离合之歌、征战戍守之歌、盛衰兴亡之歌、守边英雄之歌。

(2) 唐朝在东部天山南北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高昌王鞠文泰勾结西突厥进行分裂活动，李世民即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大将军薛万钧、契苾何力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进讨，较快地平定了叛乱，鞠文泰惊吓而死，其子智盛出降，共得高昌国所辖“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①。同时与鞠文泰勾结一起共搞分裂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派驻在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境）支援高昌的军队也投降于唐。

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即改高昌都城西昌州为西州，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改为西州都督府，据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指出裴行俭在高宗显庆年间（655～661年）因反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昭代）而遭到贬斥，先作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改为金山副都护，所以碑文说：“西域从政七年间，穷荒举落，重译向化。”到乾封年间（666～668年）才又从西域调回长安任职。《旧唐书·裴行俭传》则明确指出裴行俭任西州都督府长史是开始于显庆三年（658年），任安西副大都护是在麟德二年（665年）。由是可知在显庆三年以

^①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高昌》，中华书局1975年版。

后和麟德二年以前的七年时间中,还有一段时间曾任金山副都护。这个金山都护府设在天山以北的庭州,副都护则在西州。到武后长安二年(702年)金山都护府才改设为北庭大都护府,这时高昌仍为西州。州治在今吐鲁番县城东五十里哈拉和卓和阿斯塔那二村庄之南的高昌古城,下属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

吐鲁番盆地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和丝绸之路及军事通道冲要,唐朝为了确保这个盆地的安全繁荣和畅通,对东部天山南北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

《新唐书·兵志》称:“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为官。”有人指出:“就西域而言,大军镇置兵五六千人,小军镇置兵二三千人,守捉城置兵三五百人,此外还有戍堡置兵一二百人,烽燧只三五人。”^①这仅是个大概数,《旧唐书》明确指出东部天山南北所设的军队为:

瀚海军 开元中,盖嘉运置,在北庭都护府城内,管镇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三百匹。

天山军 开元中置西州城内,管镇兵五千人,马五百匹,在都护府南五百里。

伊吾军 开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镇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北庭府东南三百里。

静塞军 置于轮台县。^②

可知在玛纳斯河以东天山南北置有四个军,人数最多的是北庭都护府城内的瀚海军,其次为西州城内的天山军,再次为巴里坤盆地的伊吾军。轮台县的静塞军虽未说明人数,也因其位于天山南

^① 钱伯泉《唐朝丝绸之路的货币经济》,《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

^② 《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

北通道的交叉点上,特设一静塞军。而《新唐书》所记大历六年(771年)置静塞军是错误的,很可能也是在开元年间设置,因为自755年安史之乱后,陇右已为吐蕃所占,自长安通达西域的道路早已被切断,不可能于771年在西域再设静塞军。在进入西域门户的天山南北道的重要据点上设置四个军,这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以及维护西域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守 捉

守捉是唐代在西域设立的重要军事据点。1989年版《辞海》称:“守捉,唐制,军队戍守之地,较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新唐书·地理志》卷40伊州伊吾郡载有:“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箕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西州交河郡载:“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礞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据此可知,在吐鲁番盆地境内的是赤亭守捉;而罗护守捉和张三城守捉虽位于吐鲁番盆地境外,但与吐鲁番盆地的东西境相距不远,所以一并列在吐鲁番盆地范围内叙述。

罗护守捉

罗护守捉的位置,上述《新唐书·地理志》已经指出:罗护守捉与赤亭守捉相距190里,并在赤亭守捉之东。《新唐书·地理志》还特别指出:“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至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从罗护守捉西南行则至赤亭守捉。可知罗护守捉适处在天山南麓的山口处。所称自罗护守捉西北行即上乏驴岭,就是说

由此进入天山就是一路上坡,形容骑驴上坡也很费劲,故称乏驴岭,越过天山达坂,即至天山北坡的木垒县大石头乡。走出大石头乡的狭窄山岭路后经过 180 里的荒漠戈壁路,其间仅几处有泉水,就到了独山守捉。此独山守捉即在今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附近。自今木垒县城至大石头乡政府所在地适为 90 公里,即 180 里,与古代所记里程大致相当。由此即可知罗护守捉的确切位置是在今哈密市西境的七角井地区。由此西南至鄯善县的七克台乡,即赤亭守捉所在地也就是 100 公里左右,与唐书所记里程大致相符。

赤亭守捉

赤亭,由于岑参诗歌的多次描述,早已名闻于世。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天上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
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
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
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

——岑参《天山雪歌送肖治归京》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岑参《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这些诗中充分反映出赤亭位于沙漠口岸，地位十分重要，常年多风，风大，气候炎热干燥，而且是著名的古战场。岑参多次经行赤亭口，不管他是任安西都护高仙芝的幕僚时期，还是后来任封常清的幕僚常住轮台时期，都是从今哈密市的南湖西经莫贺延碛、十三间房先到赤亭。因而他在《经火山》一诗中说：“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关，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这确实是岑参的写实。蒲昌即指现在的鄯善县，唐代称蒲昌，在从哈密南湖向西至赤亭间，地下埋藏着一条煤炭带，从唐初开始煤炭自然，直到清朝才熄灭，岑参经过此地时，煤炭正在自燃，故称之为火山。所以称为赤亭就因那里连绵起伏的丘陵土都是红色。故形象地以“赤”形容，赤亭守捉正是建立在这一片赤色的丘陵地带，故称之为赤亭守捉。唐初玄奘西行至高昌也是走的这条路。《宋史·高昌国》卷490称：王延德“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此处泽田即为赤亭的同名异译，惟唐书所说赤亭甚为允当。至于说现在赤亭所在地称为七克台乡，七克台系维吾尔语转译汉语赤亭所得。

唐代赤亭遗迹现在仍然耸立在鄯善县七克台乡政府东南约五公里，距兰一新（兰州至新疆）公路干线南约2.5公里处，遗址座落在沉积沙岩的丘陵东端，雄踞于丘陵制高点上，地理座标为东经89°39′，北纬42°59′，海拔高度490米，相对高度约30米。站在遗址

军镇。那里每个军镇管辖六七千人，赤亭、白水等镇仅驻兵三四十人，可以说是比守捉还小的地方上的小军镇。

赤亭镇

赤亭镇不仅有守捉，而且还设镇。现在鄯善县七克台乡南湖村南面一道东西向的小山，南北狭窄，古城遗址主体建筑座南向北，“平面呈长方形，东城东西长约28米，面积约252平方米。其地势中间高、两侧低，就势起墙建屋，中部屋基较东墙高差约1米，较西墙高差约0.5米。东墙为土坯垒砌，南北宽约9米，厚约1.3米，残高约3.4米……南墙东西长约28米，土坯垒砌，土坯尺寸规格与墙同……北墙亦为土坯垒砌，仅与东墙交角处残留一段。残高约2米，宽约3米，厚约1.3米……两墙为夯筑，残长约8米，残高约3.8米，厚约1.6米。”^①在西墙外的8米处，另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墙，从丘陵上顺北坡直下到坡底，全长约50米。由此向西约50米处土梁北侧的凹地上尚有一处两两相对的居址遗址，约有100多平方米；在土梁南侧为墓葬区，东西长约160米，南北宽约80米。

从赤亭镇所留遗址看，自山丘至坡底，及北面宽阔的平原就是赤亭镇士卒屯戍区域。据《新疆出土文物》所载《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称：“赤亭镇兵肆拾贰人”。在《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为具投当州诸镇戍营田顷亩数事》的出土文书中也说：“赤亭镇兵肆拾贰人，营□□顷；维磨戍□□□□。”^②可见赤亭镇镇兵平日除戍守任务外，每年还必须在附近屯种一定的土地，以求粮食能自给。

既然赤亭镇是国防军事机构，那么负责赤亭镇的主管人当然也是军人，而非行政人员，所以赤亭镇的最高负责人是军官。这在《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杨景璇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

^①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租请给公验事》^① 出土文书中说得很明确。

(前 缺)

- 1 [] 镇押官行赤亭镇将杨嘉麟取田地七十六亩(别粟六升(斗),计卅五石六升,第一百五十二围)
 - 2 [] 璿父上件取田,先祖与蒲昌县百姓范小奴,其开廿二年
 - 3 [] 付表兄尹德超,景璿今却付安西,恐有[][]
 - 4 [] 县分付并各给公验,庶后免有交错,谨牒
 - 5 [] 开元廿二年七月 [] 日赤亭镇将男杨景璿
- 牒
- 6 [] 付司宾示
 - 7 [] 廿七日

唐朝在西域所设关、镇、守捉都有勘验过所(通行证)之责,这在《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② 出土文书中指出:“依检:王奉仙并驴一头,去年八月二十九日,安西大都护府给放还京已来过所有实。其年十一月十日到西州,都督押过,向东,十四日,赤亭镇勘过,检上件人无却回赴北庭来行文者。又问王仙得款:去年十一月十日,经都督批得过所,十四日至赤亭镇勘过,为卒患不能前进……到赤亭染患,在赤亭车坊内将息……”由此可知王奉仙持有安西大都护府发给的过所,沿途所经守捉、镇、关等都得检验,方可通行。因病,只能在赤亭车坊内暂住。

白水镇

《西州图经》伯2009号:“白水涧道,右道出闪河县界,至西北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6页。

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所称白水涧道是因发源于天山的白杨河，流经白杨沟峡谷，进入吐鲁番盆地。这条白杨沟峡谷，全长26公里，山势迂回曲折，两岸峰峦叠嶂。峡谷宽狭不一，宽处达一二百米，狭窄处才数十米。由于白杨河发源于北面的博格达山雪峰，流程不长，即进入白杨沟峡谷，并未挟带泥沙。流经白杨沟时，水色清澈，水质甘甜，一溪清流，终年不断。流水宽阔处不过十多米，狭处仅二三米。一般情况下，河水不深，人畜车均可涉水而过。而顺山势流淌的河水，在河底错杂的卵石上激起的阵阵浪花，犹如白雪堆拥，把这样一条山涧溪水称之为“白水涧”颇为允当。由于地势不高，人马车常年可通行，所以成为古今来天山山区最为便利的通道。通过白水涧道经柴窝堡盆地直趋天山以北，可西去中亚碎叶，东向北庭都护府，所以唐轮台城就座落在今乌拉泊故城。从这里既是丝绸之路通道，同时也是军事通道。所以唐朝特在白水涧沟口设立白水镇戍守。

史书说，白水涧道出吐鲁番盆地交河县，在唐代是突厥南下通道，设有白水镇戍守。在敦煌莫高窟竖立的《大周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中刻有“白水镇”名，此碑建于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五月。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党河”条所录的碑文称：“……第怀恩，昭武校尉，行西周白水镇将，上柱国”等字。可知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设置西州后，即在其间设置白水镇，派兵戍守。现在于白杨沟峡谷沟口坦平草场上的铁黑色山岩上耸立着一座古堡，形势十分险要。“城虽不大，却有内外两重，城墙是取当地碎砾石夹灰壤土夯筑而成。夯层厚10~15厘米，夯打密实。墙基厚2~3米，高5米，与所在岩石一道，相对高于地面5米左右。城墙依山势而铺展。内城墙南北长50米，东西长30米，西南见一豁口，可能与当年城门有关。在内城圈外，东北南三面，又延展出夯土墙近一圈，最后形成

东西 70 米,南北 80 米的外城墙垣。”^①

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难敌的险要沟口究竟驻有多少戍兵?据《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称:“白水镇兵叁拾……田陆顷”。在《武周天山府索进达辞为白水镇上番事》^②出土文书中有:

(前 缺)

- 3 [] [] [] 年叁月 [] 日天山府 索进达辞
- 4 [] 进达元不是白水镇番,昨为 []
- 5 [] 如后到,所
- 6 [] 上谨辞。

(后 缺)

上述那些驻守白水镇的戍兵,平日除守卫任务外,还必须在镇附近择地屯种,以确保军粮能自给,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确切的记载。

(一)^③

(前 缺)

- 1 [] 为长行马 []
- 2 [] [] 牒为给白水屯种子支供记 []

(二)

《唐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白涧屯纳官仓粮账》^④

- 1 白涧屯神龙二年九月十五日纳青稞杂大麦,交用两
- 2 一硕函量,壹函为壹点,拾点成一大上字。尚达……………

① 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4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43 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345 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392~393 页。

……

- 16 已上叁拾叁上字,计青稞杂大麦陆佰陆拾硕。仓
17 督曹建,监仓官王□,屯官侯猷。监纳官镇副刘初
(后 缺)

以上两种文书,第一种是说有关方面已用长行马给白水镇送去了屯田所需种子。第二种文书是说屯田戍卒向管粮仓的主管交纳了屯田所收的粮食。证明白水镇戍卒亦兵亦农的真切情况,补充了历史记载的不足。

银山镇

《西州图经》伯 2009 号:“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磧鹵”。《新唐书·西域传》“帝即命郭孝恪为西州道总管,率兵出银山道”,伐焉耆。《新唐书·地理四》更具体指出:由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碛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磧”。这些史料都未提到银山镇,只有斯碎片 032 号《神龙元年马死命马子理赔牒》称:“……被差遂送使至阿思敬往焉耆,回至银山西三十里,因被溺致死,谨连银山镇公验如前……”可知银山确实设有镇。因为银山道是唐代从西州通向焉耆、龟兹必经之路。尽管沿途多沙磧、丘陵,艰难难行,而商运和军运却都很繁忙,岑参诗也多次提到它,“银山磧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银山磧西馆》)“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天山雪歌送肖治归京》)可见银山地位的重要,惟其驻兵数,史书和出土文书均未见。

柳谷镇

《西州图经》伯 2009 号:“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斯碎片 032 号:柳谷镇

状上：“西州长行马回一疋……先从西州领得前件马，送使往北庭，今□二十八日却回柳谷镇，停经三日，……其马行至镇西区，忽即急黄致死。”《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还指出：驻守“柳谷镇兵肆拾”。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为柳谷镇守捉兵元怀□停给粮□□”。^① 由于柳谷镇是交河县前往庭州的必经通道，但山路曲折狭窄，只能通人、马、驴，不能通车。宋朝王延德就是经此道的交河到北庭。在唐朝《武周某馆驿给乘长行马驴及粟草账》^② 的出土文书中有如下记述：

(前 缺)

- 1 右肆月□□□□
- 2 判官等乘往柳谷回
- 3 粟一斗八升同达 草壹拾贰束同达
- 4 右同日给高昌县长行驴壹拾贰头，秦惠等乘往柳谷回，壹日料
- 5 粟贰斗叁升同达 草拾束同达……………
- ……
- 12 右同□给高昌县长行马壹疋、驴两头，使人刘嘉福乘往柳谷
- 13 回□日料
- 14 粟□□□升五合同达，草伍束同达
- 15 □五月二日给柳谷长行马两疋，驴壹头，使人宋怀乘往州台壹日料
- 16 □□□□达□□□□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告诉人们，驻守柳谷镇的兵士平日除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65~466页。

守卫任务外,同时还必须屯田营种,以求军粮自给,这在《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中载有:^①

柳谷镇兵肆拾人,□□□肆顷; 酸枣戍□□□
据此,可以为证。

鹞 鸽 镇

鹞鸽镇在唐史上无记载。从吐鲁番盆地西经阿拉沟经过大小尤鲁都斯草原进入伊犁巩乃斯河谷,自古代起就是畅通的一条草原道。从吐鲁番盆地西行,进入阿拉沟后,但见阿拉沟河穿山越谷,奔腾东流,两岸山岩峭立。这条山谷全长100公里,平均宽约500米,狭窄处仅10米左右。一些开阔地段,绿草如茵,畜群满坡,雪鸡、雪莲等珍稀动植物随处可见。翻过奎先达坂,斜向东南,入乌拉斯台狭谷,可到焉耆盆地,折向西北,可直达伊犁。可知阿拉沟山谷是沟通吐鲁番盆地与焉耆盆地及伊犁地区的咽喉通道。所以迄今在阿拉沟谷依然耸立着一座由卵石夹土砌就的唐代古堡。“堡垒略呈方形,西北角高耸的瞭墩,至今仍高15米以下。古堡傍河而立,耸峙于峭壁之上,控扼由吐鲁番盆地西入阿拉沟的咽喉。古堡内的废墟中曾经出土过唐代文书残纸,其中包括了唐代借贷契约及鹞鸽镇和一些捉、铺、烽及戍边卫士的姓名”。“过古堡,循阿拉沟西行,12公里左右,为又一座古堡废墟。31公里后,再见古堡一座,座座相连,彼此呼应。”^②这些都说明在唐代历史的长河中,为了保卫阿拉沟这一东西草原道的交通安全,曾经有过相当严密的军事设施。鹞鸽镇也正是在这种需求下设置的。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② 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5) 戍 堡

唐代于吐鲁番盆地除设置军、守捉、镇外,还有戍堡。在史书上很难见到关于戍堡的记载,可是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却可见到不少戍堡的名称及其营田情况。

1.《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为具报当州诸镇戍营田顷亩数事》^①

- 1 西州都督府 牒上 勅 []
- 2 合当州诸镇戍营田,总壹拾 [] 顷陆拾 []
- 3 赤亭镇肆拾贰人,营 [] 顷; 维磨戍 []
- 4 柳谷镇兵肆拾人, [] 肆顷; 酸枣戍 []
- 5 白水镇兵叁拾 [] 营田陆顷; 蜀畔戍兵 []
- 6 银山戍兵 [] 营田柒拾伍 []
- 7 右被 [] 营田使牒,当州镇戍 [] 田顷亩 []
- 8 戍兵 [] 及营田顷亩 []
- 9 方亭戍 [] 谷戍 狼井 []
- 10 右 []
- 11 牒被牒称: []
- 12 格令 斡 []
- 13 者 []
- 14 存 []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220页。

(后 缺)

2.《唐西州都督府所属镇戍营田顷亩文书》^①

(前 缺)

- 1 [] 柳谷镇肆 []
- 2 [] [] 亩 银山戍捌拾 []
- 3 [] 具顷亩如 []
- 4 [] [] 戍 磻石戍 苦水 []
- 5 [] 可管

(后 缺)

从上述文书可知,唐代在吐鲁番盆地的戍堡至少有维磨、酸枣、曷畔、银山、方亭、狼井、[]谷、磻石、苦水等。其中方亭戍虽在赤亭道上,但被列入赤亭道的为维磨戍,可见维磨戍就在赤亭近旁。而在斯碎片 031 号《神龙元年四月贾才敏运马牒》指出方亭戍的位置说:“至伊州回至赤亭东三十里,其马先荡足,因驱行不前,遂即致死……磻内无主可卖,遂即弃掷不收者。……府司才敏被差逐长行马六匹,遂使往伊州,回至方亭戍三十里,前伴马忽患急黄致死,为在枯磻,肉无人卖,皮见领来。”可见方亭戍位于赤亭镇东三十里,离赤亭镇已较远。其余酸枣戍应在柳谷镇附近;曷畔戍应在白水镇附近;银山戍应在银山镇附近;磻石戍、苦水戍在银山戍以东;狼井、[]谷戍可能在赤亭与苦水戍之间。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1 页。

(6) 烽 铺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于《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中：“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说明唐代在吐鲁番盆地的烽燧一个连着一个。《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唐兵部烽式》：“烽燧军中的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建立烽燧的地点，则为“唐法，凡边城墩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岗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里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烽燧的职能是“昼放烟，至夜即放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可知唐代烽燧，特别是西域的烽燧，一般都设于戈壁沙漠山岭要隘处，远离边防军营，成为名副其实的边防哨所。可从辽远的西域直接通首都长安，成为维护国家统一，进行战略的神经末梢，是西域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汉朝史籍和汉简中都只有烽燧的记载，到唐代却出现了烽铺的称谓。在阿斯塔那 226 号墓所出：

1. 《唐开元十年(公元 722 年)伊吾军上支度营田使留后司牒为烽铺营田不济事》^①

(前 缺)

1. [] 状称 [] 作 []
2. [] 属警固，复奉使牒，烽铺子不议
3. [] 功，各渐斲种前件亩数如前者。然烽铺
4. [] 少差失，罪即及身，上下怕惧，专忧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4 页。

- 5 []数少,又近烽地水不多,不
6 []隐没堠亩,求受重
(中 缺)
- 7 []无田水,纵有者,去烽州廿
8 []上,每烽烽子只有三人,两人又属警固,近烽不敢
9 不营,里数既远,营种不济,状上者。曹判:近烽者,即
10 勒营种,去地远者,不可施功。当牒上支度使论。至
11 开十闰五月廿四日,被支度营田使留后司五月十八[]
12 牒称:伊吾军牒报[]烽多无田水。纵[]
13 有者[]薄恐不任[]称人力不[]
14 []言不可固,即非[]
(后 缺)

2.《唐伊吾军牒为申报诸烽铺廨田所得斛斗数事》^①

- 1 桂埏烽粟[]
2 乙耳烽床肆亩,采得子叁硕叁斗叁[]
[]肆硕陆升
(三)

(前 缺)

- 1 乌谷铺豌豆[]
2 骨咄祿铺豌豆伍[]

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烽与铺是两个不同名称,但在唐代又常连用,说明两者互相依存,即烽子专司放烽之责,铺则平时畜牧廨田,有警则传递烽牒,所以铺一般有二三人,置马二匹,近沙碛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210页。

的铺则配驼三头,除烽驿相连的地方外,一般烽燧皆置铺。可见烽燧放烽,铺事传牒,各主其事,所以烽与铺是并存的基层军事组织。

由于吐鲁番盆地在唐代西域战略地位的重要,对于烽铺建置非常周密。不仅从赤亭向西沿着天山南麓直至柳谷、白水、鸛鸽、银山镇有一条烽铺线,同时从赤亭向西南沿着库鲁克山北麓西去银山碛也有一条烽铺线,严密地守卫着这条东西通道。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发现的唐代烽墩名称有:赤亭烽、罗护烽、达匪烽、突播烽、小岭烽、跨谷烽、维磨戍烽、柳中上烽、狼泉烽、寒亭烽、胡麻泉烽、上萨捍烽、悬泉烽、神山烽、赤山烽、河头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等。

按照《武经总要·唐兵部烽式》规定:“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日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五人兼守烽墩,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又说:“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看业前后所说似有矛盾,实际前面所说烽子六人是包括副帅在内,而从事更刻望视的前后都说是烽子五人,这与《通典》卷152所载相符。就边防烽燧说以置帅一人,副一人较为妥,这是边防和战斗的需要。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西域地域辽阔,各地人烟稀少,各烽置帅一人和烽子五人也很难达到法定人数。所以在后期实行中,常是一烽六人,即主帅一人,烽子五人。据日本宁乐所藏《蒲昌府文书配诸所(烽)名籍》载:^①

(前 略)

狼泉烽主帅严定远 孙生 赵英本 曹龙表 长探

^①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研究》,载日本《东方学报》第33册。又《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第306页,将此件定名为《西州蒲昌府(开元二年)卫士名簿》。

竹思敬 赵武刚
(后 略)

可见这里只有烽帅,没有烽副。另设长探二人。而在《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伊吾军上支度营田使值后司牒为烽铺营田不济事》说:“每烽烽子,只有三人,两人。”^①可知西域烽子很难征集,常不足法定人数。因此在宁九(乙)号文书果毅贺方判辞:“队副高行琳符下授官讫,其上萨捍烽所,即顿阙人侯望,即帖维磨戍。”另在宁二〇(丙)·七(乙)号文书还载:都督府牒赤亭镇副杨逸,贼在达匪,悬泉烽处,令当贼路探巡,都知界内兵马烽火通明“叁拾里内烽,依前县府官巡逻”。^②

烽帅、烽卒的责任十分重大,不仅负有放火报警之责,同时负有防御抗敌之责。所以烽子平时要耕田贮粮,准备积薪,敌来要报警御敌。因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唐西州都督府下诸府主帅牒》:令其所属府、县、镇、戍、烽墩,“寇贼在近,百计须防,诸府主帅岂得安然。当界贼路要切捉搦者,番之次配,令当界游奕踏伏”。所以各烽铺均配置有御敌武器。《武经总要·唐兵部烽式》称“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大筒四口……近边者亦量给弓弩”。《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对烽燧配置的武器更详细指出:凡烽“安置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绳、火钻、火箭”等等。在战争时期,边境烽燧更须配备一、二名长探,用以侦察敌情,以利于进行有效防御。

唐朝还严格规定了对烽帅、烽子放烽御敌的惩戒办法。根据《唐律疏议》卷8《禁卫律》规定:“不应举烽燧而举,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绕三里内辄放烟火者,各徒一年。”“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侯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诸烽墩

^① 《新疆出土文物》第60页图92《唐伊吾军屯田文书》。

^② 《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第323页。

不警,令寇贼犯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以故陷败户口,军入城戍者,绞”。可知烽帅、烽卒责任又重,生活又苦,需要自己种田贮草,遇有战争,又很危险,常有死伤。如宁一·二七(缀合)号文书《唐开元二年(714年)西州蒲昌府牒》^①：

(前 略)

悬泉烽主帅史才智(便抽长探),长探粟候郭才感(已上两人因贼两脚五指落)上萨捍旅帅王惠感(身死)。长探粟候苏才感。三卫苏才应(已上两人来月次当长探,合去不?请裁下),

维磨长探行客苏仁义、携谷烽质才仁(没落)。长探粟候石善君、柳中县白丁曹感达(已上两人来月次当长探,合去不?请裁下)

州上兵梁成德、王盲秃(已上身死)。果毅阴寿仗身郭智子、曹靖仗身曹感达。

检案内上件人等,并合来月当上。其人等身死、依困、没落、改补等色,其替事须申州处分,谨以牒举,牒。

开元二年五月 日府索才牒。

玉(押缝) 付 司 玉示

十九日

五月十九日禄事鞠 受

司马澜

检 案 玉示

如前谨牒 十九日

^①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研究》,载日本《东方学报》第33册。

此处系指当时蒲昌府折冲都尉王温玉等签署呈西州都督府请示的牒文。从这一牒文中可以看出在悬泉烽、上萨捍烽、维磨烽、挾谷烽执行侦察任务的长探及州上士兵都有伤亡。如悬泉烽的长探史智、郭才感因遇敌受伤。上萨捍烽王熹感身死，维磨烽苏仁义，挾谷烽质才仁被敌俘去，还有士兵二人死亡。可以想见包括长探在内的各种烽卒，一遇战争，随时有血洒疆场的可能。所以一些有钱人家轮到上烽时，常雇穷人代替，或者常有烽卒逃亡之事发生。例如阿斯塔那 140 号墓出土文书《唐张隆伯雇董悦海上烽契》。^①

(前 缺)

- 1 []一日武城[][][]隆伯[]
- 2 宁戎乡人董悦海用河头上烽
- 3 一次一十五日，与雇价钱五文，其钱
- 4 []日交相府了。[]道[]
- 5 []当，张悉[]
- 6 []信。
- 7 []人张
- 8 []雇人 董悦海
- 9 知见人 张相愿
- 10 知见人 高昭

阿斯塔那 10 号墓出土文书《唐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匡某雇人上烽契》^②

- 1 永徽六年十一月[]日，武城乡匡[][]
- 2 交用银钱肆文，[]乡人易隆仁往[]
- 3 城上烽一次，拾[]烽上有道留[]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5 册，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5 册，第 84 页。

- 4 壹仰易自[]匡悉不知,两和立
- 5 契,获指为[]
- 6 主[]
- 7 受雇易隆仁///
- 8 知见人傅隆护///
- 9 严武达
- 10 []旨/道//

阿斯塔那 93 号墓出土文书 1.《唐西州高昌县严某雇人上烽契》^①

- 1 []六月一日,高昌县人严[]
- 2 文雇取交河县人赵松[]
- 3 当交河上烽壹次拾伍日,其钱[]
- 4 付了。若烽有通[]
- 5 当严悉不知,若[]
- 6 人随身[]
- 7 画指

(后 缺)

2.《唐西州高昌县阳某雇人上烽契》^②

- 1 []年六月一日,高昌县[]
- 2 钱十文雇交河县人[]
- 3 用神山烽上壹次拾伍日。[]
- 4 即日交相付了。若烽上有通[]
- 5 []当,阳悉不知。[]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0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271 页。

6 []画指[]
(后 缺)

这样的雇人上烽文书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相当多,这里选取的四份是属于河头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神山烽四个烽雇人上烽情况。由此可知雇人上烽,不是个别的烽,而是相当普遍的情况。雇期一次均为十五日,雇金为银钱四文、五文、十文不等,由雇主和被雇人协商而定。在所有雇人上烽契上都写明雇主交了钱,写好被雇人的上烽契后,受雇人是否按时上烽,以及在上烽期间逃亡;或守卫不严,致有遁逃未觉或刁难行旅,或诈取钱财等事,触犯法律,官府科罪时,按雇契规定均应追捕受雇人,与雇主无涉。

由于烽卒责任大,危险性又大,加以西域人口稀少,不仅雇人上烽者多,即使按番上烽者也颇多弱者和残疾者充当,不免危及边防的巩固。据吐鲁番所出《安西判集残卷》载:“……比闻烽夫差遣,是残疾中男,远望必阙机宜,闻者即可心寒,所部何能不惧。略检本州兵士,尚有二石(百)余人,分捉城惶(隍),虽言要重,较量烽候,于事即轻,掣抽壹伯(百)余兵,兼助诸烽守备。实翼县官巡察,明示是非,令长务闲,亲加检校,必使在烽调度,无阙所须,覩候用心,随机驰报……”^①这种判集残卷虽缺纪年,却留有奉判裴都护语。这裴都护就是指他于麟德二年(665年)至乾封元年(667年)擢升安西大都护期间所判。说明那时西域人丁缺乏,烽候的烽子很难依制配足,各州县只好征集残疾中男充当烽卒,引起了主政者的关注和忧虑。

唐代吐鲁番盆地北部天山山区为西突厥各部游牧区域,在唐初西突厥贵族中个别有野心的人并不那么遵照唐令行事,因而于山区要隘均设有烽燧,严查过往行人商贩及预防各种有异谋的人。

^① 东洋文库《敦煌吐鲁番文献关于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工法律文书1978年版。

阿斯塔那 341 号墓出土文书《唐小德辩辞为被蕃捉去逃回事》^①即可知实情。

(前 缺)

- 1 审：但小德今月二日牵车城东埽地，
- 2 其日斋时，贼从东北面齐出，遂捉小德
- 3 并牛，至夜在苇东食，人定后，即发向
- 4 草泽宿，至三日明，即发入突播山
- 5 自解手走上山，经三日上山，
- 6 投得维磨戍烽，其贼见
- 8 在小岭，小德稍解蕃语。听贼语，明
- 9 拟发向驰岭逐草。其抄小德等来
- 11 可有二百骑，行至小岭谷内，即逢

(后 缺)

《西州图经残卷》载：州境十一道，其中赤亭、新开、花谷、移摩、萨捍、突播六道，均从西北出蒲昌县界合柳谷去庭州。可知花谷、移摩、萨捍、突播都是蒲昌北去要隘。所以在这些通道上设有萨捍烽、小岭烽、突播烽，有敌人来则报警和御敌，平日还须稽查行李出入。《唐律疏议》卷 8《禁卫私度关》条：“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疏议曰：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就是说唐代各级官员出门走远路必须持有公文，一般平民出外营商或探亲访友须携过所，否则就要被拘留，按情节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8~129 页。

轻重处理,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屡有所见,上述王奉仙到酸枣戍被捉事就是例证。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唐代在吐鲁番盆地设立的烽铺由东向西。沿着天山南麓及库鲁克山北麓西行的两条烽燧线,其遗址和当年雄姿今天依然可见大概。

残留的烽燧遗址以鄯善、吐鲁番县所辖火焰山与天山之间的东西南北通道为最多,可以看到这些残留的烽燧都位于地势险要、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之处,同时又视野开阔,扼守着交通要道。根据文物调查,略作扼要叙述。^①

1. **鄯善县赛克散尧里迪给巴希土尔** 维吾尔语意为 80 里路上的第一个烽火台。位于唐代赤亭古城以北约 80 里左右天山南麓一小山包上,地理座标为东经 $90^{\circ}36' \sim 37'$,北纬 $43^{\circ}15' \sim 16'$,海拔 1 207 米。在七克台乡赛克散土墩自然村东南约 350 米。烽火台顶部已坍塌,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砌墙建成,墙厚 90 厘米,东北角墙残存高度 4.7 米,西壁残存高度 3.7 米,东壁长 3.7 米,南壁长 7.7 米,每面约有外护壁厚 85 厘米。烽火台北壁有一券顶的门洞。

2. **三十里大墩烽火台** 维吾尔语“土和土尔”。意谓乌鸦烽火台。地理座标为东经 $90^{\circ}20'37''$,北纬 $42^{\circ}55'35''$,海拔约 500 米。位于今鄯善县园艺场东北约 5 公里,原兰州至新疆公路北侧的一个土岗之上。距今鄯善县城东北约 15 公里,故俗称三十里大墩。烽火台原为土台垒砌,外抹草泥,原烽较小,后又在外扩加一层。现存原烽火台东西残宽约 5.2 米,南北残宽约 4.8 米,残高约 4.57 米;附加部分东西宽 5.2 米,南北宽 1.7 米,残高 5.05 米。

3. **汉墩阿克墩烽火台** 位于鄯善县连木沁乡汉墩村阿克墩庄东约 2.2 公里一月牙形的小山梁上,地理座标为东经 $90^{\circ}2'53''$,北纬 $42^{\circ}56'13''$ 。烽火台南有火焰山,近处东北南面地势较为开阔

^① 《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3 年第 3 期。

平坦。烽火台整体为土坯结构,底部东西长 5.9 米,南北宽 4.6 米,残高 6.2 米,中上部呈空心状。审其建筑形式为唐朝烽火台遗址。

4. **东湖烽火台** 俗称清墩温吐尔。位于鄯善县东巴扎乡东湖村洪屯尔色孜耶的沙山脚下,距县城东郊 10 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 $90^{\circ}22'12''$,北纬 $42^{\circ}51'43''$,海拔 900 米。烽火台遗址南枕层峦叠嶂的库木塔格(沙山),寸土不毛,流沙风动,几欲将烽燧吞没。北临开阔的原野,村落棋布;东北可直通唐赤亭古城,计程 30 公里;向西直达鄯善城 10 公里。烽火台几已完全塌圮,尚可见到轮廓,东西长约 16 米,南北宽约 9.8 米,残高约 5.2 米,面积约为 156.8 平方米。

5. **阿萨协亥尔烽燧遗址** 位于鄯善县艾丁湖东部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约 10 公里处一片盐碱和沙地分布地区,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7'18''$,北纬 $42^{\circ}35'39''$,海拔 -138 米,面积约 5 400 平方米。这是一处有城堡和烽火台连在一起的遗址,整个遗址为土坯建筑,有城墙,略呈长方形。周长约 304 米,西墙约 57 米,南墙约 95 米,北墙顶宽 5 米,残高近 3 米,墙已倒塌,紧挨着南墙中段的烽火台,已严重倒塌,底不可测,顶部南北长约 15 米,东西约 11 米,残高 5.58 米,方向北偏西约 30° 。审其建筑造形和遗物,为唐高昌回鹘时期。该遗址面积较大,周以城墙,内有烽火台和居住建筑,外有角楼,既可瞭望报警,又可驻兵把守,在该烽燧东约 23 公里处有迪尔乐烽火台。

6. **煤窑沟烽燧** 位于吐鲁番县胜金乡煤窑沟谷断崖东面,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23' \sim 24'$,北纬 $43^{\circ}7'$,海拔 681 米。烽燧东南是一条煤窑沟河支流,它由北向南进木头沟。沿河道分布许多古代遗址,如七泉湖萨依烽燧,木尔吐克萨依戍堡等,还有闻名中外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沿河出胜金口东南即为高昌故城。煤窑沟烽燧北距天山峡谷出口约 5 公里,烽燧遗址南北长 7.5 米,东西长 7.7 米,面积 57.75 平方米。整个建筑为土坯结构,高 6

米,建筑形式由基底向顶部逐渐收缩,呈梯形状。仍可清晰看到一条由西往南绕至烽顶的台阶。

7. **七泉湖萨依烽燧** 位于煤窑沟烽燧东南,沿干涸河道行3公里即到此烽燧遗址,海拔620米,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25' \sim 26'$,北纬 $43^{\circ}6' \sim 7'$ 。烽燧保存尚好,整个建筑为土坯结构,方形,南北面和东西面均各长8.3米,高7.8米,由基底向上逐渐收敛呈梯形。烽顶为长方形平台,东西长5.3米,南北长4.6米,底层墙基厚1.6米。

8. **木尔吐克萨依戍堡及烽燧** 顺着煤窑沟河干涸河道南行约9公里左右就到木尔吐克萨依戍堡和烽燧遗址,适位于木头沟西北入口处,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27' \sim 28'$,北纬 $43^{\circ}1' \sim 2'$,海拔345米。戍堡围墙3.4米,墙厚0.65米,呈方形,18.5米 \times 18.5米。戍堡内沿北、东、南三面墙有房屋基础,戍堡西南角侧为烽燧,基底略为方形,5米 \times 3.4米,由基底向上逐渐收分呈梯形,残高10米。戍堡围墙及烽燧均系土坯建筑。

9. **胜金口烽燧** 在木头沟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烽燧遗址,相距2公里,控扼由东北方向进入火焰山的交通路线。木头沟西侧烽燧座落在火焰山北麓的平坦黄土地,海拔260米,四周为村庄和耕地。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0' \sim 31'$,北纬 $43^{\circ}0' \sim 1'$,烽燧基底长18米、宽13米,呈长方形。由基底向顶部呈梯形。

10. **乌江布拉克烽燧** 座落于火焰山北麓坡地上,海拔236米,木头沟河从东侧由北向南流。东南为乌江布拉克村。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1' \sim 32'$,北纬 $42^{\circ}58' \sim 59'$ 。烽燧全部由黄土整筑,基底呈方形,由基底向上呈梯形,残高7.3米。

11. **胜金烽燧甲** 吐鲁番县胜金乡农场东南海拔238米,东经 $89^{\circ}36' \sim 37'$,北纬 $42^{\circ}59' \sim 60'$ 处有一烽燧遗址,距胜金台站14.5公里,南距七康湖烽燧4公里。烽燧基底平面呈方形,南北边长15米,东西边长14米。由基底至腰部弧线状,再至顶部略呈梯

形。烽燧高 13 米。

12. **木头沟东土墩烽燧** 位于木头沟河东 500 米处一条北南向河谷中,海拔 270 米处残高 65 米的土墩上,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1' \sim 32'$,北纬 $43^{\circ}1' \sim 2'$,向西南可眺望木头沟内伯西哈千佛洞。

13. **胜金烽燧乙** 位于胜金口千佛洞西北 400 米,海拔 60 米,三条沟谷交汇处的一块高地上,木头沟河从东侧流过,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4'$,北纬 $42^{\circ}55' \sim 56'$,烽燧基底平面方形,残高 6 米。

14. **胜金烽燧丙** 东距胜金烽燧乙 250 米,东南距胜金口千佛洞,位于一小山顶上,视野甚为开阔。烽燧仅剩基础部分,基底方形 5 米 \times 5 米,土坯垒砌,残高 1.7 米。

15. **七康湖烽燧** 位于七康湖水库南 200 米,火焰山北台地海拔 280 米处,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36' \sim 37'$,北纬 $42^{\circ}57' \sim 58'$ 。在此可观西面和南面两条沟谷,南沟谷为鄯善通吐鲁番公路,相距仅 1 公里,西沟口则为七康湖水库进火焰山的要道。烽燧已破坏,残高 1.8 米,基底土坯墙厚 0.85 米。

16. **干沟烽燧** 从煤窑沟向南沿一条砾石公路进火焰山,于出山口东侧一座小山顶上,海拔 225 米,东经 $89^{\circ}23' \sim 24'$,北纬 $42^{\circ}58' \sim 59'$ 处为干沟烽燧,地势险要,南是吐鲁番盆地,西距恰特喀勒烽燧 9 公里。烽燧已被破坏,残高 2.6 米,土坯建筑。

17. **恰特喀勒烽燧** 位于火焰山干沟南 9 公里,平坦沙砾戈壁,海拔 46 米,东经 $89^{\circ}22' \sim 23'$,北纬 $42^{\circ}53' \sim 54'$ 处有一座烽燧遗址,南北长 15.3 米,东西长 13 米,残高 8.2 米,由基底向上呈梯形,黄土夯筑。东望高昌故城 12 公里。

18. **雅尔湖烽燧** 位于干涸河沟东侧,海拔 130 米,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2'$,北纬 $42^{\circ}59' \sim 60'$ 的雅尔湖村,南距交河故城 3.5 公里,扼守由北沿沟进交河故城通道。烽燧基底呈方形,由基底向上呈梯形,约高 5 米。

19. **盐山烽燧** 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也个什塔格山亚尔霍孜

沟口北的东侧山包,海拔169米,地理座标为东经 $89^{\circ}5' \sim 6'$,北纬 $42^{\circ}55' \sim 56'$,西距交河故城4公里,西北可远望交河全城风貌。烽燧基底方形,10米 \times 10米,坍塌甚重,残高1.7米。这座烽燧与上述的雅尔湖烽燧,控制着交河故城南北两座大门,成为保卫交河故城的前哨阵地。

20. 阿拉沟烽火台 位于托克逊县城西56公里,海拔772米,地理座标东经 $87^{\circ}52'$,北纬 $42^{\circ}51'$ 。其南面、西面为深约16米由河水冲刷形成的断崖;东为鱼儿沟车站的附属建筑;北面500米为南疆铁路鱼儿沟车站。烽火台是以砾石为主、土坯为辅营建的城堡式建筑,东西长30.5米,南北长31.3米,面积954.65平方米,加上城外围墙,总面积可达1000平方米。烽火台位于城堡西北角,呈梯形,高约10米,是城堡内最高建筑物,城墙高7米左右。在烽火台内曾出土过一件唐代文书,可以确断为唐代烽燧。

(7)馆 驿

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杜甫诗《春陵行》说:“邮亭夜急符,来往急相追。”都生动描述了驿使们骑骏马风驰电掣般,昼夜兼程奔向全国各地传递紧急军令、政令文书的紧迫情态,因为它寄托着国家的命运。唐代既无汽车,更无火车飞机,要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把四面八方的信息传送到京城长安十分重要,也十分困难,那时唐朝的政治重心在西北,当高昌王鞠文泰于公元7世纪30年代进行分裂叛乱,闻唐军举兵讨伐时,对其属民说:“唐去我七千里。”^①如果边境有事,不能用最快速度传告京

^①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八月条。

都长安,作出决策,如何能维护统一呢?所以从古代起就建立了驿传制度,一遇紧急事,就用驿马昼夜兼程,送报长安。由于唐朝疆域辽阔,驿传制度也更加完善,它的驿站设置密度较大,在中原各地站距短者仅二十几里,长者也不过六七十里,在边远的戈壁沙漠处所当有所别。而驿站还和军、守捉、镇、戍一类军事设施密切联系,从而传递信息速度也更快,是以在各地建立馆驿是首要任务之一。《唐会要》卷 735 安西都护府条称:“显庆二年(657 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埋瘞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掳掠者,悉检还之。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资治通鉴》卷 200 唐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条也说“定方于是悉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所以岑参进入吐鲁番盆地后如实的描写了“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的醒目国防设施。并在《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说:“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可知当时前线的战场信息全恃驿路传送。足证馆驿对维护大唐统一事业所发挥的特殊功能和作用。

据《通典》卷 33 职一五乡官条称:“三十里置一驿”。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可知馆、驿的区别是设在通途大路上的称为驿,不在通途大路上的称为馆。而文中所说“三十里置一驿”,不过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在西域颇多空旷的戈壁沙滩,常是百里不见人烟,因而西域的驿站一般都超过 30 里,如自罗护守捉至赤亭守捉之间相距 190 里,其间仅设达匪、草堆两驿,平均驿程达六十余里。而自天山馆经碛石馆到银山馆共 220 里,驿程达 110 里左右。因为在戈壁荒沙中设驿站,必须择有水草及险要处,所以绝不能以 30 里为准。《新唐书·百官一》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规路要隙置官马。”《新唐书·地理四》西州交河郡下所列的龙泉馆、吕光馆、新城

馆等都是交通干线上的馆驿名称。而在《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发掘简报》^①中还指出：“纸棺所用的故纸，大都是天宝十二—十四载（公元753~755年）西、庭二州一些馆驿的马料收支账，其有的盖有轮台、柳中县印。已见的馆驿名称：交河、天山、酸枣、碛石、神泉、达匪、草堆、柳中、罗护、赤亭等。”这些馆驿名称不少已见于文献，有些则补充了文献的缺漏。

《新唐书·百官一》卷46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唐六典》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每驿皆置长一人。”《通典》三三职官一五乡官：“驿各有将，以卅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可知负责馆驿的称为驿长或驿将。有人认为驿将是误写。^②实际并非误写，在南北朝时主驿者就称为驿将。到唐初，驿长和驿将仍互相通用。如《太平广记》176娄师德条引《朝野僉载》称：“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渐杀不得，死罪’……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这里记述的为同一事。文中却是驿长、驿将混用，可知驿长就是驿将。文中还提到驿家，是知驿家即为驿长，而驿长、驿将在有些地方还称为“捉驿者”或“捉馆官”。如《新唐书·李峤传》卷123中则有“当道城镇至无捉驿者”，此“捉驿者”即指驿长而言。这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未见“捉驿者”的名称，却有“捉馆官”的名称，如在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文书《唐天宝十四载（755年）柳中县达匪馆私供床麦账历上郡长行坊牒》^③中就有“捉馆官”的称号。另外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

① 《文物》1975年第7期。

② 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一》，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十九年(731年)康福等领付充料钱物抄》中还把驿长、驿家称为馆家。^①

(前 略)

- 11 大练三疋充中馆玖月客使停料,
- 12 九月十五日吕义领
- 13 大练拾疋充中馆□□玖月停料,九日
- 14 十六日吕义领

(中 略)

- 68 大练两疋,十月付馆家充
- 69 杨□等料,付向辅麟领,

(后 缺)

从上述诸名称的史实中,可知唐代主持馆驿的人可称为驿长、驿将、驿家、馆家、捉驿者、捉馆官等不同称呼,用得最多的名称则为驿长。

唐代馆驿的编制和马匹数,各地并不相同,视其闲要和地理位置而定其等级。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称:“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疋,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凡马三名(名当作匹)给丁一人。”依此规定在都亭驿之外的馆驿共分六等,第一至第六等驿所配给的驿丁人数分别为 20、15、10、6、4、3 人;官给的驿马数则分别为 60、45、30、18、12 和 8 匹。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29 号墓出土文书:

^① 转引于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6 期,1984 年 12 月出刊。

1.《武周达匪等驿申报马数文书》^①

- 1 兵曹 []
 - 2 [] [] 驿马五十三 []
 - 3 [] 在达匪 []
 - 4 [] 三匹(五十二匹见在欠上槽马一匹)狼泉驿马
五 []
 - 5 [] 捡上件驿马报者 []
 - 6 [] 除 [] 数如前 []
- (后 缺)

2.《武周宁戎驿马及马草碓文书》^②

- (前 缺)
- 1 [] 贰车 []
 - 2 宁戎驿马肆拾贰 []
 - 3 [] 得驿长 []
 - 4 [] 饲马草 []
 - 5 [] 当裁(裁之误)玖拾陆 []
- (后 缺)

由上可知吐鲁番盆地的达匪驿马 53 匹,虽不足 60 匹,也应算为第一等驿站;狼泉驿马 5 下面缺字,也可肯定超过第二等驿 45 匹之数,可断定其为第一等驿站。有 53 匹驿马的应配给驿丁 18 人。宁戎驿马 42 匹,虽低于 45 匹,却高于第三等驿 30 匹马的定数,也应列为第二等驿站,应配给驿丁 14 人。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6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97 页。

每个馆驿的驿丁多少,完全根据驿马多少而定,由此可知驿丁的主要职责是牧饲驿马。这在《唐六典》¹⁷太仆寺典厩署令具体规定:“凡象一给二丁,细马一、中马二、弩马三;驼牛骡各四;驴及纯犊各六;羊二十各给一丁;乳驹、乳犊各给一丁”。可知馆驿所属驿丁专负牧饲驿马之责,而馆驿中负责传送过往官员及其家属人员的人则称为驿子,或称马子、马夫。

专负责传递过往官员及家属的驿子于各个馆驿中的人数无定额,因是按官员品级身份配给驿马及驿子。《唐律疏义》¹⁰职制律增乘疏议曰:依公式令,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以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匹。皆数外别给驿子。此外须将典吏者临时量给。

可见唐代驿丁所服的既不是正役,也不是杂徭。而是色役;驿子所服的则为杂徭。每驿驿丁均按3匹马配一驿丁定数;驿子则按过往官员品级、家属人数而随配,所以无定数,因而驿丁须番上,驿子则无定期,随事充。

唐初规定驿长“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①。就是说驿长必须对整个馆驿事负全责,如官给马匹的死、失和经费、实物的不足等,都须给以赔填。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天宝十四载(755年)柳中县具属馆私供马料账历上郡上行坊牒》^②

- 1 柳中县 牒上长行坊
- 2 合当馆从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十六日郡支贴马食贮料外,馆家私供床麦□□□□斛玖胜 内七石床
(中 略)

^① 《通典》卷33职官15乡官。

^② 转引于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6期第35页。

- 86 []别将朱承泰状称：在馆客使繁闹，准牒每季支帖马料叁拾硕，并已食尽，季终
- 87 []重，不可缺饲，贷便私供。县通斛斛如前，请牒上长行坊听裁处分，状上者。县馆。
- 88 []行坊帖马侵食当馆斛斛青麦，床等共肆拾玖硕壹斛玖胜，具状牒上长行坊，听裁者。
- 89 []上，谨牒。
- 90 天宝十四载正月八日史孙令彦牒
- 91 宣义郎行尉尹使
- 92 朝议郎行丞员外同正员上
柱国何在郡
- 93 朝散郎行丞业并廷玉
- 94 承奉郎守令 刘 琛琛
- 95 正月 日摄录事严 仙泰受
- 96 功曹摄录事参军 旺 付
- 97 []连彦庄

二十五日

这件牒文由柳中县馆主持人朱承泰因客使繁闹，郡坊每季支给该馆的帖马饲料三十硕不敷供饲，为了维持正常工作，缺饲部分只好设法私供，而私供的马料系借自民间，文书中称之为“贷便”，朱承泰“贷便私供”后，就向上行坊上牌文，请求解决这笔欠账。如果能及时解决，驿长就不必贴赔；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再加上其他损失等事，就会把原是富强之家的驿长拖垮。所以到唐朝后期，驿长因不堪重负，富强之家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充作驿长的重役，《新唐书·李峤传》卷123称：“当道城镇，至无捉驿者。”只好由小弱民户承担此项重役，很快就弄得丧产破家，民不堪命，迫使乱事迭起，唐朝政府只好改弦更张，在陆地以吏主驿事，在水路以官船漕。《新

唐书·刘晏传》载：“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辄，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晃、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

同时上述驿丁也系征自民间，所以各馆驿所属驿丁常有逃避驿役之事。从吐鲁番阿斯塔那 376 号墓出土两件文书中可知梗概。

1.《唐开耀二年(公元 682 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违番不到驿丁事》^①

(前 缺)

- 1 杜护洛 郭□子 马定□ 张君达 张□□
- 2 张小君(已上第一番) 范乌者(昌汜惠) 康默仁(平) 王住住(平□信)
- 3 康守绪(大洛) 和万善(大洛)(已上第二番) 张神力(大) 高海洛(大)
- 4 樊定隆(马)(已上第三番)
- 5 牒：才艺前件驿丁，并违番不到，请追勘当。谨牒。
- 6 开耀二年二月 □驿长康才艺牒
- 7 付怀感 各取诸乡
- 8 署即专追限明日平旦
- 9 将遇借示

(后 缺)

2.《唐开耀二年(公元 682 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处分欠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8~569 页

番驿丁事》^①

(前 缺)

- 1 _____ 秃双 龙 定(大)□ 赵愿洛 宋弘义
(昌)
- 2 丁愿德(昌) 左辰欢(昌) 翟安住(昌) 令狐呼
末(昌) 沈朱渠(昌)
- 3 龙安师(昌) 竹士隆(昌)
- 4 牒:才艺从去年正月一日,至其年七月以前,每番
- 5 各欠五人,於州陈诉。为上件人等并是阙官白
- 6 直,符下配充驿丁填数,准计人别三番合上,其
- 7 人等准两番上论,欠一番未上,请追处分。谨牒。
- 8 开耀二年二月 日宁戎驿长康才艺牒

(后 缺)

从上述两件文书中,可以知道驿长康才艺所属驿丁来自于各不同乡村,是根据唐政府的规定,必须按时轮番供差遣的。却有不少人缺番或逃番,一方面说明充当驿丁是必须尽的差役,一经查实,必须追迫上番;另一方面也说明充当驿丁较为艰苦和繁重,人所畏避。

馆驿使用的马匹,据《唐六典》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其马,官给”。可见驿马主要由国家提供。官给驿马,都配给牧田,用以解决驿马饲料。《新唐书·食货一》卷 51:“贞观中,初税草以给诸闲,而驿马有牧田。”同书《新唐书·百官一》卷 46“驾部郎中员外郎条,“凡驿马,给地四顷,蒔以苜蓿”。而《通典·食货二》田制下说得较为详确,“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疋,给地四十亩。若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0~571 页。

驿侧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给田二十亩”。对驿马和传送马的给田尚有区别。

当官马拨作驿马以后，如有死亡，则由驿长赔填。驿马虽主要由国家提供，实际常不敷用，须经常向驿道附近各族百姓征用，或称“帖驿”。这在敦煌王梵志《富饶田舍儿》诗中也反映出“……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①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交河郡郡坊草料账》^②中对于使用帖马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

(前 缺)

- 1 十六日郡坊帖马三疋食麦一斗八升付健儿丁光。
- 2 同日郡坊帖马两疋天山馆送使封大夫女婿杨郎到，食麦一斗付天山马子赵□
- 3 十七日郡坊帖天山马三疋送米升判官王进朝到，食麦一斗五升付天山馆王兴。
- 4 十九日郡坊帖马银山五疋收回，食麦二斗五升，付马子杨景秘。
- 5 廿一日郡坊马十四疋〔 〕帖银山，碓石迎黎大夫，食麦〔 〕健儿〔 〕
- 6 廿二日郡坊马十四□〔 〕马送黎大夫到，便胜到天山，食麦卅石，付杨景秘。
- 7 廿三日郡坊帖银□〔 〕迎杨大夫食麦五斗，付马子杨景秘。
- 8 同日郡坊帖马□□(十疋)内两匹细，全料，银山、碓石

① 张锡厚校辑《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页。

② (日)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账研究》的《诸种文书》录文。

- 迎杨大夫食麦六斗八升,付健儿丁光。
- 9 廿四日郡坊帖马十疋内两疋细,全料,共食麦六斗八升,付健儿丁光。
- 10 廿五日郡坊帖马十疋,食麦六斗八升,付健儿丁光。
- 11 同日郡坊马卅□帖银山迎封大夫,食麦一石五斗,付健儿张俊。
- 12 同日郡坊卅一匹马帖碯石迎封大夫,食麦两石五斗六升,付赵瓘、吕祖。
- 13 廿六日帖马卅二疋,食麦两石五斗六升,付马子赵瓘、吕祖。
- 14 廿七日帖马卅二疋,食麦两石五斗六升,付马子赵瓘、吕祖。
- 15 同日郡坊帖马五疋卅疋银山送使张自谄到,食麦二斗五升赵瓘烦。
- 16 廿八日帖马卅七疋内五疋送张自谄到,赵瓘留帖,共食麦两石九斗六升,付杨秘。
- 17 同日郡坊帖马银山廿二疋,送旌节使到,并全料,食麦一石七斗六升,付杨秘。
- 18 廿九日帖马卅五疋食麦两石八斗,付马子赵瓘。
- 19 同日郡坊帖马银山四疋,送李中郎到,食麦二斗,付马子陈瑞真。
- 20 卅日帖马卅五疋,当时便送封大夫向天山,食麦两石八斗,付马子赵瓘。
- 21 同日郡坊帖银山马六疋,送内使王进朝到,食麦四斗八升,付赵瓘。
- 22 同日郡坊帖马五十疋,从银山送封大夫到,食麦四石,付健儿张俊。
- 23 同日帖银山馆马十五疋,食麦七斗五升,付杨景秘。

- 24 九月一日郡坊帖马十五疋,迎李大夫,食麦一石二斗付赵瑾。
- 25 二日郡坊帖银山马五疋,送谈判官到,便胜过,食麦五斗,付马子杨秘。

(后 缺)

(二)

- 21 廿?日郡坊帖岑判官马柒疋,共食青麦叁斗五升,付健儿陈金。
- 22 ?日帖马柒疋,共食青麦叁斗伍升,付健儿陈金。
- 23 ?日帖马柒疋,共食青麦叁斗五升,付健儿陈金。

(后缺)

从这个草料账中可以看到帖马是普遍的、经常的,碰到当时西域最高军政长官封常清过往时帖马竟达 30 匹以上,多时帖马达 50 匹。岑判官即指封常清的副手岑参,他经过时也要帖马 7 匹。而帖驿马的料均白官给。据《唐六典》¹⁷ 太仆寺典厩署:“凡象日给稻粟各叁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和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注:象马骡牛驼,饲青草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芘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据此再观察上面所列草料账,马的饲料是每日一斗,有青草日给半料,应有五升,乳者倍之。由此可知八月十六日帖马两匹,食麦一斗,每马日食五升,为半料,因为那时还有青草可吃。而到八月二十五日帖马十匹,食麦六斗八升,即每马每日食麦八升多,算是全料。八月二十六日帖马 32 匹,食麦两石五斗六升,每马每日平均食麦八升,也系全料。

帖马均征取于民间,并且都是急用,不得延误,这对各族人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到唐后期,宦官专权横行,甚至拦抢路人的马。《资治通鉴》卷 242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二月甲子条:“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捉,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

驿传路线实际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生命线,稍有迟延,就会给国家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患。唐朝对于驿传有严明的法律。《唐律疏议》¹⁰ 职制律驿使稽程条:“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可知贻误大事者竟处以绞刑,这是保国卫民所必有的措施。《资治通鉴》卷 197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九月的一条史料说:“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从长安至焉耆计程七千余里,驿骑仅行二十八日,平均每日行 260 里左右。在这样遥远的路程上能够准时到达,唐太宗又能如此料事如神,充分显示了大唐高速、高效的办事效率和驿道畅通的神速功能。不能不佩服我们祖先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如此准确的信息传递系统。

但是高速的驿传还必须有效率高的行政相配合。唐朝高速的驿传所以能发挥巨大的功能,就是因为唐政府的办事效能也同样很高,决不拖拖拉拉。在阿斯塔那 517 号墓出土文书《唐下西州柳中县残文书为勘达匪驿驿丁差行事》^① 中可见西域地区的办事效率也很高。

(前 缺)

- 1 史
- 2 十一月廿七日受,十二月十日行判
- 3 录事张达检无稽失
- 4 录事参军善顺勾论
- 5 下柳中县勘达匪驿驿丁差行事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4 册,补遗,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 页。

这是一件查办达匪驿驿丁所负牧饲没有尽职,发生差错的案件,经查情况,不到半月就判决了。说明唐代虽封建社会,办事效率确实很高。怪不得《容斋随笔续笔》二汉唐置邮条中盛赞汉唐精神说:“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可见汉唐精神决非虚语,而是高效、高速、高功能、大开放的创造精神。

(8)车 坊

车坊在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是重要的运输机构。《唐六典》五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称:“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凡诸司有备运之车。”这里所说的内外百官,显然是说除中央各部官府普遍设有车坊外,各地州县官吏也都设置车坊。这在《唐大诏令集》二穆宗即位敕称:“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宅铺店碾碓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唐代西域吐鲁番盆地的西州及其所县也都设有车坊。如在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7年)推勘天山县车坊翟敏才死牛及孳生牛无印案卷》。^①

(前 缺)

1

录事 检无稽失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9、84~86页。

- 2 仓曹摄录事参军 勤 勾讫
- 3 关后曹,为天山坊死牛皮事。
- 4 下天山县,为牛两头死无印[]
- 5 牒王恭为出[]叻麻
- 6 天山县 为申推勘车坊孳生牛无印,所由具上事。
- 7 合当县车坊开元廿一年正月一日,据帐合交牛驴总〔下残〕
- 8 肆拾壹头牛驴,翟敏才共朱小犊 ---
- 9 贰拾叁 []大小犍牝。得翟敏才款[]
[]无死状[]
- 10 一黄[] 一黄犍肚白二岁[]
须审勘[]
- 11 一赤白犍[] 一赤犍六岁[]
(后 缺)

在唐代京都长安中央各司所置车坊多是用牛拉的车,在吐鲁番盆地的车坊,除用牛拉车外,还用驴。因为在西域天山南路农村,驴几乎每家都饲养,这是与中原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在上述天山县的车坊文书中计其牲畜总头数时以“牛驴”概括,说到孳生时也以牛驴合称。足证供运输用的车辆,有的用牛拉,有的用驴拉曳。这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223 号墓出土文书《唐景龙二车(公元 708 年)补张感德神龙二年买长运死驴抄》^① 可以为证。

- 1 张感德先去神龙二年十月内买长运死驴
- 2 壹头,皮一张,给抄讫。今称失却,更给抄。
- 3 旧抄在,不在[]用限,景龙二年四月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0 页。

4 廿日胡基抄。会纳历同。典委

由此可证那时确实是用驴拉车,故称之为长运驴,后因病或累死,于是剥得皮一张,上交公家。现在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农村中依然是有牛拉车,也有驴拉车。

在上述牒文中查办天山县车坊翟敏才死牛及孳生牛无印一事,可知唐代官办车坊牲畜均有印记。如无印,一经查出,定要按唐法治罪,所以翟敏才反复申辩无印的原因。^①

(前 缺)

- 1 []四月末[]见
- 2 [][]科者。又款,其牛为未食青草
- 3 []长官[]分明,敏才实不回换。又坊内东人,自从十
- 4 七年配入坊[]改动。实若回换,[]坊岂能改口,请
- 5 问即知者。又[]牛为小,附帐渐大,经年毛色改转,所[]不
- 6 同,实是[]生牛者,又款,如后食青草饱,毛退,检无印
- 7 者,情愿陪上牛者。频问不移,依问车坊镇兵鱼二郎等四人得
- 8 款自配入坊以来,经今四年,实是官牛,亦不曲相扶抱,如后有
- 9 人乱告一事参差,求受重罪者。又款:自到坊以来,不曾见印
- 10 牛是实,亦不见回换者。又向翟敏才得款,所交牛数六岁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4~86页。

以上

- 11 吃青袍毛退,检元印者,求受重罪者。摄丞判奉牒,令推此牛,颇
- 12 亦穷其巢穴,或有州印明验,或有毛长印无,所由确款有词,
- 13 东兵众称不换。请至饱青呈验无印,科罪甘心。途穷计日非除。
- 14 理贵尽其词款,牒坊请所由官,数加巡检,至四月末来,毛落堪
- 15 检覆,仰即状言。仍准前录中听裁者。
- 16 陆头翟敏才款注狼咬及落泥死私填。
- 17 一犁牦面白肚白十五岁(用钱柒佰文于张仁其处买,用填黄牦白面十五岁替)
- 18 一乌 犍(死)十二岁(角把头,脊上及远人相膊疮痍上用钱贰仟文于车元胤处买,用填赤犍十二岁牛者)
- 19 一相牦犍六岁(角竖,远人相膊上有疮痍,用钱一千四百文于史伏念一处买,用填牦犍六岁替)
- 20 一赤 犍(死)八岁(角竖,两膊上远人膊上有痍,用钱一千一百文于焉耆人侯元处买,用填黄犍十一岁替)
- 21 一紫犍白面十二岁(角抱盆,两耳秃,两膊上及远人相有痍,近人眼瞎,用钱捌佰文於罗转达处□□用填黄犍十四岁替)
- 22 一赤犍八岁(角竖,两膊上远□膊上有痍,用钱一仟文于白富那处买,用填犁犍九岁替)
- 23 右同前得翟□□□交牛数内,中间或有在群牧放处,被
- 24 狼咬,或□落□死,怕惧官府,又无三状,随时私买用填。为此无

- 25 实不与人回换,所有私填罪愆已经恩赦者。又问
- 26 头牛总头,六头是十六年已前着印牛
余
- 27 委清)
- (后 略)

从这个文书中可以知道车坊中属于公家的牛驴都有印记,孳生牛驴也必须打上印记,以表明属于公家所有。如无印记,一经发现,必须查明情由。是私人者混入,或其他原因,即或病死后,也必须把肉皮出卖所得钱交公,或者直接把皮交上去。如翟敏才那样的无印牛皮被发现后,就必须交待其无印牛皮产生的详细经过。可见当时车坊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调度适宜,确保运输的顺利和畅通。

由于各地车坊的车及牲畜主要为所管官府的运输和杂役服务,因而州府可以征用车坊的车及牲畜。如在《唐代西州诸曹符贴目》中就反映了这种情况:^①

- 20 符,为征车坊牛,分付龙申事。
- 23 为征北馆车坊牛事。

可见车坊的管理处于各该州县官府的监督之下。从天山县车坊文书可知,车坊内的新生牛驴,最初就要登记造册,建立簿籍,由州县直接掌管。

各地车坊平日须经常注意车辆的修理和备有应急的预备车辆。如阿斯塔那 230 号墓出土文书《唐西州请北馆坊采车材文

^① 王中琴《唐代西州诸曹符贴目》,《文物》1975年第7期。

书》。^①

- 1 昌县者得申称被符得北馆
- 2 望请北馆坊采车材,具与赤亭坊贮备
- 3 共办前件县界

(后 缺)

赤亭镇车坊位于唐代蒲昌县以东,由此去伊州间七百里路都是戈壁沙漠,运输艰困,须备有较多车辆,以应各种运输急需,所以赤亭车坊较大,车辆较多。

《唐会要》七八节度使条指出:河西节度使,开元十二年十月,除王君旭,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可知自开元二十年以后,河西节度使均加长行转运使衔,而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可知道,西域除一般车坊外,也有长行车坊:

1.《唐天山县申长运坊孳生牛状》^②

- 1 天山县 为申长运坊孳生
- 2 牛一头犁犂白面十五(肉出卖得)
- 3 肉出卖

(后 缺)

2.《唐天山县长运坊状》

- 1 天山长运坊 状上
- 2 右缘车坊管
- 3 见今探斫得
- 4 满拾乘长运
- 5 牛常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页。

(后 缺)

由上两件文书可知,车坊和长运坊除了和中央的车坊一样负有官府及地方官吏的递运服务外,还具有一定的军事性质,担负着边防军繁重的运输和杂役。

由上吐鲁番盆地的各种国防设施看,确实非常严密。但唐朝决不是依靠武力统治西域,而是依靠发达的经济文化,吸引着西域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唐朝在西域驻军最多时不到六万人,这样一点军队至多只能充作维护丝绸商贩及使者的安全,一旦遇到外敌人侵及少数敌对分子分裂叛乱时,主要依靠西域各族的地方武装。岑参在《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说:“大人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峰火灭,剑水羽水稀。”可知吐鲁番盆地的各种国防设施主要是用以维护各种丝绸商路的交通安全,非万不得已决不使用武力。

张九龄在《送赵都护赴安西》诗说:“他日文兼武,而今粟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①张说的《送赵颐贞郎中赴安西副大都护》诗称:“将起神仙地,才称礼乐英。长心堪击虏,短语足论兵”。^②张九龄和张说先后做过唐朝宰相,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域最高军政长官以善于团结西域少数民族,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矛盾,不用或少用兵为上策。显然是代表了当时统治者的思想,人民当然更渴望和平与安宁。卢象在《送赵都护赴安西》诗中更反映出这一思想:“上策应无战,深情属载驰。不应行万里,明主寄安危”。^③常建的《塞下曲》更说“天涯静处无征战,兵器销为日月光”。^④而王维的《奉和圣制送石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诗,^⑤则期盼唐代都

① 《全唐诗》第1函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张说文集》卷6。

③ 《通典》卷144。

④ 《全唐诗》第2函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全唐诗》第2函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护治理西域使众心向中原,各族人民乐融融:

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
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郤。
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
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
万方氛祲息,六合乾坤大。
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

吐鲁番盆地柳中城的历史发展

柳中城即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地区,自两汉开始在那里屯田以来,经济人口日益发展,加上为历代丝绸之路通向中原有重要口岸和军事上的重镇,因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一直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清代额敏和卓家族即以鲁克沁(即柳中)为根据地,协助清廷平定了西域地区的一系列分裂叛乱,为柳中城的历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1) 柳中城的自然环境

柳中城位于吐鲁番盆地。其所以重要,是与吐鲁番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分不开的。它的北面是举世闻名的博格达山,最高峰海拔 5 445 米;西面是喀拉乌成山;南面是库鲁克塔格、库姆塔格;东境止于七角井峡谷西口,如以周围山脊线为界,面积 50 140 平方公里。它的地形,北高南低,西宽东窄,形似纺锤,成不对称的盆地地形。盆地东西长约 245 公里,南北宽约 75 公里。惟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行政区划,并不完全以盆地为限,因而它的行政面积有 67 000 平方公里。

吐鲁番盆地所以举世闻名,首先因为它是全国地势最低的地区。整个盆地低于海平面以下的面积有 4 000 多平方公里,占盆地面积的 8%。在这 4 000 多平方公里中有 2 000 多平方公里低于海

平面 100 米以下。盆地最低处位于盆地南缘的艾丁湖，湖水平面低于海平面 154 米，湖底更低于海平面以下 161 米，成为全国地势最低点，仅次于低于海平面以下 392 米的约旦死海，成为世界第二低地。

吐鲁番盆地又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年夏季 6~8 月间，吐鲁番、鄯善县火焰山以南地区平均最高气温在 38℃ 以上。位于盆地东部火焰山以北，地势较高的鄯善县城、连木沁一带，夏日平均气温也在 35℃~39℃ 之间。而在戈壁沙地处的绝对最高温可达 50℃ 左右，地表温度大多在 70℃ 以上；在吐鲁番县城西的一处沙地上，更曾测得 82.3℃ 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有“沙窝里烤熟鸡蛋”、“石头上烤熟面包”之说。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火山云歌送别》：“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在《经火山》一诗中则说：“……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形象地描述了热浪滚滚、炎风逼人的生动情景，所以我国历代史书上称此盆地为火洲。

吐鲁番盆地还是全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位于盆地内的托克逊县年平均降水量仅 3.9 毫米，吐鲁番县年平均降水量 16.6 毫米，鄯善县年平均降水量 25.5 毫米，可知盆地内部降水极为稀少。蒸发却十分强烈，根据多年的平均值，三县的年蒸发量托克逊县为 3 821.5 毫米，是降水量的 980 倍；吐鲁番县为 3 003.1 毫米，是降水量的 181 倍；鄯善县为 2 879.3 毫米，是降水量的 113 倍。可是在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及西部的喀拉乌成山则有较多的降水和丰富的水利资源。盆地的灌溉水和应用水主要取之于山区，从而形成了盆地中特殊的水利灌溉事业——著名于世的坎儿井。

炎热、干旱、少雨的特殊气候簇拥着周围群山环抱的特殊地形，产生了吐鲁番盆地特有的种植业——棉花、蚕桑、葡萄、瓜果、

谷麦,且“厥土良沃……一岁再熟”^①。同时也产生了吐鲁番盆地十分丰富的矿藏——煤、铁、盐、石油,储量十分诱人,《魏书·高昌传》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其他还有石灰石、石膏、石英石、铜锰、钠硝、芒硝、硼、土碱、陶瓷土等多种金属,非金属矿藏,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吐鲁番盆地位处东部天山以南,东为哈密盆地,西为焉耆盆地,北越博格达山为天山北麓大草原,南越库鲁克塔格为白龙堆沙漠及罗布泊,适处丝绸之路必经通道,是绿洲农业和畜牧业交汇的地区,古代是东西丝绸之路上的要站,历代以来均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要地之一。而鲁克沁则位于火焰山之南,艾丁湖之东,库鲁克塔格北麓;是秦汉时期从中原经敦煌出玉门关西北越库鲁克山后的第一个口岸,既是一条用兵的要道,又是东西经济文化的捷径,因而从历史的曙光一开始,鲁克沁就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2) 柳中城在两汉时期的战略地位

经过考古学家的探寻,于吐鲁番盆地东境的七角井一带,找到了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在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到用硅质岩、石英、燧石打制成的细石镞、石钻头和刮削器类,这是适应当时人类狩猎、畜牧业生产而产生的细石器工艺,并标志已处在中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阶段。而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北等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四千年前的石刀、石矛、石镞、石球等刮削、切割、狩猎用的石器工艺就更加细致,技术更加精湛;同时已产生了陶器,说明当时活跃在盆地的人群已逐渐从采集、狩猎为主的生

^① 《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活方式,进入定居的农业、畜牧为兼营的社会。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石刀、石矛、石镞等刮削器、敲砸器等的造型、制作工艺不仅与当时西域地区不少遗址点上所见细石器一样,而且与时代更早的河南灵井、山西下川、陕西大荔等处的细石器形制制作工艺相同,说明古代西域各族先民创造的精神、物质财富,早就和我国中原地区各族先民存在过文化技术交流。

从吐鲁番盆地考古出土中所获得的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证和我国《史记》、《汉书》记载可知,那里住的是姑师人(一名车师),他们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表明车师人当时既营畜牧业,也营农业。就是说公元前3~2世纪的秦汉时期在吐鲁番盆地居牧的人民主要是车师人,利用他们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才智,在火焰山南北,直至鲁克沁沃土,垦辟了土地,发展了畜牧业,并建王都于交河城。

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登位,他东征乌桓,西灭月氏,统一河西走廊后,就于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左右派兵征服天山南北的广大西域地区。《汉书·匈奴传》说,匈奴单于遣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三十六,引者)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西域被匈奴征服后,由于匈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于是匈奴即在西域的焉耆、危须、尉犁间设立僮仆都尉。匈奴贵族把被征服的西域各族视为奴隶,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和乌孙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匈奴为隔断汉与乌孙的联系,把重要兵力控制在东部天山的车师族地区,于是汉朝只好从玉门关西北经楼兰至渠犁屯田,以此作为根据地,再向东和匈奴争夺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王国。西汉时郑吉数次出兵攻击交河城的匈奴族,正是为了争夺这块战略要地。所以在公元

前 60 年匈奴日逐王向汉投降,西域归入中国版图之前,汉和匈奴曾有五争车师的激战历史。可知吐鲁番盆地军事地位的重要。

在西汉与匈奴争夺车师前王国时期,汉屯田军也和车师人一起开发了吐鲁番盆地,尤其是高昌、鲁克沁地区。史称高昌城始建于西汉的屯田军,《汉书》中已提到“高昌壁”,《北史·西域传》则说“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汉朝在车师前王国设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高昌故城),管理屯田事宜,率数百名士兵在此屯田。这是吐鲁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原来的汉族人开始在此定居,与土著的车师人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到西汉末,王莽篡位,对西域少数民族政策产生一系列失误,匈奴残余势力复张,西域各族再度役属匈奴,直至永平十七年始再遣都护及戊己校尉。《后汉书》卷 19《耿恭传》称:“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附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于吐鲁番盆地设立的戊己校尉均驻于高昌壁,而后汉时的戊己校尉却主要屯驻于柳中城。这是因为柳中城位于高昌城的东南,相距仅 30 公里左右,其间戈壁沙滩面积不大,事实上高昌和柳中之间渠水相连,村落相望。同时经过前汉对车师地区的经营,汉朝势力已有一定基础,已可在车师前后部地区同时屯田。特别是经过两汉于高昌地区的屯田开发,农牧业已得到一定的发展,人口也有一定增殖,柳中也已开发成一重要区域。

由于柳中适处吐鲁番盆地的东南,距河西走廊军政重地敦煌最近,由柳中(鲁克沁)向东南越过库鲁克塔格可直趋敦煌;同时还可向西南越过库鲁克塔格至楼兰,古代车师族势力直达楼兰,所以《史记·大宛列传》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从鲁克沁

向北穿过天山峡谷约五百里可进入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吉木萨尔、奇台地区。这对以蒲类海草原为基地的北匈奴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鲁克沁算是咽喉锁钥,所以鲁克沁对敌人来说,是插入东部天山的一把尖刀,随时可出击山南山北的敌人;同时可保证中原与西域大地的联络孔道畅通无阻,加强中原王朝对东部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安定西域的形势,是以东汉时关宠、班勇先后以柳中为屯兵基地,与以蒲类海草原为基地的北匈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维护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促进西域的经济发展和会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驻节焉耆盆地,同时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率兵屯守金满(今吉木萨尔)、柳中,以保卫西域都护府东北方面的安全。匈奴闻讯,即于公元75年遣骑兵进攻天山南北的东汉屯兵。关宠亲率屯兵和敌人血战,终因寡不敌众,战歿柳中。耿恭在金满失守后,即退守有洞水可据的疏勒城(今奇台县境),孤军对敌,死战不屈,最后只剩下战士26人,直到第二年东汉援军收复柳中,再北越天山隘道,救出了为国死守的耿恭,使匈奴大为震惊。从这一战役可知柳中战略地位的重要。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死,汉章帝即位后,鉴于西域残余匈奴势力的嚣张,只好暂罢都护及戊己校尉,直至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平定西域,即以超为都护,驻节龟兹它乾城,同时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屯守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居车师后部侯城屯田。此时屯驻高昌的戊己校尉继续派兵到柳中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使柳中屯田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到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六月,因都护任尚措置失当,北匈奴分裂势力再度入寇,只好再罢都护及戊己校尉。《后汉书·梁慄董传》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董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在此期间,残余的北匈奴不仅搅得西域不得安宁,同时连连寇扰河西走廊。于是在安帝延光

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珣上书陈三策,他所说的上策是集中兵力,击灭以蒲类海为根据地的北匈奴呼衍王,只有这样才能绝其根本。如果一时兵力不足,尚难于歼灭呼衍王,那末就采取屯田柳中的中计。他说“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安帝采用了中策,即遣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于是班勇以柳中为根据地,凭藉西域各族的支持,组织、动员各族兵力,迅速收复了为匈奴势力控制的车师前后部。接着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等十七个城邦相率归服,西域全境重新统辖于东汉王朝。柳中大地上的各族人民,为东汉政府重新统治西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柳中经过汉族屯田兵的长期屯垦和土著车师人的共同努力,农牧、手工各业都得到了发展,在大力兴修各种水利工程的同时,还对农作物栽培采用了新技术代田法,增加了农作物种类,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柳中及高昌地区经过两汉数百年的开发和建设,已形成吐鲁番盆地的经济、文化中心。

(3) 公元3~13世纪柳中城的历史进程

经过两汉数百年在高昌柳中城地区的屯田垦辟,火焰山南这一片绿洲的面积已大为扩充,人口日益增多,因而发展了从柳中直通敦煌的丝绸和军事通道。《三国志》卷30《魏书》所附的鱼豢《魏略·西戎传》说:“从墩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这新增加的一道是“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至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这条新道实际就是从玉门关西北越库鲁克塔格直趋柳中城,至高昌的一条丝绸及军事通道,如果不是两汉在此屯田,人口和经济都

大有发展,这条新道是难于开辟出来的。

在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即于高昌再度设立戊己校尉府,先后派遣张恭、张就任戊己校尉,继续在高昌、柳中地区屯田。并承担安定西域社会的任务。西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仍,河西走廊及西域却相对安定,因而不少人民迁徙到河西及高昌地区,所以晋朝就在吐鲁番盆地设高昌郡,后来前凉张骏、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也都设高昌郡,郡守驻高昌。是以《魏书·高昌传》、《北史·西域传》均说:“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驻太守以统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与高昌近在咫尺的柳中就接受高昌郡守的统治。经过偏安于河西走廊几个小王朝一百多年对高昌、柳中地区的经营和开发,经济文化进一步有所发展,丝绸之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因而高昌,柳中几乎连成一片绿洲,面积大有扩展。是以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偏安于河西张掖的北凉王族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的政治不稳,只好率领余众进入西域鄯善、吐鲁番盆地,赶走了高昌太守阚爽,把北凉都城放在高昌,设置了各种官职,成为在高昌建立的第一个小王国。立国虽只短短17年,但却由此掀开了吐鲁番盆地历史新的一页。公元460年,柔然出兵灭沮渠安周,扶立了阚伯周为高昌王,阚伯周以后,阚义城、阚首归、张孟明、马儒先后为高昌王,但他们的背后,或为北魏,或为高车,或为柔然汗国,或为南宋南齐,各有所依,彼此兵刃相加,像走马灯似的相继登台。直到公元499年,麹嘉上台,才把统治权定下来,自此麹氏后裔保持了140多年的统治,在历史上被称为“麹氏高昌王国”。在这些人称王时,都有一套官制,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官僚群。如果没有高昌、柳中地区和吐鲁番盆地长期开发积累的经济基础,就无法维护较大的剥削集团和寺院僧侣集团。

从高昌设郡到高昌王国的建立,柳中的经济文化不断得到发

展。前凉王张骏置高昌郡时,即“立田地县”^①。其为柳中城改立。1975年在哈刺和卓古墓区第90号墓出土了《高昌时期高宁、威神、田地县驰马文书》^②,同墓还出土了永康十年和十七年残文书三件,而此永康纪年为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因柔然曾统治过高昌,永康十年、十七年即公元475年、482年,足证早在阚氏王国时期,田地县已为阚氏政权的行政单位。其间经过张孟明、马儒至麹嘉称王时二十多年的经营,高昌、柳中地区的经济必有所发展。《魏书·高昌传》载,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麹“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可知,麹氏立国后田地已由县升郡,郡设太守统治,田地太守已由国王之侄麹孝亮充任。据《周书》卷50《高昌传》称:麹氏高昌“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知不仅田地升为郡,则交河也已成为郡,这在1975年哈刺和卓古墓区第89号墓葬出土的章和十一年(公元541年)“都官下交河郡司马主者符为检校失奴事”的文书^③也可为证。由此也可知田地、交河二郡在高昌王国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性。交河为军略要地已为人所共知,而田地郡不仅为高昌门户、军事重地,同时也是高昌王国的粮仓和经济的生命线所在,此时从两汉的柳中一名改称为“田地”,恐怕与其田地肥美有关。民以食为天,政治稳定,首先要粮食充足,才能安定人心。

麹氏高昌王国前期除设有田地、交河郡外,还在火焰山北增设了横截郡。1969年在哈刺和卓古墓区第54号墓出土了章和七年张文智墓表,上书“初除横截郡绿事参军、司马□补王府左长史……历安乐、永安,白苏三县令。”^④章和是麹坚的建元,章和七年即公元537年。可证这时已增设横截郡。这样就可知在麹氏高昌

① 参见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8“陇右道”引顾野王《舆地志》的记载。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28页。

④ 此墓表现存新疆博物馆陈列厅。

王国前期于吐鲁番盆地设有田地、交河、横截三郡。显然田地郡是连接中原的通道,保卫高昌王国南境。交河郡防卫来自西北方的敌人。横截郡防卫来自天山以北的敌人。麹氏高昌王朝传至麹文泰,就依靠这种优越的地理经济形势,产生了自大和分裂的邪念。唐太宗李世民接位后不久,麹文泰就阴结西突厥分裂势力,在高昌坚城的基础上,“增城深堑”,还扣押和拘留东来的各国使者,并扬言说:“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①唐太宗针对麹文泰的分裂阴谋,遂于公元640年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和薛万钧、契苾何力等大将共率汉、突厥、契苾步骑数万讨伐麹文泰的分裂叛乱。

这次李世民的讨伐是大军先进至伊吾(今哈密)绿洲作好充分准备,在后勤负责人姜行本的指导下,利用天山北麓松树塘的森林资源,制造了有力的攻城武器——冲车、抛车及十丈高的楼车。然后以契苾何力为先锋,从伊吾绿洲直趋田地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田地城,虏7000余人,这样就截断了高昌军民的衣食经济中心,等于卡住了人的喉咙。所以麹文泰闻唐军至磧口,直趋田地郡时,惊吓而死。由此可见田地郡在高昌王国时期的经济及军事上的重要性。当唐军攻拔田地城直逼高昌城时,麹文泰的儿子智盛抵挡不住攻城的唐军,只好出城投降。《旧唐书·高昌传》记称:“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唐太宗平定麹文泰的分裂叛乱,顺势统一塔里木盆地后,即在高昌城“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在州之下去除了郡的建置,改设为县。《新唐书》卷40《地理四》称:“西州交河郡,中

^①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都督府。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天宝元年为郡……户万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县五:前庭、柳中、交河、蒲昌、天山。”此处前庭即指高昌,宝应元年更名。柳中县则为高昌王国时期的田地郡,到西州时期已改为柳中县。

唐朝为了适应大一统后政治、军事的要求,进一步重修并扩建了高昌王国时的城墙,同时也加强了前庭、柳中县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开发,并保护和繁荣了从西州辐射出去的各条丝绸道。特别要指出的是从高昌经柳中直达敦煌的大海道,这是从河西进入西域最为便捷的一条丝绸通道。据敦煌石室佚书所得《沙州图经》载:“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①。这条丝绸道路就是从今鲁克沁向东南越过库鲁克塔格经疏勒河直趋敦煌,可以避开罗布泊以东的白龙堆沙漠和伊吾以南的莫贺延碛之苦。《元和郡县图志》卷40《西州·柳中县》:“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指的就是《沙州图经》中的大海道。《太平寰宇记》卷156《西州·柳中县》条则说:“柳中路:裴矩《西域记》云,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管水草,人难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这里把大海道称为柳中路,甚为妥切,不仅显出了柳中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同时也显出了柳中是历代丝绸道上的要站。凡从吐鲁番盆地出发走大海道的人必须从鲁克沁整装出发;从敦煌走大海道的商贩进入吐鲁番盆地也必须先到柳中。这条丝绸道实际并非始于隋、唐,在此之前的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早已存在,上引《魏略·西戎传》所指北新道,实即大海道。而在吐鲁番哈刺和卓出土的北凉时期墓葬文书中有《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②及《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

^①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书》^①两件,内容均为遣人至田地县守“海”十日。第二件文书在“守十日”下,还有“代到口”三字,足见是轮番守卫。此时的田地县,即唐代的柳中县,守“海”即指大海道,因为那里并无海,显然是指的沙海。由此可知高昌王国对大海道的重视既包括经济的,同时也包括军事的。文书中明说是“发骑守海”,应该是以骑兵进行武装守海,并不是一般的守卫。这些都给田地县增添了历史的光彩。

唐朝统一西域后,吐鲁番盆地更成为丝绸道上的要站,这时罗布泊水量减少,原走罗布泊经楼兰去龟兹的道路很少走了,主要改走伊吾经高昌,或大海道经柳中、高昌再西去的路,所以柳中、高昌地区成为国际的商业都会,随之而来的东西南北各方不同民族的来客也都汇集在这里。

吐鲁番盆地本来处于绿洲的十字路口,民族十分复杂,加上大唐恢宏的气派,欧亚非几大洲的民族都想来此经商、学习、观光、一睹大唐盛世的先进文化。但见高昌、柳中的商肆上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的各族人民,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装,活跃在商场,真是五彩缤纷,好似一座世界性的博览会。公元487年原居外蒙西部的高车族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十余万户迁至东部天山南北定居,更增加了车师族的人数。因为高车属铁勒部的一支,与车师人的语言、生活、习俗大致相同。柳中、高昌城原来都是戊己校尉城,本来是以汉族的屯垦士兵兴建起来的,但在屯城的周围却主要是车师人、高车人,这些远道而来的以汉族为主的屯垦士兵与车师人、高车人朝夕相处,日久这些汉人也就车师化、高车化,即铁勒化了,这在历史记载上说得很清楚。《北史·西域传》“高昌”条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可知高昌、柳中地区汉人穿的也是胡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服,尽管他们也读了毛诗、论语等中原通用的读本,却是译成车师—高车语,亦即铁勒语读的。从而《隋书·西域传》“高昌”条说: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麹氏高昌王国伯雅王到长安朝拜后,向王国内下令说:“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任。”这充分表明生活在高昌、柳中地区的汉人早已胡化,也即铁勒化。麹伯雅虽下令改穿华服,“然竟畏铁勒,不敢改也。”因为麹氏高昌王国受铁勒贵族的管辖和统治,这在《隋书·西域传》中也明确指出:“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因而原先的匈奴人、鲜卑人,东来经商、传教的大月氏人、印度人、粟特人、伊朗人、阿拉伯人以及欧非各国人,只要在吐鲁番盆地定居,无不被铁勒人同化,融入铁勒人中。这就是民族融化不可抗拒的洪流。这些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

1972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太凉承平十三年(631年)的沮渠封戴墓表。^①另还出土了唐代西州高昌县授田文书内有给沮渠喜仁的田亩数。^②可知有的匈奴后裔在此做官,有的则已成为当地农民,显然也已铁勒化。

关于鲜卑族人融入高昌、柳中铁勒人中,在阿斯塔那103号墓出土的麹氏高昌至唐代的授田文书中有户主秃发庆武^③,秃发是鲜卑族姓,可知这户鲜卑人已在高昌耕种为业,融入车师—铁勒人中。还有一件文书是高昌延寿八年(631年)隆质等田亩出银钱账,其中有“秃发伯口田四”。^④另一件“领粟账”的名单中,有一名秃发头六^⑤。显然这些鲜卑人都已铁勒化。

① 《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版。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关于大月氏国及印度来到高昌、柳中一带的佛教徒及商人也很多,但有不少也已融入高昌、柳中的土著民族中。如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第一至第六册中则有大月氏人名支苏坦^①、支熹伯^②;天竺人则有:竺国双^③、竺黄媚^④、竺茵婢、竺立忠、竺阿堆、竺沙弥、竺岑儿、竺口口、竺佛图^⑤、竺圆得、竺惠儿、竺相伯、竺幼宣、竺伯子、竺道口^⑥;竹幢洛、竹石柱;^⑦竹都柱、竹息谿、竹怀、竹士隆;^⑧可知这些月氏人和印度人到高昌、柳中地区传教或经商后都融入铁勒族中。

中亚河中的粟特人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丝绸道上各城镇都有他们的足迹。在阿斯塔那五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诸户丁口配田簿》中户主康阿迺、户主白明熹、户主康槌奴、户主曹不之攬,户主曹玖子,户主曹摩仁,户主安畔施,户主康知口。^⑨这些昭武九姓的粟特人都已成为高昌、柳中地区从事耕种的常住农民,显然已融入当地铁勒族中。

从这些简单例子中足可说明以戊己校尉形成的高昌、柳中两城原是汉族为主,发展到高昌王国及隋唐时期也都已铁勒化。其他从四面八方来的匈奴、鲜卑、柔然、月支、印度、粟特各族人民也都融入当地土著人中。所以公元6~8世纪的突厥汗国曾统治吐鲁番盆地。建立于麹氏高昌第七代王麹乾固延昌十五年(公元575年)的《麹斌造寺碑》的反面有高昌王麹宝茂及其世子乾固的署名。宝茂的署衔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董、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286、333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20、250页。

⑥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130、159、160、168、188页补9页。

⑦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第211、276页。

⑧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344、570页。

⑨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360~367页。

高昌王。”其中“西平郡开国公”以前的官号为西魏所受官爵；自“希董”至“希利发”为突厥所受官号。“高昌王”为宝茂自称的尊号。麹乾固的署衔为“卫将军波多旱、输屯发、高昌令尹”。其中“卫将军”为西魏所授之官衔；“波多旱、输屯发”为突厥所受官衔。“高昌令尹”为高昌本国所授官职。同时高昌王还曾与突厥联姻。《隋书·西域传》“高昌国”条称：“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使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可知突厥贵族对麹氏高昌王国的压迫剥削很重。尽管有不少突厥人到了高昌、柳中地区，但突厥汗国灭亡后，这些突厥人也都融入当地铁勒族内。因突厥族虽是统治民族，但在吐鲁番盆地是少数，必然为人数多的铁勒人同化。

所以公元840年外蒙地区约15万多回鹘人在庞特勤率领下西迁至焉耆、龟兹、高昌一带，即于848年初建立了回鹘汗国，后来即以高昌为都城，成为维吾尔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汗国的统治范围西到龟兹，东及哈密，北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辽阔草原。在王城周围有以柳中为中心经过近千年开辟的广大绿洲，农牧手工业产品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于王室享用。在汗国400多年时间中是高昌、柳中地区繁荣、昌盛的又一个高峰。高昌古城门上，楼阁高耸，气势宏伟，街道两旁商肆、作坊栉比，来往商客不断。汗国的统治者冬天在高昌，夏天到天山以北的北庭去避暑。毗邻高昌的柳中地区经济也有了新的发展，仍然成为丝绸道上联结中原的重要口岸。

1130年后高昌回鹘汗国臣服了西辽。在西辽统治时期虽然受到契丹贵族的压迫剥削，但境内社会较安定，高昌、柳中地区并未遭破坏。而到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崛起蒙古草原后，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高瞻远瞩，于1209年“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归降成吉思汗蒙古。并亲自朝帝于怯绿连河（即克鲁伦河），奏

称：“陛下若恩顾臣，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庶几竭其犬马之力。”^①成吉思汗很感动，并嫁也立安敦公主给他，作为第五子对待。于是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刻跟随成吉思汗征伐你沙不里、河西（指西夏——引者），立了大功。其死后即由其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为亦都护。在高昌回鹘投降成吉思汗后，东部天山南北的回鹘族地区由于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优待，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继续得到了发展。在蒙元帝国中央重用了许多畏兀儿族的知识分子，如廉希宪、廉惠山海牙、阿里海牙、阿鲁浑萨里、偃哲笃、偃玉立、燕只不花、阿塔海牙、道童、答理麻识里、安藏、鲁明善、月举连赤海牙、亦黑迷失等，都是著名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翻译家等。这种情况决不是一天形成的，各种人才也决不是短时间培养出来的，而是从两汉以来，直至蒙元统治高昌、柳中地区的一千多年时间里，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并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了丝绸道上东西方拥来的各种文化，使当地的文化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质较丰富，精神文明较充实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符合于时代要求的优秀人才。

(4) 东察合台后王统治时期鲁克沁的剧变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西北地区的蒙古贵族发动了分裂叛乱。公元1275年窝阔台后裔海都及察合台后裔都哇率军十二万围攻忠子元室的高昌回鹘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都城高昌被围达半年之久，都哇、卜思巴遣人劝降，亦都护宁死不屈，回言说：“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②确为名垂千古的英雄。可是高昌城中的储粮将尽，叛酋都哇

^① 《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以书系矢射城中曰：“……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①火赤哈儿的斤为救民命，只好忍痛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放在厚厚的毛毯上，引绳缒城下交叛首，都哇才撤围而去。火赤哈儿的斤一心为国的牺牲精神受到元廷的重赏，仍命他还镇火州高昌，叛敌见他屯兵哈密力，就派大军袭击，在众寡悬殊下，火赤哈儿的斤血战沙场，终于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维护统一的不朽战歌，永远受到各族人民的敬仰。

由于分裂叛军在高昌、柳中地区进行激烈而长期的战斗，高昌故城遭到了严重破坏，今天所见的残城，主要是这次战争遗下的最大创伤；而从汉代开始建立起来的柳中屯城，破坏却并不严重。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遣派至西城哈烈、撒马尔罕的使者陈诚经过柳中及高昌时曾留下两首诗。他先到柳中城，即作诗名《鲁陈城》：

楚水秦川过几重，柳中城里遇春风。
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
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
羌酋举首遵声教，万国车书一大同。

然后在《西域番国志》中写称：“鲁陈城，古之柳中县，地在火州之东，去哈密约千余里。……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园，流水环绕，树林阴翳。土宜稷麦麻豆，广植种蒲桃、桃、杏、花红、胡桃、小枣、甜瓜、葫芦之属。有小葡萄，甘甜而无核，名曰锁子葡萄。土产绵（棉）花，能为布而纛薄。善酿葡萄酒。畜牛羊马驼。气候和暖，人民醇朴。”可见此时汉唐以来的屯城还在，并未指说破坏情况。

可是从柳中到高昌城所见就不同了，他的诗名为《哈密火州

^① 《元史》卷122《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传》。

城》(此处密为刺之误)道:

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
遗迹尚存唐制度,居人争睹汉官仪。
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
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

在《西域番国志》中则写称:“火州在鲁城之西七十里,……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草日人烟惟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东边有荒城基址,云古之高昌国治,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居焉。唐置伊西庭节度使,今为马哈木所隶。”由此可见,说明高昌城大部分已残破。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都哇攻占畏兀儿地,高昌王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之子纽林的斤即“诣阙请兵”。从此,包括柳中在内的火州地区长期成为元朝和西北诸王争夺之地,直至延祐初元朝击败西北诸王,收复畏兀儿地。元仁宗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①至顺元年(1330年)元朝“复立总管府于哈刺火州”。^②不过元朝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吐鲁番盆地真正扎下根来,所以纽林的斤及其后裔虽都被称为高昌王,但也只能搬迁至甘肃武威永昌堡,遥领火州地。

自1436年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登位后,察合台汗国即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由秃黑鲁帖木儿汗统治的地区称为东察合台汗国,在汉文史籍称为别失八里。秃黑鲁帖木儿在位十五年(1347~1362年),他虽致力于统一察合台汗国,但也未能如愿。在他统治期间最大的事件是他本人首先信奉了伊斯兰教,然后强迫一些蒙

^① 翼集《高昌王世勋之碑》,见《道园学古录》卷24。

^② 《元史》卷34《文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

古贵族也信仰伊斯兰教。秃黑鲁帖木儿死后,经过哈马鲁丁篡夺汗位的战乱,到1389年秃黑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汗登位后,局势才稳定下来。《拉失德史》指出:“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曾经举行过圣战(ghazat)进攻契丹。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刺和卓和土鲁番。”^①可知这时东察合台汗国已牢固地统治了吐鲁番盆地。

公元1408年黑的儿火者死后,历经沙米查干(1403~1408年)、马哈麻(1408~1415年)、失儿马黑麻(1415~1416年)、纳黑失只罕(1416~1417年)、歪思(1417~1432年)各汗统治时期都把吐鲁番盆地作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而从歪思汗开始,吐鲁番盆地更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他本人常驻吐鲁番。歪思汗死后,继续统治吐鲁番地区的察合台后裔为也密力虎者王、速檀阿力(1478年死)、兀隆各、速檀兀也思、速檀阿黑麻(汗)(羽奴思次子,1504年死)、速檀满速儿(汗)(1543年死)、速檀沙(汗)(约死1566年)、速檀庙速(1570年被绑往叶尔羌)、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1575年新立为王)、速檀阿卜纳西儿阿黑麻(1579年袭立为王)、速檀马黑麻虎答遍迭(1583年新立为王,1594年被捉送叶尔羌)、速檀阿卜刺因(汗)(1594年封于察力失—吐鲁番,约1635年死)、苏鲁谭阿布伦木汉默德阿济汗(死于1656年)、巴拜什(1656年登位,1678年死)等;至1679年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占领吐鲁番,结束了察合台后王对吐鲁番、火州、柳城等地的统治。

察合台后王统治吐鲁番时,和明朝保持了政治、经济上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到明朝去进贡和经商贸易,在《明史》中可找出许多例证。《明史》卷329《西域传》把柳城、火州、土鲁番列为吐鲁番盆地三个重城。可知交河已衰落,而为吐鲁番所代替,柳城和火州则依然屹立于盆地东部。《明史·西域传》“柳城”条指出:“永乐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四年(1406年)刘帖木儿使别失八里,因命斋彩币赐柳城酋长。明年其万户瓦赤刺即遣使来贡。七年(1409年),傅安自西域还,其酋复遣使随入贡。帝即命安斋绮帛报之。十一年(1413年)夏,遣使随白阿儿折台入贡。冬,万户观音奴再遣使随安入贡。二十年(1422年)与哈密共贡羊二千。宣德五年(1430年)头目阿合把失来贡。正统五年(1440年)、十三年(1448年)并入贡。自后不复至。”由此可知,1448年时柳城尚未归属吐鲁番。《明史·西域传》接着说:“柳城、密尔火州、吐鲁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长入贡,多与之偕,后土鲁番强,二国并为所灭。”这段文字是在柳城1448年入贡明朝,自后不复至之后所述。可证柳城是在1448年后才被吐鲁番并灭,而火州的被并于吐鲁番,也可能与此同时。

当时察合台后王统治的别失八里及柳城、吐鲁番等所以一再要向明朝入贡,一方面表明他们自认是明之藩属,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同时在经济上更是互相离不开,很多生产及生活用品须仰赖中原的供应。尽管吐鲁番强大后,曾出兵占领由明朝直接统治的哈密地区,为此,明朝对吐鲁番曾闭关绝贡。但吐鲁番仍然一再向明朝要求入贡,把吐鲁番通向中原的路称为“金路”,任何情况下都想打通它。对此,《明史·西域传》很生动地指出:“满速儿犯边后,屡求通贡,不得。十五年,归先所掠将卒及忠顺王家属,复求贡。廷议许之,而王迄不还。……时满速儿比岁来贡,朝廷待之若故,亦不复问忠顺王事。”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虽地处东北,但位处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后裔也已闻悉。因而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庚寅,“吐鲁番阿奔木匝法尔·苏尔覃·马哈麻特·额敏·巴哈笃尔汗遣亦思喇木和者进贡,并疏言:‘前遣使进贡,曾奉上谕,五年一次进贡。……因臣国地方遭逢荒乱,以故未得如期进贡。但天朝建都极东,

巨地居极西,以后应否照旧进贡,请裁夺’”^①这位马哈麻特·额敏是上面提到的苏勒檀·赛伊特·巴拜汗之子。“疏”文中所说遭逢荒乱就是指自1678年以来卫拉特对叶尔羌汗国的入侵及叶尔羌汗国的政治动乱。据《清圣祖实录》卷128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再次向清朝进贡,其全名是“吐鲁番阿布尔木萨拍尔·马哈马特·厄敏·巴士尔·哈西汗”自称“系青吉思汗后裔”。后来于1692年左右在和白山派阿帕克和卓的斗争中被杀。这些可以看到叶尔羌汗国的大汗及其在吐鲁番的统治者对待清朝的态度也和对待明朝一样,是通过“朝贡”关系保持着同清朝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为不久以后鲁克沁的额敏和卓家族投靠清朝,协助清朝统一西域准备了条件。

原来柳城、火州地区以信仰佛教为主,同时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北史·西域传》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说明从高昌郡到高昌王国时期高昌、柳中地区以信仰佛教和祆教为主。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佛教寺院名称,如麹氏高昌王国时期的阿斯塔那517号墓出土的文书《高昌某年湊林道人保训等人人酒账》^②内有“民部郎中寺七月□一日取田地张氏戒羲一□”。这些都可证明田地郡有不少佛教寺院。后来虽经铁勒、突厥的统治,因为他们也信奉佛教,所以田地郡佛教仍在发展。从而《西州图经》专列有位于柳中县境内最宏伟、轩昂、清幽的丁谷窟寺,即今人所称的吐峪沟千佛洞窟。其生动地描述丁谷窟寺:“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谷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指西州——引者)二十里。寺其依山构,揆岫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岩峦纷纭,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滞,下轻溜溜潺,实仙居之胜地,凉栖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可见丁谷寺背依崇岩,下临清川,寺宇轩昂,环境清幽。宋朝使节王延德于

^① 《清圣祖实录》卷98。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补遗,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公元10世纪末到高昌回鹘都城时,仍可见到内外的许多佛寺。

不过这时伊斯兰教已传入塔里木盆地的西南部,并已成为喀拉汗王朝的国教。于是伊斯兰教传教士不断潜入高昌回鹘西部的库车等地传教,还不断发生宗教战争。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迨其次子窝阔台为汗时,高昌回鹘境内已有一些人信奉了伊斯兰教。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次子萨仑的斤(《元史》称玉古伦赤的斤为其次子)被窝阔台汗寡妻、蒙古汗国摄政者脱列哥皇后任命为高昌亦都护后,曾参加了高昌佛教徒策划一网杀尽别失八里附近穆斯林的阴谋。谋泄,被蒙古宪宗蒙哥汗处死,改由其弟玉古伦赤的斤嗣为高昌亦都护。洪钧《元史译文证补》26上“畏兀儿地”条称:“怯石迈因之弟萨仑抵嗣立,宪宗即位,萨仑抵来朝。而别失八里之地流言忽起,谓萨仑抵将尽戮民之从天方教者,其仆告变。蒙古官赛甫曷丁监治别失八里,亟要萨仑抵返,询无是谋,而其仆坚证之。事闻于朝,付忙哥撒儿鞠治刑讯,萨仑抵遂诬服,令其弟倭肯亦杀之,代其位。从天方教人则大悦。萨仑抵崇释氏,民与异教,故设谋害其主。”可知从13世纪上半叶起,吐鲁番盆地及北庭一带已有不少伊斯兰教徒,使崇佛的萨仑的斤亦都护恐惧和不安,遂设谋打击伊斯兰教徒。

由于柳中、高昌地区长期崇信佛教,自秃黑鲁帖木儿汗以后,为了在蒙古贵族及畏兀儿地区推行伊斯兰教,就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如1389~1399年在位的东察合台汗王黑的儿火者征服哈刺火卓、吐鲁番后,就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这两个地方现在被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①这里所说“达尔·阿勒·伊斯兰”的意义,有人说是“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的权力,那里的居民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不信伊斯兰教的居民在那里要服从穆斯林

^①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的统治,没有完全的自由和权利。”^①

但是一千多年来柳中、高昌地区虔诚信仰佛教,决不是靠一次征服就能完全改信伊斯兰教的,因而公元1414年明朝陈诚经过柳中、高昌时,那里仍然有不少佛寺和信仰佛教的人。《西域番国志》说:

鲁陈城……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刺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装束者,男子椎髻,妇人幪以皂巾,垂髻于额。俱依胡服,方音皆畏兀儿语言。

火州,在鲁城之西七十里……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惟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

可见到15世纪20年代柳中城内信佛教的和信伊斯兰教的人同住一城,并且指明“方音皆畏兀儿语言”,即均属畏兀儿族,不过信教不同罢了。并说火州、吐鲁番、鲁陈三城“民风、土产,大概相同。”^②也就是说,均为畏兀儿族。

由上可知,伊斯兰教徒在鲁陈、火州、吐鲁番已有一定势力和重要地位。这在汉文的史籍也有反映,如:

《明太宗实录》卷38:永乐三年(1405年)“火州回回满刺(毛刺)乞牙木丁等来朝贡马及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83:永乐六年(1408年)“哈密卫所镇抚黑的儿等及哈刺火州回回阿力迭力失等来朝进碇砂,赐之钞币。”

《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七年(1409年)“哈刺火州等城回回远伯里等来朝贡方物。”

《明太宗实录》卷210:永乐十七年(1419年)“哈密、土鲁番等处回回土鲁番迷失等百三十七人来朝贡马。”

^① 《简明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荷兰来登1965年版,第69页。

^② 陈诚《西域番国志》。

这些史实,至少说明15世纪20年代以前火州、柳中、吐鲁番地区已深受伊斯兰教影响,原先的佛教文化已受到猛烈冲击和摧残。

那时有些蒙古贵族中仍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因此,黑的儿火者以后一些察合台后王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如1407~1416年在位的黑的儿火者汗之子马哈麻汗在强使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时,采取了严酷的手段:“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azrar),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①到1417~1432年统治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时期更在吐鲁番地区大力推进伊斯兰教,“歪思汗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他每年都要到土鲁番、塔里木、罗布、怯台等地的周围去打野骆驼……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②正是经过歪思汗在柳城、火州、吐鲁番等地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使得那里的佛教势力日衰。《明宣宗实录》卷113说:“尹吉儿察居土鲁番城,为歪思王所逐,归附来京。”查尹吉儿察原为土鲁番头目,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尚向明朝贡马及方物。^③此后再未见朝贡,只是说其子满哥帖木儿子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尚向明朝贡马。^④可是到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丁巳,尹吉儿察即“率家属来朝,愿居京师,以图报效”,宣宗皇帝即命“行在工部与居第什器等物,户部给俸禄”。^⑤于同年十一月,宣宗又明确指示“给土鲁番城来归都督金事尹吉儿察月俸视山后人例,于北京米、钞各半支給。”^⑥

从1430年下半年起,吐鲁番盆地原有头目及僧俗人员就不断

①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33页。

②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第248~249页。

③ 《明宣宗实录》卷21。

④ 《明宣宗实录》卷45。

⑤ 《明宣宗实录》卷68。

⑥ 《明宣宗实录》卷72。

逃向北京及其他地方。如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戊子“柳城等处头目阿黑把失……来朝马及方物。”^①明帝给予了赏赐。可是到同年十二月丁亥“柳城万户阿黑把失等十六人来朝奏：‘愿居京自效’。命阿黑把失等五人为副千户等官，赐金织裘衣，彩币、钞、布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为例。”^②由此可知柳城头目上半年还向明朝进贡，下半年起就被驱逐出境，可见从1430年下半年起柳城地区已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头目掌权，吐鲁番城及火州也大致如此。

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戊子“土鲁番城指挥金事猛哥帖木儿等三十八人来朝奏：‘愿居京自效’……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③

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癸卯：“土鲁番城胡马儿舍等来归，皆奏愿居京自效，命为指挥、金事、百户等官，……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④

宣德七年(1432年)八月癸卯：“土鲁番城舍人陈檀等来朝，奏愿居京自效，……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⑤

宣德八年(1433年)正月丁丑“土鲁番城回回僧海失都来归，奏愿居甘州，皆从之。”^⑥这里的“回回僧”即指信奉佛教的畏兀儿人。

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丙寅：“土鲁番城回回伯颜帖木儿等来归，奏愿居京自效……仍令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⑦

宣德九年(1434年)十月乙丑：“土鲁番城舍人卜烟川儿等率妻子来归，奏愿居京自效。命卜烟川儿为正千户。……仍命有司给

① 《明宣宗实录》卷 65。

② 《明宣宗实录》卷 73。

③ 《明宣宗实录》卷 73。

④ 《明宣宗实录》卷 76。

⑤ 《明宣宗实录》卷 94。

⑥ 《明宣宗实录》卷 98。

⑦ 《明宣宗实录》卷 106。

房屋器物。”^①

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丙申：“土鲁番城都纳佛先，舍人南忽力等奏：‘愿居京自效’。命佛先等安插在京寺院，日与饩廩；南忽力等隶锦衣卫，给房屋、什器、月粮。”^②

这些僧人所以先后携家到内地居住，除去政治原因外，宗教信仰的发生剧变，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在1437年吐鲁番地面因师巴刺麻答失遣僧人格来到明朝贡马及方物。^③可是到1441年明代汉文史料中再次出现“巴刺麻儿答失里”(与上述巴刺麻答失为同名异译，均为梵语 paramarthasri 的音译，意为“佛说吉祥”)时，其职位已不是“土鲁番地面国师”，而是“土鲁番地面头目”。^④足见这时巴刺麻儿答失里已改信伊斯兰教，而被任命为“土鲁番地面头目”了。同时自1437年以后的明代汉文史料中再未出现有关吐鲁番盆地佛教僧侣的记载。这样基本可以肯定，吐鲁番盆地佛教的活动，到15世纪30年代末完全终止。长期以高昌、柳中作为佛教中心的寺院被焚毁，洞窟壁画被破坏，居住在这里的畏兀儿人已全部伊斯兰化，从以下例证中也可窥知实情：

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癸卯：“柳城地面头目米儿咱阿都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等物有差。”^⑤这时的米儿咱阿都拉已为伊斯兰教的名字。

天顺六年(1463年)正月辛亥“命土鲁番等处使臣百户满刺马哈麻为副千户，所镇抚亦不拉忻为百户，授法虎儿丁等五人俱为所镇抚。”^⑥这里的“满刺”即“毛拉”的异译，为宣传伊斯兰教者；亦不拉忻即伊不拉引的异译，为伊斯兰教徒常用名。

① 《明宣宗实录》卷113。
② 《明英宗实录》卷28。
③ 《明英宗实录》卷32。
④ 《明英宗实录》卷84。
⑤ 《明英宗实录》卷71。
⑥ 《明英宗实录》卷348。

这些都可知 15 世纪 40 年代起,柳城、吐鲁番地区的畏兀儿人民及察合台后王统治者已全部伊斯兰化。由是也可知世居鲁克沁的额敏和卓家族的先民及其后裔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惟他们沐浴在这个丝绸重镇的阳光中,耳闻目睹了许多杰出人物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英雄故事,一代又一代震撼着他们的心灵。所以当清朝的统一大业在全国节节推进的时候,额敏和卓能看清大势,站在统一方面,为清朝统一西域立下了不朽功绩。

鲁克沁即从汉代的柳中发展而成,经过两千多年的开发和建设,现已形成鲁克沁镇、吐峪沟乡、达朗坎乡、迪坎尔乡。根据 1985 年调查,其人口及民族成分如下:

鲁克沁镇:4 519 户,23 463 人。其中维吾尔族 21 763 人,汉族 1 526 人,回族 174 人,其他 1 人。

吐峪沟乡:3 728 户,18 595 人。其中维吾尔族 15 524 人,汉族 1 846 人,回族 86 人。

达朗坎乡:2 229 户,11 979 人,其中维吾尔族 10 705 人,汉族 1 218 人,回族 48 人,其他 5 人。

迪坎尔乡:951 户,5 570 人。全系维吾尔族。

以上一镇三乡,合计 11 427 户,59 607 人。其中维吾尔族 53 562 人,占总人口的 90%;汉族 4 590 人,占总人口的 8.2%。回族 308 人,其他 6 人。

足见这里主要是维吾尔族聚居区,连同回族,均信奉伊斯兰教。现有好几座著名麻扎及重要清真寺。

唐轮台城位置考

(1) 唐轮台城建立的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代表汉、唐时代的综合国力,当时从中国中原运往欧、亚、非各国以丝绸为主的物品闪耀着中华各族人民先进经济文化的光辉。尽管路途艰险,既要过无数的高山大河,又要走不见人烟的漫长的戈壁沙漠,却都无法阻挡各国人民对中国汉、唐时期欣向荣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向慕,从而西域的这条丝绸之路成为黄金之路,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倾倒。

在两汉时期,由于长时间和匈奴争夺西域,因而首先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是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条道路,即从敦煌阳关西出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葱岭去大月氏、安息,即经今阿富汗、伊朗,中、近东至非洲;另一条路是从敦煌玉门关西北经楼兰、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大宛、康居、奄蔡达欧洲。到公元前 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撤销僮仆都尉,汉即在天山以南乌垒设立西域都护府,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域归入中国版图。此后由于残余的匈奴势力常胁迫位于东部天山南北的车师王国截断丝绸之路,所以在两汉时期从哈密经高昌西去龟兹,或从哈密经蒲类、金满西去伊犁的道路都时常不通。至魏晋南北朝时并未形成全国大一统局面,因而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虽通行,却常在互相争夺之中。直到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太宗命侯君集等

率军平定高昌麹文泰的分裂叛乱，才于高昌设西州和安西都护府，天山北金满设庭州。至648年平定龟兹叛掠后，即把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在这种统一西域的大好形势下，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畅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丝绸为首的商业的繁荣，唐朝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世界各国各族开放的社会，因而即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在天山北路设立了轮台县，同时建筑了轮台城，成为天山北路草原道上的军事和商业重地。

唐朝统一西域，并以龟兹为中心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统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武则天长寿二年(702年)又于北庭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直至里海的辽阔草原区域，此时安西都护府专辖塔里木盆地、中亚河中及阿富汗等地。与此同时，位于西藏的吐蕃贵族却始终和唐朝争夺西域这片土地，尤其是天山南路地区，因而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后，曾于651年、670年、678年、687年、794年，5次为敌人攻陷。其中除651年因受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影响而迁出龟兹的安西都护府外，其余四次都是被吐蕃贵族攻陷龟兹后，都护府只好暂时迁离龟兹，直至收复龟兹后才迁回原地。那时吐蕃贵族在西域的主要根据地是婼羌县的米兰古堡及和阗地区的麻扎塔格，实际上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南道，直至武则天长安二年(693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后，才稍煞吐蕃贵族凶焰，使得塔里木盆地有一百多年的安定时间。但经吐蕃贵族的多次骚扰，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于是军政开支拮据，为了补充地方财政的不足，唐玄宗即于开元七年(719年)汤嘉惠以焉耆备四镇之后，下“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①同书同传赞称：“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可知当时在塔里木盆

^① 《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焉耆”条，中华书局1982年版。

地周缘有四个收税点,而在天山北麓草原道只有一个轮台纳税点,足证轮台的重要。由此也可知天山南路四个纳税点的收入仅够维持各地方的军政费用,而轮台纳税点的收入不仅可供应所辖区域内的军政费用,实际还负有统筹全局费用的责任,因为它没有受到多次战争的破坏。

包括整个东疆及天山北麓草原道在内的辽阔区域的收税点只有一处轮台城,可知这个轮台城必须设在各条商道总汇的枢纽地方,又不能脱离军队保护的範圍。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偷税、漏税。

那么唐轮台的确切地点究竟在何处呢?经过近现代各族学者的多方探究寻觅,提出了黑沟说、米泉说、昌吉说、乌拉泊说四个不同的地点。归纳起来,这四个不同地点都在乌鲁木齐市及其周围地区,只是所述地点稍有不同罢了。不妨对这四个地点作些具体分析。

在文献记载上对北庭都护府至轮台的距离各不相同,《元和郡县图志》卷40“庭州条”：“轮台县,下,东至州四十二里”,这里所指四十二里肯定有脱误,与其他著作相勘校,“四”下当脱一“百”字,应为“四百十二里”。《新唐书·地理志四》“北庭大都护府”条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洛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依这些数字合计为三百二十里,如再加上沙钵城与冯洛守捉之间八十里之数,则为四百里,与四百十二里之数大致相仿。《太平寰宇记》卷156称:“轮台县在庭州以西四百二十里”。《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此大唐时北庭端府……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这些记载所说轮台县距北庭都护府之间的三百余里或四百余里,都非实测数字,只能算大概的估计。如果根据这些数字肯定唐轮台城的地点,必然会发生偏差,所以只能以300~400里左右的大概数,再结合地形、地理特点确证古轮台城所在地。

先从有人提出的唐轮台城在黑沟说观察。最早提出这一观点

的是清光绪年间跟随金顺、张曜来新的肖雄，他在《新疆杂述诗》中说：“古轮台在北路阜康县西六十里，今设黑沟驿处也。跨博达山处也，势踞高坡，远能眺望。唐之患重山北，因以阜康之黑沟驿为轮台。地踞高坡，五单于收于一望。而古城一带，土肥地广，故于此屯种焉。后世皆言北路轮台而忽于南路者，因岑参一歌而显。且北之轮台，地实凄凉……今尤城垣尽废，绝无居民，仅得邮亭驿使，守候檄传，寂寞山城而已。”并作《轮台》诗一首称：“古诗轮台动远愁，地头夜角汉唐秋。山河一统遗陈迹，雪暗邮亭冷黑沟”。^①此说一出，先后曾有好几位学者附和。可是从北庭都护府至黑沟不足三百里，特别是黑沟地区都是低矮丘陵、缺水，不适宜驻军和屯田；清朝虽在此设有黑沟驿站，据《新疆图志》卷79道路1载：“黑沟驿，驿书一，马夫七，马匹十四，月支薪粮，工食、料草，油烛，纸张等项六十二两四钱”。而清代学者洪亮吉、裴景福等过此时所记实情，始终只有四五户人家，因而经过考察，寻觅不到任何古城遗址。可断定唐轮台不会在黑沟。

还有人说，轮台在今米泉，因为在米泉“古牧地镇西北八公里处，东临沙河，村庄环绕，地面开阔。现在仍残存部分城墙，城墙高10米，宽4米，由土坯砌成。古城南北长556米，东西宽315米，占地175140平方米”。^②当地人民习称之为“大破城”，也叫“唐朝城”。据此张敏先生认为即唐轮台城，他在《唐轮台初探》一文中把米泉古城说成唐轮台城的根据是有现存古城可证，及距北庭古城的距离与史书记载相差不远，尤其是在轮台曾住过三年的岑参写

^① 肖雄《新疆杂述诗》卷四，《陕西通志》1892年版，第41~42页。

^② 张敏《米泉几处古城遗址与出土文物》，载余骏升主编《历史在诉说——昌吉历史遗址与文物》，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另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社科版）中说：米泉古城“位于米泉县城西北约五公里，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北角有一直角形转折。规模较小，南北约500米，东西约370米，周长约174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约5~10厘米。城墙基宽约6~7米，残高约3~4米。四个城角各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均有密集的马面，西墙有8个，北墙有5个，东墙和南墙保存不好，马面个数不明。北墙中部开一城门，系瓮城门，城内遗物较少，仅有少量陶片，其质地为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与后寨子古城的陶片一致。”

下了许多有关轮台的诗歌,特别对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所说:“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里明说轮台东门就是曲曲湾湾的浅山丘陵,可是米泉古城处在一片平原上,出东门也是平原,与诗意全然不符。于是张敏先生只好说岑参“写诗,并非纪实。不一定出轮台东门,绝对要符合‘山回路转’的地貌”。^①实际这是错误的认识,岑参西域诗所以永远充满生命力,就因其是写实。岑参的纪实诗推翻了米泉古城是唐轮台之说,还是陈戈先生说得好:如果把米泉古城说成唐轮台古城,就“只能控制哈密——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犁之路,却不能控制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之路”,这样就不能全面履行“征税北道”之责。^②因而米泉古城至多是唐代的一个守捉城,不可能是唐轮台城。

还有人说昌吉古城是唐轮台城,薛宗正先生于《唐轮台名实核正》^③一文坚主此说。此座古城位于昌吉市正东昌吉州治东北,“1964年实测城周3190米,今仅存东墙500米,北墙600米,城东北部出土唐代莲花砖……此外尚有出土开元通宝一枚,蒙古银币若干枚,足证此为唐朝遗址”。从北庭都护府古城至昌吉间的各古城遗址,以昌吉古城遗址最大,因而薛宗正先生说:“以上诸古堡废墟相勘比,具有县城规模者非此城莫属,例如乌拉泊范围仅2000米,格局狭小”。陈戈先生指出,昌吉古城“位于昌吉新城北边不远,其形制与米泉古城完全一样,只是范围略大一些,南北约1000米,东西约600米,周长约320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约6~8厘米,城墙基宽约7米左右,残高约3~6米。”^④确实它的规模比乌拉泊古城稍大些。根据考古学家陈戈先生分析,庭州古城(后堡子

① 《历史在诉说——昌吉历史遗址与文物》,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② 陈戈《唐轮台在哪里》,刊《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④ 陈戈《唐轮台在哪里》,刊《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古城)、米泉古城、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除了在规模大小上有差别外,其余在构筑方法(均系夯筑,夯层厚薄基本一致),形制结构均呈长方形或方形,均有角楼和密集的马面,城门为瓮城门等及出土遗物诸方向都是相同的,因此,它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从各城出土的遗物来判断,这几座古城当是建于唐代,也延续使用至元代”。^① 据此可断定,庭州古城属北庭都护府城外,根据《新唐书·地理四》所载“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扬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现有不少学者已基本考定,俱六城守捉为米泉古城;经百里至乌拉泊古城,即轮台县;由此向西北行150里至张堡城守捉,即今昌吉古城,由此而西渡过里移得建河,即今呼图壁河,再至玛纳斯河以东的乌宰守捉。因而昌吉古城只能是唐代的张堡城守捉,不可能是轮台县。如果强把昌吉古城作为轮台城,那就只能控扼由哈密经天山北路或吐鲁番去伊犁之路,却无法控扼由哈密——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吐鲁番间的道路,从而征税北道必然造成极大损失,可见昌吉古城决不是轮台城,同时与岑参诗中所描述的轮台城周围的风物也并不相符。

现在残存的吉木萨尔县后堡子古城、米泉古城、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四座古城的形制、规格大致相同,其中后堡子古城最大,因系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气势宏伟,名副其实,以米泉古城为最小,昌吉古城稍大于乌拉泊古城,为此薛宗正先生据城市大小论定只有昌吉古城才能当轮台古城。^② 对此,陈戈先生作了恰当的回答:“昌吉古城虽在范围上比乌拉泊古城稍大一些,但乌拉泊古城在大城圈内又套有两个小子城,子城墙上又有马面和瓮城门,从整个形势看,乌拉泊古城显然要比昌吉古城雄伟而严密。因此,米泉古城

① 陈戈《唐轮台在哪里》,刊《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薛宗正《唐轮台名实核正》,《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和昌吉古城应为‘守捉’或‘城’，而乌拉泊古城应为一‘军’”。^① 因为《新唐书·兵志》：“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同时指出在轮台驻有静塞军，可见轮台城的建筑必然要符合军的需要，必然要比守捉或城复杂和严密。

(2) 乌拉泊古城即唐轮台城

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 10 公里，乌鲁木齐河东岸，在东经 87°35′20″，北纬 43°38′40″之间，海拔 1 100 米，遗址残存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 550 米，东西宽 450 米，周长逾 2 000 米，城墙夯筑，夯层厚约 6~12 厘米，城垣底宽 5 米，残高 5~8 米，每面城墙都有密的马面，城墙四角有角楼，连内城都有马面，角楼每面城墙中部开一较大的瓮城门，城墙上向外的观察孔。在城内偏北部还有两个小子城，靠西面的小子城呈长方形，南北约 350 米，东西约 250 米，周长约 1 200 米，靠东面的小子城呈正方形，边长约 200 米，周长约 800 米，这些马面、角楼、观察孔、子城等建筑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并且在其东西有乌拉泊村烽火台、化肥厂烽火台、柴窝堡土墩、盐湖烽火台、永丰乡烽火台。在去塔里木盆地的通道口有阿拉沟东口石垒，高达 15 米，迄今依然耸立沟口，这些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工程系统。显然乌拉泊古城是一个驻军城，在古城内有陶片很多，同时还发现有完整的陶瓮、陶罐等，其质地、形制、风格与北庭及昌吉古城发现者大体一致。因而乌拉泊古城可以断定是唐轮台古城。

从唐代通向西域的线绸之路看，更可证实轮台城只可能设在乌拉泊地区，因为从中原通向西域天山北麓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必

^① 陈戈《唐轮台在哪里》，刊《新疆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

然以轮台城为交汇点。

在唐朝进入西域的丝绸之路中道已不走罗布泊、楼兰一线,而是走伊吾、吐鲁番盆地西去龟兹、疏勒或别迭里山口西行。通向天山北麓的丝绸道一般说都是通过天山的山间道路进入北部草原,再向伊犁、碎叶西进。

根据天山中的通道看,从远古起就自然形成了以下几条比较重要的通道,即:(1)从伊吾通向天山以北蒲类西行;(2)从伊吾经七角井西北越天山至木垒、北庭西行;(3)从吐鲁番越天山他地道至北庭;(4)从吐鲁番经白水涧道至轮台城;(5)由龟兹经黑英山越天山至乌孙;(6)由阿克苏向北越天山冰达坂至昭苏盆地夏台。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下东部天山的几条通道。

先说从伊吾北越天山至蒲类盆地的丝绸通道。在两汉时代这条路是和匈奴争夺西域的重要战场,作为丝绸道通行时间不多,唐朝统一西域后,虽然作为丝绸商道利用时间多了一些,但限于自然条件,一年所能通行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哈密北越天山,东西山势高达3400米和3800米,即使在近代修筑公路后,到达天山庙达坂处,海拔也达2800米,公路盘山而行。每年有10个月的风雪天气,尤其是严冬,冰雪封冻时,即使马、驼也很难通行,所以每年可以被利用的时间并不长。

从伊州至唐轮台之间翻越天山的第二条道路是从伊吾、七角井、一碗泉过天山与上述第一条路汇合后经独山守捉,庭州西行,与走他地道北出天山路汇合后西至碎叶,即《新唐书·地理志四》“伊州伊吾郡”条所称:“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之路。

从伊州西行北越天山的第三条道路是从伊州至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城,唐代称西州,由此向北有一条入马道行走在天山中,可直达庭州,被称为他地道,即《新唐书·地理志四》“西州交河郡”条所称“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

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与上述二条路相汇合后再西行至碎叶。这条路在《西州图经》残卷中还指出从“交河县界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①足见这条路虽是通向天山以北的一条捷径,但因山高路险,只能通人马,无法通车辆。尽管宋朝王延德也是经此道去庭州,但七角井道和他地道都因海拔高,路窄难走,不能常年通行,运送货物量少,难于成为重要的丝绸通道。

只有从吐鲁番盆地向西北走白水涧道至唐轮台城才是最平坦、足水草、通车马的道路。为何称白水漳道,因那里有一条发源于博格达山南麓,海拔2 000多米的白杨河,由黑沟、阿克苏沟、高崖子沟几条支流汇合后,经由柴窝堡盆地通过海拔已不及1 200米的峡口村至后沟天山断裂带时,海拔已不足1 000米,由此流向吐鲁番盆地艾丁湖。白杨河道较宽,窄处也近百米,平时河道内水流不大,水面不深也不很宽,车马无可涉水通过,因自吐鲁番盆地至轮台城的大道是沿着这条白杨河旁行走,两岸是浅山,故称白水涧道。而北出白水涧道就进入柴窝堡盆地,成为南北天山之间的一大谷地,东西长114公里,南北宽30公里,地势平坦开阔,盆地内汇集了来自南部天山的乌鲁木齐河、羊圈沟、水西沟,北部天山的白杨沟、博尔沟、三个岔沟、阿克苏干渠、高崖子干渠各水,形成珠帘似的大小湖泊、泉水,海拔较低的一条通道,在强盛的唐朝,更成为最重要的军事通道和最兴旺繁荣的丝绸大道,从而唐轮台也就成为军事重城和丝绸商城。

柴窝堡盆地的风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它适处在东西两个峡谷之间,所以由西而东的寒潮一来,就从准噶尔盆地穿过峡谷,进入盆地,于是刺骨寒风肆虐。而在冬春和秋冬之交的过度季节,由于吐鲁番盆地气温、气压快速升高,准噶尔盆地气压又下降较快,在

^① 《敦煌石室遗书》。

二大盆地上空产生气压梯度,使位于天山中间,东西宽、南北狭的柴窝堡盆地形成东风劲吹,并且一场连着一场,于是乌拉泊和达坂城成为有名的风口。但是在每年阳历4月至10月间,柴窝堡盆地因受南北天山的阻隔,因而在这段时间内少风、少雨,偶而有风,风势也不大。道路在博格达山南麓的山前台地上,全年无洪水之扰,同时砂石道路也无翻车滞马陷车之忧。即使在季节交替,多强风、劲风时,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也创造了一套适应风势行路妙策。根据地形地理实情,贯通天山南北的通道,只有从吐鲁番盆地循白水涧道、柴窝堡盆地至唐轮台城、准噶尔盆地的路线最为平坦、宽阔,路况最好,海拔又不高,常年可通车马,可以说是军事通行和丝绸商贩最安全最便捷的路径。

实际唐轮台城究竟在哪里,被称为西域诗泰斗的岑参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在唐轮台城住了三年,《首秋轮台》歌中说“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并且是十分不平常的三年,因为他那时是以伊西、北庭节度副使,仅次于都护兼节度使封常清的军政要员身份住在轮台,身负重责,既要协助封常清指挥军事,又要为维护统一,安定西域,加强民族团结日夜操劳。所以他对轮台城及北庭、伊州、吐鲁番盆地、龟兹一带的通道及自然实情最为熟悉。只要真正读懂了岑参所写的各种轮台诗歌,就可弄清轮台城的确切位置了。

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诗说:“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人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全是写实。唐代自吐鲁番盆地向西北沿白水涧道进入柴窝堡盆地后,就沿着盐湖、柴窝堡湖、乌鲁木齐河东侧进入轮台城。此城东北紧邻终年积雪不化,高达5445米的博格达峰,那里远古以来就是雪海、冰海,在几十公里外,就可看到耀眼的博格达冰峰雪岭。而岑参又把自白水涧通达唐轮台城的丝绸大道别称之为走马川,所以“走马川行雪海边”,十分形象,一到冬季,整个柴窝堡盆地是雪海,即使在春夏秋时博格达宽大的山体也是雪海。而轮

台城旁的乌鲁木齐河一入冬季就无水，河床躺满各种大小碎石，狂暴的大风一刮，满河川的碎石被风吹得乱滚。近三十年住在古轮台城旁的徐百成先生屡屡见到这种景象。他说：“当地下雪后即刮东风，风沙很大，几乎整个冬天不能存雪，秋冬之交的头几场风多为黄沙风，漫天阴黄，沙石满地走。既飞白雪又滚黄沙是这片戈壁的特点。乌拉泊的夜风更是加紧地吼。风天，全天只有早晨十时左右和晚六时左右风力较弱一些，‘风夜吼’所述实为纪实。”^① 据现代气象测定，达坂城以西与乌拉泊古城间的风口经常出现12级大风，特别是三个泉附近“三十年一遇的特大风为55米/秒，而百年一遇的特大风速达60米/秒”，大风竟能吹翻铁路货车。“1971年元月9日一次就吹翻货车十节”。^② 因而吹着卵石滚动是常见现象。而岑参诗所说“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也全是写实。久住唐轮台古城的徐百成先生证实：胡天八月即指公历九月，乌拉泊地区近三十年中最早是在9月5日下雪，由于古城环水，空气中湿度较大，尽管这里风多风大，但也有不少风和日丽的时候，俗称“下树挂”的天气，那时“团团浓绒的霜花挂满枝枝干干，很是喜人，这时天气和煦，空气水分较大，‘梨花开’和‘湿罗幕’十分逼真”，^③ 而岑参诗中所说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只有乌拉泊古城所在地是这样的地形，因为唐轮台城的东门以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地貌，确是一片泉眼，汇成多条小溪流入乌拉泊湖，于是平川中形成含沙细粘土，成为细软虚泡地而，很难行走，雨天更是艰难，所以古道都是沿城东北天山丘陵带行走。

① 徐百成《读诗试考证轮台地望》，此文后收录《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贺大良《达坂城的特大风》，《地理知识》1981年第4期。

③ 徐百成《读诗试考证轮台地望》，收入《轮台丝路今觅处》。

唐轮台周围的地形及气候实情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昌吉、米泉、黑沟数处古城所可比拟的。特别是岑参诗“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更具体说明了岑参于天蒙蒙亮骑快马从轮台城出发，当天晚上就到了交河城；那么这里所说“按胡俗”是什么样的行路风俗呢？实际就是长期生活生产于这地区的各族人民，抵御和战胜狂风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行路经验，即在风季必须顺风行路，路途中驴死弃驴，马死弃马，不可顾及，自唐轮台城至交河城一日间就可到达。岑参正是选择了当时正刮西风，就按当地只能顺风行路的习俗，一日之内赶到了交河城。有些人提出来唐轮台位于昌吉或米泉等地望的说法都是不可能在一日内骑马赶到交河城。可是薛宗正先生在《唐轮台名实核正》^①一文中强调说轮台与西州相距540里“无轮多快的马，一天也决不可能跑完540里的路程”。要知这540里是指到高昌所在地的西州，一天当然跑不到；而岑参诗中所说是从乌拉泊的唐轮台至吐鲁番城西10公里的交河城则为156公里，在阳历9月的唐轮台地区白天长达11小时，如有好马，又乘顺风，一天之内完全可以到达。

以上所述，已可证明岑参的西域诗中早已指明唐轮台的确切地点，就是今日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而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中更说：“汉兵屯在轮台北”。可知派驻唐轮台的静塞军主要屯驻在唐轮台城以北，即今乌鲁木齐市所在地，并且史书还指出屯驻轮台城北的唐军，使得“轮台、伊吾屯军，禾菽相望”。这为后来乌鲁木齐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唐轮台城风大、土少、戈壁多，绿洲面积不大，不适宜大部队屯驻，而从轮台城北出准噶尔盆地边缘时，地形开阔，土地肥沃，平日风势也大为减少，大可发展农业、牧业，所以乌鲁木齐地区古今来都是重要的屯垦区域。依此农牧业生产就有充裕的粮、肉供应轮台城各

^① 薛宗正《唐轮台名实核正》，《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级官员及丝绸商贩们各种衣食供应,这也是重要军城、商城所必备的物质基础。

从岑参先后两次到西域所写的诗歌看,第一次作为高仙芝的幕僚时,自伊州至莫贺延碛西经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至龟兹都是经行天山南路之道。而第二次作封常清的幕僚,常住轮台三年期间经行之道也是从伊州,沿莫贺延碛至赤亭、高昌、交河,循白水涧道至轮台城,他多次来回都是走的这条道,从未走过伊州—蒲类道,伊州—七角井—木垒道,高昌—北庭道。由此也可证明自伊州经赤亭、高昌、白水涧道至轮台城是最繁忙畅通的丝绸大道。据此,唐轮台城才形成天山以北草原道上的唯一收税城。

(3)唐轮台城周围地区的人类活动遗迹

唐轮台城座落于天山山区的柴窝堡盆地,那里水草丰美,适合于人类的活动。据考古发现,在柴窝堡湖的东北和西南有比较密集的细石器,以细石核的锥状、柱状、船底形等,石片石器的尖状器、刮削器等为多,还有少数细石叶,或以细石叶为料加工的细石器。有的学者分析这些出土的细石器工具的类型,制作工艺,“具有比较原始、古老的特征,估计是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原始社会遗址”^①。并在柴窝堡湖东北见到不少南北排列的圆丘形封土墓;乌拉泊水库西岸曾发掘过一批车师人的墓葬,所见随葬文物与吐鲁番盆地所见古车师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具有相同的特征。在达坂城附近的山沟中,还发现有地表堆石的古墓葬,可见在柴窝堡盆地从远古起就有人类的活动。

正是由于柴窝堡盆地及其周围山区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所以

^① 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2页。

从远古起就有比较发达的狩猎业和畜牧业。在盆地内已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羊骨及小铁刀等,就是柴窝堡盆地内古代各族人民繁殖畜牧业的佐证。特别重要的是在柴窝堡盆地周围天山山区中迄今留存着不少极为重要的岩画,分布于“乌鲁木齐市艾维尔沟、二道沟、库尔嘎克萨特沟和豹子沟,乌鲁木齐县高崖子牧场的高崖子沟和豹子湾沟、西沟乡黑沟、柴窝堡乡白杨沟和三个山沟等多处有较集中的岩画”^①。这些岩画上凿刻着盘羊、北山羊、鹿、马、骆驼、狼、狗、蛇、氏族部落印记、猎人、牧民、男女舞蹈图等,不仅表现了活跃于草原的各种兽群、畜群,同时也表明了狩猎业、畜牧业的发达,还有各种健身舞蹈图像,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柴窝堡盆地及其周围山区草原中各族人民狩猎、放牧等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

从柴窝堡盆地出白水涧道向东南,很快就到了车师前王庭交河城,因而柴窝堡盆地主要是远古车师族及其先祖生息活动的重要区域。再从白水涧道的三个泉地区转向西北不远处就到了托克逊县科普加衣镇,适位于天山南麓的前山带。在科普加衣镇周围,有一大片属于车师族的古墓地;再由此前行数十米的浅山丘陵区就有一大片原始社会时期丰富生动的狩猎、放牧岩画,以及虎、豹、狼、鹿、骆驼、马、牛、羊等兽群、畜群,特别还在一块岩石上凿刻了巨幅水利图,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第一幅水利图,有重要学术价值。^②

唐轮台城所以重要,除了它是由中原通往天山北麓西达碎叶的草原丝绸之路及军事战略重地外,同时由此向南,穿越天山断裂带,还是通往龟兹、塔里木盆地及伊犁的军事、丝绸通道,即由羊圈

^①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队《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② 苏北海《新疆托克逊县科普加衣岩画》,周普葆主编《丝绸之路岩画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6页。

沟经艾维尔沟、阿拉沟进入塔里木盆地和西去伊犁河谷,全程山势不高,坡度不大,路径曲折少,沿途有鱼儿沟石垒、阿拉沟大石桥、通讯营石结构遗址、夏尔沟城堡和众多古墓葬。考古部门于20世纪70年代曾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东口发掘过四座竖穴木椁塞人墓,在“墓葬地表见块石封堆,圆形,直径5米多,高不足1米。封堆周围见矩形石垣,东西向,长15米,宽10米左右,墓葬彼此成东北、西南向,链线排列。”^①属战国到西汉时代,随葬文物则有多量金、银、铜、铁、陶、木、丝、漆器、牛羊骨,而以金器最多。铁器方面有小铁刀,长11.5厘米,与盛羊骨木盘放置一起,铁镞则为三棱形,表明塞人于战国时期已使用铁,而马、牛、羊骨杂陈于墓葬中,特别是羊骨与小铁刀并陈于木盘中,更说明了墓主人生前以肉食为主的生活,畜牧业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的主体,《汉书》说塞人经济是“随畜逐水草”,得到确切佐证。

由于唐轮台地区从远古起就有车师、塞人、乌孙、匈奴等族人在此繁衍生息,因而留下了许多古老而又光彩夺目,富有永恒生命力及诱人魅力的文化遗存。如留存的古墓葬群很多,据乌鲁木齐文物普查方面的初步统计,“墓葬共85处,青铜器时代—汉代的30处(包括3处发掘过部分墓葬的墓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47处,铁器时代的一处,清代的5处;另外,有两处已发掘完的墓地,春秋—汉代的一处,唐—元代的一处。”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山前丘陵,多位于河道两岸的台地,相对比较集中的则多于河流的沟口地带。”^②如鱼儿沟南岸铜矿墓葬、艾维尔沟北岸温格爾霍拉墓葬、迪根萨拉乐沟口墓葬、一道沟口墓葬、阿拉沟南侧喀拉盖萨拉沟口台地墓葬、方家沟北口墓葬、苇子街村墓葬、苏拉夏

^①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钩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②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队《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沟口东墓葬、夏尔沟口墓葬、三个山沟东岸台地墓葬、柴窝堡湖墓葬、高崖子沟墓葬、黑沟渠首墓葬、阿克苏河渠首墓葬、东沟西岸台地墓葬、东河坝西岸台地墓葬、石人子沟西岸台地大山梁墓葬、西白杨沟东侧台地墓葬、仓房沟台地墓葬、板房沟村墓葬等。

博格达山及其周围地区是突厥族先祖重要发迹之处,公元6~8世纪突厥汗国统治西域时期,柴窝堡盆地属西突厥汗国管辖,遗留下的石人像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在尚能找到的石人像有芦苇沟乡石人子沟的村内及近处,水西沟乡庙儿沟村西100米处有石人,芦苇沟乡葛家沟村西南约800处有石人,这些石人是突厥汗国及其以前各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但在历史发展中,许多石人已被人为破坏,现在残存的几尊弥足珍贵,应妥加保护。

唐朝统一西域后,不仅在乌拉泊湖畔建立了唐轮台城,而且为了保卫这个重要军城和商城,除在轮台城北屯驻静塞军外,还在轮台城周围设立了烽火台,作了周密的防卫措施,正如岑参诗中所说的:“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以及进出吐鲁番盆地的白水镇城和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鱼儿沟石垒、夏尔沟城堡等,构成了一个重要军事设施网络,以保护丝绸商道和军事通道。

现在残存在轮台周围的烽火台,可以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加以开放和利用,为此,特把几个烽火台的简单形制介绍于下:^①

盐湖烽火台 位于盐湖北岸,居一小山丘上,烽火台残高6米,顶部面积25平方米,基部南北15米,东西14.5米。为一土坯建筑,上部土坯横砌,中下部竖砌。土坯均以黄土模制而成,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11厘米。从南部看,自地表1.5米以上,每70或100厘米见一层灌木枝或芦苇。据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1075±75年。

永丰村烽火台 位于天格山北麓的山前戈壁地带,属在乌鲁

^①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队《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木齐县永丰乡永丰村一队北约 1.5 公里太平渠东岸。烽火台保存基本完整，夯筑，夯层厚 8 厘米~13 厘米，夯土中夹少量砾石。烽火台立面呈梯形，基为方形，边长 12.5 米，顶宽 7.4 米，高 9.5 米。从南侧看，由底至顶有四层加固棍，每层 4 根，棍径 10 厘米左右。

新疆化肥厂烽火台 位于化肥厂以北的丘陵地带，其南为红卫湖及沼泽地，东北有丘陵戈壁。烽火台座落于一个较平缓的小山包上，大部已毁坏，现仅剩一圆形土堆，直径约 40 米，高约 5 米，由东向西倾斜，东侧上部见夯筑痕迹，夯层厚 7 厘米~10 厘米。烽火台东北 75 米处有一矩形土堡，长 63 米，宽 48 米，高约 1 米。墙外有宽 3 米、深 0.8 米的壕沟。土堡内散布一些黑褐釉瓷片、青花瓷片、绿釉红陶片等物。

乌拉泊村烽火台 地处天格山北麓的山前地带。属托里乡乌拉泊村居民区内。烽火台残高 5.1 米，夯筑而成，夯层厚 8 厘米~15 厘米。其四周均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仅东部保存较好。顶部南北长 7 米，东西宽 5 米，国家测绘局在上立有标志。底部基本呈正方形，边长 10.1 米，东北、东南角各有一个 2.5 米×2.3 米的缺口。

柴窝堡遗址 位于柴窝堡湖北约 1.3 公里的戈壁滩上，其北为草滩，东南为广阔的戈壁沙滩，西约 500 米为能通行的沼泽地，直至湖边，现遗址已坍塌，残存南北长 18 米，东西宽约 12 米，高 2.6 米。遗址东北、西南还各有一处遗址，现仅剩残墙断壁。东北方一处，长 58、宽 36、高 2.6 米，墙厚 0.35 米~0.7 米，夯筑而成。西南一处，长 32、宽 18、厚 1.8 米，墙厚 0.5 米，夯筑。在遗址内外，散布青白瓷片、粗瓷碗底、绿釉红陶片等遗物。

在柴窝堡盆地东端的白水涧道上，唐代为了保护通向轮台城的军商大道，在白杨沟峡谷西口建立了一座城堡。现在这座古堡保存尚完整，位于达坂城镇东南约 4 公里，在峡口北部高约 4 米的小石山上，北面是沼泽，南邻后沟，西距乌库公路 500 米左右，东有兰新铁路。城堡虽不大，却有内外二城，平面略呈方形，城墙取当地碎

砾石夹壤土夯筑而成,有些部位夹芨芨草及苇束,夯层厚8厘米~20厘米,文物普查报告中说:“外城周长约360米,北西二墙陡直,东南墙略呈弧形。以保存较好的北墙看,高5.2米,厚3.8米,上筑女墙,高0.7米,厚0.8米。西北隅建角楼,西南角的墙外,距墙约13米处,修一段护墙,残长10米、高0.6米。内城略呈方形,位于外城西北角,南北长42米,东西长45米,高4米。南墙中部见宽8.5米的豁口,似为城门,城内采集的文物有红陶、釉陶片及瓷片。”^①有人考察这座古堡后说:“这座古堡,利用岩石地势,凭借精心构筑的堡墙,就如在峡谷通道口安设了一座坚实的塞门,真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难行”。^②唐代就是凭借这一古堡控制这条峡谷通道,控制通往轮台城,通往天山南北的交通大道。

由于达坂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达坂城近旁,还有东河坝土城,苇子街古城,另在阿拉沟与夏尔沟口交汇的阿拉沟南侧台地上有一城堡,南离阿拉沟公路10米。城堡遗址“平面作梯形,东、西墙分别长17.7、19.8米,南北墙各长6.2、8.7米。墙为双层,其间加草拌泥,均以砾石座泥夹树枝垒砌,有的地方有直径约10厘米的加固棍。墙最高处约4.3米,基宽3.6米。北墙中部外侧,见一段土坯设施……其高、宽各为1米。遗址内发现少量红陶片及灰陶片”。^③由上各种文化遗存可知,在唐代通往天山以北的丝绸及军事大道上以轮台城为中心,伴之以周密的烽火台,白水镇城及其他古城;而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山区要道上也设有雄伟、坚固的鱼儿沟石垒、阿拉沟石垒、夏尔沟城堡等军事设施。

^①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队《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② 王领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2页。

^③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队《乌鲁木齐市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4)岑参轮台诗歌的重要学术价值

岑参(715~770年),河南南阳人。父亲早逝,年少孤贫。但聪颖过人,勤学苦读,称誉乡里。二十岁时即到长安献诗阙下,渴望进阶仕途,可是数受冷落,直到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才中了进士,先后做过率府兵曹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等小官。但他来自民间,又博学多才,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急求报效祖国之途,而盛唐时代中国之政治、军事重心则在西北,尤其在西域大地。因而于天宝八载(749年)满怀报国和安边热忱的岑参,随同高仙芝前往西域,大约两年多时间内,事业并不那么称心。尽管察看了西域广大土地,却并未写出多少诗篇,说明他并未为高仙芝所重用;同时也说明岑参对高仙芝的为人及事业不甚敬重,显然《旧唐书·高仙芝传》指出的“仙芝性贪”,必然为岑参所不悦。这样的将帅,不可能识才、擢才。

只有到了天宝十三载(754年)岑参为封常清识拔时,才能以相见恨晚的情谊同赴西域,为唐代统一西域,巩固西陲的伟业立下不朽功绩。

为什么封常清会赏识岑参,这与封常清的出身、博学、具有政治远见和爱国热情分不开。《旧唐书·封常清传》中指出,封常清的外祖父,因罪流放安西(今库车)守胡城时,常携常清于城门上教其读书和观察西域风物。可见封常清从幼年时起就对西域民族风情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但他身材细瘦,眼睛细小,再加脚短腿跛,称得上其貌不扬。为此数谒高仙芝而不得重用,他愤然对高仙芝说:“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愿,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见封常清的所以能被提升为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安西四镇节度、伊西

节度等使,全是凭着他的知识才能,为唐朝在西域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样一位忠诚谋国的守边将帅才能真正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也才能真正赏识岑参这样难得的人才。而岑参得到封常清的知遇,他蓄积已久的才华才能像长江、黄河之水一样,不可阻挡地奔腾向前,如实地写出了千古闪光的不朽诗篇,大大补充了历史、地理、民族等史书记载的不足,并把西域诗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

天宝十三载(754年)四月岑参第二次去西域时的性情就同第一次投高仙芝幕府时的情绪大不相同了,爱国的热情像泄闸的流水一样,一泻万里,不可抑止。实际他在第一次去西域时所写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已充分表述了他所追求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而在第二次去西域之前的《送人赴安西》诗中更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岑参才能全力献身于大唐的统一和繁荣富强事业,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怕苦和险,从而他所描述的山水、沙漠、戈壁、狂风、大雪、寒冰等都融入了他的生命,印刻着大唐创业者的足迹。

岑参西域诗歌最大特色之一是写实,所以岑参的西域诗歌不仅是文学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同时还对盛唐时期经营西域取得的功绩,有了令人信服的确凿记载。自从岑参跟随封常清第二次来到西域后,荷蒙拔擢,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经常为封帅出谋划策,并能驰骤于高山草原,荒漠戈壁,所以他在诗中自白说:“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土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可见岑参既是谋士,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因此他笔下有关西域战争的诗歌,能道出战争的实质。

在高仙芝为唐代安西副都护时,虽然征讨大小勃律地区的吐蕃势力时取得了胜利,但因其性贪,没有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所

以战争不断,在塔拉斯河与大食军一战大败,诚如岑参《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诗中所说:“晓笛别乡泪,秋冰鸣马蹄。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谿”。随着这种局势的发展,吐蕃势力在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一线有所发展,因而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封常清被提升为安西副大都护,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后,首先对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一带的民族关系作了妥善处理,取得了不战而胜的辉煌功绩。接着给盘踞在且末地区播仙镇的吐蕃势力以沉重打击,由是天山南路得到了比较稳定局面。为此,岑参特写下了《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赞扬了封大夫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原来游牧于伊犁河、楚河一带的突骑施部,一向忠于唐朝,由于唐政府在西域的个别边将在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引起不满,掀动干戈,封常清又决定亲率军队前往镇慑。由是岑参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二诗中,以气势磅礴的笔锋描述封常清这支部队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怕严冬寒雪,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气概集结在轮台城北,衔枚西进,结果没有经过战斗,就安定了伊犁河、楚河一带各族人民的心。从而岑参在《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盛赞封常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绩说:“胡地首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山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欲笑霍骠姚,区区徒尔为”。岑参把封常清用兵如神的战略,未经战斗,就使“降虏来如归”,评说其功绩在汉代霍去病之上。

封常清在西域战无不胜的奥秘,是他赤胆忠心为大唐事业献身,加上他从小就在西域长大,对西域各族人民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十分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在封常清的思想影响下,岑参也十分重视团结少数民族,他事事处处和协各族人民,因而在他的西域诗歌中写下了不少民族和睦、亲如一家的动人诗歌: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
将军纵博场场胜，踏得单于貂鼠袍。

——《赵将军歌》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
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形。
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

这些诗篇充分反映了经过封常清的大力平叛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工作，这种卓有成效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在西域各族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天宝十四载（755年）中原发生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后，封常清即被调往中原平叛，在西域仅留下了各族的老弱残兵。安西及北庭都护府的机构虽未撤销，但也仅派留后负守边之责。不久，陇右一带为吐蕃侵占，于是西域通往中原的路全被切断，西域处于孤立无援，孤军奋战的状态，在这种十分艰苦危迫情况下，竟然守卫西域长达30多年之久而未失土地。《新唐书·郭昕传》载：“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关陇陷，不得归，朝廷但命官遥领其使。建中二年，昕始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诏曰：‘四镇、二庭，统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与率职。自关陇失守，王命阻绝，忠义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

守将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今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姓李，更名元忠。听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诸将吏超七资叙官。”《资治通鉴》卷 227 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六月，“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闻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

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万里孤悬，中原阻绝，南有吐蕃，西有大食，北有游牧各族，纷纷扰攘。安西、北庭境内，番汉杂处，粮断饷绝，军疲民贫，首尾难于相顾，郭昕、李元忠受命于患难之际，置生命于度外，以少有的谋略和智慧，团结西域各族，克服难于想象的困难，团结奋战，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谱写了一曲英雄史诗。《资治通鉴》指出：“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缿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戒逻戍，万里相望。”安史乱后，中原戍卒来源断绝，只好征集本地少数民族人民。在今新和县属通古斯巴什古城内，1928 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那里发现“罗文罗”（织品）残片及大历十四年（779 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等文物多件。^① 这里的白苏毕梨当为龟兹人的屯田戍卒，同时还出土了汉人屯田戍卒间的借米粮契。说明自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与中原间声闻隔绝，内地汉人戍卒已难至西域，只能征募龟兹人为屯田戍卒。这些文书说明了艰难支撑危局的实情，同时说明西域各族人民心向唐朝的坚贞情谊。如果没有民族间的真诚团结，在兵饷全部断绝情况下，是征不到少数民族战士的。可知西域历史是唐代西域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心愿缔造的历史。

在安西北庭境内有许多醒目的烽燧，像钢铁卫士一样耸立在大漠、戈壁、丘陵间，成为守卫西域的重要军事设施。在唐代的这些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5 页。

烽燧中,近代考古不仅在那里出土了建中通宝钱,同时还出土了芨芨绳头、麻绳头、麻鞋帮缘、麻秆、麻毡、麻毯、麻绳头是用许多索子一样的麻线编织而成。这些都是安史之乱后,西域唐戍卒的手工作品,所见麻秆的麻产于当地,麻鞋即是饷原匮乏的烽卒在艰难苦斗的环境中制作而成。

郭昕于建中二年(781年)秋七月被唐政府由四镇节度留后擢升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副大使后,更加英勇地和吐蕃贵族进行战斗。一般史书都把安西都护府的陷落写为贞元六年(790年)北庭陷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被回纥大相颉干迦斯所杀之时。可是根据考古发掘及龟兹石窟壁画所见与贞元六年之说不符。因为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四章中指出,在拜城克孜尔石窟所获文书有“贞元七年(791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及“□□节度押芽特进太常卿”;而在克孜尔干佛洞内更有“贞元十年(794年)的题记”。足见第8世纪90年代龟兹地区仍在唐朝军民手中。

在名将郭昕指挥下,北联回纥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和吐蕃贵族展开了浴血奋战。直到9世纪初,吐蕃贵族可能仍未牢固占领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为据《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①中说:“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指保义可汗——引者)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复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教授,吐蕃,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天可汗躬擐师旅,大败贼,奔逐至真珠河(今那林河)”。按保义可汗在位时间为808~821年,总观上述碑文,在保义可汗进攻龟兹的吐蕃时,很快就把吐蕃占领军击溃,至少表明吐蕃军队在龟兹还立足未稳,或者说郭昕统带的唐军仍未退出龟兹境,因而在回纥军队进攻龟兹时,与唐军相配合,很快赢得了胜利。诚如由常袞为德宗皇帝起草的《谕安西、北庭诸将制》中所说的:“……战事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急,以战则克,

^① 罗振玉校补《和林金石录》。

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稜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每念战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甲，白首戎阵，忠劳未报，心之惻怛，难忘终身。要当侯大旆所指，穷荒荡定。悬爵位以相待，倾府库之所有，以答西州贤士大夫忘身报国之诚。”^①

这永照人间的历史奇迹，是如何得来的呢？首先得归功于盛唐时期站在世界前列的发达经济和灿烂文化，为西域各族人民所向往，同时又有比较开明的，为各族人民乐于接受的宽和的民族政策。但是要做好民族团结的工作却非易事。在东汉，班超团结好了西域各族人民，就无往而不胜；可是继任的都护任尚，没有重视这个根本的工作，就很快发生战乱。同样，在唐代高仙芝负责西域军政时，西域祸乱迭起，从而继高仙芝主政西域的封常清及其助手岑参就特别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经过几年努力，不仅平定了各种战乱，并且做到了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经济文化发展，在整个西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尽管封常清任期未满，就因安史之乱而被匆匆调往中原平叛前线，但在岑参协助下所做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工作却在人民间深深扎下了根，这就为安史乱后，唐代西域军民数十年艰苦奋战培植了土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知为什么在岑参西域诗中没有一句赞高仙芝的话，而对封常清的历史功绩却备加赞扬，难道是岑参的偏爱吗？历史作了确切的回答，绝对不是岑参对封常清的偏爱，而是岑参对一个在西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其影响所及，就产生了唐军孤守西域30多年的奇迹。这些功绩当然也有岑参的一份。从而可知，岑参不仅是杰出的爱国者和西域诗的泰斗，更主要的是以他的智谋和封常清一起保卫了西域这块辽阔的疆土。岑参的西域诗是不朽的，他守卫西域的功绩也是不朽的。

^① 《唐大诏令集》卷116。

唐代龟兹境内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军事屯戍设施

(1) 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屯戍古城

考定安西大都护府的府址设在龟兹王城内后,就可进一步看到唐代为了保卫大都护府的安全曾作了周密部署。究竟如何部署,在史书上虽缺乏明确记载,但从残存的军事设施遗迹看,仍可见到大唐经营西域的恢宏气派和坚固的军事建筑。史书明说驻于龟兹的汉军多时三万,少时二万四千人,不包括本地都督府所属的民族武装在内。这些军队不可能都集中于龟兹王城一处,必然分散集居于龟兹境内各险隘要害之处。根据《唐六典·屯田郎中员外郎》的规定:“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可知唐朝戍守西域的边防军,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除战时外,都要参加屯田。因此,凡有驻军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屯田区,无论军队多少,都要量力屯种。从而在各守捉城、各烽戍、各州县还有很多小规模屯田。可知各地遗留下的唐代屯城,也即唐代的军营所在。据此,略述唐代在龟兹境内的主要军营分布点。

从渭干河边的柘厥关向西,沿着雀离塔格山麓,至新和县城西北 10.4 公里,属大尤都斯乡的托普古城,处于北纬 $41^{\circ}34'$,东经 $82^{\circ}30'$,城方形,海拔 1 012.7 米,面积 3.8 万平方米;南北长 190

米,东西宽 200 米,周长 590 米,城墙厚 10 米,墙高 6 米,有六处缺口,估计为城门出口,城墙均用土块筑成,经多年风雨侵蚀,现已成土圉墙。古城内东部有一长 25、宽 25、高 6 米的土台墩。围墙四周及城内有长满骆驼刺、红柳、芦苇、苦豆子、胖姑娘等花草,绿草滩一片。城外东西两面已辟为农田,种植小麦;城北缺口前有一条 6.5 米宽,东西走向的排碱渠。已被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确定为唐朝遗址,应即唐朝戍兵军营,周围为其屯种之地。这里位于渭干河以西,土地肥沃,水源较充足,地位重要,既可拱卫安西大都护府,又可控扼雀离塔格山间通道,斥埃拜城盆地动静。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 25 公里左右有一座通古斯巴什古城,靠近沙雅县辖境,也为唐代的屯戍之城。正方形,城周长 825 米,占地 72 亩(此处亩为旧制)。今残存城垣宽约 10 米,平均高 3 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现今仍高 6 米以上,气势雄伟,城墙夯土基,土块砌成,有南北两座城门,城门两侧有箭楼,城垣每 50 米有一箭楼,城内虽已开垦种植苜蓿,但其起伏不平之状,可推为当时建筑物的遗痕。在通古斯巴什古城西南方向直距 5.5 公里处还有一古城,方形,残存城垣高约 2 米,长约 250 米,宽 150 米,被称为“布特巴什博海尔”,维吾尔语意为“佛头城”。这是又一座屯戍之城。

唐代在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敌人是吐蕃贵族,因而更要在其入侵的要隘通道上屯驻军队,常备不懈。位于沙雅县西北的央达克协海尔古城就是重要的屯兵之城。据《中国名胜辞典》埃格麦里央达条下释文称:“在新疆沙雅县城西北约四十公里处为古龟兹和唐安西都护府属城之一,城作方形,为夯土筑,墙基残存高约 1 米,有三重,外城周约 3 351 米,内城周 510 米,中有土阜一线,似塔庙遗址,城中沙阜累累,未见遗物,曾出土桥纽铜质图章、刻字木板等。”这与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所说“羊达克沁大城”的内城周及残存墙高等相同,可知为同一古城。埃格麦里即今英买力乡的同音异译,央达即羊达克沁的异译。在 1980 年出版的《沙雅县

地名图志》中更译为羊达克协海尔,也系羊达克沁的异译,并把该古城确定在沙雅县城西北 21.7 公里处,这比较允当。在这古城中出土了“开元通宝”及有建中年号的钱币,并有陶器、陶片甚多,还有磨粮食的石磨。特别是 1981 年 6 月在央达克古城东南角一尺许的地下,发现了呈正方形排列的四口特大陶罐,均为细土质红陶,外呈黄白色,其形状为细高鼓腹状,分四截制造而成,罐高 1.59 米,罐口周长 1.38 米,细颈周长 1.34 米,腹部最大周长 3.46 米,底部周长 1.65 米,陶罐壁厚 2 厘米,陶罐的腹部从左至右竖行书写了^{薛行军}_{监军}五个毛笔字。^①这个“薛行军”就是《新唐书·西域传》所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因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佐焉耆叛而命将阿史那社尔率军十万讨伐,龟兹王大败,于是“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薛万备以精骑穷蹙六百里,王计穷,保拔换城,社尔围之。阅月,执羯猎颠”。这一仗不仅平定了龟兹,同时还在薛万备的建议下,乘胜威服了和田,阿史那社尔即“遣万备率五十骑抵于田之国,万备陈国威灵,劝其入见天子,伏闾信于是随万备来朝”。这个薛万备就是陶罐上所书的薛行军。可见央达克协海尔是一个重要的驻军之城,因为这里正当吐蕃南面越塔里木大沙漠入侵龟兹的要道。

从央达克古城向南及东南,即渭干河东西两边及塔里木河北一带寻迹,同样有自东至西一连串的屯戍城堡遗址,如在央达克古城西南 6.7 公里处有尤瑞克古城,维吾尔语意为“明亮的城”。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则称此城为“月勒克泌城”。在尤瑞克古城西南 7 公里处,又有铁热克古城,维吾尔语意为“胡杨城”。1987 年夏我在此二古城中考察,见城中散布着各种陶片、陶壶甚多,还有打碎了的磨盘。即使用鞋稍踢开泥土都有碎铜烂铁、锈蚀了的铜钱及各种陶器。如加发掘,一定可获得许多重要文物。

^① 吴疆《薛行军陶罐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再从铁热克古城向东南至塔里木河以北还有唐代遗存的一系列古城,如现在残留城垣较显著的博斯坦托格拉克古城,在今沙雅县属塔里木乡政府驻地东南 8.5 公里处,离沙雅县城 45 公里,南距塔里木河 3.5 公里,西距柏曼水库 2 公里的胡杨林中。博斯坦托格拉克为维吾尔语语意“胡杨的绿洲”。外围古木矗立,地形平坦,有南北走向的自然沟位于古城之西。今残存城垣南墙约 570 米,东墙约 30 米,距内城 50 米外有一土丘环城,可能是外城垣遗迹。这城也系屯戍之城,防御塔里木河南面来的敌人。

由此向东至库车县境内哈拉哈塘乡北 10 公里处有克孜尔古城遗址(又称羊达克沁,即长满骆驼刺的城),位于北纬 $41^{\circ}43'20''$,东经 $83^{\circ}12'$,海拔 914 米,城方形,每边长 110 米,外有护城河,宽 20~25 米。护城河底和城垣高度相差 6~7 米,城四周筑有马面,在城中出土有“建中通宝钱”,绿釉陶盃、罐、磨片,红陶片、粗砂黑陶片、骨殖和木炭,另有一大陶罐,无釉黄皮红陶质,无耳朵,上沿厚 3 厘米,上口直径 25 厘米,大部分保存好,不过比薛行军陶罐稍小罢了。可能系储粮之物,表明这城系屯戍军营,于 8 世纪还在活动。

从克孜尔古城向南经哈拉哈塘乡再东南行 10 多公里,即到维吾尔语称为“穷先”的大古城遗址。在库车县城东南 60 公里的草湖戈壁中有一“顷布阿尔古城”。^①当地群众说是三重城,中有一大台基,高约 10 米,东西长约 30 米,南北宽 60 米,在城内曾得剪边钱碎片二十余,还有铜器碎片、耳坠珠、绿釉黑陶片,类似铲柄的铁块及黄色的丝绸片半平方厘米。这块丝绸片每平方厘米约有 6×6 根丝线,薄如现在玻璃纱。可见当时丝绸织品的精致。从出土文物考察系唐代军营遗址,中间高台可能是军事指挥部的衙门所在。将军及各级军官携带家眷,所以钱币、器皿残片和女人珠坠同时存在。

由大古城向东南走 10 公里便到桑塔木遗址,维吾尔语为“粮

^① 武伯伦《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0 期。

仓”意。位于库车城东南70公里草湖的戈壁中，是一座废屋遗址，长38米，宽18米，用此粮食供应大古城和唐王城驻军之用。

由桑塔木遗址再东行30公里便到当地人民称为“克塔依城”的古城，即“汉人城”意。这个克塔依城由一方城址及其西部的三个附带建筑物组成，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唐代屯戍之城。残存的方城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150米，残存墙垣高7~8米，顶宽1米，底宽10米，每隔30米有一马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离地面2米处有一层树梢枝，20厘米厚，其上有土坯七层；又一层树梢枝及7层土坯；又一层树梢枝，最上层为土坯，约40余层到顶。每块土坯厚10厘米。在这里出土有细砂黑陶、铁块、剪边铜钱65枚、建中通宝钱、麻毯、麻履带、核桃壳、核桃、糜子等，其中成串铜钱为龟兹地区铸造的五铢钱，可见此遗址在汉代即已存在，唐代仍沿袭使用，并且从遗址上可以看到汉代夹条夯筑和唐代用土坯重筑的遗痕。而从烧过的麻毯、木桩、烧红了的磨石看，说明这里曾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在遗址附近有古代耕垦的渠道存在。

从央塔克古城向南沿渭干河下游，再沿塔里木河北岸东行，古城遗址、废堡、残垣、星罗棋布，古墓坟丘，比比可睹，它们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城，其宏伟规模，永为后人所感奋。

如果从龟兹王都伊逻卢城，即安西大都护府城向东至库车县境的那依苏河为止，同样有不少古城遗址。如位于牙哈乡塔哈西管理区境内、烽燧附近的遗址，曾出土粮食，现已全毁，可能也是屯戍城堡。在其西南15公里处原也有一古城遗址，曾出土过金银。总之，位于今乌喀公路之南的牙哈乡诸村境内，原有古城遗址不下十处。由此再往东至二八台之东12公里，东和轮台到境接壤，于东经83°58'，北纬41°47'，海拔1009.5米处有一遗址，分为三个区域，西区域为主区，保存有五个土堆（自北向南及自东向西），一堵墙皮。墙皮位于五个土堆的中间部位靠东的地方。五个土堆为原建筑物坍塌后所留的残迹，东区域为古代仓库遗址，在约50~60米的范

围内有许多口径为1~4米不等的圆坑,深几十厘米到1米,显然是当时的屯粮小窖。窖中还有残存的粮食,以粟居多,只有少量的小麦;在此还出土砺石一,石纺轮一,白底兰花瓷片一,米黄色瓷片一,黄色瓷片一,石磨盘、铁块、红皮粗砂灰陶,这里很可能是唐代粮台。

在此遗址东南约3公里,隔拉依苏河,位于今轮台县境内群巴克乡牧业村村委会驻地阿亚克村西2.5公里处有一周长约300米的正方形城堡遗址,城墙大部被洪水冲毁,只留下四个城角的戍楼遗址。东南角的残址最大,高4米、宽4米、长7米,城堡为土坯建筑。城堡内覆盖着较厚的红色灰泥土,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及陶片、玉器碎片等物。在古城堡四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昔日屯田时开挖的沟渠和田埂,面积在千亩以上,可以证明这是一座唐朝的屯田城堡。根据五铢钱的出土,估计汉代已经在这里屯戍。

就在这拉依苏古城遗址北面5公里的拉伊苏沟内,于1971年曾发现一座唐朝古墓。“古墓位于沟西岸,墓室高3米,边长4米,呈正方形,四壁和墓顶平滑光整。墓室内摆着两副棺木,分别装着大小尸体7口。衣服早已风化,无以辨别身份。但是其中一棺材的侧板外侧有大写阴刻汉字:‘安西大都护府’,并有小字:‘东至乌垒营五里,西至手捉六十里’”。^①这很可能是在安西大都护府失陷以后,仓促间即以安西大都护府牌匾作为棺板,收殓了牺牲的重要官员,移葬至汉人的屯戍区域内。而“手捉”,唐代各史都写成“守捉”,也许民间任意把它写成“手捉”。

以上所述主要是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周围,即包括今天库车、沙雅、新和、轮台几县境内的军营,直接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府城。而在龟兹西境的郁头州所在地是从西南进入龟兹境的险隘重地,因而也是当时军营重地,当然也是屯田重地。自今巴楚县城东北行

^① 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轮台县地名图志》,1985年版,第152页。

60公里,横亘着一座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陡峭险峻的图木休克山,此山中间有一巨大断裂口,只有从这个豁口中间穿行过山,所以当地维吾尔人民称它为代热瓦孜塔格,意即大门山。形势十分险要,只要守住这个山,东西交通就控扼手中,所以为历代军营重地。唐代郁头州城也即在此,人们称之为托库孜萨来古城。人们在城中拾到唐代开元通宝等钱币。该城共有三重,有内城外城和大外城之分,城堡座落在西北端的山坡上,周长约1600米,原城墙用泥土和石头构筑而成,宽3~5米不等,尚可辨认南北各有一门。城堡的一些军事设施依山而上,有些甚至到了山顶。

唐代从龟兹西行经过拨换城(阿克苏)向西南沿着丝绸道,首先进入今柯坪县境内的老齐郎古城、都埃梯木、阿克先尔、亚依德梯木,然后再进入今巴楚县境内的琼梯木、玉克拉克梯木、科西梯木、泽梯木至托库孜萨来。这一连串的地名,实际都是当时散布在龟兹西境丝绸道上的军营、屯城、烽火台,以及招待东西方各国使者的招待所等。唐代贾耽《四夷道里记》中所称的渴者馆,根据其所记道里计算,实即上面所称的琼梯木所在地。

琼梯木,又称梯木先尔,系维吾尔语烽燧城的意思。南距托库孜萨来古城28公里,位于东经 $79^{\circ}7'30''\sim 38''$ 之间,北纬 $40^{\circ}11'30''$ 。该城为近似方形的小城堡,建筑在高出四周约8~10米的高台上,城堡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64米,占地总面积为384平方米,城垣系土坯砌成。城堡东南约500米处,有小型建筑,已成土阜,惟在其周围散布着不少炼铜铜渣,还采集到多枚龟兹小钱。由此向西和向南200~300米处有多处陶窑,这里还并列多个大口陶缸,作为储水和储存食物之用,城堡西约2000米处,有被焚毁的小型佛教寺院一座,在城堡的道道沙丘间收集到许多轮制陶片,残存器形有罐、碗、盘、壶、钵等,多为素面或模印变体树枝、树叶纹饰。还出土有麦、粟、桃、杏和核桃等子实、陶质(少量的是石质)、纺轮和很多马、牛、羊骨和鹿角。在整个遗址中还采集到多枚“剪轮五

铖”、鹅眼钱、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乾元重宝等钱币。

在琼梯木之南约5公里处有玉木拉克梯木，残留有一座圆形墩台(东经79°8′,北纬40°10′),残高约10米。墩台北面700米处有房屋遗址,可能是戍守人员住所。于房前房右还深埋于地下几口红陶大缸,似为贮水、贮粮工具。

从这些简单情况看,琼梯木可能是拨换至托库孜萨来间的一个军营和屯田重地,所以有烽火台、商场,各种手工业、各族使者宾馆等,曾一度有过的繁荣景象,依然映现在残留的各种遗迹中,给人无尽的追思。

(2) 龟兹镇

《旧唐书·龟兹传》称:“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其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而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扩大为安西大都护府后,随即同时设立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后来曾以焉耆代碎叶。这个镇主要是管理、组织、指挥戍边的军队,属于国防机构。《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又说:“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龟兹镇由于其任务是主管戍边军队,受大都护及后来的节度使的直接指挥,因而其军事机构必然和大都护府设在同一地点,即龟兹王城内或龟兹王城附近。这种镇都设有镇守使,负责指挥调度军队。贞元五年(789年)高僧悟空经过天山南路时,曾记下了当时各镇守使的姓名:“疏勒(一名沙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次至于阗(亦云于遁或云豁丹)……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镇守使苏岑……次

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①而悟空至安西时，未提到镇守使的姓名，只说了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兼御使大夫郭昕，可知龟兹镇的镇守使由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郭昕兼任，悟空所以不写龟兹镇守使之名，原因就在此。

龟兹镇的驻兵制度及其兵额，据《旧唐书·吐蕃传》称：“贞观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缿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挽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高宗时罢四镇戍兵，无异使天山南路不设防，致使吐蕃乘隙而入，攻陷四镇，直至武后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始克复四镇。鉴于前次罢戍兵的失策，即从新恢复四镇，并置兵三万人。于是吐蕃贵族如芒在背，无所逞其威，因而一再向唐廷请罢四镇兵，遭到唐廷拒绝。由是吐蕃屡图侵扰四镇，均难得逞。

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增设安西节度使，与安西大都护府同治龟兹镇内，统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镇，其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以上所说戍兵三万人及后来的二万四千人，指的都是以汉军为主的中原戍兵，并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在内。而以汉军为主的内地戍兵在各镇所驻戍兵数，历来史书均未说清，也无具体史料可据。所以只能就其总数而言。

驻扎在龟兹镇的卫戍部队究在何地，史书未载。根据考古发掘，很可能位于龟兹王城东北7公里的明田阿达古城，就是龟兹镇所在地，也即汉兵驻守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正好起着拱卫安西都府城的作用。据黄文弼教授指出：“明田阿达古城在库车县城东北约7公里……靠近胡木利克村。古城遗址东为伊苏巴什河，西为乌恰河，南为乌库公路，北倚确尔达格山。在伊苏巴什河与乌恰河之

^① 《悟空入竺记》，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6页。

间的台地上,中间有一个面覆砂磧的高岭,古城遗址即座落其上。古城有内外两重”。^① 因此可知,两河中间夹一高台地,地势险要,用水又方便,在城周围进行耕垦也很方便,适宜于较多驻军的防守。现残存的内城为长方形,面积东西150米,南北72米,城墙夯筑,残高约1米,宽1~2米不等。城内有两个大土台,在内城之南和西南有十七个方形土坯台。于外城内外也都有土坯台,可知该古城构造较复杂,范围较大。重要的是在城中曾出土有汉文残纸,上书有“左卫率府广济府卫士王万二千口杂字”。黄文弼教授认为“‘王万二千’当为‘三石二斗’之误写,为卫士在本州应给予之粮”。^② 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确切,“王万二千”可能是“一万二千”之误,即指当时龟兹镇的驻兵数,而内外两重城完全能容纳这样多驻兵数。所称出土的左右卫率府广济府卫士,即指唐时太子武官。《旧唐书·职官三》云“太子左右卫率府……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所属焉”。可知广济府属于左右卫率府,则广济府卫士曾被征戍龟兹,所以会在明达古城中出土广济府卫士的残纸。这也可作为这里是唐代龟兹镇兵所在地的有力佐证。

(3) 守 捉

《辞海》“守捉”条^③：“唐制，军队戍守之地，较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天宝以前，军、城、镇、守捉皆有使。又上元以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简称则无“守捉”二字。可知守捉是

①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②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③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7页。

军队戍守之使,在唐代的天山南北各军事通道上都设有守捉。在安西大都护府所属的龟兹境内,据《新唐书》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自焉耆都督府至龟兹都督府之间有六个守捉城,其名称为:“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由此可知自唐代焉耆都督府城至龟兹都督府治所,即今库车县城为315公里,而今焉耆县城至库车县城沿公路走共339公里,惟当时焉耆都督府治在今焉耆盆地四十里城子,北距焉耆县城40里,这样从339公里中减去20公里尚有319公里,与唐史所载315公里的路程大致相符。据此,根据史籍及考古发掘,大致可考定六个守捉城的位置如下:

1. 于术守捉城

于术守捉城的位置,据贾耽所记为过铁门关后二十里。按现今行政区域看,已属库尔勒市辖区。根据资料核查,在今库尔勒城南约三公里的夏渴兰旦古城遗址,“城周1080米,中有土墩,墩为土坯所砌。”^①出土文物颇具唐代风格。^②可能就是于术守捉城所在地。

2. 榆林守捉城

《新唐书·地理志》称:“又西行二百里至榆林守捉”。从现在库尔勒市的夏渴兰旦古城西行,沿着乌鲁木齐至库车公路全在天山南麓的山前戈壁中行走,只见在途中摇曳的少量芨芨草、骆驼刺等荒漠干旱植物,直至轮台野云沟区域始见树木、村落和绿洲。自库尔勒至此公路里程为95公里,与古代所说二百里大致相当。就在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9页。

^② 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村委会野云沟驻地之东 9 公里,地处乌库公路北侧约百米处有一座较完整的阿克墩古城遗址。这个古城由“内外两重围墙组成。外围墙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120 米,东西宽约 67 米,南墙垣适中有豁口。内围墙置西偏南,有一面利用的是外围西墙。内墙垣也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62 米,东西宽约 35 米,南门宽约 6 米。内墙垣东北隅有一圆形土坯建筑,直径约 11 米,残高约 3~4 米,其西北角尚存枯井一口。在居址内采集有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多枚、小铜佛像、各种铜扣、铜饰件、铁残件等”。^①这里出土的各种文物,经鉴定均属唐代。在古城西南 1 公里左右,仍残存高约 2.5 米的烽火台一座。考古学家黄文弼还指出,有二个红泥质的陶罐,“出野云沟东北二十里阿克墩东北一古冢中,据说当时掘出尸骨甚多,有陶罐数十”。^②根据这些实物判断,阿克墩古城很可能是唐朝的榆林守捉城,是一个重要的戍守古堡,当然在这里常会发生战争,所以抛散在野的尸骨很多,更足证明是古战场重地。

3. 龙泉守捉

据《新唐书·地理志》称:自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自野云沟至阳霞乡,有发源于北部天山的阳霞河流贯其境,仅次于迪那河水量,形成了轮台县境内的一块重要绿洲。向以泉水多而著名。现于阳霞乡西的博斯坦村尚有龙泉遗址,清代曾在此设置驿站,当时龙泉曾为阳霞名胜古迹之一,现泉眼虽已淤塞,惟沼泽地面积尚有 400 平方米,该处古柳、芦苇甚繁茂,由于那一片绿洲肥沃,故维吾尔语称其为博斯坦。龙泉一名维吾尔语称其为“依兰布拉克”,即蛇泉之意。在这里设守捉城,独得天然地理的优势。其戍堡遗址虽已难觅,但按里程、形势及经济实情看,龙泉守捉就在阳霞乡内。

^① 张平《有关唐安西乌垒州等地考》,《新疆社会科学》1990 年第 2 期。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9 页。

4. 东夷僻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说：龙泉守捉西“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如从龙泉守捉向西至今日轮台县城，公路里程为33公里，约66华里，可是汉唐时期，今日轮台县城一带并未全部开发，主要在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下游地段。在被当地维吾尔人民称为“黑大依协海尔”或“黑太沁故城”的东南约7公里的荒漠中有一座兵营遗址，当地维吾尔居民称为“恰库木排来克”，汉语意为“轮状台”。兵营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南侧残存一土墩，高约5米，均为夯筑。从遗址内出土的陶器、铜钱等文物均属唐代，这里很可能就是唐代的东夷僻守捉，其地望位于阳霞西南30公里，与唐代所记里程约相当。如以黑太沁作为乌垒州府所在地，则东夷僻守捉正好起到拱卫乌垒州的重要任务。

5. 西夷僻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称：自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从黑太沁故城，即《轮台县地名图志》称为“阔那协海尔古城”西北约25公里的拉伊苏河东岸有一座戍堡和两座烽火台矗立的共存遗址。从这个遗址到恰库木排来克的东夷僻守捉所在地正好70里左右。这座拉伊苏戍堡，边长300米，现仅残留下四个城角的戍楼遗址。戍堡内出土文物很丰富，有铁刀、弓箭等兵器，有铁犁铧、铁镢头、铁镰刀等农具和大量的陶罐、纺轮、石磨谷物加工用具等生活用具，同时还出土有“开元通宝”、“龟兹小铜钱”、“汉龟二体五铢钱”、唐代铜镜残块等，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唐代戍堡，可能即是西夷僻守捉所在地。在戍堡四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唐代戍军开挖的沟渠和田埂，面积超过千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些屯田遗迹，把这座城看成是纯粹的屯城，因为唐制，凡有驻军的地方，必须同时进行耕牧，不论是大军所在地，还是烽卒，都得执行且耕且战的

政策,所以凡是守捉所在地,必然有耕农遗迹存在。

在西夷僻守捉城还有两个相距不远的烽火台。一座残高约 8 米,边长约 6 米,呈方形的烽火台,在其下的居住遗迹内,曾采集到东汉的剪轮五铢铜钱,因而可以断定这座烽火台属汉朝,可知从汉朝起这是一个军事要地。而位于东侧的烽火台,残高约 14 米,平面呈梯形,用土坯垒砌,每块土坯长 35 厘米、宽 25 厘米、厚 11 厘米,由于土坯层内间隔着夹有数层木桩。木桩经碳 14 测定年代数据属唐朝。^①

6. 赤岸守捉

《新唐书·地理志》称:西夷僻守捉西“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现在库车和轮台两县是以拉依河为县界,看来唐代龟兹和乌垒州之间的界线也是以拉依苏河为界。经在拉依苏河岸边掘得的一座唐墓的棺材板侧板外侧所书“东至乌垒营五里,西至手捉六十里”。显然手捉即守捉的同音异写。“西至手捉六十里”,即指从拉依苏河向西再行六十里。经考古探查,于今乌库公路大涝坝附近,在公路南百米的戈壁上有座城堡遗址,城堡呈方形,周长 120 米,残垣高约 3~5 米,系夯筑。在城堡内出土有“开元通宝”、“大历元宝”、“龟兹小铜钱”等唐代文物。城堡东约 700 米处有烽火台,残高约 6 米。依今公路里程计,大涝坝西距库车 65 公里,即 130 华里。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说自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的记载大致相符。可证赤岸守捉可能就是大涝坝附近的城堡遗址。

^① 1986 年 12 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木桩交北京中国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碳 14 测定。测定数据:距今 1220±70 年,树轮校正,距今 1155±75 年。转引于张平《有关唐安西乌垒州等地望考》注 15,《新疆社会科学》1990 年第 2 期。

(4) 关 隘

唐代设置关梁,是作为“诘暴之所”。其设置原则“关必据险路”。选择关址,“须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属于要会之口,实堪控扼。”^①所以安西大都护府周围所在的河川、山谷隘道,必然要设置关梁,加以防守。

柘厥关 据《新唐书·地理志》称:“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文中白马河即今渭干河,可知柘厥关即设在渭干河边,成为唐代经过安西通达中亚和世界的主要交通干线。

亚洲腹地的古代军事要塞,受自然地理形势影响很大,河湖、山隘、沙碛都是制约军事设施及其战术运用的主要因素。柘厥关是屏卫安西大都护府安全的锁钥,控扼龟兹与中亚交通往来的一处重镇。只要柘厥关一失,大都护府就岌岌可危,因为从柘厥关至安西大都护府,即今皮郎旧城间仅 23 公里多,其间一脉平川,无险可守。

可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 1907 年于库车实地考察后,却把柘厥关定在雀离关。^②这是弄错了位置。而伯希和在其《都勒杜尔·阿胡尔和苏巴什》的考察报告中,把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标在库车城西、库木吐拉以南,渭干河左右两岸。在他 1907 年所摄照片中,仍可见城垣森严,塔楼高耸。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这里考察后说:“至千佛洞(指库木吐拉)村庄附近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四百二十米,四方形,城中已开垦为熟地。……拾唐代陶片数枚,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

^① 《唐会要》卷 86“关市”。

^②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炮台’。盖为当时戍守官兵瞭望之所。在沙雅河(渭干河)西岸,与河坝洞区东庙相对,亦有古代寺庙遗址一区……此地亦名千佛洞,实为大庙遗址,同一小城,周约380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遗址。城东有方形高塔一座,底宽八,高约七米,砖砌。……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下为方形,宽约8米,上略圆形,宽约六点三米,高约六米余。”^①根据实地考察所得,也证明唐代柘厥关实在渭干河边。今被称为夏克土尔、玉其土尔的残存古堡,隔渭干河相对峙立,库木吐尔则在此二古堡东南约2公里,彼此成犄角之势,控制着渡渭干河西行的交通大道,城堡主体在渭干河东岸,在河西的主体则为一大型寺院。近年一些考古人员又在这些古城堡区陆续拾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和陶器。更证明这里是唐代重要政治、军事活动中心。唐朝高僧悟空于贞元五年(789年)经过龟兹时,亲眼见到有“东西柘厥寺、阿遮哩贰寺”。^②这里既称东西柘厥寺,很可能柘厥关也分布渭干河东西两岸。唐代的政治、军事设施总是伴随着佛教寺院,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统治。

雀离关 位于安西大都护府北面的库车河上,主要是防止北方草原敌人南来袭击,在今库车城北面约20公里有一苏巴什古城,现在残存城堡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00米,堡墙残高5米以上,只有一处门道,南向开。黄文弼教授曾在这里采集到龟兹古钱币及波斯翁来亚王朝时期库思老二世(651~702年)所铸银币。城堡以北,在南北近700米,东西约200米的范围内是大片佛教建筑遗迹。倾圮了的寺院和佛塔,依然显示出其宏大规模。在库车河东岸,同样可见到依山势走向、南北延伸的古代近百米长的残存堡墙。在长500多米,宽150多米的范围内,同样是佛寺佛塔,丛丛列列。它们与库车河西岸的古堡丛集的佛教建筑群隔河相望,甚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悟空入竺记》,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为壮观宏伟。从天山中奔腾而下的库车河，穿山越谷 100 多公里，山雀离塔格山口后，河面突然宽阔，约有 200 米左右，由此流灌库车绿洲，是以雀离塔格山口的形势十分险要，正是进入龟兹绿洲的隘口。唐代在此设立雀离关，屯兵驻扎以控扼山区草原敌人的出入，自属十分必要。

过雀离关后，顺库车河上溯，河两岸不仅水草颇好，且向为古代冶炼钢铁采挖煤炭重地。向北越过大龙池、小龙池，登上铁力买提达坂，即可东入开都河谷的尤鲁都斯草原；向西北更可进入伊犁河流域的巩乃斯大草原。古代向为乌孙、匈奴、突厥诸族游牧人民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心，地位十分重要。从而在库车河出山处设关对保卫安西大都护府有重要意义。

盐水关 自库车绿洲通向拜城盆地的雀离塔格山中，有一条宽不过 20 多米的盐水沟。由此进入拜城盆地后，北越天山即可到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或昭苏，西行可到阿克苏绿洲，直达中亚。所以盐水沟是古代军事和商旅要道，现在于盐水沟内仍可见到古代堡寨遗址数处，高尚存三四米，均耸立于盐水沟西岸石壁上。1907 年法国伯希和曾在盐水沟峡谷口古堡中掘得一批龟兹文木简，简作长方形；长 8 厘米~16 厘米，宽 4 厘米~10 厘米，上书婆罗谜字母，惜大多已残损，在好几种简文中提到“盐关”的名称，可证“盐关”是沟口古堡的名称。列维指出都是公元 7 世纪时的文物。其中有一完整的简文称：“guarttas 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 二十年七月十四，1/0(署名)”^①。由此可证，唐代曾在盐水沟设关戍守，严格审查过往商旅行人。

乌垒关 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西、西北、北面已建立了柘厥关、盐水关、雀离关，那么在其东面是否也曾建关，史书并未明说。

^① 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载《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惟在东汉《刘平国治关亭诵》碑上指出刘平国除在黑英山盆地修建关亭外,还曾建修过“东乌累关城”,足证在东汉时期于龟兹东境就有乌累关城,以保卫设于它乾城的西域都护府。到了唐代,安西大都护府迁设龟兹后,统辖疆域远较汉朝为大,气势更加恢宏,拱卫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设施,自必更加严密,乌垒关的设立必然更加迫切。

1971年冬,轮台县在拉依苏河口兴建水库时,曾发现河口西岸的黄土台地分布有唐代古墓群,在一座墓葬的棺木上有“安西大都护府”、“手捉”、“乌垒关”等字样。后来这些棺木板散失,当时目睹棺木板的人回忆,有的说是“乌垒营”、有的说是“乌垒管”、有的说是“乌垒官”、有的说是“乌垒关”。应该说“乌垒关”为确。因为有些人不熟悉历史,年久后,对“官”、“营”、“管”、“关”等字又难于辨认,故各说不一。足证当时确有乌垒关。

既然“乌垒关”三字就在拉依苏河口处发现,也可肯定乌垒关就设在拉依苏河口两岸。因为拉依苏河源于天山山脉,下游两岸分布有很厚的黄土堆积台地,河道到此切割很深很宽,最宽处可达400余米,形势甚为险要。位于东岸的守捉城及汉唐烽火台均还耸峙,正向人们陈说着逝去的历史陈迹,而当时在拉依苏河东西两岸修建乌垒关城,做为安西都护府东境安危的所系,自在情理之中。核之古今形势,乌垒关设立在拉依苏河口两岸最为确当。

(5) 亭 燧

汉武帝为了统一西域,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① 只要稍知西域地理的人,就可知“亭”在统一西域事业中所起的重要

^①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作用,因为在戈壁沙漠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前进中失去了联系就会迷失方向。如不建亭,更会随时被敌人切断,所以古代往往是“列亭”、“亭侯”、“亭部”联称。在桑弘羊给汉武帝的屯田戍边建议中力陈在轮台、渠犂等处屯田积谷“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刘彻却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①。可知“列亭”与“亭燧”作用等同,都是在军事上起到警戒斥堠的作用,是维护统一的重要军事设施。现在于龟兹境内仍可见到唐代巍然矗立的一列列烽燧遗址。

唐代于龟兹境内所设军营、屯城关堡,必与烽火台相通。现在于轮台县群巴克乡政府西北10公里的迪那河渠首工程南侧卵石沙滩中有一喀拉亚烽火台,残址高5.5米,直径7米,系汉唐时期烽火台。由此越过拉依苏河山口西经库车境内乌鲁木齐通往喀什公路以北的托克塔姆北的丘克土尔^②、博斯坦托呼拉克吐尔、克里科西吐尔(位于玛扎巴哈千佛洞之北)、伊希哈拉吐尔、克孜尔尕哈吐尔,然后进入盐水沟,在关卡附近有一石砌的烽燧,再向西北至拜城县黑英山盆地的刘平国治关亭处也有烽燧。另一条烽燧线是从盐水沟烽燧向西经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向西经赛里木、托克逊乡、温巴什乡,越山进入姑墨、温宿越别迭里山经热海(伊塞克湖)、楚河至中亚各地。现在从乌什县城斜向西北行,沿别迭里河谷前进,直到别迭里达坂,沿途尚残存三个古代烽燧。在烽燧下,尚见古代墓葬,足证这里是拜城盆地经姑墨、温宿、别迭里通达中亚的军事大道。那些一连串的烽燧线就是有力佐证,当然也是重要的丝绸通道。

这条烽燧线南面的一条烽燧线,是从今轮台县城西南拉依苏烽火台越拉依苏河进入库车境内的却勒河瓦提吐尔(西距县城60公里)、托克塔木吐尔(县城东40公里、乌喀公路南侧30米处)、塔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土尔”即烽火台意。

汗其吐尔(牙哈乡政府驻地西偏南 3.5 公里)、沙克沙克吐尔、克里沙尔里吐尔、萨喀古吐尔(县城东 2.5 公里,北距乌喀公路 400 米左右、墩高约 10 米)、科克提拜孜吐尔(伊西哈拉乡政府驻地以北 0.7 公路处)、喀拉萨里阿塔木吐尔(位于县城以西 3 公里,墩高 4.5~5 米)、科西吐尔(位于县城西南 13.5 公里,北距公路南 0.6 公里)、库木吐尔,再西至新和县境内的达玉杜土吐尔、羊达克吐尔等,沿雀离塔格山南的戈壁沙滩进入拨换境。

沿着塔里木河北岸西行直至渭干河下游还有一条烽燧线,即从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淘纳协海尔城等处的汉、唐烽火台向西南沿塔里木河北进入龟兹绿洲的库车县境即为克塔依古城烽燧(又称唐王城)、大古城烽燧、阿合卜烽燧、塞克桑塔木烽燧、库纳克烽燧、曲拉克烽燧。另外从大古城烽燧向西至沙雅县境塔里木河北的博斯坦托格拉克烽燧向西北至铁热克烽燧、尤瑞克烽燧、央塔克烽燧、布特巴什烽燧,再向西至拨换境沿着去郁头州丝绸古道,沿途也都设有烽火台,不少地方,现在依然可以辨认。

上述南北几条烽燧线拱卫着安西大都护府,现在有些地名就是由当时烽燧的名称而成为该地区的名称。如库木吐拉千佛洞和库木吐拉古城等就因当时有耸立的库木烽火台而得名。又如迄今仍耸立于盐水沟口的克孜尔哈烽火台,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姑娘遗留下来的”或“姑娘居住过的”,并不妥切。根据《突厥语词典》的记载意,是建筑在山顶上或高地上的,“外形如同塔楼的建筑物,其顶部可点燃烟火,监视敌兵犯界侵扰,使人民进行防御。”“卡阿”(汉音近),即哨卡之意,现在库车县境内有五个以“卡阿”为词根的地名,可能都是龟兹王设置哨卡的地点。

至于烽燧组织。唐代制度,据《资治通鉴》卷 240 载,宪宗元和十二年(817 年)条胡三省注:“唐凡烽燧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侯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辞、转牒。”每个烽燧

间的距离一般在 15 公里左右,也有 12 或超过 15 公里的。每个烽燧间的距离基本根据地形地理情况决定。烽卒戍兵的生活很清苦,除基本的戍守任务外,每个烽卒还必须耕种几亩田,以稍解供应不足的困难。遇到战争,就更加艰苦。不仅随时要准备战斗,供应跟不上时,更须自力更生,力求衣食自给,过最低限度的生活,英勇保卫我国神圣领土。

唐代不少诗人讴歌了西域烽燧的重要性及其所完成的历史功绩。如王昌龄《从军行》中说: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吹。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中也说:

曾到交河郡,风土断人肠。
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可见烽燧总是成线的,总是和战争相连在一起的。

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

(1) 增设四镇、伊西节度使

从节度到节度使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其主旨都是指用节调度军队以卫国保疆。为了应付突起的非常事变,对于不是驻防在同一州郡内的军队便于统一调用,就需要以节为符验才能调度。如《唐大诏令集》卷 35《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称:“其蒲州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并授节度”。《张说之文集》卷 14《赠太尉裴公碑》称:“上元中……诏公为洮州道左军总军,又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并受元帅周王节度。”这些例子说明只有用节才能统一调度和指挥不同地区的军队。

因此只要得到皇帝赐授旌节,就有调度指挥军队的权力,肃宗于 756 年接皇帝位后,为了统一全国军权起见,就停止了一些亲王的节度。在《唐大诏令集》卷 36 至德元年(756 年)八月二十一日《停颍王等节度诰》中称:“凿门名将,授钺专征,杖以方面之威,执夫赏罚之柄,邦家重任,固实在兹……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承。庶若网在纲,惟精惟一,颍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

查节度一名,最早见于《宋书》卷 95《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之北伐诏称:“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可见此节度非官

衔。到唐初,给诸道总管等授节度,而到武则天时已有节度大使之称。《唐会要》卷 61《御史台馆驿》:“大足元年(701 年)五月六日勅,诸军节度大使听将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万人以上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以上大使、副使二人,并给传乘。”这时的节度大使仍还不是官衔。《通典》卷 30 都督条称:“分天下州县制为诸道,每道置使,理于所部(即采访防御诸使也),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说明节度使还并非常设官衔。所以《唐六典》卷 5《兵部》称:“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副大使焉,有判官焉。若大使加旌节以统军。置木契以行动。”

《新唐书·兵志》称:“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是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皆置节度使”^①。这就是说从公元 711 年起才以节度使正式命官。惟这条文字中有两个河西,有误。后一个河西实为安西之误。

那么,西域何时有关节度使的官名呢?《旧唐书》卷 97《郭元振传》称:“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在凉州五年”,就是说从 701 年起郭元振已以凉州都督身份节度河西、西域各军,实际已有节度大使之称。西域正式增设节度使则在先天元年(712 年)十一月。《唐会要》称是年“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而史献原在长安(701~704 年)中已为北庭大都护,到 712 年时又加称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可见都护是其本官,节度使是其加官,因而他的正确全名应该是北庭大都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伊西节度因其位于伊吾以西而称伊西节度,由于伊西节度使府和北庭都护府同治一地,所以有些史书也把它称为北庭节度使。实际是都护和节度虽互兼而各为一官,北庭应指都护,伊西应指节度。

当北庭已有伊西节度使时,安西还未设节度使,却已有四镇经

^① 《唐会要》卷 78、《通典》卷 32 记载与此相同。

略大使之名。《新唐书》卷 67《方镇表》指出景云元年(710 年)设安西都护四镇经略大使。开元四年(716 年)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诸蕃落大使。此史料源于《唐大诏令集》卷 35《剡王嗣直安北大都护等制》称:开元四年(716 年)正月二十一日“嗣开,可安西大都护,仍充河西道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潞国公郭虔瓘等,国之老臣,朝之宿将……虔瓘可安西副大都护,仍兼陕王府长史安抚诸蕃副大使。”由亲王遥领大都护后,原大都护及经略大使都改为副职。而四镇经略大使即为四镇节度使的前身。

那么安西究竟到什么时候有节度使的官职呢?据《唐会要》称:“开元六年(718 年)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这里把汤嘉惠任四镇经略大使说成开元六年是有问题的,因为《新唐书·西突厥传》载:“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以献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庭都护汤嘉惠等犄角。”查阿史那都担叛乱,《通鉴》卷 211 列在开元二年(714 年)二月,“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可知都担叛乱是在开元二年。在此之前汤嘉惠已调任为北庭都护,可知汤嘉惠的调任都护至少是在开元元年和二年之间,阿史那献的调任碛西节度使也在同一时间,足见《唐会要》所说的开元六年不确。因为《新唐书·西突厥传》中也明说史献于 712 年起为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后不久,就调任碛西节度使。从 712 年到 713 年,时间不长,才可用“未几”二字形容其调度之快。如果按《唐会要》之说,则从 712 年起直到 718 年才调职,就不能用“未几”二字。而《通鉴》和《新唐书》叙述的时间相同,可证安西有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年(714 年)。

现在不少书上对于安西、碛西、四镇节度使几个名称常混用，实际应该把节度使称为四镇或碛西，因为都护是本职，节度使是加官，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安西都护、四镇节度使或碛西节度使。两者虽然互兼，官却非一职。节度使主要是掌管武装，四镇也主要是军事据点，所以称四镇节度使才符合实际。又因四镇均位于莫贺延碛以西，故又别称之为碛西。而四镇、碛西之名在《通典》及《唐大诏令集·李若幽朔方节度使赐名国贞制》中又称镇西。如《旧唐书·高仙芝传》称：天宝六载十二月（原书六月有误）“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督为四镇节度使”。这里对四镇节度使记得很明确。也有把它记称碛西节度使的，如《旧唐书》卷8《玄宗上》开元十五年五月“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在唐史上也有混用的，如《旧唐书·封常清传》称：天宝六年十二月“仙芝代夫蒙灵督为安西节度使，二十载……王正见为安西节度，奏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十一载，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三载入朝……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这几段所说的安西节度，正确说都应该是安西都护、四镇节度；虽然这方面有时混用，有一点却是不能混淆，即在安西都护之前不能说持节充四镇或碛西节度和伊西节度。只有在节度使之前才能加“持节充”几个字。

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宰相张九龄给四镇节度使王斛斯的一些敕书的标题，虽然有的写成“安西节度”，有的写成“四镇节度”，而在敕书的开首却是一律写成“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①足见安西专指都护，四镇专指节度，在唐代人心目中是清楚的。

既然都护是本官，节度使是加官，因而都护一职是一脉相承的。节度使却有时中断。也就是说在玄宗时期于西域增设四镇、伊

^① 《全唐文》卷285、286。

西节度使后,并不是年年都有节度使之职。如《全唐文》卷286《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称:“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贼共除,有患相救,万里之外,何待奏闻。”在张九龄《曲江集》卷11《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亦称:“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谋。”这是开元二十三、四年间的事,文中所称西庭,即指西州、庭州,可见这时未设伊西节度使。而在四镇却仍的节度使,所以在同一时间发给安西的敕书却称《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或《安西节度王斛斯节》),而给北庭的却称《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或《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不同的敕书正好表现了不同的职名,即前者有节度使,后者已撤节度使。

上已说明四镇节度、安西都护和伊西节度、北庭都护之间二者可互兼。不仅如此,四镇和伊西二节度之间还有分有合。因为从战备着眼,合与分都视当时的军事形势而定。从地理方面说,自敦煌以西直至里海的广大西域地区,自成一地理单元。沙碛连沙碛,山脉连山脉,虽有草原和农区之分。但天山中亘,草原牧民,越山而过,路路可通。因而山北有警,必然烽火连及山南;塔里木盆地农区一动,同样声息立刻通于草原。是以承平时期,两节度以分为宜,俾便于管理,动乱一起,就以合为宜,俾便统一军力。迅速平定叛乱。因而自先天元年(712年)在天山以北庭州设置伊西节度以后,与设在天山以南龟兹的四镇经略使分治南北,亦即继承安西、北庭两都护分管的区域,所以二者必相兼。然在紧迫的军事情况下,伊西节度有时并于四镇节度。在《唐会要》卷78及《新唐书·方镇表》均称开元十五年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这里的伊西、北庭实为一节度,再无可分之理;所称分两节度者,伊西应为安西之误写,才能称分安西、北庭为两节度。果若是,则在此之前伊西节度曾一度统于四镇节度。

《新唐书·方镇表》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又称:“合伊西、北庭(应为安西之误)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说明此时四镇、

伊西二节度使又合而为一。可是《旧唐书》卷8《玄宗上》称：“（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可见这时四镇、伊西又分为二节度。到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伊西节度又合于四镇节度，《旧唐书·玄宗纪上》称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说明此时伊西节度又统于四镇节度。惟这里说的“移隶伊西、北庭都护”不妥，应该说是“移隶伊西节度于四镇节度”，因为北庭都护未移隶。在同一时间唐廷一再给北庭都护盖嘉运有敕书，怎么能说是移隶伊西、北庭都护于四镇节度呢。至于《唐会要》所称的“至（开元）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隶伊西、北庭都督四镇节度使”，错误就更多。不仅开元二十九年应为二十三年之误，都督应为节度之误，都督之下又漏一“属”字。

为什么从开元二十二年起分为四镇、伊西二节度后，至开元二十三年十月又急于合为一节度呢？《旧唐书·玄宗纪》指出“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拔换城”。由于此时天山南北同时告警，所以急于合为一节度，以便于统一指挥。迅速平定乱事。这样北庭都护盖嘉运就于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率兵击破了突骑施，天山以南的拔换城也同时解围。到二十七年秋七月杀苏禄，十二月擒吐火仙，二十八年十二月乙卯突骑施酋长和莫贺达干率众内属，西域又获得了较安定的局面，所以《方镇表》中又称开元二十九年“复分置安西、四镇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所称有误，应该说复分置伊西、四镇节度使、治北庭、安西都护府。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以程千里兼北庭都护、持节充安西、北庭节度使，虽然仍分两个节度使，却由一人充任。天宝十三年程千里调为右金吾大将军后，即由原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封常清于“天宝十三载三月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①仍由一人兼二节度之职，所以《唐会要》称“至天宝十二载三月始以安西四镇节度封常清兼伊西、北庭节

^① 《旧唐书》卷94玄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度、翰海军使。”此处有十二载应为十三载之误。

由此而后，安史乱起，西域四镇、伊西二节度所统兵丁大部分调入内地平叛，因而两个节度使职均调回内地，西域只有“留后”在守卫边疆。

(2) 四镇节度使的管区及武装

节度使主管军事，在未设节度使以前，唐朝在西域各重要地区已经驻有各族军队，不过是由都护调度罢了。《新唐书·兵志》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军有经略使，多由刺史兼任，也可由都护兼任。镇有镇守使，守捉有守捉使，烽戍有帅。

四镇节度使、安西都护府下的军事单位有著名的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有一段时间曾以焉耆代替了碎叶。其中龟兹、疏勒、于阗三镇的位置无变化，即今库车、喀什、和田三地。而碎叶和焉耆二镇的设置却有变动。

碎叶与焉耆的关系，在唐朝有的修史者并未弄清。如《唐会要》卷 73 就提出：“咸亨元年（670 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693 年）十一月，复四镇赖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宋代修史者有的人更推波助澜，混乱难读。如欽旧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的焉耆都督府下注称：“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元人胡三省注解《资治通鉴》卷 202 的碎叶城时更说“碎叶城，焉耆都督所治所也，方翼筑”，这简直是把碎叶和焉耆混而为一，显然是错误的。近代有的人也肯定“碎叶镇就在焉耆

国”。^① 还有的虽承认中亚楚河流域有碎叶，但却认为焉耆另有一个碎叶。实际历史上只有一个碎叶，近代考古证明，也只是在中亚楚河托克马克附近发掘到碎叶城旧址，在焉耆境内，却无任何迹象可证。因而碎叶在焉耆，或有两个碎叶之说，都不符于历史。应该肯定唐代的碎叶城在时亚楚河流域，焉耆并无碎叶。

碎叶镇究竟置于何时？现在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置于贞观年间；一种说法认为是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的高宗显庆年间。持后一种说法的理由是贺鲁叛乱未平定以前，西突厥还未归属唐朝，因而碎叶不可能设镇。王治来指出：“从647年起开始有了安西四镇这个名称。但这里的碎叶应当是焉耆，因为这时碎叶尚处在西突厥的境内，不为唐朝所有。只有平定了西突厥以后，碎叶才代焉耆为安西四镇之一。”^②

我认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已在楚河流域设置了碎叶镇，因那时西突厥已臣属唐朝。^③ 所以在碎叶设镇，当时的记载也十分肯定，如《旧唐书·吐蕃传》说：贞观中“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旧唐书》卷198《龟兹传》称：“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这指明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龟兹后就设置了碎叶镇。所以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龟兹、疏勒、于田、碎叶四镇凯旋而归时，武则天兴奋地向侍臣说：“昔贞观中具绂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④ 根据武则天所追琐的历史，也可证贞观时所设置的四镇包有碎叶镇。因此把最初设置的碎叶指说为焉耆，与史不合。

由上可知，焉耆成为四镇之一，乃是在公元702年设置北庭都

① 曾同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2页。

②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188页。

③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1卷，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172页。

④ 《旧唐书》卷934王孝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护府,并把碎叶地区归于北庭都护管治后,才以焉耆镇代碎叶镇。在这方面有的人确认为显庆三年(658年)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恢复的四镇是以“焉耆取代了碎叶,因为在咸亨元年(670年)再罢四镇时,这时四镇的名称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①。这样与史也不合。因为658年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不仅把安西都护府重新由西纵迁回龟兹,并且于中亚游牧区增设了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以统治西突厥地区,中亚全部归入了唐的版图。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的四镇没有碎叶,而是焉耆,显然与史实相违。因为昆陵、濛池两都护府设立后,都护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这对中亚更需要一军事重镇,以调节和统率中亚各族武装的指挥机构,以巩固和守卫边防,可见碎叶镇的发展是当时形势所必需。

所以仪凤、调露年间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西行时碎叶镇早存在,这在《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已指出:“裴吏部名立波斯,实取遮旬,伟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以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公城碎叶。”^②可见王方翼未到碎叶任安西都护之前,杜怀宝是以安西都护身份驻守碎叶镇,因而《资治通鉴》卷201所说的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这里的焉耆是衍文,四镇应该是三镇之误,因为此时焉耆还未设镇,吐蕃尽管由和田沿着和田河直趋阿克苏,使于阗、龟兹、疏勒三镇暂时控制在吐蕃贵族的势力之下,碎叶镇却仍然存在。因为历史记载已指出从咸亨元年(670年)起安西都护府已迁往碎叶,直至679年王方翼为安西都护时的九年时间中安西都护一直驻扎在碎叶镇。到永淳元年(682年)十姓反叛,王方翼虽于热海地区战胜了十姓叛乱,由于东突厥叛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所以于武后垂拱二

^① 邹逸麟、赵永复《唐代的碎叶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

^② 《张说之集》卷16

年(686年)又暂弃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是以到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再复四镇,也仍然是有碎叶的四镇。

根据记载及历史发展实情看,自从648年设立碎叶镇后直至702年(长争二年)增设北庭都护府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西域四镇一直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其时焉耆并未设镇。直至702年起碎叶镇归属北庭都护府后,焉耆才代碎叶为安西四镇之一。自开元年间增设北庭节度使以后所说的四镇就都是指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而无碎叶,因为此时碎叶地区已为北庭大都护府辖区。

都护府是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关。行政的统治,必须同时辅以军队的威慑。所以《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称:贞观十四年派候君集平定高昌“太宗……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惟这时还未设四镇,至公元648年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治龟兹,随之即设四镇,并留兵镇戍。《旧唐书·吐蕃传》又说长寿元年王孝杰大败吐蕃,恢复四镇后“乃於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可见有都护府就一定有驻军。敌人要想夺四镇之地,首先必须驱逐军队和破坏军队建设。所以吐蕃贵族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遣使请和,则天将许之,论钦陵乃请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则天竟不许之”。足见吐蕃对于唐朝武装力量多么重视,多么嫉恨。

为了保卫唐朝的神圣疆土,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旧唐书·吐蕃传》称:“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群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尽为臣妾,……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缿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饒羊马。大军万人,水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

四镇的驻兵人数,各时期并不相同。从内地戍调的正规军一般在二万至三万人之间。《旧唐书》卷198《龟兹传》称,长寿元年恢复四镇后,用汉兵三万人屯驻。到开元二十一年时,据《旧唐书·地理

志》称,安西节度使所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戍兵共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这些戍兵分别编入军、守捉、城、镇等。据《新唐书·兵志》称,属于安西道的是“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这种说法有问题。首先鹰娑都督不是戍军的名称,而是地方的行政机构,不能和戍军并列一起,应属误写。保大军仅见《新唐书·地理志》安西都护府下书有:“保大军屯碎叶城”的字样,其他唐代史籍未载,据此所说的保大军应为702年以前碎叶镇尚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时之事。碎叶镇改隶北庭都护府后,安西道就再不可能辖有保大军。至于守捉名称,在《新唐书·兵志》仅称兰城等守捉;而于《新唐书·地理志》安西都护府下则列有“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东有且末镇,西南有皮山镇。焉耆西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城”。这里已写出九个守捉,五个镇。可是这里的镇与四镇有所区别,指的是军队编制单位,四镇的镇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

关于守捉和镇的具体位置,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其所附的贾耽《四夷通道》中称:自西州西行至天山中的银山碛后“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接着又说:“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从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人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拔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拔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原书于田误)境之胡虏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宿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峰。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

珠河，又西北度乏驴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人戍，傍碎人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措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斐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水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六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这是四镇节度使从西州经龟兹镇、碎叶镇达怛逻斯重城的一条军事要道，沿途都驻有唐朝的正规军队，保卫着西域的统一，保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天山北路自庭州经伊犁通碎叶、怛逻斯的军事要道相结合而巩固西陲。678年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659年平定阿史那蜀延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692年王孝杰击灭吐蕃贵族、收复四镇等等重要战役的胜利都是利用这些军事要道取得的。正如张籍《征西将》中所说：

黄沙北风起，夜半又离营。
战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
深山旗未展，阴磧鼓无声。
几道征西将，同收碎叶城。

形象地刻画了奔驰在几条军事通道上的英勇将士为西域统一事业献身的光辉业绩。

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北麓的军事要道，贾耽《四夷通道》中指明：“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袄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阆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

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阆”。“于阆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故羯饭馆也。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这条军事通道已指明了兰城守捉、坎城守捉、葱岭守捉和石城镇、播仙镇、疏勒镇的具体位置。同时《四夷通道》中还表明围绕于阆镇周围设置了卫星式的军事据点“于阆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北与姑墨接……于阆东三百里有坎城镇，南六百里，有胡弩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可见于阆镇的东、西、南三面都有拱卫的军事据点。北面因系沙碛，未设军事哨所。并从这里也可知道镇和守捉并未严格区分，所以兰城和坎城、守捉和镇二者并用。

唐代这条军事要道指明是出阳关西行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阆镇、疏勒镇直趋中亚和帕米尔高原。实际从于阆镇沿和田河直趋阿克苏，是一条通过塔里木大沙漠最便捷的军事通道，所以吐蕃贵族从和阆出扰北道，总是从和田先攻占姑墨，然后再包围龟兹镇和疏勒镇。吐蕃贵族为了配合从和阆北进的军事行动，还常同时从吐蕃地区西出拉达克经巴勒提、克什米尔、坎巨提，北出帕米尔高原以胁疏勒镇和锡尔河、阿姆河地区。这样根据西域地理特点所形成的军事要道，也就形成唐代在西域军事布防特点。《新唐书·吐蕃传》称：玄宗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都护图之。’孝嵩听许，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死者数万，多取铠仗、马羊，复九城故地。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还国。置绥远军以杆吐蕃，故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及是，累岁不出兵。”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驻防军也可随时增减，绥远军的设置于小勃律地区，就是专门防止吐蕃贵族

入侵四镇。文中所指疏勒副使应该就是疏勒镇守使副使。

到开元末,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诱胁,妻以公主,周围二十余国都为吐蕃所制肘,玄宗特命高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他即从龟兹出发,经拨换城(今阿克苏)、据史德(今巴楚县)、疏勒镇、葱岭守捉、播密川、特勒满川,然后分成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丑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璜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①战争于天宝六年八月掳获小勃律王及其公主,获得重大胜利而归。从这里又可见到上面未列出的拨换守捉和疏勒守捉。由此可知镇是一个地区的指挥机构,保护指挥机构的另有驻军,即守捉;必要时守捉可改设为军,是以在碎叶镇就曾一度设有保大军,视军事形势发展可有相应的设置。

唐朝除驻防在西域的正规军外,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实际就是少数民族武装。因为西域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设立的各个都督府,就是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负有征集和保卫边疆的责任。如和阗的尉迟胜,唐朝曾于天宝年间授于毗沙府都督,他曾“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同击破萨毗播仙,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改光禄卿,皆同正”。^②这表明尉迟胜利用和阗的地方武装,才有可能与高仙芝共同击败吐蕃贵族。开元年间讨袭突骑施部苏禄时,在给四镇节度使王斛斯的书中也说:“四镇蕃汉健儿,并委卿随所召募,可得几许,得具所奏闻。史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兼与卿计会,并临事处置,无所失宜。”^③这里说得很清楚,少数民族的武装是由各少数民族首领招辑,可知唐朝所以要设立各级都督府、州的特殊作用,

西域各族人民对唐代统一西域保卫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天宝十二年(753年)九月六日《赐突骑施黑姓可汗铁券文》中称:

① 《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

③ 《全唐文》卷286《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卿虽拥在沙漠，常捍烟尘。识进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败之数。久率藩邦，归化朝廷。兼拒凶威，挫其侵铁。精贯白日，义光青史。绩用累著，嘉尚良深。今授卿特进，册为突骑施可汗。”^①类似这些为国立功的各族首领和战士真是史不绝书，举不胜举。

同时在西域的重要军事行动，不仅每次都调集了蕃汉健儿，同时也还调用了河西节度使及其他地区的军队、粮食和运输力量，这种例子也很多。如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中称：对突骑施部阙俟斤被杀后引起的骚动“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昼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勃达等路人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河西节度内发蕃汉二万人取瓜州，皆高同伯帐路西入。仍委卿简择骑将统率，仍先与西庭等计会，克日齐入。比已敕朔方军西受降城、定远城及灵州兼取大家子弟，并丰安、新泉等军，共征二万，于瓜州、北庭招托。就中简择骁将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从瓜州宜给一月熟食，若至北庭，粮贮可支五年以上。凡此诸道征发，并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②这些军队的调入西域，仍然保留了原有建置和番号，有的事平后就撤回，也有的仍留西域，因此西域留有内地各军番号不足为奇。1933年11月于塔吉克斯坦泽拉夫善河南岸穆格山上发现了一批古文书，其中除粟特文文书和阿拉伯文文书外，还有一批汉文书，其中有一件汉文书的残文如下：

（前缺）

访察前置监军御史者宜（下缺）

神龙二年闰正□十四□（？）

都司

牒伍润

交城守捉使 大斗守捉使

^① 《唐大诏令集》卷64。

^② 《全唐文》卷284。

谋被 敕监覆仓库兼访察诸州军使牒称检

案内被 敕访察诸州军使牒称得东都右御史

(台牒)

□□得吏部牒称奉 敕旨如右牒至准

(以下缺)^①

由于文书中的交城守捉使和大斗守捉使两个军事单位都在唐朝的凉州境内,因而发表这一文书的苏联波利叶捷夫和日本人岩精佐一郎的《唐代粟特城塞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都强调与出土地点无关,而是“汉人旅客携带”过去的猜测。但是文书出土地点位于中亚河中地区,一直在唐朝疆域之内,这里不仅有唐朝的驻军,并且为了平息一些叛乱,常有从内地调往的各种军旅,因而出土文书中有内地各军、守捉的番号,正好表明是内地调去的军队留存下来的文书,与上述一些历史记载完全符合,因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

另外,在军队中实行的御史监军制度,在西域军队中也同样实行了。据《通典》卷24称,隋朝末年就有派遣监察御史监军的制度,唐因隋制,御史台也有监军之责,具体执行任务的也是监察御史。《旧唐书·高仙芝传》中指出,开元末吐蕃贵族胁制小勃律,出扰塔里木盆地时,玄宗特派高仙芝往讨,中使边令诚就是监军。获得胜利后,高仙芝即草书向朝廷告捷,节度使夫蒙灵督严厉斥责其越级报捷,为此“令诚具奉其状曰,‘仙芝立奇功,令将忧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督为四镇节度使,征灵督入朝。”这不仅表明西域军中实行了监军制度,并表明监军御史权力很大,他的一纸具文竟使高仙芝得到提拔,夫蒙灵督被撤换。后来安史之乱时,封常清、高仙芝失败后被监军边令诚所杀,成为历

^① 《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页。

史重大冤案,更可见监军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1949年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件编号为66TAM61的文书^①,虽已十分残破,但却可看到留有“刘监军”、“刘监萧乡军”等字样,可证监军制度在西域也和内地一样严格实行。

综计先后持节充四镇节度使的有汤嘉惠、张孝嵩、杜暹、赵颐贞、吕休琳、米曜、徐饮识、王斛斯、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智、高仙芝、王正见、封常清、梁宰。

(3)伊西节度使的管区及武装

伊西节度使的管区包括天山以南的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和天山以北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及其以西直至里海为止的广大草原区域。

在这广大地区驻防的正规军的规模,据《新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一年的统计:“北庭节度使……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北庭节度使所治,在北庭都护府,管兵二万人,马五千匹,衣赐四十八万疋段……瀚海军,在北庭府城内,管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二百匹。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马三百疋。”并且指明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防制突厥施、坚昆、斩啜”。所指斩啜是指东突厥贵族而言,斩啜是武则天因默啜常率部扰乱而给起的浑名。这里把伊西节度使的主要任务说成全是对付国内的突厥、坚昆和突骑施就失之于偏了。应该说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防制大食的侵略和吐蕃的北进。这时东侵的阿拉伯军正方兴未艾,源源东进,烽火早已直逼阿姆河流域;而吐蕃势力也日炽,不仅谋占四镇,对天山以北也跃跃欲进,这

^① 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是写史者所不可忽视的重点。

为了要守卫从伊州直至里海的广大区域,必须首先要有一条驿传哨所相连的军事大道,一以守卫边防,一以保护商旅,特别是丝绸的畅销欧亚。在《新唐书·地理志》伊州伊吾郡下注明通达天山以北及吐鲁番盆地的军事通道是:从伊吾“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其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非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这是从哈密通向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军事通道,所说与伊西路合,就是连接了通向西州的道路。然后在这条大道上修筑两条军事要道,直达北庭都护府,一条是从“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①另一条是从吐鲁番盆地的交河向“北八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②。

然后从北庭大都护府直至中亚的军事大道是沿着天山北麓西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里有黑水守捉,又七里有东林守捉,又七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踰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蝥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③

这是从天山以北通达碎叶的军事要道,由碎叶以西直至里海还同样有一条军事要道,即从碎叶到怛逻斯、奇姆肯特,再沿锡尔

① 《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伊吾郡,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新唐书》卷40《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中华书局1982年版。

河、咸海以北的草原大道直达里海,既是著名的牧道,也是军事要道。

在这条东西长达一万多里的军事大道上唐代设置了严密的军事据点。上述记载已列出了自东向西的守捉有罗护守捉、独山守捉、沙钵城守捉、俱六城守捉、张堡城守捉、乌宰守捉、叶河守捉、黑水守捉、东林守捉、西林守捉,共十二个守捉。这与《新唐书·兵志》所说:“瀚海、青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这里只指出十个守捉,比上述的少了二个,大概是所凭记载材料的时间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为这种军事设施因事因势而有变动。但上述所设守捉还未到伊犁谷地。显然在伊犁谷地及其以西地区的军事设施过去史籍上缺少明确记载。

经过近代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唐代也有不少重要军事据点和驻防军。除了伊犁谷地的弓月城和楚河的碎叶城为政治军事重镇外,现在已经知道这一地区的驻防军除保大军、瀚海军外,还有金牙军、濛池军、玉河军、萧乡军等。

在唐史上只有金牙道的记载,未见金牙军,可见金牙道并不等于金牙军,因为永淳元年(682年)派裴行俭为金牙道大总管讨伐十姓伪可汗阿史那车薄的叛乱,未出发就逝世了。而解放后出土的《汜德达告身》中则说:“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龟兹、疏勒、碎叶四镇。”这是发生于686年的事,不是与金牙军之名出现在同一时间,惟其驻防地点总与金牙道有关系。当时为了抗击位在伊犁河北阿史那车薄的叛乱而设金牙道,则金牙道的地理位置应在伊犁河北,金牙军的防区也应在伊犁河北。根据近代地质地理调查在今伊犁谷地及博尔塔拉以北山区,颇多产金之地。唐代所以取名金牙道、金牙军,可能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关。这时的伊犁地区虽属金山都护府管辖,但在统一的军事行动下,可以在平定阿史那车薄叛乱后,乘胜进收四镇。

伊犁一直是中亚的军事重地,所以驻防军较多。除出现金牙军

的番号外,还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件编号为 66TAM61 的文书^①中提到有个李绍谨从弓月城到安西的路上在离弓月城百来里的地方碰到了从安西来的使者四人,其中二人到玉河军,二人到萧乡军,这两个军都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

根据四人所去的方向是在伊犁谷地,无疑萧乡军和玉河军也是唐代在伊犁的驻防军。而在文书背面书有麟德二年(665年)字样,不管这个年代是文书本身的年代或作为废纸书写后留存的年代,总是离麟德不会太远的年代,这时伊犁还属安西都护府管辖。

而在弩失毕地区设立濛池都护府后,史籍未载有否驻防军,可是日本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中载有一篇编号为三〇一七号的文书,其录文为:

二人 濛池军差
宋才住 目海洛
廿二人差送

这里的濛池军应该就是设在濛池都护府境内的驻防军。当时濛池都护府管辖区域是在碎叶以西至里海之间的地区,那末濛池军也可能是驻防在塔拉斯或其以西地区。

从这些新出土的文书看,从伊犁河谷直至里海之间的地区,唐代都设有正规的驻防军。当然在从伊犁向东直至伊州之间广大地区的驻防军,史籍早有记载,不过有些记载与史实尚有出入。

《新唐书·兵志》中把伊吾军、天山军归之于河西道是错误的。《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都把这二军归属北庭节度使。《唐会要》中归属安西四镇,这是伊西、碛西合为一节度时可以作此归属。《唐六典》未列天山军,而以伊吾军属四镇,这

^① 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也是伊西、四镇合为一节度时的情况,但从未属于河西节度使管辖。

伊吾军 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称:“在州(指伊州·引者)西北三百里,时罗漫山北甘露川,置刺史为使,景龙四年(710年)置。”这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相仿。

天山军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唐会要》都说开元二年置。而《元和郡县图志》则先说“开元二年置”,末句又说“贞观十四年置”,显然前后矛盾,末句恐为衍文。多数记载多称开元二年置,因那时已设节度使。但并不能说在此以前西州无驻军,只是说从此时起才名以天山军。

瀚海军 据《唐会要》称:“置在北庭都护府,本乌孙王境也。贞观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684年)废州置焉,长安二年十二月,改为烛龙军。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天山军并在碎叶城”。而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庭州条称:“在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新唐书·地理志》在北庭都护府下则称:“有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通典》则直书开元二年置,不叙沿革。从这些记载看,以《唐会要》记载沿革最详。《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所述基本相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中指明瀚海军在文明元年已设在北庭,只是到开元二年才改名烛龙军,而以瀚海军移置碎叶镇;次年又因历史关系,仍把瀚海军移回北庭,而以烛龙军迁往碎叶。所以先天元年(712年)阿史那献任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此时伊西节度治所在庭州,则瀚海军也在庭州。及后开元二十三、四年间盖嘉运为北庭都护时也都兼任瀚海军使。

清海军 由于庭州与伊犁之间距离过远,驻军不足,于是又在天宝年间于庭州西七百里增设清海军,即由原来清海镇改置,此清海镇实即清镇军城。因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自庭州至清镇军城为610里,而其中沙钵城守捉和冯洛守捉之间未列里数,显

然是漏写了里数。以所漏写的七十里计，则与所说七百里之数十分相近。可知清海军、清海镇、清镇军城都在同一地点。

静塞军 在《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下又说：“有静塞军，大历六年置。”此处所称大历六年与史不合。因为此时平定安史之乱不久，河湟尚为吐蕃所占，西域路阻，不可能在西域设置军队，因而静塞军只可能设置于开元、天宝年间。钱晓澄在《廿二史考异》中已指出：“按地理志静塞军大历六年置，此所举军台皆天宝以前所置，不宜及静塞也。”

静塞军既然设在开元、天宝年间，那么静塞军究竟设在何地？《新唐书·地理志》中未说驻防地点，只是被列在轮台县之后，这就很有可能静塞军就驻防在轮台地区，因为控扼天山通道要隘的轮台县却未列驻防军，仅说庭州以西七百里有清海军，而在战略重地轮台却未说有驻防军，显然不合情理。我认为静塞军就在轮台驻守比较符合真情。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中也明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可见轮台地区确有大军驻守。

只是这样布防，才能赢得战略的主动权，而严密守卫西疆。因为哈密、吐鲁番已有伊吾军和天山军守卫；从北庭至赛里木湖之间有瀚海军、静塞军、清海军；自伊犁而西又有金牙军、玉河军、萧乡军、保大军、蒙池军等，中间辅之以守捉、镇、城、烽。如此一有军情，烽烟相连，鼓声相闻，南北相接，东西相竞，如臂使指。再和民族武装相配合，更是如网在纲，可操胜利之券。

布防虽严密，要取得胜利，还必须做到各军之间协调一致，指挥统一；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团结各民族，组织好民族武装力量。否则军队虽多，也常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唐朝驻守西域的部队有没有不协调的情况呢？还是有的。由于当时瀚海军驻防在庭州城内，所以伊西节度、北庭都护一定兼任瀚海军使。如在《全唐文》卷286两条敕文就是《敕瀚海军使盖嘉运

书》，敕文的前款却都是“瀚海军使、北庭都护”。凡在都护辖区内的军队都由伊西节度统一指挥；无节度使时，由都护统一指挥。可是有的自恃位高权重，有时也不那么听指挥。在《敕天山军使张待宾书》中称：

“近知贼下烧此，安然即去，竟无斥堠，来不预知。如此防边，无乃疏阔？此一分头抄掠，计其数不至多。向若烽燧稍明，复与北庭计会，相与来（夹之误）击，贼可无遗。且道镇统军。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异一家。况在绝漠，尤宜相协。已敕盖嘉运记，可与之筹宜。”^①

在《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中则说：“……至如西州近者有贼，其数无多。烽堠若明，密与两军作号，首尾邀击，立可诛剪。何为当军自守，信贼公行，未有损伤，去无关键，岂是边镇之意也。”^②

从这两个敕文中可以看到北庭都护盖嘉运和天山军使张待宾之间不够协调，张待宾也不大听盖嘉运指挥。敌人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在两军相接的薄弱处东窜西逃，致使少数敌人不能及时消灭，相反还造成一定的损失。

同时西域毕竟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做好民族团结，调集民族武装，是巩固边防，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关键。所以伊西节度使辖区每次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都与善用民族武装分不开。如为了讨伐东突厥默啜，于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十五日《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中突骑施守忠就征集诸蕃部落兵达二十五万骑之多。^③开元二十三四年间突骑施部的骚动，也都是驻防军和各民族武装共同平定。所以驻防军虽多也比不上民族武装多。是以唐代西域边防的得以巩固，是蕃、汉健儿共同奋战的结果。

在唐代只有车、马、驴、驼的交通情况下，迢迢万里地从关中、

① 《全唐文》卷 287。

② 《全唐文》卷 286。

③ 《唐大诏令集》卷 130。

齐鲁一带调兵戍西域十分困难,也不可能把眷属带往西域。尽管远戍西域战士有一定年限,如《玉海》卷138《邺侯家传》称:“旧制三年而代,后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台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旧唐书·杨炎传》称:“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这与所定三年不同,可能是与更住三年者合计而言六年。

但是按规定的年限,实际很难实行,常由当权者任意妄为。所以在《唐大诏令集》卷107《镇兵以四年为限诏》称:开元五年正月“每念征戍,良可矜省,其有涉河渡碛,冒除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令应募,华首未归。每言劳止,期于折衷。但碛西诸镇,道阻且长,数有替易,难于烦扰,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其诸军镇兵,近日递加年限者,各依旧以三年二年为限。仍并不得延留,其情愿留镇者,即稍加赐物,征人愿往,听复令行。”由于“壮令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况成为普遍现象,才下达此诏。那么这个诏书下达后,是否有所改变呢?事实上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边政戍兵的不得按期回乡,越来越厉害。所以在《旧唐书·杨炎传》中继续说:“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珣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不仅人远死边疆,更且还全家遭到苛政勒索之害,使得“天下之人苦而无告”。所以《新唐书·兵志》说:“番役更代多不以时。”怎能不使那些戍边战士的妻子转辗反侧,望眼欲穿呢!

闺里佳人年十余,嗷蛾对影恨离居。
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
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
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鸟泛中洲。

……

有使凭将金剪刀，为君留下相思枕。
摘尽庭兰不见君，红巾试泪生氤氲。
明年若更征边塞，愿作阳台一段云。

——李白《捣衣篇》

综计先后任伊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的有阿史那献、杨楚客、王正见、程千里、封常清等。

(4) 光照史册的守边英雄

当755年安史叛乱发生后，从西域抽调数万名蕃汉精锐健儿入援中原，但四镇节度使、安西都护及伊西节度使、北庭都护的机构并没有撤离西域，仍有留后在负责西域军政事宜。所以《旧唐书》卷12《德宗上》建中二年秋七月“自河陇陷虜，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为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可见内地所以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之名，这不仅表示遥领西域的两个军政机构，同时也表明广大西域地区仍然是唐直接领有的地区。

日夜想夺取西域重地的吐蕃贵族，在侵占河陇地区后，更想全力攻占西域，从而可见当仅留有少数戍卒的安西、北庭和吐蕃贵族战斗的激烈、残酷。虽然这时期唐史上留下有关保卫西域的战斗情况很少，但从片段材料中也可见到他们的英勇战斗业绩。

《旧唐书·德宗》有一条材料称：“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铤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以抗戎虜。殁身异域，多历岁年，以迨于兹，旅櫜方旋，诚深追悼，宜加宠赠，以贲幽泉。休明可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铤赠兵部侍郎。皆陇右牧守，至德以来陷

吐蕃而歿。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这是从781年起与西域取得联系后才得知实情，从而对这些牺牲的英雄烈士给予了表彰。可是这里所指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和西州刺史李琇璋的牺牲未说确切年代，其他史籍上也无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战死的年代是在756~781年间，因在此之后守卫西域的是李元忠和郭昕。从而可知杨休明、李琇璋之死必在此二人负责之前。而在《旧唐书·郭昕传》中指出：郭昕至“肃宗末才为四镇留后”。安史叛乱发生在天宝末及至德初，到肃宗末年已相隔六年时间。

李嗣业于756年从西域统军东去时，史籍未指明西域留有何人。当时河陇还未失守，因而西域必仍有军政负责人，杨休明应该就是李嗣业东返时才被任命为伊西、北庭节度使的。正是在这个时间吐蕃贵族乘机猛攻西域及河西，从而守卫在河西及西域的周鼎、杨休明等人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同时为国殉难。是由李元忠、郭昕又继续统帅西域各族战士守卫边防。而伊州刺史李琇璋牺牲后，袁光庭又接任了伊州刺史，继续团结哈密地区的各族军民和吐蕃贵族战斗。因哈密是从河西通向西域的门户，自为吐蕃贵族必争之地，所以吐蕃军频频袭击和包围伊州地区，袁光庭坚守伊州，浴血奋战一年多，吐蕃虽多方诱胁，也毫不为动，直至兵尽食竭，光庭遂先以刀杀死其妻子，然后自焚而死。

李元忠和郭昕能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高擎大唐旗帜，艰苦奋斗二十多年，更是永远值得人们歌颂。在代宗大历年间就已风闻守卫西域的一些情况，即由常衮草拟了《谕安西、北庭诸将制》称：“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同翼王室。率辛李之将，用甘陈之谋，与羌骑校尉，王侯君长以下，自金河玉关，至于南北戊午。逾流沙，跨西海，□蒲类，破白山，战事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灵，以战则克，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稜振於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踰陇，不复汉有矣。每

有使至,说令忠等忧国勤王,诚彻骨髓,朝廷闻之,莫不酸鼻流泪,而况于朕心哉,遐想贤劳,耿叹何已,……每念战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甲,白首戎阵,忠劳未报,心之惻怛,难忘终身,要当候大旆所指,穷荒荡定,悬爵位以相待。倾府库之所有,以答西州贤士大夫忘身报国之诚。”^①这里对河陇陷后周鼎、曹令忠等在河西、西域的英勇战绩,有了极为概括的叙述,确实是武功赫赫,挽狂澜于既倒。文中仍称曹令忠,可见此诏书系772年以前所下,因为由曹令忠改为李元忠,乃系唐廷于大历七年(772年)才赐改。《旧唐书·代宗纪》称:“大历七年八月庚戌,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后来于781年西域遣使经回纥道来中原联系通后,又立刻下诏书给以褒奖。《通鉴》卷227记,德宗建中二年(780年)六月诏称:“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问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至兴元元年(784年)五月乙未“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北庭都护李元忠加左右仆射”^②。

李元忠、郭昕为什么能孤军奋战而保卫西域不失呢?主要是能团结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奋战,才取得了胜利。当时在北庭周围地区游牧的主要是回纥族、沙陀族,还有一些葛逻禄及突厥部落,这些部落当时都服属回纥统治。开始各族都能戮力对付吐蕃贵族,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因回纥统治者贪得无厌,遭到了沙陀、突厥等部的不满,吐蕃见此情景,就乘机收买拉拢一些不满者,合力攻击北庭及回纥军。所以《旧唐书·回纥传》称:“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又有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肆行抄夺,尤所厌苦。其先葛禄部落及白服突厥素与

^① 《唐大诏令集》卷116。

^② 《旧唐书》卷12《德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回纥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败。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回纥，乃举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北庭都护府的攻陷是在贞元六年(790年)六月间。

当北庭都护府被吐蕃攻破时，节度使是检校工部尚书杨袭古，即率部下二千余人前往尚未失守的西州。790年秋颉干迦斯又集结回纥丁壮五万余人准备与杨袭古同攻吐蕃，结果又失败，大半死伤。袭古仅剩下一百六十多人，仍准备逃往西州，颉干迦斯却哄骗说：“第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①结果到了牙帐，却留而不遣，竟被杀害，从此安西阻绝，吐鲁番盆地及库车地区却仍在固守中。

那时西州、龟兹等地所以能固守，就因唐人势力尚未退出西域，所以到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载，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②并于十一月，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于是河西走廊西部及西域东部的各族武装均由张义潮统率，展开和吐蕃贵族的进一步斗争。至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十月据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恐热首，传京师。^③终于逐步肃清了吐蕃贵族在西域的残存势力。

由上史实看，自安史叛乱，河陇被吐蕃贵族占领，与西域阻隔的近百年时间中唐朝势力并未退出西域。早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吐蕃)钦陵，赞婆……遣使者请和，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武后即派酒泉尉郭元振往使，在途遇钦陵，钦陵问：“天子许和，约罢二国戍，使十姓突厥四镇各建君长，俾其国自守若何？”元振驳斥说：“唐以十姓、四镇抚西土，为列国主，道非有它，且诸部与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旧唐书》卷18下《宣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吐蕃异，久为唐编人矣。”正因为西域久已归入唐之版图，实行唐朝统一的政治制度，各族人民长期沐浴大唐文明，宜乎吐蕃贵族离间、煽诱西域各族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最后，吐蕃贵族不得不在各族人民团结的铁拳下退出了西域。这就是久入唐朝版图的历史实际发挥了不可估计的巨大力量。

弓月城及弓月部落考

弓月城在唐朝很有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县上安西都护牒》^①中指出,有人一次就向弓月城采取二百七十五匹练去龟兹。足见弓月城在唐代是一个不小的城市,所以《新唐书·西突厥传》中《乌质勒传》指出:“突骑施乌质勒……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最后一句弓月城伊丽水之间可能有漏字,意思明确是说弓月城在伊丽水地区。这从《新唐书》卷40《地理志》所说可证:“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七十里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蝥失密城,渡伊丽水,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根据徐松、李光廷等的考证,石漆河就是今日的精河,车岭指登努勒台山,因为在元代未开通果子沟(指塔勒奇山路)道路之前,古代常走登努勒台山路入伊犁。

在唐代突骑施汗国时期,把碎叶和弓月城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可见弓月城在中亚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重要。那么弓月城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伊犁何处呢?根据近代考古调查,在今伊宁市东北吐鲁番圩子发现了两个紧连的大、小古城唐代城址,正当登努勒台山出峡南下的路上,南距伊犁河渡口雅马渡90公里。而《唐书》所说西突厥叛首阿史那贺鲁于弓月城被苏定方大军击败后,渡过伊犁河逃往塔拉斯河千泉地区的史实,正好说明弓月城是在伊犁

^① 《文物》1972年第1期。

河北岸。这些史实,再结合吐鲁番圩子村所存唐代遗址观察,著名的唐代弓月城应在今伊宁县吐鲁番圩子村一带。

至于弓月城的语意,据日本松田寿男《弓月考》^①中认为:“车岭为金牙山、弓月山之异译。弓月城不外车城之意。”我国岑仲勉先生在《弓月今地及其语原》一文^②中也同意此说,只是认为弓月城即源于“空格斯 Kunges 或 Kunger,其城位在今巩乃斯地区。”我认为“弓月”不是“车城”意,而是突厥语意“有羊、羊多”之城的意思。因为弓月是从突厥语“库以”译音而得。“库以”、“弓月”为同名异译,意即羊特别多的城。

根据当时的民族分布说,伊犁这一带是葛逻禄部的牧地。据波斯文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第十五章《关于葛逻禄国及其城镇》中说:“葛逻禄人的财富是羊、马和各种各样的毛皮”。在历史上的伊犁地区一直是游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羊、马有名。因为那里气候宜人,雨雪丰富,水草特别丰美,把葛逻禄人所居住的中心城市说成“弓月城”,即羊特别多的城市是符合实情的。从而当时一些人把葛逻禄人也别称之为弓月人或弓月部落。

在唐朝,弓月一名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它是一个重要城市,更重要的是以弓月命名的葛逻禄人有众多的人口,在唐代历史舞台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原来在7世纪末、8世纪上半叶伊犁一带都是统隶于突骑施部。到739年突骑施部的吐火仙被盖嘉运擒获后,原受治于突骑施的各族都归向唐廷,所以《册府元龟》卷977称: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九月,“处木昆、匐延阙律噉部落、拔塞干部落、鼠尼施部落、阿悉吉部落、弓月部落、哥系部落皆遣使谢恩,请内属,许之。”这里所提到的各部除弓月部落外,都是原属咄陆、弩失毕二部共十箭的各部落,只有弓月部落不在其内,因而可知弓月部落即指葛逻禄,因为突骑施部所统咄陆、弩失毕二部

^① 《东洋学报》第18卷第4号

^②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1页。

外,另外最大的部族就是三姓葛逻禄,而《册府元龟》各部中未列葛逻禄,只说弓月。是知弓月即为葛逻禄。

既然弓月部落就是葛逻禄人,在唐代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人数多,分布地域也很宽广,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在阿史那贺鲁叛乱,唐朝派出大军征讨时,也以弓月道之名西征。《通鉴》卷199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①……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这里所以称弓月道行军总管,就因阿史那贺鲁叛乱的主要根据地是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他所裹胁的叛乱力量就是处月、处密、葛逻禄、咄陆、弩失毕几部人民,而处月、处密已先被唐廷平定,最后的根据地就在伊犁河、楚河地区,从而以弓月道名之。公元682年阿史那车簿叛乱时,也是首先围攻弓月城,这在《唐会要》卷94指出:“永徽元年(682年)四月,阿史那车簿围弓月,安西都护王方翼救之。三姓咽面与车簿合兵拒方翼,战于热海。”经过王方翼的苦战,平定了叛乱,取得了重大胜利。《张说之集·王方翼碑》称:“于是车簿啜首唱寇兵,群蕃响应,蝟毛而竖。公在碛西,捷无虚岁,蹙车簿于弓月,陷咽面于热海。”这都显示了弓月部位处伊犁河地区的重要地位。

当时不仅在伊犁有弓月部落,同时在塔里木盆地喀什噶尔一带也有此部人,并且很活跃。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凤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这时正值唐朝与吐蕃贵族激烈争夺安西四镇的时机,吐蕃贵族尽力拉拢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弓月、疏勒等部以反抗唐朝。因而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十二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

^① 胡三省注: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余里。

击弓月以救于阗。”到麟德二年(665年)闰三年,“疏勒、弓月两国又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①唐朝派鸿胪卿肖嗣业率军于高宗咸安四年(673年)前往征讨。当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②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喀什噶尔一带已有不少弓月部人民。

根据上述史实,足证弓月部在唐代的伊犁及喀什噶尔一带已有相当多的人数。这样一个重要部落却只在唐史有所记述,而在唐以后的汉文史书再未见弓月之名,同时在唐以后西方史书也未见弓月之名。如10世纪末完成的波斯文《世界境域志》及与此时代相差不远的加尔迪齐的《记述的装饰》和喀拉汗王朝名著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等书中都未提到弓月的名称。在这相同的位置只有葛逻禄的名称,由此也可推知弓月部实即葛逻禄。从而可知为什么汉文史书上只说8世纪中叶葛逻禄徙往中亚,并未提到南疆有葛逻禄部。可是喀拉汗朝及波斯文的著作上却都说喀什噶尔、阿克苏一带有葛逻禄。由上史实可知塔里木盆地西部的葛逻禄部并非8世纪中叶肃宗至德年间才迁往,而是在此以前早有不少葛逻禄人住在那里,只是被称为弓月人罢了。

^① 《册府元龟》卷995。

^② 《通鉴》卷202,中华书局1982年版。

耶律大石西征及统一中亚

(1) 辽朝与西域的关系

辽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曾自公元 907 年至 1125 年统治中国北部辽阔的疆域，达 219 年之久，在此期间，宋朝、西夏都要向它岁岁缴纳巨款或称藩朝贡，因而辽朝实际是公元 10 世纪至 12 世纪上半叶中国土地上最强大的朝代，影响及于中亚，远至西欧，当时一些西方史料都把中国称为契丹（Khita 或 Khata），从而在中古英语、俄语、希腊语更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被分别读为 Cathay、Kitay 和 Kitaia。迄今俄语仍称中国为 Kumaу，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辽朝统辖疆域甚为辽阔，据《辽史·地理志》称，契丹疆域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张正明在《契丹史略》中说：“辽朝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河北中部及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① 实际情况比这范围更广一些，其南部在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与宋、西夏接境，东临太平洋，东北直至黑龙江流域，北至色楞格河、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带，西面直包阿尔泰山、喀尔齐斯河、斋桑泊，与喀拉汗王朝为邻。

^① 张正明著《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3 页。

《辽史·地理志》在叙述契丹疆域的同时,还指出其所属是“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其中所列属国范围很广,包括高丽和不少西域地区。《辽史·百官志》解释属国与契丹的关系是:“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可知这些属国由契丹给以封官,属国自也要向辽政府纳贡,不过“朝贡无常”。^①于辽境内被征服的部族,必须年年纳贡,在开泰九年(1020年)冬十月戊子,西南招讨奏“党项部有宋犀族输贡不时,常有他意,宜以时遣使督之”^②。不按时交贡,就被认为是不忠实,而被怀疑和监视,在诏书中曾指出:“边鄙小族,岁有常贡。边臣骄纵,征敛无度,彼怀惧不能自达耳。第遣清慎官将,示以恩信。无或侵渔,自然效顺。”^③从这里也反映出辽境内各部族,属国的纳贡,由于贪官的苛征,常使力难胜支,从而终辽一朝,激起边民的经常起义。

属国不仅有进贡献纳的职责,同时也有奉调出兵征戍的任务。《辽史·营卫志下》的“属国军”称:“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多寡,各从其便,无常额。”这里虽然说“助军多寡,各从其便”。但向属国征召兵员却必须遵行;如有迟误,就要受到严厉惩罚。《辽史·肖惠传》称:“太平六年(1026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刺后期,立斩以徇。”

根据《辽史》中所述属国与契丹的关系,实与唐的羁縻府州差不多,其疆域应该是辽的组成部分,陈述也指出在辽代“由东北到西北地带的部族和小国。先后成为大辽的组成部分或属领”^④。不

① 《辽史》卷 36《兵卫志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辽史》卷 16《圣宗七》,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③ 《辽史》卷 16《圣宗七》,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④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111 页。

过属于辽朝疆域之内的属国,据《辽史》说是60个,一说59个,而在《辽史·百官志二》中却列出属国78个之多。显然有些被《辽史》称为属国的不属于辽朝的疆域。只是与其在政治、经济上有较密切的关系罢了,如日本、新罗国、大食国等就属于这一类。这里只着重分析一下与西域有关的各属国。谨列出这方面的属国名称及其简情于下:

回鹘国单于府,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

甘州回鹘大王府,

高昌国大王府,

阿萨兰回鹘大王府,亦曰阿思懒王府。

沙州回鹘敦煌郡王府,

于田国王府,

突厥国王府,

西突厥国王府,

乌孙国王府,

辖戛斯国王府,

斡朗改国王府,

师子国王府,

波刺国王府,

大食国王府。

由于突厥汗国被唐朝击灭后,除已经融入其他民族和西逃伊朗、土耳其以外,仍保留突厥族名称的已不很多,突厥国王府应在漠北,西突厥国王府和乌孙国王府则在额尔齐斯河西南至伊犁河

以北地区间,丁谦把乌孙国定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并不确实。^①

斡朗改即乌梁海的异译,乌梁海国王府与辖戛斯国王府毗连,前者在唐努山与萨彦岭之间的叶尼塞河上游;后者位于萨彦岭以北的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当时与周缘其他部落联会起来常反对契丹贵族,所以辽代经常对西北地区用兵。在《辽史·耶律化哥传》称:“开泰元年(1012年)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这次伐阻卜之地即在西北境,何以为证呢?因为此次并未剿平,该地各部族仍然继续反抗,那里的边吏才又奏称:“自化哥还阙,粮乏马弱勢不可宁,上复遣化哥经略西境。”鉴于前次的教训,这次举兵更多,下狠心要对反抗者严惩,于是耶律化哥又一次率大军“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辎重”。获得重大胜利。翼只水就是额尔齐斯河,从而可知契丹贵族征服了阿尔泰山及唐努乌梁海地区,所以契丹的西部疆域包有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唐努乌梁海一带地区。

契丹贵族这次在阿尔泰山地区的重大胜利迫使那里的不少游牧人民,包括阻卜、辖戛斯、都播等涌向中亚,据伊斯兰作家阿布·纳赛尔·乌特比的《亚米尼史》称:回历408年(公元1017~1018年)“有十万帐异教徒入侵七河地区”^②。这应该就是指耶律化哥对阿尔泰山地区的战争,尽管在《辽史·圣宗纪六》把它列在开泰六年(1013年)阴历五月初一(阳历6月11日),与乌特比所记时间稍有出入,但相差也只四年左右。时间应以《辽史》所记为准。当

^① 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乌孙”条称:“乌孙见两汉书,至东晋时为蠕蠕所迫,徙居葱岭山中,事载魏书,此后史中不见其名,辽史所谓乌孙,不知何在。惟考乌孙发源在今唐努乌梁海北俄国界中,其地有乌斯河(即乌孙转音),部人因以为名。乞尔吉斯诸族尽出于此,其后蔓延欧亚二州,为漠北三大人种之一。汉之乌孙国亦由此分出,每岁该种人必至河上祭其始祖……迄今尚有二村存焉,口上乌斯,下乌斯,地虽僻小,声名颇著,辽时当有村长备物贡献,故併于各国之列。”考乌孙并不发源于唐努乌梁海,这是误说。尽管乌孙少数人于古代可能曾散居到唐努乌梁海地区,而留下乌斯的地名,这些人实际都已融入辖戛斯族中,所以辽代的乌孙国王府并不在此,而在乌孙故地。

^② 阿布·纳赛尔·乌特比《亚米尼史》(Abu Nasr Abd muhammed b al-Djabbar Utbi, Tarih L.—Yamini)开罗1908~1909年版,卷2,第220页。

西方听到这一重大事件时可能已到1017年左右了，因而记下这个时间，这十万帐异教徒显然不是契丹人，而是被契丹贵族驱往中亚的辖戛斯、都播、阻卜等人。原来在唐代中亚还无柯尔克孜人的记载。这次可能就是柯尔克孜人迁往西天山游牧的开始，以至于在著名的《玛纳斯》史诗中塑造的英雄玛纳斯主要是和契丹人战斗的史诗。

至于大食国、师子国、波刺国三个王府，我认为也都在中亚。这里的大食国不可能是指的阿拉伯地区，因为在公元751年唐和大食的怛逻斯战役后，大食势力就植根于锡尔河、阿姆河间的河中地区，到辽代，大食还在阿姆河南北地区有根据地，并握有东西方商道交通的要冲，所以还需要联络辽廷，以发展经济文化，因而《辽史·圣宗七》称：“开泰九年（1021年）冬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在西史未见有契丹嫁女到阿拉伯地区去的记载，因而这个嫁女给大食，地点应在呼罗珊一带。

而师子国王府也决不是指的印度以南的锡兰岛，锡兰岛古时虽称狮子国，可是这里的狮子国应该就是指龟兹地区。《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称：“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这样龟兹也可别称之为师子国，在同传中还说：“其宰相著大食国锦采之衣，骑马前引，常以音乐相随。”接着又说其国“西至大月氏国两月程，东至夏州三月程”。从这里可见龟兹和大食关系的密切，相隔路程并不太远。那里夏州指的是西夏，在今宁夏地区，从龟兹到大食比到宁夏近一个月，显然当时近指的大食就在今中亚地区，如果要到阿拉伯，那末比到夏州之路还要倍之。

由是波刺国王府应该是指喀什噶尔地区而言。因为喀拉汗王朝的副王布格拉汗又称波刺汗，即从铁勒族的薄落部落演变而得，波刺即公骆驼的意思，所以波刺国王府即是指的和喀拉汗朝副王的关系。

现在再集中分析一下已经明确写明回鹘字样的一些王府,其地望及政治经济关系是如何呢?

首先说回鹘国单于府,应该就是指的唐代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的回鹘汗国所在地。在回鹘汗国破灭后,仍然留散在漠北的一些回鹘族,契丹贵族就在该地设立了回鹘国单于府,并驻重兵镇守,以慑服回鹘,这是契丹直接用兵征服后所设立的。《辽史·太祖纪》称:天赞三年(924年)冬十月,丁卯。“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经过这一年用兵,太祖阿保机基本上平定了漠北,辽朝政府对于回鹘部十分重视,常以此镇压阻卜等族的重要根据地,本来各王府都委派各部落、各部族头目充任酋领,而在漠北的回鹘部则于1053年派去了契丹人充任回鹘部副使,以加强对北边各部族反抗日益强烈的镇压,可见这个回鹘国单于府直接受辽政府统治。

甘州回鹘国大王府主要是指祁连山以北,龙首合黎山以南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回鹘族,他们的会庭地点是在甘州,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甘州回鹘,自1032年起建立西夏政权后,甘州回鹘即受治于西夏,与辽朝的往来则因西夏阻隔而较少了。不过在1032年以前甘州回鹘曾被契丹征服。阿保机天赞三年(924年)冬十一月乙未朔曾派兵深入河西走廊。擒获甘州回鹘部都督毕离遏,并遣使晓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到翌年夏四月,回鹘乌母主可汗即遣使贡谢,这时正值五代十国纷乱,中原云扰。甘州回鹘被迫臣服于契丹。960年起中原为宋朝统一后,甘州回鹘却与宋朝不断有贡使往还,从而疏远了辽廷,因而引起契丹不满,所以后来多次讨伐甘州回鹘,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十二月“肖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抚慰而还”^①。后因牙刺里复叛,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肖图玉又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

^① 《辽史》卷14《圣宗五》,另在《辽史》卷93《肖图玉传》则称:“统和……十九年总领西北路军事,后以南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刺里”。

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①。到太平六年(1026年)时，肖惠又讨甘州回鹘，“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②在这期间，辽朝所以多次进讨甘州回鹘，实际是和宋朝争夺河西走廊地区，那时党项族首领也站在辽一边，每当辽出兵攻甘州回鹘，党项贵族也常出兵相助，实际是共同反对宋朝。所以力图使甘州回鹘臣服，但是收效并不大，后来终于被并于西夏。

位于敦煌地区的沙州回鹘也曾一度向辽朝入贡。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开泰三年(1014年)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回赐衣币。开泰九年(1020年)秋七月甲寅，辽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曹顺即遣使去契丹进贡。但到1032年西夏政权建立后，沙州回鹘也被并入西夏疆域，此后沙州回鹘与契丹的往来就很少了。

高昌国大王府就是指的高昌回鹘地区，在二百余年的辽朝历史中，契丹和高昌回鹘之间未见有过兵戎之争，一直和好相处，所以高昌回鹘在辽朝一直与契丹族的政治、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位处东西通道，契丹要打通商道，必须紧密联系高昌回鹘。在此期间，宋朝要想制西夏及打通中西贸易道路，也必须团结和争取高昌回鹘。所以契丹和宋在高昌回鹘地区的争夺很激烈，经常互派使者前往联系，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赵炅派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国时，“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昌本汉土，汉使来观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因劝乃止。”^③这里生动地记载了辽宋在政治上争夺高昌回鹘的激烈，但宋朝毕竟和西域之间隔一西夏，虽仍有远图，也是力不从心，是以契丹在西域的政治、经济影

① 《辽史》卷16《圣宗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辽史》卷93《肖惠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宋史》卷490《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响超过宋朝。

最后关于阿萨兰回鹘大王府究指何地,迄今众说纷纭。查阿萨兰的汉语意谓狮子,不少回鹘王及人民都喜欢用阿萨兰,而在不同史书上所记载的阿斯兰、阿思懒、阿萨兰都是同名异译,《宋史·高昌传》称:“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阿斯兰汉。”而在《辽史·肖惠传》中所说:“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进至甘州。”这里的阿萨兰部又确是指的甘州回鹘。但是在《辽史》所列的阿萨兰回鹘大王府显然不是指的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因为在所列属国中,已列出了甘州和高昌回鹘的名称,决不会再把阿萨兰回鹘指此二地。而龟兹回鹘和于阗国也不可能列成大王府,因为在政治上前者属高昌回鹘,后者局处一隅,只可能被列成王府,是以阿萨兰回鹘大王府由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只可能是当时建立在中亚的喀拉汗王朝,因为喀拉汗王朝的大汗即汗族最高首领称为阿萨兰喀拉可汗,或称阿尔斯兰喀拉可汗;副王则称布格拉喀拉可汗,由于喀拉汗王朝的统治民族是回鹘族,所以在辽史上即以阿萨兰回鹘或回鹘阿萨兰代替喀拉汗王朝。

终辽一朝,阿萨兰回鹘与契丹在政治和经济上关系是很密切和友好的,开泰三年(1013年)耶律化哥征讨西北部族于额尔齐斯河获得大胜。经由白烈一路返回时,遇到了喀拉汗王朝派出追堵溃逃部族军的阿萨兰回鹘,被大为俘掠,都监衮里前去侦悉此情后,即向化哥说:“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①于是悉还所俘,造成不好影响,化哥受到撤职、削王爵等处分。足见辽和喀拉汗王朝是友好的政权,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西域各地所以被辽代列入属国之中,是因为不仅西域人大量地到了辽京和其他城市,《契丹国志·卷21》称:“高昌、龟兹、于阗、大食、小食、甘州、沙州、凉州等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

^① 《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丹贡献。”足见入贡次数之多，而贸易往来更是兴盛，如在辽京专设回鹘营，就是明证。同时也有不少契丹人到了西域，由于契丹人是游牧民族，其辖境又毗连哈萨克草原，因而在哈萨克草原东部于西辽未建国前，已有不少契丹人前往，所以在伊本·阿西尔的《全史》中就说：“在喀拉汗王朝的边界上已住着一万六千帐辽朝迁来的突厥契丹人。东部喀拉汗王朝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伊本·苏来曼委派他们守卫边界，并赐给他们份地和给予其他奖赏。以后王朝和这些突厥—契丹人发生矛盾，强迫他们与妻子隔离，想使他们不再繁殖。这些突厥—契丹人起来造反。向巴拉萨衮进发，但遭到阿尔斯兰汗的袭击，并向他们发动‘圣战’。”^①足见契丹人在哈萨克草原之多了。从而可知耶律大石所以信心百倍地西征，所以能够在到达叶密立时，短时间内就集结四万帐，很快建成西辽王朝，是与辽代长期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

(2) 耶律大石西征

原来辽朝在镇州设有西北路招讨司，其辖境“大致是东起克鲁伦河，西至喀尔齐斯河，北至色楞格河下游，南抵沙漠与西南路辖境相接。”^②有着辽阔的草原，是辽代十分重要的边防重地。在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在可敦城设镇州，选诸部族军二万余骑屯驻，并规定“凡有征讨，不得抽移”^③。另还有御马数十万匹牧养于漠北草原。耶律大石认清了当时形势，利用漠北的入力及雄厚的军事物资，作为复兴旧业的基础，所以他决心向北先到镇州，再策划定计。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5～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5～66页。

^② 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见《元史及北方民族研究集刊》第2期。

^③ 《辽史》卷14《圣宗五》，《辽史》卷37《地理志一》“边防城”条。

公元1124年7月,耶律大石看到形势急转直下,劝说天祚帝退往漠北,建立根据地积聚力量,“待时而动”。天祚帝犹豫未决,并遭到大臣肖乙薛、坡里括的反对,阻其实行。于是《辽史》卷30称:“大石不自安,遂杀肖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①《世界征服者史》中说耶律大石“离开契丹时,他由八十名他的家人和部下陪同,尽管据另一说法,他是由一支极庞大的部属随同”^②。从《辽史》看,好像大石决定弃天祚帝北奔时,杀肖乙薛、坡里括时就自立为王了;魏特福和冯家具二人也认为在出发时就已宣布自己为王。^③这种说法并不妥,因为耶律大石出走时所带人数不多,尚无任何根据地,如何会立刻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呢?只有耶律大石率部北行,经过艰难路程,越过沙漠,到达漠北镇州城,会七州十八部王众之后,知道所属各部的态度和所能征集到的兵马人员后才能于此自立为王。唐长孺《耶律大石年谱》注二十二也主张此说,我认为这样比较符合实际。

当耶律大石从夹山北行三日,经过黑水,有人指出此水即流经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爱毕哈河,又名艾卜盖河,^④然后再经白达达部(即汪古部)游牧地,得到该部详稳床古儿的资助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然后直奔可敦城,即在此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韦、敌刺、玉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而毕十八部王众,大石敕谕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

^① 《辽史》卷29也有相同说法称:“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

^②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③ 魏特福与冯家具(K. A. Wittfoged and Feng),《中国社会史——辽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Philadelphia, 1949,第623页。

^④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见《历史地理》第2辑。

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軫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①这一篇慷慨激昂的爱国陈辞，确实感动了各部王众，很快就组集到“精兵万余”，同时“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②洪皓《松漠纪闻》“大食”条也说：“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磧外，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石所得。”只有在这种兵马齐备的情况下，才能“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为恢复辽朝事业而奋战。所以说耶律大石自立为王应在这时，而不是在夹山出走之时。

值得重视的是耶律大石自立为王时仍然袭用辽制，设北、南面官属。原来南面官职主要管理以汉人为主的农业区域。这边可见耶律大石西行时所带各级官员中汉人相当多，否则不会再仍设南面官属。

同时在《辽史》卷30《西辽》中说耶律大石“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这个北庭都护府显然不是《唐书》所说位于天山以北的北庭都护府，而是指的可敦城。尽管布莱资须纳德、丁谦、羽田亨等人均主张此北庭都护府即唐之北庭都护府，突厥名称之别失八里，可是这种说法很难与事实相符，因为耶律大石所会的七州十八部王众，其中的七州系辽代在漠北所设的头下军州；而十八部族则基本游牧于漠北地区，即从鄂嫩河、克鲁伦河以西直至阿尔泰山地区，因而耶律大石所驻的北庭都护府，梁园东认为系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北匈奴单于庭”的略词，即辽时的窝鲁朵城，就在可敦城附近。^③揆诸实情，此说较确。

当耶律大石在镇州大集兵马，声势日益浩大时，正在兴兵征辽的金朝皇帝自然从各方面得到了耶律大石活动的情报。1124年10月金军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得到耶律大石的情报并向金朝报告说：“辽详稳挹不野来奔，言耶律自称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

① 《辽史》卷30《天祚皇帝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布莱资须纳德著，梁园东译注《西辽史》，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25页。

畜产甚众。”^①

1125年夏,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完颜希尹又向金朝报告“闻夏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金太宗答复“大石(与夏)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②

1125年末,宋朝的边防也得到关于耶律大石的情报,麟府折可求向朝廷献言:“夏国之北,有大辽天祚子梁王与林牙肖太师,统兵十万,出榜称:金人不道,与南朝奸臣结约,毁我宗社,今闻南朝天子悔过逊位,嗣君圣明,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前日败盟之事,当不论也。”^③这个情报中所说大石为肖姓,及梁王称帝与大石无关外,基本反映了这时耶律大石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在《三朝北盟会编》卷98中还引录宋朝使臣赵子砥的《燕云录》中说:1128年他在全国“盛闻(大石)结集兵马及数十万,待时兴举”。

在此期间,耶律大石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由于他在去可敦城途中已通好子白达达人,因而1127年时白达达人即拒绝卖马于金朝,金朝派使问罪,双方关系紧张。耶律大石还积极联络西夏,《金史·宗翰传》卷74称:“耶律大石在西,交通西夏。”并且还进一步想联络宋朝共击金朝。1129年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廷向朝廷报告,耶律大石曾派人持国书去南宋,虽被西夏截留,而送信汉人却到了宋境的曲端处。^④可见耶律大石在外交上争取诸国,孤立金朝的活动很频繁,并且收到了效果。所以从他立王后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并且准备反攻了,1129年金泰州都统婆卢火向朝廷报告:“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⑤这时大石已攻得金朝的北部二营,金太宗完颜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即于

①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25,第178页。

④ 《永乐大典》卷10876,虜字《张魏奏议》:“又奏虜中事宜状,臣近据曲端申,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国书赴朝廷,为夏人截留。”

⑤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30年派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进讨耶律大石，征兵诸部族，但诸部族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①

这次金国出征耶律大石，虽部族兵未能征集而罢，但并不表明金朝无力进攻，因而耶律大石政权在可敦城虽经过五年生聚，军事实力已相当强大，但金朝锐气正盛，正攻城掠地，步步前进，未便立即举兵抗衡，耶律大石在调查了周围形势以后，了解到高昌回鹘王朝和喀拉汗王朝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境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动乱增多，已趋衰落时期，所以他决定先向西发展，扩大领域建立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后，再举兵征灭金朝，复辽疆域。

由是耶律大石在1130年2月22日，^②“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整旅而西。”^③他先遣人送信于回鹘王毕勒哥说：“昔我太祖皇帝北征，地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从这封信中透露了高昌回鹘与甘州回鹘出于同一祖先，即都出自回鹘汗族药罗葛氏族。

高昌回鹘王毕勒哥得到书信后，等到耶律大石部队经过该地时，回鹘王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④从这一条史料看，好像耶律大石西征只经过高昌回鹘一条路线再至中亚巴拉沙衮的。可是志费尼却提出了另一种情况说：“他们抵达吉利吉思国，向该地区的部落发动进攻，后者也反过来袭扰契丹人。他们从那里征进，直到他们来到叶密立，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座其基址至今尚存的城市。这儿有很

①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辽史》卷30《天祚皇帝四》中说：“明年二月甲午”，此处梁园东于其译著的《西辽史》，第10页定为1130年，多数学者从是说。

③ 《边史》卷30《天祚皇帝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辽史》卷30《天祚皇帝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儿汗身边,以致他们达到四万户。”^①从这一条史料看,耶律大石的军队显然曾经叶尼塞河而阿尔泰山,再至叶密立的。

问题就在这里,耶律大石的西征部队究竟是走一条路线,还是走两条路线,需要进一步探究。

日本人羽田亨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②中认为耶律大石的西征是沿着一条路线进入中亚的,即从北路葛逻禄人游牧的海押立进入的;可是他又说契丹人曾攻打过南疆的喀什。这样就前后矛盾,实际是自己推翻了只有一条路的说法。魏良弢在其《西辽史稿》中主张耶律大石由一条路线进入西域,他说:“耶律大石的军队离开别失八里后,首先进入吉尔吉斯境内,但受到他们的抵抗,似乎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这可能与耶律大石基本战略思想有关,保存实力,待时而动,他率领部队西进,到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建立根据地。修筑城池,招抚当地突厥语各部族。”^③照此说来,是西辽军到别失八里后再向北疆阿尔泰山西去,如此绕道是难于说通的。而赵儒生在《西辽史新证》一文中说,耶律大石西征“大体从阿尔泰、塔尔巴哈台、济木萨一带出发,分两路,一路接连渡过叶密尔河、伊犁河、楚河,向巴拉沙衮前进,取哈喇汗朝的统治权而代之;另一路自济木萨经焉耆、库车、阿克苏向喀什方面前进,打了圣节儿信中所提的那一场战役。”^④这里虽提出了两条路线,但仍未说清何者为主力,以及在何处分两条路线等问题。

耶律大石从鄂尔浑河上游镇州出发西征时就已分成两路军队,这是由当时的西域形势决定的。当耶律大石离开镇州时,他仍然留有部队驻守那里,以抵抗金朝的进攻,同时也为西辽东部的疆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② 《禹贡半月刊》5卷7期汉译文。

③ 魏良弢《西辽政治史稿》,《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④ 赵儒生《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54、255页。

域进行守卫,然后再西进。开始西征时的主力是沿着杭爱山北道前进,因为这一路的黠戛斯、西北阻卜诸部在辽代常叛服无常,特别是黠戛斯部一直反抗很激烈,需要在这一次西征时,再一次显示契丹的威力,以免后顾之忧。同时这一条一向是古今著名的草原牧道,从这里可直通阿尔泰山及中亚,又是最重要的物质基地,如果要有作为于草原,必须先占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施展宏图。所以历代草原雄主在据有漠北以后,必须先占有唐努乌梁海、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伊犁河地区,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以及成吉思汗蒙古,无不是如此。阿里不哥、海都所以敢和忽必烈抗争几十年,正因为他们占有这一片草原为根据地,那里有最丰美的水草、肥沃的土地,取之不尽的金银铜铁和各种贵重的稀有金属等。以耶律大石的识见,必然认识到了只有占据这些地区,才能有恃无恐地西进、南下,无坚不摧。所以耶律大石西征主力是在北道,并且由耶律大石亲自统率;而以偏师顺杭爱山以南经吉木萨尔去塔里木盆地,这一路在进攻喀什噶尔时虽然遭到失败,也无关于大局。

耶律大石亲统大军离开可敦城后,先向西北到黠戛斯地遭到抵抗,看来他为了保存实力没有征服该地就向阿尔泰山乃蛮族牧地直趋塔尔巴哈台山南的叶密立河(即今额敏河)地区。《辽史·部族表》卷69中列称耶律大石经过了乃蛮部,而乃蛮部那时正游牧在阿尔泰山地区。可见耶律大石西征所走的漠北草原一道是从可敦城向西北先至黠戛斯地区,再经阿尔泰山,越和布克赛尔盆地,穿斜米思台山至伊米尔河,然后沿阿拉湖南下经阿拉套山之北越过伊犁河,直趋巴拉沙衮。

耶律大石西征的主力部队虽然走的漠北草原道,但他也同样考虑到必须派出另一支部队去征服塔里木盆地,所以他在可敦城时已先派人送信至高昌回鹘王,并得到他欢迎契丹军队假道去进攻东支喀拉汗朝的回信。显然早已探知高昌回鹘与喀拉汗朝之间

矛盾甚深,而与辽朝间不仅早有政治、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并且同信佛教,因而高昌回鹘欢迎耶律大石军队假道西进,从而可知耶律大石所派经行高昌回鹘地区的部队,很可能是从可敦城出发时即取道杭爱山之南直趋巴里坤草原至吉木萨尔,受到回鹘王毕勒哥的欢迎和资助后,再经焉耆、库车进军喀什噶尔。根据伊本·阿西尔《全史》的记载:“在522年(公元1128年)独眼菊儿汗·秦带着大量(军队),只有真主才知道多少,到达喀什噶尔的边界。喀什噶尔统治者,即伊尔汗阿赫马德·伊本·哈桑,武装起来反对他。他集结自己的军队,向敌方进发。他们相遇就发生了战斗。独眼菊儿汗被击溃,他的许多拥护者被杀死。”^①这支契丹军队虽然在喀什噶尔地区遭到失败,但并不是关键性的战役,因耶律大石的主力已在叶密立地区站稳脚跟,事态的发展也证明此后西辽征服东西喀拉汗王朝的军队,还是从巴拉沙衮地区派出的。同时第一次的喀什噶尔战役也并不是东支喀拉汗朝单独抗击,很可能是与塞尔柱王朝军队共同抗击下才取得胜利,是两国的伊斯兰教联军。当时桑贾儿写给报达政府的一封信中说,邪教徒的势力业已大挫,契丹人的一位首领在与喀什噶尔的阿尔斯兰汗阿哈默德的一场交战中被杀了。俄国中亚史专家巴尔托里德对此信甚为重视,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并据此推论说信中提到的被杀者就是耶律大石,从而怀疑说:“耶律大石与西辽建国人究竟是否同一个人,颇值得怀疑。”^②显然这些认识和推论是错误的,就因误把耶律大石的主力放在南线,实际被杀的仅是耶律大石部下负责南线军的一个指挥员而已。

那时金朝十分关注耶律大石的出逃和西征,多方派出人员探听他的实情,因而当耶律大石离开可敦城西征后,金朝立刻从西北前线得到情报,金朝企图乘机进占漠北镇州重地,遂于次年即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5页。转引自苏联《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5页。

^②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四论》,英译本,第101页。

1131年令元帅粘罕“自云中以燕云、汉军、女真军一万人付右都监耶律余睹，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顶林牙于漠北曷董城”，“又起燕云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云、河东夫运粮随余睹行。”^①可是金朝这次进攻却遭到惨败，“曷董城自云中由猫儿庄银瓮口北去，地约三千余里，尽沙漠无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胜数，车牛十无一二得还。”^②这里的曷董城，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说的和勒端城都是可敦城的同名异译，耶律佛顶林牙在其他史籍无此名，可能就是耶律大石西征后留守于可敦城的契丹统帅。而金军进攻可敦城的失败，也说明可敦城这时仍在西辽的辖境之内。这样耶律大石在东线击败了金军的进攻，在额敏河畔又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自土拉河以西至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已连成一片辽阔的疆域，于是即在1132年（宋高宗绍兴二年、金太宗天会十年）2月5日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即在叶密立城正式称帝。根据突厥语族人民习惯，起名为菊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群臣又上中国称号为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追谥其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肖氏为昭德皇后。耶律大石并向文武百官说：“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因赐立功将领萧斡里刺等49人封爵有差，至此辽代事业又在西域开创了新的局面，建立了西辽王朝。

^① 《大金国志》卷7《太宗本纪五》。

^② 《大金国志》卷7《太宗本纪五》。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也有类似的说法：（绍兴元年）是春，金左副元帅宗维使右都监耶律伊都将燕、云、女真二万骑，攻故辽林牙于和勒端城，调山西、河北夫犒饷，自云中至和勒端城，经沙漠三千余里，民无得还。”

(3) 统一中亚

耶律大石在叶密立河畔正式建成西辽王朝后,他的声势和威望大增。已日趋衰落并又不相统一的东部喀拉汗朝民族矛盾日深,而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东部喀拉汗朝的阿尔斯兰汗阿赫马德·伊本·哈桑已死,由儿子伊卜拉欣继位,据志费尼说,这是一个无能的人,受他统治的一些哈萨克族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不再服从他,而“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他又无力阻止或者逃跑他们,于是听说菊儿汗耶律大石人多势众,正率领大军驻扎在边境上,就向他派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刺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①于是耶律大石应东部喀拉汗王的请求,即于1134年初率领大军轻易地进入巴拉沙衮,“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②于是耶律大石即把伊卜拉欣降封为“伊犁克·土克曼”(Ilig turkmen),即土克曼王意,仍保存东喀拉汗朝对喀什噶尔、和田、费尔干纳地区的统治作为附庸。尽管这时耶律大石还没有派军队到塔里木盆地南部去,但伊本·阿西尔指出“当菊儿汗耶律大石的军队出现在喀拉汗王朝边境上时,他们便投入了他的军队,使西辽军队人数增加一倍。”原来东部喀拉汗朝的守边部队不少是契丹人,这时契丹人必然迅速投向耶律大石麾下,东部喀拉汗朝领土实际已在西辽军队控制之下,因而当耶律大石对巴拉沙衮周围的康里、葛逻禄人全部归服,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8页。

^②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很快就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①显然这一次的出兵没有遇到什么艰难。

在此同时,耶律大石又使伊犁河、楚河一带的康里、葛逻禄、乌孙等部落也受其统治后,就派出统治官员到了那些地方,据志费尼说,他把“沙黑纳派到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Barskhan),从答刺速到牙芬奇(Yafinch)的各个地方去”。^②此处“沙黑纳”有人译作“监临官员”,^③而志费尼把对康里人的征服放在派出各地“沙黑纳”之后,这与当时情势不符,应该是先征服康里人之后,才有可能向各地派出官员去统治。因为那里七河、伊犁河、锡尔河一带康里人是一个主要力量,如果康里人不平服,巴拉沙衮地区就寝难安枕,只有平服以康里人为首各部后,才有可能向哈萨克草原各地派出统治官员去,这样才符合当时的情势。

这时,耶律大石不仅对首都巴拉沙衮的统治已巩固,同时哈萨克草原各部也已受其统治,社会安定,生产有所发展,所以志费尼记称:“他的百姓兴旺,他们的牲口长了膘。”^④东部喀拉汗朝地区的统治也已牢固,国力蒸蒸日上,于是日夜不忘恢复辽故国的耶律大石,在衡顾国力之后,决心东征金国,即于1134年3月,命令六院司大土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敌刺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副之,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歌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立旗帜,举行誓师大会,耶律大石向出征将士宣读誓词:“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并对元帅萧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②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18页。

^③ 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④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翰里刺说：“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这不仅表现了耶律大石的战略思想，也是他军事经验的重要总结。可是东征部队经过艰苦行军，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不得已，勒兵而还。耶律大石说：“皇天弗顺，数也！”^①

西辽日益强大，又发大军征讨金朝，这对金朝是个严重威胁，虽因路途艰阻未获成功，但在金朝社会上已引起极大反响，据1134年7月宇文虚中给宋朝使臣杨安的矾书经文并跋语中说：“石头双林，虽未出世，气象已咄咄逼人，又言，当坚其心，有进无退，众魔将降，吾道自胜。又言，若见尊宿，并可告此，盖言达锡林牙势衰盛，欲张浚以其言白上也。”当然金朝也决不坐视西辽强大而不谋征讨的，实际也是及时发出军队讨伐西辽，结果也是遭到了失败。金熙宗(1136~1149年)接位后，耶律大石又派军队突袭了金朝，“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②金朝即命粘罕于1135年底率军征伐。可是金军进入沙漠后，遭到耶律大石潜伏在沙漠部队的猛烈反击，激战三昼夜，未分胜负，此时金军粮草断绝，人马大都冻死，原亲契丹人的副将又率部下数千骑兵起事，投向西辽，于是金军内乱，在西辽军队的夹击下，粘罕大败而归。这些史实都反映了西辽想复国，金朝想征灭西辽，势不两立，双方都戒备甚严，未敢稍懈。

在西辽和金朝间的多次战斗中，势均力敌，都无法取胜，促使西辽东部边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于是西辽又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决心向河中进军，继续征灭西部喀拉汗朝领土。公元1137年他首先派军队进入费尔干谷地，由此向河中推进，到达霍占德时，遇到西部喀拉汗朝大汗马赫穆德·伊本·穆罕默德的抵抗，于回历931年(公元1137年5月~6月)两军激战，西部喀拉汗军大败，大

^① 《辽史》卷30《西辽》，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

汗马赫穆德逃回撒马尔罕,据伊本·阿西尔说:“事件严重地震惊了它的居民,恐慌和沮丧加重。单等着早上或晚上灾难(的降临)。布哈拉和河中其他城的居民也是这样。”^①

原来河中从1089年起已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公元1130年塞尔柱王朝的苏丹桑贾尔进一步出兵占领撒马尔罕,加深了西部喀拉汗朝的从属地位,马赫穆德实际已是桑贾尔的傀儡,所以他逃回撒马尔罕后,就向桑贾尔求援。要求他为保卫穆斯林的事业出兵攻打异教徒。从而桑贾尔即于1141年7月征集呼罗珊西吉斯坦伽兹纳马赞兰德(衞穆耆而)、古尔等地十万多骑兵渡过阿姆河,开进河中地区。耶律大石曾向桑贾尔去信,希望关于河中地区问题不要用武力解决,采取协商办法,用和平手段解决。可是桑贾尔自恃兵力强大,态度很傲慢。于是耶律大石就下令向河中进军。两支大军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相遇。那时西辽军人数比桑贾尔统率的西部喀拉汗及塞尔柱的十万大军少,加上西辽军又是远道前来,应该说形势对桑贾尔有利,在这种态势下,耶律大石只能运用智谋,避其所长,击其所短,才能取胜,所以他首先探察敌情,并亲自察看环境,在达尔加姆峡谷立营,先抢占有利地形,然后鼓舞将士们说:“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用以坚必胜信心,然后下战斗命令:派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领兵二千五百攻敌右翼;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敌左翼;自己则率军攻敌中军。桑贾尔军队的右翼主将是艾米尔军马吉,左翼主将是西吉斯坦国王,中军由桑贾尔亲率,而以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殿后。

公元1141年9月9日(回历536年萨法尔月五日)会战开始,尽管桑贾尔军队在开始时打得很顽强,特别是西吉斯坦国王的军队甚为勇敢,可是西辽军队却越战越猛,尤以葛逻禄人出力最多,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6页。

终于大败桑贾尔军队，桑贾尔仅率少数残兵脱逃，他的妻子及左右翼主将等均被俘，士兵死伤惨重，单在达尔加姆峡谷就有一万名死伤者。总共死伤多少，记载不一，《辽史》卷30说桑贾尔联军在“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未说确实数字；伊本·阿西尔引用的材料说是“十万人被杀”，巴尔托里德认为是死伤三万人。^①以后者三万人的数字较近于实情，前者十万的数字显然有夸大。因为中亚史料都说桑贾尔联军十万人，不可能全部死伤，明说有些是逃走了。不过这次战役是中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所以伊本·阿西尔说：“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在呼罗珊也没有比这更多的死亡。”^②这次会战的胜利，就使西辽的政治声望大增，中亚各族的穆斯林们都慑服于异教徒的统治。

不可一世的桑贾尔惨败后，带着西部喀拉汗朝可汗马赫穆德及少数残兵败将仓惶南奔捷尔梅兹（忒耳迷），渡过阿姆河，逃入呼罗珊。从此塞尔柱王朝势力退出河中地区。耶律大石大胜后，释放了战俘，即率兵占领撒马尔罕。但他对待西部喀拉汗朝和东部喀拉汗朝一样，扶植其后裔作为附庸，继续统治河中。鉴于大汗马赫穆德的出逃，即封其弟依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为桃花石汗，仅留一名沙黑纳监督其统治。志费尼指出：“拔汗那与河中地区都承认耶律大石“为他们的宗主”。^③

耶律大石征服河中后，他的骑士和马匹为数大增。他又派大将额儿布思(Erbüz)出征原为塞尔柱王朝附庸的花刺子模，很快征服之。他们“洗劫村落，进行大屠杀，花刺子模沙赫阿此兹派出使臣，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388、389页。

^② 关于卡特万会战的详情见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多本，第11卷，第53～57页。转引于《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3～67页。

^③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向他表示愿意效忠菊儿汗,并每年交纳三万金狄纳尔及其他贡品。”^①按照这些条件缔结和约后,颉儿布思即撤军。《辽史》卷30所说“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这里的回回国就是指的花刺子模国。

耶律大石在统一西部喀拉汗及花刺子模地区后,即班师回到巴拉沙衮,于康国十年(公元1143年)歿,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在《辽史》卷30《西辽》中说:“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尔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这个说法前后矛盾,如果照此说法,耶律大石军队没有定都巴拉沙衮之前就先进入河中,这就是说东部喀拉汗朝没有降服之前,耶律大石就西进河中,这与史实不符。这一点梁园东曾指出:“据《辽史》原文,谓其于忽儿珊战后,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是谓其即位之年‘甲辰’,然大石于保大四年(1124年)西行,其年己为甲辰,此后五十九年中再无甲辰,大石何能于甲辰年在起儿漫即帝位?”^②显然是把大石称帝及其地点都记错了。

综观耶律大石一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辽朝灭亡之际,仅率少数人员仓促离开故土西征,兵行万里,竭尽智谋,“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建立起西辽王朝,不到二十年时间,统一了东起鄂尔浑河,西尽威海,北及哈萨克草原,

^① 这里没有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418页所记年交三千金狄纳尔贡赋之说,而是采用巴尔托里德及魏特福、冯家昇所说年交三万金狄纳尔之说。在《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390页说:“不论实物贡品,每年向哈刺契丹缴纳三万金狄纳尔”。魏特福、冯家昇二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第64页所引蒙盖特的英译文也说:“并同意缴付牲畜、物品和三万狄纳尔为年贡”。

^② 布莱资须纳德著,梁园东译注《西辽史》,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4页译注二十四,这一点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中也指出:“天祐出军夹山,在保大四年七月,达实(即大石)西去即甲辰岁,其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兵行万里,驻军塔什干,凡九十日,又西至奇尔爱雅,而后受册即位,其所历日月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

南至阿姆河, 帐米尔、喀拉昆仑山的辽阔疆域, 左右多民族, 多宗教的中亚形势近百年。他总结辽朝亡国教训, 吸收中亚各族的统治经验, 因地因族制宜地创建和制订了有利于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的一套封建体制和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的穆斯林史学家称赞耶律大石“公正和有才干”。^① 于13世纪初亲历中亚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也说: “耶律大石颇尚文教, 西域人至今思之。”^②

(4) 统治特点

契丹族原是游牧为主的民族, 后来耶律阿保机崛起, 又征服了不少从事农业的汉族地区, 创建辽朝, 为了便于对农牧民统治, 创立了“北面”、“南面”官, 对农牧民分治的政治体制, 《辽史·百官志》说: “辽国官制分北南院, ” “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 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 故名北院。” “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 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 故名南院。” 对此元好问简单概括说: “北衙不理民”、“南院不主兵”。^③ 实际就是军权掌握在契丹族之手, 被奴役的汉人, 只准为其纳粮服役, 正是《辽史·肖孝忠传》卷 81 所指出的“国制: 以契丹、汉人分北、南院枢密治之。” 这种两部制是辽朝政治上的一大创见, 即根据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不同特点, 分别设置机构进行统治, 对定居的农业民族置南面官, 按地区管理, 设置州县; 对游牧民族仍以其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为行政单位, 设官治理, 由北面官总

^① 朱兹贾尼《宗教保卫者一览表》, 拉维蒂英译本, 第 2 册第 912 页。转引自魏特福、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第 671 页。

^② 《湛然居士文集》卷 12“怀占一百韵寄张敏之”自注。

^③ 《遗山先生文集》。

其事。

耶律大石于1124年出走后,也沿袭辽制而“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①以后金朝所得情报也说耶律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②因为耶律大石在漠北统治时期,其所辖地区既有契丹及其他各游牧部族,也有七州汉人及其他定居民族,仍适用北南两部制统治。建都巴拉沙衮后,广大的哈萨克草原各部仍以游牧为主,保留了氏族部落形式。而楚河、锡尔河一带也已有相当多的定居农业,特别是河中和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区域,更是定居农业区域,所以终西辽一朝也一直实行北南两部的统治体制。

耶律大石虽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但故辽亡国的余痛犹在,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的辽朝,竟然在金朝阿骨打崛起后难于抗击,一败再败,这是耶律大石所亲身感受的,亡国的原因他也是深切了解的,因而他必须吸取辽朝亡国的教训来制订西辽王朝的体制和国策。特别是西辽王朝的主要根据地在中亚,民族宗教更为复杂,民情习俗更各异其趣,但有一点是在任何地区都是相同的,就是必须要轻徭薄赋,使各族人民能衣食自给,才能求得社会安定,与各族之间和睦相处,对此耶律大石是有较深刻认识的。

因此他首先因地因族制宜地采用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被列为附庸国的各地实行羁縻政策,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有的统治机构和人员,让他们继续统治,很少干涉其内部事务,他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还拥有一定的军队。穆斯林作家伊本·阿西尔说:“在政治上,西辽王朝对归属它的国王让他们继续统治本土,发给他们一块银牌做为归顺的标志。”^③西辽平时并不在附庸国境内常驻军队,只是在一定时期派兵巡视,或附庸国地区有变乱和外敌人侵情况,

^① 《辽史卷29《天祥皇帝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多本,第11卷,第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6页。

西辽才派兵前往镇压,如公元1141年7月游牧在河中的葛逻禄人遭到塞尔柱王朝桑贾尔军袭击时,耶律大石下令进军河中击溃桑贾尔军。不过虽然同属附庸国也还根据其重要性及忠信程度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如离畿辅较远的花刺子模是定期派出官员去探察情况。位处襟要的富饶农业地区如东西喀拉汗朝及高昌回鹘地区则派出监官常驻其首府。有的唯命是听的忠实分子,如布哈拉“布尔罕王朝”则完全让他们自治。这种根据不同情况实行的羁縻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赢得了各族统治者的好感。伊朗史学家志费尼指出:当哈喇契丹的诸汗控制了河中时,算端乌思蛮也受菊儿汗的统治,服从他的教旨和禁令。菊儿汗那方面让他继续拥有河中的国土,没有把他从那里撵走,满足于征收一小笔年贡和把一名沙黑纳派驻在他那里。算端乌思蛮过着安适和快乐的生活,每当他朝见菊儿汗时,总受到尊崇礼敬的接待。”^①

对子康里、葛逻禄、乌孙各部也都保留了他们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由各部落原有头目进行封建统治,也对各地派去沙黑纳。对都城虎思斡耳朵及附近的七河地区则作为直属领地,由西辽派出官吏治理。

鉴于亡辽的税赋徭役太重,《辽史·耶律昭传》称:“每当农时,一夫为顷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冗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辽史·肖韩家奴传》也说:“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殫,警急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所以耶律大石能否在人地生疏、民族复杂的中亚地区巩固封建统治,是否能雷厉风行地实行轻徭薄赋,使正在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成为当务之急。深有远见的耶律大石的税收制度比原有的喀拉汗朝还轻,伊本·阿西尔的《全史》指出“他们(指西辽)占据了整个突厥斯坦国家,当他们占领城市以后,对于它的居民未做任何改变,只从每户——从城市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466页。

居民,此外,也从农村居民收一个狄纳尔,至于耕地之类,它们给居民享用。”^①《金史·粘割韩奴传》则说,大定(公元1161~1189年)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以十分之一输官。”这两条史料虽稍有出入,但按每户征收一个狄纳尔的“户赋”看是较轻的。因为狄纳尔是一种冲制的金币,每枚重约七、八克,形如榆荚,像铜钱一样,一枚为一文,是那时西域通行的货币。常德《西使记》中指出:“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而对于附庸国所征收的一小笔年贡的标准看来也是按所报的户数征收年贡。花刺子模的每年贡纳三万金狄纳尔,也是以户为计的数字。土地税则仍由各附庸国官吏征收,作为他们进行封建统治费用。这种十分之一的土地税比中亚伊斯兰教规定的税率“哈拉吉”(土地税)交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要轻得多,所以耶律大石定下的赋税政策,不仅为西辽境内各族人民所能接受,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元朝1259年奉召赴波斯觐见旭烈兀的常德途经中亚时还说“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这里张星烺注说:“拉施特《史集》载蒙古宪宗元年,大汗诏定波斯等地赋税方法,最贫者每岁纳金币底纳儿一枚,最富者底纳儿十枚。”^②从这里也可知西辽时每户所纳一个金狄纳儿是指一般中等以下人家而言,由于贫富的差别,富户达十金狄纳尔。在西辽时很少记述有关各族人民起义的事,这与轻徭薄赋政策有密切关系,还由于西辽政权没有没收原来王朝和官僚的土地财富。保留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各族封建地主和牧主的支持。

耶律大石所定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整个西辽时期并没有改变,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6页。

^②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65页注(21)。

可是一个政策能不能彻底执行,还取决于执行政策的人。在西辽末年,经过几代的统治,有的西辽官吏骄横起来了,有的不按既定政策办事了,这样必然要遭到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志费尼指出:当哈刺契丹(Qara-khitai)的皇帝征服河中及突厥斯坦那年的春季,巴尔术也落入臣服的圈套,不得不缴纳贡品。哈刺契丹的皇帝把一名沙黑纳(shahna)派给他,其名叫少监(shaukem)。这个少监,当他职位上站稳了,就开始作威作福,对亦都护和他的将官百般凌辱,撕毁他们的荣誉面纱,因而他成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憎恨的对象。^①可见西辽初年定下的政策是由于西辽末年派出的一些官吏骄横不法才遭到人民的反对,并不是政策的改变。

耶律大石吸取亡辽的另一教训是不让将军直接控制军队。原来辽朝的军队直接掌握在各王公大臣及节度使手中,这在对外扩张时发挥过一定作用,可是到建国时期,王公大臣们都想以自己掌握的军队转向为自己谋利,在王朝末期更一再发生叛变和拥兵自立。如天庆五年(119年)9月有御营都统诸行营副部署耶律章奴率军反叛,大掠各州,12月又有中军都监耶律张家奴叛,天祚帝亲征才平定。而保大元年(1121年)因争立太子,内部倾轧,大将耶律余睹竟率千余骑叛投金军,成为金军入侵的向导,直逼天祚帝行宫。^②这种接二连三的叛立,大大削弱了辽朝的力量,也是耶律大石所目睹的深刻教训。同时喀拉汗朝的分东西二部,也是由于将军们各拥军队,经常和中央政府争权。耶律大石接受这些沉痛教训,再不让将军们私拥军队,以便加强中央集权。伊本·阿西尔记称:“(耶律大石)不委任艾米尔为百骑以上军官,使其不能对他叛乱。”^③由耶律大石直接控制军队,随时调配战士的措施收到了一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辽史》卷29《天祚皇帝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多本,第11卷第57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7页。

定效果,在西辽史上确实未见地方军和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记载。

再一个教训是不给皇亲国戚分封土地。因为在辽代以亲兵和门客(部曲)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宫卫,以及由贵族和官僚占田夺地形成的头下军州,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封建割据,不断削弱中央集权制度,其成为故辽日益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耶律大石就对皇亲勋戚概不分土地,以免尾大难制。据伊本·阿西尔说:“他(耶律大石)劝导自己的亲信们要居安思危,战战兢兢,不让艾米尔(将军们)拥有封地,但自己赏赐他们。并说‘如得到封地就要肆虐。’”^①而原来建立在中亚的喀拉汗王朝、萨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等都是实行分封制,他们称为伊克塔制度,由是各王朝内部分立和反分立的斗争几乎和王朝相终始。耶律大石深刻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为防止权贵们的肆虐,就坚决不给任何人分封土地,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地方的封建割据,确实中外史籍上都未见记载西辽时期有割据政权和封建混战的情况。

在中亚地区能否处理好宗教问题,是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古代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几乎都发达于中亚。西辽进占中亚地区后,虽然各族人民已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佛教仍占相当势力,祆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还有一定残余力量,游牧民中的萨满教也还相当流行,契丹贵族又是佛教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兼蓄并包的宗教政策,才能各守其教,和平相处,如果扶此抑彼,就会引起宗教战争,造成社会混乱。耶律大石也沿洞到此种特点,从而宣布信教自由,所以有的人说耶律大石是“一位摩尼教徒”;^②又有人说耶律大石“秘密地成为穆斯林”。^③由此反映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7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7页。

^②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5页。转引自苏联《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5页。

^③ 朱兹贾尼《宗教保卫者一览表》,拉维蒂英译本,第5册第912页。转引自魏特福、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第671页。

出耶律大石确是很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很显然到1211年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由于改变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迫穆斯林们改信佛教,立刻就激起了穆斯林们的极大反感,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终至迅速走上灭亡的道路。

西辽尽管不在附庸国常驻军队,但仍然有一支镇慑的部队。据伊本·阿西尔说:耶律大石有一支“突厥部队,汉人部队,契丹部队,”按这个次序来看他的部队以中亚突厥语族人最多,其次为汉人部队,契丹军最少,所以他在河中卡特万草原与塞尔柱王朝部队会战时,一下子就能征集七万人,并以骑兵部队为主。对保卫边疆、巩固统治、镇压人民、向外扩张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支部队的民族成分史籍虽少记载,但可以推知是以康里、葛逻禄、突骑施等部人民为多,这是由于契丹族也是游牧民,进入中亚后,都城周围主要是这些部落,易于征集;又是骑兵,来去行动迅速,可以出敌不意进行突袭。而喀拉汗王朝与高昌回鹘都有以回鹘族为主的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再征集回鹘军队去镇压和巡边。

(5) 疆域与民族

疆 域

俄国史学家巴尔托里德认为,西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说,西辽“是中国辽朝的一个分部,它的领土是中国历史版图的一个部分,它的纪年在中国正史(《辽史》)中曾给予正式的著录,在辽远地面上建国而被中原正统历史著录者,此为极破格的一次,甚至是唯一的一次。”^①足见西辽在中亚建国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事情,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2怀古诗一百韵自注云:

^① 巴尔托克里德著《突厥斯坦简史》,见《中亚史四论》英译本,第28页。

“(耶律大石)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确实是中亚历史上的一个泱泱大国。可是其疆域究竟有多大，一向为中外史地学家所十分关注。它的疆域四至，迄今仍众说纷纭，不过不断有新见产生，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①

根据西辽统治特点，凡是附庸国及交纳税金的地区都应该属于西辽的疆域，不过在其统治近百年近时间中，随着国力强弱的不同，疆域也有所变迁，惟其基本疆域还是固定未变的。从1124年到卡特万会战的次年，即1142年是耶律大石奠定西辽版图的时间，1160~1170年西辽夷列及普速完在位时是西辽领土开拓最广的时期。

谨以位于楚河的西辽政治中心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分析其疆域的四至，可以看到在此东北的漠北地区，自耶律大石于1124年称王起，直至1156年之前，土拉河以西直至中亚的广大草原，一直是西辽的势力范围，在1136年左右，金熙宗曾派元帅粘罕征讨可敦城的契丹军，金军遭到惨败，他的副将契丹人外家得也乘机投归大石。不过金朝对未收复的漠北地区日夜不安，时刻筹划进取，据《大金国志》卷14载，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2月又派左都监帅婆隆敦经略田于曷董城（即可敦城），却遇到“林牙子乌列游骑数百人出入军前，婆隆敦遣使打话，遂退。”此处乌列即指1151~1163年继大石登位的夷列帝。可知这时西辽在可敦城以西仍有相当势力，金军还不敢贸然深入。以后，金军势力才逐步达到阿尔泰山以

^① 中国对西辽史及疆域研究做出不同贡献的如：丁谦《西辽史疆域考》，见地理学丛书《古学汇刊》第一套。岑仲勉《西辽史书所见》，见《金陵学报》1935年第4卷第2期。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7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赵儒生《西辽史新证》，刊《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等。国外对此进行研究的如：巴尔托里德《七河地区历史概要》，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魏特福、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插图，美国费城，1949年版。赫尔曼《中国历史和商业地图集》1935年版。日本松田寿男《亚洲历史地理图》。博斯沃思为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刺契丹”词条，第4卷第581页，1976年版。

东布尔根河地区,并在漠北设立了西北路招讨司,以统治契丹族及其他突厥语族人民,才有正隆五年(1160年)漠北契丹人撒八的起义,^①这是由于金朝尽征漠北契丹男子去征宋,撒八、孛特补遂率众杀金西北路招讨使完颜沃侧等人反叛,一时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都响应,在金朝大军的围剿下,遂“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②移刺窝斡及山前群牧不愿西行,遂杀撒八,东攻金朝临潢府,史称窝斡“兵众强,车帐满野”,众有八万多,并于正隆六年十二月(1161年)一度称帝,改元天正。由此可见契丹族在漠北人数之众;并知撒八西行要经龙驹河,即阿尔泰山的乌伦古河一道,足证阿尔泰山地区为西辽所统治,金朝无法往追。从而也可知在1156年以前西辽的东北疆域直至土拉河及鄂尔浑河。1156年以后,金朝势力深入漠北,并在那里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由是西辽疆域退至阿尔泰山东部的布尔根河地区,隔沙漠戈壁与金朝相邻。所以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世宗诏遣监察御史完颜规古速巡边时,随行的契丹押刺四人,授刺、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③。为此,金世宗对漠北的契丹人很不放心,深恐“大石使入间诱,必生边患”。^④并认定契丹人决不会与金人同心,因而下令把西北路契丹人徙上京、济、利等路安置,使“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⑤

西辽在最东北边的疆域应从谦谦州,即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梁海盆地开始,向西包括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在内的阿尔泰山地区。因为耶律大石在定都巴拉沙衮时,就把“沙黑纳派到谦谦州

①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称:撒八起义为1161年,不妥。因为《金史》卷133《移刺窝斡传》称:“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煽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闻男子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遂反”。

② 《金史》卷133《移刺窝斡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到巴尔昔罕(Barskhan),从答刺速到牙芬奇(yafinch)的各个地方去”。^① 这里的谦谦州,岑仲勉《读西辽史书所见》^② 中译成克姆刻耶,实即都从 Kum-kidjik 一名而得,岑氏把它解释成为今阔帕勒(kopal)城附近地,即《元史·宪宗纪》的海押立。赵儒生于《西辽史新证》一文中^③ 颇赞是说。这里把克姆刻耶断成科帕勒是不妥的,这在俄国人布莱资须纳德的《中世纪研究》中已指出,今“克姆(kem)河或叶尼塞河(yenissei)之上游,土人尚称曰克姆,犹云河也。正源于乌鲁克姆(Ulu Kem)大河也,一小支曰克姆齐克(Kem-chik)小河也,小河流域内尚有地名曰克姆克姆齐克(kemKemchik)”^④。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所以谦谦州应在今唐努山和萨彦岭之间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即《唐书》所称的剑河。核诸西辽时期所管辖的东北疆域也应在唐努乌梁海之地,北与黠戛斯(辽史译称辖戛斯)相连,决不止于科帕勒。因谦谦州之北的黠戛斯地区在辽代反抗甚烈,叛服无常,耶律大石西征时,也并未征服,当然这是为西辽所十分关注的问题,因而大石定都巴拉沙衮后,立刻派监督官至谦谦州去,以侦察和防备黠戛斯的动静,因而这时从谦谦州经阿尔泰山直至巴拉沙衮的广大草原都是西辽疆域。所以巴尔托里德在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刺契丹”词条中说:从公元 1141 年 9 月 9 日卡特万会战时起“哈刺契丹帝国北起吉尔吉斯国家(在叶尼塞河),一个时期南到巴尔赫,西起花刺子模,东至回鹘国家。”^⑤ 博斯沃思在新版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哈刺契丹”词条中也有类似说法称:“哈刺契丹控制的疆域北起吉尔吉斯国家的边界,南到巴尔赫,(560/1165 年占领),西起花刺子模至东突厥斯坦的回鹘地区。”把西辽的东北边界定在谦谦州,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是符合于史实的。萨

①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0 页。

② 梁园东译注《西辽史》附录,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③ 赵儒生《奇脱居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1 年版,第 254、255 页。

④ 布莱资须纳德《中世纪研究》卷 2,第 101~102 页。

⑤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 5 卷,莫斯科 1968 年版,第 544 页。

彦岭以北的吉尔吉斯地区不包括在内,因为《辽史》中并无征服辖戛斯的记载。

西辽的北部疆域丁谦、越俪生等只说是到科帕勒,顾颉刚、章巽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7图越过海押立而定在巴尔喀什湖的东北端,看来都不很妥切。因为喀拉汗朝之所以投降西辽,就因葛逻禄、康里等部反对他,所以大石轻易就到了巴拉沙衮,不久,康里、葛逻禄部也都服属西辽。是以志费尼说,大石、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那里康里人的主要分布区域是在楚河、锡尔河中下游直至咸海以北的广大区域,巴尔喀什湖以东及其东南地区则以葛逻禄人为多,海押立就是葛逻禄的政治中心,但这两部人的牧地很难截然分开,常是错牧而居,在巴尔鲁克山及阿尔泰山地区也有康里人,现在巴尔鲁克山中仍留有航里(即康里)的地名,所以《金史·粘拔恩韩奴传》称:“大定中(约在1075~77年间),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王观其意。”有人指出粘拔恩君长“在辽代游牧于阿勒坦山与谦河之间”^①,康里部是西辽属民,因而西辽北部疆域应自阿尔泰山迤西斋桑泊向西南循巴尔喀什湖北岸,西行至楚河河尾及锡尔河下游。邓锐令《西辽疆域浅释》一文中所指西辽的北部疆域基本上符合实情,仅东部自塔尔巴哈台西端开始一点,我认为还应北移到斋桑湖开始。

巴拉沙衮正东系高昌回鹘,是西辽的附庸,它的东部边界也就是西辽的东部疆域。那时西夏已占有河西走廊,直到瓜、沙州地区,即今安西、敦煌地区,据《宋史·夏国传》卷485称:西夏元昊于1035年(宋仁宗景祐二年)“昼夜角战二百余日,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高昌回鹘的东境则与西夏接界,即今哈密、巴里坤、伊吾、罗布泊一带均系高昌回鹘辖境,在北塔山之北和乃蛮部接壤,

^① 魏良弢著《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罗布湟之南则为东部喀拉汗朝境域。《元史·必兰纳识里传》卷202称：必兰纳识里“初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这里的感木鲁即哈密力的异译，可知哈密地区属于畏兀儿亦都护所治，故称北庭感木鲁人。而元陆文奎《墙东类稿》卷12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中还说：“公讳杨珠布哈，字延真，辉和尔氏，居哈喇和卓，为北庭大族，辉和氏列城五，锡勒沁城尤严险，北连沙漠，南抚诸羌，公之先世守之。”日本安部健夫著的《西回纥国史研究》(504~505页)中认为锡勒沁应是车尔成，从而认为由此上推其曾祖父，正值西辽初年，数代一直守卫车尔成。此处指说车尔成有所不妥，因为西辽初年时车尔成已属东部喀拉汗王朝，不属高昌回鹘，因而此处的锡勒沁城应为今库尔勒地区，其守卫范围应包括库尔勒、尉犁、罗布泊一带，所以说“北连沙漠，南抚诸羌”。以上史实都证明西辽正东边界在哈密、巴里坤、罗布泊以东和西夏交界。

东南边界则以东部喀拉汗王朝和西夏沙州连界。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5月西夏西南都统嵬名济给宋朝泾原总管刘昌祚的信中说：“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①当时喀拉汗朝与宋朝间使节往还不断，宋朝也有意联络喀拉汗朝，并一再给以册封，以图共攻西夏，因而《宋会要辑稿》称：1097年喀拉汗王朝“差人马攻甘、沙、肃三州”。可知东部喀拉汗王朝的边界与西夏的沙州毗连，其界线应该是在今若羌与敦煌之间的戈壁。

西辽的南部边界即以原来东西喀拉汗王朝的边界为准，因二者都是西辽的附庸。而东部喀拉汗王朝的南部边界原以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阿尔金山与吐蕃、黄头回纥连界。在帕米尔地区的南部界线应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宋史·于田国传》卷490称：建隆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

二年(公元961年)12月,圣天遣使言“本国去京师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余里,南接吐蕃”。此处指出葱岭即为婆罗门界,历史上葱岭与婆罗门间向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则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七个帕都在东喀拉汗朝境内。

至于西喀拉汗朝南部的界线基本以阿姆河为界,先是与塞尔柱王朝为邻,后来与古尔王朝为邻,西辽也循此界线。不过有时还越阿姆河而统治了河以南的一些地方,如1141年9月9日卡特万会战以后,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不仅完全退出河中地区,在阿姆河南呼罗珊地区的势力也已日趋衰落,西辽曾一度占领巴尔赫,伊本·阿西尔说:“巴尔赫的统治者每年向河中地区的契丹人送缴哈拉吉(土地税)。”到回历594年(公元1197~1198年)古尔王朝强盛后,又占领了巴尔赫地区。这时才停止了向西辽王朝缴纳贡赋。巴尔托里德的《突厥斯坦》称:《善事系年》(Tarikh-al khayrat)作者引用……安狄枯底(Yusuf Abdallah Andkhudi)的话说,“西辽曾于560年(即公元1165年)攻掠巴里黑与安狄枯(Andkhud)二地。”又云“在1198年八米羊(Bamlyan)的郭耳统治者别忽丁撒木(Baha ad-Din Sam)攻占了巴里黑。”在这以前“巴里黑属于一位突厥王子所有,这位王子是西辽的附庸。^①”可见在1165~1198年间巴里黑曾为西辽的疆域,所以魏特福与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所附西辽图,曾将巴里黑绘入西辽版图。

西辽正西的疆域应包括花刺子模地区在内,有些人未列花刺子模为西辽附庸,^②于史未妥。因为1141~1211年的70多年时间内,花刺子模基本上都向西辽纳贡,其中有短时间向塞尔柱王朝纳贡,但也同时向西辽纳贡,所以俄国巴尔托里德《七河地区历史概要》一书中说:“我们在菊儿汗的国家里,以后至少可以看到附庸统治者对帝国首领三种程度的附属关系,……葛逻禄汗,像撒马尔罕

^① 转引于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

统治者一样,应是忍受菊儿汗的长驻代表在自己身边;对另一些[附庸],如布哈拉的宗教首领——他曾有段时间把俗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则获得了自己为哈刺契丹收纳贡赋的权利。”^①可见巴尔托里德是把花刺子模列入西辽王朝的附庸国。《辽史》卷30《西辽》也明确说,耶律大石在卡特万会战后“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这里的回回国王就是指花刺子模。从此以后,花刺子模沙赫向西辽缴纳年贡三万金狄纳尔。魏特福与冯家昇认为“哈刺契丹[对附庸国]的主权,首先表现在财政问题。”^②这是正确的,西辽虽未直接派官吏去统治,但它必须向西辽缴纳年贡,如果不缴纳就可兴师问罪。所以当花刺子模沙赫阿此思在位,按时缴纳年贡,且很恭顺,他死后,于公元1172年其长子由西辽军队护送回国登上王位后,花刺子模更完全成为西辽的附庸。特克失不仅如数交纳年贡,并“极力用种种方式讨好菊儿汗”,他临死时还“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跟菊儿汗打仗,也不要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因为‘他是有一道其后有可怕敌人的长城。’”^③在特克失之前的1148~1172年间,花刺子模虽向塞尔柱王朝纳贡,同时也向西辽王朝纳贡,事实上是两属。在特克失之后的算端摩河未登位后,力量有所增强,极力想摆脱缴纳年贡的烦恼,并中止了两三年的贡赋,于是西辽菊儿汗就派他的大丞相马合木太(MnhmdTai)去督责应交的赋税,他因正准备率军去出征钦察,即交由其母新秃儿罕哈敦处理此事。她不仅隆重接待西辽使者,并决定悉数交纳年贡,还派她宫廷几个贵人随马合木太入朝菊儿汗,为“迟不纳贡表示歉意。同时保证算端仍恪守藩属之约”。^④可知在花刺子模向西辽缴纳年贡的岁月里,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

② 魏特福、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第666页。

③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419页。

④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始终是西辽的“藩属”。当时花刺子模疆域包括咸海及阿姆河下游三角洲至乌斯提尤尔特高原和卡拉库姆沙漠。是知根据历史事实，应把这些地区包括在西辽版图之内。

由上可知，西辽最广时的疆域，东自土拉河，西至威海，北至阿尔泰山，南至兴都库什山、喀拉昆仑山。后来虽有所变迁，但基本保持了东自伊吾，西至威海，北自阿尔泰山、斋桑泊，沿巴尔喀什湖北至锡尔河下游，南至兴都库什山、喀拉昆仑山、阿尔金山。

民 族

中亚本来是民族十分复杂的地方，西辽建国前后，又在中亚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契丹族。契丹族原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到辽朝兴起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契丹族才陆续进入中亚，所以耶律大石西征时，先他而来到中亚的契丹族，据记载已有“一万六千帐”，每帐以五人计，则总数已达八万，每帐以一战士计，则有一万六千战士，当耶律大石进军七河地区时，他们加入了西辽军，就使西辽军队“增加一倍”^①。可知耶律大石西征时的契丹军队约在二万人左右，此外还在会七州十八部王众时，又得“精兵万余”。这些是汉族兵和外部族兵。如此可知西征军队约三万多人，但得在可敦城留守一部分，跟随大石继续西行的至少二万多人，其中有突厥语族、汉族、契丹族三部分军队。

这些契丹族兵到达叶密立和巴拉沙衮一带地区后，除一部分守边外，一部分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在尹志平《葆光集》卷上“过大石林牙契丹”诗中也说：“辽因金破失家乡，西走番戎万里疆。十载经营无定止，却来此地务农桑。”“群雄力战得农桑，大石林牙号国王。几帝聚众几百万，到今衰落亦成荒。”^②那时巴拉沙衮周缘地区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5~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其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5页。

^② 转引于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务农的已以回鹘人为多,因而这些契丹人和回鹘人一起生产和生活,必然要逐渐为回鹘人所同化,所以于公元1220年出使成吉思汗而途经其地的乌古孙仲端说:“今其国人无凡,衣服悉回纥也。”^①不过西辽的基本根据地巴拉沙衮一带是在哈萨克草原,还有不少契丹人继续保持了游牧生活。与当地其他民族一起游牧。这些继续从事游牧的契丹人,后来融入了哈萨克族。在哈萨克草原北部、西部未受西辽统治的有钦察、寄蔑、阿速等部,在东北部与西辽境邻接的是一些蒙古语部落。

西辽的主要根据地及其直辖领地都在哈萨克草原,原来契丹人的游牧生活习俗与哈萨克草原诸部也大致相同,而西辽的主要军事力量也以那里的葛逻禄、康里、乌孙诸部人为多。原来在东喀拉汗朝政治中心巴拉沙衮地区周缘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都不服从汗王统治,汗王迫向耶律大石求援,耶律大石才轻易地进入巴拉沙衮。他为了处理葛逻禄王府,使之成为西辽王朝的藩属,而原来西喀拉汗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也是游牧的葛逻禄人,所以后来西喀拉汗王朝的统治者也与葛逻禄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磨擦,造成多次流血冲突。西辽主要依靠葛罗禄等部族的武力统一了中亚,统治近百年,但也因民族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和尖锐,自1211年起终于被乃蛮部屈出律篡夺了帝位。

当然回鹘族也是西辽王朝境内主要民族之一。因为喀拉汗王朝的汗族是回鹘族,后来分裂为东西喀拉汗王朝后,统治者也仍是回鹘族的后裔,原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及河中一带的咽面、葛逻禄人日益为回鹘族所同化,从而回鹘族各部不同名称,更日益为回鹘的共名所取代。《宋史·于阗国传》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遣使罗散温献方物,十一月,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鲙鳞黑

^① 乌古孙仲端《北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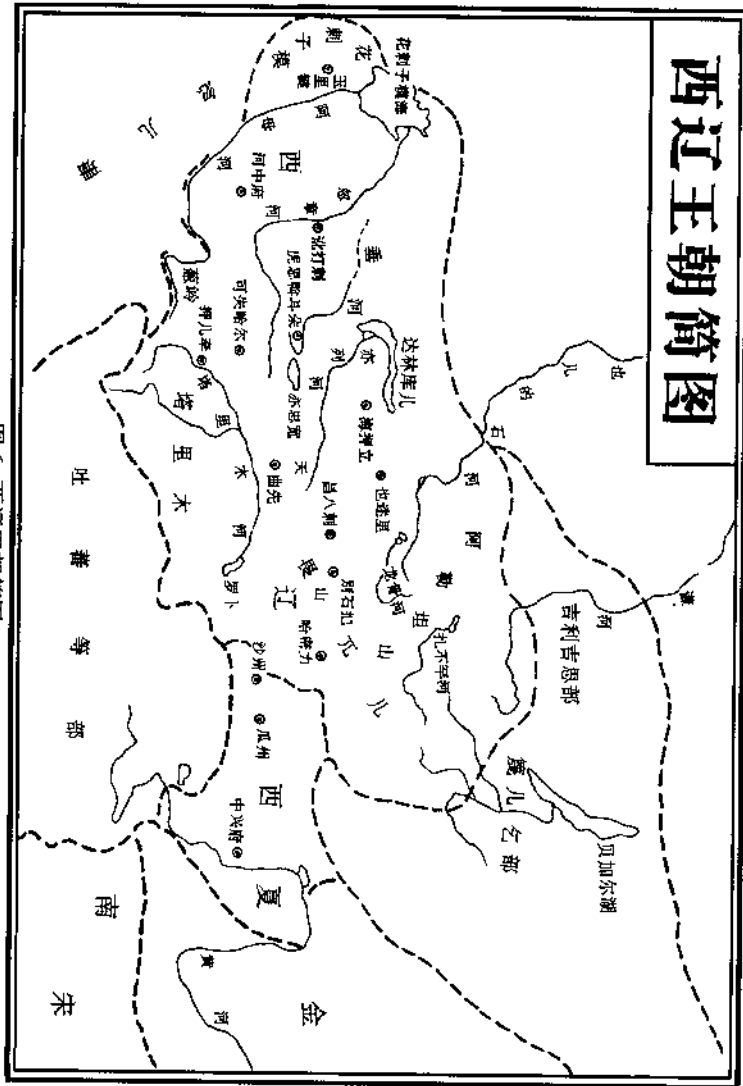


图6 西辽王朝简图

韩王。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于阗谓金翅鸟为‘鲐鳞’，黑韩盖可汗之讹也。”这里的黑韩王即喀拉汗王，罗撒温即罗撒温，其所遣使者已明说是回鹘。至于高昌回鹘境内更主要是回鹘族。《宋史·高昌国传》称：“建隆三年(962年)四月，西州回鹘阿都督等四十二个以方物来贡。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太平兴国六年(981)，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斯兰汗，遣都督麦叔温来献。”并说高昌国“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馱，小众馱，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甚众。”这里虽还指出一些不同族名，但这些突厥语族的各部都已是残存之名，不久就全都融入回鹘族中，也像哈萨克草原各部都融为哈萨克族一样。

咸海及阿姆河下游以南地区原为花刺子模及塞尔柱突厥统治地区，后则逐渐形成为土库曼族(又译突厥蛮族)，而在阿姆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则形成为以伊兰语为主的塔吉克族。位于河中及阿姆河中游以南的塔吉克人主要从事农业，位于帕米尔及其以西山地的塔吉克则从事畜牧和狩猎，在城市的塔吉克人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并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除上述民族外，西辽境内的汉族日益增多，并遍及各地，汉族自两汉时代大量涌入天山南及伊犁河地区和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中亚外，汉族的西移在隋唐时代又是一个高潮；到了西辽是汉族西迁中亚的第三个高潮。

阿力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

(1) 阿力麻里古城的地理位置

阿力麻里古城是伊犁地区著名古城之一,历史悠久,在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阿力麻里古城城址已被毁,近代以来对阿力麻里城的位置颇多歧说。尽管城址已难觅,惟根据一些有关古城的游记仍可确定古城的具体位置。如在元太祖十五年(公元 1220 年)西行,1222 年东返的李志常,来去都经过阿力麻里古城,在他所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巔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综观丘处机一行西行旅程,即沿赛里木湖南缘,进入果子沟,与现行乌鲁木齐至果子沟的公路大致相当,古今来的地形和路线并无多大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出果子沟峡谷到芦草沟后究竟向哪个方向走才到阿力麻里城。《新疆图志·道路志》认为长春真人到芦草沟后是南行到塔勒奇城北的磨河旧城。因芦草沟向南行至磨河旧城间多

是戈壁,与长春真人所说出峡后“入东西大川,水草丰盈”的景象不相同。这就可知长春真人出峡至芦苇沟后并不是南行,而是西行经东西平川,并不经戈壁沙滩。所称东西大川就是指经过清水河、阿克苏河至阿力马图河、克干河地区的阿力麻里城。现在克干山南麓,克干河下游有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当地人称为阿尔泰遗址,因其出金子而得名。西距位于霍尔果斯河畔的霍城旧城 13 公里。阿力麻里古城遗址范围甚大,北达克干山南麓,南及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儿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 5 公里,南北还超过此数。据当地人说,周约 50 华里,可知此城面积甚大。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常驻夏于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阔克(Gueuk)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① 这里的阔克实与克干为一声之转。在刘郁《西使记》中所记 1259 年常德西觐旭烈兀经过阿力麻里城所见景色称:“过孛罗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杆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② 这里说明阿力麻里城是民族杂居,尤以汉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为多,说明城内道路两旁流水潺潺,所以水果颇丰,可见那里水草丰美,正是得益于克干河和阿力马图河的丰富水量,才使周围垦辟了大片农田、果园,数百年间一直成为伊犁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徐松《西域水道记》也说阿力麻里城在阿力玛图河滨,并说“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蓄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丁谦在西游记的考证中也赞同徐松观点,这都符合于历史和地理实际。而洪钧反对这些观点。新出版的《古西行记选注》245 页注 16 所说:“阿里麻里在今霍城一带;阿里

^①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0、181 页。

^②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8、239 页。

麻图，为今苏联之阿拉木图，徐松《西域水道记》将此两地混为一处，丁氏亦随之误考”。这是《古西行记选注》一书弄错了。位于今霍城县的阿里麻里城，确是在克干河和阿力马图河地区，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是城市名，非河名。尽管阿力马图与阿拉木图的同名异译，都因该地多水果而得名，这亦不足为奇。在世界上因景色相同而颇多相同地名。但决不能据此而指说离阿力麻里城东 20 里的阿力马图河是弄错了地点。

(2)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递变

唐朝葛逻禄原来分布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一带，以碎叶为中心的突骑施汗国于公元 8 世纪中叶衰落后，从公元 766 年开始，葛逻禄的主要牧地已迁至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地区，并建立了葛逻禄汗国。《新唐书·回鹘传》称：“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疆，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这时的葛逻禄还未信奉伊斯兰教。

阿力麻里建城，很可能 8 世纪中叶于哈萨克草原建立葛逻禄汗国前后就逐渐形成。因为唐朝丝绸之路北道曾盛极一时，那时位于赛里木湖(乳海)东面的普刺城，已是北道上有名的重城，因而阿力麻里和海押立城，也应该形成于此时。于 8 世纪初叶在慕格山(Mount Mug)出土的一份粟特文书中已经提到阿力麻里(Almalik)的名称。^①唐朝以后经过喀拉汗王朝，西辽王朝的统治，到西辽末年时，阿力麻里城已成为中亚的一座名城。被称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他于 1333 年途径中亚花拉子模时，就遇到一个来自伊拉克卡尔巴拉(Karbala)的去中国的商

^①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7 页。

队，他们走的路线是经过阿力麻里，并称当时从西亚去中国的商队很活跃。

到12世纪时，阿赫马德·亚塞维为了加速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发展，就结合哈萨克草原诸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习惯，对《古兰经》原义作了某些变通，并把游牧民中有影响的神祇名字和宗教仪式吸收到伊斯兰教义和仪式中，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写成诗歌体进行宣传。由是他的教义和仪式很快被草原各部落游牧民所接受，因而到西辽末年，在伊犁河流域、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出现了以葛逻禄人为中心的伊斯兰王国。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在13世纪初，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分界线已在昌八里，即伊斯兰教的势力已向东推进到今日天山北麓的昌吉市，与以佛教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互争雄长了。

在西辽统治时期，阿力麻里和普刺的统治者是葛逻禄人斡匝儿，屈出律多次攻打他未获胜。成吉思汗崛起后，斡匝儿即臣服成吉思汗，倍受恩宠，“并奉成吉思汗之命，与术赤结为姻亲”，^①还赠给他一千头羊。由于他酷嗜狩猎，成吉思汗曾规劝他，注意戒备，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可是他从成吉思汗处返回阿力麻里后，依然毫不戒备地热衷于狩猎，即在自己的猎场上被屈出律的士兵擒获后斩杀。其子昔格纳黑的斤(Siqnaq Tegin)继承其位，仍然奉诏与术赤的一女成婚，并亲往朝见成吉思汗，颇得优宠，命其继续治理阿力麻里，惜死于归途。他的儿子又在651/1253~4年承袭了他的位子。

元《经世大典》序录记称：“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这里的回回即指中亚奉行伊斯兰教之地。在成吉思汗统一中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亚后,把辽阔的西域分封给术赤、察合台、窝阔台。

除术赤封地主要在钦察草原外,察合台、窝阔台的封地正是在中亚伊斯兰地区。志费尼指出:“察合台受封的领域,从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Samarqand)和不花刺(Bokhara)止,他的居住地在阿力麻里境内的忽牙思。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Emil)和霍博(Qabaq)地区的禹儿惕;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Güyük)。”^①这里只说察合台的封地是从“畏兀儿地起”。这句话很笼统,可以理解为包括“畏兀儿地”。也可理解为不包括“畏兀儿地,”为此,美国艾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察合台的最早封地应为“从畏兀儿之边(Huded)伸展到撒马尔干的不花刺”。^②从这里可以看到察合台汗国始封之地并不包括畏兀儿的农村之地在内,而是从畏兀儿之边直至河中及伊犁河一带的草原区域,巴尔托里德也指出:“察合台的封地从回鹘地面到撒马尔罕,到布哈拉,从阿尔泰山之南到阿姆河。窝阔台的大帐建立在塔尔巴哈台,在叶密尔河和霍布克河的岸上”。^③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兀儿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浑河(阿姆河)两岸”。^④可知当时察合台的封地是在塔尔巴哈台山西南、阿拉湖之西、七河流域的南部直至河中的广大地区;七河流域的北部属术赤汗国;从塔尔巴哈台山南的伊米尔河流域向东至和布克赛尔盆地经阿尔泰山南至科布多地区为窝阔台封地。说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者的封地是相连的。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6页。

② 艾尔森(Thomas T. Allsen):《十三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载《中国及其周边》(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③ 巴尔托里德著,赵福生译《七河史》中《蒙古察合台汗国简史》兰州大学油印本。

④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181页。

成吉思汗于 1227 年逝世之前,窝阔台一直驻守在叶密立地区。成吉思汗死后,大汗位由窝阔台继任,于是他就到了喀喇和林任蒙古大汗,他的原有封地即赐给他的儿子贵由汗。由于忽必烈的称帝,蒙古贵族间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在西域地区先后掀起了阿里不哥、海都、八剌剌·笃哇的叛乱。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弄得天山南北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察合台后王已无力再战,只好向元中央投降。然后配合元廷,击溃窝阔台系诸后王,于是笃哇即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尔台大会,在到会的中亚蒙古诸王公 360 余人之前,列举窝阔台系察八儿的“罪状”,宣布予以废黜,时为大德十一年(1307 年)。由是窝阔台汗国灭亡,原属窝阔台的封地并入了察合台汗国。于是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不仅包括了中亚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如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锡尔河、阿姆河间的河中地区。同时还包括了中亚最富饶而辽阔的草原地带:如准噶尔盆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草原地区,一向是许多游牧部族,特别是哈萨克族先民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发祥地;河中地区则为乌孜别克族,以农业为主;天山南路各绿洲以维吾尔族为主。这些地区虽都受蒙古贵族统治,但蒙古族人数始终是少数,所以最终都融入了其他民族。另外还有不少汉族和塔吉克族。

察合台的封地最初是以伊犁为中心,包括楚河、塔刺斯河直至河中地区,其政治中心则在伊犁的阿力麻里,察合台本人也常住阿力麻里。到其后裔笃哇兼并了窝阔台的封地和畏兀儿地区后,政治中心也仍然在伊犁阿力麻里,笃哇后裔诸王也仍然常往伊犁。察合台进驻伊犁时,其周围人民主要是杜拉特部落,因而察合台汗国及其后形成的蒙兀儿斯坦汗国所用的各级统治人员和军事力量主要来自于游牧的杜拉特部人民,从而察合台汗国各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实际操纵在杜拉特部游牧贵族手中。

笃哇之子也先不花一世于公元 1321 年依靠杜拉特部力量登上汗位,树牙帐于伊犁阿力麻里,被称为察合台汗国,一般史书称

其为蒙兀儿斯坦。统治着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七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北至额尔齐斯河的广大草原区域以及伊塞克湖以东,焉耆以西的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区域。其中以吐鲁番以西直至费尔干那边境,北至伊塞克湖,东至喀什、莎车、和阗在内的地区,当时被称为“曼噶赖·苏雅”(意为“向阳”,也称为“向阳区”)。察合台汗晚年为要统治这块地区,即分封给杜拉特部贵族乌尔土布,由是不少杜拉特贵族入居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当也先不花在阿力麻里城重建东察合台汗国时,在天山南路的杜拉特部贵族已分化为播鲁只为首和以图来克为首的两支势力。以阿克苏为中心,东北至吐鲁番盆地,西至伊塞克湖,西南至巴楚一带属播鲁只家族管辖。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东至且末、和阗、叶尔羌,西至费尔干西部,南至喀喇昆仑山及巴达克山地区则属图来克家族管辖。也先不花任蒙兀儿斯坦汗国第一任可汗后,天山南路地区仍然委托杜拉特贵族管理。

公元1330年也先不花汗死后,由于正后无子,蒙古贵族之间展开了王位的争夺。当时杜拉特部播鲁只家族权势最大,他出身于七河地区杜拉特部的兀鲁思别克家族,由于他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不敢自称汗,就凭他的权势,于1348年把察合台汗的后裔笃哇汗的年仅18岁的孙子秃黑鲁帖木儿扶上了汗位。

秃黑鲁帖木儿登位后,十分感激播鲁只的扶持,给予了不少赏赐,播鲁只家庭的权势更有了扩张,秃黑鲁帖木儿的政治、军事权力实际操纵在播鲁只家族手中。而秃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时,正当元朝衰落,无暇西顾,汗国境内一些突厥语族化了的蒙古贵族们,各据地盘,横行无忌。秃黑鲁帖木儿面对这种四分五裂的形势,决心依靠播鲁只家族调用杜拉特部的力量,把原察合台领地重新统一起来,恢复过去对河中的统治权。因此,从1360年起,就不断对河中地区用兵,不到两年时间,他对西部察合台汗国作战20余次,利用西部察合台汗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倾轧与混乱,于1362年最终征服了河中及阿富汗北部地区,并派其长子伊利亚斯常驻撒马尔

罕,坐镇河中地区。对于阿姆河南的巴尔赫地区则派一位与自己同名的帖木儿,即“瘸子帖木儿”为该地区的总督。

秃黑鲁帖木儿在位时,扶持他登位的播鲁只逝世后,秃黑鲁帖木儿带着感激的心情,即立其幼子忽歹达袭其父位,而播鲁只的胞弟哈马热丁·杜拉特对此不满,早已羡慕播鲁只的权势和地位,梦寐以求承袭其位,他为权势欲所支配,十分衔恨秃黑鲁帖木儿汗。因而秃黑鲁帖木儿一死,哈马热丁·杜拉特部即举兵反叛,杀死秃黑鲁帖木儿的后继者伊里亚斯和卓,并大肆屠杀秃黑鲁帖木儿家族,“一天这之屠杀了秃黑鲁帖木儿的十八个儿子”。^①只有秃黑鲁帖木儿的幼子克孜尔和卓(即黑的儿火者)被播鲁只之子忽歹达所隐藏,才免遭残杀。由此可见,杜拉特部在蒙兀儿斯坦政权中权势之大,人数之众。

此后,哈马热丁·杜拉特自擅汗号,成了蒙兀儿斯坦的统治者。由于哈马热丁不是出身于察合台汗族,激起察合台后裔们的强烈不满,境内一片混乱。舍力甫丁在《帖木儿武功记》一书中曾说,帖木儿艾弥儿曾为此五征蒙兀儿斯坦。哈马热丁部队屡为帖木儿所败,只好逃往他处,时正当元末明初之际,诚如《明史·西域传》所称:“元亡,(西域)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正是这一时期蒙兀儿斯坦历史的真实写照。

公元1383年杜拉特部首长播鲁只幼子忽歹达利用手中权力,拥立秃黑鲁帖木儿幼子黑的儿火者为蒙兀儿斯坦汗。这时中亚瘸子帖木儿的权势日大。黑的儿火者和帖木儿争夺中亚的霸权中,屡遭败北。致都城阿力麻里也被帖木儿军全部残破,被迫东迁至别失八里,《明史》称之为别失八里政权。黑的儿火者只好承认帖木儿在河中的政权。由是蒙兀儿斯坦的别失八里政权只好投靠明朝,以求在西域和帖木儿王朝争夺势力范围。

^① 毛拉木沙《伊米德史》。

同时根据历史记载,蒙兀儿斯坦汗国的主要居民是操突厥语的部落,其中有杜拉特(咄陆)、康里、乌孙、克烈、阿尔根诺提、阿克拉提、布勒甲其等。这些部落中,杜拉特和康里是蒙兀儿斯坦汗国中人数较多的部落,这些部落主要居住在楚河、伊犁河谷及七河流域。统治阶级则为蒙古贵族;而蒙古贵族始终是少数,因此游牧区的蒙古贵族最后都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苏联帕·彼·伊凡诺夫指出:“蒙兀儿斯坦的游牧人正式称自己是蒙兀儿人(蒙古人),其实他们跟真正的蒙古人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大部分早已同当地突厥居民融合一起了,他们也操突厥语,还在14世纪便信奉了伊斯兰教。”作者接着指出:“在这个时期,属于这种蒙古人部落的还有杜格拉特人。”^①

由上史实可知,蒙兀儿斯坦汗国的权力始终操在杜拉特部的宗法封建头目手中。从察合台汗国的政治舞台演变过程看,不论是笃哇,还是也先不花,都是一部分杜拉特贵族势力集团的傀儡。每一个汗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杜拉特集团的好恶和意愿,甚至使察合台汗国中兴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也是由杜拉特部播鲁只氏族封建主扶持上台的。所以苏联伊凡诺夫也在《中亚史纲》一书内指出:“杜格拉特的部落贵族依靠自己部落众多人口和力量,掌握了蒙兀儿斯坦的政权,经常随心所欲地从察合台的后裔中任命和撤换地方上的可汗。”^②在蒙兀儿斯坦汗国时期写出的《拉什德史》的著名历史家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杜拉特追述自己家族历史时说:“杜拉特家族是蒙古的一支”。很显然马黑麻·海答儿的先祖一直是杜拉特部落的蒙古统治阶级。

当察合台汗国进驻伊犁阿力麻里后,他所赖以巩固统治的基

^① 帕·彼·伊凡诺夫《中亚史纲》(16~19世纪中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图书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一章《移民中亚境内之前的乌孜别克人和哈萨克人》。

^② 帕·彼·伊凡诺夫《中亚史纲》(16~19世纪中叶)。

本力量是杜拉特部的各级封建主及其所属军队,所以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从察合台在世的时代开始“朵豁刺惕家族(即杜拉特家族——引者)就成了东突厥斯坦各区的世袭首领——异密”。“大约在察合台临终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地区赐予朵豁刺惕家族了。”^①可见察合台汗国建立以后,在他统治区域内实际掌权的各级地方官,主要是杜拉特部的各级封建主,是以察合台在世已赐给杜拉特贵族乌尔土布以下七种特权:“(1)可以用鼓(Tabl), (2)可以用旗(Alam),在突厥语中,前者叫做 Nakara(铃鼓),后者叫做 Tuman tugh(土绵纛)(3)他的两个侍从可以佩(Kushun-tugh)(和硕纛)。和硕纛是‘Chapar tugh’的同义语。(4)他在汗的会议上可以佩 kur(壶),虽然按蒙兀儿人的习惯,任何人也不得携有箭壶,除非汗本人可把箭袋拿在手中。(5)同汗狩猎有关的某些特权。(6)他是统辖所有蒙兀儿的异密,在敕令(firman)中,他的名字之前冠以‘蒙兀儿兀鲁思之首(萨尔达)’的称号。(7)在汗的面前,其他异密的座位比他距离汗座要远一箭之地”。^②

由此可知,察合台在世时,天山南北的实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操纵在杜拉特贵族手中,因而察合台死后,每个登上汗位的人,都必须得到杜拉特部贵族的支持,才有可能保持汗位。但由于杜拉特部不是蒙古汗族,不能自登汗位,必须选一成吉思汗的后裔,才能被中亚蒙古贵族所认可,从而也先不花死后,当时操实权的杜拉特部播鲁只家族,必须听命于播鲁只,否则汗位难保。于是在播鲁只的操纵下,就迫使秃黑鲁帖木儿赐与各种特权,达到实际上的擅权自为。据米儿咱·海答儿记称:“到异密播鲁只从钦察地面把秃黑鲁帖木儿汗找回来,并将他拥上汗位。秃黑鲁帖木儿汗为了酬劳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7 页。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8~229 页。

他,在上述七种特权之外,又增加另外两种,因此异密播鲁只享受的特权共有九种。”这新增加的两种特权:第一,他有权不奏请汗而任免和硕的异密(即千夫长);第二,准许播鲁只及其后代犯九罪不鞠讯。^①到犯第十次罪的时候也还规定有特殊的审讯及处死方法。

后来黑的儿火者,又是在播鲁只之子忽歹达的保护下,逃避了哈马热丁的追杀而扶上汗位的。黑的儿火者更对忽歹达感激涕零,于是在九种特权之外,又给忽歹达另外增加了三种特权,其内容为:^②

(10)在宴会上,当汗的扈从(yasavul)值勤时,异密忽歹达派两个扈从参加值勤;一个站在右边为汗进盏,另一扈从站在左边为异密忽歹达进盏,这两个盏是汗和异密忽歹达专用的。

(11)所有勒令均由异密忽歹达盖印;不过汗的印玺应列于忽歹达印章之前。

(12)(第十二种特权在任何文本中都没有提到)。

在这十二种特权中最突出的是:

(1)加桑——艾弥儿之艾弥儿(最高军事长官)。

(2)芒来——苏雅地区的统治者,也即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世袭统治者。

(3)察合台可汗的政令必须附署杜拉特部播鲁只——忽歹达贵族的印章,否则不予执行。

(4)与可汗平起平坐。

这就可见察合台汗国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操在杜拉特贵族手中,历任可汗不过是任凭播鲁只家族摆布的傀儡。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3) 伊斯兰教在阿力麻里城的发展

自公元 8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后,伊斯兰教势力在草原不断扩展,特别是经过 12 世纪亚塞维的大力推进,在城市和牧区的伊斯兰教势力更是得到迅猛发展。但在 13 世纪中叶法国基督教传教士鲁布鲁克从欧洲东来中亚时,仍然见有佛教徒和景教徒,他说“再往北有一‘大城’海押立,在这里……第一次见有佛教徒,在这个一度是阿尔斯兰汗哈刺鲁首府的伊斯兰城中并有三所寺院。在距海押立城不远的地方有一村庄,那里的居民全为景教徒”。这情况说明在哈萨克草原,于 13 世纪中叶仍还有少数人未信奉伊斯兰教,而统治者蒙古贵族,特别是蒙兀儿斯坦的蒙古贵族大部分还未信仰伊斯兰教。

14 世纪初期,察合台汗国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在此前后,由于蒙古族与河中地区农业民族间长期的频繁交往,在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中,已有一部分人渐染伊斯兰教,诸如木八剌沙、八剌。到了怯伯汗统治河中时期,对伊斯兰教采取保护政策。到了答儿麻失理时代(1326~1334 年)蒙古诸汗王更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他自己也改奉了伊斯兰教。自此以后,河中地区的蒙古诸汗以及各部落首领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伊斯兰文化,或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当时处在天山南北的蒙古贵族,虽仍顽固地坚持过游牧生活,不愿信奉伊斯兰教,并拥立怯伯之兄也先不花为东部察合台汗王,即史称的蒙兀儿斯坦可汗,设牙帐于阿力麻里。但是当时位于天山以南的重要领地“曼朶赖·苏雅”(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及费尔干纳)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伊斯兰文明之中。该地的蒙古贵族对伊斯兰文化接触日多,所以东部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活动甚至在蒙兀儿斯坦汗国建立不久就已经开始了。

在此同时,以喀什噶尔为根据地的伊斯兰教势力,无时不在向阿克苏、库车地区渗透。伊斯兰教领导集团深知库车是塔里木盆地北道佛教的最大中心,要攻克这个堡垒是不容易的,必须一方面积极组织武力,准备强攻;一方面还必须依靠政治作为后盾,这样才能如虎添翼。这就只有首先拉拢蒙兀儿斯坦的统治者,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而于公元1333年即派出中亚布哈拉伊斯兰教协会的著名人士阿皮日丁和卓之子贾拉里丁和擅长萨满教及蒙语的主教夏赫白地先到喀什,然后到了阿克苏,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争取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领袖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为了尽量争取伊斯兰信徒,1333~1344年间进行了十二年的传教活动,向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各地派出了伊斯兰传教士。他们二人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信任,特意和当地维吾尔人结婚,以及密切联系已经信教的穆斯林群众;有时还化装成佛教僧侣,混入当地的佛教徒中,刺探情报,联络感情,得到了较高的威望^①1347年18岁的秃黑鲁帖木儿来到阿克苏的阿音柯时,贾拉里丁早就布置好了许多伊斯兰教徒包围了他,为他宣说伊斯兰教义并神化贾拉里丁,秃黑鲁帖木儿召见了贾拉里丁,并向贾拉里丁说,只要他称汗后,一定邀请贾拉里丁到阿力麻里去宣传伊斯兰教。因而贾拉里丁病重时,叮嘱儿子额什丁于他死后,务必去阿力麻里秃黑鲁帖木儿汗处提醒他实践自己的诺言。贾拉里丁去世后,葬于今阿克苏市阿音柯乡,成为那里最著名的麻扎。

很显然,伊斯兰教领导集团昼思夜想谋求借秃黑鲁帖木儿的权力,来扩大伊斯兰教的地盘和信徒。秃黑鲁帖木儿于1347年登上汗位,额什丁闻讯后,迫不及待地遵父嘱前往阿力麻里。由于王宫戒备森严,一时难于接近,额什丁不得不每天清晨在汗的宫帐近处高声唤拜,汗终于被声音惊动,召见额什丁。额什丁即向汗述说

^① 《昆山伊协活动年表》。

在阿克苏与其父的会面和汗的信仰表白,汗欣然于1350年履行自己的诺言。当天在额什丁和大毛拉黑的马特主持下举行入教仪式:洗礼净身,颂读“凯里买”(清真言),做乃玛孜,剃了长发,施行割礼。据说秃黑鲁帖木尔还为自己取了伊斯兰教名字——艾卜伯克里,并在钱币上铸刻了此名字。

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即召集大批蒙古人,当众宣布他已皈依伊斯兰教,并要蒙古人也改信伊斯兰教。于是蒙古人即按照额什丁的吩咐将帽子扔到了河里,据说河水为之阻断不流,额什丁又叫他们从河里拿起帽子,重新戴在头上,表示戴了新的帽子,并劝蒙古人须服从秃黑鲁帖木儿汗王和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

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加强了秃黑鲁帖木儿在蒙兀儿斯坦汗国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当然对额什丁感激不尽。秃黑鲁帖木儿为了表彰额什丁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杰出功绩,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即授与额什丁以下特权:

1. 世袭天山南部伊斯兰教教长。

2. 在库车修建由阿尔西丁(即额什丁)亲自掌管的哈尼卡——一个特定地区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除此而外,将宗教税中的一部分划归阿尔西丁本人受用。

单伊斯兰教长这一职务就使额什丁家族成为这个地区最有权威的势力,再通过哈尼卡礼拜寺、寺院经济的各种瓦哈甫形式,占有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和商业店铺等。汗国统治者每年还从国库划拨一笔专用款项作为额什丁的传教经费。这样额什丁家族既享有政治特权,又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在蒙兀儿斯坦国内获得了显赫的权势,所以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称汗时也必须先取得额什丁的认可。史称黑的儿火者(贺则尔)称汗时,曾派出以忽歹达为首的三十余人的使团,携带着一百匹马,五百头牛,一千只羊,五十峰骆驼,十五个奴隶的大量礼物到库车额什丁处完成了最

后一道法律程序才能登位。甚至天山南部的各级行政长官——阿奇木伯克也得由额什丁先提名后再任用。^①

利用政治权力强迫蒙古贵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斗争,极为复杂和激烈,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施用了暴力,同时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徒也进行了迫害。在瓦丁所著《圣第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记述了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传教被害事。巴斯喀尔遗札中述说:阿力麻里城的教会是归中国总牧师管辖区统辖。阿力麻里城的教士也受北京总主教的指挥。^②这与当时阿力麻里城归属中国的政治相一致。

巴斯喀尔被害后,教皇本笃十二世于1339年又派马黎诺里前来中国,他于1340年从钦察到了阿力麻里,详知了巴斯喀尔等被害情况。在他所著《奉使记》中说:“阿梨算端篡位,信伊斯兰教。即位后下令国中曾经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必须通过改信伊斯兰教。有违令者,杀无赦。巴斯喀尔等欧洲来的基督教僧侣不愿服从这项命令,故都被捆绑,以绳牵之,游街示众,又被穆斯林殴打侮辱,唾面骂,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断手足,最后斩首”。^③可见该城基督教徒被迫害的惨酷。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所著《圣徒传》中,也详记阿力麻里城中传教僧人死难情形:“有主教李嘉德,僧人佛兰锡斯、巴斯喀尔、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杀害。”^④这些基督教徒被害事决不是秃黑鲁帖木儿汗于1347年登位时一年间发生的事,而是在他登位之前阿力麻里城内的伊斯兰教势力已相当强大,已经在不断迫害基督教徒。汗登位信奉伊斯兰教后,当然对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异教徒迫害更甚,甚至可以公然杀害异教徒而难于申诉。可见阿力麻里城内宗教斗争的激烈。

① 《贾拉里丁·克特柯与秃黑鲁帖木儿传》,维吾尔文本。

②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83~290页《巴斯喀尔之信》。

③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81页。

④ 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正是由于秃黑鲁帖木儿汗改信了伊斯兰教,赢得境内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人民的拥护,因而他逝世后,各族伊斯兰教人民为他修建了宏伟的麻扎,供各族穆斯林瞻拜。现在阿力麻里城虽已全被破坏,难寻踪迹,但这个建筑别致,富有浓厚伊斯兰风格的麻扎却依然耸立于古城的东北,享名于国内外,前往瞻观的人络绎不绝,成为霍城县突出的旅游资源。

(4)从钱币看阿力麻里城的经济文化

钱币是一种流通手段和交换媒介,蕴含着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记录着政治经济、历史发展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察合台汗国的历史记载,在元、明史上并不多,可是在1949年建国前后于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察合台汗国的钱币,这就大大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的钱币不多,斯坦因于库车得到察合台汗国银币3枚;^①黄文弼1934年在吐鲁番获得4枚。^②1949年以后则发现了大量的察合台汗国的金、银、铜币。1958~1959年在阿力麻里发现10枚钱币;1977年在昌吉古城遗址出土一陶罐,内装1370枚钱币,绝大多数为银币;1987年5月5日在博乐市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旁出土金币36枚,在此前后还出土银币23枚,铜币50枚,1990年3月在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察合台汗国铜币1649枚,总重3.95公斤。另外还在阜康出土近20枚金币;而银币则还在库车发现近百枚,奇台百余枚,木垒数枚。由此可见,关于察合台时期的钱币已发现了金、银、铜三种不同

^① 斯坦因《亚洲腹地》图版ZZ-23。

^② 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页,图版壹壹捌,图47-50。

钱币,诚如常德《西使记》中所说:“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①出土了这样多的钱币,可证察合台汗国时期,在其辖境内确曾打制了大量金、银、铜币,其中尤以银币、铜币为多。谨对各地出土钱币稍作分析。

1. 银 币

昌吉古城出土的 1 370 枚银币,每枚上面均压印有库法体或普通体阿拉伯文,同时还有各种不同图框和花纹。在很多银币的铭文中都保存有用阿拉伯字母或数字表示的制造地点和制造年代,其年代基本上都是公元 13 世纪 40 年代至 14 世纪初期(638/1240~1241—706/1306~1307 年)。制造地点,以阿力麻里城最多,还涉及普刺、忽毡、肯者特、撒马尔罕、喀什噶尔、布哈拉、塔拉斯、花刺子模。^②

在 1 370 枚银币中,察合台汗国的银币计 1 364 枚,占绝大多数;另有钦察汗国银币四枚,伊儿汗国银币一枚,还有一枚银币因铭文不清,暂难确定。单就 1 370 枚的察合台汗国银币等打制地点的分布情况,据陈戈先生的统计如下:^③

银币打制地点	数量(枚)	重量单位
阿力麻里	761	的尔汉
努拉特(即布拉特)	111	的尔汉
忽毡	10	的尔汉
肯者特	17	的尔汉
撒马尔罕	77	的尔汉
最大的鞞耳朵	274	的尔汉

①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9 页。

② 陈戈《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 年创刊号。

③ 陈戈《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 年创刊号。

银币打制地点	数量(枚)	重量单位
喀什噶尔	88	的尔汉
布哈拉	5	的尔汉
塔拉斯	29	的尔汉
花拉子模	4	的尔汉
不明	2	的尔汉
合计	1378	

这 1 378 枚的银币数字是根据陈戈先生文章所列表中统计而得,显然与 1 370 枚的数字不相符,多出 8 枚银币。惟这个统计数字仍然反映出打制银币最多的城市是阿力麻里,其次是最大的斡耳朵、努拉特、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作者说,对“‘努尔特’系何城,位置何在,不清楚,留待识者”。^① 韩雪昆先生指出“努拉特”系“布拉特”一名的误译,地点即为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普刺城。^② 这是正确的。至于最大的斡耳朵究竟在何地,也应该离阿力麻里城不会太远,因为斡耳朵为宫帐、宫殿意。最大的斡耳朵很可能是指察合台汗驻蹕之地,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察合台的驻地,“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斯驻蹕,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刺木园……秋冬两季他在亦刺(ILa)河岸的〔? 蔑鲁疾克(Ma-rauzik)〕度过”。^③ 可知察合台的居住地点四季虽稍有不同,但基本地区均在伊犁河直至阿力麻里周围地区,相距均不远。银币打制地点阿力麻里和最大的斡耳朵两地打制的银币就占 1 035 枚,几接

① 陈戈《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

② 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

③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近于三分之二,可知打制银币最多的地点是在阿力麻里及伊犁河谷,其次是普刺、喀什噶尔、撒马尔汗。说明这些银币是在察合台汗国辖境内流通使用,反映13世纪前后察合台汗国辖境内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景况。

银币的重量单位称为“的尔汗”,是阿拉伯世界传统的货币单位,它们的实际重量基本上在2克左右,当时察合台汗国的“的尔汗”重量标准是2.1克。银币的直径约1.9~2.4厘米。

在这些银币的铭文中,有“公正的最大的”,“除了安拉,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王权属于唯一的权威的安拉”、“最大的依玛目”、“最大的公正的国王”、“最大的斡耳朵”、“最大的公正的斡耳朵”、“最大的伊玛目安纳昔尔里丁拉赫”、“王权属于安拉。宇宙属于安拉”等,都使用阿拉伯文,显然与信仰伊斯兰教有关。这些铭文都取自《古兰经》,尽管不是《古兰经》上的原文字句,却系取自《古兰经》中的某些意思。尽管打制这些银币时的察合台汗还未信奉伊斯兰教,但各地的当权者却是伊斯兰教信徒,所以钱币上的铭文也都采自《古兰经》。从而可知1347年起秃黑鲁帖木儿汗信仰伊斯兰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 铜 币

在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先后出土的1700余枚铜币,是在察合台境内通行的钱币,被称为普刺城的达勒特古城,离阿力麻里城不过100多公里,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在这里出土大量铜币,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多的察合台汗国铜币,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制造方法均用中亚地区传统的打压法,圆形无孔,正背面均打压有科斐体^①阿拉伯文;币面上均打压有几何图案,线勾花纹或某种徽记,不见人物和动物图案,这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① 科斐体,是阿拉伯文书体之一,公元7世纪产生于幼发拉底河畔的科斐城,故名。

在这些铜币上的铭文主要是：正面译文为“公正的最大的”，背面译文为“布拉特打制”和正面、背面译文都是“布拉特打制”。另有少数铜币铭文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币面铭文是“最大的依麻目”，“安拉的宗教保卫者”等。这里的依玛目是伊斯兰教对宗教领袖的尊称，因伊玛目一词即为“表率”、“领袖”之意。而所称打制地点“布拉特”，即为普刺、不刺、孛罗的同名异译。如《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普刺”；《元史·耶律希亮传》作“不刺”；耶律楚材作“不刺”，常德《西使记》作“孛罗”，法人鲁布鲁克《东行纪事》作“普拉特”。这些不同译名，皆为一音之转。

大批铜币在布拉特城的出土，表明铜币在察合台汗国时期是仅次于银币的主要流通货币。同时这种铜币除在布拉特出土外，还在阿力麻里、昌吉等地也都有出土，天山南路个别地区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因而可知，察合台汗国铜币主要流通于天山以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天山南路的商贸繁荣和发达状况，而天山南路及中亚地区则因战乱较多，影响了经济及商贸的发展。

3. 金 币

由于黄金本身的贵重和来之不易，所以金币的制造和流通数量，相对来说少于银币和铜币，这与已发现的金币数量不多的情况相吻合。

1987年5月在新疆博乐市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出土察合台汗国金币36枚；在此之前还在阜康也发现察合台汗国金币20枚，因未公布，难知详情。这里谨就博乐市出土的金币稍作分析。

达勒特古城出土的36枚金币，铭文尚清晰完整的16枚，残破的20枚。币面上可以识读的铭文均为阿拉伯文。金币厚度只有1.5毫米~2.7毫米，外圆都不规整，直径为15毫米~32毫米，重

量3.1至10.05克不等,含金量达60%~70%,^①察合台汗国的金币制造方法,也和银、铜一样,采用打压法,异于我国中原传统的浇铸法,均圆形无孔。因受伊斯兰教影响,无人或动物图案,只有点圈等文体,能识读的铭文内容主要有:

有一枚金币直径26.5毫米,厚0.4毫米,重3.4克,含金量70%,其铭文正面为“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崇高的安拉之友”。背面为“忠诚于宗教和世界的伟大崇高的国王,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在有的金币上的铭文则写成“除了安拉别无他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比拟的)”。还有的铭文写成“感赞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愿安拉怜悯他”。或“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安拉宗教的保卫者。阿力麻里打制”。或在正面写“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背面写“最伟大公正的。阿力麻里打制”。有一枚金币上写着一条长长的铭文:“最大伊玛目,除安拉以外,别无他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安拉的宗教保卫者,众信士的首领”。所有这些写在金币正面或背面的铭文,长的或短的,原意均出自《古兰经》,都是人们常见的伊斯兰教信条。至于少数金币上写的“公正的,伟大的或最伟大公正的”赞语,主要是歌颂察合台汗国宫廷(牙帐)而言。

根据出土的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金、银、铜币同时流通情况看,以银币为最多,符合白银是中亚传统流通手段的历史事实。而当时有金、银、铜货币在市场上大量流通,还反映了察合台汗国前期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活跃以及社会的稳定。

^① 蒋其祥、李有松《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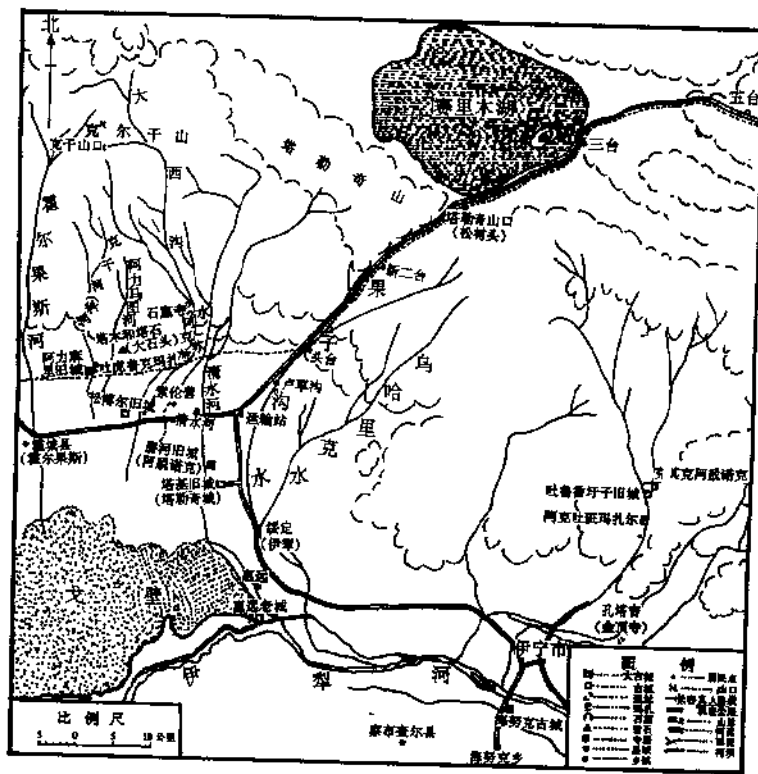


图7 阿力麻里古城位置示意图
(引自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历史演变

(1) 额尔齐斯河的位置及其战略地位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我国新疆阿尔泰山东部,汇入鄂毕河,直冲北冰洋,是我国惟一的北冰洋水系河流。

巍峨高耸的阿尔泰山,平均高度海拔 3 000 米以上,最高的友谊峰(即奎屯山)达 4 374 米。它尽管深处内陆,可是北冰洋气团越过西伯利亚长驱南下,经斋桑谷地,沿额尔齐斯河向东进入山地时,就被高耸的山岭所阻挡。因而山区气候湿润,山岭终年积雪,夏季雨水丰富,草木繁茂,马羊满谷,有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以额尔齐斯河上源一开始水量就较大,然后穿过高山的丘陵,经过盆地和平原,在我国境内就汇集了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等大小河流,穿过我国国境后又汇集了鄂木河、伊施姆河、托波尔河等河流,浩浩荡荡,至汉特—曼西斯克城西部汇入鄂毕河,至萨列哈尔德城附近注入北冰洋。

额尔齐斯河是鄂毕河的最大支流,全长 2 969 公里,流域面积 1 017 平方公里。原来大部分都在我国境内,自 16 世纪下半叶起的两个多世纪中沙俄侵吞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后,现在留在我国境内的只有上游部分,近 600 公里左右了。

根据地质地貌及沉积物的分布情况,可以察知在地质时代第

三世纪初期,发源于阿尔泰山的水系,原注入准噶尔盆地;至第三世纪末和第四世纪初期,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在阿尔泰山前形成了一条大断裂带作西北东南走向。在此断裂带上,不仅有两岸全为坚硬花岗岩的峡谷,最深处达300米以上,并有深陷的地堑盆地镶嵌于低山之内,如富蕴盆地等,从而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奔腾汹涌的水流冲出峡谷后,受此大地堑的影响,不能直向南流,只好来个九十度大转弯,沿着大地堑,折向西北,直泻入北冰洋,从此额尔齐斯河的水系流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这种地质地理的构造,就使峡谷中的水流像脱缰的野马,汹涌咆哮,声如巨雷,产生了良好的水利资源。还由于阿尔泰山区降水丰富,从布尔津以下都可通航。同时也形成游牧人民最好的黄金草原,如著名的巴拉宾草原、斋桑草原、阿尔泰牧区及沙吾尔山冬牧场,都是自古以来各族游牧民最向往的地方。不仅沿河有富饶的鱼盐之利,同时阿尔泰山区更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在单于我国的阿尔泰山区就已查明有金、铁、铜、铝、锌、铅、锂、铍、钛、汞、云母、水晶等多种矿产。阿尔泰名称的来源,突厥语意就是金,从古起阿尔泰山就以金山著名于世。

镶嵌在额尔齐斯河上的斋桑泊,更是一颗十分诱人的明珠,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特富鱼盐之利;在湖周围的农牧区域又是少有的富庶区,所以沙俄侵略者早在1756年就叫嚣要“占据额尔齐斯河河源和斋桑湖。”^①当时的奥伦堡总督兼枢密大臣涅普柳耶夫也要“占据直到斋桑湖的地方。”^②到1758年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域后,沙俄更“企图占领整个额尔齐斯河,直到斋桑湖”。^③所以到1864年中俄国界谈判时,沙俄千方百计要把斋桑湖侵占到

^① 库尔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俄国与中国》,载苏联《新东方》杂志第19期,1927年莫斯科出版。

^②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史纲》,莫斯科1951年版,第180页。

^③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彼得堡1903年版,第18卷,第152页。

手,他的首席代表巴布科夫认为“斋桑湖……是构成了与中国西部划界全部事业的重心。”^①

在沙俄侵略者看来,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地区是侵略哈萨克、草原和新疆最好的根据地。巴布科夫认为“额尔齐斯河按照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具有防线的一切优点,可以保卫我们西伯利亚南部国界,防止吉尔吉斯人的侵袭和防止准噶尔人的敌对破坏行动。同时,额尔齐斯河分布其上的碉堡与堡垒,乃是向准噶尔与吉尔吉斯草原深入进军的可靠基地”。^②沙俄为了抢占到这一块原属中国,位在中亚北部的战略重地,在两个多世纪中进行了野蛮的侵略。

(2) 古代额尔齐斯河流域与中原的密切关系

额尔齐斯河流域归入中国版图虽然始于公元7世纪,可是从远古起这里就和我国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了密切的联系。苏联一些考古工作者曾在南西伯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属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遗址和墓葬里,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由于首先发现于卡拉索克,从而被命名为卡拉索克文化(Kapacykchun),这种文化后来在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及其以西地区也都有发现;同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戈壁省、乌尔扎河和德勒山附近也都有发现。

这种卡拉索克文化的青铜器和陶器,与我国在安阳一带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是相类似的。从而可知所称卡拉索克文化是我国商周青铜文化的延续。1959年出版的由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第一卷称:“卡拉索克的匕首、刀、矛、弯柄、套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87页。

^②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1卷,1959年版,第627~628页。

斧、掌形耳环和各种小牌等装饰品,跟靠近中国长城北面各地区所发现的特别相像。许多最典型的卡拉索克器物,特别是刀、双套马车的小画、陶器的装饰,都在安阳附近(殷)国首都出土的制品和青铜器的装饰上,找到了它们的直接原型。独特的卡拉索克石碑(石立板状石碑)的图案装饰直接起源于殷这一事实,也证实了这一见解。”^①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考古学家С·В吉谢列夫当时也说:“独特的卡拉索克铜器、陶器和装饰艺术同长城以北那些地区(鄂尔多斯、绥远、热河)最为接近,而这些地区的文化和中国东部殷商时期的文化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②

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著名苏联考古学家、萨彦-阿尔泰考察团的领导人吉谢列夫院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这部巨著中,归纳当时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说:“早在卡拉索克时期(指公元前14年~15世纪——引者),贝加尔、米奴辛斯克(即吉尔吉斯人集居的阿巴根河一带——引者)、托木斯克和鄂毕河上游地区以及更远的西部,在物质文化形式上都与中国北部卡拉索克型文化惊人地相似。”^③这些地区出土的具有中国内地特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例如:1941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阿巴根城南8公里处发掘了一座中国汉代建筑物,其中出土的瓦当圆盘上都刻有“天子万物”等“汉代特有的字样”。^④这座遗址中的其他出土物也都“属于汉代。”^⑤又如1959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图瓦发掘出120座建筑物。据《苏联考古》杂志报导,这些建筑物的屋顶,“盖的是中国型的焙烧得很精致的琉璃瓦……此外,屋顶和屋角有富丽堂皇的大量雕塑品:有张口卷身的巨龙,有美丽动人的凤凰”等等。其中还发现“中国的上釉器皿、磨盘……以及中国型铜钱。这些钱币都是同一时期的,写着‘大金

①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1卷,1959年版,第41页。

②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1卷,1959年版,第41页。

③ 吉谢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182页。

④ 吉谢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479页。

⑤ 吉谢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480页。

通宝’”。在今苏联图瓦境内发现的还有“汉人的塑像、两只狮子和两只羊的像”，以及“刻有汉字铭文的经过琢磨的方尖碑碎块”等等。而且这些遗迹直到“30年代前”还保存在该地。^①

这些与我国中原商周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卡拉索克文文物，当时的一些苏联科学家也肯定说是丁零人由中原带往南西伯利亚的，他们在《世界通史》第1卷42页称：“卡拉索克型文物按地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研究：贝加尔湖沿岸区（这里发现殷代三足器）、米奴辛斯克盆地、阿尔泰（这里发现卡拉索克固有的文物，数量特别多）、哈萨克斯坦。据中国史籍记载，原先居住在中国北部和汉族相近的丁零部落，正是散居在上述这些地方。显然就是他们把得自商（殷）朝古代中国居民的各种文化因素（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带到了南西伯利亚。”而吉谢列夫和其他一些苏联有影响的考古学家还根据卡拉索克文化期居民的体型和人种类资料，证明当时南西伯利亚的居民同我国商周时期的居民是同种。这些无可否认的有力佐证都说明额尔齐斯河流域远在公元前就和黄河流域在经济文化上有了紧密联系。

后来苏联由于霸权主义的需要，吉谢列夫推翻了他原先已得出的结论，指说南西伯利亚的卡拉索克文化，甚至中国安阳的商文化都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远古文化——塞伊姆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② 显然不符于历史事实。

^① 克兹拉索夫《图瓦与中世纪城市》，载《苏联考古》1959年第3期。

^② С·В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四十年来苏联境内青铜时代的研究》。

(3)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9 世纪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民族活动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两汉魏晋时额尔齐斯河以东直至叶尼塞河流域见之于史书记载的是坚昆。《汉书·匈奴传》称：“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在汉初坚昆役属于匈奴。当汉朝结盟乌孙，并把匈奴贵族势力赶出塔里木盆地以后，匈奴贵族为了谋图截断汉通西域的道路，即以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为根据地，长期和汉争夺天山东部——吐鲁番、哈密、北庭、巴里坤。同时千方百计想破坏汉和乌孙的联盟，所以常派使者去胁迫乌孙，当宣帝末年盘踞在阿尔泰的匈奴郅支单于派使至乌孙小昆弥乌就屠时，乌就屠坚决抵制了郅支的诱引，“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返，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零，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郅支并留都坚昆”。这里的西破坚昆，恐系东破坚昆之误，因《魏略·西戎传》称：“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① 当时康居都城在今江布尔地区，呼得在其东北，则其方位应在今额尔齐斯河西及巴尔喀什湖以北一带，而在《魏略·西戎传》中又同时指出呼得、坚昆、丁零三国“坚昆中央”，当然也不能完全看作三者是自东而西并列，其间牧地各有错杂，不过是说其主要位置是坚昆在中央，如果不是这样，那不会在同传中指出此三国“俱去匈奴单于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而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据此可知，当时游牧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及阿尔泰山区的是坚昆、呼得、丁零，而额尔齐斯河东面以坚昆较多，西面以呼得较多，东北及西北以丁零较多。

^① 《三国志》卷 30《魏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匈奴贵族失败以后,原被匈奴奴役的各部,语言习俗比较相近的组成了铁勒部落联盟,因而原游牧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各部也被称为铁勒族。《隋书·铁勒传》称:“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这里所称匈奴之苗裔,实际是指被匈奴奴役的部落,而又同属突厥语族,古人不察,皆称之为匈奴之苗裔,因而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的各部落,也被总称为铁勒族,又因铁勒族大多乘坐高轮大车,故又以高车族名之。

额尔齐斯河流域是游牧人民的天堂,那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每有草原雄主崛起,总要先夺占额尔齐斯河流域及阿尔泰山作为依据,再向四方扩展。当柔然族于5世纪初崛起于漠北后,不仅拥有漠北草原,同时也占有阿尔泰山地区。《北史·蠕蠕传》称:“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其辖区“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羸靡附之。于是自号豆仑可汗。”这里虽未明说占有阿尔泰山,但在另一条史料中却指明:“太和十六年……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西走,自立为主。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盖出自金山。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①这里的金山即指阿尔泰山,可见阿尔泰山地区已为柔然贵族所占有。

尽管这时柔然族已成为阿尔泰山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的统治民族,但其人数并不是这一地区的多数。分布在这一地区人数最多的仍然是铁勒族,即高车族,他们不过暂时受柔然贵族统治罢了。这在《魏书·袁翻传》中有比较生动而具体的叙述:“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收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

^① 《北史》卷98《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因而北魏在北方所设防御的重点是对高车,并非对柔然,所以《魏书·袁翻传》中继续说:“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要冲,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足证当时柔然贵族统治额尔齐斯河中、上游时,那里的主要民族仍是高车族各部,民族成分并未有根本改变。

当柔然贵族得势时,从6世纪时已渐露头角的突厥族,也曾一度受其奴役,并被掠去一部分突厥人至阿尔泰山为其锻奴。《隋书·突厥传》称:“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也居金山,工于铁作。”在《周书·突厥传》中则明确指出,这些突厥人至阿尔泰山后,成了茹茹的锻奴。大统十二年(546年)“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将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

柔然贵族灭亡后,于6世纪中叶起,突厥贵族逐步统一了大漠南北及直至里海为止的广大草原区域,于是额尔齐斯河地区也为突厥贵族所占有。原来在《隋书·铁勒传》中称“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唾勒儿、十槃达契等。”而在《新唐书·回鹘传》则称:“薛延陀者,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在铁勒诸部最为雄张”。所以在隋末唐初时额尔齐斯河地区各铁勒部落都受统于薛延陀部,当时树牙于阿尔泰山以北的突厥族车鼻部虽势力也强,“北荒诸部将推为大可汗”。^①然因薛延陀已立有可汗,所以“车鼻不敢当,遂率所部归于延陀”。由于他“为人勇烈,有谋略,颇为众附”。于是“延陀恶而将诛之,车鼻密知其谋,窜归于旧所,其地去京师万里,胜兵三万人,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西有歌逻祿,北有结骨,

^①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皆附隶之”。^①由此可见,突厥族的车鼻部原牧地应在今阿尔泰山东北部,科布多以北,唐努山以南。势力雄张后,遂建牙至阿尔泰山以北,后受薛延陀迫又回原牧地。所以说其北唐努山和萨彦岭之间为结骨部,其西阿尔泰山区即额尔齐斯河中、上游是葛逻禄部。按葛逻禄的突厥语 Karluk 原意即游牧于雪山地区的部落,正好表明葛逻禄最早游牧于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及西天山一带。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册封薛延陀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后,夷男即树牙郁督军山,即今杭爱山,以抗东突厥,于是其部众也从额尔齐斯河移牧于杭爱山,从而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就主要是西突厥统属的葛逻禄及咄陆的一些部落,其东则和结骨相邻。《旧唐书·突厥传》称:“西突厥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贞观十二年(638年)时因部落酋长间不和,“咄陆可汗又建庭于馱曷山西,谓为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寻、触木昆诸国皆臣之。”^②这里的馱曷山,《西域图志》卷22指称在今伊宁城南之布咯鄂拉是不妥的;沙畹在《西突厥史料》第34页虽指出了这点,但究在何处却并未指出。笔者认为这馱曷山不在伊犁地区,应该是在阿尔泰山地区,因为除厥越失、火寻部落难于确指地望外,其余的结骨、触木昆、驳马、拔悉密都有确切记载。其中结骨即坚昆,在今唐努乌梁海一带;触木昆在今阿尔泰山以北一带,苏定方于653年左右“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部落,大破之”。^③阿史那贺鲁由此率叛军南逃。而驳马在《新唐书》写成“駁马”,又称毕刺,或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北极于海……好与结骨战,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④由此可知駁马必在结骨之北或西北直至北冰洋边;而拔悉密则在阿尔泰

①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山东部地区,公元8世纪初才逐步移到巴里坤及北庭一带。从以上咄陆所统的部落分布地区看自伊犁河北直至额尔齐斯河流域为止,因而他所建北庭不会在伊犁,而以阿尔泰最为适宜,所以镞曷山应在阿尔泰地区。

随着唐高宗初年发生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的平定,唐朝就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正式设立都督府、州。《新唐书·回鹘传》称:“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桓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刺;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永徽初,高偁之伐车鼻可汗,三族皆内属。显庆二年(657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后分炽俟部置金附州。”^①这里的仆固振水就是额尔齐斯河,多桓岭就是指塔尔巴哈台山,当时葛逻禄部的分布实际就是北从额尔齐斯河起,占有阿尔泰山及塔尔巴哈台山直南至巴尔鲁克山、阿拉套山。在这些地区内即就葛逻禄的原有部落设置了三个都督府、一个州,直隶安西都护府,并由唐朝直接册命各部落头人为都督、刺史,行使唐政府的号令,缴纳一定赋税,为唐朝守卫西北边疆。同时位在阿尔泰山东北唐努乌梁海的黠戛斯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立坚昆都督府,册拜俟利发为都督,隶燕然都护府管辖。

(4) 成吉思汗征服阿尔泰山周围各部及瓦剌蒙古占有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经过

至8世纪中叶,突骑施部衰微后,葛逻禄部大部分迁入伊犁河、楚河及塔拉斯河一带。《新唐书·回鹘传》称:“至德后,葛逻禄

^①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由是葛逻禄西去中亚后,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草原就逐步为乃蛮占有。波斯拉施得《史集·部族志》乃蛮条称:“乃蛮一部分住在险阻的山区,另一部分住在草原。他们拥有大阿台山、窝阔台建造崇高宫殿的哈喇和林平原,阿雷(AIui)—撒刺思(Saras)的山及兰也儿的失河;也儿的失木怜即也儿的失河;此河及吉儿吉思地区之间的山岳,他们(乃蛮)版图的边界,与王罕居地蒙兀儿斯坦互相接壤,而且也毗连畏兀儿斯坦的沙漠边缘相邻接。”对此在《多桑蒙古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此种鞑靼民族旧曾称藩于全国者,形貌语言风俗习惯迷信大致相类,其间部众最伙者,为乃蛮(Naimans)部落,居也儿的石河上流,及大金山(AItai)山脉连亘之地。西隔一沙漠,与突厥种之畏吾儿相接。北界小金山(AIatai),与突厥种之乞儿吉思谦谦州(Kem—Kemdjoutes)两部之地为邻。东界哈喇和林(Caracouroum)诸山,与克烈部(Keraites)连界。”^①可见乃蛮部的牧地非常辽阔,从漠北的鄂尔浑河山岭直至额尔齐斯河,包有整个阿尔泰山,南边隔准噶尔沙漠和畏吾儿毗连。所以《蒙古秘史》190节中说:“乃蛮部的国土,有广大的牧地,有众多的人民,有丰富的牲畜。”^②

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为统一蒙古草原进军中亚奠定了基础。《蒙古秘史》第158节说:“(1202年)后来成吉思合罕、王罕二人出发去征讨乃蛮部的古出古惕不亦鲁合罕,走到兀鲁思塔黑山(即奎屯山)的湟豁黑水(科布多支流索果克河—引者)处,不亦鲁黑罕不能抵抗,翻越阿勒台山逃走。成吉思合罕和王罕二人,从湟豁黑水去追赶不亦鲁黑罕,到达乞湿泐巴失海子(即乌伦古湖,旧图作布伦托海—引者),在那里把他们消灭了。”^③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页。

②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游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69页。

③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游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4页。

成吉思汗击破不亦鲁黑罕后,就班师东返了,并没有全部征服乃蛮部,从而乃蛮部的太阳汗继续集结军队,准备袭击蒙古部。于是成吉思汗又回军在鄂尔浑河东纳忽昆山击毙了太阳汗,其子古出鲁克就一直逃到阿尔泰山投靠其叔父不亦鲁黑罕,成吉思汗军队跟踪追击,即“在阿勒台山前征服了乃蛮部的部众,完全占有了他们的部众”^①,并即在阿勒台山阴过冬,时为1204年。

1205年春天,被成吉思汗击败的乃蛮部古出鲁克罕和篾儿乞惕人脱思脱阿正在额尔齐斯河的不黑都儿麻地方整顿军马时,成吉思汗又率军前往攻袭,乱箭射死了脱黑脱阿,于是“乃蛮人、篾儿乞惕人等……大败而逃,渡额儿的失河的时候,大部分坠到水里淹死了,只有少数人渡过额尔的失河逃亡。乃蛮部的古出鲁克罕经畏兀儿的合儿鲁兀惕部地方,跑到在撒儿塔兀勒地方的垂河的合刺乞塔惕部(即黑契夫一引者)的古儿罕那里去了。篾儿乞惕人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合勒、赤刺温等西向康里、钦察等部逃走”。^②从这些战斗情况看出古鲁克和他父亲的主要牧区是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及阿尔泰山南北地区。同时也可看到乃蛮部被成吉思汗征服时不少人被打死了,不少人逃出了原牧地,乃蛮的部落离散了,于是原有的乃蛮部牧地又逐步被由东向西的卫拉特蒙古所占有。

当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时,游牧在阿尔泰山北鄂毕河上游及其支流托木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上游支流不里都儿麻等地的帖良古惕部也同时被征服,所以于1206年成吉思汗把额尔齐斯河林木中的百姓及帖良古惕、脱斡劣思等部封给豁尔赤。

在成吉思汗征服了额尔齐斯河及鄂毕河上、中游后,就又集中力量征服了唐努山以北的林木中百姓,《蒙古秘史》239节称:“兔儿年(207年)拙赤率右翼军,去征伐林木中百姓,以不合为前

^①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63页。

^②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6~187页。

导。斡赤刺惕部(林木中百姓)的忽都合别乞率领万斡赤刺惕部投降。忽都合别乞来给拙赤带路,从万斡赤刺惕部的牧地前进,到达失黑失惕地方(西斯吉特河)。拙赤招降了斡赤刺惕部、不里牙惕部、巴儿浑部、兀兀速惕部、合卜合纳思部、康合思部、秃巴思部,到达万乞儿吉思部的牧地。乞儿吉思部的那颜们也迪、赤纳惕、阿勒迪额儿、斡列别克的斤等都来投降。……拙赤又招降了失必儿部、客思的音部、巴赤惕部、秃合思部、田列克部、脱额列思部、塔思部、巴只吉惕部等以南林木中百姓。”^①这些林木中百姓主要分布于唐努山以北直至安加拉河迤西额尔齐斯河的托博尔斯克一带,最北部是失必儿之地。据拉施特《史集·部族志》吉利吉思条称:“昂哥刺河流到亦必儿·失必儿(Ibir—Sibir)部地区的边界”。这是林木中百姓最北的部族之一。其地极寒。在16世纪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时,在额尔齐斯河上的托博尔斯克上游16俄里处有鞑靼库姆汗的都城Sibir。成吉思汗把这些征服的林木中百姓,赐给了术赤管辖:“你是我的长子,首次出门,所到之处,人马无恙,就使吉庆的林木中百姓投降。把这些百姓赐给你吧。”^②

成吉思汗同时把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所征服的各部落也都赐给术赤作为封地,拉施特《史集》中说:“也儿的失河及按台山境内所有地方和人民,周围的驻冬和驻夏牧地,成吉思汗都封给术赤了……,术赤的营地在也儿的失河境,他的政府的首府就设在那里。”^③足见术赤最初封地的政治中心是在额尔齐斯河流域。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在蒙元时期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流域是受中国统治的。

在成吉思汗初起时瓦剌部的主要住牧地是在唐努乌梁海及色

^①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3~234页。

^②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4页。

^③ 拉施特《史集》I,刊本131页。

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一带。拉施特《史集·部族志》斡亦剌条称：“斡亦剌的帐幕及住地，在八河流域……诸水从此地流出，汇为一水曰谦河。谦河流入昂哥刺河。”而195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考古队在库苏古勒省阿尔布拉克(Arbu Lagh)县第三巴格地方，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北岸，发现元宪宗“丁巳夏”(1257年)外刺附马八立托及公主——悉叶建立的用汉、蒙两种文字写的“释迦院”碑。证明这个地方是瓦剌部政治活动中心地之一。^①从这些记载和实物，可知瓦剌部的原牧地是在得勒格尔河向西北越过唐努山脉的东端分水岭至毕克木河上源锡什锡得河一带。成吉思汗的术赤军即由唐努山进入盆地，收服了瓦剌各部。在元朝，瓦剌地区一直在元中央政府所设岭北行省管辖之下。

由于瓦剌部未经战斗就投降了成吉思汗，所以妻以女子，成为附马，为成吉思汗统一中国立下了功绩，从而不少部落逐步融入了瓦剌部，使之入数日众，势力日大，并日益向西北广大草原发展。明初，瓦剌分为三部，由马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管辖。1409年夏明朝政府册封马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赐给印诰。^②

15世纪前半期瓦剌在也先领导下曾于漠北草原称雄一时，因而许多蒙古部落融入了瓦剌部，所以明朝瓦剌部的人数较之元代的瓦剌部已大有增加。到16世纪末期瓦剌人已主要迁牧到阿尔泰山以东的科布多盆地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准噶尔盆地一带。从而14世纪起即已存在的四卫拉特逐步成为著名的四卫拉特联盟。据《皇朝藩部要略》称：“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裔；曰准噶尔；曰村尔伯特，姓绰罗斯，为元臣孛罕裔；曰土尔扈特，为元臣翁罕裔，姓不著……部自为长，号

^① 丕依勒《关于蒙古古城及居民点史》，附有影印释迦院碑图片，见《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3期，第43~53页。

^② 《明史》卷328《瓦剌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四卫拉特。”^①这四部原先“各统所部，不相属”^②。由于频繁战争和内政外交的需要，才逐步结成了联盟。

卫拉特各部不断向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广大西域地区迁牧是和喀尔喀蒙古各部长期斗争造成的，如在16世纪和扎萨克图汗部的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间就多次发生战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阿勒坦汗的侄孙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曾打败了额尔齐斯河上的土尔扈特人，并将锡木必斯土尔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③到17世纪初，西喀尔喀的赞瑚尔汗又多次打败卫拉特人，在一段时间内卫拉特人不得不向其称臣纳贡，同时也迫使卫拉特人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及哈萨克草原转移，从而使原游牧在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的土尔扈特部更移向伊施姆河、托博尔河上游一带，其冬牧场甚至直达恩巴河。杜尔伯特部则由科布多移向额尔齐斯河上游两岸。同时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巴图尔浑台吉也于17世纪初把一部分移牧于额尔齐斯河，直达塔拉一带，并出现在鄂毕河的巴尔瑙尔地区，可见沙俄侵略军于16世纪末来到额尔齐斯河地区之前，我国卫拉特蒙古各部早就占有了该河流周缘的广大牧区，并载入了中外史册。

在17世纪初年的四卫拉特是以和硕特部为盟主。当清朝统一东北并逐步掩有蒙古时，1637年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就以卫拉特蒙古名义遣使向清朝进贡，是为卫拉特蒙古统一于清朝的开始。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顾实汗又急忙于1646年奉表进贡，同时包括准噶尔部首长巴图尔浑台吉在内的许多厄鲁特首领都“附名以达”^④。清政府即赐给顾实汗甲冑弓矢，令其管辖厄鲁特各部。此后厄鲁特部辄间岁遣使至清廷进贡，保持了清中央与地方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4。

③ 《蒙古源流笺证》卷6。

④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

的密切关系。

以上的简单史实证明,额尔齐斯河流域及阿尔泰山南北地区一直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地区。至少从唐朝起我国已在那里设官治理,一千多年来我国历代都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的统治。

清代伊犁将军府的 设置及其历史功绩

伊犁河流域适位于新疆和中亚五个共和国的中心位置,是中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是公元前哈萨克族先祖乌孙部活动的中心地域。它曾是公元6~7世纪西突厥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突骑施汗国、葛逻禄汗国,以及后来的喀拉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哈萨克汗国无不以伊犁河为基本根据地。因此说伊犁河流域是几千年来中亚历史重地,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伊犁河流域的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熠熠生辉,历久不衰,是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富饶资源分不开的。首先,它的气候温和湿润,最适宜于人类的活动、农牧业的发展和动植物的生长。伊犁河上游三面环山,由四条向东辐射的山脉构成基本骨架,而其西部却甚为开敞,十分有利于大气环流和湿气团的进入,受到高山阻挡,常形成多雨雪的天气系统,所以降水丰沛,成为中亚降水最多的地区。伊犁河上游伊犁河谷的伊宁、霍城、察布查尔、巩留西部和伊宁市的年降水量达200毫米~300毫米,东部位处喀什河谷、巩乃斯河谷、特克斯河谷的尼勒克、新源、特克斯几个县的丘陵山地,因处于迎风坡面,年降水量谷地为260毫米,山地可达800毫米左右。至于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昭苏盆地及特克斯河谷

西部年降水量平均在 512 毫米左右,个别山区年降水量可达 1 000 毫米以上。其次,人们赞誉伊犁河流域是中亚明珠,还因其水草特别丰美。《汉书·西域传》称其“山多松栝,迄今山区林带依郁郁葱葱,草原牧畜遍野,特别是矫健的骏马,早已饮誉世界;山坡上的旱地几乎年年丰收。如果说真有天堂的话,应该说“上有天堂,下有伊犁,”论其气候的温和湿润,水草的丰沛肥美,物产的富饶繁多,都可和苏杭媲美;加上地下埋藏的金、煤、铁、铜等矿藏,和文物古迹的丰富,就很难有可以和他比拟的地方了。

(1)清代统一西部疆域的经过

15 世纪中叶,游牧于叶尼塞河一带的瓦剌势力日强,开始向西发展,逐渐越过杭爱山、阿尔泰山,占有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流域,西南到达吹河、塔拉斯河流域。16 世纪时厄鲁特蒙古形成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并经和硕特部首领博贝密尔咱为四部“丘尔干”盟首,始称卫拉特汗,先后传其子哈尼诺颜洪果尔、拜巴噶斯。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 年)传至拜巴噶斯之弟图鲁拜琥时,即向清皇太极“遣使进贡”。^①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 年)图鲁拜琥又同西藏的藏巴汗及达赖、班禅一起向清皇太极“奉表贡”。^②势力日扩后的皇太极说:“昔时金国所属尽为我有,沿海一带,自东北以迄西北,至使术、使鹿,产黑狐、黑貂等部及厄鲁特部在臣服”。^③清顺治三年(1646 年),清政府任命图鲁拜琥为厄鲁特首领,“赐甲冑,弓矢,俾辖诸厄鲁特”。^④当时准噶尔部已逐渐强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③ 《清太宗实录》卷 59。

^④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大,它的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也“附名以达”^①随图鲁拜琥一起,向清政府入贡。1653年又封图鲁拜琥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简称顾实汗)。

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强大后,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逐渐排斥了顾实汗,而置厄鲁特各部于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之下。巴图尔浑台吉死后,其子僧格继任准噶尔首领,从清康熙五年(1666年)开始。僧格曾多次入贡^②。不久,准噶尔贵族内讧,僧格为其异母兄弟车臣卓特巴图尔所杀,其子索诺阿拉布坦立。这时巴图尔浑台吉第六子僧格同母弟噶尔丹正在西藏当喇嘛,在西藏第巴(官名)怂恿下,迅速赶回伊犁,逐车臣,杀阿拉布坦,自立为准噶尔汗。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他每年向清政府派遣大批贡使。康熙十八年(1679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噶尔丹即“遣使奉贡入告”,^③请求批准。清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前往准噶尔。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平定吴三桂的叛乱,统一中原后,曾遣使至准噶尔部告捷。在康熙帝给噶尔丹的敕令中特意指出:“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赉捧重赏。”^④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卫拉特蒙古各部,与清王朝中央政府是隶属关系,是当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尽管于康熙二十七年(1668年)发动了叛乱,仍还承认“与中华一道同轨”。^⑤表示不敢“自外于中华”^⑥这些记载表明,即使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仍然十分清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

② 《清圣祖实录》卷19,24,31。

③ 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康熙十八年九月丁酉。

④ 《清圣祖实录》第103卷,第16~17页。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⑥ 《清圣祖实录》第137卷,第24~25页。

楚和明确。

噶尔丹叛乱初期,表面气焰嚣张,进入喀尔喀蒙古后,还进一步勾结沙俄分裂祖国。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噶尔丹叛乱后,就有大批厄鲁特蒙古部落迁离准噶尔地区。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憨都台吉为首的一部分准噶尔部落逃入内地,其首领向清政府控告噶尔丹的残暴统治^①。同时跟随噶尔丹的准噶尔牧民也大批逃亡^②。而逃往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乘噶尔丹兵败时,率众占据噶尔丹老巢伊犁地区,并立即向清朝政府上书,保证“嗣后大军凡有谕旨,俱愿遵行。”^③决心与噶尔丹叛乱势力划清界线,仍然服从清中央政权,并遵照清朝政府指示,在阿尔泰地区切断了噶尔丹的归路,从而加速了噶尔丹的灭亡。

噶尔丹在势穷力蹙时,一面诡称要向清政府投降,一面却加紧勾结沙俄,那时沙俄政府允诺“至青草出后,助乌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④由是噶尔丹有恃无恐,即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又率叛军三万骑,进驻克鲁伦河巴彦乌兰,扬言“借俄罗斯乌枪兵六万,将大举进犯漠南”。^⑤从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帝玄烨亲率三路大军,在土拉河上游昭莫多大胜噶尔丹叛军,噶尔丹仅率少数残余逃往科布多。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清帝又率军出宁夏进击叛军,噶尔丹败退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这个破坏统一的卖国贼结束了自己的生涯。策妄阿拉布坦遵康熙帝指令,将噶尔丹尸体及其女儿一并送交清朝政府。

噶尔丹死后,清政府即命策妄阿拉布坦领有准噶尔故地。沙俄仍然派温阔夫斯基谋图策动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俄国”,^⑥遭清政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康熙三十二年戊午。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
 ⑤ 魏源《圣武记》卷三。
 ⑥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80页。

府的强烈反对。清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沙俄仍然密派特务乌格留莫夫到准噶尔部进行分裂活动。可见沙俄从勾结野心家噶尔丹开始,对准噶尔部所占广大土地始终怀有侵略图谋,一次又一次拉拢准噶尔贵族搞分裂活动。清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封建贵族为了争夺汗位,互相残杀,经过近八年的内讧,最后准噶尔贵族达瓦齐在辉特部贵族阿睦尔撒纳支持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夺得了汗位。但达瓦齐统治极为残酷,准噶尔人民“无不离心解体”。^①一批又一批准噶尔人民和封建主纷纷迁往内地,如准噶尔部贵族萨拉尔、杜尔伯特台吉三车棱(车棱、车棱蒙克、车棱乌巴什)、达瓦齐部将玛木特等先后率部众投奔清政府,要求政府迅速制止内乱,统一祖国西北地区。乾隆十九年(1754年)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争权夺利失败而率部投归清政府。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政府任命尚书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军出北路;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出西路,讨伐达瓦齐。两副将军各领兵三千为前锋。北路军出乌里雅苏台,西路军出巴里坤,各带两个月粮草。由于达瓦齐不得人心,当清朝两路大军向伊犁进发时,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准噶尔部落人民望风而降,于四月底就顺利会师博尔塔拉,然后直捣伊犁达瓦齐巢穴。达瓦齐匆忙率军万人逃到格登山(今昭苏县境),企图负隅顽抗。可是清军派侍卫阿玉锡带二十四骑前去侦察,那时达瓦齐叛军已成惊弓之鸟,当阿玉锡舍骑乘突入叛军大营时,顿时大乱,达瓦齐只好越天山窜逃至乌什,为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献俘清廷。后来乾隆帝特在格登山竖立了一座纪功碑,即今留存的格登山碑。

清军进军伊犁,平定达瓦齐叛乱后,原拟“仍其旧设四汗,众建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9。

以分其势”。^①可是政治野心家阿睦尔撒纳早已梦想“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②为此于1755年9月又发动叛乱。清廷得悉后，即于同年12月出兵巴里坤，翌年三月军至伊犁，阿睦尔撒纳逃至哈萨克中玉兹，企图借哈萨克兵反抗清军，其阴谋为哈萨克族阿布赉汗识破，未能得逞。在此同时，叛首阿睦尔撒纳还派人到彼得堡乞求沙俄的军事援助。但在清军和哈萨克军的夹击下，阿睦尔撒纳仅率残卒二十余人逃入俄境，受到沙俄庇护，清政府一再要求沙俄按照《恰克图条约》引渡逃犯的规定，把阿睦尔撒纳交还中国，沙俄政府却一再推诿，直至1757年9月21日阿睦尔撒纳在托波尔斯克患天花死去，沙俄才把叛首的尸体运到恰克图交清朝政府派员验视。^③至此，准噶尔少数反动上层贵族发动的历时七八十年的分裂叛乱，最终平定。

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进入伊犁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达瓦齐叛乱的同时，也释放了曾被准噶尔贵族监押在伊犁的叶尔羌阿哈玛特和卓后裔布拉尼敦(大和卓)和霍集占(小和卓)，以便利用他们在维吾尔族中的某些影响招服维吾尔人民，并以军队护送布拉尼敦回喀什噶尔。他们却乘机纠集党羽，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喀什、叶尔羌等地发动叛乱，烧杀掳掠，搞封建割据，遭到天山南路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人民的强烈反动。在清朝军队的英勇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最后大小和卓兄弟带领残卒三四百人逃入帕米尔高原的巴达克山后，被当地首领于1759年7月擒获处死。维吾尔族农奴主贵族、反动宗教头目大小和卓发动的破坏统一，分裂祖国的叛乱，至此彻底平息，清朝统一新疆的局面才得到巩固。

在清政府统一西北边疆的斗争中，满、汉、维吾尔、哈萨克，厄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

③ 《清高宗实录》卷555。

鲁特蒙古、柯尔克孜、锡伯、达斡尔等族人民都发挥过重大作用，他们对开发和保卫西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伊犁将军府的设置

清朝于1755~1759年间先后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以后，为了统治这片辽阔的疆土，即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正式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天山南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

伊犁将军府于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统等各级地方官员，分别管理伊犁、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刺乌苏、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阿克苏、库车、喀刺沙尔、吐鲁番、哈密等地。据《清实录》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乙巳：“谕，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昨已简用明瑞，往膺其任，著授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所有敕印旗牌，该部照例颁给。”^①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壬子，“军机大臣等奏，伊犁当勘定之初，为新疆总汇，奉旨设立将军，一切管辖地方，调遣官兵，自应酌定成规。臣等谨议，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仍令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如有应调伊犁官兵之处，亦准咨商将军，就近调拨，开明职掌，载入敕书，从之。”^②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辛酉，“谕伊犁等处，已授明瑞

^① 《清高宗实录》卷673，页1下。

^② 《清高宗实录》卷673，页13下~14上。

为将军，自应设参赞、领队大臣，协同办事。伊犁参赞大臣著爱隆阿、伊勒图补授；领队大臣著伍岱补授。爱隆阿、伍岱，赏银各一百两，驰驿前往；伊勒图亦由喀什噶尔调赴伊犁，所遗领队副都统员缺，著扬桑阿补授，协同永贵办事。”^①

这是在设立伊犁将军府的初期对所设官职权限已有了初步规定，并分别派定了将军、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等人选。设将军一人，首任将军明瑞，伊犁将军是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同时也兼管行政。其下视地方冲要与否，分别设置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级大臣，即在比较大的城镇设办事大臣，比较小的城镇设领队大臣，综理各地军政事务，如在向为历史重地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均设参赞大臣。惟乌鲁木齐参赞大臣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已改为都统，首任都统为索诺木策楞，仍听伊犁将军节制。原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秋连同和阗领队大臣移驻叶尔羌，另在喀什噶尔设领队大臣，巴尔楚克设总兵；其余在巴里坤、巴彥岱、英吉沙尔、古城设领队大臣，阿克苏、乌什、库车、叶尔羌、辟展、库尔喀刺乌苏设办事大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改辟展办事大臣为吐鲁番领队大臣，受乌鲁木齐都统节制等。

当然伊犁将军一职最为重要，总计自1762年至1912年伊犁革命党人起义胜利，结束清王朝在伊犁统治为止的150年间，先后担任过伊犁将军之职的有34人，共48人次，因为有的担任一次，有的则担任二次或三次。谨按其年代先后，依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是：明瑞、阿桂、伊勒图、永贵、增海、舒赫德、索诺木策楞、奎林、永铎、明亮、保宁、永保、松筠、晋昌、长龄、高杞、庆祥、德英阿、玉麟、特依顺保、奕山、布彦泰、萨迎阿、扎拉芬泰、常清、明绪、荣全、金顺、锡纶、色楞额、长庚、马亮、广福、志锐。需要指出的是，新疆

^① 《清高宗实录》卷674，页2下。

1884 年建省,军府制被废除,全省事务由巡抚职掌。伊犁将军仅掌管伊、塔地区边务而已。

由于伊犁地处欧亚大陆中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伊犁将军一职颇受清廷重视。一般均由满蒙大员担任,因满洲贵族能在短期内统一全国,得力于始初的满蒙联姻者颇多,是以伊犁将军中的保宁、松筠、长龄、庆祥、扎拉芬泰等都是蒙古八旗贵族。

在新疆颇有建树、影响较大的伊犁将军则有明瑞、阿桂、伊勒图、松筠、长龄、布彦泰、金顺、长庚、马亮等。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原曾统率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为统一新疆立下赫赫战功;被任命为伊犁将军后,任职近五年,不仅对全疆的国防设施、行政建置多所筹划,同时对伊犁将军府的开创及其直辖伊犁九城中惠远、宁远、惠宁等城池的修建和满营、绿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的组建多有贡献,奠定了西陲国防重镇的军事、政治基础。从此,“宣国威于边疆,开一代之胜举”,其功不可没。

接任明瑞的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满族,爱国名将,协助明瑞平定大小和卓及乌什赖黑木图拉叛乱。在伊犁将军府初建时期,他就以办事大臣身份协助明瑞,力主在伊犁河南海努克等处屯田,增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地维吾尔农民至伊犁屯田;率领汉族军队屯田;继续兴建伊犁九城中的绥定、塔勒奇二城,对伊犁开发、加强国防立下了功绩。

第三任伊犁将军伊勒图,满族正白旗人,先后三次任职伊犁将军。在任职期间,妥善处理和安置了 1771 年从伏尔加河畔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各部;完善和扩大伊犁屯田;增筑塔尔奇沟口外乌克兰博罗素克、东察罕乌苏、霍尔果斯、哈喇布拉克诸地城堡等。对农垦及国防设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松筠,蒙古正蓝旗人,是一位在国防、经济、文化建设都有建树的伊犁将军,自嘉庆七年(1802 年)起先后两次任伊犁将军。在任职期间大力兴修水利,扩大旗屯,妥善处理了喀什噶尔维吾尔族人

孜牙敦乱事和浩罕商人等的不法活动,并能礼贤下士,尊重知识,擢拔人才,及时支持谪戍伊犁的祁韵士、徐松等研究和编撰有重要学术价值,足以垂诸久远的《西陲总统事略》、《钦定新疆识略》等书。

长龄于道光五年(1825年)出任伊犁将军,蒙古正白旗人,1825年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及英俄支持下入侵塔里木盆地,并迅速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闐四大城,幸赖长龄运用智谋,调度适宜,讨平了张格尔叛乱。光绪十年(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又纠集党羽,侵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数城,长龄再次扬威,迅速平定了玉素普叛乱,为巩固新疆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次叛乱平定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接任伊犁将军的布彦泰(满洲正黄旗人),大力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牧业,以裕民生。适逢原两广总督林则徐在伊犁戍所,对农垦事多所向他咨询,还派林则徐会同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一同到维吾尔族聚居区阿克苏、乌什、和闐周勘农垦实情。两年时间,扩大耕田60余万亩,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和传诵。

金顺,满洲镶蓝旗人,于光绪七年(1881年)任伊犁将军时,适为沙俄侵占伊犁十年后被迫交还前夕,沙俄阻挠中国收回伊犁,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金顺能识破和挫败敌人各种阴谋,收复领土,安定社会,厥功至多。

长庚,满洲正黄旗人,于国势积弱、内外危机四起的清代末年两次出任伊犁将军。面对沙俄威胁,伊犁又百端待理,他多所规划,一面练兵图强,操练新军,巩固边防;一面恢复伊犁屯田,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一面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开办电灯电话。同时坚决收回横亘于伊犁、塔城之间被沙俄强租去七年之久的战略重地——巴尔鲁克山,拔去了侵略者的一颗毒钉,显示了守边卫国者的硬骨头精神。

(3) 伊犁将军府的统辖区域

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在 1755~1759 年间先后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叛乱后所统的疆域,除北部已被沙俄侵占及阿尔泰地区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外,大致是原准噶尔汗国统治的领土。乾隆帝曾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七月十九日的一次上谕中说:“准噶尔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①但是由于沙俄从 17 世纪起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所以清朝统一新疆后所辖疆域比原准噶尔的属地小得多。除新疆的东部与外蒙、河西走廊毗连,南部从喀喇昆仑山与印度相接为历史传统界域外,现在主要叙述一下西北和西部界域,以明将军府所辖西部的疆域。

综计伊犁将军府西部所辖疆域属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个地区,谨分述于下。

1. 塔尔巴哈台地区

塔尔巴哈台地区在准噶尔汗国时原有疆界,北起铿格尔图拉(今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朔方备乘》说:额尔齐斯河西北流至铿格尔图拉,河北是科布多地区,河“以南亦属中国界”^②。向西南越过喀尔满岭经楚克里克河(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科克佩克特河与察尔河的分水岭)、爱古斯河(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一线与哈萨克族中玉兹为界。西以勒布什河与伊犁地区为界。这就是说布昆河、斋桑泊、阿布达尔摩多河、布古什河、萨克司湖、阿拉湖、额敏河、塔尔巴哈台山、沙吾尔山、斜米思台山、巴尔鲁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四。观《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 23 卷《北徼山脉考》。

克山、玛依勒山、扎依尔山等都在塔尔巴哈台辖境以内。

明末清初,塔尔巴哈台区域是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与哈萨克族错牧而居之所。1630年左右,土尔扈特部西徙伏尔加河一带游牧后,又成为厄鲁特蒙古辉特部的牧地,后来准噶尔部强大后,原来游牧于此的哈萨克族乃蛮部落和克烈部落也受到准噶尔贵族的统治。所以到1755年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境内除蒙古族外,哈萨克族阿布勒比斯王第六子库库岱的部落也游牧于此,它的夏牧场在布昆河之西,冬牧场在俄依河之东(俄依河发源于沙吾尔山),基本上都在斋桑泊的周围,与阿尔泰山西南相接,所以他们后来逐步迁到沙吾尔山以北及阿尔泰山地区。另有哈萨克萨尼雅斯台吉第四子罕巴尔部落的夏牧场在哈尔巴哈河之西,冬牧场在俄依河西南百里的果莫孙河两岸。在塔尔巴哈台山附近的则以哈萨克族乃蛮部落为多。至于说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所说:“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从爱古斯河为界”。仅是指塔尔巴哈台地区西北与哈萨克中玉兹相毗邻,并不是在爱古斯河东南中国境内没有哈萨克族。实际在爱古斯河东西游牧的都是哈萨克族中玉兹部落。不过他们一度曾受准噶尔蒙古贵族统治罢了。上述一些一直游牧于中国塔尔巴哈台境内的哈萨克族部落,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叛乱后,乃蛮部首领阿布尔芳斯即率部归属清朝,清政府给阿布尔芳斯及该部其他头领都册封官爵,颁发印诰。1783年阿布尔芳斯去世后,又封其女婿和卓为汗,所以这部分哈萨克族一直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并成为现在中国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列夫申著《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一书中也说乃蛮部首领阿布尔芳斯“和俄国没有任何关系,”又说乃蛮部“由于驻扎在原准噶尔人的领土上,所以得到了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引者)的保护,”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乃蛮部的阿布尔芳斯仍然“臣服于中国”。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叛乱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塔尔巴哈台地区和各游牧部落的管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设立

参赞大臣一员,经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批准,由参赞大臣绰勒多自乌鲁木齐率绿营兵六百名,屯种雅尔地方,建城垣,并派京健两营兵驻扎。^①第二年雅尔城竣工,新城被命名为“肇丰”,^②塔尔巴哈台参赞正式移驻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乌尔扎尔),后因雅尔冬季雪大,1766年,参赞大臣阿桂于东距雅尔城二百里的楚呼楚另建绥靖城(即今之塔城)。清朝除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一员外,还设协办领队大臣一员,专管东路卡伦;专理游牧领队大臣一员,兼管西路卡伦。

2. 伊犁地区

清朝在重新统一新疆前,伊犁是准噶尔蒙古的主要游牧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这里设伊犁将军府,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天山南北各地的广大疆土,从此伊犁成为新疆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因为清朝统一后的新疆,伊犁适位居全疆的中心位置,在此还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抚民同知、理事同知、总兵、守备、阿奇木伯克等各级地方军事、行政官员,具体管理伊犁地区。

清代伊犁辖地十分辽阔,它的东面是库尔喀喇乌苏,南面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相接,东北以勒布什河与塔尔巴哈台为界。西北、西和西南分别与左右部哈萨克、浩罕为界,成为清代中国西部边界的一部分。

伊犁的北面、西面均以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岸为界,即巴尔喀什湖全部在清朝界域之内。巴尔喀什湖是中亚最大的湖泊之一,清代文献称为巴勒喀什淖尔或巴勒喀什池。乾隆年间编纂的《西域图志》称:“巴勒喀什淖尔,周回八百余里,伊犁全河,经流千里,屈折

^① 松筠《新疆识略》第2卷。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149页说:“在现在的尔扎尔哥萨克村庄,出现了塔尔巴哈台城,后来被迁往东一百二十俄里(1俄里合1.0668公里)的现在这个地方。”

至此,百川万派,于焉归宿,盖准噶尔西北境最大泽也”。^①又说伊犁西路“北至巴勒喀什淖尔”。^②随后编纂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也明确指出伊犁边境“北至巴勒喀什池,接左哈萨克界”。而《清朝通志》以及洪亮吉撰写的《乾隆府州厅县图志》也都有相同的记载。

同时沙皇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作、历史地图也都确认,巴尔喀什湖在清代伊犁辖境以内,如沙俄时代编撰的《大百科全书》也说清代边界包有巴尔喀什湖。^③由苏联政府审定,于1958年出版的《苏联历史地图集》明确绘出中国西部边界直到19世纪仍在巴尔喀什湖。就在同一年苏联政府还审定了由苏联海军参谋部编制的《海洋图》中也有一幅16~17世纪的中国地图,也把当时中国的边界划在巴尔喀什湖北岸。可见中国西北边界在巴尔喀什湖,中、俄文献都有明确的记载。

从巴尔喀什湖西端起,向西南,过伊尔该图山(哈萨克斯坦称楚伊犁山),为吹河、塔拉斯河流域。清朝对吹、塔拉斯地域的管辖,清代许多官书都有记载。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吹河是伊犁西北境之巨川也。由吹河向西南有塔拉斯河,也是当时中国伊犁境内的大河。《清朝通志》称:塔拉斯河“西北流经塔拉斯地,汇为淖尔,是为伊犁之极西境。”^④塔拉斯河下游“有阿尔沙郭勒、阿克库勒淖尔、必库勒淖尔”^⑤,都是伊犁西路境内的河湖。由必库勒淖尔可“西行入哈萨克界。”^⑥向东南经哈喇布拉岭、喀得墨克岭,均为中国伊犁边界。额得墨克岭南为浩罕,北为塔拉斯河发源地,从该岭向东南至纳林河,与喀什噶尔地区为界;再往东,至阿特巴什河与乌什地区接界。

① 《西域图志》第26卷。

② 《西域图志》第13卷。

③ 《大百科全书》第76卷,彼得堡1903年版,第805页。

④ 《清朝通志》第27卷《地理》。

⑤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17卷《伊犁》。

⑥ 《西域图志》第13卷、第21卷。

根据以上历史文献记载,可知清代伊犁地区边界走向是:从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岸到塔拉斯河西端;又东南沿塔拉斯河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到纳林河。

伊犁地区的民族,有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厄鲁特蒙古、察哈尔蒙古、满、汉、回、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其中以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蒙古人数为多,占地面积也较大。特别是哈萨克族,其先祖乌孙从汉代起就以伊犁为活动中心;至唐朝又发展为咄陆部,仍以碎叶以东的伊犁河流域为活动中心。明末清初,准噶尔部据有伊犁时,哈萨克族大玉兹的乌孙、康居、杜拉特、扎拉依尔、阿勒班、索宛各部仍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臣服于准噶尔蒙古。清朝统一新疆后,大玉兹的哈萨克人是中国清朝的属民,如索宛部落就分布于伊犁以北的沁达兰卡伦一带,距伊犁最近。

属于伊犁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于伊塞克湖周围及其以北的阿拉套山一带,清朝文献称之为东布鲁特五部。《西域图志》称:东布鲁特“旧游牧地格根、噶尔奇拉、特木尔图,为准噶尔所侵,西迁寓居安集延。及准噶尔平,乃得复其故地。”清朝统一新疆,东布鲁特五部降附清朝,成为清朝属民。上述其余民族,向为国内民族。

3. 喀什噶尔地区

清代喀什噶尔地区的境界,北起纳林河南之图古斯塔老,与伊犁地区相接,西部与浩罕、拔达克山等为邻,包有阿赖岭、铁叶尔里叶克岭、和什库珠克岭、哈喇池,再南包帕米尔,至帕米尔河,然后向东至明铁盖达坂。清政府在这里设有参赞大臣,综理塔里木盆地各地事务。还设有协办大臣等文武地方官员和各级伯克,具体管理喀什噶尔地区。

喀什噶尔地区的民族,农业区主要是维吾尔族,在边境和山区

游牧的主要是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对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游牧部落的管辖,就体现着清政府对边境地区的主权。

柯尔克孜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汉代称鬲昆或坚昆,唐代称黠戛斯,元代称吉利吉斯或乞儿吉思,清代称布鲁特。他们最初游牧于叶尼塞河中、上游;公元9~10世纪有一部分向西迁至中亚天山中部广大地区游牧;17世纪末18世纪初叶尼塞河的柯尔克孜人也搬迁到了天山中部,和原先来此游牧的柯尔克孜人汇合在一起。

在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及大小和卓叛乱的斗争中,柯尔克孜族各部曾用各种形式支持清军的统一大业,在平叛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于1758~1759年先后归属清朝政府。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萨尔巴噶什部首领车里克齐向到达图古斯塔老等地招抚柯尔克孜部落的侍卫乌尔登请求,准许他们到伊塞克湖一带游牧。乌尔登当即指出:就是柯尔克孜各部“现在耕种之纳里特(即纳林河一带——引者),珠木罕、塔拉斯等处,从前尚为厄鲁特所据,今大兵平定准噶尔,格根、喀尔奇喇、特穆尔图淖尔等处,仍须安设卡伦……。若尔等游牧狭隘,惟抒诚恳请,恭候皇帝天恩指定,不可私行迁徙。”^①1759年布鲁特额德格纳部首领阿济代表西布鲁特向清朝政府表示:“自布哈尔以东,我等二十一万人,皆为臣仆。”^②

18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柯尔克孜族的各部落主要游牧于阿特巴什河以西的广大牧区。1758年,经清政府批准,柯尔克孜族各部落遂越过阿特巴什河,进入伊塞克湖一带。到18世纪60年代初,柯尔克孜族的游牧部落已遍布于“塔拉斯河与楚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科契科尔和珠穆翰,阿特巴什山和纳林河,克特缅立别,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八,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辰。

^②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莫斯科1959年版,第9页。

图古斯塔老和其他天山地区”。^①

柯尔克孜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尽管早已进入宗法封建社会,却始终保留着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归清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游牧于喀什噶尔西部和北部边境的柯尔克孜族部落有萨尔巴噶什或布库部、萨亚克部、希布察克部、奇里克部、蒙科多尔部、额德格纳部、冲巴噶什部、萨尔特部等。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辖北部边界是从纳林河下游南岸起,在那里游牧的主要是中国柯尔克孜的萨亚克部和萨尔巴噶什部(萨尔巴噶什部后来分为萨尔巴噶什和布库两部,清代文献习惯把它称为萨尔巴噶什或布库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萨尔巴噶什部首领车里克“赴京入觐”时,清廷曾授予三品顶戴花翎。乾隆五十年(1785年)车里克死,其长子承袭品位,又授其次子萨哩木伯特五品顶戴花翎,皆“世袭罔替”。19世纪30年代,毗邻的浩罕不断蚕食我国柯尔克孜的游牧区,从而萨亚克、萨尔巴噶什等部落首领在纳林桥一带聚会,共同约定,协同清朝政府抵御浩罕侵略。

由萨亚克部落的牧地往南,中国与浩罕以噶布兰、苏提布拉二岭为界,即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古里察与奥希之间。在这段边界地区游牧的是中国柯尔克孜族冲巴噶什和额德格纳两个部落。冲巴噶什的首领阿瓦勒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北京入觐,被授予五品顶戴,后因在境内经营马场有功,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被授予三品顶戴。阿瓦勒死后,由其子孙世袭,直至19世纪20年代,清政府授予冲巴噶什部落首领二品至七品官爵的多达二十余人,其中许多人领取清政府发给的俸禄。^②从19世纪30年代起,随着浩罕势力的扩张,浩罕不断侵袭喀什噶尔边境地区,却遭到冲巴噶什部人民的坚决抗御^③。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八,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庚申。

^② 松筠《新疆识略》第12卷《布鲁特头人表》。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第15~16页。

与冲巴噶什部错牧而居的还有柯尔克孜族的额德格纳部。它的游牧区域除在喀什噶尔西北山地外,还向南延伸,直至阿赖岭。^①喀什噶尔与浩罕交界的噶布兰岭、苏提布拉克及其东西的古里察和奥希,都是额德格纳部的游牧地。其首领多人被清朝政府授予四品至六品顶戴和金顶。^②随着浩罕势力的扩张,19世纪初,浩罕控制了额德格纳部的一部分,并占据了重镇奥希。道光八年(1828年)因不堪浩罕统治者的压迫和掠夺,额德格纳部十位首领率两万余人摆脱了浩罕控制,返回祖国。清政府即把他们安置在喀什噶尔所属特依列克达坂(又名铁列克达坂、铁列克达湾,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帖列克岭)一带游牧。^③

由柯尔克孜族额德格纳部牧地再往南,是帕米尔高原,也属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西域图志》第23卷称:“葱岭,一名极疑山,在天山西南,与南山(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引者)会合处。连岗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邐,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葱岭以西,与清朝喀什噶尔交界的主要是拔达克山。

帕米尔高原北部是阿赖谷地,嘉庆二十年(1815年)喀什噶尔孜牙墩叛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即调派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队“在阿赖地方截堵”孜牙墩。道光七年(1827年)分裂头领张格爾匪帮曾以阿赖谷地为据点进行骚扰,清兵即进驻阿赖地区搜寻张格爾。^④在这些平叛中,柯尔克孜族首领率部落人民积极配合清军,协同作战,探报敌情,在“军营出力,经各大员奖赏翎顶者”就有十六人之多。^⑤可证阿赖谷地确属喀什噶尔管辖。

《西域图志》中还指出在喀什噶尔城西五百里的和什库珠克岭

①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莫斯科1959年版,第36页。

② 松筠《新疆识略》第12卷《布鲁特头人表》。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54页。

④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伏龙芝1963年版第286页,“把战士一小群一小群地分派到各个地区搜寻张格爾。”

⑤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第80卷。

为喀什噶尔属山,同时伊西洱库尔淖尔(又称和什勒库勒淖尔)“水势深广,万山环绕,北通安集延,西限葱岭,南抵拔达克山。”也是喀什噶尔地区的湖泊,嘉庆时编纂的《会典》说:“伊西洱库尔淖尔,在喀什噶尔西,上有高宗纯皇帝圣旨碑,为伊犁^①极西境。”

从伊西洱库尔淖尔西南行,清代边界与拔达克山的什克南为邻。由此转东,到达喷赤河上游,成为喀什噶尔西南边界的南端。喀什噶尔所辖的这一段边境,是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的游牧地。苏联学者也说希布察克部落“分布在从奥希起沿帕米尔高原到巴达克山,并由此沿喀拉昆仑山一带”。^②也就是说从和什库珠克、阿喇楚勒、伊西洱库尔淖尔等帕米尔西部地区都是中国希布察克部落的牧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授予希布察克首领阿奇木为散秩大臣,积极协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1760年秋,兆惠向乾隆帝奏称:“蓝翎侍卫启泰招降希布察克布鲁特,在阿勒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击贼,直到拔达克山,俱奋勉效力。”^③到19世纪20年代,清政府先后给这个部落的二十多个首领以官爵顶戴,其中有的还领受清朝政府的俸禄。在帕米尔高原南部的塔吉克族长期与柯尔克孜族错牧而居,在谈及柯尔克孜的守边功绩时,也包括了塔吉克族在维护统一方面做出的贡献。

自纳林河下游南岸到帕米尔高原的这段中国喀什噶尔的边界,不仅清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在过去苏联一些历史著作中也有相同记载。如《吉尔吉斯史》一书称,1759年,东天山的柯尔克孜族部落:萨亚克部、萨尔巴噶什部接受了清朝政府的管辖。接着东吉尔吉斯其他部落和南吉尔吉斯各部落也都“臣服”于清朝。^④并还

① 因当时新疆均属伊犁将军统辖,所以又称新疆为伊犁。

②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莫斯科1959年版,第36页。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卷八三,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

④ 《吉尔吉斯史》第1卷,伏龙芝1963年版,第273~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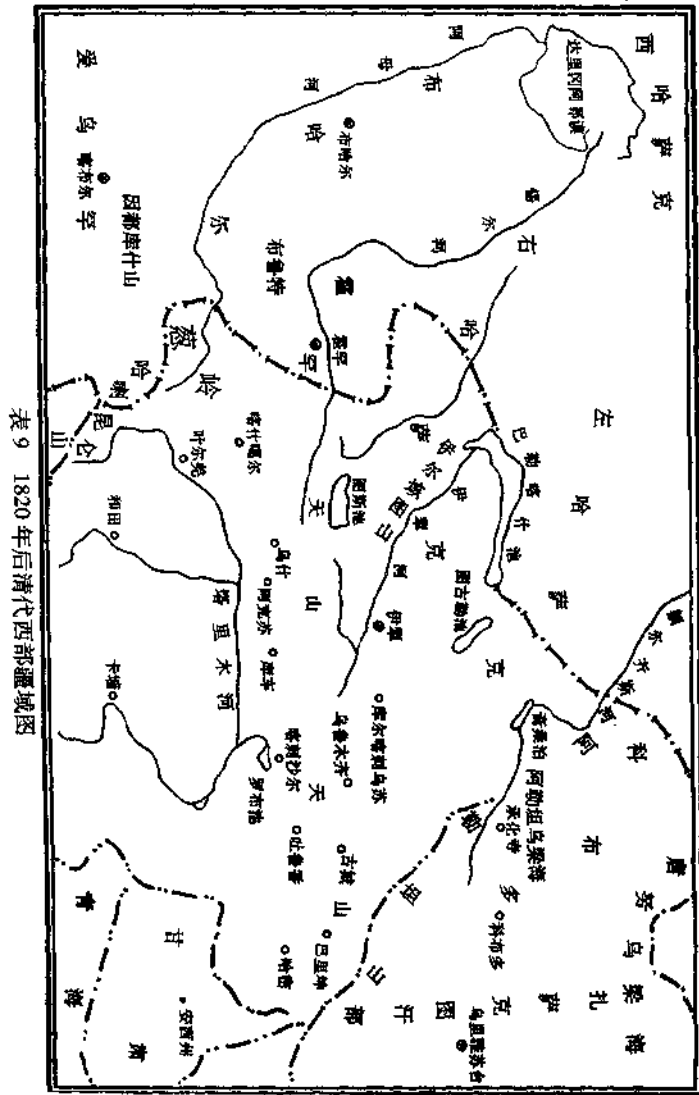


表 9 1820年后清代西部疆域图

进一步指出柯尔克族的奇里克、冲巴噶什、布库等部落,到19世纪60年代“北吉尔吉斯”被俄国吞并以前,仍然是中国的游牧部落。^①另一本《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的苏联著作中也说:“清朝当局为管理吉尔吉斯人建立了某些卫所。“卫所的划分不尽与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单位相符,卫所主要是按地方……命名的”。^② 尽管这些著作中多方歪曲柯尔克孜族各部落与中国清朝政府密切的政治关系,但这些柯尔克孜部落属于中国,清朝政府对他们的游牧地实行着有效管辖的基本事实,还是无法掩盖的。

(4) 清代伊犁九城

清朝设立伊犁将军府后,为了巩固和保卫这个将军府,即从1763年起先后建成惠远、绥定、宁远、拱宸、塔勒奇、广仁、瞻德、熙春、惠宁九城,形成新疆首府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为维护统一,保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对各城分别作一简单叙述。

1. 惠远城

惠远城,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乾隆三十八年(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度地筑城,逾年城成,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计长九里三分。乾隆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将军保宁再度扩建惠远城,在城东展筑一里三分三厘,由是周长达十里六分三厘,成为当时新疆第一大城,城内建筑整齐,纵横四条大街直通四大城门。东门称景仁,西门称说泽,南门称宣阁,北门称来安。每条街上都有小巷,共48条,城中心建有高大巍峨的三层钟鼓楼,飞檐

^① 《吉尔吉斯史》第1卷,伏龙芝1963年版,第27页。

^② 《吉尔吉斯史》第1卷,伏龙芝1963年版,第31页。

画栋,气势雄伟,以镇四方。登楼远眺,四条大街像利箭一样通向南北城门大道,一城风光尽收眼底。

惠远城内有规模宏大的将军府,参赞大臣衙署,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四个领队大臣衙署,绿营总兵公署,理事同知和抚民同知衙署等。同时惠远城还是驻军重镇,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从热河、甘肃、凉州、庄浪等地迁调满洲、蒙古官兵4370名及鸟枪、步甲400名到惠远驻守。因此在城内、城外有不少军事设施,如军器局、火药局、军器库,官兵操练武艺的教场等。

城内还设有官学、私学、义学各类学校10所。为了便于和日益向东扩张的沙皇俄国进行商贸及外交往来,还专设有俄罗斯学校。1851年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沙皇俄国特在惠远设立了领事馆。

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惠远城内还设立宝伊官钱局,局址即在将军府所在地,有二炉座,年铸钱1100余串(每串一千文),正面铸汉文“乾隆通宝”,背面铸满文“宝伊”局名。所用铜料,除在伊犁巴彦岱采挖外,主要靠天山南路各地调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伊犁将军保宁奏明,每年加铸钱文600串,共1722串,这定额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直沿用。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因派大军平定南疆张格尔的叛乱,军饷大增,钱价昂贵。宝伊局即代铸红钱,仿阿克苏模式铸普尔钱,运往南疆使用。^①不久又铸咸丰通宝小平红钱。1866年,伊犁发生动乱,“苏丹”割据政权占领伊犁九城,宝伊局从此停铸。

伊犁是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地区,因而城内外寺庙林立,如哈萨克、维吾尔、回等族信仰伊斯兰教,建有清真寺;各部蒙古信仰喇嘛教,就建有嘛嘛庙。满、汉族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和儒学等,因而建有道观、文昌宫、昌寿宫、魁星阁、城隍庙、关帝庙、真武庙、龙王

^① 《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

庙、火神庙、风神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社稷坛、先农坛等等。这对屯垦和远戍伊犁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慰藉。

惠远城处于物产富饶,水路、陆路交通四达的欧亚大陆中枢,四方商品荟萃于此。古代本是草原丝绸道的集散中心地,将军府设立后,更成为中亚农牧工商集中的重要商城,百货云集,市肆繁华。洪亮吉有诗称:“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①这里的布鲁特人是指哈萨克人,不是指柯尔克孜人,因为当时惠远城周围及其以西主要是哈萨克人;本诗洪亮吉还自注称:“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由此也可见惠远城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惠远城南凭宽阔的伊犁河,这一条发源天山、西入巴尔喀什湖的大河,是中亚最为富饶的河流之一,因上游山区雨雪丰富,所以水量很大,鱼类也极为丰富,洪亮吉也盛赞说:“结客城南缓步回,水云觅处浪如雷。昨宵一雨浑河长,十万鱼皆拥甲来。”他还自注说:“伊犁河鱼极多,皆无鳞,而皮厚如甲来。”这是很形象的譬喻了。

由于惠远城南凭澎湃汹涌的伊犁河,景色美丽,特在城边建一望江楼,成为惠远城的一大游览消憩胜景。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说:“临河有高楼,红桐碧瓦,俯瞰洪涛,粮艘帆檣,出没其下,南山雨霁,沙市云开,酒榼茶枪,赋诗遣闷,苍茫独立,兴往悲来。”洪亮吉也有诗称:“城隅两日霁寒威,韦曲词人尚下帙(谓韦大令佩金)。趁得南山风日好,望河楼下踏春归”。他特自注:“惠远城南有望河楼面伊江,为一方之胜。”^②可见一些骚人墨客常在望江楼聚会,遣诗赋词。特别是爱国抗敌英雄林则徐、邓廷桢等被谪戍伊犁后,也常在伊犁河边畅谈国事,遣诗赋怀,为历史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百读传诵的名诗。邓廷桢的《伊丽河上》道:“万里伊丽水,西流不奈何。驱车临断岸,落木起层波。远影群鸥没,寒声独雁过。河梁终

^① 吴嵩宸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② 吴嵩宸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古意，击剑一长歌。”林则徐的《塞外杂咏》道“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他们为何慷慨长歌？为何“满头晴雪共难消”？只因英帝国主义正在入侵我国沿海各省，所以日日夜夜“只愁烽火照江南”。那时历史地理学家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赋》，以及由松筠署名的《钦定新疆识略》（实际出自徐松手笔），也都是他谪居惠远期间完成的。可见这段时期的惠远城，不仅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

但是，伊犁这块中亚的明珠，早已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注目，特别是沙皇俄国早已垂涎欲滴，因而于1871年悍然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达十一年之久，从而惠远旧城也在沙俄殖民军的蹂躏下被彻底摧毁。有人把旧城的毁坏归之于“河水所浸，渐就颓圯”。^①这并非根本原因，伊犁河水侵蚀仅是次要原因。如果不是沙俄侵占此城，惠远城军民完全可以及时加固堤防，保护城池。由于沙俄侵占此城后，对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烧杀抢掠，“旧时都会，化为灰烬”。现在仅剩一此断垣残墙，留给后人凭吊了。实际这留下的是我们的耻辱，是沙俄帝国主义入侵的见证。

中华各族人民从来不怕强敌入侵，1875年爱国将领左宗棠、刘锦棠等率军进入新疆，首先平定阿古柏，然后清军从南、东、北几方面包围伊犁，使人侵俄军无所施技。迫于形势，沙俄只好于1881年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把残破了的伊犁交还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金顺将军进军伊犁，即在已毁的惠远旧城之北十五里处按原样建一新城^②。被称为惠远新城，现为霍城县惠远乡所在地。

修建惠远新城后，伊犁将军府仍驻守于此。原设惠远旧城的宝伊官钱局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之后又开始发行伊犁制钱，人称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刘维钧《西域史话》，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也说：“河水的侵蚀，城垣颓坏了”。

^② 1995年5月8日《新疆日报》古今中外版由张俊才摄影的一幅照片注释：“修建于1883年的霍城县惠远乡的将军府，属土木结构”。此处年代有误，应为1882年。

伊帖,票面一千文(内地印刷)。另有辅币“油布帖”。油布帖票面五百文(因五百文票使用广,纸易烂,采用油布)。黄色龙票(省票),每票合纹银壹两陆钱陆分。伊犁帖每票合纹银壹两。持官钱局钞票兑换白银每百金加水至二十五六两之多。^①惠远赌场上还流行一种竹牌子辅币。官钱局主要业务是汇兑,从事发行纸币,兑换钱币,放款取息。1928年金树仁主政新疆后,撤消了官钱局。原官钱局被改为迎宾馆。^②

清末在伊犁将军长庚的倡导和支持下,惠远城成为新疆吸收近代工业文明的窗口,如电灯、电话、电报、照相、汽车等引进和设置。《伊犁白话报》登载:“会芳园内新开照相馆,照一张四寸大的相片要白银一两;加印一张白银三钱。照一张六寸照片,价银一两五钱,加印一张银五钱。”

民国初年还在惠远城设立官办高等学校一所,首任校长余文欢(湖北籍),有教师近10人,大部为湖北人。有学生400余人,属满、汉、锡伯、索伦、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族子弟,全是学习汉文。该校毕业的优秀学生有官碧澄(汉)、中孚(锡伯)、白文辉(满)、白林又名白雪木等,其中白雪木(1896~1951年)是锡伯族中颇有成就的诗人,精通满、汉、俄文等,著有《素花之歌》、《老妇泪》、《汗腾格里颂》等诗歌,还编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语言优美、流畅,并还先后任察布查尔公立中学校长,特克斯县县长,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秘书等职。中孚也是人才,精通锡伯、汉、俄文,曾任新疆工学院教授,在新疆颇负盛名。该校自1933年起被改为残废军人教养院。

惠远新城的商业也很发达,街坊布局与老惠远城形制一样,专为进疆军队“赶大营”的京津商贩建商店40幢。广招商贾,采用暂免官税、官费补贴的办法,招徕各地商人进城经商,天津文丰泰商

^① 《民立报》1911年5月26日。

^② 参见晏海发《清末民初伊犁惠远商业概况》油印稿。

号也来此开设分店。又以公费移民之法,允许绿营军队士兵携带眷属,或去内地接着属。从而肩挑商贩,纷至沓来,在惠远城内置房设店,成为坐商,一时间城内街道交错,铺面林立,文酒风流,盛极一时,虽“犹未尽复旧观”,但至清末已有“小北京”之称^①。

惠远城商业贸易多集中城内东街、北大街及东关。城内多京津商人,城外则维吾尔商人群居。其中颇有名声的为津商经营的文丰泰、同盛和、大兴泰、永昌泰、文怡厚等字号,尤以文丰泰、同盛和最富实。以上店号经营京广杂货为主,有绸缎、茶叶、化妆品、日用品、呢绒、鞋帽、服装、文具、纸张、白砂糖、龙眼、棉料、苕苕棍、扣布、稀布、青竹布、漂丝布、黑竹布、蓝竹布。绸类有青闪、蓝闪、蓝闪青、青闪末本绸、宁绸、亮绸。缎类有花缎、锦缎、闲缎。茶类有米心茶、红茶、龙井、三九大茶等,还有南疆杂货,如干果、桃杏、孜然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首饰经营是惠远城一大特色。首饰店之多,加工之精细,品种的齐全,为伊犁九城之冠。其中颇有名气的金银首饰店为津商蒋平于南街开设的宝兴厚首饰店和津商张海有开设的聚兴楼首饰店。

1894年之后,惠远还开设一些中药店。计有张少山的德兴堂中药铺;山西大同人刘绅士的广济中药铺,药店资本合伊犁贴三千两左右;甘肃兰州人李俊开设的中药店,不仅医病,还经营药材生意,从内地运来大黄、天麻等,又将伊犁贝母、羚羊角输入内地。

惠远城加工业甚为发达,有榨油、磨面(水、旱两种)、酿酒、陈醋、糖坊、干菜泡制、裁剪缝纫、玻璃灯坊、玉器加工等。其中缝纫多在东大街,系鄂蜀人所经营。津商于相甫于北街经营的广义和油坊,资本雄厚,营业量大,除油坊外,还有芝麻糖坊等,平时有雇工3~5人。在南大街由三人合资开设的裕泰昌油坊,有作坊45间,雇工10~15人。城北关外则有锡伯族人多托胡我、雨松(锡伯族领

^① 惠远城商业贸易参见晏海发《清末民初伊犁惠远商业概况》油印稿。

队大臣)、冯安泰(即冯嘎达,察合尔领队大臣)三人合资开设的烧房,由多托胡我任经理,字号取三人名第一字称为多雨丰。另在东大街还有玻璃灯铺,玻璃材料由俄国进口,玻璃刀由巩固进口,加工各式玻璃灯,钟鼓楼四角也悬挂着玻璃灯。

惠远城的什锦点心铺也很有名,由津商芝成所开富庆祥什锦点心铺,远近咸集。津商杨某开设的点心铺,更是花样繁多,生意兴隆。

惠远新城的风味小吃,花样品种之多,誉满全疆。钟鼓楼下,摊贩成阵。湖北的馄饨,楼洞正中的烤羊肉、羊羔肉,回民族的油糕、油酥馍、糖火烧、肉火烧、腊羊肉夹饼、火烂鸡肉,天津的锅贴、猪肉包子,应有尽有。在钟鼓楼四角下各矗立着二层楼,西南角为花鼓戏院,东南角为羊肉馆,东北角为汉族饭馆,西北角为民族饭馆。花鼓戏随湘军传入伊犁,兴盛于光绪中晚期;民国后湖南、湖北人大部东归,花鼓戏随之冷落;又开始盛行“二簧、河北梆子”。羊肉馆则为天津人范掌柜,外加羊羔肉,色味俱全。猎肉铺则早卖猎肉,晚售卤肉、卤鸡、卤肠等。民族饭馆经营抓饭、烤包。

惠远城还有几间有名的大饭店、酒楼,如曲园、大吉祥、九路聚饭店等。由天津杨柳青人安师子西大街开设的天福居酒楼,1917年财政大员谢彬于5月10日到惠远城时就住在该处。特别是由天津杨柳青人宫德铭子1890年在北大街开设的会芳园更是远近闻名,酒楼内备有各种点心、什锦蒸食,内有雅座,洁净宽阔,代售南京板鸭、金华贡腿、南糟鲥鱼、鸡、鱼、肉松、蜜饯、莲子,一应俱全。会芳园是中国古老廊檐式建筑,经营面积2012平方米,可容27桌192人吃饭、休息;大罩棚高8米、宽12米、长25米,可容16桌128人吃饭;凡红白喜事,在此唱戏,要容300人左右。会芳园的炸、爆、烧、蒸、扣、煎、扒、烤……独具匠心,尤以烧烤席120道誉满全疆,于1893~1933年间甚为兴旺,1933年后由于军阀混乱,遂一蹶不振而倒闭。

城内还有锡伯族花俩春开设的车马店和杂粮店、草料铺。河南人李明德开的鞭炮铺,以及乾盛和菜店及数家当铺。

在惠远东大街还设有皮毛公司一处,为二层建筑物,由外国技师设计,仿西欧洋式,前门庭专卖洋货,后有三十余间库房,收购肠衣、皮毛,沙俄即从此运回原料,在本国加工制造,又将成品输入伊犁,“以重价售我,利市十倍”。^①后皮毛公司改为专售京广杂的太丰红商店。

惠远还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设立了商会,开始有会员100人,到民国19年(1930年)已有会员400人。在钟鼓楼东南角有议事亭一处,又称议事阁,凡商务重大事宜均在此商定办理。

光绪34年(1908年)还在惠远北大街原将军花园内设立电报局,系有线电路,东至黑山头,西至宁远,共510里。邮政则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达海参威,经海路抵天津、北京,数十日即达。

惠远城东郊有老稻地、公所园,以产稻米、马铃薯、百合驰名。马铃薯长约80厘米,粗8厘米~10厘米,百合个大、味鲜。

清末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影响到伊犁,部分革命党人在惠远新城创办了《伊犁白话报》,宣传进步思想,武装各族革命群众,并于1912年1月7日由同盟会员杨瓚绪领导,发动了伊犁起义,一夜之间推翻了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处死了最后一位伊犁将军志锐,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惠远新城成立了新伊大都督府。不久伊犁统一于新疆,由省长杨增新任命杨飞霞为伊犁宣慰使,后改为镇守使;1930年又改镇守使为伊犁屯垦使,由张培元充任。1933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后,即于1937年任命其岳父邱宗璿为伊犁屯垦使,始将屯垦使公署从惠远城迁往宁远城(今伊宁市)。从些惠远城仅为驻军营地,商业也一落千丈。

^① 《新疆图志》第28卷《实业志一》。

现在惠远城内除钟楼尚保存完好,并已修整一新外,宽敞的将军府旧址尚存庭院、曲径、回廊、凉亭以及风格粗犷的一对石狮子,此外均已旧痕难识。

2. 绥定城

绥定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伊犁参赞大臣阿桂于乌哈尔里克修建,^①南距惠远城三十里,城高一丈七尺,周四里三分,原设四门,东称仁熙,西称义集,南称利渠,北称宁漠,后北门被堵塞。该地所以称乌哈尔里克,因“乌哈尔”为准噶尔语“鹭鹭”意,“里克”为维吾尔语“很多”意,译意即为鹭鹭很多的地方,由于乌哈尔里克河流经绥定城东,河中颇多鹭鹭,故名。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在伊犁置屯镇总兵,管辖绿旗兵,即以绥定城为中营。随着绥定城的发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增置绥定城巡检一个,越三年又置仓员一人。1884年新疆建省,改设伊犁府于绥定城。1864年后被沙俄侵占去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伊犁河谷已偏据一隅,从而新设的新疆巡抚只好驻在乌鲁木齐。1888年绥定城改建为绥定县。现绥定县治已成为霍城县所属的水定镇。

绥定城商业相当发达,主要集中在南大街和南关、东关。有迪化同盛和分号,津商安氏经营的文丰泰百货店,山西人创办的继美丰茶庄,天津商民经营的首饰店;附设有戏楼的振泰洪酒楼,闻名全疆的兴泰和酱醋园,还有专收皮毛的西顺行,福全候酿酒坊等。南关则以维吾尔族商人为多,巨商玉山也开有商店,此外还有资金雄厚的夏亚洪商店,阿不来克巴衣商店和托克逊字号。东关还有专铸造犁铧及马车上各式铁质零件的炉院。陕西来的汉族王铁匠,技艺高超,专打制龙牌锄、刀、菜刀、铁铲,因这些工具上均有葫芦印记,故人们谑称之为葫芦王。城内东街的“坑坑刘”,专做各式大车,

^① 《新疆简史》第1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绥定城,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建”误,应为1762年。

坚固而轻巧。另外还有众多的油坊、磨坊等。城东河坝外有造纸坊一处，用碎布、废纸、棉花为原料，压碎泡浆贴墙晒干。在城西则有巴扎，每逢集市，人如潮涌。市上有农牧民的各种农产品、畜产品、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如绸缎、铁器、自制肥皂、自制火柴、牛羊油蜡烛，以及和田地毯、库车刀剪、鞍蹬、拜城铜器、俄式“沙马瓦”蒸盆、手炉等用具。而伊犁河产鱼类和成堆的西瓜、甜瓜、无花果格外诱人。1917年5月10日谢彬途经绥定时，于《新疆游记》中记称“南关皆缠商，城内多津商。南关前年毁于火，市廛皆新筑，楼房俄式，整齐可观，街道亦宽广”。^①这场大火的原因是维吾尔巨商阿不采克巴衣举家去果子沟避暑，商店关门，有人把一发子弹射入商铺内的火药箱，顿时大火冲天，南关商店几尽毁于火。

谢彬在绥定一带还看到了清末民国初，国家积弱所留下的不堪回首的耻辱：“迪化、伊犁间之电杆，已十二年未修，（章程：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一遇朽倒，恒截原杆重竖，因陋就简，以迄今日。自绥定迤北，与俄线（俄属萨满有电杆通我伊宁）并道而南，彼则下夹石础，高插霄汉。我则高不逾丈，腐败倾斜。相形之下，欲哭无声。且又尝梗不通，几同虚设。俄领事每笑比为‘骆驼电线’，可耻亦可愤也。”^②

3. 塔勒奇城

塔勒奇城位于绥定城（今霍城县水定镇）西5公里处，因北面的塔勒奇山得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参赞大臣阿桂所建，在伊犁九城中修建最早，同时也是规模最小的一座城池，初建仅高一丈，周一里五分六厘，有门三，无名。嘉庆七年（1802年）在北面展筑四十丈；二十一年（1816年）又在东面展筑三十丈，共三里六分，北距广仁城五十里，屯镇守备驻于此。有人把塔勒奇城放在果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②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子沟内,并以果子沟的景色作为塔勒奇城景色描叙是错误的。^①

塔勒奇城主要为绿营兵驻地,城内有守备衙署,千、把、外委衙署、军器库、粮员衙署、仓厂,城周围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为绿营屯种之地,粮产甚丰,成为当时伊犁贮粮基地之一。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盛赞塔勒奇周“曲岸细柳,新蒲小淑萦回,自成幽境”。城西北五里有草湖,周十余里,俗称乱泉子。城南三里许还有周约一里的小湖,临湖西岸有故江南盐巡道朱尔赉额所建且园戍馆,“园中有楼,曰面面山楼,果树榆树可百余株。圃中裂畦,布种罌粟,繁如云锦……夕阳西下,散步水滨,鳧雁鸳鸯,冲烟拍水;有细鱼,四腮如鲈,溯流举网,藉草以观”。可知城周风景如画,可惜塔勒奇城清末已废,仅剩居民数家,现在废城内已被全部平整农田,自水定镇至三道河的公路正从城中穿过。

4. 广仁城

广仁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伊犁将军伊勒图建于乌克尔博罗素克,原意为准噶尔语多芦苇的地方,因此当地汉族人就把它叫做芦苇沟。^②广仁城城高一丈三尺,周三里六分,有门三,东门称朗辉,西门称迎灏,南门称溥惠。为绿营携眷官兵左翼所驻(绿营初建时分左中右三营),设游击一、守备一、千总二、把总四、经限外委六、额外外委六,马步兵各三百人。清代学者洪亮吉于1800年被谪去伊犁,夜宿广仁城时作诗称:“芦苇沟边路,茫茫日欲昏。坚水截南北,空白合乾坤。马避千人集,雅啼独树村。车箱梦畴昔,聊是慰羈魂”。1884年建省后,广仁城即隶属绥定县,驻有游击一员,原绥定城巡检也移驻广仁城。该城商业在历史上曾相当繁盛,文化教育也较发达。谢彬《新疆游记》称:“城多崩塌,内驻巡官,外驻防

^① 刘维钧《西域史话》(一),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28页。

^② 刘维钧《新疆史话》(一)第128页说:“广仁城建筑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它的前身是元朝阿里麻里帅府的驻地”。均误。

卡,有绥定牲税及统税分局与国民学校,城厢店铺居民约二百余家”。^①在本世纪60年代后期,城内居民陆续迁出城外,于公路两旁另建新街。现在芦苇沟已成为乌伊公路上的新兴集镇。原有广仁城仅剩几段残垣,供人瞻拜。

5. 瞻德城

瞻德城,建于今霍城县清水河镇,原名察罕乌苏,系准噶尔语“白水”或“清水”意,故当地汉民称为清水河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参赞大臣阿桂,就建议察罕乌苏是伊犁少有的肥沃土地,应该建一小城,终于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将军伊勒图建成。城高一丈三尺,周三里六分,有城门三,东门称升瀛,西门称履平,南门称延景。东距广仁城二十余里,由绿营携眷官兵右营屯驻该城,营内设都司一、守备一、千总二、把总四。给制外委六、额外外委六、传步兵各三百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隶属绥定县管辖。1914年6月霍尔果斯设县治,瞻德城又划归霍城。1917年5月9日谢彬过该地时,见“民居百余家,有汛卡”。^②现在已是霍城县第二商业集镇。

6. 拱宸城

拱宸城,原名和尔郭斯,因临霍尔果斯河而得名。和尔郭斯、霍尔果斯系同名异译,均为准噶尔语“畜牧地”的意思,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将军伊勒图建。城高一丈七尺,周三里七分,有东、南、北三座城门,分别被命名为寅辉门、遵乐门、绥定门。城在塔勒奇城西八十里,由屯镇参将驻守,是年置巡检一人,为伊犁绿营携眷官兵之霍尔果斯营屯驻。

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霍尔果斯分防厅,由巡检改设分防通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②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判,专司稽查卡伦,不理民事,并无辖地。民国三年(1914年)新疆督军杨增新“激于国防,乃划拨绥定辖地,与索伦营地,设霍尔果斯县。东界自小西沟心,顺渠水,折南折东抵妖魔山,沿山脊;折南,顺大干沟,至绥霍大路之头道河;折西,至二道河;折南,直抵伊犁河沿;西界霍尔果斯河,与俄接壤;南界伊犁河;北界索伦营新划草场。东西八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居不盈二百户”。^① 据此经中华民国内政部批准,设立霍尔果斯县。1947年改名霍城县,由是拱宸城成为霍城县县城。1962年因霍城境内数万边民出走苏联,即于196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水定县并入霍城县,霍城县城也迁往水定镇。原有的拱宸城城墙大部尚存,现在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团部驻地。

7. 熙春城

熙春城位于惠远城和宁远城之间的哈喇布拉克(黑泉子),距惠宁和宁远两城只有10里左右,那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在此建成一座城垣高一丈,周长二里二分,命名为熙春。有东、西、南三城门,分别被命名为觐恩、凝爽、归极。城内设屯镇都司一名,负责屯田事务,并从陕、甘两省抽调携眷汉族官兵300名,组成绿营兵进驻此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从事农业生产。经过汉族士兵的辛勤耕耘,昔日野草丛生、野狼出没的黑泉子,变成了沃土良田。1917年谢彬经过此地时,仍说:“城盘子,即熙春城。城内居民二三十家”。^② 现在此城已难寻残迹,但汉族士兵在此屯田,把荒原变为绿野,在当地少数民族中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仍把熙春城所在地称为“汉宾”,即汉族士兵意。今天伊宁市汉宾乡的名称就是由此而得。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②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8. 惠宁城

惠宁城在惠远城东北约七十里处,北傍阿里玛图山,南距伊犁河三十里。其地有阿里玛图、毛海图、皮里沁三股山泉水和方圆五、六里的黄草湖泊,那里水丰土肥,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巴彦岱,即“富饶”的意思。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伊犁将军明瑞在此建城,高一丈四尺,周六里三分,乾隆帝赐名惠宁城。有四座城门,分别被命名为东门昌汇、西门北丰、南门遵轨、北门承枢。

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清政府先后自西安抽调携眷满洲、蒙古官兵2204名组成满营,至惠宁城驻守,并由惠宁满营领队大臣统辖,城内设有军器弹药库和练武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还把绥定城的巡检移驻惠宁城。

惠宁城是伊犁粮食储藏和集散地之一,城内磨坊就有十一处,设有粮员衙署和仓厂。对教学也很重视,在城内设有官学8所,义学一所。1863年3月惠宁城内回民在杨三星、马二领导下联合城外贫苦农民起义,并于1865年2月占领了惠宁城。1871年沙俄入侵军以重兵胁迫伊犁“苏丹”艾拉汗签订了城下之盟,由是伊犁被沙俄侵占达十一年之久,惠宁城也由是残破。

9. 宁远城

17世纪40年代,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进驻伊犁。由于厄鲁特蒙古信奉藏传佛教,即于伊犁河两岸多建喇嘛寺院,并设专管喇嘛事务的机构,初称五集散,后又扩大为九集散,于是伊犁就成为准噶尔部的政治、军事、宗教活动中心。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乘西藏政局纷乱之时,于1716年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率精兵6000人进军西藏,击败藏兵,然后从各寺庙中劫取金银神器、佛像等返回伊犁,即在伊犁河北岸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固勒扎庙;在伊犁河南岸则修建了海努克庙。“固勒扎”蒙古语意为盘羊,因庙的屋顶

用盘羊角装饰而得名。“海努克”的蒙古语意为牦牛，据说海努克庙的庙顶用牦牛角装饰成，每当阳光照射时，固勒扎庙顶金光闪闪，故习称之为金顶寺；海努克庙顶银光闪闪，故习称为银顶寺。史书记载，这两个寺庙“高刹、摩霄，金幡耀目，栋橑宏敞，象设庄严，集聚喇嘛，居此二寺，暮鼓朝螺，梵吹清越。”每逢岁首、盛夏，准噶尔部各地喇嘛云集，虔诚拜佛，“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宏瞻，遂甲于漠北”。因而金顶梵音，被誉为清代伊犁八景之一。可是1757年阿睦尔撒纳叛逃伊犁时，为了抢夺固勒扎庙的金银重器，烧毁了此庙。固勒扎庙仅存在30多年；同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国防，1762年决定要在海努克修建军事小堡，由是海努克庙也被拆除。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决定在固勒扎建城，高一丈六尺，周四里七分，取名宁远。有城门四，分别被名为东景旭、西环瀛、南嘉会、北归极。在城外东北隅半里许沙阜上竖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前后碑二通。城中置阿奇木伯克等官职，辖维吾尔人民6383户，除服役采铁者外，务农者6000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分6000户为九屯。1881年设宁远城同知；光绪十四年(1888年)伊犁设府，宁远置县，与伊塔道同治，隶伊犁府。民国三年(1914年)改宁远县为伊宁县，东西180里，南北130余里，领圩子84个。

1917年5月16日谢彬巡视伊宁城后感慨地说：“清同光间，俄人乘我内乱，据我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嗣经收回，又订伊宁为自由商埠，以故市面商权，皆握俄人之手。又有彼邮局、电局及道胜分行，以助竞争，其势愈雄。商场用器，度曰‘当子’（值我二尺），衡曰‘哈塔克’（当我十一两）——皆俄器也。账簿、算盘、银钱、货单，皆俄式也。发售俄国商品，沿用俄国习惯，求之形式，无一有类华商，洵可悲已。自欧战以来，俄国工商业停歇，无货输入，缠商巴依，影

响最大”。^①宁远城内维吾尔族商人最多，资本雄厚，最著者为阿图什商人玉山开设的福盛行商号资本达200余万两，其主要商业区从今伊宁市公安局往南至人民电影院，长达一里的过街硬盖天棚，百货云屯，琳琅满目。实力稍次于福盛行的为雅和普商号。专收皮毛的有太和洋行、遐利洋行；回族沙利德也经营皮毛公司，他们除和天津、上海、陕甘有商务联系外，还与英、美、俄、印度有贸易来往。清末宣统年间，伊犁制革业原为官商合办，长庚将军与官股银25万两，和玉山合办，机器购自德国，原聘德国工程师，继用俄人，出品与俄货无异，销路旺，对抵制俄货起了很大作用。

宁远城的京津商人也相当多，主要的有宋杰生开的忠信厚商号，经营京货和对外贸易；李同和的复庆和商号，经营京货醋浆；王作宾的同益涌商号，经营醋、点心、京广杂货；杨振山的德泰益商号，经营油场和药房；刘世斋的玉泰厚和赵云宣的大兴泰商号，均经营京货医药；安建忱的直兴公司经营肠衣；张配汝的德心堂经营中药等。宁远商会会址设在汉人街。

清代宁远商业不及惠远，可是到民国初年，民族商业日益繁荣。因其处于中西孔道，特别是俄国土西铁路兴建后，中亚各地商品源源进入；还有华侨和东北各省商人、技工假道苏联来伊宁，带来了新的技术、知识，有力地促进了伊宁地区工业、手工业、酿造业的发展。如王德润开的久康皮鞋厂；华侨王秉衡的皮鞋厂；高胜云的中亚皮鞋厂；王发等人的莫合烟厂。另还有新民卷烟厂，宁光烟草工艺社，啤酒厂，皮鞋毡筒制造厂，伊犁制膜厂，酒精制造厂，火柴制造厂，伊犁面粉厂，伊犁冶酒厂，伊犁制酪厂，伊犁罐头厂，锯木厂等。1936~1937年间还建成了伊犁电厂，电力为25基罗瓦特。

民国以后的宁远城，其人口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已超过惠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远城,形成了伊犁地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5)伊犁将军府的军事部署

各地驻军人数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满族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因而于全国各地的驻军都调满族兵为主力,其次是与满族结有姻亲关系的蒙古族;还有一部分是投附的汉族兵士。

1755~1759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即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完整的军事机构,派驻了重兵,在南北疆各主要城镇都驻有军队,共38700多人,其中主力是以满族人为主要成份的八旗兵。

清朝在新疆的驻军,分驻防军和换防军两种。驻防军长期驻守其地,官兵可以携带家眷;换防军不带家属,短期驻守,轮班换防,最初是三年一轮换,以后改为五年一轮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清朝比较重视天山北路地区,他们认为那里西接哈萨克、布鲁特等强悍的游牧民族,若无充分的防备,易招彼辈入侵,所以驻兵特多,并且以长期驻防军为主。

所称北疆驻防军以伊犁、乌鲁木齐为两个中心。伊犁以惠远城为中心,包括伊犁河两岸和博罗塔拉河流域。东路驻防兵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还包括古城、巴里坤及天山南路的吐鲁番和哈密两个盆地。

先说自1762年起陆续派驻伊犁的驻防军。

驻惠远城满营4370人。驻惠宁城满营2204人。驻伊犁河南锡伯营1018人。驻伊犁河北霍尔果斯、东集、齐齐哈尔、萨玛尔、图尔根一带索伦达呼尔营1018人。驻博乐、温泉一带察哈尔营

1 837人。驻昭苏、特克斯一带厄鲁特营 700 人。驻绥定、熙春、拱宸、瞻德、广仁、塔勒奇等城为绿营兵。

属于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满、蒙、绿营兵都为换防兵。如派驻塔尔巴哈台的满营兵 720 人,锡伯营兵 130 人,索伦营兵 130 人,察哈尔营兵 170 人,厄鲁特营兵 160 人,均由伊犁换防。另有绿营兵 800 人则由陕、甘换防。

东路驻防兵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设乌鲁木齐都统,统辖境内的满营和绿营兵驻于乌鲁木齐的满营兵 3 400 人,连同眷属共计 12 000 人,1772 年由凉州、庄浪移驻,设领队大臣一员以统之。驻于古城(今奇台)满营兵 1 100 人,连同眷属约 4 000 人,由甘肃等地移驻,设领队大臣一员。驻于巴里坤满营 1 000 人,连同眷属约 3 000 人,1772 年由西安移驻,设领队大臣一员。另还在乌鲁木齐设绿营马步兵 3 500 名,由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移驻,设提督一员以统之。巴里坤绿营兵 2 000 名,由甘肃、安西等地移驻,设总兵以领之。古城绿营兵 400,由甘肃等地移驻。吉木萨绿营马步兵 900 名,玛纳斯协营马步兵 1 600 名,喀喇巴尔噶逊绿营 300 名,均由甘、陕等省移驻。库尔喀喇乌苏及精河各有绿营马步兵 300 人,由甘州、河州、固原、西宁等地移驻。

天山南路都是换防兵,不带家眷,轮班更替,派驻喀什噶尔满营兵 330 人,由乌鲁木齐换防;锡伯营与索伦营各 96 人,由伊犁换防;绿营兵 625 人,由西宁及乌鲁木齐等处换防。

英吉沙尔,派驻满营兵 80 人,由乌鲁木齐换防,绿营兵 200 人,由陕西换防。

叶尔羌,派驻满营兵 206 人,由巴里坤、古城、吐鲁番换防;绿营兵 680 人,由陕甘省换防。

和田,无满营,只有绿营马步兵 223 人,由陕甘换防。

阿克苏派驻满营兵 60 人,由乌鲁木齐换防;绿营兵 698 人,由陕甘换防。

乌什, 派驻满营兵 140 人, 由巴里坤、古城、吐鲁番换防。绿营马步兵 505 人, 由陕甘换防。

库车, 无满营, 只有绿营兵 302 人, 由陕西省换防。

喀喇沙尔, 派驻绿营兵 600 人, 由陕甘换防。

吐鲁番, 派驻满营兵 500 人, 由乌鲁木齐换防; 绿营兵 600 人, 由陕甘换防。

哈密, 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 设驻防兵 2 000 人,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 裁撤原有驻防兵, 改调瓜州营兵 300 人, 布隆吉尔营兵 200 人, 黄墩营兵 200 人移驻哈密。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 又添设安西提标营兵 100 人驻哈密, 归巴里坤总兵属下副将统辖。

乾隆统一新疆后, 社会比较安定, 所以各族各营驻户蕃衍甚速。至嘉庆年间, 据伊犁将军松筠调查, 在伊犁各营的人数已发展到 98 300 余口, 各营的人口数如下:^①

惠远城满营	22 600 人
惠宁城满营	13 340 人
锡伯营	9 200 人
索伦营	4 500 人
察哈尔营	11 700 人
厄鲁特营	26 200 人
绿营	10 700 人
合计	98 340 人

东路驻防兵中的满营, 乌鲁木齐已达 20 000 人, 巴里坤 6 000 人, 奇台 6 500 人。可是到 1864 年, 从库车开始, 新疆地区爆发了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封建农民起义, 在短短几个月内, 天山南北两路重要城镇几乎全被起义者占有。由于历史的局限, 这次规模空前的各族农民起义, 被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篡夺了领导权。建立起

^① 松筠《新疆识略》。

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如伊犁迈孜木杂特的“苏丹”政权,乌鲁木齐妥得麟的“清真王”政权,库车热西丁政权,喀什噶尔的“思的克”政权,和田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打着“排满、反汉、卫教”的旗帜,鼓吹“圣战”,煽动民族仇杀,大肆屠杀异教徒。各个封建割据政府,为了扩大地盘,相互攻伐,争战不已,使新疆陷入分裂混乱之中,给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使满、汉等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1864年9月,乌鲁木齐满城被攻陷后,满族都统平瑞自焚,官民死难者万余人,仅有一二百人逃往乌鲁木齐南山。吐鲁番满城被攻陷后,青、壮、老年人全部被杀,只有部分13岁以下的小孩被维吾尔人救出收养。1865年1月,塔城失守后,官民死者极众,参赞大臣锡霖、领队大臣博罗果苏等均战死。1865年4月30日古城满城被攻破后,全城官兵、妇女虽拼死巷战,终因力不能敌,全城满汉官兵民众被杀者七千余人。1865年9月1日阿古柏攻陷喀什噶尔汉城后,更大肆屠杀异教徒。据目睹惨状的英国人沙敦说,仅在喀什噶尔及叶尔羌二城,被杀的满汉族人就有4万人,满族办事大臣奎英、帮办大臣福凌阿等均投火死。1866年3月8日,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被攻破后,全城死难者数万人,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前伊犁将军常清也被杀。当时全疆只有巴里坤的满城未被攻破。

经过这一场空前的劫难,全疆幸存下来的满族人已不多。于1881年将东部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的满族人全部集中在奇台,合计不过2000人;西部集中在伊犁惠远新城,也只有2000多人,总计全疆满族只剩下4000多人,仅为战乱前满族68440人的5.84%。光绪十七年(1891年)奇台满城发生了一次流行性喉症,又死去将近二分之一人口,城中满族只剩下1000多人。

在1864年新疆各族农牧民大起义的狂潮中,由于各族封建主的篡夺领导权和外敌入侵,在新疆的汉族人被杀的更多,特别是天

山南路各县的汉族人不仅大部被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也都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族人民了。

后勤供应线

新疆向为少数民族地区,清朝在统一长城以内地区后,辽阔的西域地区为准噶尔蒙古的割据政权所占踞。清政府为了统一西域,经过多方筹划,在康熙年间已设置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尔省省会扎布哈朗特)至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批台站;后又在嘉峪关至新疆哈密设置了12个台站。乾隆时为了顺利用兵新疆,对后勤供应、军书文报急需的交通设施极为关注,即在前代原有驿站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军事需要,又增设了专供军用的驿传机构:“曰军台,曰营塘,或统一于领队,或隶于提标、飞符驰檄,限日计程,重军政也”。^① 据此可知,清朝在新疆设置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大体可分军台、营塘、驿站、卡伦四种。以上四种交通设施,各有其不同的分工,但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民间运输之间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具体地说,军台主要为国防军事服务,被称为急用飞递军台。营塘则备有车、驼,专为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转运服务。驿站,备有普通快马,专为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的行政管理服务。卡伦则为巡逻、通讯两种职能服务。据嘉庆年间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卷39称:“凡置邮……曰站,军报所设为站。其常设者,自京城北回龙馆起,迤邐而西分两道。一达张家口、接阿尔泰军台,以达北路文报。一沿边城逾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接军塘,以达西路文报”;“曰驿,各省腹地所设为驿,盛京所设亦为驿”;“曰塘,甘肃嘉峪关外所设。除安西州、镇西府、迪化州各本属公文差务仍设驿外,其安西、哈密、镇西三属,特设军塘,以达出入嘉峪关军站文报。又设营

^① 《新疆图志》卷73《道路五》。

塘以达寻常文报”。

上述分设的军台、营塘、驿站、卡伦等不同交通设施,因新疆地形、气候、地理环境的特殊,都是沿着地形较平缓,有水、有草的道路通行。清代在新疆的各种交通设施,几乎都是以过去的古驿道或商路为基础,这种严格的继承性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

清代,从北京出发,来新疆地区的各种道路中,除了走外蒙古北路阿尔泰军台外,顺汉、唐丝绸之路所经过路线的嘉峪关驿路最为重要,是清军由内地到西域地区同准噶尔蒙古作战的必经之路。所以嘉峪关驿路被称为西路军站、军塘或军台,简称为西路,直辖于清朝军机处。这条嘉峪关驿路,首先从北京经过甘肃河西走廊,由嘉峪关出口入新疆哈密,再由此分两路。一路向西沿天山南麓一直到喀什噶尔,被称为天山南路台站;一路向西北越天山到伊犁,被称为天山北路台站。

清顺治三年(1646年)到顺治四年(1647年)间,嘉峪关以外原明朝七卫直至吐鲁番的蒙古、维吾尔各族封建主已纷纷向清朝表示愿同它建立封贡贸易关系。^①清圣祖玄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准噶尔贵族噶尔丹的分裂叛乱被清军打败后,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封建主额贝都拉即归附清朝。^②清世宗胤禛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对分裂势力准噶尔蒙古贵族战争的需要,把嘉峪关以外原有的卫所制度改为郡县制度,并在哈密正式驻扎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军队,由是逐步安设和完善了从嘉峪关到哈密的台站道路,被称为关外军站、军台或军塘,有时也称哈密南路。在这一区段中的捷报处急用飞递军台和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所经过的路线,基本上一致。走军台为:一千四百八十里,二十一台;走驿站则为:一千四百七十里,十九站。军台比驿站多十里和多二座。仅简列皇华驿普通快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六月壬午。同书卷三〇,顺治四年春正月壬戌。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二一。

马驿站的十九站名为：嘉峪关经惠回堡、赤金湖、赤金碛、玉门县、柳沟、布隆吉、小湾、安西、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星星峡、沙泉子、苦水、格子烟墩，长流水、黄芦冈到哈密。^①

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建立巴里坤城，同时驻守外蒙古的北路清军和驻守巴里坤的西路清军，分别向阿尔泰山和巴里坤以北地区进军。北路清军虽未得胜利，西路清军却扩大了战果，控制了巴里坤、吐鲁番和穆垒(即木垒)。乾隆二十年(1755年)趁准噶尔蒙古贵族内讧，决心平定叛乱。于是北路清军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向西经科布多阿尔泰山到博罗塔拉河，与由巴里坤经乌鲁木齐西来的清军会合后再直逼伊犁叛军巢穴，^②统一了新疆北部地区。由是清朝安设了从哈密一直到伊犁之间的天山北路台站。^③

由哈密向北越过天山科舍图达巴罕到伊犁的天山北路台站，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又分为乌鲁木齐北西两路。乌鲁木齐北路由哈密北越天山，然后沿天山北麓经巴里坤、古城，再东北向南绕路到乌鲁木齐。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叛乱，统一天山以北地区不久，又因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原来在乌鲁木齐北西两路安设的台站均被叛军破坏。从此以后从北京到伊犁的道路，无论是军台或驿站，均不经过北路，而走乌鲁木齐南路，即由哈密向西经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再接乌鲁木齐西路到伊犁。原来在乌鲁木齐北路所设台站改设为营塘。《新疆要略》卷一称：“乌鲁木齐经巴里坤至哈密，无军台，有营塘”。并被称为乌鲁木齐北路营塘道路。共设营塘二十四座，谨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20、521记载所列营塘及其里程为：由哈密底塘五十里至黑帐房塘，四十里至南山塘，四十里至羊圈沟塘，三十里至松树塘，八十里至奎苏塘，九十里至巴里坤底塘，

^① 无名氏著《驿站路程》，《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一帙。

^② 榕园《西域闻见录》卷五，乾隆四十五年岁次丁酉十二月十九日。魏源《圣武记》卷四。

^③ 《清高宗实录》卷492，乾隆二十年秋七月庚辰：“伊犁至哈密，巴里坤至乌里雅苏台俱设台站。”

九十里至苏吉塘,九十里至肋巴泉塘,七十里至务涂水塘,九十里至噶顺塘,八十里至色必塘,六十里至乌兰乌苏塘。九十里至阿克塔斯塘,九十里至木垒塘,九十里至奇台塘,九十里至古城塘,六十里至济木萨塘,九十里至三台塘,九十里至清水塘,九十里至大泉塘,五十里至阜康塘,七十里至黑沟塘,六十里至迪化底塘,合计一千六百八十里。^①

这条营塘路由哈密底塘出发以后,北路在苏吉塘同由巴里坤到吐鲁番的路分道;在古城同外蒙古科布多南路连接的汉三台会合,到乌鲁木齐后则同乌鲁木齐南路军台、驿站和由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营塘等三路会合,向西北仍然接续由乌鲁木齐到伊犁的乌鲁木齐西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将乌鲁木齐北路木垒以西八站称为富八站,将戈壁头以东八站称为乌鲁木齐北路穷八站。经过乌鲁木齐南北两路到乌鲁木齐各有便与不便处,走乌鲁木齐南路有著名的百里风区(十三间房大风区),走北路有天山陡坡和大雪,所以一般人常走由哈密经瞭敦到古城的小南路,既避北路天山深雪,又避南路十三间房之风。^②

由乌鲁木齐直达伊犁的台站简称为西路,俗称红庙大路。由乌鲁木齐向西北经奎屯、晶河、塔勒奇阿满到伊犁,它是由嘉峪关西行军台或驿路的最后一段。沿途设军台二十座,驿站二十一座,^③营塘十四座,^④还设有卡伦和民间旅店。可知从北京到伊犁的官方捷报处急用飞递军台,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以及由晶河至哈密营塘都经过西路。几种不同交通机构的驿程并不完全一样。由乌鲁木齐到晶河(即精河)的军台与营塘基本一致,同驿站则有所不同,《新疆要略》卷一称:“精河至乌鲁木齐,有军台、有营塘”。由晶

^① 无名氏著《驿站路程》与此所记路程稍有出入。

^② 参见林则徐《荷戈纪程》。

^③ 无名氏著《驿站路程》,《小方壺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一帙。

^④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一八、五二〇。松筠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三,祁韵士著《新疆要略》卷一,嘉庆丁卯夏五月。

河到伊犁军台与驿站基本一致,惟不设营塘。可知军台自嘉峪关直至伊犁沿途依次设立,并且设立最早,是军事后勤供应方面最主要的补给线。乌鲁木齐西路军台计自鄂伦拜星底台开始,一百里至罗克伦台,一百里至呼图拜台,六十里至图古里克台,九十里至玛纳斯台,八十里至乌兰乌苏台,一百一十里至安济哈雅台,九十里至奎屯台,八十里至库尔喀喇乌苏底台,七十里至布勒哈斯台,六十里至多木达都喀喇乌苏台,七十里至古尔图喀喇乌苏台,六十里至多木达都喀喇乌苏台,七十里至古尔图,喀喇乌苏台,六十里至托多克台,七十里噶顺腰台,八十里至精河台,九十里至托里台,一百一十里至托和木图台,一百二十里至呼苏图布拉克台,八十里至鄂尔追图博木台,八十里至博尔齐尔台,四十里至塔勒奇阿满台,六十里至沙喇布拉克底台,即到伊犁。^①计程一千七百里。所称腰站即小台或小站。在这条西路的军事供应线上到奎屯即同塔尔巴哈台军台分道,在塔勒奇阿满又同从塔尔巴哈台到伊犁的卡伦道路会合。

这一条从北京经过甘肃嘉峪关,进入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到伊犁的西路军台,其中捷报处急用飞递军台长九千二百九十里,军台二百一十一座。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长一万零二百四十九里,驿站一百五十九座。^②另外从天山北路古城同外蒙古科布多南路连接的汉三台经北道桥台、噶顺台至苏吉台,驿程为二百九十里,再加上阿尔泰军台。科布多南路以及由天山北路古城到伊犁,即从北京经张家口、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总里程为九千六百里,台站共一百二十六座。^③同时由伊犁经卡伦道路也可经外蒙古到达北京。

^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二〇、五二三、五一七;另外《新疆要略》卷一;《西陲总统事略》卷三;《新疆回部志》卷四;《驿站路程》中也均有记载,站名和里程稍有出入。

^② 无名氏著《驿站路程》。

^③ 据清文《站名》统计。

塔尔巴哈台地区是新疆天山以北的国防要地,为此从乌鲁木齐西路奎屯至塔尔巴哈台间,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建筑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同时安设了军台,计先后在塔尔巴哈台境内设立大小军台十座。《塔尔巴哈台事宜》卷四称,嘉庆七年(1802年)军台九处,其中“大台四处”、“小台五处”。到1803年时已增加到“大小军台十处”,其中“军台五处,腰台五处”,腰台即小台。另在库尔喀喇乌苏境内设三座台,合计十三台,未设营塘和驿站,它们的职能,全由军台办理。这些军台从塔尔巴哈台底台开始,七十里至色特尔莫多台(其间有干察罕莫多腰台),七十里至沙拉胡鲁苏台(其间有阿布达尔莫多腰台),九十里至雅玛图台(其间有托里布拉克腰台),七十里至乌尔图布拉克台(中间有昆都仑乌苏腰台),八十里至鄂伦布拉玛克台(中间有沙尔扎克腰台),七十里至沙喇乌苏台,九十里至库尔必喇台,九十里至奎屯台。^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霍伯克赛里与伊犁之间夏季通讯需要,由沙拉胡鲁苏台分道到霍伯克赛里安设了夏季小台三处。这样清代天山北路台站已基本完毕。

天山南路军台的安设晚于天山北路。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在天山北路叛乱时,天山北路大部分台站为准噶尔叛军所控制。这样,西路清军就再难于通过天山北路进入伊犁。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再次向伊犁进剿准噶尔叛军时,就由吐鲁番以北额林哈毕尔罕山和喀喇沙尔西北珠勒都斯山越过山脉,分两路向伊犁方向发动进攻,荡平了叛军。《西陲总统事略》卷一称:“(乾隆)二十二年春,大军分路进讨,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偕参赞大臣舒赫德由珠勒都斯进,伊犁将军兆惠偕参赞大臣富德由额林哈毕尔罕进”。这就为从天山南路东段哈密至喀喇沙尔的道路扫清了障碍,安设了通向喀什噶尔的军台和驿站,人们一般以吐

^① 无名氏著《驿程要站》。在《新疆要略》及《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只载总驿程,不载各站之间的具体驿程。

鲁番为中心,分成东西两个自然区段,不设营塘。在吐鲁番以东至哈密,各设军台和驿站十八站,即在每一个设站地点都设有军台和驿站两种机构。据清代无名氏著《驿站路程》所载哈密至吐鲁番的军台为:哈密底台开始,六十里至头堡台,六十里至三堡台,七十里至鸭子泉台,八十里至瞭墩台,八十里至橙槽井台,四十里至肋巴泉台,六十里至陶赖台,一百里至陶井子腰台,四十里至梧桐窝台,七十里至惠井子腰台,五十里至盐池台,一百八十里至齐克塔木台,五十里至苏鲁克图台,四十里至辟展台,六十里至连木齐木台,六十里至胜金台,九十里至吐鲁番底台,计长一千二百五十里。

吐鲁番以西的天山南路西段,通称吐鲁番至喀什噶尔军台,共设六十二座,不设驿站和营塘,即驿站和营塘的事统一由军台承担。这段军台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的分裂叛乱时安设。计由吐鲁番到喀喇沙尔八百七十里,设十台;由喀喇沙尔至库车九百五十里,设十台;由库车至阿克苏七百三十里,设八台;由阿克苏至乌什二百四十里,设三台;又由阿克苏至叶尔羌一千三百二十五里,设十六台;由叶尔羌至和田七百七十里,设八台;由叶尔羌至喀什噶尔五百五十里,设七台。这样由北京经嘉峪关、哈密、吐鲁番至喀什噶尔共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五里。^①同时由喀什噶尔向西越过葱岭可达中亚各国,由叶尔羌向南入西藏阿里达拉萨。

由上可知,在清代,随着全国的统一,内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国内交通比起以往历代王朝不仅在规模范围方面有所扩大和增强,而且在各种通讯、转运机构的设置及其使用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巩固了对新疆的统治。

原来天山北路军台、营塘隶于绿营,天山南路军台领于各城大臣。自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天山南北路所设军台、营塘

^① 天山南路各军台详见清代无名氏著《驿站路程》。

一律改为驿站,隶属于府、厅、州、县地方行政管辖,不再由军方统领。

(6)清代在新疆设立的卡伦及其功用

1. 清代西北地区设立卡伦的经过

清朝卡伦(或作喀伦、卡路、喀龙),源于满语,何秋涛说意为“更番侯望之所”。^①可知卡伦即用以巡守督察瞭望。徐松《新疆赋》中则说:“凡官兵巡守设汛之地曰卡伦”,引伸起来,也可以说是哨所。

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设立卡伦,迄今尚无定论。可以查知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已有卡伦的记载,如当时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派赴北京清政府的使者博瑞额叶图曾向清朝当局表示,他暂时不能回去,因为听说“喀尔喀色楞达什台吉率三百余人将邀截我等喀伦”。^②因而何秋涛认为卡伦始自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才开始设置的说法不妥。^③至于西北地区的卡伦则最早设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因那时已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反动头目的叛乱,为了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沙俄侵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清政府下令在斋桑泊以下额尔齐斯河西侧支流布昆河一带“可入俄罗斯之要路,俱安设卡伦”。^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又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阿桂在伊犁西路各交通要道选择安设卡伦的地点。^⑤9月自辉迈拉虎至都图岭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卡伦考》。

②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卡伦考》说:“北徼卡伦之设,始于雍正五年”。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十五。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七。

共设卡伦 21 座,派官员侍卫带兵分驻。^①以后卡伦陆续增设,遍及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计有以下一些卡伦。

科布多地区设有和尼迈拉虎、玛尼土噶图勒等二十六座卡伦。^②

塔尔巴哈台地区设有辉迈拉虎、巴克图、阿鲁沁兰等二十八座卡伦。^③

伊犁地区设有干珠罕、霍尔果斯、沁达兰等九十三座卡伦。^④

库尔喀喇乌苏地区设有车牌子等卡伦二座。^⑤

乌鲁木齐地区设有红山嘴、紫泥泉等二十五座卡伦。^⑥

古城地区设有下八户等四座卡伦。^⑦

巴里坤地区设有镜儿泉、七个子井等十一座卡伦。^⑧

哈密地区设有庙尔沟、三间房等十八座卡伦。^⑨

吐鲁番地区设伊拉里克等七座卡伦。^⑩

乌什地区设贡古鲁克等六座卡伦。

喀什噶尔地区设喀浪圭等十七座卡伦。

英吉沙尔地区设铁列克等十二座卡伦。

叶尔羌地区设赛里克等七座卡伦。

和阗地区设玛杂尔等十三座卡伦。

阿克苏地区设尼杂尔阿塔等二座卡伦。

库车地区设博勒齐尔等五座卡伦。

① 《清高宗实录》卷 645,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己丑。

②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③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④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⑤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⑥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⑦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⑧ 松筠《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

⑨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二一《哈密》。

⑩ 《嘉庆重修一统志表》卷五二二《吐鲁番》。

喀喇沙尔地区设察罕汉通格等二座卡伦。

卡伦因情况变化,时有增撤,各书所记不尽相同,但由上可知,卡伦不仅设在边境地区,并且还遍布于天山南北地区。

2. 清代西北地区设立卡伦的功用

清代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设置的卡伦,根据具体情况,其职能各不相同。概括起来说不外是管理游牧,侦察瞭望,监督贸易,稽查屯田、采矿,防止逃人和盗窃,传递文书,征收赋税,防止入侵等。

对于游牧管理方面,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为了阻止哈萨克人越入已被准噶尔蒙古占有的牧场,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的西部游牧区域设立了卡伦,所以《西陲总统事略》说:“卡伦之役,原为禁止哈萨克私行出入”。^①《习坎斋文稿》中又说:“新疆旧设卡伦,以稽查各部落之出入”^②。在《新疆识略》中更深刻地指出:“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③

游牧民族以其丰富的畜牧业产品和清朝进行贸易是十分重要的事,所以稽查贸易也是设立卡伦的一个重要事务,此类卡伦设在关津渡口。《西陲总统事略·南北两路卡伦总叙》称:“至伊犁城北塔尔奇一带及伊犁河渡口,设有卡伦七处,专为贸易哈萨克并稽查逃人而设,系惠宁城领队大臣专辖”。另外还稽查对于俄罗斯的贸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政府曾下令代理伊犁将军永保:“俄罗斯所产物件,禁止不准入卡;大黄等物,不许出境。”^④乾隆五十

① 《西陲总统事略》卷9《会议卡伦城案》。

② 叶锡麒、王澐《习坎斋文稿》卷五。

③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④ 《清高宗实录》卷1364,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八月丙午。

九年(1794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保等也曾奏请订立“回民出卡贸易章程”七条,经清政府批准执行。^①

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地区的卡伦,还代行征收赋税的职责。清政府每年檄派领队一员,领兵五百,巡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征收赋税,按其牲畜数目,“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②。“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③

本来传递文书由军台、营塘负责,但在特别情况下,有的卡伦,还负传递文书的职责。如在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之间的沁达兰卡伦与阿鲁沁达兰卡伦就曾传递文书,还因两卡伦之间“虎狼时常塞路,往往稽迟文报”,而改变卡伦地点。^④在塔尔巴哈台北路的冬季卡伦,与土尔扈特游牧接壤之处“添设察罕鄂博卡伦一处,冬季公文即由卡伦行走”^⑤。

所有卡伦,都还有稽查逃人之责。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叶尔羌、和田等地所设的卡伦,重点在稽查逃人^⑥。清代在新疆还实行屯田,有兵屯、户屯、回屯、旗屯、犯屯。其中犯屯系遣发内地犯人屯种;同时也利用犯人,或当地劳动人民开采矿藏。如在伊犁有铜厂、铝厂、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因之有的卡伦“其禁在于通逃”。^⑦又如“和阗东西河设卡伦十二处,向为稽查采玉”^⑧。

清代在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地区设置的卡伦还分常设、移设、添撤三种类型。据《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指出:“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移,或春秋夏三季递移者,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64,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一月乙酉。

②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第2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760,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乙卯。

④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⑤ 《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

⑥ 祁韵士著《西陲要略》卷一《南北两路卡伦总叙》。

⑦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⑧ 祁韵士著《西陲要略》卷一《南北两路卡伦总叙》。

是谓移设之卡伦”。卡伦所以有常设、移设、添撤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牧场作季节性转移,有冬场、夏场、春秋场之分。卡伦既然有稽查游牧的职责,自然也要随牧群转移,因而单有常设卡伦,尚难于察知游牧民动静。

常设卡伦是常年不移,官兵固定驻守一地,例如伊犁将军所在地的惠远镇需要常年派兵驻守警卫,因而在伊犁四周重要通道隘口,设立了博罗呼济尔、崆郭罗鄂伦、塔勒奇等二十七座常设卡伦。^①

移设卡伦,多数是为管理游牧,随游牧民族不同季节逐水草迁徙而设,所以住卡官兵也随牧场迁移而有时在甲地执行任务,有时移往乙地执行任务,但其递移地点,历年都是固定的。如在斋桑泊周围地区游牧的哈萨克族,就是夏季在斋桑泊的西、北、西南游牧;冬季又迁移到斋桑泊的东北、东、东南游牧。因而夏季卡伦的设置也是从塔尔巴哈台往北,依次有乌里雅苏台、哈玛尔达巴罕、板厂沟、博呼济尔、固尔班乌里雅苏图、哈达苏、特穆尔淖尔霍、哈喇布拉、干济罕莫多、喜泥乌苏、策克德克果勒、扎哈苏淖尔、辉迈拉虎等十三座卡伦。由最后一座辉迈拉虎卡伦往东再经库兰阿吉尔噶、那林两卡伦抵昌吉斯台冬季卡伦。而冬季卡伦则从塔尔巴哈台东北行,依次为锡伯图、博勒济尔、布尔噶苏台、乌兰布拉、俄栋果勒、乌里雅苏图、鄂伦布拉克、玛呢图噶图勒干,由此越黑额尔齐斯河,即与北岸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玛尼图噶图勒卡伦衔接,再经噶勒济尔巴什、塔木博勒济尔抵昌吉斯台卡伦。这一线卡伦均在斋桑泊之东、南两方。可知这完全是根据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而决定的。

添撤卡伦,是在固定的地点,接季节设撤的卡伦。这种卡伦,除在伊犁河、察林河沿岸担负季节性的侦察瞭望任务外,还警卫矿

^①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山、采玉、屯田等季节性的生产场所。例如伊犁西南达尔达木图，厄莫根多罗图屯田处，“回人耕作时派伯克二，兵四十，前往驻防，收获后离田五十里内，筑小土城，令其移驻，防兵裁撤。”^①

3. 卡伦的管理和巡边制度

清政府对西北广大地区设置的卡伦，有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各卡伦官兵的编制有明确规定。各地卡伦分别由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游牧领队大臣等专辖。重要地区如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卡伦侍卫，都由清政府直接任命，三年更代。伊犁地区虽在伊犁将军直接管辖之下，但也有部分卡伦侍卫由北京任命。^②

从上述设置的卡伦地点看，离清朝边界线近者有几百里，远者在千里以上，如在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所设的卡伦以外是我国的唐努乌梁海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乌梁海、扎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赛音诺颜汗部所属乌梁海，“游牧境之广狭，自数百里至千余里不等，游牧以外方接俄罗斯界”。^③同时在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各卡伦外，“有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迤西有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又西有阿尔泰乌梁海各游牧，游牧迤北方接俄罗斯界。”^④在伊犁将军府所辖各卡伦以外的情况，祁韵士的《西陲要略》中说：“新疆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毗连，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夏季设大小卡伦十三处……冬季设卡伦八处，此外俱哈萨克游牧。塔尔巴哈台西南一带卡伦八处……界连伊犁，卡伦以外亦哈萨克游牧。伊犁东北七百余里与塔尔巴哈台接界之处，由哈布塔海、沁达兰一带而南，设大小卡伦二十三处……察哈尔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以外俱哈萨克游牧。又西而南，尾之伊犁河北岸，设大

① 《清高宗实录》1464，乾隆五十九年一月戊戌。

②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卡伦考》。

③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卡伦考》。

④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卡伦考》。

小卡伦八处,索伦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以外俱哈萨克游牧。自伊犁河南而西,设大小卡伦十六处,锡伯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以外,隔河与哈萨克接壤……由锡后卡伦接连迤西转南而东,大小卡伦十七处……额鲁特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以外,西北系哈萨克游牧,西南系布鲁特游牧。”^①由此可见,当时伊犁将军府在草原地区设置的各卡伦主要是针对哈萨克和布鲁特,谋图阻隔他们随便移入其他牧区,以稳定牧区社会秩序。

这些记述充分表明当时在中国新疆西部及外蒙古北部草原中所设的许多卡伦不是国界线,都设在国境线以内。

既然常设、移设、添撤三种卡伦的任何一种卡伦线都不是边界线,那末何秋涛所说:“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外极边,分设喀伦,所以控制边内外游牧诸部也。然边内之土尔扈特、和硕特、厄鲁特等涵泳圣化,共安熙,即边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等岁纳租马供调遣,亦与内部藩地无异”。^②这里把卡伦内外说成“边内外”,显然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卡伦内外才符合于实际,因为卡伦并不是边界。

由于卡伦以外还有广阔土地属于清朝的疆域,清廷为了管辖这些地区,就规定各地参赞大臣或领队大臣,要对所属卡伦或卡伦以外的边境地区实行定期派兵巡查会哨的制度。卡伦官兵驻守一地执行任务,称为“座卡”,相邻两卡伦之间,要定期按规定路线巡查,并在道中之地立地(或插杆,或堆石)会哨。^③互换木质戳记信牌为凭,^④称之为“递筹”。“两卡伦互相递筹巡查之路,名曰开齐”。^⑤巡查时,除按开齐进行之外,还按卡伦外规定的路线巡查。各路巡查官兵在规定会哨地点会哨后交换表报,互换信牌。^⑥取出

① 祁韵士著《西陲要略》卷一。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北徼伦考》。
 ③ 《新疆回部志》卷《隘卡》。
 ④ 叶锡麒、王澄《习坎斋文稿》卷五。
 ⑤ 《西陲总统事略》卷9,《卡伦》。
 ⑥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9,第38页。

去年埋下的牌记带回缴销,另再埋下信牌,以便来年巡查官兵会哨时取出,作为凭证。

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叛乱后,于1759年乾隆帝即命车布登扎布为副将军,福祿、车布楚大扎布为参赞,率兵千名“越阿尔台西行,巡查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巴尔噶什诺尔(即巴尔喀尔湖——引者)等处”。^①而在1760年7月时有俄罗斯率兵入侵阿勒坦诺尔一带擅立标记,清廷即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阿桂及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于1761年前往巡查“来年令阿桂酌派副都统一员,带兵数百名,至额尔齐斯地方,京中派一、二大臣,会同车布登扎布,车木楚克扎布,拣派扎哈沁、杜尔伯特兵一千名,渡阿尔台,前往额尔齐斯地方,两路会哨巡查阿勒坦诺尔等处”。^②并选择安设卡伦地点。^③1763年清政府又命伊犁将军明瑞派员前往吹、塔拉斯、阿拉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④1765年伊犁将军明瑞又命爱隆阿统兵五百“越阿勒坦额默勒,巡查勒布什、招摩多一带”。^⑤1765年清政府将巡查边境定为制度。^⑥并规定伊犁地区每年八九月间由领队大臣一员领兵五百出发巡查。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令各领队大臣管属卡伦,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⑦在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隶属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地区原来规定每三年巡查一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政府根据集福的报告,决定改为每年稽查一次,并命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每年选派干练官员率兵百名进行巡查。^⑧

伊犁将军辖区的巡查路线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进行,然

① 《清高宗实录》卷581,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己巳。

② 《清高宗实录》卷617,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己巳。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七。

④ 《清高宗实录》卷690,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癸亥。

⑤ 《清高宗实录》卷727,第2页。

⑥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第19页背面。

⑦ 松筠《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⑧ 《清高宗实录》卷888,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七月辛亥。

后会哨。在伊犁地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批准伊犁办事副都统伊勒图的建议,巡查路线分南北两路:“南路自特穆尔图诺尔之南,由巴勒琿岭至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喇伯勒地方,亦能周遍。”^①实际这里所称的南北二路是指南路巡查路线中所分的南北二路,因为伊犁地区的北路巡查路线是由惠远城出发,向西经霍尔果斯、齐齐哈尔、奎屯等卡伦,出阿勒坦额默勒山,过哈喇塔拉至勒布什,与塔尔巴哈台所属巡查官兵会哨。伊犁的南路巡查路线则又分南北两路,即南路是从特穆尔图淖尔的南北两岸,一路由伊犁出行,沿伊犁河向西,经古尔班阿里玛图(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到沙喇伯勒等地巡查;一路由伊犁南行,过伊犁河,沿伊犁西南卡伦路,经春济、格根、鄂尔果珠勒等卡伦,越善塔斯岭、巴尔琿岭,向西北行,至沙喇伯勒、吹、塔拉斯,再向东南到纳林河,与喀什噶尔巡边部队会哨。

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巡查路线则从塔城出发,也分两路。一路北出哈巴尔阿苏山口,向西北沿塔尔巴哈台西路的夏季卡伦至辉迈拉虎,与进抵对岸的和尼迈拉虎卡伦的科布多所属巡查官兵会哨;一路则向西至勒布什与伊犁北路巡查官兵会哨。此外,还绕阿拉湖一周,巡查哈萨克游牧地区。

清朝还在远离卡伦千数百里的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塔拉斯有清乾隆朝立的石碣。这些石碣、鄂博和巡查会哨制度的执行;充分证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清政府有效管辖地区。任何一种卡伦都不是边界的标志,卡伦线也决不是边界线。乾隆帝也向哈萨克穆色布等谕称:“尔哈萨克等,俱大皇帝之奴仆,在内在外(指卡伦内外——引者),原无分别。”^②

至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辖区内的巡边方法与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稍有不同。因喀什噶尔辖境内的军队均系换防官兵,例由乌

^① 《清高宗实录》卷 696,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十月乙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075,乾隆四十四年正月辛丑。

鲁木齐所属古城(今奇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满洲驻防兵中调派。于嘉庆三年(1798年)起另从驻守伊犁的满洲、索伦、锡伯三营中添派赴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按年轮流更换;并由伊犁专派大员带兵护送应接防官兵,按年轮流更换;并由伊犁专派大员带兵护送应接防官兵至伊塞克湖以南的纳林桥。南疆方面则由英吉沙尔领队大臣管带喀什噶尔应换防官兵前往纳林桥接护。伊犁将军府根据清廷旨意,灵活采取赴特穆尔图诺尔(即伊塞克湖)巡边部队与护送喀什噶尔换防官兵同行至纳林桥交接。此后喀什噶尔巡边均与护送换防至纳林桥为止,合为一事,并成为定制。这样不仅放松了,实际已放弃了对吹、塔拉斯等地的巡查。^①由是卡伦外布鲁特等族遂私入卡伦内占山放牧,据川垦田,从而天山南路边境遍布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牧民。

自清朝道光以后,朝政日益腐败,国力日益积弱,沙俄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浩罕统治者也乘机向新疆及哈萨克斯坦扩张,清朝的巡边多次受到侵略者的阻挠。道光十三年(1833年)继任伊犁将军的特依顺保在考察新疆天山南路卡伦情况后奏称:“各卡相去各有二百余里及八九十里之遥,地广山深,处处扼险。仅靠坐卡官兵守望,诚不足以昭周密。然此止就山南(指天山以南——引者)一路而言,其余东、西、北三面,奴才虽未能遍历,而大概情形不外乎此间。”^②由是特依顺保抵达伊犁上任后,即把塔尔巴哈台的巡哨制度搬至伊犁各卡伦试行,规定伊犁周围70余座卡伦,由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各派官一员,带本营兵丁30名,巡查所属管辖卡伦。并据此拟定《沿边巡查会哨章程》奏呈。清廷以事关边防体制大事,饬由伊犁将军及所属各级大臣详细研究后再酌定。经过各级会商后重新拟定《巡卡会哨章程》奏呈,

^①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伊犁将军玉麟等奏查勘吹、塔拉斯地有无浩罕筑城聚众等情折》。

^②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呈会议巡哨章程折》。

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一月被批准,指示说:“现即酌定巡卡会哨章程,立法俱属妥善。其选派兵丁坐守瞭墩,逐日轮流防范贼匪,事匪(非)朝夕。如果行之有效,永无流弊,方可历久遵行。”^①由是巡卡会哨制度代替原有的巡边制度,通行于新疆沿边各地。这个《巡卡会哨章程》的突出点是:(1)各营每月派官兵于本营交界处会哨。(2)如该官兵巡见哈萨克等私越开齐,即当追逐惩创,惟不能追出卡外。(3)瞭望贼情尤为治边至要,应将各卡瞭望随时整顿。照依向例,令该管卡员派令健壮兵丁轮流坐守,不许刻离。见有贼踪,立即禀报,如各卡官兵稍有疏懈,定当严惩决不姑宽。

可见巡卡会哨制度的建立,实际是抽去了巡边制度的实质,只准守边官兵死守住常驻卡伦线,在任何情况下再不准越出卡伦外去巡查,这是巡边制度的废弛,国力日衰的写照。原来边界内和卡伦外的大片土地是用以安置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人民,卡伦内则以城镇为中心,分布清朝驻军,兵民屯田、牧场、马厂及各族农田。现在巡哨人员只沿着卡伦开齐行走,形成了一条人为的常驻卡伦巡查线,为沙俄侵略者利用常驻卡伦割占清朝西北边疆领土提供了借口。

^①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呈会议巡哨章程折》。

沙俄在阿尔泰地区勘界立牌中的诡谋

(1)中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签订经过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条的规定,自换约之日起240天后,中俄双方代表在指定地点会齐,分成西南和东北两组,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由于从1864年起新疆地区发生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一时喀什噶尔、伊犁、塔城都为起义者占领,致使勘界立牌工作无法进行,只好暂时拖延。

这样纷乱的时机,沙俄认为是侵占我国新疆领土的大好时机,尽管根据《勘分西北界约记》已侵吞了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但仍不满足,一面积极派兵镇压新侵吞领土上各族人民的反抗;一面公然违背条约第4条规定中国卡伦在未勘界前“仍听中国在彼驻守”的规定,不断派兵侵扰我国卡伦,并“要挟挪避。”^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威胁,1868年4月,沙俄驻华公使倭良嘎哩竟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照会说:“俄国封疆大吏,志在安边,不便仍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47页。

准中国驻守旧卡”，提出“所有布克图拉苏穆河（即布克图尔玛河——引者）一带，从昌吉思台至乌科克等卡，照约归俄各卡，按现在机宜，均应退撤。”^①清朝政府根据条约规定“卡伦应在该处设立界标后一个月内，移至中国内地”的规定，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挟。沙俄竟悍然于当年9月派兵至布克图尔玛河一带，绑架中国守卡官兵，遁令乌克克（即乌科克）、沁达克图、乌尔鲁、昌吉斯台、哈喇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干、和尼迈拉虎等八处卡伦全部后撤。当中国守卡官兵坚决抵制时，俄兵依仗优势兵力，鞭打中国守卡官兵，捣毁卡伦帐篷，抢劫中国军器衣物，强把中国八卡官兵驱逐到乌克克卡伦以东^②。一些原属中国的哈萨克族不堪沙俄的野蛮压迫，在首领察干玛克里带领下，忍痛离开原牧地，迁移到霍湍和尔滚、科布多河、博罗布尔根等处游牧。

面对沙俄日益猖獗的侵略活动，清政府认为“俄人滋生事端”的重要原因是“西疆界址未清”。因而向沙俄提出先在清朝尚能控制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布伦托海地区勘界立牌。得到俄方同意并经双方商定，两国代表于1869年5月22日（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科布多边界乌克克地方会商甚界。而沙俄外交部却指令北京公使声称：“中国委员和我国委员一起在国界上进行工作时，均将处于俄国部队的掩护之下，该部队负有义务保卫代表的人身安全。”^③这样完全在沙俄部队的威胁下进行勘界，确实是表演了一幕典型的以强凌弱的木偶戏，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派出的勘界首席代表是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和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文硕。俄国代表仍以巴布科夫为首，由穆罗姆佐夫（亦译穆噜木策博）大尉协助。另有巴甫林诺夫领事担任翻译。巴布科夫为了要侵占我国更多土地，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1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1卷，第20~21页。

^③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8页。

在一开始就调集步兵一连,和哥萨克一个连组成特别部队进驻乌科克周围地区,按照1727年拉布泽斯基在布连河上设置营垒的办法,宣布乌科克作为设置界牌的起点。勘界会议在巴布科夫的操纵下,决定分南北两个组,北路由奎昌会同沙俄穆罗姆佐夫沿东北方向直上,树立科布多北段地区界牌,接着再树立乌里雅苏台地区界牌,直至沙宾达巴哈为止。南路由巴布科夫代表俄国,等待北路清朝代表奎昌到来后,再继续勘定科布多南段地区直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一带的界线。由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向南转西沿塔尔巴哈台岭到哈巴尔阿苏一带的界牌,则由巴布科夫会同清政府代表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文硕勘定立牌。

在赛留格木岭树立第一块界牌时,巴布科夫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叙明国界可以不必直接引叙《塔城条约》的相应条款。”^①因而此段边界他不愿按条约“顺赛留格木岭”而行的规定,及原图所画红线进行,借口原约第六条中有“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各界址处所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择其地方形势建立”的文字,指称“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实际是藉此更深入中国境内去寻找水源,清朝代表当即指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巴布科夫盛气凌人地说:“红线条约可不必遵,止以水源为此。”^②经过反复辩论,沙俄代表理屈词穷,才依照红线于赛留格木岭的柏郭苏克山上树立了第一块界牌。

北路建完第二座牌博,到达乌里雅苏台所属珠鲁淖尔(又称朱浦鲁库里湖)时,按照原约红线,边界应当“顺唐努山南向西到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转往北行,顺萨彦山向东至沙宾达巴哈。”而沙俄代表穆罗姆佐夫却认为:“若由红线,其路万难飞越,止就珠鲁淖尔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8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14页。

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①实际是想藉此多侵吞我国唐努乌梁海的游牧地域,清朝代表虽一再辩驳,但清政府在沙俄的压力下,却指示划界的荣全:“当按照条约与之辩论,固不可过于决裂,致生事端。”^②荣全也就顺水推舟说,这一片领土“虽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幸系旷野荒山,此等隙地尽可稍让,与游牧并无妨碍。”^③这是十足卖国者的语言,在这些昏君奴才的支持下,沙俄的阴谋才得逞,于是唐努乌梁海的十佐领牧地又在塔城条约之外无端割给了沙俄。

北方组勘界委员奎昌等出发后不久,由于乌科克地区气候寒冷,在五月下旬还常常下雪,中国首席代表荣全不能忍受较艰苦生活,而在勘界未定就匆匆离开了乌科克,巴布科夫说:“娇生惯养的中国大员们留居在乌科克是更加不习惯的,他们比我们更急于离开乌科克。”^④荣全离去后,巴布科夫不等委员奎昌的到来,就私自从布赫塔马河盆地到昌吉思台各山口选定了有利于沙俄的地点设置了界牌,并大言不惭地说:“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在这些山口设置界牌,没有科布多官员的中国官员参加……我预料奎昌大员设置乌兰·达巴界牌(即柏鄂苏克山界牌——引者)时曾经对我表示充分信任,这次对我在大阿尔泰各山口预先选定设置界牌地点的正确性,也不会发生反对意见,后来也得到了证实。”^⑤这明明是破坏协定,偷立界牌。哪有两国共同勘界,一方的代表还未来到之前私立界牌的,这是世界勘界史上少有的奇闻。

中国委员奎昌到达昌吉思台后,不仅承认了巴布科夫私立的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15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18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5页。

④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

书馆1973年版,第410页。

⑤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

书馆1973年版,第413页。

界牌,还进一步地向巴布科夫说,从昌吉斯台到黑额尔齐斯河玛尼图噶图勒干的一段勘界工作,他因“年迈体衰”,再不能一同前往,只能另派科布多官署官员前往,归巴布科夫“指挥”。清朝官员的这些表现,怎样不使巴布科夫满心喜悦而骄傲地说:“两个中国委员荣全和奎昌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我,把全部边界事宜交付我的手中,同时还委派了中国官员归我指挥。”“我成为全部边界事宜的一个全权支配者。在我管辖之下,既有俄国官员,也有中国官员,实质上我不只是俄国的委员,而且是代行中国委员职务的委员。这一切都能指望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的时候,确切遵循我的指示,毫无反对意见,这后来也就得到了证实。”^①这不仅反映了清朝官员的腐败昏庸,同时也可清楚知道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勘定的边界,必然是在本来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外,被侵占了更多的领土。

根据南北两路勘界建牌的结果,中俄双方代表于1869年8月13日(同治八年七月六日)签订了《科布多界约》,规定了自布果素克山口(即柏郭苏克山)起至玛尼图噶图勒干止的一段中俄边界的界址处所、牌博名目。又于同年9月4日(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签订《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规定了自布果素克山口起至沙宾达巴哈止的一段中俄边界的界址起止处所、牌博名目。

(2)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签订经过

由于上述两个不平等界约的签订,沙俄不仅侵占了原准噶尔蒙古的大片领土同时还侵占了赛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湖以西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牧地、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全部,阿勒坦乌梁海七旗所属大片哈萨克、布鲁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15页。

特的牧地,所以巴布科夫十分得意地说:“从在大阿尔泰山口设置界牌的时候起,中国人所重视的布赫塔马河富饶的和美丽如画的盆地,应当最终牢固地归俄国所有了。”“布赫塔马盆地不可争辩地是俄国根据《北京条约》所得到的重要收获之一”。从而“使俄国在帝国这个边区的政治和商业势力最后巩固起来。”^①

布赫塔马盆地不仅由于其富饶而闻名于中亚细亚,还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早为侵略者所梦寐以求。被沙俄侵占以后就截断了我国西北部地区通往北京的最便捷道路,所以巴布科夫特别指出说:“这个盆地(指布赫塔马盆地——引者)对中国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东干人叛乱时期,在中国西部与北京之间经行乌鲁木齐和库尔·卡拉乌苏最捷便的交通已经截断的时候,这条道路就成为通过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前往中国首都的唯一的便利道路。”^②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庆额于1882年上书清廷称,由于科布多界约的签订“已将科(布多)地分让至十分之六,其分让之处本属沃壤。”至使当地少数民族“无所栖止,均拥挤于蒙古,乌梁海之哈巴河等处就牧。”^③

至于划定玛尼图噶图勒干向南至哈巴尔阿苏一段的中俄国界原属我国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所管,虽因刚撤销办事大臣机构,致文硕未能前往,又改派了奎昌充任。当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界约签订后,沙俄于1869年11月就一再催促清朝政府,会同建立塔尔巴哈台一带界牌,声称:“未有中国大臣会同建立,拟令本国分界大臣自行建立。”^④实际沙俄早已决定单独勘界,巴布科夫也自供说: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13页。

②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1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9卷,第2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1卷。

“设置最后一段国界上的界牌打算没有中国人参加。”^① 清朝政府得讯后，一方面即行照会俄国驻华公使，严正指出俄国企图以“独勘之界”，作为两国“共勘之界”强加于中国，完全“与会办原议不符”，必须等候中国代表前往会办”，一方面即行催令奎昌赶赴边界，“约齐俄国使臣，将玛尼图噶图勒干至哈巴尔阿苏一带，逐一查勘，会立牌博。”

实际当沙俄于 11 月间发表声明拟“自行”勘界时，早已于 1869 年 9 月间开始背着中国单独勘定了从玛尼图噶图勒干至哈巴尔阿苏的一段边界。在巴布科夫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于是年 9 月间已由穆罗姆佐夫大尉树立了黑额尔齐斯河迤南到穆斯套(冰山)间的一段界牌，由巴布科夫树立了从穆斯套山至塔尔巴哈台山中的哈巴尔阿苏山口的界牌。这确实是开创了外交史上少有的丑闻，也可看到沙俄的蛮横霸道达到了何等的惊人程度。就是在这种肆无忌惮的横暴做法下，竟把察罕鄂博牌博的设置超越原定走向，往东深入中国境内一百多公里，完全截断了塔尔巴哈台与阿尔泰间的交通要道。

一切都按照沙俄的侵略意图单独勘定界址，树立界牌后，才于 1870 年 2 月给清政府发来照会，公然声称：“接西悉毕尔(即西西伯利亚——引者)总督来文，设立边界鄂博，至哈巴尔阿苏(即哈巴尔阿苏——引者)，去年俄国分界大臣，业已妥善完竣。”^② 清朝勘界大员奎昌在多次催令下，于同年 6 月 27 日按照俄方规定日期到了玛尼图噶图勒干至哈巴阿苏一带，察看了俄国已经建立的牌博情况，这个老朽昏庸，对勘界有“畏难情绪”^③ 的寡廉鲜耻之徒，在沙俄的既成事实面前完全屈从，敷衍塞责地互换了界务，并于 1870 年 8 月 12 日(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同沙俄代表穆罗姆佐夫签订了《塔尔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 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413 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 71 卷。

^③ 参见《清穆宗实录》卷 237、268、270、271。

巴哈台条约》，规定了自玛尼图噶图勒干起至哈巴尔阿苏止的中俄边界的界址起止处所及牌博名目。

巴布科夫违背既定条约，任意侵吞中国土地的蛮横作法赢得了沙俄侵略者的喝彩，当时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斯特列莫乌霍夫特别写信给巴布科夫，赞扬他在勘界中为沙俄帝国赢得的巨大利益：“你能够同中国人达成协议，同时在我国利益需要之上，又不放过机会为我国取得有利的天然地点。例如，斋桑迤北的优良水泉，尤其是黑额尔齐斯河上作码头的地点。后一种情况最终地巩固了我国在斋桑流域的商业上和工业上的统治地位。”^①

巴布科夫所以敢在中国土地上如此肆无忌惮地假借勘界名义，任意侵吞土地，所凭藉的主要是武力，同时也由于中国清朝的腐败及勘界大员的昏庸无能。巴布科夫在同清朝首席勘界大员荣全会面后说：“我看到中国大员对我的这种友谊心情，便决定利用这种良好情况，来使当前划定国界的事宜尽可能地迅速进行。”^②后来事情的进行也完全如巴布科夫所预料的那样，荣全、奎昌之流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听从沙俄代表的摆布，才使俄方于原订不平等条约之外又在勘界中侵吞了那样多的土地。

(3)《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侵占了我们阿尔泰地区的大片领土

当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三个界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就派出武装部队入侵新勘界线以东属于中国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①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26页。

^②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8页。

了。在 1870 年秋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木扎尔特山口时,还同时派出斜米巴拉丁斯基的军事指挥官帕尔塔拉斯基“率兵百余名并炮车等物,无端突至我土尔扈特北部游牧察罕鄂博东喇嘛庙中,将扎萨克头等台吉图普新柯什克捆绑行半程,……掠去铜佛像大小像二十五尊,并银两、马匹、衣物等件,又将小喇嘛益足克一名俘去。”^① 1871 年为了配合侵占我国伊犁的沙俄殖民军东侵乌鲁木齐,又派出索斯诺夫斯基率领二百多名侵略军,配带各种武器,从斋桑地区侵入我国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布伦托海等地,结营驻扎,进行侦察,沿途绘画地图,钉立标杆。”^② 并非法闯入蒙古喇嘛寺庙,进行破坏和掠夺,抢走大小佛像七十二尊。经众喇嘛及蒙、哈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才被迫“率众西归”。

清朝为了加强阿尔泰地区的防务,曾于 1867 年 11 月设立了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并委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兼任,还把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所部的僧俗人民安置在“东以罕达噶图河为界,西以哈巴河为界,南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北以阿尔泰山大岭为界,周围约七百余里”^③ 的地区,又从 1870 年夏起在额尔齐斯河北支流奇兰河岸修建了承化寺,从而逐步形成了以棍噶扎勒参为首,凭藉承化寺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宗教中心,成为沙俄侵略阿尔泰不可逾越的屏障。

1876 年,沙俄波塔宁于 8 月 1 日带着他的妻子及纳法依洛夫、别勒佐夫、科洛米错夫等入,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沿着额尔齐斯河窜入中国境内,到处窥探活动。8 月 30 日借口要在寺院雇向导,闯到承化寺被喇嘛回绝。次日中午,波塔宁一伙,骑马闯入寺院,企图冲入大殿,激起众喇嘛的愤怒,严令退出寺院,这伙侵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 卷,第 32 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 86 卷,第 24 页。

③ 《新疆奏稿》手抄本。

者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取身边小銃(短枪)向小喇嘛开放。”^①众喇嘛群情激愤,蜂拥而上,用土块、瓜皮等物掷向侵略者,并把最嚣张的侵略分子波兹德涅耶夫从马上拉下,解除了其武装,又追上波塔宁等人,把他们关进一间禅房,严密监禁起来。

棍噶扎勒参劳动回来,得知事件的发生经过后,即行报告清朝布伦托海办事官员。并于9月1日审问了这伙侵略者,棍噶扎勒参即行严正指出:“携带武器,闯入和平的寺院,骑马在寺内乱冲,违犯佛寺的戒规,还图谋制造武装冲突。”^②而波塔宁等又无在阿尔泰游历执照,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侵略行为,使得沙俄侵略者理屈词穷,只好“哀乞认错”,经“再三恳求”,清朝官员“遂将枪械留下,帽子发还,不许逗留。”^③驱逐出承化寺境。

波塔宁等被赶出我国后,即行编造谎言,诬蔑棍噶扎勒参等的爱国行动,子是沙俄塞米巴拉丁斯克当局一面行文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胁迫查办,一面又派乌拉索夫带兵入侵承化寺,棍噶扎勒参闻讯,立即派人前往阻止,严令“只准身带数人来寺,余皆令在六七十里外地方等候。”^④晚上棍噶扎勒参在禅房引见乌拉索夫时,侵略者竟佩带武器,盛气凌人,递交沙俄的信函后,竟胁迫必须立刻用书信答复,或口头详细答复,扬言如不回答,就要用“认真之法”对待。棍噶扎勒参斥责说:“汝等带兵来讨回信,吾今永远不能给。”并将沙俄来函“在手中揉搓,复加唾沫,手撕足践。”声明中国人民不怕俄国,“如欲与我打仗,即请俄国人来罢,吾将动所有阿尔泰人民对敌到底!”^⑤。

乌拉索夫的阴谋失败后,就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诬说棍噶扎勒参在禅房拘留了他,西西伯利亚总督衙门立即行文沙俄驻华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卷,第31~32页。

② 奥布卢切夫《波塔宁旅行记》,第67页。

③ 《新疆奏稿》手抄本。

④ 《新疆奏稿》手抄本。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卷第22页《乌拉索夫日记》第20页。

公使。公使布策即带着翻译官柏百福于 1877 年 11 月间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照会和“乌拉索夫日记”，威胁清朝官员说：“此事本国看得极重。中国如不认真办理，本国当自行设法处治。”^①

腐败的清政府在沙俄的压力下，明知《乌拉索夫日记》不实，却借口为了“慎重邦交之道，而把与事件有关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调离职务，对一些官员分别给以革职或罚俸等处分，对棍噶扎勒参则以“性情粗鲁，不能约束所管喇嘛”为由，也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②

沙俄对清朝政府这种颠倒黑白的处理，仍十分不满，驻华公使布策又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威胁说：“如此办理，未免有伤两国和约，若不得察罕格根（即棍噶扎勒参）重办，边界连年各案均难办结。”清廷在沙俄压力下不得不另拟处分办法，可是仍不满足，继续威胁说：“察罕格根若不离其地，该国即派员带兵前往自行处治。”^③ 可见关键在于不仅要胁迫清廷重办棍噶扎勒参，而且必须胁迫棍噶扎勒参离开阿尔泰。因为他“坐镇空山……十年”，迫使“俄人不改轻窥”^④，对捍卫中国神圣领土，屡奏奇功，“俄人惮之。”^⑤

1879 年 1 月下旬清朝外交代表崇厚在俄国里瓦几亚与沙俄谈判收回伊犁问题时，沙俄就提出要在塔尔巴哈台另定新界，美其词曰：“将人地分清，永息边患。”^⑥ 于是强加给崇厚的所谓《里瓦几亚条约》中，公然更改《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有关这条边界的规定和勘界议定书，提出“自奎崙（屯）山、顺喀巴（哈巴）、布尔崇（布尔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2 卷，第 22 页《乌拉索夫日记》第 20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 卷，第 34 页。

③ 《新疆奏稿》手抄本。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3 卷，第 21 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4 卷，第 9~10 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5 卷，第 32 页。

津)二河中间山岭分界之处,过黑额尔特什河(哈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内堪迭尔雷克河源。”^①作为中俄交界,妄图把我国哈萨克、蒙古,包括棍噶扎勒参所部游牧的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大片土地割去。

由于沙俄的侵略野心太猖狂,所以当《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一传出,就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反对。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伦针对沙俄这段边界的划界方案批驳说:“果如所指,则阿尔泰之地利尽失,塔城隔绝在西,亦成孤注。”^②在全国人民反对下,清朝没有敢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另于1880年2月(光绪六年正月)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任驻俄公使,赴俄交涉,改订条约。

沙俄眼看即将到手的肥肉有失去的可能,立刻进行武力威胁,单在额尔齐斯河地区就派出了七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塔城西边的马克图增派了两个连,准备以巴克图部分和斋桑部队侵占塔城和阿尔泰,然后南下占领木垒、奇台,直趋哈密,切断清军的后路;另一方面派出海军舰队游弋于天津海面,直接威胁北京地区。曾经泽到俄后,开始谈判时,虽仍坚持塔尔巴哈台地区界线按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规定勘界,但由于清政府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一味妥协退让,曾纪泽也被迫对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界作了让步,答应“派员前往勘定”^③。沙俄对曾纪泽始终采取“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④的办法,胁迫曾纪泽于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第八条的规定,斋桑湖迤东之界又被改为“自奎崕山过黑额尔特什河(哈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划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

① 王铁崖等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82~38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9卷,第18页。

③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03页。

④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时期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编辑《俄国在东方》第116页。

山界之间,酌定新界。”^①这样改定界线又使沙俄侵吞了阿尔泰的大片腴壤。

这条新界要由中俄两国“会商酌定”,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在强权即真理的帝国主义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会商”。

当《中俄伊犁条约》还未经正式批准换文,双方尚未议及勘界问题时,沙俄就于1882年5月和6月间先后派出步骑七八百人侵占哈巴河地方,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迫清朝政府承认^②。

沙俄的侵略活动,激起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棍噶扎勒参属下的泥尔巴喇嘛丕拉斋仍打着棍噶扎勒参的旗号,会同哈萨克族克烈部头目卓尔托拜带领额鲁特等部官兵前往质问。各族人民坚决表示“绝不肯将膏腴之地让与他国。”^③明确提出“若将哈巴河再行允许分让,不惟哈民无处容身,即蒙民必无活命之日。〔倘令〕众民随地划归俄籍,虽死不从。”牧场上“男妇老幼,终日号泣,哀痛之声,达乎遍野。”^④清朝派驻当地的行政官员也对沙俄一再侵割中国的罪恶行径甚为愤慨,指出如果再以“哈巴河而轻许之,将来逐渐开端,俄人贪得无厌,恐犹不止此,将来西北半壁几无宁日矣!”^⑤中国边疆各族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正义斗争,大大打击了殖民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清朝谈判代表的勇气和决心。

清朝派出的勘界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于1883年7月初与沙俄勘界代表巴布科夫和别夫佐夫在哈巴河进行谈判。由于沙俄早谋侵占哈巴河,所以谈判一开始,巴布科夫“开口即欲照图中直线以哈巴河划界”。^⑥清朝代表严词驳斥,相持十余日不决。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巴图莽指出:“以前次

①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147,第11页;卷148,第8~9页。

②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147,第11页;卷148,第8~9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4页,第1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9页,第1~2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7页,第42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4页,第25~27页。

界划乌梁海西北境侵占已多,此次若再占哈巴河,蒙民无地自容,誓死不能退让。”^①经清朝代表根据条约规定,提出在“旧界”与“直线”之间“酌中定界”的方案后,沙俄虽无言可辩,却又提出以东距哈巴河八十余里的一条小河毕里则克河为界,企图多占哈巴河上源之地。最后终于在清朝代表的坚决反对和各族人民的众愤难平下,同意以哈巴河以西一百多里的阿拉克别克河为界。

在谈判中,沙俄勘界代表还想套用“人随地归”的办法,妄图裹胁侵占土地上的三万多中国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清朝代表据理反对,蒙、哈各族人民也“虽死不从”、“群情汹汹”,沙俄只好同意界线以西的哈萨克人,自换约之日起,于一年内愿属中、属俄均听其便,这样,沙俄妄图劫走中国居民的阴谋也没有能得逞。

1883年8月在沙俄的胁迫下,又签订了《中俄科塔界约》,同年九月,根据《中俄科塔界约》进行实地勘界,设立牌博,分别订立了《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和《中俄塔尔巴哈北段牌博记》。这样斋桑湖东北喀拉哈巴河、巴尔哈斯泊和阿拉克别克河以西喀喇额尔齐斯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又被割去了一大块,塔尔巴哈台内的赛里鄂拉以西各卡伦也全被侵占。北境整个地区“除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哈巴河外,已无险要可守,无地利可取”。^②新疆北部边境的屏障几已丧失殆尽。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529,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6卷,第22页。

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的签订及其勘界问题

(1) 沙俄对浩罕的侵略

自19世纪中叶沙俄用武力基本征服哈萨克草原后,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可夫即于1864年11月21日根据沙皇的意图向欧洲各国递交了一份“侵略有理”的通牒。提请各国注意中亚形势发展的必然性:“俄国在中亚的地位,如同一切与半开化的,没有定型的社会组织的游荡民族接壤的文明国家的处境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边境的安全和商业往来的利益,永远要求更文明的国家对那些以狂暴、野蛮扰人的邻居拥有一定的统治权。”^①这清楚地告诉人们,只要俄国殖民利益需要,就指说别人“野蛮”而去征服,现在明确指出中亚民族“野蛮”,因此下一步俄国必须征服他们了。可见这不是外交通牒,而是杀气腾腾的征服中亚的一纸宣言。

沙俄就在这个借口下派出侵略大军扑向中亚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并于1867年7月1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在已经侵占的中亚名城塔什干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任命陆军部办公

^①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俄国的外交和战争论文集》莫斯科1923年版,第323页。

厅主任冯·考夫曼为第一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并授予这个被称为“半沙皇”的殖民主义老手极为广泛的、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军政、外交大权。

浩罕汗国是古代大宛国沿袭下来的土地,它包括费尔干纳和塔什干一带,当沙俄侵略军于1853年攻下浩罕的阿克麦切特要塞,和1865年攻占重城塔什干后,浩罕实际已控制在沙俄殖民者手中。因而考夫曼任总督后即于1868年1月迫使浩罕汗签订了一项名为“商务协定”,实际是一项出卖浩罕主权的卖国条约,使浩罕成为俄国的附庸,妄图利用浩罕汗这个傀儡压迫浩罕人民,以缓和人民的抗俄怒火。诚如马克思在引证俄国内阁于1837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时所写的:“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①苏联史学家科诺林格也指出浩罕汗的傀儡丑态:“浩罕汗王对俄国的态度十分规矩,甚至可以说是十分顺从的……1873年,胡多雅尔汗有一次不得不从自己的汗国逃往塔什干。这样,汗王便立即把自己的个人权力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②

但是,爱国的各族人民是决不会容许浩罕汗卖国求荣的,因此1874年和1875年浩罕人民连续发生了反对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胡多雅尔汗的起义。1874年就由一个封建主的雇工伊斯哈克团结一些受苦最深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后,迅速占领了奥什和安集延等地。胡多雅尔汗慑于人民起义的威力,无力平息起义,只好请求沙俄殖民当局派兵镇压。被起义吓破了胆的胡多雅尔汗于7月26日给考夫曼写了一封可耻的信说:“我亲爱的客人威因别格先生和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6页。

^② 科诺林格《“白马将军”斯科别列夫》,1939年巴黎版,第一卷第二章《米·德·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土耳其斯坦》,由赵瑾、王文译,刊1981年第3期《西北史地》。

斯柯别列夫上校……你们同我一起离开了浩罕，尽管暴乱分子屡次追踪和进行了一次对射，你们都没有离开我，只有俄国人才采取这样的行动。当时我左右的侍卫背叛了，逃跑了，俄国人坚定地跟着，若不是他们，我很可能到达不了俄国边界。命运给我派来了这些侍卫官——我将永世铭记俄国人给我的帮助。”^①于是考夫曼就派出著名刽子手斯柯别列夫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于1875年9月23日考夫曼迫使浩罕封建贵族代表胡多雅尔汗长子纳赛尔·埃丁汗缔订了一个屈辱的投降卖国条约，规定把锡尔河上游右岸及纳曼干地区割给沙俄，赔款三百万卢布，外交和军事都得听命于沙俄，到此浩罕已名存而实亡。

封建上层的无耻投降，只会更激起爱国人民的反对，所以签订投降条约的墨迹未干，愤怒的人民又在伊斯哈克领导下掀起了抗俄的新浪潮，以安集延为中心，击退了前来镇压的沙俄殖民军，并很快就占领了浩罕、马尔格兰。考夫曼着了慌，即行任命斯科别列夫为割占的纳曼干俄国管理局的负责人和侵略军指挥官。他在玛赫拉姆城下，残酷镇压了起义人民，但是英勇的起义人民是吓不倒的，10月24日又夺回了纳曼干城。斯柯别列夫即用十六门大炮猛轰，城内房屋尽毁，浩罕抗俄军民死伤近四千人，起义军不得已才被迫弃城转移。在1876年的整个11月和12月斯柯别列夫都是无休止地在镇压起义人民，他野蛮地说：“考虑到亚洲人的心理特点……采取了恐怖行动——途经哪个起义者的村庄，往往就烧光那个村庄”^②到1876年1月斯柯别列夫对安集延的起义军民又采用同样野蛮手段炮轰一周。据斯柯别列夫自己供认“被埋葬在废墟下的浩罕人达两万之多。”^③这样，安集延于1月11日陷落。1876年

① 科诺林格《“白马将军”斯科别列夫》，1939年巴黎版，第一卷第二章《米·德·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土耳其斯坦》，由赵瑾、王文译，刊1981年第3期《西北史地》。

② 科诺林格《“白马将军”斯科别列夫》，第一卷第二章《米·德·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土耳其斯坦》，1939年巴黎版，赵瑾、王文译，刊1981年第3期《西北史地》。

③ 《苏联》瓦尔德、戈季耶等《沙皇政府征服乌孜别克汗国》第二卷第八章。

2月19日沙俄公然宣布把浩罕并入俄国,并改名费尔干省,任命屠夫斯柯别列夫为该省军事总督。

斯柯别列夫用极为残暴野蛮手段征服中亚各汗国后,傲然自得地认为对征服亚洲弱小民族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说:“在亚洲,和平的长久和短暂是与你敌人的屠杀直接成正比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定理。对他们打击得越凶狠,后来他们就安静得越长久。”^①

当费尔干纳盆地强被并入沙俄后,一小撮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洋洋自得地叫嚣:“将费尔干纳省这样一个所有方面都是最富饶的地区并入我国,不仅绰绰有余地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获得了进攻中国,甚至进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基地。我们获得了从这一方面进入这两个国家的唯一通道。”^②沙俄正是从这里不断入侵我国塔里木盆地及帕米尔高原的。

(2)沙俄疯狂入侵喀什噶尔及帕米尔

怀有世界霸权野心的沙俄殖民者是永远不会停止侵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真正的边界,武力所到之处就是他们的边界。沙俄乌赫托姆斯基说:俄国“在亚洲,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边界。”^③

所以沙俄刚把费尔干纳盆地侵吞到手,屠夫斯柯别列夫又狂妄叫嚣必须侵占费尔干周围的整个山岭。他认为只有“在承认整个费尔干天山属于我们之后,我们(1)保证山区的安宁并增加国库收

^① 冯·黑尔德《俄国人在中亚》伦敦1874年版,第85~86页。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二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25页。

^③ 乌赫托姆斯基《中国事件》,彼得堡1900年版,第84页。

入；(2)控制‘Les isseus des frontieres’(法语：“边界的各个路口”)；(3)随时可达敌人的侧翼和各联络点；(4)突然行动带来的全部好处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5)迫使敌人不能平均分散我们的兵力或撤向村镇”^①。“我们必须控制费尔干天山，否则，及时提出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速度，震惊整个印度世界的向叶尔羌示威便不堪设想了。”^②

为了捷足抢占我国喀什噶尔西部天山，在1875年镇压费尔干人民大起义的时期，就用武力占据了我国西部天山的伊斯法拉、乌奇库尔干和古里察要隘。这些地区是喀什噶尔和浩罕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强被沙俄侵占以后，不仅破坏了原有的自然分界线，同时喀什噶尔在西部天山的险要也尽失了。可是沙俄殖民者仍不满足，继续厚颜无耻地说：“一些事件很快地就表明这条线还不敷需用。喀拉吉尔吉斯人的暴动，要求我们向山地进行一次艰难而消耗很大的远征。俄国人的前哨，如果一开始就部署在现在所部署的地区的南面的话，这次远征就不必要了。”^③为此，在侵占古里察一带的天山险隘后，为了进侵我国更多土地，考夫曼于1875年8月间亲自带着武装人员从侵占的我国古里察地区窜入我国境内侦察。弄清这一带我国山区的民族和地形情况后，就私自虚构了中俄间的未来边界线，然后于1876年5月派出了以库鲁巴特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阿古柏处，谋图胁迫签订不平等的边界条约。

当1876年5月库鲁巴特金使团离开塔什干东往新疆与阿古柏谈边界时，就不加掩饰地说：“上级预先规定了这个地区对我们有利的边界线上的某些点，并就此向我们使团下达了指示。”^④代

^① 《历史通讯》1882年第10期，见1914年版《历史文件汇编》。

^② 科诺林格著《“白马将军”斯科别列夫》，见1982年第1期《西北史地》。

^③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14页。

^④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4页。

代表团于是年11月6日到达阿古柏处后,就按照考夫曼的指示,带着威胁的强硬口吻向阿古柏说:俄国费尔干省与阿古柏之间的边界线“必须由苏约克山口通过乌鲁克恰提要塞,再往前直到马里塔巴尔山。苏约克山口位于谢米列钦斯克省和‘毕条勒特’领土之间的这条边界线的西南面的终点。”“乌鲁克恰提要塞、纳格拉察勒得、叶金和伊尔克什坦必须交给我们。”^①这是何等样的强盗手段呀!不顾历史和现状,企图用指鹿为马的诡谲阴谋诈取我国大片领土。

当时阿古柏侵略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当然无力抵抗沙俄的侵略,也无法抗拒沙俄的胁迫,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阿古柏也仍然说明他所建边界哨所的情况:“他在呼达雅尔汗成为浩罕汗之前,就建立了乌鲁克恰提;其他的全部哨所都是在他自己直接支持下修建的。”并且接着说:“我恳求您做我的兄长,并在土耳其斯坦总督面前替我说情。如果他愿意向我表示他的友谊,就请他把我修筑的由我占有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一些要塞留给我。”^②库鲁巴特金却蛮横地说:“我不能从我所指出的各点后退一步。”^③

由于清朝刘锦棠大军迅速破灭了阿古柏反动政权,沙俄的一切如意算盘都成了泡影。由此也可以看出,沙俄侵占中亚以后,是沙俄侵占了中国的大量土地,而不是阿古柏越出了原有界线。除上面指出的沙俄侵占古里察以东的我国土地外,还侵占了纳伦河地区的阿古柏反动政权辖地。所以当沙俄为了侵略新疆而在纳伦建立哨所时,阿古柏就向沙俄提出了抗议,指出纳伦河是他的领土,

^①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14页。

^②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15页。

^③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16页。

是和所谓七河省之间的天然疆界。为了抗击沙俄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阿古柏才于“通过图鲁尔特和贴列克山口的路上建立了一个……恰克马克要塞。”^①

在此同时,阿古柏反动政权也还管辖着帕米尔。尽管浩罕汗国较强大时曾数度窜入帕米尔,但都被那里的英勇人民击退了,所以沙俄侵略者入侵帕米尔后,帕米尔人民也向侵略者说阿古柏直接统治了郎库里及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一带。1892年沙俄的塔格耶夫窜到郎库里帕米尔时,布拉特伯克向他说:“在东方历史上著名的阿古柏伯克登上喀什噶尔的王位。他为占领郎库里,向这个地方派遣了库里伯克率领军队。库里伯克出其不意地向帕米尔人进攻,打死了伯克,抢走了他的财产,指派伯克布拉特为管理者;他被迫向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宣誓。一直到阿古柏伯克死去,伯克布拉特都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②对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地区,侵略者塔格耶夫也说:“1866年,小小的山国萨雷库尔宣布它隶属于阿古柏。”^③足证在阿古柏反动统治时期也由阿古柏直接统治了帕米尔,浩罕并没有统治过帕米尔。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沙俄在侵吞浩罕以后,就急速向东侵占我国的天山山区和向南侵入我国的帕米尔,谋图造成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再胁迫我国签订不平等的界约。

所以除对费尔干东及东北面的天山山区加以军事侦察和实行军事占领外,对位在费尔干纳盆地以南的我国帕米尔也早已垂涎欲滴。沙俄即于1871年就派费德琴柯窜至我国帕米尔的阿赖山区进行侦察。从而1876年2月非法宣布吞并浩罕后,费尔干纳军事总督斯柯别列夫就迫不及待地于同年7月15日亲自率领八个连、四个哥萨克骑兵中队、一个火炮连和三门山炮等侵入我国帕米尔

①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在耸入云霄的地方》,莫斯科1904年版,第148页。

②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在耸入云霄的地方》,莫斯科1904年版,第166页。

③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在耸入云霄的地方》,莫斯科1904年版,第148页。

高原北部,镇压了以柯尔克孜族阿不杜拉伯克为首的起义人民,并按照沙俄的命令所到之处“树起俄国国旗。”^①还带了一些专业情报人员广泛搜集帕米尔的自然、社会、政治情报。在此以后考夫曼不仅年年,甚至一年派出好几次军事侦察队窜入帕米尔各地进行颠覆侵扰活动。

清朝政府在击破阿古柏反动政权后,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左宗棠麾下的大将刘锦棠一面尽力肃清阿古柏残匪,一面积积极巩固边防。沙俄则除直接派遣正规殖民军不断入侵外,还窝藏以伯克胡里为首的阿古柏残部。1880年春考夫曼还在土耳其斯坦总督府多次召见伯克胡里等匪首,唆使这伙匪帮继续窜入喀什噶尔,纠集残匪进行暴乱,妄图侵占我国南疆,以配合沙俄侵略军强赖在我国伊犁不走,从而达到侵占伊犁的目的。可是尽管在考夫曼的策动和支持下,大批阿古柏残匪又窜入南疆边境进行骚扰抢掠,并扬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什噶尔)英(吉沙)各城。”据被擒获匪徒供称:他们“由俄国内犯时,俄官姜达郎嘱以此行务取喀什噶尔城池,原则不准再入俄境。”^②但是窜入我境的阿古柏残匪,在各族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大部被歼灭,只有少数仍然逃回中亚。考夫曼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破灭。

不畏强暴的刘锦棠在肃清阿古柏残匪取得重大胜利后,迅速派出得力部队加强边境防务,严守了喀什噶尔和浩罕之间的边界。同时1883年间在帕米尔地区先后添设了六个卡伦,都在萨雷阔勒岭以西。从乌孜别里向南通向兴都库什山的大道上设立了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又称阿克苏卡),自伊斯哈克河向西经大帕米尔直至哈尔果什山口则设立雅什拱特拜卡、巴什滚伯孜卡、图斯库尔卡。1884年又在萨雷阔勒岭以东添设塔敦巴什卡。

^① 寇松著《帕米尔及阿姆河河源》伦敦1898年版,第79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第55卷,《新疆图志》第98卷,奏议八。

就在这种侵略和反侵略的激烈斗争下,沙俄为了捞到更多的侵略利益,就在 1884 年胁迫清朝签订了屈辱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3)《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及其勘界后果

在沙俄武力胁迫下于 1864 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三条末段称:“边界穿过特克斯河沿那林哈勒哈河行,而后至天山山岭。自此往西南,分晰回子部落,布鲁特部落驻牧之处,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这虽然仅指明一个总的方向,但也可清楚知道边界线的走向是沿着天山正脊走的,就是说沿着塔里木河水系和特穆尔图淖尔水系之间的分水岭进行的,这与明谊根据俄国绘出的查界图,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分界附图也是相附的。可是 1882 年的《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却完全推翻了沿天山正脊为中俄界线的规定,而把界线南移到博斯塔格山上,以致把应该划给中国的流入塔里木河的阿克苏河东源扎纳尔特河的丰美牧场全部划入俄境,使我国丧失大片领土。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沙俄代表的狡诈诡譎,贪婪狠毒所造成。而清朝代表沙克都林扎布的颛预无知,缺少爱国心,致任敌摆布,妥协退让,不以失土为可耻,遗臭青史,也是罪责难卸的。

这个界约只解决了自那林哈勒哈河至别迭里的一段界线,在别迭里以南的中俄界线则另有规定。在光绪七年《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的末段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①在

^① 钱恂《中俄界约勘注》。

1876年沙俄还未吞并浩罕之前,实际已在1860年(咸丰十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完成了其阴谋。在此约的第二条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①随之在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第三条中就更进一步的规定了边界较清晰轮廓。该条的末段称:“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②这就指明沿天山之顶及浩罕界直至葱岭为止。

根据上述历次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突出之点是天山之顶和浩罕的界线及终点止于葱岭。到1884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更突出地加上了“现管之界”的字样为准,这就反映出随着沙俄侵略势力的前进,不断蚕食着我国领土,企图以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胁迫我国承认他的侵略既得利益。

原来浩罕管辖的界线,东面是以天山正脊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辖界相接,即在奥什和古里察之间,南面只到葱岭北麓,阿赖岭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经过1876年斯柯别列夫匪军的侵略,已经用武力侵占了我国的阿赖地区,所以沙俄强加“现管之界勘定”字样,以此胁迫清朝承认他用武力吞并的阿赖山区。并还进一步篡改以葱岭为止字样,因为以葱岭为止,就只能到玛里他巴尔山口。按当时已被沙俄侵占的费尔干省所设行政管区,其南也只到玛里他巴尔山口,在1879年沙俄诱迫崇厚订约时,南边界牌鄂博也只到玛里他巴尔山口。从玛里他巴尔山口至乌孜别里山口还有二百余里。这又是沙俄的一大阴谋,他利用清廷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的颛预糊涂,就完全根据沙俄的侵略计划,假借以“山高雪深,人不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8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能到”为借口,采用“指山为界”^①的狡诈手段,造成“一切界址,悉由俄人指定”^②的惨痛局面,遂被偷越玛里他巴尔山口,南侵二百里,直至乌孜别里山口。《新疆图志》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是“俄人乘我不觉”^③,明明我国有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在旁,如何会不觉呢?事实应该是沙克都林扎布的寡廉鲜耻,对国家民族不负责所造成的恶果。

既然沙俄南侵乌孜别里山口的阴谋得逞了,为了达到他侵占我国帕米尔大片领土的目的,就更施展诡计。对乌孜别里山口以下,就在该约第三条末处擅自写上“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④的奇文。这样就把我国和什库珠帕米尔的全部、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西北的一小部分领土划给了沙俄,同时还形成了向西南和往南线之间的待议地区,就使我国帕米尔的大部领土为沙俄所侵占了。可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割去了我国帕米尔的大片领土。

而在实际勘界中,由于沙克都林扎布的无能和无耻,在喀什噶尔西边的现管地界,又被沙俄侵夺大片土地。首先沙俄为了达到多侵我国土地的目的,利用他们长期所得情报和实测所绘地图,以欺蒙清廷无边境详图,而谎说是依据塔城及伊犁两个中俄条约规定的界线,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红线。实际这条红线是根据其侵略意图绘出的,完全违背条约所规定的边界走向,而把边界线大大越过我们现管之界,以愚弄、欺骗不谙我国边界地理形势特点的清朝勘界大臣,对国家民族不责任的沙克都林扎布、长顺等败类也竟执此而欺上蒙下,致丧失大片领土而不顾。

那时负有新疆边防重责的新疆帮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曜

① 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
 ② 新疆外交研究所《新疆外交报告表》界务,第3页。
 ③ 《新疆图志·国界志》。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已经察觉到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在与沙俄代表咩登斯克的勘界活动中没有现管之界的原则,而是听人任意摆弄,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心急如焚地立刻向清廷详陈实情,指明沙俄强要在我国的依尔克什坦划界,“与现管地方舛错太甚。”因“依尔克池他木在山以内,地势平衍,既不沿葱岭,不靠浩罕,实与条约不符。现管之帖列克达湾,即帖列克达坂,系葱岭正干,与西南现管之界同一山梁,其山之阴皆浩罕旧地,为今俄国费尔干省现管之界。”同时还根据调查所得的确切材料指明从“廓克苏至依尔克什他木一带,系喀什噶尔所属岳瓦什、布鲁特祖遗坟地,水草既饶,道路又近,部众赖以资生,舍此别无草场,一经划归俄国,是夺其养命之源。”^①所以他要求清廷力争“在帖列克达湾设立牌博,再行互换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敕令“分界大臣……随时执约,设法挽回。”^②

清朝接到张曜的报告后,一面令曾纪泽与俄国外部大臣详细辩论,同时还指令伊犁将军金顺会同沙克都林扎布妥善办理。可是沙克都林扎布伙同他的儿女亲家长顺^③采取敷衍、欺骗,对中国土地毫不负责的态度。沙克都林扎布始则说:“七月初五至十三日叠接张帮办来牍,谓喀喇多拜及屯木伦等处为现管之界。遂先从此处力争,大都为得尺得寸之计。”^④这里所说“力争”是遁辞,因为他接着就说:“初九日至伊尔克什他木,即官图红线之伊尔克池他木河,亦即卡伦单之依尔克唐是也。曩者,夷族叛乱,俄人屯兵,帕霞置卡、形势要害,人所力争,此官图红线所界划,卡伦单所特载者。”^⑤沙克都林扎布却说依尔克什他木形势如何重要,是什么“官图红线”所在,根本无视了“现管之界”的勘界原则。他不以界约所订勘

^① 《新疆帮办张曜喀什噶尔西边界应照条约现管之界办理摺》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36卷。

^② 《新疆帮办张曜喀什噶尔西边界应照条约现管之界办理摺》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36卷。

^③ 见《续碑博集》卷53《太子少保吉林将军郭博罗公神道碑铭》。

^④ 《沙大臣勘界日记》,见《新疆图志·国界三》。

^⑤ 《沙大臣勘界日记》,见《新疆图志·国界三》。

界原则去抵制和揭露侵略者的阴谋,相反却被敌人的阴谋迷了心窍。因此他反而买通他的亲家长顺向清廷虚报说:“依尔克池他木即新约后载议准俄商出入卡伦山口之伊尔克什唐,亦即图中之依尔克池他木河。其他线外并无游牧,间有孛遗布民,均住卡伦附近。”还在报告中指斥张曜提出的所争地段“非尽实情”。^①

清廷又令伊犁将军金顺“熟筹利害,确切查明”时,金顺却仍然听信沙克都林扎布的卖国言词而继续和其一起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说:“帖列克达湾,在喀城极西,距依尔克池他木红线二百余里,地势孤悬一隅,实非要隘,而依尔克什唐载在新约卡伦单,设卡置兵,以谨出入。依此立界,险要固未失也。岳瓦什部众,均住红线内之乌鲁克恰提住牧,距贴列克达湾迤东三百余里,地势宽阔,水草裕饶,履勘时并无岳瓦什人在彼住牧。”^②真是卖国有理呀!明明是古里察、铁列克达坂的险要一失,敌人就可直下喀什噶尔平原,竟然无耻地说:“险要固未失”,以此欺骗和蒙蔽人民。可见沙克都林扎布、长顺、金顺三人实一丘之貉,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贼。如果不是长顺等的卖国行为,是完全可以吧铁列克一带险要力争回来的,因为有现管之界的勘界原则,可以识破和粉碎敌人的一切狡谋。

那里畏敌如虎的清廷,在接到长顺、金顺的奏陈后,就由总理衙门指示说:“俄方狡诡多端。如果争之甚力,即使屈从,亦必另指一处,以为抵制,或且耽延时日,多方误我,正未可知!”害怕“不赶紧互换图约,恐俄人日久,在我界内别生枝节。”^③就在这种卖国退让的指导思想下,使得俄国不以“现管之界”勘界的侵略要求得以实现。

① 《新疆图志·国界志》。
② 《新疆图志·国界志》。
③ 光绪朝《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六。

(4) 结语

沙俄破坏“现管之界”的勘界原则,非法侵占我国大片土地,做得十分露骨。可是苏联霸权主义者为了给《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勘界时沙俄不按“现管之界”的勘界辩护,普罗霍罗夫的《关于苏中边界问题》一书中只谈按《中俄伊犁条约》勘界,更不谈喀约是违反《中俄伊犁条约》按“现管之界勘界的规定”,恣意侵占我国喀什噶尔西边铁列克和屯木伦一带地方。强要人们信沙俄就是照条约“划界”的,用以掩盖沙俄违约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①。齐赫文斯基则更恶毒的把“现管之界”和什么“阿古柏边界”混淆起来,胡说什么“作为基础的不是老的边界,而正是这一新的边界,即所谓‘阿古柏边界’”^②。

所谓“阿古柏边界”完全是沙俄乘阿古柏即将垮台的时候一手炮制的,那时阿古柏虽然答应派扎曼汗前往考夫曼处去谈判,即使在他派出代表时也没有全部答应沙俄强行提出的边界线,他仍向库鲁巴特金说:“我将派出我自己的一些使节随同你们前去请求强大的雅里木帕夏(意即半沙皇,指考夫曼)作出一些让步,把我辛苦操劳十四年才建设起来的地方留给我。如果他不接受我这个请求,那就全靠上耳其斯坦总督阁下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段划定一条边界线,我接受他的边界线。”^③足证阿古柏在口头上也并没有完全答应沙俄的胁迫,他派出的代表根本没有谈判,就由于他的迅速失败而成了泡影。

^① 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莫斯科1975年版,第163~169页。

^② 齐赫文斯基等《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1972年第6期。

^③ 库鲁巴特金著,古沃少校英译本《喀什噶利亚》,印度加尔各答1882年版,第16~17页。

苏联霸权主义者根据没有完成任何签字手续的片面提议作为扩张的根据,不仅开创了国际从未有过的先例,其霸道行径实在比老沙皇走得更远。说穿了是妄想篡改历史,制造借口,继续来侵略我国罢了。否则怎么会把根本不存在的的事情,喋喋不休地去欺骗世界人民呢?对这些做法,我国各族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帕米尔的历史和现状

(1) 亚欧大陆的心脏——帕米尔

帕米尔,远古称春山,后又称葱岭,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注中称:“《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西域图志》又说:“葱岭,一名极疑山,在天山西南,与南山会合处。连岗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邐,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①。现在中外书籍上则通称帕米尔,在我国书上则有译作波迷罗、帕密尔、白弥尔、巴马等称呼。柯尔克孜人民对于境内河川、湖泊附近的平原称为帕,所以帕米尔的意思,就是高寒平坦的地方;也有的认为帕米尔是波斯语“平屋顶”或“世界屋脊”的意思^②。

万山之祖的帕米尔,位于欧亚大陆的中枢,在我国新疆的西南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跨萨雷阔勒岭,西临喷赤河,南障兴都库什山,北屏阿赖岭。世界著名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喀拉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都从这里向各方延伸,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结。其间山峰与谷地交错而列,地势高耸,一般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

^①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23卷,第19页。

^② 许景澄《帕米尔图说·帕米尔图叙例》中说:帕米尔,古称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犹言大地一屋顶也,后转称为帕米尔。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1975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3页称:帕米尔按波斯语是“世界屋脊”之意。但当地人却称这个地区位于河川、湖泊两岸谷地的任何高地为帕米尔。

位于中亚的帕米尔高原,东边是近于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山脉和喀什噶尔山脉,高原中西部的山脉基本都是东北、西南走向,在阿赖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自北而南横亘着达尔瓦兹山脉、完治山脉、罗善山脉、雅兹古列姆山脉、什克南山脉、南北阿尔楚尔山脉等,由于萨雷阔勒岭山脉的南北走向,就使该山脉东西帕米尔之间的地理景观和河流流向有所不同。在山脉以东属塔里木河水系,主要有塔什库尔干河(叶尔羌河上游),改子河和玛尔堪苏河(喀什噶尔河上游),均流入塔里木河;山脉以西属阿姆河水系,主要有瓦罕河、大帕米尔河(合流后称喷赤河),还有阿尔楚尔河、贡特河、巴尔唐河、木尔加布河等。并错列着不少湖泊,较大而著名的有:大喀拉库里湖、郎库里湖、萨雷库里湖、伊西洱库尔湖。这些河流湖泊的周围,草类繁茂,是帕米尔最优美的牧场,形成八块小平原,俗称为八帕。即东南部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萨雷库里湖附近的大帕米尔、阿克苏河上游的小帕米尔、阿尔楚尔河和伊西洱库尔湖附近的阿尔楚尔帕米尔、木尔加布河谷地的萨雷兹帕米尔、喀拉库里湖一带的和什库珠帕米尔、瓦罕谷地的瓦罕帕米尔。

帕米尔高原虽然是一个高寒山区,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古今来一直是东西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道途,同时南北之间也有易于通行的道路。从古起我国人民最早行走于这个著名的世界屋脊,最早记录了这块引人注目的重地,留下了不少为世界所珍视的著作。远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已对葱岭有所记载,《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各小国有了明确记载。公元4世纪末西去印度的法显,在他的《佛国记》里更记述了葱岭的自然景观;继之翻越葱岭的还有高僧智猛、昙无竭(法勇)和518年西去的宋云、惠生。在宋云的行记中,也生动的记述了涉足葱岭的境遇;特别是629年(贞观三年)西行的玄奘,来去都经过帕米尔,是我国古代经过帕米尔地方最多,记载最详细的一人,由他明确指出了帕米尔的范围是“据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

至乌铎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① 瞻部洲系佛教所指四大洲之一,即指葱岭位在亚洲的中心地带;热海为伊塞克湖;千泉在怛逻斯以东;活国系原吐火罗地,即今阿富汗;乌铎今英吉沙尔一带。在当时条件下能第一个描绘出葱岭的轮廓,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时还第一个记载了帕米尔的最早名称——波谜罗。这些都显示了我国人民的毅力和才智。

欧洲人虽然在希腊托勒美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了伊摩斯山,对帕米尔有了一点影子,却是十分模糊。后来直到13世纪下半叶马可·波罗东来中国时才对帕米尔有比较清楚的记述。俄、英帝国主义知道帕米尔已是19世纪的事。英国第一个窜入帕米尔南部萨雷库里湖一带窥探的是1838年的海军大尉伍德;俄国人则直到1871年才有费德琴柯打着科学研究的招牌,窜入帕米尔北部边缘的阿赖山脉。从此俄英两帝国的军事侦察队就源源不断地闯入帕米尔,发现这是一块易于通行的战略要地,狂叫必须抢占到手。沙俄从1838年起派出的格鲁姆勃切夫斯基侦察队在帕米尔各地探查五年以后下结论说:“我走遍了帕米尔的四面八方……各帕米尔的通道很方便,只要把山口稍事修缮,修几个上下坡,甚至马拉炮都可以通行。高达一万五千尺以上的山口,也不会阻止部队的前进,因为通往山口的漫坡延伸几十俄里,而且这些山口高出周围的地面只不过二至三千尺,至于兴都库什山的山口。如通往坎巨提的基里克山口和通往乞特拉尔的巴罗基勒山口是相当方便的,不需任何修缮,部队即可以通行。”“帕米尔远不是荒无人烟的空地,那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碰见吉尔吉斯牧民、牧草和燃料(优若黎)”。^② 经过这一番侦察,发现了从中亚通向印度洋的捷径,怎么会不垂涎欲滴。

英国人侦察帕米尔以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全帕米尔到处都有

^①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② 格鲁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1891年版,第21~22页。

路,有一千条路,只要有向导……哪里都可以去。”^①发现兴都库什山并不是敌人过不去的屏障,因此拼命想在帕米尔寻找一块缓冲地带,以阻挡北极熊的南下。于是帕米尔地区变成了俄英逐鹿的场地。

(2) 清代以前中国对帕米尔的统治

帕米尔从远古时候起就与中原黄河流域各族有了经济文化的联系,在《禹贡》中已有“西被于流沙”之说。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于中原出现的黄帝部落联盟,在其首领轩辕氏统一黄河流域后,就“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②到了商朝,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更加强了与周缘各族人民的联系,于是远在葱岭西的渠搜国,也到商都朝贺。^③而当西周还没有灭商之前,周的祖先古公亶父就以他的嬖臣长季綽分封“于春山之貳,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④这里的春山就是帕米尔。

周灭商以后,到周穆王时,进一步发展了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往来。亲到西域,登上昆仑,瞻仰黄帝所建宫室,又策马葱岭,“北升于葱山之上,以望四野”,直到季綽所建的赤乌氏国。这些联系,加深了中原和包括帕米尔在内的西域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为西汉时帕米尔归入祖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前 60 年,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的广大西域地区,正式归入了西汉的版图,并经过张骞、堂邑父、班超、班勇等的调查,对于西域的民族、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情况也有了

① 戈登《世界屋脊》第 157 页。

② 陆贾《新书·修政语上》。

③ 《大戴礼记》卷一《少问》。

④ 《穆天子传》卷二。

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分布在帕米尔高原的主要是无雷、难兜、蒲犁、依耐、子合、休循、捐毒数国。核之今地，无雷在今大帕米尔及瓦罕东部，难兜在瓦罕西部及什克南、罗善一带；依耐在阿尔楚尔及郎库里一带，子合在小帕米尔及其以东地区；蒲犁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一带；休循位于阿赖谷地；其东系捐毒，当在今克孜勒苏河上游伊尔克什坦、乌鲁克恰提一带。这些被《汉书》所列各小国的名称，实际都是一些游牧部落的名称，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羌族，《通典》说：“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比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盖同为羌种，故传以若羌目的。”而在《汉书·西域传》中则说“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氏行国。”可知蒲犁、依耐、无雷、西夜、子合都是同属于羌族的游牧部落。只有位于帕米尔北部的休循、捐毒是塞种。解放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部的香宝宝古墓地，发现一批两三千年的羌族墓葬群。^①足证古代这一带确是羌族游牧的地区。

游牧在帕米尔高原的羌族和塞种两汉时都受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各级官职都佩汉印绶。1959年沙雅县出土了“汉归义羌长印”，就是西域羌族人民受汉统治的有力佐证。我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最后都是说西逾葱岭。《汉书·西域传》称：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可见葱岭所居地位的重要。《后汉书·西域传》也说：“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后汉书·班超传》说得更明确“超遂逾葱岭，迄悬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即立其王，而绥其人。”英国斯坦因侦察帕米尔，听了流传在帕米尔各族人民的传说以后，也不得不说：“自从班超得到胜利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向西扩展，竟远达帕米尔地方以外。”^②

^① 197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②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18页。

到魏晋南北朝,虽然是政治动荡、各割据政权并立的时期,但帕米尔高原仍然受中原各割据王朝的管辖。曹魏时“楨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蒲犁国之误——引者)、德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循国、琴国皆并属疏勒。”^①那时疏勒“无岁不奉朝贡”^②为了管理西域事务,还于公元222年(黄初三年)设立戊己校尉,并任命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西晋时仍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以统治西域。晋东渡后,西域又受到前凉、前秦、后凉等封建政权统辖。公元324年张骏在凉州建立前凉政权后,就把包括帕米尔在内的西域诸国置于自己政权的管辖之下,前凉的疆域直到末年还是“西包葱岭,东距大河。”^③前秦苻坚不仅派吕光带兵统一了西域,后来吕光回到凉州建立后凉,也仍然封其子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④恢复了两汉统治西域的都护制度。

到公元420年拓跋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后,西域各族闻讯,即于437年(北魏太延三年)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各遣使向魏,其中的渴盘陀就是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地区,统治帕米尔东南部;乌孙也有部分被柔然所迫,迁往帕米尔北部,北魏太武帝也于435、436年先后派使者至西域宣慰,437年又派董宛、高明到了乌孙及塔什干、费尔干等地,于是随使东来向北魏贡献的有16国,此后“相继而来,不简于岁”^⑤。其中帕米尔东部渴盘陀在《魏书》中向北魏贡献的年份就有437、439、453、462、502、503、507、512、513各年。位在葱岭中的悉居半国也先后于439、462、502、511各年遣使向北魏贡献。在《梁书·诸夷传》中还记载渴盘陀于546年向南朝的梁贡献土产,足见即使在南

①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晋书·张轨传》。

④ 《晋书·吕光载记》。

⑤ 《魏书·西域传》。

北朝这样政治分裂时期,帕米尔地区也仍和中原有政治联系。

581年杨坚统一中原,建立隋朝。炀帝派韦节、杜行满出使西域,西域诸国“相率来朝”。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通过葱岭通道的丝绸贸易也有了新的发展和繁荣。裴矩所撰《西域图记》^①序言中指出的南、中、北三条东西通道;除北道走天山北麓西行外,南、中二道仍都分别从渴盘陀和疏勒度葱岭,西去欧洲和非洲,作为东西通道的帕米尔,又成为隋朝在西域的边防门户。

公元618年继隋而统一西域的唐朝,更有了近三百年的统一时间,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疆域也更为辽阔,帕米尔高原在唐代的西域历史上又谱写了新的篇章。

唐代统一西域后,即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帕米尔高原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管辖,661年(龙朔元年)即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包括帕米尔在内的十六国,设立都督府州,即以其王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府百二十六……并于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其事。”^②位在帕米尔地区的则有鸟飞州、至拔州两个都督府和一个葱岭守捉。鸟飞州都督府设在帕米尔南境的护密国,即今瓦罕地区,王都为塞迦审城;高宗显庆时即册其王沙钵罗颀利发为刺史,自高宗以后直至天宝年间的历代王室都由唐朝册封。758年(肃宗乾元元年)其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时,又赐姓李,这是对唐朝忠诚和有功的特殊厚遇。至拔州都督府设在帕米尔北境的俱蜜国,即今达尔瓦兹地区。642年(贞观十六年)时,其王即遣使者入朝,其后又屡献胡旋女及名马等。在今帕米尔西境的什克南一带即唐代的识匿国,其王也被册封为金吾卫大将军。公元747年(天宝二年)高仙芝率军远征小勃律的吐蕃贵族时,识匿王即率地方武装随高仙芝出征,为国牺牲,唐廷授其子为都督左武卫将军。帕米尔东境的渴盘陀国于开元(713~741年)中驱逐

^① 《隋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了盘据在那里的吐番贵族后,即设立了葱岭守捉,又称葱岭镇,唐朝直接派兵驻守,成为保卫帕米尔高原的军事据点。公元727年慧超从印度求法回国路经那里时记称:“从护密国东行十五日,过播密川,即至葱岭镇,此即汉属……外国人呼云竭饭檀国,汉名葱岭。”^① 这些都是唐代在帕米尔行使主权的有力确证。

1953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2卷120页巴达克山条记载说:“公元前二世纪巴达克山地区已归属中国,中国人以喷赤河上游为自己通往西方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交通要道。到公元初期,巴达克山地区已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公元五世纪时候,巴达克山地区重新归附了中国。”而唐代高仙芝率大军横越帕米尔高原征服小勃律吐蕃贵族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也赞佩不绝。英国斯坦因侦察高仙芝的行军路线及战争场地后,十分惊奇地说:“帕米尔同兴都库什在军事行动上是一个可怕的自然障壁,数目比较不算少而有组织的军队越过此地,在记录上要以此为第一次。高山峙立,缺乏一切给养,这种军队在此如何能够维持得住,即是这一个问题,便足以把现代任何参谋本部难倒了。”^② 高仙芝“这位勇敢的中国将官竟不在达科特隘口建立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以志此事,就所遭遇的困难而言,横越达科特及帕米尔较之欧洲史上从汉尼拔(Hannibal)以至于拿破仑同苏伏洛夫(Suvorov)诸名将之越阿尔卑斯山,还要困难呢!”^③

从10世纪开始建立在中亚及新疆南部地区的哈拉汗王朝也同样管辖着帕米尔及喀拉昆仑山。随着哈拉汗王朝生产文化的发展,帕米尔高原也是道路畅通,贸易发达,生产有所发展,据阿拉伯作家伊斯塔赫里报导“巴达克山地区很早就以产红宝石和天青石著名,在哈拉汗王朝开矿相当普遍,甚至在帕米尔的深山中也有矿

^①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②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30页。

^③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31页。

坑。”

1131年于哈拉汗王朝及高昌回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辽王朝，仍然统有帕米尔高原。1218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辽，并命哲伯追杀西辽末主屈出律于帕米尔萨雷库里湖，即于西域置达鲁花赤统治。帕米尔为察合台后王封地，归别失八里元帅府管辖。到明朝时则属于被称为察合台东支的别失八里政权，其首领受明朝册封，并自洪武起就向明朝进贡，明朝也不断给以赏赐和册封。《续通典·边防三》称：“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国王哈达拉和卓（旧作黑的火儿者，今改正——原注）遣使贡马，赐其王采币十表里，其使者皆有赐。成祖永乐四年贡瑾玉，十六年布色（旧作不思，改正——原注）弑其从兄王诺果沙扎该（旧作纳黑失只罕，今改正——原注）自立为王，徙其部落西去，更号伊里巴拉。宣宗、宣德后屡入贡。”吐呼鲁铁木尔统治时期疆域更达到帕米尔以南。明朝对巴达克山曾于“永乐六年（1408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采币，并及哈实哈儿、葛朗忒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①1614年赛义德汗征服喀什噶尔后，即下令把1503年已征服的帕米尔一些地区划分若干区作为喀什噶尔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明《一统志》也把帕米尔列在别失八里（又名齐力把里）的疆域内。

明朝末年，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察合台后裔各汗王各自为政。日益强大的准噶尔统治者从1634年以后逐步使天山以南地区沦为自己的附庸。1644年清朝入关代替明朝统一全国后，卫拉特蒙古即向北京称臣纳贡，1653年（清顺治十年）4月清朝即封卫拉特部联盟首领顾实汗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洪台吉，则随顾实汗“附名”入贡。1678年准噶尔部噶尔丹不仅进一步征服了塔里木盆地，势力还远达到帕米尔边区的巴达克山及昆

^① 《明史·西域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都斯达勒罕一带,并胁迫帕米尔周缘各部向其称臣纳贡。到1759年,包括帕米尔在内的新疆各地,才为清朝所统一。

自西汉统一西域,到清朝乾隆时再度统一西域,在这一千八百多年时间中,帕米尔一直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尽管除汉族外,还受过鲜卑、突厥、回鹘、蒙古、满等族的统治,但他们都是中国的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苏联某些所谓学者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满族和中国其它少数民族都不算是中国人,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也都不是中国的领土。”^①显然是别有用心。

(3) 清朝对帕米尔的统治

清朝于1757年平定准噶尔后,窜踞南疆的博罗尼都和霍集占发动叛乱,清朝又派大军追击大小和卓至帕米尔高原。在以兆惠为统帅的清军围攻下,首捷于和什库珠帕米尔,次捷于阿尔楚尔帕米尔,最后立营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并设计诱杀了大小和卓。然后清政府即在该湖之北十里之处修纪功碑一座,并建立有庙宇、房屋,碑上刻有乾隆亲自撰写的碑文:“伊西尔库尔淖尔者,我付将军富德等穷追二酋(即大小和卓——引者),至拔达克山之界。”^②该地被称为苏满塔什,意即“铭石”,就是由此纪功石而得名。

自喀什噶尔西北山区直至帕米尔,主要是游牧的柯尔克孜族。《西域图志》卷45称:“西布鲁特,在喀什噶尔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逾葱岭而至,与东布鲁特相望,部落凡十有五,……部落虽分而驻牧同地。东南扼葱岭,西迄于布哈尔诸部落,共二十万人。”在受准噶尔贵族压迫时,他们“久思内附,以准噶尔阻,未得通。”清政府

^① 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声明》。

^②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莫斯科1959年版,第31页。

追剿大小和卓时,柯族人民协助清军为平叛做出了贡献,当将军兆惠率军道经诸部时,都“遮首吁请内附”,即遣二等待卫达克塔纳等往抚头目,阿济比代表诸部,奉书将军兆惠称:“额德格纳布鲁特小臣阿济比,恭祝大皇帝万万寿,恭呈如天普复、广大无外,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令将军自喀什噶尔传谕我部,颁给印文,谨已奉到,不胜踊跃,适慰心想。当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① 1760年秋,兆惠向乾隆皇帝报告说:“蓝翎侍卫启泰招降希布察克布鲁特,在阿勒楚尔伊西洱库尔击贼,直至拔达克山,俱奋勉效力。”^② 清廷奖其忠诚,并诏隶户籍,由是西布鲁特十五部落附入清朝,并即遣使朝京师。

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为了加强西域防务,即于1752年(乾隆二十七年)正式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一职,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到帕米尔,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各级地方官员。帕米尔地区的军政事务,则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综理,各部大小头目均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放。苏联佐姆戈尔捷诺夫也说:“清朝当局为管理吉尔吉斯人建立了某些部所。”^③ 对于地方官员,清朝仍采用本民族原来官制——伯克制度,委放各部头人,并按各头目原官地位大小,给以清朝官爵与翎戴,自二品至七品不等。比照清朝地方官员,作为各该部落的行政长官,行使政权。1782年根据实测完成的《西域图志》和《大清一统志》记载帕米尔地区的和什库珠克、阿喇楚勒、叶什勒库勒属喀什噶尔管辖;塞尔勒克(即色勒库勒)为叶尔羌属境。

^① 同样规定见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30卷;《钦定新疆识略》第3卷。

^② 叶尔羌参赞大臣梁山、帮办大臣关福《致浩罕谕帖》。

^③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66页。

根据 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新疆四酋升迁调补事宜》中的规定,对色勒库尔(塔什库尔干)地区共委任了以下各级伯克:“五品阿奇木伯克一员,六品伊什罕伯克一员,商伯克一员,七品哈子伯克一员,阿尔巴希一员,沙虎尔一员,密哩咱尔一员,塔尔哈喇木部落七品伯克一员。”^①还颁给印信一颗,管理地方事务,其中五品阿奇木伯克是统理该地大小事务的最高官员;伊什罕伯克是阿奇木的副手;商伯克征收赋税;哈孜伯克处理刑民事务;阿尔巴希伯克负责支差催课事务;沙虎尔伯克主管驿运等杂务;密里咱尔管理水的灌溉。每年在叶尔羌支給盐菜钱四十千文,作为补助费,该地则每年向清朝政府缴纳贡赋黄金二十七两七钱,硝石一千七百斤,折赏布一百五十三疋。自 1760 年起即委任该地伊斯兰教首领色以提沙利及其后代为历任阿奇木伯克。

1830 年浩罕汗派素都尔统带一千多匪徒,窜入塔什库尔干地区,烧杀掳掠,并杀害了阿奇木伯克迈买沙。清朝即令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哈郎阿派出大军剿平了浩罕匪徒,当即任命平定浩罕匪徒叛乱有功的塔吉克族四品顶戴花翎库尔察克为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1833 年浩罕匪徒五百多人再次窜入塔什库尔干地区,很快被库尔察克带领塔吉克、柯尔克孜人民击溃。1836 年 11 月浩罕的勒什噶尔胡什伯克更率二千多名匪徒围攻塔什库尔干城,库尔察克带领塔吉克人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因众寡悬殊,受伤牺牲。英雄的塔吉克族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伊什罕伯克迈热木的带领下,退守色勒库尔东部一带,继续战斗,并在清军的配合下,赢得了胜利,肃清了浩罕匪徒。直到 1865 年阿古柏窜据南疆建立“哲德沙尔”反动政权时,浩罕还有几次窜至塔什库尔干地区滋扰,都被英勇的塔、柯族人民赶走了。清政府多次向浩罕汗指出色勒库尔“系天朝的地方”^②。所以自 1759 年至 1865 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包

^① 同样规定见于《钦定皇舆论西域图志》三〇卷;《钦定新疆识略》三卷。

^② 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帮办大臣夫福《致浩罕谕帖》。

括色勒库尔在内的帕米尔高原始终在清朝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自1865年阿古柏在新疆南部建立反动政权后,直至1877年被清军击溃的十三年时间里,阿古柏仍然统治了帕米尔高原。浩罕虽与阿古柏争夺这块地区,阿古柏还是取得了胜利。沙俄侵略者塔格耶夫也是这样说的。他窜入帕米尔后,听到郎库里帕米尔柯尔克孜族的布拉特伯克向他说:“当阿古柏伯克登上喀什噶尔的王位,他为占领郎库里,向这个地方派遣了库里伯克率领的军队。库里伯克出其不意地向帕米尔人进攻,打死了伯克,抢走了他的财产,指派伯克布拉特为管理者。他被迫向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宣誓,一直到阿古柏伯克死去。伯克布拉特都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而当喀什噶尔被中国人占领以后,他认真地继续为中国皇帝缴纳赋税。”^①这就指明了自阿古柏起及以后的清朝统治时期,郎库里一带帕米尔都受中国的统治。

塔什库尔干地区也同样曾一度归属阿古柏反动政权的统治,他曾派遣阿山夏占据了塔什库尔干地区,所以沙俄塔格耶夫继续说:“1866年,小小的山国萨雷库尔宣布它隶属于阿古柏,但它的统治者阿里夫沙紧接着就由于什格南和帕米尔发生的普遍骚乱,而拒不承认阿古柏的统治者。因此,1869年从叶尔羌向萨雷库尔镇派出了一支远征军。阿里夫沙的军队被打败了,他本人也被杀,而相当一部分他的臣民,奉命把他们的家,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其中身强力壮的,被征召入伍充当了兵。”可见沙俄侵略者也不能不承认阿古柏统治了塔什库尔干地区。

1877年底,清朝的刘锦棠大军势如破竹,击破阿古柏匪军,直抵叶尔羌。塔什库尔干地区各族人民在哎里布领导下,袭击了阿古柏头目阿山夏,收复了色勒库尔。1878年(光绪三年)初清即行任命哎里布为色勒库尔地区的阿奇木伯克,管辖范围除原色勒库尔

^①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陈晋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66页。

等十九处塔吉克族聚居的城镇乡村外,还包括色勒库尔北部柯尔克孜族奈曼等部游牧的布伦库尔、黑孜塔克等九处地方。并谕令哎里布“严守卡,不准来往匪人。遇有地方要紧事务,即来喀什大营汇报。”^①

面对沙俄的侵略,刘锦棠加强了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理。于1878年委派沙依木伯克和库鲁木旭伯克为蒙巴希(千户长),常驻六尔阿乌(今乌木尔加布),下设六个玉孜巴希(百户长),分别管理喀拉湖、郎库里、六尔阿乌、阿尔楚尔、切西都完和阿克苏(今克孜勒苏)等地方。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1884年新疆正式改建行省,设巡抚综理全省军政事务,在省以下设道、府、厅、州、县各级行政机关。原叶尔羌改为莎车直隶州,属喀什道。对萨雷阔勒岭以西仍沿袭兄弟民族习惯,继续委派当地部落头人为千户长和百户长,进行管辖,即郎库里的拜克波罗伯克,阿克苏的托库尔伯克,托合他买提的托合他伯克,阿尔楚尔的卡拉库力伯克,六尔阿乌的买买提玉山伯克,切西都完的艾西巴衣伯克,波孜纳的库万提伯克;巴什拱拜孜的百提伯克,塔什库尔干地区因系边防要塞,特设立抚辑粮运局(后改名转运抚辑局)负责地方治安和转运军粮等工作,由喀什提督委派旗官一名管理局务,为当地军政首长。他不仅管辖着塔什库尔干地区,还综理着自郎库里至阿尔楚尔及萨雷库里湖一带的军政事务。这个旗官实际是中国在帕米尔的最高负责人。在此同时,还保留了该地正副阿奇木伯克,哎里布之后任职的是其兄阿不都勒艾山,1892年因病辞职后,又委任其子买买克里木接任^②。阿奇木伯克受莎车直隶州和色勒库尔抚辑粮运局的双重领导。潜入我国帕米尔的英国人戈登经过调查,也明确指出:“当中国占据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色勒库尔被一个传统的酋长统治着”,但他承认“附属于

^① 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刘锦棠委任哎里布为色勒库尔回目谕》。

^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喀什提督和喀什道台谕文》。

中国。每两年或三年,他去叶尔羌进贡一次,并得回相当值钱的赏赐,其中包括金子和银子。这笔钱代表一年的十四个雅姆巴斯(略多于200英镑)薪俸,作为保卫边疆的补助和通向巴达克山道路的维修费”^①。

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每年也收取一定的赋税,建省后由色勒库尔旗官张鸿畴掌管,委派夏合甫夏担任税收官。夏合甫夏经常来往于六尔阿乌等地,督促检查税收工作。在19世纪90年代初多次入侵帕米尔的沙俄杨诺夫上校还于1891年6月见到中国清朝的喀什噶尔官员“向过往商客和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征收赋税”^②。

刘锦棠大军横扫阿古柏反动政权的时候,沙俄的侵略势力已不断窜入帕米尔,并咄咄逼人地蚕食边境,威迫签订屈辱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清朝为了巩固帕米尔边防,即在建省前后于帕米尔高原设立重要卡伦八处。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新疆西南边外情形疏》称:“迨光绪年间收复新疆,刘锦棠始增设七卡子旧界之外,十五年又添设苏满卡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

究竟是哪八个卡伦,在《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新疆巡抚陶模复电》中指出:“该处一带向设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巴什滚伯孜卡、图斯库尔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塔敦巴什卡、唯苏满卡系十五年新设。”^③这虽然是1892年电中指明的名称,其设卡年代却远在这之前,其下限量苏满设卡最迟在1889年,可见其余各卡这设,均在1889年之前,故以“向设”之语概括。据查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又称阿克苏卡)设于1883年(光绪九年)8月30日前。都设在从乌孜别里向南通

^① T·E·戈登《世界屋脊》1878年版,第110页。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杜尚别1962年版,第283页。

^③ 《新疆图志·国界志八》。

向兴都库什山的大道上,黑孜吉牙克卡在乌孜别里山口附近;六尔阿乌卡即木尔加布,位在阿克苏河旁;阿克苏卡设在阿克苏河上游。接着于1883年8月30日以后,又在小帕米尔位于伊斯里克河上游的雅什拱特拜,大帕米尔的巴什滚巴孜(巴什拱拜孜),以及位在哈尔果什山口东北的图斯库尔(咸湖之意)设立三卡,由东而西,差不多在一条直线上,以捍卫大帕米和瓦罕地区的边防。1884年又设立了塔敦巴什卡,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沙俄在帕米尔的清俄边界谈判中,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要我国“先撤卡,后勘界”。诬说清朝在帕米尔的卡伦于19世纪90年代才设立,非80年代所设。1892年俄国外交部总办格必尼斯向许景澄说:“俄人英人之游历帕米尔者,从前未云有中国卡伦在彼,看来不过设有一二年。”^①侵略者总是要制造各种谎言混淆视听,抓取侵略利益的。

除上述八卡外,随着沙俄对帕米尔的加紧侵略,又继续添设了阿克塔什卡和伊斯里克卡。查阿克塔什卡系1891年(光绪十七年)新设卡伦,为色勒库尔屏蔽,在阿克苏河上游,仅与色勒库尔中隔一山梁,距一百余里,由阿克素睦尔瓦卡头目哈四目兼管,过去向未设卡。因1891年沙俄侵略军到此滋扰,竖立木杆,粘贴俄文,伪称系俄境,才经喀什提督董福祥命黎旗官修立卡房,派兵驻守。伊斯里克卡位于伊斯里克河中游,大概也在此前后设卡。1890年(光绪16年)10月,英人杨哈四班窜到阿克塔什记称:“在阿克塔什,我们看见有三或四个帐幕和一个中国任命的伯克或头人……在当时帕米尔是被认为中国领土。”^②到1892年英国人敦么尔于10月13日潜入阿克塔什时,亲眼看见该处堡垒(卡房)完全成为废墟,无一完整石块:“完全是俄人暴行造成的结果,中国人他们坚决要俄国人必须给他们重建一个。”^③由此可见清朝在萨雷阔勒岭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七卷。

② 杨哈恩班《一个大陆的心脏》第13章,伦敦1896年版。

③ 顿么尔《帕米尔》卷2,第109页。

以西的卡伦都是被俄国侵占后拆毁的。苏联普罗霍罗夫也说：俄国“占了萨雷阔勒岭一带的哨卡，从而肯定了俄国对该地区的权利。”^①

沙俄虽然用武力侵占了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领土，仍然心犹未甘，总想把帕米尔全部侵占到手，因而仍对我国控制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千方百计进行侵扰。1900年沙俄借口在帕米尔的通信兵被打和驻色勒库尔的驿卒被逐一事，通过俄驻乌鲁木齐领事胁迫新疆当局撤换了驻色勒库尔的旗官戴富臣。接着在1901年，沙俄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又以“办理邮政”事务为名，强迫新疆当局准许沙俄在色勒库尔设立“邮站”^②。于是就以邮站为名进行各种非法的侵略活动。邮站竟然驻扎着一名军官，二十四名武装士兵，一切供应都向当地人民勒索，“稍不遂意，即行鞭责”。搜集情报，走私军火，盗窃珍贵文物，任意收寄民间邮件，非法大量发展俄侨，收买拉拢封建上层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颠覆分裂我们祖国的罪恶活动。所谓“邮站”，实际是沙俄新设在我们帕米尔的侵略据点，不折不扣的军事哨所。沙俄的这些暴行，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阿奇木伯克买买克里木的带领下进行了各种抵制和英勇不屈的斗争。清朝为了保卫帕米尔的领土，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将莎车直隶州升为府，并在其所属的色勒库尔地区设立蒲犁分防通判厅，设通判一名，仍保留正副阿奇木伯克，以加强对帕米尔的防御和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即改蒲犁分防厅为县，正副阿奇木伯克则一直保留到1926年才撤销。所谓沙俄“邮站”，却一直到了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才被我国人民赶走。

综上史实可知，二千多年来帕米尔一直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

^① 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莫斯科1975年版，第170页。

^② 斯克莱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英中俄在新疆的真相》，伦敦1973年版，第124～125页。

下,这些辉煌的历史事实是永远涂改不了的。

(4)沙皇俄国对帕米尔的侵略

沙俄用武力侵并中亚通衢费尔干纳盆地后,洋洋自得地说:“将费尔干纳省这样一个所有方面都是最富饶的地区并入我国,不仅绰绰有余地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取得了进攻中国,甚至攻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基地,我们获得了从这一方面进入这两个国家的唯一通道。”^①这样帕米尔就成了它的邻区,唾手可得了,所以侵略者直言不讳地说:“经过费尔干纳我们可以进入帕米尔地区。”^②

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斯柯别列夫被任命为费尔干省总督后,为了迅速侵占我国的帕米尔,即于1876年7月15日亲自统率8个连、4个哥萨克骑兵中队、1个火炮连和3门山炮侵入我国的帕米尔,所到之处“树起俄国国旗”^③。还带了一些专业人员搜集有关情报,一直窜到阿克拜塔勒山口。

1877年考夫曼又派出了以西弗特洛夫为首的侦察队,从塔什干,经奥什,越阿赖岭窜到喀拉库里湖、朗库里湖、雅什里雅库里湖、穆斯塔格山、萨雷兹及阿尔楚尔帕米尔一带侦察地形,搜集自然及社会情报,前后达两年之久。

1878年考夫曼还向帕米尔地区另外派出了两个侦察队,一支是以马什凯托夫为首的侦察队从特尔斯阿格山口越过外阿赖岭,沿着考夫曼山西到达克则勒苏河南河流域,由于达尔瓦兹及什克南地区发生内乱,不能南窜,被迫东进至喀拉库里湖后返回阿赖。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25页。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25页。

^③ G·N·寇松《帕米尔阿姆河河源》第79页。

另一支是以奥山宁、尼瓦尔斯基、饶地扬诺夫为首的侦察队，于1878年夏天出发，原准备从帕米尔西北直窜至帕米尔南部，因遇阻而被迫于9月返回阿尔梯马萨，仅侦察了帕米尔北边一小部分。

1878年考夫曼还派出了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军事远征队窜入帕米尔西部地区，并越过阿姆河到了巴达克山。

1881~1882年派出克西雅考夫、拉吉尔为首的侦察队从喀尔提锦窜入达尔瓦兹，直到什克南一带。

1883年5月派出以普提亚特、伊凡诺夫、班得尔斯基为首的大规模侦察队，他们花了大半年时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走遍了帕米尔高原各部，直到12月才回到俄境。绘制了帕米尔地区较详细的地图。

自沙俄征服浩罕以后，几乎年年派出各种侦察队深入帕米尔各地搜索政治、社会、自然情报，经过反复调查以后，于1884年胁迫清朝签订了屈辱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个不平等界约是沙俄违背本来就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恣意扩大侵略所造成的，在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后项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而在实际勘界中，沙俄又一再施其狡谋，恃势逞横，不仅侵占了苏约克到浩罕界之间的中国领土，而且非法侵占了铁列克和屯木伦至浩罕界之间的中国大片领土，俄国熊对此仍不满足，还强要把界线定在铁列克和屯木伦以东的伊尔克什坦。

同时在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三条中明确规定南边界线应是“行至葱岭，经浩罕界为界”。那时的浩罕南界是阿赖，阿赖以南是中国的帕米尔，所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末处界牌鄂博只能到玛里他巴尔山口，比狐狸还狡猾的沙俄却“乘我不

觉,竟越玛里他巴尔山口,南侵入二百里,至乌孜别里山口”。^①甚至更进一步的分割我帕米尔领土,在《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末处,擅自写上“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②这就无端侵割了玛里他巴尔山至乌孜别里山以西及其西南大片属于我国的帕米尔领土。由是和什库珠帕米尔全在界外,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西北的一小部分也在界外并入俄国。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是无止境的,侵吞帕米尔也是蓄谋已久的,因此《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不过是沙俄用以侵占我国帕米尔的桥头堡,所以墨迹未干,就决心要对整个帕米尔实行武装占领。但因土库曼还未征服,还不能集中兵力侵吞帕米尔,只是更进一步的加强军事侦察。1887年又派出格鲁姆·格尔几迈洛兄弟侦察了北帕米尔及库得拉河,郎库里湖一带,一直窜到塔什库尔干及叶尔羌河上游各支流。

1888年起沙俄又派出曾是刽子手斯柯别列夫的助手,后来为马尔格兰副省长和费尔干省边区委员的格鲁姆·勃切夫斯基先后五年深入帕米尔各地进行详细侦察,并一直越过兴都库什山深入到坎巨提,企图窜入克什米尔的时候,才被英国阻挡了。经过深入侦察帕米尔及中印边境的政治、军事、地理、气候等情况后,于1891年3月经沙皇政府的精心安排,于参谋总部尼古拉也夫研究院作了题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的报告,大肆叫嚣侵占我国帕米尔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说通过帕米尔的道路,现在便于我们向印度进军,那末毫无疑义,一旦落到英国人手里,这些道路更便于向我国境内进军。并且,当我们需要集中全部驻亚洲兵力的紧急时刻,也会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③

① 《新疆图志》卷五《国界志》。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③ 格鲁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1891年版,第28页。

那时由于有些兵力还分散在土库曼的战场上,还未能帕米尔建立军事哨所,只是进行了军事侦察,炫耀了武力。格鲁姆·勃切夫斯基毫不隐讳地说:“在1876、1881和1882年间,英勇的土耳其斯坦军队组成许多支队,带着庞大的辎重和野炮、山炮,翻越难走的阿赖岭,到达大阿赖谷地,后来又到达大喀拉库里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①

随着沙俄征服驍悍骁勇的土库曼人,在中亚留下的就只有帕米尔未被征服,因而到90年代就可集中全力侵吞帕米尔了。从而沙俄依据格鲁姆·勃切夫斯基的侦察报告,决定以武力侵吞帕米尔。于是侵略军所到之处,血雨腥风,在屠杀各族人民的尸骨上树起了沙俄国旗。

1891年7月沙俄派出土耳其斯坦主力营营长M·杨诺夫上校率领120人组成一支哥萨克侵略军,从奥什越过阿赖山谷,侵入帕米尔地区的阿克拜塔耳、阿克塔什、布才拱巴什及通向印度的一些兴都库什山口,所到之处,“竖杆粘贴”,公然胁迫我国柯尔克孜居民“归属俄国”,强要“阿尔楚尔的吉尔吉斯人和部分什克南人声明,他们不是阿富汗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的臣民,因为俄国沙皇把从萨雷库里到阿姆河都归并了”^②。同时“撤掉了由清朝当局委派的一些当地乡长的职,并任命了一些对俄国有好感的人。”^③还蛮横地驱逐“中国将军张鸿畴及其随从马上离开……并威胁说,如果再来,后果自负”。还把张鸿畴的旗子抢走了。更窜到伊西洱库尔附近,劫走了乾隆在苏满塔什竖立的纪功碑,英国斯科莱因也承认“这块石碑是中国在阿尔楚尔主权的确实证据。”显然是蓄意毁灭帕米尔属于中国的历史铁证。杨诺夫向英国杨哈思班

^① 格鲁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1891年版,第28页。

^② 斯科莱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英中俄在新疆的真相》,伦敦1973年版,第34~35页。

^③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杜尚别1962年版,第288页。

也露骨地说：我们“支队被派到帕米尔的目的，是要制止中国人和阿富汗人在那里肆无忌惮的逞威作福的活动，并恢复我们对这块领土的权利。”^①事实恰恰表明了是杨诺夫在我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

由于英国于1891年出兵侵占了坎巨提，沙俄为了防止英国势力越过兴都库什山抢占帕米尔，就于1891年1月12日，3月15～19日，4月15日和29日连续几次召开侵占帕米尔的特别会议，强调“帕米尔掩护和保证着土尔克斯坦边区的安宁和安全，只要俄国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地区站住了脚，就将有可能在兴都库什山的山麓确定边界。”^②因而决定继续派出武装队伍，深入帕米尔，建立军事哨所，实行武装占领。同时土耳其斯坦弗勒夫斯基一再叫嚣必须跟中国重新勘界，取消臭名远扬的第三款^③，并且建议沿萨雷阔勒岭和慕士塔格山划界，这两架山是阿姆河和塔里木河上游的分水岭^④因为《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款明确规定自乌孜别里山一直向南一线以东的帕米尔是中国的领土，以西是待议区，所以他对第三款恨之入骨。

可是一纸空文是束缚不住侵略者的，沙俄于1892年2月3日派出了勃尔热齐斯基中尉及赫勒勃尼科夫中尉为首的军事侦察队，带领二十名熟练骑手和十名哥萨克，再次窜入我国的帕米尔。当勃尔热齐斯基于4月24日带着十五名侦察兵窜到郎库里湖时，碰到了六十个中国哨兵。“张大人（即张鸿畴——引者）则向他们宣布说，‘整个帕米尔是中国的’，命令立即离开中国领土。”侵略者塔格耶夫说：“同中国的部队发生了冲突”，“俄国军官只好退却”^⑤。这

① 斯克莱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英中俄在新疆的真相》伦敦1973年版，第35页。

②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杜尚别1962年版，第282页。

③ 指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④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08页。

⑤ 鲍里斯·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1902年版，第35页。

是对待侵略者的最好办法。

沙俄鉴于勃尔热齐斯基的失败,于同年6月2日第2次派出了以杨诺夫为首的侵略军,配备了一营步兵,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骑兵山炮连的两个排,总参谋长奥勃鲁乔夫下了严格的命令。在“邻接木尔加布、郎库里和库达拉这一地区里,支队尽力设法通过和平手段把中国的卡伦(哨所)和阿富汗的游动侦察班清除出边区,一定要坚持让中国人离开郎库里的四郊。在从木尔加布周围到库希·巴兰图岭(即兴都库什山——引者)的帕米尔南部地区里,支队司令官应该只限于一般的观察,避免往兴都库什通道推进,必须要注意不让其他的敌手在边区这一部分地方站住脚。”^①他们窜到木尔加布、阿克苏和阿克拜塔尔三条河流汇合处,建立了帕米尔哨所(后来改称木尔加布哨所),作为沙俄侵略帕米尔的大本营。然后派出由捷克尔斯基大尉指挥的侦察队窜到了阿克塔什,赶走了清朝的部队。为了不让清朝部队再回到阿克塔什哨所,杨诺夫即于7月9日命令阿尔辛尼耶夫大尉带率150名侵略军,拆毁了清朝的阿克塔什哨所。杨诺夫则带领部队窜到了伊西洱库尔湖一带,击毙了阿富汗的上尉和9名士兵,伤2人,俘虏7人。以帕米尔哨所为基地,侵略者横行在东自萨雷阔勒岭,南止萨雷库里湖和兴都库什山西及罗善和什克南的广大地域。

中国的阿克塔什哨所被沙俄毁平后,清朝立刻派出一百名骑兵前往阿克塔什重修了哨所。杨诺夫闻讯后,立刻气势汹汹地于同年8月19日带领两连步兵,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四门炮赶往阿克塔什,清军在众寡悬殊之下,只好暂时撤走,重修哨所又被立刻夷平。俄国外交部还假惺惺地说:“鉴于两国友好,他们可以赔偿哨所所有的损失。”^②

^①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杜尚别1962年版,第290页。

^② 斯克莱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伦敦1973年版,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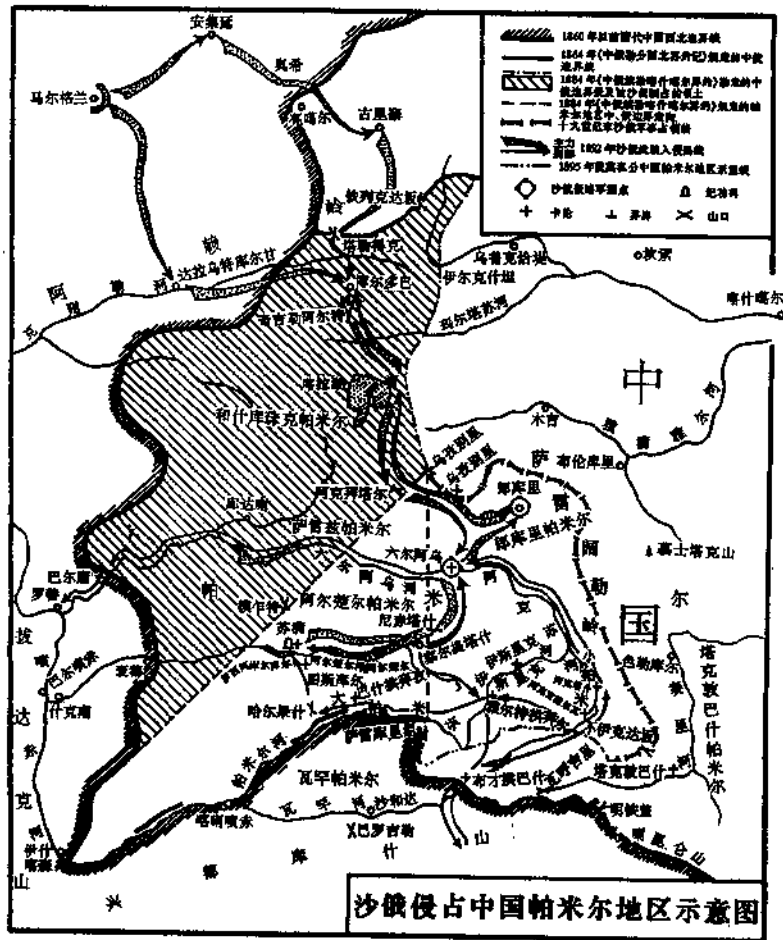


图 10 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示意图

杨诺夫给帕米尔哨所留下八名军官,160名步兵,40名哥萨克,并任命库兹涅佐夫大尉为哨所司令官。于8月25日率部窜往郎库里湖,在那里修筑了哨所,用以封锁喀什噶尔向帕米尔的通道。

1894年,沙俄又派出了一支由杨诺夫将军为总指挥的特遣支队,窜到了西帕米尔地区,镇压了当地一些头目与人民,用武力占领了西帕米尔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以后,才有恃无恐地破坏中俄的划界谈判,并进一步于1895年与英帝合谋瓜分了帕米尔。

(5) 英帝国对帕米尔的侵略

俄国向帕米尔赤裸裸的侵略,完全是基于霸权主义的需要,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借口的,诚如克伯特所说“以惯常的贪欲,俄国人要求全帕米尔属于他们,并且这种基于除贪婪外别无其他理由的要求,却实际被英国人答应了。”^① 英帝国主义完全基于保护印度的殖民利益,当沙俄侵略势力咄咄逼人地从中亚向南推进时,英国由于自己力量的不足,采取步步退让策略,只求能在印度和俄国领地之间找到一块缓冲地带,不直接和俄国势力碰撞,就错认为是万全之策了。因此派出一批批侦察队,深入帕米尔和阿富汗,用政治、军事手段控制阿富汗,使之成为保护国,和沙俄抗衡。另在帕米尔,寻找缓冲地带,防止俄国势力越过兴都库什山。

英国在这种帝国主义扩张思想指导下,于1838年派海军大尉伍德窜到帕米尔的萨雷库里湖一带。1886年英国又派出洛卡尔特上校为首的军事测量队经由吉尔吉特、洪查,窜至帕米尔的瓦罕和喷赤河,侦察地形,绘制地图。

1887年夏,英国的印度政府派出阿尔哲尔农·久兰德中校经

^① R·P·克伯特《亚洲腹地》。

由吉尔吉特到兴都库什山各通道进行军事侦察活动。1888~1889年阿·久兰德以吉尔吉特为基地,设立了一个特别政治代办处,以巩固英国在兴都库什山的南北政治军事势力。

1889年春,以孔伯伦德少校和鲍埃尔中尉为首的侦察队窜入我国塔克敦巴什帕米尔。1889年春天,又派出弗伦西斯·杨哈思班和乔治·马卡尔特内为首的特别考察队,窜入我国新疆及帕米尔等地进行侦察活动。杨哈思班原是英国近卫军龙骑兵大尉,当时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五级文官彼得罗夫斯基向当时的费尔干省省长科罗里科夫将军报告说:“杨哈思班大尉从喀什噶尔来监视杨诺夫上校进行的侦察活动,杰维逊中尉来到驻扎着志愿兵连的阿尔楚尔河监视帕米尔支队”,于是科罗里科夫就下令说:“如果这些英国入手中没有我国政府颁发的允许访问帕米尔的相应证件,那么就把他们打发到中国的界线那边去。”^①因而当杨诺夫于8月17日夜在布才拱拜什遇到带有18人卫队的杨哈思班后,就勒令他立刻离开,杨哈思班虽提出了抗议,杨诺夫却严厉地说:“你们是十八个人,我有二十六个人,……如果你以近卫军龙骑兵的荣誉提出保证,你将在一昼夜的时间里经过瓦哲尔山口,沿着通往中国的塔什库尔干的路跨过边界,并再不……返回来的话,我大概是不会使用武力胁迫你搬出去的。”杨哈思班只好用法文写了一份具结:“遵照俄国政府的指令,我保证明天一八月十八日,搬出到中国领土上去,保证不再……返回俄国境内来,特此交出这份被迫具结的保证书。”^②杰维逊中尉被杨诺夫在阿尔楚尔地区押送出帕米尔,可见俄、英两帝国在帕米尔地区斗争的激烈,同时也看到咄咄逼人的沙俄侵略者在帕米尔已压倒了英国人的侵略势力而且直叩印度的大门了。

由于俄国侵略势力已经迫近兴都库什山,英国于1891年迅速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00页。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01~402页。

出兵占领兴都库什山南面几个重要通道口……坎巨提、雅辛、乞特拉尔。以此为根据地不断派侦察队窜入我国帕米尔活动，搜汇政治、军事情报和测绘地图。

在此同时又唆使其保护国阿富汗王阿卜杜拉赫曼出兵侵占我国喷赤河东面的什克南、罗善、苏满塔什、瓦罕等地区，破坏清朝在那里建立的哨所。《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中记述了我国苏满哨卡被阿富汗军侵占的经过：“（1892年）四月，苏满塔什的中国部队接待了一位阿富汗官员的拜访，这个官员由二十人陪同前往。这位阿富汗官员声称，苏满塔什和木尔加布河的整个领土归属他们所有，他们打算保护这块土地，反对俄国人的侵略，中国驳斥了这一要求。张将军加强了苏满塔什的驻军，着手在这里修筑工事，由喀什噶尔调拨军队，而阿富汗继续停呆在那里，扬言要施以暴力……双方达成全部撤离苏满塔什的协议解决了这一纷争。张将军把军队撤至郎库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是让阿富汗人占据苏满塔什。”这是歪曲事实。因为马继业是英国驻喀什的领事，掩盖了阿富汗侵占苏满塔什及瓦罕等地区的行动是在英国指使下进行的。阿富汗占领这些地区后，英国公然声称：“位于木尔加布河南边的那些地方是属于阿富汗的，而位于这条河北边的土地则是属于清朝当局的。”^①

不断南侵的沙俄侵略者是决不会让阿富汗占有苏满塔什的。阿富汗军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4月20日占据苏满塔什后，6月20日，俄国就派军前去赶走了阿富汗哨兵。英国一看难于阻挡沙俄的南侵势力，向沙俄作出重大让步，以中国土地作交易，提出在帕米尔南边瓦罕走廊地区建立缓冲地带，获得沙俄侵略者的同意后，就以老牌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胁迫清朝政府出卖帕米尔领土。

1892年英国外交部向清朝驻法参赞庆常说：“现与俄商，拟自

^①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2年版，第279页。

萨雷库里湖起,向东划一直线,至中国边界为止,所有直线以南之地归英保护。”英国还为俄国辩护说:“中国所引喀约一直往南之说,细考俄文,并无一直字样,俄国决不允许。”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怕侵略的米尔狡辩:“为中国计,宜择关系边防要紧地方指点明白,与俄力持,或能允许,其余荒塞无用,可以不争。”^① 英国外交大臣劳斯帕力还堂而皇之地说:“英国办事,但顾全局之利害,不计一隅之得失。帕米尔瘠苦不毛,英不争此石田,徒糜兵饷,但于兴都库什山北划一界限,以防俄人侵越,亦是固守边塞。为中国计,与其作无理之争,不若统筹全局,另拟办法,以固边隅。”^② 很显然,英帝是要胁迫中国放弃帕米尔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主权,让英俄任意侵占。

(6)中俄关于帕米尔的划界谈判

沙俄武装侵占帕米尔的广大领土后,即向清朝政府提出帕米尔地区的划界问题。荒唐地提出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分界线,理由是说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款中国界线自乌孜别里山豁一直往南的规定“语太宽混”,强要“自乌孜别里山豁转东而南,顺山脊为自然界”^③,实际是妄图以军事占领线强加给清朝政府。

沙俄另外恶毒的一招是坚持要清朝“先撤卡,后勘界”,其所持歪理是“地既未有定属,不当一国先有卡伦”,“中国不撤卡伦,便是先据其地,俄国故不能允。”^④ 沙俄外交部东方总办格必尼斯更有意歪曲中国在帕米尔设卡时间,胡说什么清朝在帕米尔设卡是在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24页。

③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发陕甘总督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

“去年(1892年)俄参将伊鄂诺弗到帕时前后”,“不过设有一、二年”,许景澄明告说“光绪十年喀城定界约时各卡业已扎设”,“设卡伦已有十年”。并严正说“中国在乾隆年间取得回疆边外,各回部均归所属。所有兵力所到之处,有权可以设卡”^①。同时清朝为了和沙俄早日划定帕米尔的边界,坚持以喀约第三条为中俄间划界原则外,对于所设卡伦提出了合理的主张:“现在留设各卡伦,系从平定回酋阿古柏后扎在该地,历年已久,现在帕米尔地界尚未查勘清楚,万无凭空言议撤之理,然中国仍不改和睦边界本意,所以此时并不将设有卡伦之处认为勘定之地,可以俟两国派员会勘之后,再行商量。若未经勘界,先欲目前撤去该处卡伦,断不能允许。”^②沙俄坚持胁迫清朝“先撤卡,后勘界”,很显然是要解除清朝在帕米尔的武装,可以让他不费兵卒,唾手而得,腐败的清廷虽然在口头上加以反对,而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以武力为后盾,依靠人民,进行斗争。

1891年7月沙俄杨诺夫入侵帕米尔时,我国清朝的一些官吏,甚至像驻俄公使许景澄那样一些人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他说伊鄂诺弗(即杨诺夫)“此次南边所历,尤为人迹罕到,不能耕种,其地之高约一万四千尺,为帕米尔极苦之地,想邻国必不我羨而直起争心也。即在俄国亦非欲掘其地修备,只以生齿日繁,藉为游牧之所耳……所立木牌,戴巡阅事,旋即撤去。”^③所以杨诺夫入侵帕米尔后,清朝即向沙俄提出抗议,沙俄始谎称只到俄属的和什库珠帕米尔,并非中属的苏满塔什帕米尔;继则妄称越境系打猎,俄外交部被迫承认嗣后不再越境,所立木杆,也听“中国拆毁”。^④清廷信以为真,没有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用武力驱赶出去,一直到杨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

^② 《许竹笈先生出使函稿》第六卷,第十页,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12卷。

^④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

诺夫侦察完毕,看着他扬长而返后,才派出张鸿畴带兵驻防苏满塔什,沙俄捷连季耶夫说:“杨诺夫支队刚一离开帕米尔,中国立刻把自己的岗哨派到了木尔加布河的上游地带和阿尔楚尔河跟前”^①

清廷尽管派出军队加强了设在帕米尔的各哨所,可是采取的方针,却是见敌人就避,敌人走了,就追。因而一个一个哨所任凭沙俄侵略军拆毁,这完全是由清廷不抵抗的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怪不得沙俄侵略者塔格耶夫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中国人(指清朝——引者)的外交使我觉的可笑,他们在和我们玩‘捉迷藏’。只要我们离开了某个据点,他们就出现在那里,但只要我们的部队刚要开来赶走他们,他们在头天晚上就得到吉尔吉斯人的警告而消失了。”^②用这样的态度保卫领土,只能任凭敌人横行,我们只能被动挨打,没有不失败的。

清朝在1892年9月29日由军机处给驻俄使臣许景澄的谈判原则是,可向沙俄外交部“告以帕为中属,有会典及图志确证。惟约(指喀约——引者)既申明界线,则中线之西,俄线之东,中间空地可以相让酌分。”沙俄外交部总办格必尼斯却诡辩说:“喀城分界条约立未多年,我们如何不记得?”这种丑态,完全是一副无赖相,继又狡称:“此约所云乌孜别里山以下之地,语意实在过于宽混,难于作准。”强要“以萨雷阔勒地方分界”^③。在沙俄的心目中哪有什么条约呢?只要侵略军所到之处,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边界线。所以一味退让,不以实力为后盾的谈判,无异是缘木而求鱼。

沙俄杨诺夫支队于1892年侵占帕米尔,并在那里设卡驻兵后,清朝即向沙俄提出质问和抗议,并言明郎库里、木尔加布等处“在乌孜别里往南之东,应属中国界,故请退兵。”沙俄格必尼斯狡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05页。

②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51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

辩说“只因夏天俄兵经过之路业已阻住，现在穆尔格阿布河（即木尔加布河——引者）之卡兵要借（此）递信或资马匹放牧之用，却无别意。”^①明明是沙俄强占了我国之郎库里，清朝一再坚持要俄国撤退郎库里之哨兵，沙俄却凶横地说：“贵大臣今日来说之地（指郎库里——引者）亦因未分清楚，故我们以为可以驻兵。”^②这才真正是弱肉强食者的语言。这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帝国主义者必须以实力，以战斗来进行谈判。

请听沙俄蛮横逞凶之辞：1892年10月25日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俄外交部总办格必尼斯说：“中国以喀约为据，该地东边之地应属中国，无可改移。”答称：“我们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之处，亦无可改移。”告云：“可惜贵国所认定者，无两国商定之凭据。”答称：“岂不说过，喀约不明白，难作凭据。”沙俄的狰狞面目于此暴露无遗。1893年1月29日沙俄外交部长吉尔斯又气势汹汹地说：“俄本拟以萨雷阔勒山为界，今愿以此山之西请中国指实何地应画入华界，俄可和商。若无地可指，浑执喀约，俄国只好自办。”^③沙俄蓄意撕毁喀约的丑态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进一步提出种种歪理，以图久占帕米尔。沙俄外交部长吉尔斯始则说，中国前将乾竺特全部之地拱手与人，现在某国在彼驻兵，据为己有，以致帕地受迫。何以坎巨提让之如此容易，帕米尔在中国实为无用之地，反如此沉重！继之又说“帕米尔向归浩罕，（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清驻法参赞庆常立即驳斥说：“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进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兵）卡，见于贵国公牒；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一则贵国游历将牟，皆谓之东境归华管辖，未有定界，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成约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

尤为坚固。”^①

由此可知,沙俄种种遁辞,都是狡辩,一驳即倒。沙俄鉴于清政府坚持喀约划界的立场严正,就和英国密谋,牺牲中国在帕米尔的领土主权,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广大帕米尔疆土。沙俄外交部长吉斯公然说:“现在英国商议帕事,英国虽争小帕,而小帕以北地方听俄处置,英不与闻。即小帕地界,英亦酌量割让,是英国受商而中国转不受商。与其同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若与英国商定一切。”^②这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俄英在中国帕米尔地区都同样如狼似虎地蹂躏我国土地,勾结起来,离割中国土地,同是一丘之貉,不过沙俄比英国做得更狠更毒一些罢了。

沙俄以武力侵占我国帕米尔二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时,清朝正面临日本侵略的严重局势,一时无力逐出入侵帕米尔的殖民军,只好于1894年3月底被迫同意沙俄提出的“目前事实上所形成的状况在未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保持各自的位置并将命令主管机关不得超越上述位置。”,在同年4月17日的复照中,中国对享有帕米尔领土主权,作了严正声明:

一、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议定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

二、采取上述措施也并不表明终止目前的谈判,并希望由于中国现在对俄国所作的重大让步,圣彼得堡内阁定将接受中国的上述建议。

帝俄政府于4月23日的复照中,也接受了清政府保留帕米尔领土主权的声明,并进一步说:“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

到最终解决为止。”^① 这些换文突出表明：

(1)不是划界条约,而是双方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协定。

(2)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仍然是中俄间解决帕米尔边界问题的唯一有效依据。

(3)中俄间的帕米尔边界是未定界,还有待谈判定界。

这样,尽管沙俄有意中断和破坏了中俄间的谈判,并不顾清政府的一再抗议,私自和英帝瓜分了我国的帕米尔,可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仍然是划分帕米尔边界的唯一协定。武力强占中国萨雷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地方,仍是中国的领土,在此线以西也还是中俄间的待议地区。恩格斯早已指出:“至于谈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②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早已严正指出,“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用强力扣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土地或殖民地(像土尔克斯坦、蒙古、波斯)”。^③

(7)1895年俄英瓜分我国帕米尔

当沙俄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站稳脚跟,南下黑海出地中海的愿望一时受阻,正飞马进向中亚,咄咄逼人地向印度洋推进的时候,被称为日不落的老大英帝国主义已有力难从心,捉襟见肘之感,为了保护他已得的印度殖民地,就必须尽力阻挡沙俄南进的势力。帝国主义之间从来都是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的。英帝当时为了阻止俄国势力不越过阿姆河进入阿富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版。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恩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

^③ 列宁《有没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1917年6月20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页。

汗,与沙俄一起策划了许多不可告人的阴谋。据英国罗林孙的揭露,沙俄所以能集中力量征服希瓦,也是得到了英国对于沙俄“在希瓦之役的同意”,以此换取了沙俄同意英国提出的“以阿姆河为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建议”。^①

英俄于1872~1873年背着中国和阿富汗人民签订《格兰威尔—戈尔恰科夫协定》(又称《英俄协定》),就是英帝谋图牺牲部分阿富汗的利益,以求和沙俄在中亚保持均势,该协定规定阿姆河支流喷赤河右岸的罗善、什克南和瓦罕北部为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阿富汗北部则以阿姆河为界划分英俄的势力范围。这样就把帕米尔西部最好的地方——什克南和罗善通过英国之手送给了沙俄。

英国为了保护他在印度的殖民利益,首先向俄国提出在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瓜分帕米尔,对此俄国的哈尔芬以霸主的口气指出:“提倡在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瓜分帕米尔的主要发起者的英国,自然是不能在那里用自己的力量同俄国抗衡,而且不列颠当局也不敢在这个地区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宣称对帕米尔有连续继承权的彼得堡。自从俄国支队在那里驻上了以后,就只能借助谈判,来最终解决问题了。”^②

由此可见,俄英私分帕米尔发起者虽是英国,而实际操纵者却是俄国。

直接促成俄英二帝国私分帕米尔的非法活动,还是由清朝的腐败和积弱所造成。如果清朝能及时把沙俄武力赶出帕米尔,俄英就无由进行瓜分。所以哈尔芬明确说:“1894年4月,中俄互换照会,两国通过换文,保证不破坏在帕米尔已形成的状况,并严格保持诸强国在那里的占领的地区的完整。”^③就因有了中俄间的换文,才能使俄英背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土地上完成瓜分我国帕米尔

① 罗林孙《英国和俄国在东方》,伦敦1975年版,第312页。

②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399页。

③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399页。

的阴谋。

俄国为了侵吞帕米尔,在1893年3月8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与英国瓜分帕米尔的几条原则:

(1)必须完全彻底遵守1872~1873年的俄英协定。

(2)必须把“一年四季都适合于生活”的西帕米尔的什克南、罗善归并给沙俄,要英国劝说阿富汗让出来。

(3)把布哈拉占领的达尔瓦兹南边的左岸部分给阿富汗。

然后迫使英国同意了这个决定。英国为了说服阿富汗放弃喷赤河以东的什克南、罗善地区,于1893年10月派出了英印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秘书亨利·热麦尔·久兰德为英国驻阿富汗的外交使团,当时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是“向埃米尔说明,必须撤出俄国要求的什克南和罗善的东部地区,以及达成一项关于印度—阿富汗边界的友好协议”。沙俄外交部首脑吉斯则同意英国提出的从萨雷库里湖起到中国“领土”(指清朝实际控制线——引者)为止作为分界线的初步方案。他认为把瓦罕盆地的东部保留在阿富汗手里,可以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建立一个阿富汗土地的缓冲地带”^①。

俄英间作了这些幕后交易以后,即于1895年2月25日签订了俄英关于在阿富汗和俄国之间勘分帕米尔领土的条约,规定“在维多利亚湖以东的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是从该湖最东边的一点起向东划一条直线,沿山脊稍微较该湖的纬度偏南,一直到班得尔斯基和奥尔塔贝尔山口,然后两国政府都不在这条线以外有政治活动,而在英国势力范围的兴都库什山与维多利亚湖东端起到中国边界的界线之间地方,应为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不能并为英国领土,并且不在那个地方设立堡垒或哨所。”^②

到此只留最后一步派出人员进行勘界了。因而俄英国即于

^①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403页。

^② R·P克伯特《亚洲腹地》附录九,第344~355页。

1895年7月间各自派出了帕米尔的勘界委员会。

俄国派出的勘界人员：

首席代表：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费尔干省军事总督)

代表团成员：扎列斯基上校(帕米尔哨所要塞司令)

宾捷尔斯基(地形测绘员)

帕纳费丁(俄国前巴格达公使)

加尔金上校(曾潜入塔里木盆地及伊犁侦察)

维里马博士

四位青年军官，四十名哥萨克护卫队，十八人组成的军乐队，大量当地的熟练骑手和驮运队。

英国派出的勘界人员：

首席代表：久兰德少将(驻阿富汗公使)

代表团成员：何尔狄赤上校(曾写过三角学和天文学著作)

威亥勃少校

斯瓦伊宁大尉

阿利柯克博士(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及博物馆馆长)

马卡尔提内伊

三位专搞地形测量的专家

代表印度政府参加委员会的是：勒索利多尔·扎鲁格·汗，萨希勃·阿卜杜尔·加法尔

阿富汗方面的人员：

古里雅姆·穆罕默德·金·汗

阿舒尔·穆罕默德·汗(神学家兼法学家)^①

俄英两国的混合勘界委员经过在帕米尔萨雷库里湖畔两个月的密谋，终于在8月27日埋上了最后一个界桩。英国首席代表洋

^① 以上材料参见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19～423页；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8年版，第1卷，第320页。

洋自得地说：“这儿是帕米尔问题的终点。”^① 1896年元月沙皇批准了这个非法条约，沙俄外交大臣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也骄傲地宣称：“俄罗斯帝国完成了中亚的归并。”^② 并把非法侵占我国的帕米尔，在东部柯尔克孜人居住的地区划分为帕米尔和奥罗绍尔两个乡，归弗尔干省管辖，西帕米尔的什克南、罗善和瓦罕北部归布哈拉埃米尔管辖。实际这里的管辖权仍“操在帕米尔支队司令的手中”^③。

尽管沙俄在批准俄英关于帕米尔的非法协定时也宣称：“存在于两国间的较好的结果，比缔结的条约本身，使人感到更大的满意。”^④ 实际这是外交辞令，而对留给阿富汗的瓦罕走廊是始终不甘心的，只是在俄国的军力暂时还不能完全战胜英国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做出了这样的临时安排，所以1895年两个帝国主义强盗瓜分帕米尔的墨迹未干，沙俄侵略者已经不停地叫喊要抢占瓦罕走廊了。

捷连季耶夫不满地说：“兴都库什山的北边通道，留给了阿富汗。也就是说实质上这些通道到英国人手里了。”^⑤ 阿·鲍勃林斯基也埋怨说：“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些道路，我们在1895年按英国提的要求毫不吝惜地送给了阿富汗，亲手把阿富汗和中国联结在一起了，我们把从南、东两方包围住帕米尔的阿克苏谷的南部让给了阿富汗人”^⑥。入侵帕米尔的塔格耶夫更叫喊说：“瓦罕转到了阿富汗帕米尔的控制之下，而且俄国要坚定地立足于兴都库什山的一切渴望，也因这次勘界落空了。”^⑦ 可见抢占瓦罕走廊，立足兴都

①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404页。

②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404页。

③ 伊斯卡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8年版，第1卷，第330页。

④ 伊斯卡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30页。

⑤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23页。

⑥ 伊斯卡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8年版，第1卷，第334页。

⑦ 鲍里斯·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1902年版，第144页。

库什山是沙俄既定的侵略方针,现在只是时机还未到罢了。只要时机一到,就会像猫抓老鼠一样立刻吞掉的。

但是,俄英帝国主义瓜分我国帕米尔,遭到帕米尔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掀起了反抗俄英政府统治的斗争,逃避俄英侵略者的苛捐杂税,多方宣传迁移到中国现管的境内来。侵俄英略者得悉后,残酷地虐待被侵占的各族牧民,甚至设置监狱,制订刑法,阻止他们迁移出境。1895年5月23日费尔干纳省参谋部向土耳其斯坦军区的司令官气急败坏地说:“帕米尔勘界线,诸多不便,对东帕米尔的游牧居民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值得耽心的是,尽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不可能阻止住那些现在占据着木尔加布以南的游牧站的牧民,迁移到邻近的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地区去游牧,这是由于根据最近和英国签订的协定,确定了我们的南部帕米尔边界,使这些居民处在一种不利的环境中”。^① 侵驻我国帕米尔的俄国官兵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只像置身于一个敌国里一样,行走在他们那里贫苦不堪,空无人烟的村落里。”^②

(8) 苏联侵吞瓦罕走廊

沙皇俄国追求世界霸权是从1682年彼得大帝掌权后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沙皇俄国“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他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③ “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

^①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8年版,第1卷,第331页。

^② 伊斯坦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史纲》,第116页。

^③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① 在向外扩张时,拼命追求海洋,北出波罗的海,南争黑海、出地中海,东趋太平洋,东南出印度洋,是沙皇既定的国策,是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侵吞中亚,强占帕米尔,进军印度,称雄印度洋是它侵略扩张的既定路线。

沙俄向外扩张的指导思想是要侵占整个帕米尔,再南下印度,扬帆印度洋。所以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墨迹未干,它已进军帕米尔,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帕米尔领土,又与英帝瓜分我国帕米尔,表面同意英国提出的以瓦罕走廊划给阿富汗作为两大帝国缓冲地带的涛声还未降落的时候,一小撮扩张主义者又在鼓噪把俄国国旗插上兴都库什山了。

屠杀中亚人民的刽子手、考夫曼的主要助手斯柯别列夫将军于1882年向英国的马文说:“阿姆河是一条河,河不是好边界,所以我们要求以兴都库什山为我们的属地和你们的属地的边界。”^②

1891年9月初俄国土尔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从马尔格兰窜往阿赖侦察后,向参谋总部提出专门报告,狂叫必须“取消”第三款,沿着萨雷阔勒岭“跟中国重新勘界”;同年十二月他又上书陆军大臣,叫嚷俄国“需要帕米尔”,还提出了以兴都库什山为俄国南界的方案。^③

1892年3月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等叫嚷:“帕米尔掩护和保证着土尔其斯坦边区的安宁,只要俄国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地区站住了脚,就有可能在兴都库什山的山麓确定边界。”^④

19世纪末叶,沙俄的外交部长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更发

^①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

^② G·N·寇松《俄国在亚洲“不定”的边界》,《十九世纪月刊》第25卷,1899年1~6月。

^③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04~405页。

^④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8年版,第1卷,第287~288页。

誓说：“一旦有适宜的机会，就把整个阿富汗的土尔其斯坦从阿富汗手中夺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就将会被硬压着离开阿姆河和喷赤河。那末，他们也就会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那片帕米尔地区丢掉。”^①

可见在一小撮沙俄侵略者的心中早就把兴都库什山看成是沙俄和印度之间的边界，所谓瓦罕走廊的缓冲地带从未在这些霸权主义者的心中留下过痕迹。

但是，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强烈谴责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严正指出：“沙皇俄国把征服中国领土，征服与俄国边界接壤的领土上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任务。为此不择手段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它是和其他帝国主义一起推行这个政策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和俄国一起蚕食中国人民的主权和权利，掠夺他们的财富。”这是对沙皇侵略政策的无情谴责，并郑重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②因此在1924年5月3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③。列宁的政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实现。

苏联霸权主义者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列宁主义，继承老沙皇的扩张侵略衣钵，继续向世界各地扩张，在1979年派出大军入侵阿富汗，扶植了以卡尔迈勒为首的傀儡政权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胁迫这个傀儡政权把瓦罕走廊交给苏联。据1981年7月26日阿富汗通讯社报道：“卡尔迈勒已把关于将阿富汗东北的瓦尔走廊地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彼得堡1906年版，第423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18~21页。

③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2页。

区并入苏联的文件正式交给勃列日涅夫。”即在莫斯科签订了“阿富汗—苏联边界协议”。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是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喀布尔傀儡卡尔迈勒。签订这个协议的目的“是要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瓦罕走廊并入苏联，以便切断阿富汗—中国的边界，并同巴基斯坦有直接边界”^①。

实际上苏联用坦克、大炮、飞机大举入侵阿富汗后，即行武装控制瓦罕走廊。1981年8月30日“新华社”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出的一则电讯说出了苏联侵吞瓦罕的真相。电文称：“瓦罕地区长八十公里，宽五十公里，已有军事设施五处驻有苏联军队，而阿富汗政府军官兵都不准入。六个月来，苏军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仅有十五公里宽的阿什卡萨姆地带周围设置了许多军事哨所。……在过去五天中，几十架苏联直升飞机在阿富汗境内靠近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巴达赫尚省的瓦罕地区进行频繁的空运。”1982年4月间“新华社”据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人士说：“苏联正在阿富汗同苏联、中国和巴基斯坦接壤的战略要地瓦罕走廊修建一个大型空军基地……在接近中国边境的瓦罕，还在修筑了一条全天候公路。”^②可见苏联所以要把瓦罕并入苏联，作为军事禁区，就是要用以威胁中国和巴基斯坦，以达到老沙皇梦寐以求的立足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洋的目的。

苏联对瓦罕走廊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塔斯社”才向世界公布说：1981年6月16日在喀布尔签订了苏联和阿富汗之间从佐尔库里湖西岸到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峰（中国称克克拉去考勒峰）的边界走向条约。这个涉及到我国帕米尔边界的非法条约，我国各族人民闻讯，自然要愤慨，我国人民政府理所当然要给以揭露和驳斥。所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即于7月22日严正提出“该条约涉及中苏帕米尔争议地区”。所以郑重声明：“在中苏两国政府

^① 《参考消息》1981年7月29日。

^② 《新疆日报》1982年4月21日。

之间的边界谈判尚未结束,帕米尔争议地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同第三国签订涉及中苏帕米尔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①

中国政府及时揭露了苏联的侵略活动,苏联政府急忙于1981年8月11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胡说什么中苏帕米尔地区的边界是“历史形成”的,是“通过1894年的换文从法律上肯定下来的”,现在提出说帕米尔争议地区是中国方面“臆”造出来的。这种为沙皇俄国非法侵占我国帕米尔领土进行辩护的外交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篡改历史,只是更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凶恶面目。以上引清政府和沙俄于1894年的换文就是中国和俄国间在帕米尔地区还存在未定界的有力佐证。同时在1926年3月25日中国政府给早期苏联政府的节略中也还指出:“帕米尔地方本系中国领域,于1892年被前帝俄政府以借境为言派兵强占,迄今成为悬案。”同年4月14日,苏联政府给中国方面的节略中表示“至从前从未划界之处,亦应另定新界。”^② 这些铁的历史事实是歪曲不了的。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虽一时占据了瓦罕走廊,并胁迫签订了非法的所谓“边界条约”,不仅遭到阿富汗各族人民的愤怒声讨,同时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声谴责。最后只好在阿富汗人民的打击下灰溜溜地撤出了阿富汗。

(9) 中华儿女围剿侵略者

几千年来,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帕米尔在古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历代都受中国的统治,那里的各族人民长久沐浴着灿烂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23日。

^② 《光明日报》1981年9月1日《我外交部有关人士驳苏联外交部声明》。

中华文化,他们热爱祖国,一贯英勇反抗外来侵略。帝国主义侵略者原以为在这人烟比较稀少的世界屋脊上,只要施展各种狡诡阴谋,就可轻易地侵吞到手。哪里知道他们窜入我国的帕米尔领土后,到处响起了“我们是中国人”的自豪和光荣的语言,回旋在峻岭山野,回荡在草原湖泊,使得敌人心惊胆粟。

1890年英国杨哈思班从南面窜入帕米尔侦察后,回到伦敦,就向报馆说:“帕地回民,最尊服中国。”^①而英国斯坦因于1900年从乞特拉尔向北走向帕米尔时,到达雅尔浑河和马斯杜日河一带时,“当地的传说往往将后来的遗迹同朦胧不清的中国入主时期连贯起来……唐代中国的势力横越帕米尔甚至及于兴都库什山南的暂时扩展而言,在四面阻绝的山地里,这种当地的传说是极可重视的。”^②窜到伊西洱库尔出口处再向当地人探查历史情况时,他所听到的当地的传说,依然是“断断续续的中国统治”^③。斯坦因就在这座湖的不远处又看到中国的一个奇迹,据他说“湖边亦木塔什峭壁顶上,那里有一座小庙,以前庙内曾有一块纪乾隆二十九年战胜的汉文石碑,1892年6月22日被约诺夫大佐……部下的哥萨克兵把附近一个卡子中最后的阿富汗守兵扫荡之后;遂将汉文石碑移到塔什干博物院,但是白石的碑座依然存在。两千年来中国的威力屡屡及于伊摩斯山外,今抚遗物,如在目前!”^④确实,在帕米尔到处都是有关中国的传说,到处都是有关中国的文物,在世界屋脊上,他才更感到中国这样一个巨人是不会倒的,不得不慨叹而又惊奇地说:“中国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还不如说是由于帝国派在这些地方的政治代表外交手腕之运用得当,以及中国优秀的文明的力量。”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

②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30页。

③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225页。

④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217页。

1892年俄国侵略军窜到伊西洱库尔的苏满塔什时,柯尔克孜人就向侵略者说:“中国人的驻防部队在这里驻扎过。他们的将军要求我们的头人每年到他那里去磕一次头,当然他们之中每个都要给将军带去一只羊或一头牦牛,富裕些的有可能带去一头骆驼——这里包括了我们的全部进贡。谁想在1888年阿富汗人猝然来临,中国人不想让他们占领雅什里库里,但是力所不及,结果阿富汗人把他们驱逐出了哈尔果什,拆毁了他们的堡垒,并在阿尔楚尔河岸驻扎了军队。”侵略军追问:“谁在这里时,你们生活得更好些?”柯尔克孜人回答说:“还是中国人在这里好,阿富汗人是些凶恶的野兽”,“他们抢光了我们,用暴力夺去了我们的妻子和女儿。”^①沙俄侵略者当然比阿富汗人在那里的统治更坏,入侵帕米尔时被杀的柯尔克孜人民不知其数,稍有不平和反抗,就遭监禁和屠杀,大军所过之处,丁壮被掳,牲畜被抢,激起了人民无比的愤怒。

当侵略军窜到我国的阿克塔什哨所时,柯尔克孜的村长告诉侵略者,他们是“中国臣民”,侵略者在深入调查以后,不得不下结论说:“必须指出,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是非常拥护中国人的,喜欢中国人,并且非常愿意服从全权中国皇帝的意志,首先这种喜欢是来源于中国人不向游牧民族征收任何赋税,不欺压自己的游牧民族的臣民,只要求他们的村长每年到塔什库尔干古堡去拜见张大人一次。这样的负担,吉尔吉斯人当然完全可以接受。”^②柯尔克孜族的村长严正警告侵略者说:“中国人在阿克塔什堡垒驻扎着驻防军……中国人是优秀的射手。”侵略者说,他们“尽量吓唬我们,希望我们马上掉头回去”^③。

^①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5页。

^②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5页。

^③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26页。

在帕米尔的西部,喷赤河右岸什克南、罗善一带地区,中国的影响也是为世代人民传诵不已的。尽管在沙俄未入侵前,阿富汗人在英国的唆使下,赶走了中国驻军,但是中国的影响是消除不了的。1893年8月沙俄从帕米尔哨所派出以万诺夫斯基为首的一支侵略军入侵帕米尔西部罗善区的雅兹古拉姆山谷,要向塔吉克居民购买食物时,他们根本不要俄国的货币,只有中国或阿富汗的硬币才能通用。^①可见中国影响在西帕米尔的久远和深刻。

1876年屠杀中亚人民的刽子手斯柯别列夫征服浩罕后,对各族人民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压迫,于是柯尔克孜族的阿卜杜拉伯克在阿赖山区发出了抗击侵略者的庄严号召;这时不仅阿赖山区的游牧民参加了起义,被征服的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孜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也因不能忍受沙俄侵略者的压迫,都跑到阿赖参加起义。

沙俄侵略者开始蔑视起义人民的力量,以为很容易平服,仅派出伊斯波拉德伯克大尉带率半个步兵营前往镇压,可是当他们窜过伊斯法伊拉姆峡谷到达劳特库尔干堡垒时,遭到了高不可攀的悬崖上的阿卜杜拉伯克起义部队的伏击,被迫退了回去。于是沙俄只好派以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斯柯别列夫亲率大批侵略军前往阿赖山区。满以为大部队一到,就可很快歼灭起义人民,事实却相反,当他耀武扬威地窜到亚加恰尔特峡谷时,起义人民早已占领了这个险要的峡谷,并烧毁了桥梁,切断了通道,躲在石砌鹿砦后面猛烈地向侵略军射击,“在阿卜杜拉伯克的炮火袭击下付出很大牺牲。”^②迫使斯柯别列夫不得不“很快承认无法向这些山民进攻”^③。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绕到起义部队的后面去袭击。当阿卜

^①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6页。

^②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6页。

^③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6页。

杜拉伯克发现退路已被截断时,取小道迅速地躲过敌人的追袭,带领起义人民从外阿赖山到了帕米尔,而沙俄派出的一支别动军则被诱人外阿赖的腹地,于暴风雪的袭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于喀拉库里湖边。后来因众寡悬殊,阿卜杜拉伯克只好带着自己的弟弟马合木德、哈桑伯克及一部分起义人民,越过帕米尔暂时到了阿富汗,徐图再举,并且嘱咐留在帕米尔继续抗击沙俄侵略军的骑手们“不要向异教徒投降”。敌人也不得不说,在这之后侵略军进到阿赖山谷时,依然不时遭到起义人民的袭击。

阿卜杜拉伯克抗俄的英雄业绩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心中,他的英名和帕米尔一样长存,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后 记

在父亲的遗著《西域历史地理》(第2卷)出版之际,我临窗遥望天山,不禁百感交集。

父亲苏北海,原名王仁南,1915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早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甘肃任历史教员。1945年初来到新疆工作,1948年在新疆大学的前身新疆学院任副教授,1949年参与新疆和平起义。1950年到1957年,历任中共新疆分局研究室研究员、新疆八一农学院教员、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二十年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平反落实政策后,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1988年光荣离休。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研究新疆史地。重返新疆大学任教时,已是64岁的老人,该是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和科研,从此辛勤劳作二十年,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99年5月31日凌晨3时15分与世长辞,享年84岁。

父亲数十年潜心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史和西域历史地理,旁及民族学、岩画学、丝路文化等学术领域,专业精通,学养深厚。曾开设中俄关系史、新疆古代民族史、哈萨克史、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课程,教授各民族大学生数百人,指导硕士研究生9名,少数民族青年教师3人,学生遍布天山南北,有的还考取了博士研究生。师生们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和勤勉的学风所敬佩,是公认的一代名师。这二十年间,共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总计达一千余万字,创造了优质高产的科研纪录。有4部著作荣获国家级优秀奖。其中《西域历史地理》(第1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岩画》三部专著,分别荣获全国高校第一、二、三届人文社会

科学优秀著作二、三等奖，均属新疆唯一获奖的学术著作。

父亲以其在科研上的显著成就和重大贡献，1986年被新疆人民政府授予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7月，应邀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科学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父亲曾兼任多种职务，事迹入选多种权威辞书，并被国内外报刊电视广泛介绍。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名彪西域史，人去书长留。他的肉体虽然火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将在那上千万字的学术著述中永不止息地搏动！

父亲在新疆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爱祖国、爱新疆、爱各族人民，一生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以强烈而持久的爱国主义情感，兢兢业业，勤奋研究，不断有佳作问世。二十年间多次踏上艰苦的野外考察之路，跋山涉水，不避寒暑，足迹踏遍天山南北，行程达30万公里。在家则常年终日伏案写作，节假日也不例外，临终还留下来不及出版的200万字的书稿。遵照父亲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向天山南北。天山埋忠骨，遗爱在人间。父亲，安息吧！

在父亲的遗著《西域历史地理》(第2卷)出版之际，我代表全家向关心此事并给予我们帮助的国内外友人、各级领导和新疆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王志红

2000年5月31日

父亲逝世一周年，写于新疆大学